伟人毛泽东丛书

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WEIREN MAOZEDONG CONGSHU

邓力群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小飞
黄修义
覃永辉
版式设计：博　尔
耿文国
装帧设计：沈秋红
董雁飞

伟人毛泽东

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 邓力群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5

（伟人毛泽东丛书）

ISBN 7-81056-769-1

Ⅰ. 政… Ⅱ. 邓… Ⅲ. 毛泽东思想—政治理论—研究 Ⅳ. A8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0234 号

书　　名：伟人毛泽东丛书
主　　编：邓力群
出 版 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发行部）68472815　68933837　　传真：68472751
电话：（总编室）68932218　　传真：68932447
印 刷 者：北京仰山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者：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980（毫米）　1/16
印　　张：748.5
字　　数：1262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书　　号：ISBN 7-81056-769-1/A·11
定　　价：1590.00 元（精装本　全 24 册）

版权所有　翻录必究

◇伟人的一生
◇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经济战略家毛泽东
◇军事战略家毛泽东
◇外交战略家毛泽东
◇哲学大师毛泽东
◇文化巨人毛泽东
◇毛泽东人际关系
◇毛泽东逸事
◇毛泽东家系
◇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伟人已逝
风范犹存

伟人毛泽东丛书

Wei Ren Mao Ze Dong

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

他，是伟大的思想家、诗人

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他，就是**毛泽东**

总　　目

毛泽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 沙健孙(1)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 张启华(391)

毛泽东国家学说 …… 刘德厚(565)

毛泽东与党的建设 …… 罗小凡(837)

毛泽东政治战略理论与实践 …… 唐春元(1059)

毛泽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沙健孙　著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人民革命的新阶段 …… (5)
一、中国人民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 (5)
二、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 (13)
三、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 …… (19)
四、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 …… (28)
第二章　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理论 …… (40)
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 …… (40)
二、毛泽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 (44)
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49)
四、毛泽东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团结战斗的旗帜 …… (62)
五、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 (65)
第三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 (78)
一、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 …… (78)
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 …… (81)
三、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 (86)
四、革命的参加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 (95)
五、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 (107)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 (122)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 (129)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 (129)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 (143)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 (172)

第五章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 (188)
一、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 (188)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203)
三、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 (220)
四、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 (232)
第六章 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 (238)
一、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238)
二、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 …… (247)
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 …… (251)
四、特定条件下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 …… (271)
第七章 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 …… (284)
一、在斗争中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 (284)
二、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 (290)
三、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 (298)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 …… (318)
五、正确认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 …… (329)
第八章 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 (344)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 …… (344)
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 (352)
三、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 (359)
四、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 (372)

第一章

中国人民革命的新阶段

一、中国人民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度。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以来,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的斗争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几乎没有间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的斗争由于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规模之宏大,群众动员之广泛,社会变革之深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而且会发生这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呢?

1949年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美国果务卿艾奇逊在为发表美国国务院关于美中关系的白皮书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件中,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说明。

其一,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按照这个说法,中国是由于人口多了,饭少了,所以才发生革命的。

从现象上看,事情似乎是这样。中国人民由于被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才被迫奋起抗争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把他们推向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的呢?是人口过剩吗?不是。我们知道,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旧中国确实存在着人口过剩的问题。只是这种人口过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的人口过剩,是由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反动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区,

广大人民陷入了饥饿的境地，这里的社会秩序动荡，群众反抗现存政权的斗争不断发生；而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那里的社会秩序稳定，人民与政府亲密无间呢？为什么在旧中国，只有四亿多人口，就发生了“人多了，饭少了”的问题，以致人民不得不起来造反；而到了新中国，人口逐年增长，今天比解放前夕几乎增长了2－3倍，群众性的温饱反倒获得解决，广大人民反倒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呢？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艾奇逊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其二，艾奇逊说：“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这里，艾奇逊把事情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弄颠倒了。事实上，“不是什么西方思想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①。中国人民正是由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感到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陷入了饥寒交迫和不自由的境地，才“骚动和不安起来”，才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找救国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的。这些西方思想的传入，在一个时期内确曾对中国人民起过某种启蒙的作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思想旗帜的。“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它们并不能帮助中国人民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很快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并不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旗帜下，恰恰相反，是在否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之后，才具有波澜壮阔的伟大声势，走上胜利发展的康庄大道的。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之后，这个革命在国内的主要对手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首脑蒋介石写过一本题为《苏俄在中国》的书，总结自己在大陆上反共失败的教训。在这本书中，他把中国社会发生革命变革的原因归结为苏联在中国的“阴谋”。他说：“苏俄诱惑群众的宣传，就是使他们误信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为达其乌托邦之惟一捷径”。“本党和政府虽看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并“确立坚决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与国际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13页。以下引用《毛泽东选集》的文字，均不再注明该书的版本。

而终于失败"。

在这里,蒋介石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讲了一篇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在长时间里,国民党统治集团掌握着全国政权,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占据着几乎所有的舆论工具。它不遗余力地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并且对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跟共产党走的人采取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仍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而他们竟然不惜冒牺牲生命的危险,勇敢地集合到共产党的斗争旗帜下来?这难道是"苏俄的阴谋"这几个字就能解释得了的吗?更何况,我们知道,蒋介石本人正是玩弄阴谋权术的能手,他在与自己政敌的斗争中,从来都是胜利者;只有同共产党的斗争属于例外。

诚然,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中国革命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赢得胜利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并不是由于苏俄作"诱惑群众的宣传",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

总之,无论是艾奇逊还是蒋介石,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敌对力量,他们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对中国人民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出切合实际的说明。

列宁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③ 事实上,近代中国社会充满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严重的危机,孕育着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④ 溪了具体地了解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51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4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633页。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为什么说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呢？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向中国举行多次侵略战争（如1840年的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7年的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884年的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并采取种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一方面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殖民地化了，而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独立国的地位。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具体地说明这种情况。

首先，中国已经没有完整的主权，在政治上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其表现是：

资本主义列强强迫占领或"租借"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如：英国强占了香港。俄国割去了中国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吞并了中国西境巴尔喀什湖、斋桑泊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德国"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旅顺、大连。法国"租借"了广州湾。英国"租借"了威海卫、"新界"。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中国的若干中心城市设立"租界"。这种"租界"是十足的殖民地，这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上海外滩公园的门口甚至挂着"中国人和自行车和狗不得入内"这种极度污辱中国人的牌子。

资本主义列强还向中国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它们发动侵略战争来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如：鸦片战争后，英国勒索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这笔款项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勒索赔款二亿两白银，清政府还付出三千万两"赎辽费"，这笔款项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它们更勒索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要负担二两多。这种行为，乃是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所实

行的公开的掠夺。

资本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0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滦州等十二处"留兵驻守"。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了"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规定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在华美国人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中国确实已经没有独立的主权可言。

资本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中英南京条约规定,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货物,"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中英虎门条约中附有海关税则,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0%左右,来列人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税率"值百抽五"。中英天津条约更规定,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征税5%;外国商品运销内地,只纳价值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国家。问题还并不止于此。资本主义列强还掌握着中国海关的行政权。总揽全国海关权力的总税务司和设在各海口的税务司都是由外国人充任的。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五十年之久。这就是说,中国海关不但不能成为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工具,反而成为外国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重要据点了。

资本主义列强还以实力为后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为沙俄的势力范围,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各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内,拥有筑路、开矿的特权。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

同时,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控制,中国在经济上逐步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其表现是:

"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

和财政。”[①] 它们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强迫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给予贷款来支持中国的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是以关税、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税收，是中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全年约四千至五千万两，主要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在中国不只吸收存款，还发行货币，垄断国际汇兑和商业信贷。因此，它们就“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②]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由中国自主经营的，1894 年为 21.1%，1911 年为 6.7%。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外轮占主要部分：1897 年为 76.8%，1916 年为 77.6%；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航线上中外轮船吨位，外轮也占 70—80%。远洋航运更几乎全部由外国资本垄断经营。

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因而就可以把中国变成它们自由倾销工业品的市场。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中国直接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获取高额利润。1913 年，外国资本占煤矿投资总额的 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 100%，并且控制了 41.2%的纱锭和 49.6%的布机。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③]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主要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使得帝国主义势力无法征服中国，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妥协，使得它们不可能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同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62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62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629 页。

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① 这就是说,原本独立的中国,尽管仍然保留着独立的形式,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真正独立的地位,而变成了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呢?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使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保持着,并且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而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则依然控制着政权。

下面我们也来比较具体地说明这种情况。

本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这就是:大量有人身自由但却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大量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创造了这样的前提。

外国资本的倾销,首先导致个体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人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人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废为不材,洋铁、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而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之计,皆为所夺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走向破产。他们成为游民,流入城市,这就是中国产业无产者的后备军。

"由于破坏自然经济的力量主要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小生产破产后的货币财富的积累,主要落到外国资产阶级口袋里去了,因而在中国,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破产失业者,另一方面并没有相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者。"不过,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的一部分货币财富的持有者终于开始投资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成了中国最初的民族资本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原始资本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积累起来的。"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些近代工业的投资者主要不是原先的作坊主、工场主,而是原先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本国的封建官僚或地主,以及商

① 《毛泽东选集》,第629页。

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在近代中国，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① 由于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反动政府的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在经营工业获利没有保障而经营土地不仅获利高而且可靠的条件下，许多货币持有者热衷于兼并土地，很少有兴趣投资于工业；就是民族资本家自身对扩大再生产也缺乏热情，不少人将经营工商业获得的利润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土地，而后把土地出租给农民，兼事封建剥削。所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进程极其缓慢。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则依然构成广大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连同雇农，却没有或只占有很少量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把自己收获物的四成、五成甚至六成、七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只能形成封建势力占支配地位的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先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接着就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这种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统治，成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是封建主义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封建社会，但也没有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成了半封建社会。

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② 当时湖南韶山的民谣称：“农民身上三把刀：租重、税多、利息高；农民面前路三条：逃荒、讨米、坐监牢。”据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中的记载，当时广东海丰县农民平均年收入165元，其中81元交租，自留的84元中，40元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农具，余下的44元不够一个人糊口，根本无法养家。”江西安源民谣称：“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意即讨饭）；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据李大钊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6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31页。

活》一文中的记载:唐山一骡,日费5角,工人一日工银仅2角;死一骡资方损失100元,死一工人只需出30—40元。据此,作者愤慨地写道:"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显然,对于被驱赶到饥饿和死亡线上的中国人民来说,除了奋起抗争,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正是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在侵略东方的过程中"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② 也正是这些人所进行的革命,最后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二、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有着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它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曾经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中国人民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而且酷爱自由,具有反抗黑暗势力的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民中间产生过许多的民族英雄、革命领袖,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③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珍惜它的光荣的过去。他们不能容忍外国侵略者对它肆意蹂躏,不能允许它由于贫弱而走向灭亡。如何挽救祖国的危亡,争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如何实现国家的富强?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问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6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5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23页。

对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来说，在救国这个问题上，惟一可能作出的答案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描写了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怎样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历程，并且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②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并不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封建阶级中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已经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在林则徐主纂的《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的魏源并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是着眼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把这种向西方的学习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是因为他借用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形式，并从农民革命的需要出发对它进行加工改造之后，创立了拜上帝会，以此组织群众，向封建统治阶级发动了英勇的攻击；也不仅因为他颁布了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天朝田亩制度》，而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意味着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且还因为他明确地支持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洪仁玕认为，英、美、法等“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他说，俄国彼得大帝由于曾“到佛兰西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因而“大兴政教”，“声威日著”，使俄国成了“北方冠冕之邦”。“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师法的。他不仅提出要向西方国家学工艺技术、兴银行、办工业、开矿藏、设新闻官书信馆等，而且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对于穷人“则宜令作工以受其值”，③ 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政新篇》曾经洪秀全批准后公布，洪秀全并曾在该书上多处写下了“此策是也”、“钦令此策是也”等的批语。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在西方的直接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469页。
③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下形成的。他说过,他自己由于"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力主学习西方,厉行变法,以便使"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①,以便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境地。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主张对于工商业"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②,而且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他认为,这种对于西方文物制度的学习,应当形成为一种热潮。清廷须"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③;同时选举贡生监生之明敏者人使才馆,"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④。他亲自写了《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和《日本明治变政考》进呈清廷,希望当朝者"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⑤ 他并且乐观地预言:"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⑥

严复是最早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理论的启蒙思想家。他认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之征验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定,"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风俗人心之间"。因为海禁大开以还,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并不少,但终于"不能有实效者",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根本。他说,"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⑦。他想用"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改造中国的风俗人心。因此,他认定自己的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就是要集中精力从事西方学术论著的译介工作。在他看来,"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⑧ 他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两章),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号召人们自强不息,"与天争胜",以便救亡图存。他翻译了英国《穆勒名学》(今译《逻辑体系》)、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和英国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今译《社会学原理》)等,宣传唯物论的经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社会政治思想。

①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③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摺〉》。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⑤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摺〉》。
⑥ 康有为:《进呈"明治变政考"序》。
⑦ 严复:《原强》。
⑧ 严复致张元济。

他以为，如果这些理论、思想为中国人所接受并且付诸实施，那么中国就不只是救亡有术，而且也是富强有道了。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是直接在英、美等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他说过："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典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因而很早就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① 当他从改良主义转向民主革命立场之后，他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把自己的基本思想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说："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② 也就是说，他提出三民主义是直接参考了欧美的历史经验的。他甚至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人民呼吁"，要求他们给予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以道义上的同情和物质上的支持，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③ 当然，他也看到了"欧美强矣，其民实困"④ 这个事实，因而企图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能避免西方的社会弊病，由此，他形成了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⑤，即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他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所制定的恰恰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⑥。当时，孙中山对于实行自己的方案，也是怀有很强的信心的。他说过："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不但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应当指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曾经是十分热烈、十分认真和十分虔诚的。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

①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②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③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呼吁》。
④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294页。

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① 为了实行这些主张,他们进行过多方面的奋斗,甚至组织过政治团体和党派,举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但是,结果又如何呢?太平天国革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天京城破,洪秀全本人殉难。《资政新篇》里的那些主张当然无法实行了。戊戌变法,有如昙花一现,不过百日,即告失败。光绪皇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则以身殉难。除了保留下当时兴办的一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以外,所有的革新措施都一风吹了。就是这个大学堂也不再是培养革新者的摇篮,而变成了造就封建士大夫的书院。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促使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中国这个基本事实并没有改变,这场革命也没有取得成功。从形式上看,有了约法(临时宪法),有了国会,有了若干公开活动的政党,当时的中国,有点像共和国的样子了。实际上,全部政权都操纵在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手里。他们可以任意践踏临时约法,而另立有利于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所谓"约法";可以把国会当做玩品,今天强迫国会选举某人为总统(不照办,就不准议会散会,议员回家),明天使这个国会无法活动,后天又成立一个新的御用国会;可以凭借实力扶植一些政党来为自己抬轿子,也可以压制另外一些政党的活动,直至随心所欲地宣布某个政党为非法。所谓"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名的招牌。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却成了封建专制政权的变种,这个历史事实确实具有极大的讽刺意义。孙中山自己就说过:清朝被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坏虽成功(按:其实也没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而民愈不聊生矣"!② 真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陈独秀也曾愤然说过,这是什么"中华民国",其实是"中华官国"、"中华匪国"而已。这场革命也流产了。

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③ 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④。由外国侵略者组成的洋枪队,直接参与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血腥镇压。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69—1470页。
② 孙中山:《国民党改组问题》,1924年1月20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147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679页。

终天之恨”。①

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提，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领导人民做到这一点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而显得十分软弱。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同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没有勇气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把推行新政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开明的皇帝载湉一个人身上，随后又把排除顽固势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军阀袁世凯一个人身上；他们不敢也不愿依靠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甚至错误地认为这种农民革命运动是足以使国家陷于“忧危”的境地的。他们痛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根本的原因也正在这里。辛亥革命的致命弱点，也在于它没有同广大农民相结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因为只有经过这个变动，才能推翻封建势力，摧毁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②

总之，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得并不少，但其结果，既没有使中国赢得民族独立和政治自由，更没有使中国变得富裕和强盛。相反地，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了，人民越发贫困了，国力更加衰弱了。以为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就会很快地富强起来，这种幻想终于被无情的历史打得粉碎。实践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不能不对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从根本上产生怀疑。

当然，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斗争，尽管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斗争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封建主义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启蒙，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曾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而在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些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势力灭亡中国的企图，也是一种打击和扼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仍然是一种推动。尤其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使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而且还推动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比如，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6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6页。

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建国方案是破产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却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追求也延绵不绝。就是资本主义建国方案遭到破产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的,它成了人们探索挽救祖国危亡途径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许多真诚地为实行这个方案而奋斗过的人们,后来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了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这绝不是偶然的。①

三、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

中国的先进分子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并且在这个旗帜下去发动和组织中国人民的斗争,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主要地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实现的。与此相关联,1919 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了中国人民革命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开端。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它是在中国的新的社会力量得到进一步生长和发展的条件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发生的。

在 1914 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而暂时地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进一步成长起来。这样,中国民主革命在这时也就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导。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在 1915 年的创刊为标志,中国发生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团结在这个刊物周围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新的资本主义建国方案之所以遭到破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思想仍然是旧的封建主义的一套。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实现"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

① 参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页。

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勇敢地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由于两千年来孔学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当时的封建军阀仍然把孔子的一套当做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们去信奉，于是，他们首先把自己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孔学。他们用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他们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成为向历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公开挑战的光荣战士。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德先生（德谟克拉西）和赛先生（赛因斯）。按照它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解释，民主，既是指天赋人权等等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是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科学，狭义的是指资产阶级殖产兴业所需的自然科学，广义的也包括社会科学，即一些用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如美国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德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英国罗素的新唯实主义等等。

从否定方面，非孔、排孔；从肯定方面，提倡民主与科学。这一切，都是为了“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以便“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求适今世之生存”。[①] 这说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乃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在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用资本主义来反对封建主义，用民主来反对专制独裁，用科学来反对迷信盲从，在历史上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这个新文化运动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传和追求，并不能把中国引向解放之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用个人主义思想、进化论观点等等来批判孔孟之道，却并没有能够揭示封建思想的社会根源，进而揭示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也没有对中国广大劳动大众的命运表示应有的关切，对他们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以为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去进行宣传教育

①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

工作就可以达到目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作为中国追求的目标,但他们中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就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种保留的态度了。其原因是: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开始朦胧地感觉到,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所约许的理性的王国并非永恒的真理、正义、平等、人权在人间的实现。陈独秀就说过:"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①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它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西方人自己也感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全社会人心都陷人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② 这种情况不会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李大钊就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已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③ 中国人是否还应当走这条路,当然就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这个事实,更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因为这种学习的结果,在政治上,如鲁迅所说,不过是以"千百无赖之尤"来代替"独夫"的专制④;在经济上,如瞿秋白所说,中国"虽已和西方物质文明接触了五六十年,实际上已遵殖民地化经济原则而成了一变态的经济现象"⑤。既然如此,中国是否应当继续走这条路之成为一个问题,也是很自然的了。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陈独秀在歌颂法兰西文明时,就曾把社会主义当做法兰西人对于近代文明的三大贡献之一,虽然他还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李大钊认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⑥,虽然他还不能指明新的政治制度应当是怎样的;毛泽东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

---

①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15日。
② 《梁启超选集》,第719页、第723页。
③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
④ 鲁迅:《文化偏至论》,1907年。
⑤ 瞿秋白:《饿乡纪程》,1920年。
⑥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

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①]，虽然他也还无法对中国人所需要的新思想作出具体的阐明……。应当指出，这些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怀疑论成份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正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所说，“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②]。它推动人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尔后人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艰难的选择。

从19世纪40年代末《共产党宣言》问世直至20世纪初五四运动发生的前夜，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曾有过什么真切的了解。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刊物《万国公报》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他们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加以介绍，只不过是为了给基督教的教义涂上一层油彩而已。1902年以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既不了解，也不准备加以实行。他进行这种鼓吹，“只不过是为了向清廷施加压力，假社会主义之名，逼迫清廷行君主立宪政体之实”。[③]孙中山、朱执信等也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过介绍。他们是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流弊而提倡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并且在实践中被还原成了十足的资本主义路线。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④] 所以，社会主义既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和广泛的传播，更没有形成实际的运动。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在中国人面前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思想武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即社会主义。这个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证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⑤]。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可以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85页。
③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第3、5页。
④ 陈独秀：《答褚保衡（社会主义）》，1917年1月1日。
⑤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记述1921年1月彭璜在新民学会新年会上的发言。

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示自己的解放之路。确实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使得陷于傍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青年毛泽东就兴奋地宣布,"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俄国人新发明的这一条路,"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① 彭璜也说:"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需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②

十月革命之所以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去接受社会主义,也是同这个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同在这个革命的基础上诞生的新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采取的新的平等的态度分不开的。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践踏摧残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个情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对此,瞿秋白在论述五四运动的意义时曾作过说明。他指出,对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③。

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所进行的广泛发动及其所赢得的历史性胜利,也给予了中国人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因为自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民的"直接行动"。④ 这种直接行动是辛亥革命中所不曾有过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证明了十月革命所提供的革命方法在中国的有效性。这样,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也就成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推动力量。对此,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曾作过具体的说明。他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我们"从俄国革命见到

① 《毛泽东给蔡和森肖旭东并在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
②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记述的1921年1月彭璜在新民学会新年会上的发言。
③ 瞿秋白:《饿乡纪程》,1920年。
④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1920年4月21日。

了搞群众运动”，“又见五四运动是群众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后，我们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非屈从于任何压力，也不是追逐时髦。这是他们对于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缜密的思考之后所作出的抉择。他们认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② 所以，“当本己之自信心，周览世界之学术，必切实证明为真理，而后从而信之”。③ 他们认为，学说并非装饰品。“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④，而不是看它是不是时髦。比如，新民学会1921年新年会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须采用什么方法时，就曾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即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考虑。陈独秀在论述我们“应讲何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也曾对社会主义的五种流派，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进行过比较研究⑤。在当时流行的众多学说中，他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它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之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决不是趋时髦，也不是为彻底”。⑥

中国先进分子之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是这个运动的最大收获，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如果说，在这之前，当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之后，曾经在资本主义的死胡同里徘徊过；那么，如今这个死胡同的墙壁是被推倒了，人们这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并且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由于掌握了认识中国社会这个“必然”的科学武器，人们这才有了使自己的思想获得“自由”的可能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⑦ “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

①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又见《董必武的回忆》，1961年。
②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1921年1月19日。
③ 《吴玉章君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之演说》，1920年7月1日。
④ 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1920年10月1日。
⑤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1921年1月19日。
⑥ 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1920年9月28日。
⑦ 《毛泽东选集》，第1516页。

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①。

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引爆了中国的革命,因而压制和中断了中国的启蒙,以至我们今天不能不回到几十年前的出发点:重新呼唤科学和民主。近年来的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究竟能不能成立,对于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清楚的必要。

如果具体地考察一下五四以来的历史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来就不曾抛弃过前期新文化运动举起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相反,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改造,从而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涵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首倡拥护德、赛两先生的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时,即意识到民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的。他指出:"18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20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② 在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更明确地指出,"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③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④ 多数人要享有民主权利,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⑤ 这样,他就把少数人的民主与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与劳动阶级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这种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的民主才是更高的民主,才是民主的真谛。至于科学,除自然科学外,就社会科学来说,这时在他看来,已经不是指詹姆士、柏格森等的学说,而主要地是指马克思主义了。他指出,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不应当"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⑥ 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⑦ 不待说,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多数人的民主,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516页。
② 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1919年12月1日。
③ 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1920年12月1日。
④ 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1920年10月10日。
⑤ 陈独秀:《答柯庆施(劳动专政)》,1920年11月1日。
⑥ 陈独秀:《答皆平(广东——科学思想)》,1921年6月1日。
⑦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1922年5月5日。

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等级制度以及纲常名教等等，是尖锐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批判精神，更是同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人们的迷信盲从观念水火不相容的。既然如此，提倡马克思主义又怎么可能妨碍、中断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呢？

实际上，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向封建的思想文化开火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思想家的弱点，从而把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前进了。

首先，他们"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孔子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二千余年，"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种学说由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它的崩颓粉碎也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① 这样，他们就揭示了孔子学说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否定了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由此出发，他们也就把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扩展成为反对滋生这种思想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他们认为，宣传教育手段固然极端重要，但决不是万能的；在中国的旧制度下，也不可能施行真正的普及教育，因为教育手段主要掌握在少数有产者手里。② 他们强调，"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③ 所以，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改革社会。而"要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少数人的呐喊尽管会促使一部分人的觉醒，不过，"增加一两个善良的分子，并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不恶"④。这样，他们也就把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仅仅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了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方式，从由少数人进行的思想的批判，发展到了主要由人民群众进行的武器的批判。

不应当低估反封建的革命实践对子封建思想的冲击力，尤其不应当把它看作是对于反封建思想斗争的阻断、挤压和排斥。事实上，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的。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封建地主，同时旁及"各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全部，其中政权又是一切权力的基干⑤。革命既然集中地打击了封建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
② 参见《毛泽东给蔡和森肖旭东并在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1日）和陈独秀的《讨论无政府主义》（1921年8月1日）等。
③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1月2日。
④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1月2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31页。

政权,它也就使族权、神权、夫权也跟着动摇起来。正是在革命过程中,亿万被压迫的奴隶懂得了自己的尊严,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作为真正的人,挺直腰干,站立了起来。读一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可以看到革命对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攻击是怎样的有力和不可阻挡,就不难了解革命本身是多么伟大的启蒙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军队,一般说来,这是最少民主精神、最多等级观念和奴隶主义的地方。恰恰是在这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把民主精神、反对等级制度和盲目服从的思想灌输了进去。他们明确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① 他们在人民军队内部推广了民主生活,建立了民主主义制度,清除了封建雇佣军队的影响。广大士兵由此意识到了自己在革命、在军队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就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与革命同步,在斗争中成长。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②

中国人民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新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这种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教育手段、依靠"三五文人的笔墨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历史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救亡斗争的兴起和发展,既没有中断、更没有取消启蒙的工作;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倒是应当说,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促使启蒙运动在量上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在质上得到了根本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地,正是由于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的思想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

当然,正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革命摧毁了封建的地主政权和土地所有制,固然为清除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是它并不能自动地消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一切影响。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既然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既然它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

① 《毛泽东选集》,第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97—698页。

立性，既然它由于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而渗入了亿万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那么，要彻底清除它的影响，也就不能不经历漫长的过程和进行艰苦的工作。在五四后期，曾经有过一种舆论："文化运动已经有两三年了，国家实在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对于这种说法，曾经是启蒙运动思想领袖的陈独秀所作的答复是："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决不是短时间可以得着效果的事。这几年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底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一毛，那责备文化运动底人和以文化运动自居底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轻了。"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把中国今天之所以仍然面临着清除封建遗毒的任务，归结为五四以后的革命压制了五四以前的启蒙（尽管在革命过程中，人们对于从理论上清算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影响的严重意义还估计不足，工作做得也不够深入和系统）；正如我们不能把某些西方国家今天之所以仍然崇尚王权、仍然有爵位等级、仍然讲究绅士风度等等，归结为17、18世纪这些国家发生的革命中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一样。

四、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诞生，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和中国人民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那样："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

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

国民党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同盟会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反清士绅的联合战线的组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它曾经发动和组织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一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357页。

成为流行的说法。由于同盟会纲领的革命水准本来就不高,反对满族统治者和建立共和国是它的成员之间团结和统一的主要基础。当清王朝被推倒,"民国"建立起来,许多人就以为"革命成功"了。这样,原先的革命党人,一些人高升(他们成了新的官僚、政客、军阀,或者资本家),一些人退隐,一些人落荒而逃。而许多原先"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他们纷纷涌入这个组织,企图假革命之名以营私。它的领袖孙中山仍然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但也认为今日"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当前的急务在于发展实业。他曾经接受袁世凯给他的全国总路总办的头衔,准备"十年不预政治",而以在野之身,"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它的重要活动家宋教仁则认为,中国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时期到来了。他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4个政团合并,于1912年8月成立国民党。他力图通过竞选,使国民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席,而后组织责任内阁。多数议席也果真争取到了。但责任内阁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起来,宋教仁本人就被刺杀。随后国会也被袁世凯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等奋起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但不久即遭到失败。他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为了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他于1914年7月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政治上"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组织上"屏斥官僚"、"淘汰假革命党"。由于提不出能够广泛动员群众的纲领(它所提"护法"的口号对群众并没有多少吸引力),由于采取要求党员宣誓"服从党魁命令"这一类落后的组织方法等等,参加这个党的人员寥寥无几。它没有能够成为群众性的党,没有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重大的影响。由于在斗争中无所作为,很快就自行解体了。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一文中回顾五四时期的情况时说过: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虽然派代表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并超过其注意力了"。"一个革命的政党在革命的高潮中完全不能领导,可能他快要死亡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事实表明,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日益成为近代中国最有政治觉悟的革命分子的共同要求。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成立的。

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的组织,是各该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是各该阶级的政治代表。在近代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首先创立了政党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

益;但由于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且往往是对立的,所以维护资产阶级私利的政党总是讳言自己的阶级性,而把自己说成全民利益的代表者。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共产党公开申明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因为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从来不讳言自己的阶级性。所以,为了了解共产党的性质,首先应当了解工人阶级的特点。

工人阶级有哪些本质特点呢?

首先,它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 正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承担者和体现者,是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日益发展壮大的,它就既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也没有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它有可能高瞻远瞩,具备政治上的远见。

其次,它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在旧社会制度下,工人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工人阶级要求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它如果不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为它除了锁链以外就一无所有,在斗争中,它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它对于彻底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必有任何疑虑。它能够具备彻底革命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

再次,它富于组织性、纪律性。由于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细密的分工和协作,需要严格的组织和纪律,长期在这种环境中从事劳动的工人阶级也就易于养成自己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组织纪律观念。由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由于它没有小生产者的那种狭隘性和保守性,它也就可能具有团结互助的精神。

最后,它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工人阶级既然是变革旧社会制度的积极的革命力量,它的历史使命既然是要最终埋葬一切剥削制度,它也就同在旧社会制度下受压迫、受剥削的一切劳动者有了共同的利益,它也就有可能成为这些劳动者群众在政治上的领袖。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显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就应当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了,为什么在这之后的近80年间,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82页。

并没有象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为什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样的党就建立起来了呢？

这是因为，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①] 对于这个命题，卡尔·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最先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在这之前，188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海因菲尔德召开的建党大会通过的纲领曾经原则性地阐述过与此有关联的思想，指出党的任务是要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列宁肯定了这个命题。他在1900年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即以党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命题立论，阐明了工人阶级政党建立和发展的道路。其后，他又写了《怎么办》这部著作，对这个命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证。

列宁指出："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②]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具体地考察一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考察一下社会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产生当然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及其斗争的发展为前提。

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壮大起来的。19世纪中叶，在外国资本于中国创办的企业(主要是船舶修建厂、轮船公司以及缫丝、制糖、轧花等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60年代，在清政府官办的军事工业企业以及70年代开始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主要是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企业)中，产生了中国的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70年代以后，在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主要是轻工业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的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与西方的情形不同，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同时产生的。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

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产业工人的总数，1894 年为 10 万人，1914 年为 100 至 120 万人，1919 年约为 260 万人。这 260 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除产业工人以外，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农村的无产者（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备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下面用一些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一点说明。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②

中国工人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是极其严重和残酷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极长，一般为 12 小时至 14、15 小时，最长的达 17、18 小时。大多数工厂没有为休息和吃饭而定的任何闲歇时间。他们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大都是在厂房狭小、空气污浊、没有或极少安全设备的条件下从事劳动，大批工人患有各种职业病，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如 1915 年，湖南各矿伤亡工人竟占工人总数的 18.7%。他们的工资更是极为菲薄。在 1920、1921 年，除极少数技术工人日工资有超过一元以上者外，绝大多数普通工人的工资高的不过五角多，低的不过二、三角。如上海工人每人每月工资大都在 15 元以下，而工人夫妻二人的生活费就需 17.5 元，再加上两个未成年的子女，则需 24 元 7 角 6 分，这就是说，一个工人的劳动所得，尚不足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除了受中外资本家的压榨以外，他们还受到严重的封建剥削。比如，在许多厂矿企业中，流行所谓包工制或把头制。包工制即由包工把头到乡间招募贫家子女为包身工，与之订立包身契约，预付若干包身费；包身工在厂矿劳动期间，资本家所付工资先交把头，而后才由把头酌量给予工人，这样工资的相当一部分就进入了把头的腰包。在经济上遭受残酷的剥削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也受到严重的压迫。北洋军阀政府 1912 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1914 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都把举行同盟罢工视为犯罪。1914 年 8 月颁布的《治安警察法》更明文规定当局应采取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集会及行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62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644 页。

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工人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低下","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①。

还有一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在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家往往把从殖民地掠夺得来的超额利润拿出一部分去收买少数工人,从而在工人中培植起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并经由他们去散布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家只是个别地收买工人充当工贼为自己效力,却没有能力培植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来。毛泽东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② 中国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比较高,"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所以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

由于中国的近代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发生的,多数工厂和产业工人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如1894年,仅上海一地即集中了全国工人总数的将近一半。又由于近代工业的主体部分是由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举办,他们所经营的多为大型企业,在这里也就集中了多数的中国工人。如1916—1911年对13个省的统计,雇用工人500人以上的大型厂矿即集中了当时工人总数的70%。这种情况,有利于工人阶级集结成为强大的统一的力量,有利于显示他们进行的斗争的强大声势和扩大这种斗争的政治影响。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③

由于中国工人大多是破产的农民,许多工人的妻儿老小也还在农村生活,因此,他们对于广大农民的疾苦和要求是比较了解的,他们提出的政治号召和进行的革命斗争也比较容易得到广大农民的理解和响应。中国农民在全人口中占了80%以上。中国工人阶级一旦与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伟大的战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也就成为不可战胜的了。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4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44页。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①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的基础。尽管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但这个基础是良好的、坚固的。

没有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有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也并不就具备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充足条件。工人阶级可以有各种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妇女团体等等，这类组织有许多在党成立之前就存在了。党与这些工人群众组织的区别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觉悟的阶层，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② 为此，它应当通晓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了解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的条件、进程和结果，据此制定出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以便领导本阶级和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革命战斗。它应当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以便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核心力量。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是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从工人阶级中造就出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从而使工人阶级政党的创立成为可能。

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它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要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被掩盖着的，比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就被等价交换的关系掩盖着（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按劳动时间计算发给工人工资），资产阶级专政就被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掩盖着。如果不系统地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不借助于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去进行这种总结，就不可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无疑地，工人阶级具有伟大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但是，“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③。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④ 即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具有久远的渊源，经过了全面的加工，拥有多得无比的传播工具，它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列宁说过，“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即结成工人团体，与厂主作斗争，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

① 《毛泽东选集》，第644—645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326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件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以内的战斗,它的任务是改良工人被剥削的境遇,而不是消灭剥削本身。所以,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①

科学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正因为这个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出工人阶级受苦难的原因和指示他们争取摆脱这种苦难的道路,工人也就比较地容易领会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就其形式来说,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它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特别是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② 这类知识分子叛变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向了工人方面。他们在斗争中与工人打成一片,注意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当他们把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理解旧社会本质、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本阶级历史使命的先进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创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不过,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需要自己从头去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这个工作已经在七八十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做过了。他们的任务是学习、研究和传播这个学说,把这个学说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采取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灌输到中国工人运动中去,使两者真正的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充足的条件。

前面已经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足够估计这个事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思想迅速地滋长起来了。由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占据了支配地位,第二国际终于蜕化变质。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尤其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鼓吹阶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327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317—318页。

级调和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变成了离开革命立场、主张社会改良主义的党。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联合各国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反对机会主义、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胜利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破产。

中国的先进分子既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经过俄国人的介绍才学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接受的也就是没有被修正主义者阉割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还应当注意到以下两个情况:其一,是前面讲过的,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阶级中,没有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其二,中国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中国的反动统治是依靠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来维持的,中国的议会事实上成了封建军阀手中的玩品,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没有条件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根本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幻想。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和国内环境中发生的,所以,它一开始就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并且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① 针对有人鼓吹的中国"劳动者地位之增进与政权之转移,当取议会战略"这类主张,他们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主张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②;强调修正主义主张的议会主义不过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③ 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在中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了解了这个历史情况,我们就比较容易懂得,当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许多国

①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② 毛泽东语。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③ 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

家泛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上,这绝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党的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建党只经过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它的思想基础仍然是良好的、坚固的。

不过,中国也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① 一方面,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继续着自发的斗争。不过,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很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② 张闻天也指出,这场斗争"不是官僚、军阀、政客、上层分子的活动,而是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这是它优胜于辛亥革命的地方。"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的最伟大的功绩"。③

在运动的始发阶段,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头的是爱国的青年学生,他们起了某种先锋的作用。当学生运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自动投入战斗。他们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巨大的政治声势,成为斗争的主力,在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亲日派官僚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由此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了中国的改造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如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④

李大钊在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时,就提出必须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号召革命的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在他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知识青年曾到工人中间进行社会调查,并向他们作革命宣传。1920年8月至1921年春,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99页。
③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133页。
④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1页。

小组，而实际上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在当时并不存在。这些组织成立以后，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一方面有领导、有目的地深入工人群众，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等项斗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多系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运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通过这种结合，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逐渐了解了工人群众的疾苦，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了工人阶级一边来；一部分工人则由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从而使自己具有了阶级的觉悟。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1923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

大会确立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①。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并且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慎重，严加选择”。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与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并且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自己的先进性，十分注重党员的质量。

大会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党要派党员到工会中工作，“党在工会中要灌输阶级斗争精神”。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成立时就十分重视与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这样，这次大会就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诞生。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②。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

① 当时，加入第二国际的党多称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多称共产党。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093 页。

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只有几个小组、几十名成员。从现象上看,党的一大开过了,中国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它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注意,报纸上甚至也没有刊载任何一条有关的消息。但在实质上,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因为,中国人民的斗争自来是很英勇的,他们的革命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败,所以成效甚少,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来动员和组织他们的力量,为他们指明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这种局面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结束了。

中国共产党由于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能够成为广大群众团结战斗的核心;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作为指导思想,它能够通晓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为中国人民规定正确的斗争目标和规划走向胜利的道路。它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开始时,尽管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还不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还比较肤浅、但是,这些弱点是可以克服的。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党逐步地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它所领导的人民斗争之走向胜利就成为不可阻挡的了。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 80 年间,中国人民的斗争由于没有得到如同中国共产党那样的政党的领导而统统以失败而告结束的话;那么,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中国人民的斗争虽然也经历过若干曲折,终究经过 28 年的时间就赢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这个历史的对比,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萌芽时,就被一切腐朽势力斥之为"过激主义",视之为"洪水猛兽"。党的成立大会曾受到暗探、巡捕的骚扰,致使它差一点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党一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宪警的残酷迫害,而且遭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但是,幼稚的、弱小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迎着这些诬蔑和压迫,而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这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它在本质上就是不可战胜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514 页。

第二章

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理论

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周恩来说过："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① 这里所说的"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以解决的难度极大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的真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这一点，已经由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的历史证明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 马克思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释和发挥。"③ 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④ 毫无疑问，在俄国也不同于中国。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中国革命仍然是不可能胜利的。这一点，从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由胜利到失败的两次反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④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来就是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的。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这个情况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子他们,马克思主义不是需要加以崇拜的信条,而是用来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把这个理论作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革命的科学,而不是作为凝固的、僵死的、万古不变的宗教教条看待,这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他所写的第一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拯救世界的导星",从而肯定了它所具有的普遍的意义;但他并没有因此认为这个学说已经是完成形态的终极的真理。他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说过,它也可能有偏蔽或疏漏,只是"小小的瑕疵,不能掩盖他那莫大的功绩";它也可以被补充,只是不能以为由此即可"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整体"。他强调,"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应当这样。"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所以,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①] "五四"以后,为了遏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胡适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他所持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子那时那地的救济方法"。他企图以这个论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李大钊在答复这种责难时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真理。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一样,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同时,他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因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他认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的。他告诫人们,不要"偏于纸上的空谈",而应"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②]。这样,他也就初步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原则。

---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
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陈独秀也阐述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这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主张“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主张“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① 不要把它当做消遣品。可惜的是,他在实践中没有能够把这个正确原则贯彻到底。

在1922年初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个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样一个任务。稍后,在1926年,蔡和森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在这里,他已经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这一任务清晰地提出来了。他并且认为,“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②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思想原则,毛泽东作出了最深刻的论证。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流行过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处在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对于这种错误倾向采取了鲜明的反对态度。他懂得,如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和策略,党领导的人民斗争是肯定要遭受挫折乃至陷于失败的。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部分)一文中揭露了主观主义是“左”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为了克服主观主义,使党的路线和策略走向正轨,他认为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他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他强调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

①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1922年5月5日。
②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

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

1930年5月,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关于调查工作》)这篇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这篇文章已经形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② 等著名的论断。在教条主义盛行之际,提出这样的论断,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具备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巨大而深刻的理论勇气。"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就曾经被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后来,毛泽东还讲过,尽管如此,对于这句话,"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③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任务。④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应当使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并且认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⑤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正式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⑥ 这一科学的命题,并且指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直接关联着的,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两者的"完全统一的理解",这正是党从幼稚达到成熟的标志。

---

① 《毛泽东选集》,第91—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15、1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791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这个讲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这句话被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⑤ 《毛泽东选集》,第533—53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611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能够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联系的，在于它能够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解决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开辟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把握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他们才能够提出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人民能够理解和掌握的思想武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而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掌握了中国人民群众，就必然转化成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

二、毛泽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说的中国实际，主要是指什么呢？

首先，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其次，主要是指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毛泽东强调，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际上，正确的理论，主要是对于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

再次，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子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

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的理论成果。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科学总结人民斗争的实践经验,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奋斗。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老一辈的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等,还有许多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①。

当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最早;与一些曾经留法、留俄等的共产党人比较,他所学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是最多;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也没有处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岗位之上。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作出特别突出的贡献,以至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呢?这固然与他具有优秀的天赋、丰富的阅历、广博的才学、卓越的胆识等等有关,但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他一开始就自觉地坚持了正确的思想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刻苦的学习精神、非凡的领悟能力,并注意联系中国实际进行思考。

毛泽东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按:指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②

为了掌握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他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要获得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很困难的。他曾致信中共中央,表达自己"望得书报如饥如渴"的心情,请求中央"时常寄书报"给他。1932年红军打开漳州后,他亲自去找寻书籍,运回瑞金加以研读。他说过,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长征路上,自己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352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页。

马列的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到延安后，他更发愤读书。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全面、深入的把握。

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从中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掌握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以便以此为工具，去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在读书时，他总是密切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党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比如，据彭德怀回忆：1933 年，毛泽东推荐自己阅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推荐自己阅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①。再如，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他在阅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不仅在全书作了各种符号，而且联系实际写了近一万两千字的批注，其中最长的批注达一千字。

正因为他完整、准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及其立场和方法，他才能以此为指导，深刻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在理论上作出许多独创性的贡献。

其次，深入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

还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主张“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徐特立回忆说：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的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本国的知识”。他并不在原则上反对留学，他主张“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只是他自己，想先用一至二年进行自由研究，“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②，因为只有“先研究过中国古今学术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尤其强调，“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考察和研究”。③ 应当说，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可珍贵的。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3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66—476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4 页。

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就比较自觉地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而后主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接着又主管农民运动,直接领导农民斗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长期主要在农村从事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和领导革命战争。他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第一线,深入实际斗争,并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有关问题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性,从而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毛泽东说过,"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据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进行社会调查,首先和着重的是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毛泽东指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①。

对于调查工作,毛泽东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以农村调查为例。他说,1925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并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认为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这种办法不行。"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② 认识农村问题是这样,认识其他问题也是这样。

从事社会调查工作的过程,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智慧的过程。毛泽东认为,到群众中去,必须有恭敬勤劳的态度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说过,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113—114页。
② 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

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正因为深入实际斗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在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作出理论上的创造，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再次，真切地了解中国历史，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

还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今学术制度的大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更自觉地把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项崇高任务的不可或缺的工作。他说，我们不但要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①。

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他几乎无所不读。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通读过《二十四史》；后来又再次通读了全书，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资治通鉴》，他先后读了七遍。周恩来说过：“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②

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战士，毛泽东了解中国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现在和预见它的将来。他企图通过研读中国文史古籍，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研究历代兴亡史”，总结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安民的艺术；并借助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帮助中国人民建立起对子自己的民族、对于自身创造能力的信心，增强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

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他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子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③

正因为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站在当前时代的高度上回顾中国走过的历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 801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3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5 页。

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的分析,毛泽东就既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很少的人根本不同,也同那些信而好古、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他才能既不脱离中国的历史实际,又不囿于古人的眼界和认识,从而见前人之所来见、发前人之未发,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深刻、独到、精辟的新见解。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奋斗的基础上,主要地依靠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彻底的社会革命论就获得了在中国借以实现自己的民族形式,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说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①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应当说,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②。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系统地、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地指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形,实际情形,那只有在于万万群众起来斗争时,他们的经验才能指示出来。毛泽东就说过:"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③

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特殊情况是不能够忽视的。这就是: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欧洲。还在 1919 年,列宁就对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讲过:"你们而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1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795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26 页。

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当“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①。这些话，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是完全适用的。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革命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个任务的解决，比起俄国东部来，无疑会显得更加的困难。

第二，中国是一个社会的矛盾很尖锐、革命的基础相当深厚的国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没有来得及作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就投入了实际的革命斗争。由于俄国革命在中国思想界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许多中国的革命者开始时有一种简单的想法，以为只要遵照俄国的榜样去做，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一个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化”成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从组织上说，从1922年党的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的共产党都必须执行。这些，都使党在确定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由于共产国际高举革命的旗帜，而在国际中起核心作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又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共产国际曾经“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中国党也不例外。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为指导制定自己的路线和策略方面，在实际工作方面，中国党、中国革命都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国际中心来具体指挥各国革命，这种作法本身是不可取的。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正如周恩来所说，“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②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前面讲过，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党内盛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过必须“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诚”这样的口号。这种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正确的思想原则，为了获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9—8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1页。

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并据此系统地形成中国自己的革命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还是不能不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得不够,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下面我们就来简要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步结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思想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萌芽的。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在大革命之前,中国共产党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密切党与本阶级的联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领导全国人民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党即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以五卅运动为起点,大革命高潮在全国掀起。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之下,经过广东战争尤其是北伐战争,消灭了北洋军阀的主力,革命势力迅速发展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忽视对于军队的掌握和争取,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这场革命终于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失败,党员人数由六万人下降到了一万人。

这个时期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它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党在制定自己的纲领和路线时,得到过共产国际的积极的帮助。党的重大决策,不少是直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意见而作出的,党的某些决议甚至还是国际代表起草的。对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示或意见是否正确,许多人还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不过,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方向,党的一些领导骨干通过对斗争经验的总结,还是逐步地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加深了认识。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它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由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个新的奋斗目标的提出,对于中

国人民来说，有着历史性的意义。不过，1920 年 11 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 年 7 月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都只是提出了“推翻资本家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共同具有的最一般的原则，并没有指明当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① 这说明，党在当时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还没有学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划分清楚。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联系中国的实际，指明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进行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为此应“使工人和贫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也还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笼统地说，随着革命运动“发展无已的结果，（工人）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并且认为党在目前只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说明，党在当时也还没有弄清楚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1925 年 1 月党的四大根据共产国际有关的指示精神，总结建党三年半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以来的经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应“取得领导的地位”；这个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份”，它“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这样，党就划清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思想的提出和阐明，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彻底性、这个阶级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进行了有力的论证，而且对农民和资产阶级作出了创造性的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大多数是贫农，他们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农也是可以革命的。这样，他就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

① 毛泽东在 1958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 1 号上，对《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 年 11 月）作了如下的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551 页。

他还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指出前者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这样,他就为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他还从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指出现时的中国革命既不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个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②。这样,他也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乃是一个新式的民主革命这个问题作出了初步的论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表明在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初步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萌芽的一个标志。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最艰苦的斗争年代、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当时,党面对白色恐怖统治的高压,英勇地独力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找着新的革命道路"的任务。此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进军,着力从事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随着斗争的发展,党领导的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红军还连续取得击败国民党军队"围剿"根据地的多次胜利。在国民党统治区,党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11页。

不过，这时的党仍然处于幼年时代。1927年底、1928年初，党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30年中期，又犯过“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至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统治的结果，使农村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毛泽东指出，“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①。

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转折关头，毛泽东不但表现了极大的政治上的坚定性，而且显示了伟大的创造才能。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当时的革命形势，认真总结群众斗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革命道路，为争取革命的复兴和逐步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

中国革命的这条新道路具有何种特征？对此，毛泽东在1938年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曾作过概括。他指出，与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这条新道路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即：一、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长期的革命战争；二、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先占乡村后取城市。这两个特征，都是由毛泽东首先揭示并加以论证的。

当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周恩来讲过：“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② 事实正是这样。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工农运动，他也没有提出党必须以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61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要精力掌握军队、领导战争的问题。大革命后期,他总结"四一二"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教训,针对当时的形势,就提出了党必须重视革命武装这个思想。他主张,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与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他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即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① 在中共湖南省委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他再次指出,必须"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强调"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②。在井冈山时期,他在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初步的论证,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个特征";为此,他"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③ 而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认识是不明确的。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准备城市起义方面,而没有放在领导革命战争方面,就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还曾被中央领导人斥为不要群众的"枪杆子主义",并为此而撤掉了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大革命刚刚失败时,毛泽东与许多人一样,也有过城市中心的思想。在发动秋收起义时,他也曾经企图率领起义队伍占领中心城市长沙。但起义后不久,当他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之后,他即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农村,开创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当着1927年秋、1928年春中国农村游击战争发生不久,由于敌人十分强大,而红军极为弱小,有人就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为此,他在1928年5月主持召开的湘赣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把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一点指出来了;同年10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答复。在这之前,党的六大也答复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④。不过,毛泽东在当时也还没有形成党的工作应放在乡村、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⑤。事实上,正如周恩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页。
②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报告》,1927年10月。
③ 《毛泽东选集》,第7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88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来所说，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而在1929年、1930年以后，由于城市里的群众性大斗争统统失败了，而凡是客观条件比较具备、主观上又实行了正确指导的农村斗争，大多有了相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产生这种观点”①。1929年4月，红军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已经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发展，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潮的主要条件”。“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② 到了1930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了。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在这个时期曾经明确的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③ 而当时，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仍然是固执城市中心论的。同年5月，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即正式批评“农村包围城市”这种主张“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正式决议中斥责这种主张“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的反映”。

在阐明中国革命新道路所具有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即：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和主要的进攻方向首先是乡村）的同时，毛泽东还解决了为坚持农村斗争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主要是：

第一，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在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情况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指出，由于根据地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揭露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的办法，从而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个问题的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只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7—17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5页。
③ 转引自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年6月15日。

有在农村建设起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农民斗争才有可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第二,如何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他就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建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在井冈山时期,他规定了红军必须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并且手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八项),提出了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官兵关系的准则和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他总结人民军队创始以来党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个决议在红军中的贯彻,使得这支军队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种新型人民军队,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成了坚持农村斗争的坚强柱石。

第三,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中国,在土地革命中生长的弱小的人民军队如何同强大的敌人作战的问题。

在井冈山时期,他和朱德提出了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930年10月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时,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到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全部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原则就形成了。这种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作战原则,成了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四,如何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的问题。

在八七会议确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他总结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经验,在1931年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正确的分配土地的方法。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条路线、这种方法,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而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则为调动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建设和保卫革命政权的积极性奠定了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为坚持这条道路所确定的农村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所制定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所实行的土地革命路线等等,不仅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直接违反共

产国际的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逐步地学会了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了。正因为如此，这条道路的开辟，也就成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并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还奠定了战胜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胜利完成红军长征的基础。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抗战时期，党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人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敌后军民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抗战胜利后，党进行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斗争的配合下，坚决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三年多一点时间，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主力，推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赢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政治上达到了成熟。党不仅成了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政治威信并且直接领导着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人民政权的群众性的党，而且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获得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统一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这两个时期达到成熟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因为：

第一，这时的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①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① 见《人民日报》1965年2月26日。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

第二,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40年代前期所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解放战争则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反动派之间进行的一个关于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战争。比之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这两个时期的斗争,规模更宏大,任务更艰巨,环境更复杂,因此,它的经验也更丰富。斗争的实践为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创造了前提。

第三,就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说,这时不仅处于党的领导集团中心的位置,在客观上有可能站在更高处来综观和统筹中国革命的全局,而且有了较好的主观条件(如可能收集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了更充分的读书时间等)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更全面、更深入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成熟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他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发展阶段,指出当时中国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分析,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以农民为主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样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通过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状况的研究,阐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以工人阶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826页。

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他还总结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样，他就提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科学地概括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著作中，他深刻地论证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①

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著作中，他从理论上论证了由于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内部没有民主制度，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论证了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逐步争取革命的胜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他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人民战争的思想。这个战争是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他还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指出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最好办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人民军队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争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所有这些,都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①。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他着重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②。所有这些,都为把长期主要在农村活动、党员中以农民出身的成份为主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三)精辟地论证了党在革命斗争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他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党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党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政策,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指出,开始时"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①。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提出，为党贯彻自己的路线、实现各个革命阶段的战略目标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所阐明的上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正因为如此，它们也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四、毛泽东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团结战斗的旗帜

上面，我们简要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并不是一经形成，就为全党所接受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形成，那么，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左”的错误指导方针曾经多次在党中央占据支配地位，而坚持正确意见的毛泽东却一再受到压制、批判乃至不公正的处理（包括受党内处分，被调离重要的领导岗位等）。这说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要全部走上正轨，仅仅有少数人的觉悟并不够，还需要有多数人的觉悟。因为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个人或少数人提出的正确思想只有被多数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层中的多数人所承认所接受，才能成为党的意志，成为党领导人民团结战斗的旗帜。

当正确意见一时不能为多数人接受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周恩来指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他讲到，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如关于在我们的力量小的时候，不应该打大城市，而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的意见，中央和党内许多同志就不赞成。他只好等待，并且在等待的过程中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直到这些意见被多数人所接受。

为什么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最终能够为多数所接受，并且被党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呢？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少是由于具备了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靠实践的教育。

---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内不存在一个自觉维护某种错误思潮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以,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终归是会被全党所接受的;而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意见,也终归会被全党所抛弃。这正是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的一种表现。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五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曾经在党内享有很高的权威,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一度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大革命一经失败,他的错误就受到党的八七会议的清算,而他本人也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王明由于搬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吓唬人,由于有共产国际作为靠山,在党内的政治声势一度也是很盛的。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的严重失败这个事实教育了党,这样,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也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正是因为全党在实践中受到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才得以确立,而以他为代表所提出的正确理论才被全党所承认和接受。

第二,靠深入的理论工作和党内教育。

毛泽东认为,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主要是由认识上的偏差引起的。为了肃清"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党内教育。

基于这种认识,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集中精力去研究党在前两个历史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强党的理论建设。1935 年 12 月,他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对党的政治策略方面的诸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从而系统地解决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6 年 12 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通过总结红军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正反面经验,系统地说明了党的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这部著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1937 年 7 月和 8 月,他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深刻地阐明并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发挥。这些著作的发表,帮助广大党员尤其党的干部提高了对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

增强了识别政治上、思想上的重大是非和抵制"左"右倾错误倾向的能力，对保证中国革命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形式，使全党同志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为主要内容，目的是帮助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思想方向、思想路线。1943年冬季，党的高级干部开始了对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通过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进一步统一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并在这个基础上，由1945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说过，在党的历史上，有过反对陈独秀路线和李立三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是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二是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与以往采取过的那种惩办主义、过火斗争的错误做法相对立，毛泽东强调："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①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开展的这次整风运动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就是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干部统一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对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高度的团结一致。这样，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所通过的党章就正式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据考证，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王稼祥。他在1943年7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② 同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主义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938页。
② 见《解放日报》第1943年7月8日。

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①] 1945年5月,刘少奇在《论党》这部著作中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系统的阐明。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②] 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已经在斗争实践中得到证明,它被党的七大确认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

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很深厚的,人民的革命要求是极其强烈的。一旦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潜力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有效的运用,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成为不可阻挡的了。如果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所有的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结束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革命的结局就根本不同了。我们用八年时间就打败了东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日本,赢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接着用四年的时间又推翻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历史的事实有力地证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确实是中国人民斗争的伟大的、胜利的旗帜。

五、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如同毛泽东思想那样,起过如此巨大的动员群众、改造社会的革命作用。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13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智慧的结晶”。这个理论之所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毛泽东对它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主要的作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第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不能胜利的，但是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注重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对革命实行正确的指导，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是来自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中，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的经验教训，着重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①]。毛泽东及其战友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概括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独特的经验，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

毛泽东深入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统一，而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人们为了获得科学的认识，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成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②]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是巧妙地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②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注意揭示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由此使这个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既然是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得到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式、运用形式和发展形式,那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它的一个根本点。如果离开这个根本点,那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更谈不上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和科学阐释了。

第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基本出发点。离开了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为了办好人民的事业,党必须制定并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实践经验的积累,离不开向群众的学习。毛泽东一再讲述过"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个道理,讲述过自己在从事社会调查时,是如何恭敬勤劳地把那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等等当做自己敬爱的先生,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经验的。他认为,要真正调查了解中国的情况,"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①。

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创造者这一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这是党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使自己逐步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关键。毛泽东反复地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

为了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认为,党必须将群众中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作宣传,使之坚持下去,再到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只有如此循环往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才能一次比一次更正确,党的事业才能一天比一天更发展。

---

① 《毛泽东选集》,第790页。

把群众路线当做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根本点。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其必然的结论，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指出，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有鉴于此，“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决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①

毛泽东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忠诚的、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在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他从来都明确、执着、坚决，不曾有过半点含糊。为了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他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揭示了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的本质，教导人们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必须在战略中藐视它们、同时又在战术上重视它们。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主义。中国革命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无产阶级的事业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事业，它需要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但是，既然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别国革命的经验时，中国革命才能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就必须独立地对中国革命负责，必须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② 而作为这种结合的产物的毛泽东思想，不仅以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思想、道德也由于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而得到了升华。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第31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1页。

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思想,它由于扎根于中国的大地而成了他们所需要的、同时又是他们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和可以掌握的精神武器;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能够充分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了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①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是相互支援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地必须依靠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毛泽东历来强调,必须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而自力更生的根本含义,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即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中外反动派。在反动派的严密包围与封锁下,在同国际革命力量在物质方面的联系基本被切断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正是依靠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才得以生存、发展并逐步赢得胜利的。

由此可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根本点。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历史特点、历史地位的论述,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有的论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持有特殊的见解,认为:实用主义因素、民粹主义因素和道德主义因素的渗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它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判断、接受、运用中,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反射出了在象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命运。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由此在中国获得了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点或者最重要的几个特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意识、与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的结合,与实用主义、民粹主义、道德主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的结合,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为这种结合的产物,就不能不是、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或者扭曲。

论者说明,提出上述论点,是为了使人们"能更自觉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意思诚然不错。但是,有必要指出,由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过程,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这些论点在理论上既不能成立,在实践上更无助于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62页。

们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地对这些论点进行一些分析。

(一)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实用主义因素"?

的确,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一开始就是被当做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而被接受的。问题在于,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实践的品格,是不是就意味着走向实用主义呢?马克思说过,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强调自己的实践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难道为了同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人们必需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不发生关系的"纯粹"的、抽象的学理来研究吗?

事实上,在构成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相区别的基本点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与实用主义相对立的。

实用主义者把主观臆想的所谓"纯粹经验"当做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否认有独立于经验、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反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对象是客观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② 他把那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或将局部经验绝对化的人称作主观主义者,因为"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他指出,这种主观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③

实用主义者认为"有效的"、"能满足我的需要的"就是真理,否认真理是观念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反映。毛泽东反对这种真理观。他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我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

由此可见,不注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基本论点,仅仅因为他们重视实践、重视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就认定他们具有实用主义倾向,这是没有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0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801页。

服力的。

论者提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有实用主义因素渗入的主要论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把重点放在了唯物史观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方面。

我认为，这种说法仍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渗入了实用主义因素这个命题。因为：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所接受的就是完整的马克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而不只是它的个别部分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 年 5 月)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9 年 11 月— 12 月)一文中指出："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在英美观察经济状况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为主的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 年 2 月)一文中也指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说明，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备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获得了基本正确的阐明，虽然其中的一些论述还不深入，某些方面甚至还有错误。毛泽东也是如此。后来他更明确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①] 他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这也是很明白的。

第二，在实际斗争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②] 与此相适应，在不同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部分也就分别地被人们所强调。在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和着重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十分自然的。如前所述，毛泽东确曾说过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后"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样的话。对此，有的论者已经指出，"这段话里，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的说法，不能认为是很准确的概括"，因为马克思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4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178 页。

己就讲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和正确的,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中国社会具体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①。而在实际上,毛泽东也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在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之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了帮助人们掌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曾经用很大的精力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而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以后,他又曾经用很大精力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且写了读书笔记,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很明显,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且与这种实际相结合,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决不是实用主义地,用阶级斗争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三,恩格斯曾经说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最大的发现。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在讲到怎样认识错综复杂的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时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② 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来考察阶级社会的有关问题。从恩格斯、列宁的上述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本来就占有重要的基础性的位置。这些理论曾经在帮助中国革命者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重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尤其是在革命时期予以特殊的重视,这决不是把实用主义因素渗入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从而扭曲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阵地。值得注意的是,当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就及时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并且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③ 的任务。这说明,他是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60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0页。

历史地看待阶级斗争问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已经不再把阶级斗争问题置于视野的中心位置了。1957年以后,他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看作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他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中国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之后的政治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并不是由于什么实用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以后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严重教训无疑应当认真总结,但这不是加上实用主义因素的渗入这几个字可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复杂的问题过份地简单化了。

(二)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民粹主义因素"?

的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问题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他们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并且规划了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胜利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路。问题在于,重视农民,是不是就意味着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民粹主义呢?事实上,农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从来就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国民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民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重视农民,不注意解决农民问题,那就从根本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就根本谈不上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了。难道为了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疏远农民,疏远农村,而以主要精力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吗?

民粹主义是19世纪后期发生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具有特定的涵义的。

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历来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相比较,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①]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主张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从中国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出发,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能不受到限制的。当时中国所要做的事情,不是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走"节制资本"的路。对于民粹派企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不止一次地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59页。

过明确的批判。1944年8月，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1927年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但"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 当着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时，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及时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且从原则上规划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途径。这说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他都是反对民粹主义的。

民粹派否认产业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把农民看作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历来反对这种观点。他强调，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成为胜利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大革命时期，他热情支持农民运动，同时主张要"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②。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当他以主要精力在农村中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时候，他就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性。他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深刻地阐明了在农村环境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必须首先和着重进行思想建设，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来纠正和克服党内和军内的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除了重视对农民出身的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以外，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创造了整风这种形式来系统地改造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土改中，他明确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③ 经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审定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还指明了"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就是这种"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在接管城市时，以他为首为党中央多次强调，决不能以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238—2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314页。

小生产者的观点看待城市,处理城市工作中的问题。这是结合革命实践,改造农民思想,注意把他们引导到无产阶级思想轨道上去的两个突出例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明确告诫全党,为了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就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他还多次讲过,农民终究是农民,他们仍然具有两重性。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很清楚,尽管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充分估价他们的革命潜力,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从来没有象民粹派那样,把农民看作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崇拜他们的自发性。

由此可见,在构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基本点上,毛泽东都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民粹主义相对立的。无视上述基本事实,不征引他的上述言论,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对民粹主义作过明确的批判一样,仅仅根据他重视农民,曾经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就判定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因素、民粹主义倾向甚至简直就是民粹主义,这种论证问题的态度,不能认为是严肃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当然,长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环境中进行活动,不能不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带来一系列的困难,比如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许多党员的眼界受到局限等等。但这些情况的发生,取决于党在当时面临的客观环境,而不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中渗入了民粹主义因素。依靠斗争的锻炼和党内的教育,许多出身于农民的党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得党即使主要在农村环境中活动,也仍然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

(三)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道德主义因素?

所谓道德主义?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这里似乎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意味着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了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和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视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文化批判、人的改造等意志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色"。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革命策略时所依据的,究竟是历史的逻辑还是伦理的原则,是对时代特点和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斗争形势的认识、还是抽象的道德标准?只要研究一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这个问题是不难弄清楚的。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真诚拥护者,他们转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曾经约许将按照普遍的爱的原则在人间

建立"天国",而是因为它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确定了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之后,他们仍然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他们宣布最终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但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仍然主张区别对待两种剥削: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试问,在这里起作用的,难道不是对于历史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判断,倒是什么抽象的"道德主义因素"?

马克思主义肯定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同时承认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主张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同时认为社会的改造也必然伴随着人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列宁在《怎么办》中也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的,必须把它"灌输"到工人中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就是重视思想意识、重视人的改造的。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道德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注意这样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走向道德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员应当具有自觉的革命意识、集体主义的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而且,这种思想改造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进行的,并不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所提倡的那种脱离人民群众实践的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要求共产党员在斗争中进行自我改造、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注意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教育,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去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条件。这样做,为什么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给马克思主义渗入小生产传统社会那种道德主义因素呢?如果这种论点可以成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为了同道德主义划清界限,我们就不应当这样做,而应当崇拜自发性,应当听任乃至鼓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等思想自由泛滥?而问题在于,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恰恰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

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渗入了实用主义、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因素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①。这个学说,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先和着重的,是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是总结和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它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②。这样做,正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使之具有为中国人民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条件之一。问题不仅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从中国的历史遗产中继承了什么,而且还在于他们是怎样继承的。对于孔夫子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清理,他们是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孙中山,是按照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所说的,批判其"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③。总之,对于中国的历史遗产,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并不是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更不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之相中和,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毛泽东思想称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道理的。它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使之在许多方面具体化,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发展的学说所作的伟大的新贡献。把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说成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或背离,这说明,这些论者既没有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4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32页。

第三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一、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

近代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以来，中国人民不仅继续遭受严酷的封建压迫，而且还遭受了新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实。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的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斗争向来是英勇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小，几乎都曾经欺侮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① 这也就是说，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得牢固，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人民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近代中国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这两个基本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的。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数的仁人志士，正是为此而进行了长时间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奋斗。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两个历史任务，是互相关联着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经济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8页。

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就不可能废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改变它们控制中国海关,扼住中国财政的咽喉以及在中国倾销商品和进行投资等方面享有的特权,由此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得以自由的发展;二是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购买力,由此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部分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三是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由此使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以便集中力量去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这样,中国的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项事业也就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个目标也就无从实现。

由于旧中国的统治都无不以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作为自己的靠山、以本国封建势力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因此,它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解除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束缚。为了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本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总是交替采取渐变即量变和突变即质变这两种形式,或者说是和平进化和革命变革这两种状态的交替。在通常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是以渐变的方式演进的,这时,改良、改革对历史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当着逐步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达到了极其严重和尖锐的程度,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也相应地成长起来了的时候,革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由于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是受到反动的国家政权的保护的,因此,"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①,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由于保护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的国家政权是依靠反动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来维持的,因此,要夺取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就不能不使用革命的暴力。

①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选载(二)》,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②。决不能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实际上，“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③ 清代末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情况正是这样。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起。事实表明，不奋起革命，国家就不能生存，社会将不能前进，人民群众也再没有生路了。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经企图采取温和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并希望李鸿章能“玉成其志”。他后来就讲过，自己原本是赞助那种“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运动的，只是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共同的思想经历。

中国应不应该革命？中国革命是不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答案。所以，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这种辩论，成了发动革命的必要的精神准备。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从1906—1907年间，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与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围绕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等问题，就展开过一场大论战。

改良派攻击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因而要不得。这种说法，也成为后来一切诋毁革命的人立论的主要依据。对此，当时的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们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这样做，恰恰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巨大的牺牲。革命派强调：“革命不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1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

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痛苦而已"。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这"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这不是很荒谬的吗?

第二,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得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过:"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而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商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正是革命这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说:"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两翼也。"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实际的。

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后来自己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而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口为所箝"。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从痛苦的经验中终于懂得,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是行不通的,要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

近代中国必须进行革命。中国需要进行的,又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

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由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既然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①。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647页。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为目的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是使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第一步的准备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具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意义，“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①。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②。孙中山领导的1911年革命即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③。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作出了科学的评价。他说，这个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④ 资产阶级共和国蜕变成了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中国不仅没有开通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愈陷愈深了。

辛亥革命的流产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6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6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64页。

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①。他又说,"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机构)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②。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他们的最终目的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地发展起来"。所以,"今天的农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③。列宁的上述论断,对于理解中国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有着直接的帮助。与俄国一样,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就中国的具体作法来说,就是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土地制度的这种改革,不仅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而且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土改以后建立起来的农民个体所有制经济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小农必然要发生分化,一方面产生出大批农村雇佣劳动者,一方面产生出少数富农即农村资本家。土改以后,如果不引导农民组织起来,那么,农村的自发发展,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说明,土改本身,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范围。所以,以土改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个任务,不仅作为剥削者的资产阶级提不出来,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也是提不出来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提出这个任务。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以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为前提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显然,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中国革命既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又是反帝的民族革命。

从历史上看,争取民族的统一和独立,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列宁指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④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有时表面上带着全民的性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当然,民族问题的性质是发展变化的。这个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55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64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674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0—371页。

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① 就所属的革命阵线来说，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由于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它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民族运动本身已经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在落后国家，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内在的本质，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② 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③。列宁的这个论断，可以帮助我们懂得，尽管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为什么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

正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他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④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⑤

中国共产党应当参加民主革命，而且应当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制定一条符合现代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自己选集的开篇就讲了如下的一段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25页。
②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解放社1950年版，第7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62—56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074页。

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① 在这里,毛泽东总结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论证了分清敌友的重要性。分清敌我,这正是革命总路线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都没有能对正确区分敌友这个问题作出过正确的答复。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这说明,农民既没有认清外国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本质,也没有认清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反人民本质。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并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口号。辛亥革命流产以后,国民党一度主张联合美英对抗德日、联合地方军阀反对北洋军阀,也仍然没有鲜明地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这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没有能力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这个在长时间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是由中国共产党加以解决的。

前面讲过,1922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已经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纲领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四大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解决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所不能解决的民主革命的纲领问题,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个阶级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因为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通过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科学分析,正确地揭示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而且对这个思想初步作出过概括性的表述。在 1925 年 1 月所填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他在答复"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这个问题时表示,"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 1939 年 12 月所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并且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准确、更简明地概括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②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 1948 年 4 月所写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作出了最完整、最准确的概括,指出:"无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647 页。

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①

这条总路线包含着三个基本点，即：

一、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不属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

二、这个革命的参加者是以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内；

三、这个革命的对象只能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与它们有联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能是和不应当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和一般的资产阶级。

下面我们分别地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分析。

三、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谁？属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是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区别点。这一点，直接决定着这个革命能否具有彻底性，能否具有广大的群众性的规模，决定着这个革命能否胜利，以及这个胜利能否成为人民的胜利。

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时期，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有着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从世界范围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还没有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无产阶级只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则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这个统治逐步地得到了稳定。比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中，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发展得还不够强大，它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力求给这个革命打上自己的某些印记；这个革命的结果，仍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是得到一些自由权利，但是它应当利用这些，随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使资产阶级革命成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317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对于18世纪40年代的德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讲的。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认为,在当时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②

第三阶段:无产阶级已经更加强大,可以而且必须提出争取本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以便在这个革命胜利时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在20世纪的俄国革命中,列宁就是这样主张的。

还在1899年,列宁就已经针对俄国的资产阶级既反对专制制度、又害怕社会制度民主化并且随时可能与专制制度结盟这种情况,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③ 在俄国1905革命中,列宁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争取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他说过:"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④ 他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惟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彻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反对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3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529页。

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① 在这里，列宁已经提出了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领导者之外，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思想。他强调，无产阶级既然要在民主革命中担任领袖，那么“革命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② 这个专政应当为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专政准备好基础。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还不够，1905 年革命是失败了，1917 年二月革命的果实则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以致无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发动武装起义，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夺取政权，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是列宁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的上述思想，是针对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提出来的。共产国际把这个思想推广运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补充提纲》(1920 年 7 月—8 月)指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但最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底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在落后国家内，人民群众之加入共产主义，将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由于先进国家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阶级的自我意识之发展。”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批示(1923 年 5 月)》更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④

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到胜利，中国资产阶级就不行？为什么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第一，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资产阶级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首先是帝国主义势力不容许。

中国革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毛泽东认为，考察中国革命问题，不能离开这个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不能离开世界政治的总格局。

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即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05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776 页。
③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 59 页。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9 页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因为"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①。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革命的参加者在主观上都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或反帝意识。这种革命之所以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就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反帝斗争的总结算中实际所起的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来说的。事实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具体的政治态度,有各种复杂的情况,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对此,1958 年 9 月 2 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曾作过说明。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么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一边,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一边,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他讲到,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②不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作的分析适合于当时的中国,这不应当成为问题。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曾经天真地以为,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既然以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就必定会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不过是它们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而已。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同它们发展经济文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 667—668 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710 页注〔17〕。

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无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怎样虔诚地向西方国家学习，热烈地向他们表示友谊，无情的现实却在于"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无不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①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事实。

第二，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它没有能力领导人民赢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这个革命的对象主要是本国的封建势力。中国革命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革命的对象不仅有本国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这两种势力还结合一起，前者是后者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国际支柱。这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远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强大，中国资产阶级要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它应当比当年的西方资产阶级更有力量，更具备革命的坚决性。而事实正好相反。它恰恰没有这样的力量，缺乏这样的斗争勇气。

下面我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状况作一点分析。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它们是资产阶级的主体，由于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为革命的对象；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它们在革命中具有两面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主要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据专家估算，"中国民族资本在它积累的最高峰的时候，不过 70 多亿元（1936 年币值），合 20 多亿美元，而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估计达 42.8 亿美元，比民族资本大一倍以上。稍后，官僚资产阶级所积累的财产达 100 到 200 亿美元，比民族资本大四倍至九倍"。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很脆弱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首先，是外国资本的压迫。由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实行商品倾销并直接投资经营企业，致使中国的市场被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民族工业由于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其产品无法与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 629 页。

竞争;其次,是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由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民族工业很难与之抗衡;再次,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由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受到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村购买力极其微弱,由此也就使得国内市场狭窄,轻工业原料供应不足,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最后,是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由于反动政府征收苛重的捐税,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更使得经营民族工商业获利困难,而陷入危机。正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地生长起来的,它也就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1936 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0.8%,加上工场手工业产值占 20.5%;1949 年现代工业产值也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加上工场手工业是 23%。而在这少量的现代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民族工业资产净值,1949 年时也不过 20.8 亿万元(1952 年币值),其力量之微弱,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在民族工业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比重大。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百分之八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它和工业资本的比例极不相称"。"民族资本的这种组成的不平衡状态构成它的最大弱点,使它无法摆脱对帝国主义资本、封建经济和官僚资本的依赖。民族资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基础"。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1949 年,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只占 18.5%,而其中机器只占 1.4%,消费资料则占 81.5%。有人说,中国工业只不过是装配工业(即以外国零件装配成机器)或加工工业(即以外国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商业资本因无强大的国内工业,他所经营的不是批发外货,就是趸卖原料以供外国资本主义"。这类情况,最明显不过地表现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缺乏独立性。

第四,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多数工厂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为手工业工场。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民族资本以分散落后的生产,要在帝

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力下挣扎图存，它惟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力求以最大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得较大倍数的剩余价值”。他们十分害怕工人的觉醒和革命发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第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不少民族资本家的亲友是封建地主，他们在农村进行着封建剥削。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确实保障，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两重身份。正因为民族资本家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们也就不敢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纲领，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动员和组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的力量。

正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品格作出了深刻的揭示。他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① 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也正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②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阶级是不能把革命的领导责任胜利地担当起来的。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③ 它能够把领导民主革命的责任担当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6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73—6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73页。

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但革命性很坚强、很彻底。列宁曾经说过,"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①。这个观点,原则上也适用于分析半殖民地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城市的作用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重要,但相对于广大乡村来说,它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大企业中,这种情况有利于他们形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同时,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代表广大农民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情况也使得他们有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说过:"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②

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因为在旧制度下,整个无产阶级要统统提高到应有的觉悟程度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者集团、它的先锋队组织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才能把它们联合起来,使之在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不是自封的。"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要使群众认定我们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并自愿地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就需要我们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和正确地争取群众的工作过程。"③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7—1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75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9页。

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①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执行了这些条件，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逐步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最终成了他们公认的政治领袖。

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这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也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②

为了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必须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③。按照这种认识，这种方针，都不可能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在建党初期，陈独秀曾经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是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终究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④ 在他看来，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主要依靠资产阶级，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领导革命而是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替资产阶级抬轿子，无产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可以得到若干自由权利，而后再搞无产阶级革命。周恩来指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18、19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⑤时代前进了，陈独秀的思想还停留在老地方，他所犯的是典型的右倾错

① 《毛泽东选集》，第262—2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15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
④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
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9页

误。

前面讲到,党的四大已经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问题。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具有极优越的条件来获取最后的胜利。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领导中国走第三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结果要走到殖民地的。要战胜他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① 大革命前夕,彭述之写过《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他肯定了无产阶级应当领导中国革命,同时又认为"各种阶级,如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暗示与领导的",所以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天然"的领导者。周恩来指出,彭述之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在于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②。

为了使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变为现实,为了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领导者,列宁认为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愿意彻底进行民主革命而且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这是进行领导这个思想所要求的,因为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就不成其为领导者;领袖没有被率领者,就不成其为领袖。列宁认为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第二,要把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竭力想由自己充当革命的惟一领导者的那个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陷于孤立。列宁认为自由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应当说,列宁的上述思想在原则上也适用于中国革命,只是实施的细节应当有所不同(与俄国资产阶级具有反革命性不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中国无产阶级既要排斥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又不是使之陷于孤立,而是要争取与之实行革命的联合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遵循着上述思想,正确地解决了发动和组织农民的问题和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问题,才使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得以落实的。

四、革命的参加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不是真正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敢不敢充分地发动群众,这是无产阶级领导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77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159页。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点之一。

资产阶级在全部人口中只占少数。为了推翻封建制度的压迫，求得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资产阶级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它不能不利用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力量。所以，在革命时期，它往往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它就是以第三等级的代表自居的。在西方，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即在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正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西方资产阶级才赢得了对于封建势力的历史性胜利。但是，资产阶级作为剥削者，它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从根本上讲，是相冲突的。因此，即使在革命时期，它也不可能真正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不敢充分地发动群众。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作过很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① 事实上，如果群众有了觉悟，真正意识到了自身利益之所在，并为此而奋斗，他们就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驯顺的追随者了。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主要是给资产阶级带来利益。而在胜利后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后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恰恰是农民。

害怕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共同具有的性格特征。只是这种特征，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依靠的主要是一个皇帝，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力量。尽管一些维新志士个人，在斗争中表现得很英勇，但由于没有群众的支持，他们还是不能不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慨叹。辛亥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活动也"仅仅浮在上层"，"不深人群众，没有群众基础"。它只是依靠少数革命分子，顶多也只是联络一些会党。革命党人在农村没有同农民结合，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农民的自发斗争是互相脱节的。在城市，他们也没有同工人结合，一般工人乃至知识分子对他们并"没有深刻的印象"。在革命党人中间，甚至流行这种说法：革命是由先知先觉者发明、后知后觉者宣传、不知不觉者实行的。这个说法，确实把那种不相信群众的思想清楚不过地表露出来了。

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不久，有了根本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9页。

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成为他们的政治领袖。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因此,它能够真正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敢于充分地发动群众。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即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边去",都"必须是不脱离群众的"①。这一点,正是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一贯遵循的原则。党坚决认定,"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②。党在成立初期就明确提出,"每一个党员不但自己应当能为党的政策而奋斗,而且应当会引导别人去奋斗,发展党的势力到群众中去"。③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要求自己的党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懂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④ 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⑤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正因为如此,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报告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⑥。这也正是党的力量能够从小变大、从弱转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而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是指哪些人呢?毛泽东说过,"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下同),第 90—92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7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8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094—1095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096 页。
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42 页

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①] 拿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情况来说，一般地，是指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个特定的阶段，人民的范围也还有局部的变动。如1927年革命失败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民族资产阶级曾一度离开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虽然这时我们仍然应当对他们采取争取的政策；在抗日时期，人民的概念有所扩大，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汉奸、亲日派才被当做敌人。总起来说，人民中间的主体部分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工人、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包括一部分剥削者，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依靠人民，首先和着重的，是依靠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

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已经在前面讲清楚了。这里主要讲一讲关于农民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农民问题。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②] 他说过，如果能够争取到农民，“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③] 他还说过，“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④] 他并且认为，由于农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境遇，只要无产阶级政党有正确的农民政策，农民是会“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的”。[⑤] 后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⑥]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列宁是在农民占多数的俄国领导革命，而且首先是领导民主革命的。他认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485页。

为,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就是实现对于农民的领导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①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看到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满结合,"是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次把中间阶层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首位的革命。"② 后来,列宁还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强调指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③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在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中国人口的80%以上。在中国,五个人里面就有四个是农民。帝国主义势力来到中国是为了进行掠夺,农民正是它们的最大的掠夺对象。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支柱是封建地主阶级,农民正是地主的直接的压榨对象。所以,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主义,都要依靠广大的农民。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④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成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⑤

中国的无产阶级尽管有很强的革命性,但终究人数太少,只有当它同农民结合起来的时候,它才能是真正强大有力的,它领导的革命才能形成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对于农民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如果把农民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落到了实处,其他中间阶级就会来向革命靠拢,斗争的发展乃至胜利就有了保证;如果不能把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就成了一句空话,革命就会陷于孤立的境地,就不可避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05—606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40—14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077—107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672页。

免地要遭遇挫折乃至失败。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尽管它认为既然"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①；但与此同时，它也已经开始懂得，"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②；懂得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努力去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的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③；懂得"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④ 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党进一步认识到，"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强调指出，"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⑤

在建党初期，当着党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开始深入到农村中去开展工作。1921 年 9 月，共产党员就在浙江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农民建立起农民协会。1922 年，彭湃在广东海丰地区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大王"。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特出的贡献。1923 年，他在主持党的湘区委员会工作时，即曾派工人到衡山发动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展过颇有声势的斗争。1923 年党的三大以后，他作为中央局成员兼管农民工作。1925 年，他在湖南湘潭的韶山、银田寺一带亲自做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之后即"注重研究农民问题"。1926 年，他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指导全国农民运动，并直接从事农村调查、训练农运干部等项工作。正是在调查研究中国农村情况、总结农民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他著文深刻地论证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 年 12 月)一文中，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9 月)一文中，他提出了"农民运动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重要思想，并且主张"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122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44 页、45 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108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124 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207 页。

浩大工作”。他号召革命的同志“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号召他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去了解农民的疾苦,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一文中,他热情地支持了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有力地答复了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他强调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对于这个变动采取的态度,成了区别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他提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并在“彻底推翻地主权力”之后“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问题”,从而阐明了党在农民问题上应当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内发生过两种错误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①

陈独秀怎样在农民问题上跌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还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陈独秀就讲过,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他固然说过,“农民居处散漫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的原因”。不过,紧接着他还说过,“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都有驱使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②。大革命高潮时期,他甚至主张,党在已经有农民运动的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③

那么,根据什么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陈独秀“忘记了农民”?他在农民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

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陈独秀对于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作了不切实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页题解。
②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35页。

的分析，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

在《中国的农民问题》一文中，陈独秀根据国民党农商部的统计资料，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国农村中由于“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所以“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运动。”这就是说，中国的农民主要是中农，所受地主的压迫不严重，所以缺少革命的要求。换句话说，农民虽然人数众多，革命需要依靠它，但由于它的革命性不强，又是很难依靠的。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因而是原则性的错误。对比一下毛泽东的有关看法，就可以看清这一点。

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对中国农民各阶层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在中国农村中，贫农占 70%，中农占 20%，地主和富农占 10%。他着重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他们无土地，租种地主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受地主的剥削”。所说的半自耕农也就是半佃农，他们缺少土地，不能不部分租种地主土地，每年耕种的这租于别人的部分，也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即也受地主剥削。所以，中国农民的这个主体部分，并不是小资产阶级（中农），而是“同属半无产阶级”。正因为他们受到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成了“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中农即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中农虽然也有左、中、右之分，但在革命高潮时期都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即“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①。这就是说，占中国农村人口的 90%的劳动农民不但是中国革命需要依靠的力量，而且也是完全可以依靠的。

当然，农民也有自己的弱点，其中包括陈独秀所说的“散漫”、“保守”等弱点在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凝聚为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但是，农民作为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势力尤其是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这一方面，才是他们的本质和主流。陈独秀看不清这个本质方面，而把他们的支流方面如“散漫”、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7 页。

"保守"等弱点过分地突出起来①,从而对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作出比较消极估计,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样,陈独秀在思想上就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矛盾:一方面,认识到"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另一方面,又感到"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虽然他还说过"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不过这话说得很勉强,显得自己对这种说法也缺少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资产阶级身上,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在政治实践上就总是看资产阶级的眼色行事,尽力把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活动约束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范围以内,生怕越出这个范围,生怕做出什么事情来会使资产阶级不高兴,由此气跑了或者吓跑了资产阶级。这也正是他对待农民运动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他确实具有马克思形容过的资产阶级的那种心理:当农民还没有奋起斗争的时候,他"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当农民真正实行革命的发动,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的冲天精神的时候,他"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农民斗争进入高潮以后,中层以上社会纷纷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也就惊惶失措起来。正如《毛泽东选集》中《湖南农民运动政府报告》一文的题解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②

与陈独秀过分重视资产阶级不同,张国焘片面地强调工人运动,而对于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的力量,则作出了与陈独秀同样的错误估计。他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1922 年 12 月)一文中说,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他们之难以加入革命,自不待

①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列举的农民难以加入革命的理由,有的在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比如,说"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就是。固然,山东、河南的农民在当地不能生活时,不少人去闯关东。问题在于,关外并不是人间大堂,那里的农民同样要受到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到了关外的农民,还是要起来革命的。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2 页。

言。这样，张国焘尽管在口头上后来也高喊过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由于不懂得农民是它的最主要和最可靠的同盟者，他也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了被领导者，还谈得上什么实行领导呢？

周恩来说过，“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① 用这个话来批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张国焘在农民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很贴切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处境是极其艰难的。国民党反动派用血腥的屠杀政策来对付中国的革命者。工农运动受到了严厉的摧残。资产阶级则离开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党依靠什么坚持斗争呢？主要是“紧紧地依靠着农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农村革命政权，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复兴之路的。

在这个时期，党内在要不要依靠基本农民群众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加深了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坚决地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就是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之间，“是没有争论的”②。只是在党要不要以主要力量从事农村工作，农民是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问题上，党内的认识在一个时间内是不统一的。八七会议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使党在政治上大进了一步。但是，八七会议以后，中央即发出通告，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力量”③。中央对于全国范围内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现象感到深深的忧虑，并不认为这是合乎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而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④。党的六大在党的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六大以后的中央在一段时间里也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六大和六大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正确地批评了那种“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以为那些散漫的农村斗争可以暂时置之不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错误地认为“过于重视农村斗争”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对于党、对于革命都是莫大的危险”。1929年2月，中央在给毛泽东、朱德及湘赣边特委的信中特别强调，“目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938—93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主要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党在农村的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以便这些斗争"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较平衡地前进"(着重点为引者所加)①。以后历次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无例外地坚持和发展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方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人"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②等等。

党内一些人为什么不承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呢?这是同他们不能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农民的主力军作用作统一的理解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似乎承认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就是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定了。比如,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就认为,"农民激进工人落后""这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无疑的要使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中失掉领导地位"③。所以,中央强调,必须使"暴动的城市成为自发的农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如果"轻视城市斗争,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④。六大以后,中央之所以批评"过于重视农村斗争"的倾向,重要的原因,就是顾虑由此引起"农民意识笼罩一切",使斗争离开"无产阶级的意识领导"。1930年5月,《红旗周报》的记者批评那种认为党应以主要力量从事乡村工作的观点时所提出的主要论点,也是认为这种主张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红旗周报》的一篇评论甚至说,认为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这种观点,必然会走到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发生怀疑,而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取消派投降"⑤。他们不懂得,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主要地就表现为它对于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及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主要地也在于它能够成为广大农民的政治领袖。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认识要比许多人高超得多。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答复中央二月来信时即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惟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5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06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57页。
⑤ 《红旗周报》第37期、第38期合刊。

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① 193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农民的主力军作用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证。他指出："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② 应当说，这是一个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极其深刻的见解。这个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应当指出，实践本身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任何认识都是不能不受到实践的检验的。尽管党内许多人曾经主张工人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党要以主要力量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斗争的实践却驱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走向农村去，主要在那里从事农民运动。就是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支配的临时中央，也不得不于 1933 年初从中心城市迁入农村，并在事实上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村斗争，虽然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它又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旦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就真正成了人民大革命，就有了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斗争的最终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极其残酷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能够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建立和发展敌后根据地，使自己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战胜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并使自己领导的军队转入战略进攻，最终赢得人民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主要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5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83—184 页。

都是由于依靠了农民,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要分歧,就是围绕着农民问题展开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过:"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解决农民问题为基本任务,以农民为主要的依靠力量,终于赢得了胜利;国民党的反动集团,以农民为主要的压迫和剥削对象,竭力压制农民的动员和组织,结果不得不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有了工农联盟,一方面就有了争取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的可能,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就有了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

五、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谁?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当时的社会,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③。

对于谁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得到解决的。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活动,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1 年底至 1922 年初召开的华盛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07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478—147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633 页。

顿会议，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遏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势头，确认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战乱，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这些事实，从反面给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育，使党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的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同时，这期间，党曾经派遣代表出席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指出中国“当前第一件事情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打倒”，创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更是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6月，党在对予时局的主张中即已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中国“人民受痛苦的源泉”。同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的分析，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方面，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之下”，这也“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没有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党的二大宣言发表后，胡适曾在《努力》周刊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嘲笑党提出的封建军阀背后站着帝国主义这个科学论断“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政治走上轨道，实即成立他所鼓吹的由所谓“好人”组成“好政府”，“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但是，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的统治，真正的好政府是建立不起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语言揭示的，正是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

中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了的事实,因此,它所提出的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不久以后,"打倒列强、除军阀"就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据1924年5月14日《中央局报告》:经过党的宣传,"在1922与1923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1923与1924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① 随后掀起的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甚至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以后,尽管它在事实上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代理人,但在表面上仍然不敢公开抛弃反帝、反军阀的旗帜。这个事实,是耐人寻味的。

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

首先,帝国主义的压迫,直接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1922年9月《向导》的发刊词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结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中国为使永〔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北洋军阀时期的情况是这样,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情况基本上还是这样。

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发起过一个以实行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但是,按照它同有关国家订立的条约,中国仍无权自定关税,只是规定对外国进口货物除原定的值百抽五以外,可征收5—30%的附加税而已;而且中国的海关行政机构仍然操诸外人之手。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更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3—254页。

徒托空言，并未付诸实行。它虽在与一些国家改订的条约中规定取消领事裁判权，同时又规定须待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半数以上放弃此项特权时方可废除。直至1943年，经与英美改订新约时才废除了外国在华的此项特权。但在1940年，它又与美国成立所谓"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美国当局"裁判"，从而把领事裁判权变相予以恢复了。事实上，国民党统治集团既然公开反共，它就不能不脱离人民，不能不依靠帝国主义。作为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回报，它也就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敞开了大门，从而使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程度随之加深起来。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就猛烈扩展，从而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控制着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1936)，冶铁工业的95%(1937)，石油工业的99%(1936)，发电量的77.1%(1936)，铁路总长度的88%(1936)，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1.2%(1930)，航空的几乎全部；纱绽的48.2%、织布机的51.3%(尚不包括东北日本纱厂)、毛纺绽的62%、毛织机的48%(1936及其前后)，烟厂产值的63%以上(1935)。抗战前夕，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①] 在银行方面，外国银行的资产也比华商银行的大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华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资本，即投予进出口业和与商品倾销相关的运输、银行、保险等事业的资本；而且，这些资本的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而且直接从中国掠取的。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乃是对于中国生产资金的强盗式的占有，这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一种严重的束缚。[②]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直接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个体农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侵占了中国的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大片土地。这些地区，成了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内，一方面采取极其残酷的手段，疯狂地屠杀、镇压和统制中国人民；一方面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肆意掠夺中国的资源，无度地压掠中国人民。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中国东北的经济完全为日本的垄断资本所统制。原由中国资本经营的厂矿几乎全部为日伪所攫夺，大量耕地也被侵占。在关内，按照"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原则，沦陷区的经济也完全殖民地化。中国的民族工业除被毁、内迁者外，大多为他们所占夺。他们通过独占经营、征发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4—106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序。

和伪政权统制机构的压价收购,掌握了中国的大量物资,煤、铁、纱、布以至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被大批地运往日本。中国人民则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无法维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取代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从遏制苏联和维护在华殖民主义利益的考虑出发,战后它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作为接受美援的交换条件,国民党政府使美方享有或重新享有了"领事裁判权"、军事性的降落权、内河航行权以及"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和购置、保存、建筑和租借土地、房屋与产业等等特权。美国资本迅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大量的美国剩余物资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甚至中小城市乃至乡村集镇也充斥着美国货;其在华投资更是急剧增长,占到各国在华投资总数的80%。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的私人企业,实际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分支机构。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结合,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引向了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把革命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是很自然的。

中国人民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除去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以外,也是为了扫除中国封建制度的支柱,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① 对于这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二大前夕,它即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执政的军阀是"互相勾结"的,前者支持后者,"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②。党的六大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相当深入的分析,指出"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更可以排斥'国货',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帝国主义势力"利用这些封建余孽做他们的工具,用来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种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制度——掠夺半殖民地的方式,就表现于外国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的密切的勾结"。"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底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

① 斯大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5月24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页。

加重地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一定要反对帝国主义，“才能最终脱离地主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束缚”，这个道理也是不难明白的。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中国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但是，当我们说“打倒帝国主义”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革命可以直接达到消灭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只有通过这些国家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的。那么，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具有何种涵义呢？正如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反对帝国主义，就是要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①。换句话说，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曾把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以下七项：

“A. 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

B. 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须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

C. 取消外国银行在华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

D. 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人口税之保护税则。

E. 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人航业，亦予以保护。

F. 外资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消，并从新厘定其经济权利。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须从新登记，受政府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

G. 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②

以上反帝国主义的各项要求，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都是天经地义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2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09—210页。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往来。只是这种往来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其前提就是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这个道理,党一开始就是明确的。1922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要"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① 这些话,是讲得很正确的。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②这样的口号。

作为战略口号,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凡是"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都应当反对,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扫除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的支配权;但是,作为策略口号,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是不妥当的,因为帝国主义固然都企图维持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对中国革命,它们却并非铁板一块,中间没有任何隙缝和裂痕。中国的革命者应当善于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对中国人民威胁和危害最大的那个帝国主义势力。

就是在大革命时期,尽管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达成暂时妥协,形成"共同干涉"中国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对于它们,要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委会会议文件指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最有权威的英日两国,实现他们共同的目的,是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同的是英国主要扶持直系,日本主要扶持奉系"。美国的"政策是撇开军阀,抓住中国的资产阶级,用美国资本的道威士计划来代替英日统治中国"。法国则已经"无力顾及"中国了。因此,"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尚只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地盘,他的最凶恶的道威士政策还在将来。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因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所以利用其相互间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即所谓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必要的策略"。③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日民族矛盾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7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65—166页。

上升，不仅使国内的阶级矛盾降至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且使中国而临的国际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他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①。但是，当时在中共中央占据支配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上，不具体分析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从世界矛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这个抽象的公式出发，把日本武装侵占中国东北，错误地判断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序幕，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开始。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号召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抗日，这是正确的；但它同时又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就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是非常错误的和有害的。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抛弃了上述错误口号，举起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中国同美、英、法等国建立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关系，这对于反对日本的侵略，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战后，日本被打败，英、法被削弱，美国成了世界头等经济与军事强国。美国政府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成为中国人民在走向解放的道路上遇到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的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和着重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反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的政策。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是贯彻始终的；由于各个阶段的形势不同，主要的斗争对象，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而且，由于各个阶段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形式不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形式也不完全一样。当着帝国主义向中国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是“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进行民族战争并赢得胜利，中国就会亡国。“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53页。

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①。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时期中国人民进行的直接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进行这个斗争并赢得胜利,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都是不可能的。

总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这是中国革命的一项首要的任务。

为什么要反对封建主义呢?

这是因为,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的和直接的障碍。

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封建剥削制度。

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旧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1927 年中共五大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同年,国民党农民部估计,占农村人口 14%的地主拥有全国耕地的 62%,加上人口占 18%的富农,共占有 81%的耕地;占农村人口 44%的贫农,只占有耕地的 6%;占农村人口 24%的中农也只占有耕地的 13%。在整个农村人口中,无地的佃农、雇农、游民占了 55%。刘少奇在 1950 年 6 月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就旧中国一般的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占乡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 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 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总共只占有约 20—30%的土地。据当时在华东及中南一些乡村的调查材料,一般的情况是:地主占有土地及公地约占 30—50%,富农占有土地约占 10—15%,中农、贫农、雇农占有土地约占 30—40%,小土地出租者占有土地约占 3—5%。乡村中全部出租土地约占 60—70%。富农出租土地约占 3—5%,富农自耕土地约占 10%。"这就是说,乡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的,但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21 页。

没有所有权”。[①]

地主以及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之后，即向他们收取苛重的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据1934年的统计，全国22个省区的实物地租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为45%左右，有的省区如四川的水田地租则占产值的53.6%，湖南占54.8%。至于农民因地主收租时用大斗大斛、向地主送节礼、服劳役等额外支出，还没有计算在内。这种地租剥削，不但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量，而且侵占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的必要劳动量。

除地租外，农民还受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商业资本的剥削手段，很大程度上是超经济的。当新谷登场时，商人往往压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待到青黄不接、农民需向市场购买粮食时，他们又任意抬高粮价。农民辛勤劳动所得，通过不等价交换，相当部分又被商人掠走。为了缴纳地租、田赋以及应付天灾人祸，许多农民只能靠借债度日。中国的大部分农户均为负债户。他们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偿付极高的利息。利息的名目繁多，什么“对本利”、“九出十三归”、“驴打滚”等，单这些名称就已经相当地说明了问题。农村高利贷的发放者往往就是地主本人，农民不能偿付本息时，也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房屋甚至子女典卖给地主。高利贷剥削实际上成了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是三位一体的。地主不仅发放高利贷、而且有的还兼营商业；而商人、高利贷者在获利后又往往用来购买土地，使自己转化为地主。这个三位一体的罪恶结合，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农民的身上，把他们的血汗差不多快榨干了。反动政府则不仅运用自己的权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且还向农民征收繁重的赋税，强迫农民服劳役、服兵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村经济日益陷入了绝境。长时间里，耕地面积不仅没有扩大，就是已垦农田也被大量荒废。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不过140斤；在此之前，粮食亩产最高平均也不过170斤左右。广大农民劳碌终年，尚不得温饱。许多人不得不吃糠咽菜，乃至用泥土（观音土等）和树皮草根充饥。由于买不起盐，不少农民不得不淡食。遇到天灾人祸，更有大批农民卖儿鬻女，流落他乡，甚至被冻饿面死。

封建主义重压下的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不可能提供为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购买力十分低下，也不可能提供为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广阔的市场。

---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页。

这就是说,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人民——农民就不可能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缺少最起码的条件。

封建剥削制度还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和中国官僚军阀推行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无论在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主都完全控制着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许多地主充当着各级政府的官吏;而许多政府官吏在收刮民脂民膏之后,又到农村大量购置田产,成为新兴地主。据国民党江苏民政厅 1928 年至 1934 年间的统计,该省拥有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共 374 个,其中有 77 个是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官吏。1931 年,在无锡被调查的 104 个村长中,91.3% 为地主,7.7% 为富农。这些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即土豪劣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中世纪式的黑暗统治。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就是依靠这样一部反动机器来控制全国政权的。

这就是说,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摧毁土豪劣绅在农村的统治,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

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主要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消灭封建的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就是要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如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样,也是贯彻始终的。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特别由于政治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各个阶段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也是有所不同的。

建党初期,党的二大就提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主张;到党的四大时,又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的问题。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革命农民喊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即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口号,只是还没有要求把整个地主阶级加以消灭;党在关于农民问题的纲领中提出了减租减息等项要求,党的五大还喊出"耕地农有"的口号,主张把解决土地问题提上革命的日程,只是这次大会仅仅要求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反对没收小地主及北伐军军官的土地,而在实际上,整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5 页。

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在这个时期，党已经把以革命手段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全面地提出来了，并且开始把这个任务付诸实施了，但是无论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上还是行动上，都还不够彻底。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了以土地革命为旗帜的革命战争，并且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这个时期的反封建斗争，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虽然由于革命力量当时还比较弱小，土地革命还只能在中国的一小部分地区进行；而且在“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根据地内一度执行过“地主不分田”的错误政策，这就不仅是要消灭地主这个阶级，而且实际近上手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了。

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时候，为了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党暂时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改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以利于争取地主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党重新举起了改革土地制度的革命旗帜，及时地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并且在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完成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的任务。这个时期的反封建斗争是很彻底的，封建土地制度必须根本摧毁，地主阶级必须加以消灭，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但在具体实施时，党又要求“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有利于彻底消灭封建势力。

总之，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项基本任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既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又是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①

有必要指出，当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时候，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也不能是一般的资本主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673页。

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毛泽东说过:"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①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它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的。因此,"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②,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节制。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不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但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1948 年 4 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是明确地把官僚资本主义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的。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所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官僚资本主义作一个分析。③

官僚资本是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毛泽东在 1947 年时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④ 而掌握着官僚资本的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是在 1927 年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以后,依靠反动政权的力量,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它达到了最高峰。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06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479 页。
③ 以下论述,参见拙作《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中编二(三)"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一节。北京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253 页。

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大抵是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一般垄断然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半殖民地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在这里，官僚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在生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经过一般垄断而进入国家垄断的。它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而直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中国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他们建立和加强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的过程。①

官僚资本有三个具体形态。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即指官僚自己举办的某种企业和经营；一是官僚使用资本形态，即指由"公家"举办的一切企业，这些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官僚对于此类资本经营没有所有权，但有运用权；一是官僚支配资本形态，即指那些多方而受着官僚支配控制的私人企业资本。这三个形态，"在某些场合是各别独立的，在某些场合是相混合的"。无疑地，官僚"对公营资本作自利的运用，对私人资本作自利的控制，无非是想使其所有资本形态迅速扩大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后两个资本形态，那么，"第一资本形态，也许根本不易发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成形为官僚资本"。所以，"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成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②。考察一下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不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而是在金融业方而开始的。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它们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国币、经募内外公债等项权利）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专办各地储金汇兑）、中央信托局（承办各种信托、保险及收受普通储蓄存款等业务，垄断对外贸易）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不仅完全主宰了全国的金融业，而且直接操纵着全国的经济。

在长时期内，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一直是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四大家族发展官僚资本的主要手段。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和物价的急剧上涨。人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也就由此一天比一天贬值，而且币值下跌的速度又远远地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这样，人民手中的财富也就凭空地被掠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而且为官僚资产阶级进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创造黑市以及吞并其他企业等项投机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大量发行内债，是官僚资产阶级扩充官僚资本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承购内债

① 参见许涤新《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红旗》1961年第3—4期。
② 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367页。

的,主要是四大银行。内债不是按票面价值发行,而是按五折、六折推销的,但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额十足计算,而且票面利息一般也在六厘至八厘之间。这样,承购内债,年利可达三分、四分以至五分;即一年可获利30%—50%。承购者还利用这种债券在证券交易市场中兴风作浪、牟取暴利。本来,内债的发行,就是以捐税作担保的。因此,内债发行得越多,人民的捐税负担也就越重。这就是说,发行内债,实际上正是把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财富,转化成为官僚资本集团私产的一种办法。

官僚资本集团在垄断金融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官僚资本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商业投机资本。"国家银行"的专案贴放中,工矿业的贴放只占少部分,大部分用于商业投机。外汇和对外贸易是由官僚资本集团垄断的,它们包办了外国商品对中国的倾销和中国土产向外国的出口。国民党政府的"贸易调整委员会",还垄断了国内贸易。这个政府并实行专卖制度,规定将食盐、糖、酒精、茶叶、火柴、卷烟等日用必需品通统纳入专卖事业局的管辖之下,进行收购批发。官僚资本集团借助于这种贸易统制政策和专卖制度,控制了大量商品。他们以低价甚至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进行收购,又以垄断价格加以出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其结果,不仅使官僚使用资本,而且也使官僚所有资本,都大大地膨胀起来了。比如,实行专卖制度后,许多以低价购入的专卖品大批落入官僚资本集团及其爪牙之手,市场上专卖品极度缺乏,致使这类商品的黑市价格随之猛烈上涨,于是他们又把专卖品变成"转卖品",流入黑市,以黑市价格售出。专卖之利,也就这样地进入他们的私囊了。

与此同时,官僚资本集团还以私人名义开设了许多具有垄断性质的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利用自己拥有的雄厚的金融势力和享有的种种政治特权,直接从事商业投机,获取暴利。

官僚资本集团不仅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而且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的掠夺。属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35年,它垄断了全国主要的重工业和矿业。它下属的厂矿大部分是接收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小部分是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和技术而新建的企业。由官僚资本控制支配的以"民营"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出现的工业企业,大多也不是直接投资建设,而是通过兼并民族工业而来的。1935年,在资本总额中,官僚资本还只占12%,民族资本仍占88%;几年之后,到1942年,官僚资本已占69.58%,而民族资本仅占30.42%了。解放前,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工业运输固定资本的

80%，它拥有电力的67%，煤炭产量的33%，钢铁的90%，水泥产量的45%，纱绽设备的40%，织布机设备的60%，糖产量的90%，轮船吨位的45%，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100%。

很明显，官僚资本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土积累起来的，而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是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官僚资本的发展在根本上并不等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它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国民党统治区，正是由于官僚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控制着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结果也就把那里的整个经济引向了绝境。

官僚资本的发展，没有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而只是使中国变得民穷财尽，使广大中国人民不得不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它“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因此，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消灭官僚资产阶级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纲领既最低纲领；它还有将来的纲领即最高纲领，这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初期就已经确立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崇高目标。党之所以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 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② 这就是说，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也是历史赋予这个阶级的崇高使命。

正因为如此，是否具有并坚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和纲领，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6页，第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集》第1卷，第306页，第252页。

了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改良党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即使在革命的时期也是以建立和发展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他们的主张和要求并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毛泽东在论述共产党的主张同国民党内三民主义者的主张的差别时就明确地说过:"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① 我们决不应当忽视这种差别,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内真正赞成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人混同起来了。如果这样,势必使党的面目变得模糊起来,那"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共产主义不是幻想,不是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科学预见和客观真理。"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正因为如此,"每个共产党员人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②

既然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那么,它为什么要干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呢?答复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共产主义的事业是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不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搞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事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它的活动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6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59页。

的痛苦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进行反对这两种压迫的民族民主革命，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既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它就必须为解除人民的这种痛苦、实现这个革命的目标而奋斗。

诚然，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他们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们是决不会以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为满足的。但是在中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①。在中国，热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首先要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②

以前，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经根据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在农村从事民主革命这个事实，得出过中国共产党人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是共产主义者、只是"土改民主派"这样的结论。近年来，国内有的人居然也附和这种说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一篇文章中作过如下的答复：

"能不能无条件地断言民主革命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呢？不能。列宁说过，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打开了门户；民主革命进行得越彻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就越顺利。他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无产阶级应当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以便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着列宁主义，把进行民主革命当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的准备步骤来看的。比如一个登山队，它必须翻越一个山头才能走向预定的目标即第二个山头的顶点；你能说，它翻越第一个山头，并不符合它自身的利益，只有一下就登上第二个山头的顶点才符合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59—1060页。

它自身的利益吗？更何况，我们所进行的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否定方面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个革命的肯定方面则是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政权，并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开辟道路。怎么能说，领导这个革命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领导这个革命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呢？"①

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本主义。这两个革命阶段的任务是不容混淆的。如果混淆了这两个阶段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合并到民主革命阶段里去完成，那就会出现以下这样一些情况：第一，把反帝反封建同反资产阶级并列，从而模糊革命人民的视线和注意力，使他们无法把主要的打击力量集中地落到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身上；第二，把可能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推向敌人的营垒，从而扩大敌人的力量，缩小革命的阵线，使革命孤立；第三，由于突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实际工作中就会过分偏重于工人运动方面，不懂得应当以主要力量到农村去发动农民，从而找不到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其结果，不仅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既然共产主义的实现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党在当前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搞好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呢？答复是肯定的。

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的纲领是分为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由于封建主义早已在实践中宣告破产，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又走不通，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② 只要我们注意"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③ 我们就不会犯超越革命阶段的错误。

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既是彼此区别同时又是互相联系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

① 《中国革命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706页

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他强调，“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

事实上，只有正确地理解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党才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处理各种问题时既从实际出发而不陷入空想，又具有远见卓识而不随波逐流以致使自己成为自发势力的俘虏。这就是说，必须这样，我们才会一方面像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懂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因而首先集中力量搞好民主革命，而不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合并到民主革命阶段去完成；另一方面又懂得，这个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这个民主革命是为了将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因而自觉地扶助这个革命中的新的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因为这个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② 这也就是说，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只要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内在关联，并据此对中国革命进行领导，那么，这个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③ 如果在进行民主革命时忘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不懂得共产党人在当前进行民主革命是为了给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那么，在实际斗争中，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651—6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6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50页。

不可能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不会根据需要与可能精心地去扶植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其结果就难免使自己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混同起来,在政治上、思想上不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从而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正是这样落入机会主义的陷阱的。

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对于搞好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① 确立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的信念,这不仅是激发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积极性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也是促使他们提高保护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纯洁性的重要的思想保证。毛泽东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这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可缺一的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个事实,必然会使党的机体发生某种影响,因此,"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而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正是进行这个斗争的一种有力的武器。只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②

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的思想旗帜。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为了捍卫共产主义的旗帜,曾经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旧社会的一切腐朽势力深感恐慌。他们意识到,一旦它所宣扬的真理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了解和接受,他们的那个为少数反动剥削者服务的黑暗统治和腐败制度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了。因此,当这个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它就被指斥为"过激主义"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还在酝酿建党的过程中,1920 年 12 月,北洋政府国务院即致函内务部,令其制定惩治"过激党"专条。他们惊呼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应"严加防范,以遏乱萌"。1921 年 7 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其会址还曾遭到暗探注视和外国巡捕搜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的状态。在以后的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进党领导的事业,不能不领导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的武装斗争。

当中外反动派感到依靠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无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2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793 页。

的人民力量时，他们也开始注意运用“和平”的方法来软化这个党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追随者。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就曾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在这个所谓“一个大党”的主张遭到中共中央拒绝以后，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蒋介石即制定了“限共、溶共”的方针。所谓“溶共”，就是指通过采取施加政治压力和进行思想渗透等手段使中国共产党逐步实行“和平演变”，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从而丧失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若干美国方面的人士要求中国共产党改变名称，也是为了实施这个方针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步骤。某些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提出了要共产党改变名称这种意见。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同蒋介石的“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一方面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坚决捍卫党的理想和宗旨，保持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对于有些人要求共产党改变名称的问题，毛泽东及时坚定地给予了否定性的答复。他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对于这种主张，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他强调指出，共产党的名称是不能改的，“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我在《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事实上，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同当时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是可以而且应当统一起来的。“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了。以为共产党只要改变名称就可以博得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特殊好感，就会被他们引为同类，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很幼稚的。他指出，“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美国的新闻记者福尔曼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的报导》。还有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翻译为《西行漫记》。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1]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4—325页、第275页。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个新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新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个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个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①

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重要著作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也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作了初步的论述。在《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他又对这些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先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个民主主义革命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历史特点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上的表现,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国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来说,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政体即政权的构成形式(也就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663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毛泽东早就明确地讲过，“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但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这样，就得干革命。“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你不把敌人搞掉，搞什么小米、大米，搞什么秧歌，都不成，因为还有敌人在压迫。在敌人压迫下，你还能搞什么学校，搞什么生产呢？”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①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而“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在1927年以后，“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②；在1927年以前，则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推翻这个反动统治，就不可能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就不可能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不可能解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正因为如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人民革命，首要的就是要打碎这一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因为一切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都是受到它的保护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③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④ 毛泽东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起，就是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的。他当时就说过：“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保护革命完成革命。”⑤。在批评教育救国的主张时，他更明确地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共产党人非得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⑥ 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国家政权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注意的中心。实际上，在革命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8—1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3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287—1288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
⑤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
⑥ 毛泽东给蔡和森萧旭东并在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1日。

时期,一切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思想斗争,一切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等等,归根到底,都是服从并服务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这个目的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革命者,必须牢牢记住这个目的.从实现这个目的的角度来考虑和安排各项工作,来评价每一个实际步骤和每一项具体行动,才能够保证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致失足,不致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中国人民革命在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国家制度以后,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性质的国家政权呢?

我们知道,"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上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专政的共和国。"① 对于中国来说,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的条件还不具备;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只能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人获得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在建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党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党的二大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获得一些自由与权利",它随后"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② 陈独秀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则认定"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③,也就是说,是会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党的四大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四大说,"中国革命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原来决议草稿上有,讨论后删掉了)";④ 又说,"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言之"。⑤ 这就是说,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比较充分,中国是可以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阶段的(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将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之,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党的四届三中全会则后退了一步,不讲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了,而是认为中国民族运动应

① 《毛泽东选集》,第67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4—115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84页。
④ 《李维汉谈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8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7页。

争取这样的前途："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1] 会后，陈独秀发表文章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2] 基于这种认识，中央局强调，"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3] 这种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应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便"达到民族资本主义之建设"的思想，是在政权问题的右倾观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独立从事民族资本主义之建设。所以，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纯属脱离实际的幻想，是根本行不通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奋斗。托洛茨基认为，"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要全力反对城乡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定要独掌大权，因为中国没有其他阶级能够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任务"。[4] 从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出发，陈独秀等人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这种认为中国革命应当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直接目标的思想，是一种极左的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形"左"而实右的观点。说它极左，是因为它超越了革命的阶段，冒进了；说它形"左"而实右，是因为它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这种超革命词句的掩盖下，否定了中国依然存在着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走向了取消主义。按照他们的观点，只有当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高度发展之后，下次革命高潮才能到来；而在实际上，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又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所约许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一种纯粹的脱离实际的"左"倾空谈了。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现阶段，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

---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2]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3页。
[3]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29页。
[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页。

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①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权问题获得上述明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在建党以后的一个时期,尽管党在政权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明确的认识,党内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见解。比如,邓中夏在1925年5月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政权"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为此,我们要"制止"资产阶级"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为将来建立工人政府"预为准备"。② 同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企图即"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次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欧美日本等国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国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③ 瞿秋白也说过,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他还提出过"建立统一的真正平民共和国"、建立"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④ 的主张。这些思想的提出,应当被视为共产党人早期在国家政权问题上进行的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党要能够提出争取政权的任务,首先必须否定代表旧民主主义路线的"二次革命"论。它的错误并不在于要求划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界限,而是在于认为在这两个革命之间将经历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192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开始对"二次革命"论进行清算,指出"在今日之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56—1057页。

② 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25年5月。邓中夏在本文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级即应争取政权这个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他说政权可以一点一滴地取得,是不妥当的。他也还没有认识到,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政权,即后来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政权。

③ 子玉:《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月。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页。毛泽东在本文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权既非无产阶级专政,也非资产阶级专政,而是革命民众的合作统治这个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比上面所引的邓中夏的文章前进了一步。不过,他还没有对这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作出展开的论述。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列为参加革命的力量,也是不妥当的。虽然他在1925年12月的文章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作出过中肯的分析。

④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214、254页。

力逾越的'一道鸿沟",并由此认定,"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建立"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但这个解释也有重大的缺陷。如不认识民主革命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认为"革命是活的,不象演剧和做影戏,必须演完这一幕才能开演那一幕"。① 从这种思想出发,很容易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即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② 从这时候起,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以前,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一直是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党并且领导革命人民在根据地内建设了这样的政权。由于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当时的根据地政权是没有把它包括在内的。这个政权与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的国民党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处于对立的地位。

毛泽东在1937年5月的文章中说:"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惟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③ 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在政权问题上就没有发生过错误。错误是有的。一个错误就是仍然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工农民主革命"有很迅速发展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④,甚至认为"将工农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0、21、2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57页。

的基本任务"①。另一个错误就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未能适应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如同年11月通过的《宪法大纲》就把资本家与军阀、官僚、地主等并列,规定他们也"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政府虽明确"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仍"保留旧业主手中而并不实行国有",由于实行过"左"的税收政策和劳动政策,民族工商业还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1935年12月党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与此相适应,决定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会议的决议指出,人民共和国愿意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的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用比较过去宽大的对付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他们来根据地投资,开设工厂、商店等。"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现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② 这个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仍然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红军为坚强的柱石,它在实质上是同工农共和国一致的。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936年8月,党提出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且宣言"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同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指出,这种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决议同时指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必须"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④ 由于国民党坚持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这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在名义上是隶属于国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政权的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这个政权曾实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10—61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3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95、98页。

行三三制，即在这个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而这里的中间分子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成份。这是一切既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由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了民族团结的破坏者、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动员和统一人民抗日力量的障碍物，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号召得到了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响应。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作为一般纲领，作为战略目标，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就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①；作为具体纲领，作为当前的行动口号，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②。抗战胜利后，经过1945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中间人士曾就制定宪法的原则和改组政府的方案等达成过协议。按照协议，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将被废止，中国将实行议会制和内阁制。执行政协协议的结果，在一个时期内，中央政府将以国民党为主、同时有共产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解放区将在中央政府之下实行高度的自治。这样，中国就将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新民主主义制度并存的局面。中国人民将在实践中对这两种制度进行比较，并以民主的方式作出自己的选择。由于国民党当局最终撕毁了政协协议，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中国人民遂不得不以革命战争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个时期的根据地政权，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最早可能出现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这个文件中。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并进行了论证。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即就其主体部分来说与工农民主专政是一致的，但它比后者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因为"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68—1069页

以跟无产阶级合作。"人民民主专政在根本上是与国民党的权相区别的。他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① 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公开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②。次年 6 月,他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据此,194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的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③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有必要着重说明以下几点:

(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是中国进行历史性选择的结果。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反对封建皇朝的专制统治,曾经主张仿效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样式,建立君主立宪制或者民主共和制,但是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面临着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一种方案先是由北洋军阀后是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的,他们主张中国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一种方案是由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或无党派的中间人士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一种方案是由共产党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长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受到了反复的检验。其结果是:第一种方案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同,就是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除极少数走向反动以后,多数人也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最终承认了共产党主张的正确;只有共产党的方案,逐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这个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抛弃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①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13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375 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 页。

的建国方案，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将“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①

我们已经讲过，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也仍然具有两重性的作用；但是，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实践中遭到破产、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后，如果继续进行这种鼓吹、坚持这种主张，那就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而纯粹是企图开历史的倒车了。毛泽东早就警告过，中国决不能还是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② 历史是铁面无情的。谁不尊重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谁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③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政权。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决定了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④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必须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6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479页。

级,因此,这个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也有自己的一定的位置。"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将来是要被消灭的,我们"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①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是军队。人民民主专政是在人民军队摧毁了反革命的国家机器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个人民军队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

"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国体。工人阶级对于这个共和国的领导,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这个共和国的主要成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个共和国的政权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这也就是说,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把中国人民革命的三项基本的经验、三件主要的武器,都集中地概括起来、体现出来了。毛泽东说,集中我们的经验到一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很有道理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政权从来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暴力机关。在历史上,在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虽然也产生过短暂的劳动者专政,但它们不是被剥削阶级所消灭,就是蜕化成了剥削阶级的工具。与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相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暴力机关。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② 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一个伟大的新事物,它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成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中华民族赢得了真正的独立,使中华民族得以一洗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56页。

林;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使中国人民从此真正地站立起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个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①] 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能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度,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造成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从而使中国得以逐步地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使中国得以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三)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是什么?"毛泽东说,"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②]

民主和专政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里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人民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这里的专政,是人民对反动派的专政。反动派虽然被打败了,但他们在社会上有传统的影响,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仍然是相当有力量的。"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③] 毛泽东强调,必须对反动派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但是,"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伟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政策,这项工作,具有深刻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性质,对于减少社会对抗、安定社会秩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利于发展经济和文化,也可以起到重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民主和专政是互为条件、不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475页。
③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2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476页。

分离的。只有对敌人实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只有发扬人民民主,才能对敌人实行有力的专政。

应当指出,几千年来,中国的多数人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只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下,他们才第一次成了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才开始享有民主的权利,才真正可以挺直腰杆地生活,才有了人的尊严,才见了军队、警察不必再担惊受怕,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可信赖的保护者。国际上的友好人士把新中国称作人民中国,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由于中国经济文化的基础比较落后,这使得我们在进行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方面,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列宁就曾针对俄国的情况说过:"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① 应当承认,这种危险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但是不应当被忽略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于:人民民主政权确实实行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有过的民主"在原则上高得无比"的人民民主;而上面所说的那种危险,只要切实采取措施,归根到底是可以加以克服的。

有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很不高兴,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这些曾经支持过中国最反动的独裁统治,用飞机、大炮、坦克来帮助独裁者屠杀中国人民,通过举办特务机构等来为独裁者残害中国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人们,居然关心起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企图充当起中国人民的人权卫士来了,这不能不使稍微懂得一点近现代历史的中国人感到十分的滑稽。毛泽东揭穿了这些人的虚伪的面孔,明确地指出,"骂我们'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和极权主义的人们"。"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我们不过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革命人民是决不会因为有人进行这种叫嚣就放松对于反动派颠覆人民政权的活动的警惕性的。因为"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付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②

(四)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31年11月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即规定,中国的红色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478页

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这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的、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既便于发扬民主,又便于集中意志。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曾作过多次论述。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① 1945年4月,他在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② 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这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那时的议会,不过是封建军阀的工具而已。"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③ 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关于这个政体问题,1949年9月20日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关之所以实行这种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④ "只有民主集中制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6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5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6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5页。

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因此,新的人民政权是首先在局部的地区而且是在局部的农村区域建立起来,而后才逐步地推向越来越广大的范围,直到成为全国性政权的。因此,这种新的人民政权也就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前,根据地的人民政权所谓担负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因而具有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① 而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开始担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它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马克思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在于证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 列宁指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所以,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③ 这就是说,是不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他不仅必须在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实践上坚决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其内部经济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集中表现。

---

① 毛泽东在1947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件中说,宪草应“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原则”。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中,毛泽东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作出了如下的概括,他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①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中,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而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通俗的名称,叫做官僚资本"。②

很明显,必须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才有可能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是首先在局部地区建立,而后逐步扩展到更为广大的地区的;而这些地区一旦解放,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即开始逐步得到实施,而封建的买办的生产关系也随之开始得到改变了。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社会经济形态,这就是反动派统治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对于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48年2月所写的一个文件中说过:"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主义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长时期内占据优势的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代替"。③ 事实上,只有在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施,新民主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6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253—125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7页。

义的经济形态也才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

下面对党的三大经济纲领分别作一点论述。

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我们已经讲过,在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地位的,是以地主占有土地、将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收取地租等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特征的封建剥削制度。这种封建阶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式的军阀官僚专制统治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的和直接的障碍。因此,改变这种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反封建斗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掠夺对象和封建主义的主要压榨对象,成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就是土地问题。因此,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就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一、要不要采取革命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二、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路线和政策来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并摸索出正确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的。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制定的最初宣言(1920年11月)中,"主张没收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对此,毛泽东后来曾指出,这里"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①。党的二大划清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它所制定的农民问题政纲在列举农民之痛苦诸端时并没有明确提及农民没有或少有土地的问题,但曾提出"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之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并主张"限制(农民缴纳地主之)租额"。② 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指出,党的"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土地革命"。③ 由于这个指示在同年7月才送达中共中央,有关精神未能在三大文件上体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47页、551页。
②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4—125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86页。

现出来。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文件揭露了“中国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关系，而在政治上便是一种官僚军阀凌虐农民的景象”。[①] 1925 年 1 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把“中国地主重租”视为激发农民斗争的第一个原因[②]，并且把消灭封建的经济关系列为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1925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指出，“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如果农民得不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党的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不过，这不是当前就要实行的。当前，应当把减租、减税等作为“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③] 1926 年 10 月，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党，“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对于这个错误，斯大林后来公开承认过[④]）。同年 12 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等等，“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主张“实行耕地农民”，这是“过于向‘左’”的表现。[⑤]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时期，共产国际曾向中国党正确地指出，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不过，它也并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正因为如此，1927 年 4—5 月召开党的五大时，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分歧。陈独秀虽然承认“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但又认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⑥] 大会经过争论，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代会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没收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⑦] 这一革命原则；同时，以“不能太早分裂国民革命军底力量，不能在后方制造反革命”[⑧] 为理由，对上述原则作了两项限制，即：“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有的土地可不没收”[⑨]。这样，可供没收的地主土地仍然有限，并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当然，正如大会所说的那样，“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当时是不具备立即全面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的。不过，如果党有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毕竟是一面旗帜，它有助于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五大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24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33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62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17 页，第 8 卷，第 326 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564、570 页。
⑥ 《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3 期，第 43 页。
⑦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164 页。
⑧ 米夫：《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164 页。

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是不彻底的,它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何况就是这样一个决议,也没有正式公布,更不要说实行了。正是由于在反革命进攻面前,党没有坚决地依靠农民去进行反击,而是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退让政策,大革命终于遭到了失败。

1927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正式举起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会议强调"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万万农民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①。我们知道,只有经过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才有可能在这个政权管辖的范围内进行土地革命。否则,土地革命只能是一种宣传口号而已。这一次,由于进行土地革命是与开展武装斗争、建设革命政权的任务被一起提出来的,它就不仅具有宣传的意义,而且具有实践的意义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由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阶段的。这时,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进行土地革命这个问题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到1928年7月召开六大时,党已经形成了一条基本正确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到1931年,毛泽东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六大没有解决的问题,使这条路线更加完善和具体化,并且找到了一整套比较切合实际的分配土地的办法。这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土地革命的任务。

八七会议关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而"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这个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不利于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说明当时的党"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② 会议延续以往的提法,主张实行"土地国有"。由于中国农民对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十分强烈,这个口号在政治上不利于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在经济上也不利于调动他们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所以,这是一个脱离了中国实际的不正确的口号。

在1927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必须同时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65—26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6页。

时对他们应有一个妥善的安插。会议经过讨论确认,“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的土地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经被没收的普通平民,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需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这里规定的办法,比八七会议要彻底;而主张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同时给地主(不论小地主还是大地主)以生活出路,更是在政治上很有远见的(毛泽东在此后给中央的函件中说,“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

同年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张“完全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时又规定“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共有”,农民只有“实际使用权”。前面的主张是正确的;后面的规定则实际上要求没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这就不正确了。因为第一,这种主张没有区分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实际上是在消灭地主经济的同时要求把富农经济也加以消灭;第二,这种作法,必然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不利于党在农村中团结中农的事业;第三,如前所述,不承认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也不利于调动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党的六大明确规定,“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会议认为“应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加以批评”,因为“这个口号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在中农和小农私有制占人口多数的地方,‘平分土地’必将触犯广大的中农的利益,尤其不能强硬施行”。会议还认为,中国的“富农具有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在富农已成了反动力量的地方,应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时,应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时,不应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而应“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这样,六大就把 1927 年 11 月会议的错误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所以只说“大体上”,这是因为,只要赞成“平分土地”的口号,在实践中还是难免要侵犯中农利益的。六大在土地问题上的缺点在于它仍然坚持土地国有的主张。

1928 年 12 月,湘赣边区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的第一个《土地法》(在井冈山),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主要“分配给农民个别耕种”;“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毛泽东在 1941 年时说过,这个土地法“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

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①;(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② 在井冈山土地法制定后的第四个月,即1929年4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的兴国之后,发布了第二个《土地法》。毛泽东指出,这个土地法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③

1930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中国土地问题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资本主义的自由买卖关系"。由于农民没有打破私有观念,"所以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这个讲话,确实表现了一种转变,虽然这个转变并不彻底,如仍然肯定"土地归苏维埃公有"(这显然是同允许土地买卖相矛盾的),继续把土地国有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来宣传,等等(如前所述,这在政治上对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并不有利)。《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草案》(1930年11月15日收到)虽然仍然错误地主张无条件的平分土地和"走向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但也曾正确地指出,有些地方"禁止土地的买、卖、租、押,这些办法,显然在目前阶段上是过早的办法"。

在第一线领导土地斗争的毛泽东,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对于这个长时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给予了一个正确的解决。1930年12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的布告》,明确"凡经分配了的田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赁买卖由他自由"。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第九号通告中指出,为了加强广大农民对于土地革命和全国胜利的热烈情绪,并使土地革命深入,必须使他们"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惟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2月27日,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写的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件中,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他

① 1928年5月5日,中央曾发出《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第三十七号通告。此通告于同年11月2日送达井冈山,而六大精神则是1929年1月才传到井冈山的。所以,这个土地法未按六大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提法而仍沿用六大以前的"没收土地"的提法。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7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指出,“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而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况是很不好的”。“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对所新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土地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确立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以便解放农村的生产力。这个问题,终于得到正确的解决了。

(二)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

八七会议《关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没有制定出党在农村的完整的阶级路线,只是提到“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平民会党等势力”。1927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有毛泽东参加的湖南省委会议提出,“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革命”。这可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于农村阶级路线的最早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虽然这里所使用的语言还不够准确(如“贫农领导中农”)和确切(如“拿住富农”)。党的六大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一个基本正确的解决。六大指出,“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造建设绝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到中农止”。“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按:指雇农),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对于反革命的富农要进行斗争,对于尚有革命可能的富农要加以争取,对于动摇的富农要使之中立。“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

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满足贫农、雇农的土地要求,这是土地革命的最基本的任务。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基本力量”。党在农村中必须依靠贫、雇农。在这个问题上,党内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土地革命中也是这样做的。

中农也是农村的劳动者。他们受到旧社会的压迫,是农村中的一支革命力量。满足中农的某些要求,也是土地革命的一项任务。“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这个问题,党内的认识在原则上也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由于赞成平分土地,有时难免侵犯中农利益。由于少数富裕中农有轻微的剥削,有时容易被错认为富农成份,从而损害党的团结全部中农的事业。为纠正土地革命中发生的偏向、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1933 年 10 月,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决定以此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同时还通过《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有关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说明。比如,关于富农和中农的界限问题,毛泽东指出,"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生产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对此,《决定》指出,"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人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人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种情形下,剥削收人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人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①。这两个文件的发布,对于正确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包括团结中农的政策在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后一个文件中对富农等问题所作的规定有若干方面是错误的。

富农问题比较复杂。他们从事资本主义式的剥削,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中有的人又出租部分土地,兼事地租剥削,具有"半地主"的性质。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是应当反对的,其资本主义剥削部分则是应当保存的。党的六大对于富农问题制定了一个大体正确的政策。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于 1929 年 6 月致函中共中央,批评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最重大的错误"。同年 8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改变了六大对富农的政策,认为"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② 之后,正如周恩来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所说,党在富农问题上即犯了"两种左倾毛病,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不但不应如此对待富农,在目前这样做,更加要动摇中农的。中农在经济上是有可能变为新的富农的,但今天决不能使中农离开我们,而减弱了农民的革命力量的"③。从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批评毛泽东等在中央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原则"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他们主张不仅地主的土地,而且富农的土地"亦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55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45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372 页。

须同样没收与分配”，富农只是“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而已。这种“富农分坏出”的政策是从苏联抄袭来的。其实质就是从经济上消灭富农。这样做，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政治上不利于中立富农乃至团结中农，对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苏区中央局在1933年6月作出的《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中曾提出，“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允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①。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提出土地革命中应实行“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的路线，主张对富农取限制的政策而不是消灭的政策。但是，在实行“收回富农的好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这种办法的条件下，上述正确原则是无法加以贯彻实施的。在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之后，中央于1935年12月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已经不适当”，这“是在把富农推到反革命怀抱中去”；“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② 党对富农的政策由此也走上了正轨。

地主阶级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土地革命是要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毛泽东主张，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之后，要分给地主及其家属一份土地，强迫地主在劳动中进行改造。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同时，给地主个人以生活出路，这个办法，有利于缓和地主对革命政权的反抗，有利于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攻击这种办法背离了阶级路线，主张地主“无权分得任何份地”③，认为“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苦工做”④。由于不给一般地主个人以生活出路，一些地主就更加拚命地反对革命政权，甚至上山组织所谓“绿色游击队”，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生产。这种作法，在遵义会议以后，也逐渐停止执行了。

这样，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不但在原则上有了正确的规定，而且在实际上也有了大体上适当的贯彻落实的具体政策了。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09页。
②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85、586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1931年8月）提出：“被没收土地底旧业主不应该得到任何份地”，富农的土地也“应拿去分配”，“应该给他们以只供劳动的份地，但不给以好的土地”。王明路线时期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就是从共产国际来的。
④ 见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

(三)分配土地的具体作法。

毛泽东等在指导赣南、闽西的土地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提出了一套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主要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而不是按照劳动力,也不是按照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根据各户现耕的土地多少,按全乡每人平均应得的亩数为依据,有多的抽出来,不足的补给他),抽肥补瘦,"不得采用绝对平均主义",也使人"不得把持肥田"。这种办法,有利于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基本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实际做起来,还是有可能发生侵犯中农利益等错误,因而也还不是最完善的。除了中央根据地以外,其余根据地也摸索出了一些各有特点的分配土地的办法。

尽管党在如何进行土地革命这个问题上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但自从党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并实地领导农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以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确实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农村的主人。毛泽东在1930年10月写的《兴国调查》记载:经过土地革命,贫苦农民"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也"与贫苦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他们许多人在乡区两级政权中担负了工作。其次,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好象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既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发展,也使农民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记载:过去农民没钱,讨不到老婆的,中农占10%,贫农占30%,雇农占99%;"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中农贫农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没有的很少了",只是雇农要讨到老婆还比较困难。

通过土地革命的实践,广大农民亲身感受了革命的好处,认识到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从事建设革命政权的各项工作,踊跃参加红军到前方作战;普遍组织赤卫队暴动队等群众武装组织,保卫地方、配合军队;开展各种后勤服务,大力支援前线。红军战争中由此得到了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大革命失败后,尽管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城乡,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的营垒,中国革命仍然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地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使工农联盟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暂时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以减租减息作

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抗日。“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① 但是，如果仍然原封不动地维持地主对农民的那种极端严重的剥削，那就不能有效地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抗日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通过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来适当地调节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中共中央规定，“租额以减低原租额百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借贷则“以一半分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中央指出，“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在地主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农民也实行交租交息。在土地已经分配的地区，则“保证一切土地的农民之土地私有制”。这个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其目的，“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②，从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区的农民，在抗战期间，曾经三次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党“均用极大的说服解释工作，推延下去”③。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这从根本上也是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事实上，经过群众性的减租减息斗争，农民的生活大都得到一定的改善；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晋察冀北岳区三十九个村 1937 年和 1942 年的土地占有情况，地主从占 16.43%降为占 10.17%，中农从占 41.69%升为占 49.14%，贫农从占 19.1%升为占 20.12%。从阶级关系来看，在农户总数中，中农户从占 35.42%升为占 44%，贫农户从 47.53%降为占 40.95%。由于实行减租减息，广大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这项政策的实行，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保证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5 月 4 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6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29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690、256 页。

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考虑到当时国共关系尚未完全破裂,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农村土地关系变革的阻力,这个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除了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外,主要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及献地等,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指示还要求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与大地主、豪绅、恶霸,"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适当的照顾,并且坚决地团结中农,注意保护民族工商业"等。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参加和支援自卫战争的积极性。

在贯彻五四指示的过程中,1946 年 7 月,中共中央曾考虑,为了进一步解决土地问题,"对一般地主,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量土地"。次年 2 月,中央在一个通报中指出,"仅用清算、献地等办法,常不能将地主余额土地算完、献完,或献出坏地保留好地等"。"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可以使地主把余额土地完全拿出,交给农民"。清算是主要办法,再加上公债征购的办法来配合,就可以使土地问题得到更迅速彻底的解决。在征求各地意见时,一些地方认为这个办法不适用,仍主张用清算等办法。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先后发动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甚至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这种形势,使得在解决土地问题时采取这种缓和的办法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了。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 1947 年 7 月至 9 月召开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 10 月 10 日由中共中央决定正式予以公布。这个大纲重新公开举起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旗帜。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个大纲具有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其中的一些办法,是继承了十年内战时期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但主张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这个问题是过去就发生过的。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土地制度的群众运动,广大劳动农民热烈地投身于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积极进行斗

争。这个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指出，“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封建，就是要彻底摧毁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卖国统治。具体纲领，就是(1947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双十宣言，而中心问题是平分土地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①。

这个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发生过“左”的偏差。主要是：侵犯部分中农的利益；侵犯部分民族工商业；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有的地方甚至进行乱打乱杀。中共中央发现上述问题，即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使土地革命完全走上正确的轨道。

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②。为了保证这条总路线得到正确的实施，中共中央还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具体的政策界限。

依靠贫农是党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坚持的第一条基本原则。为了充分发挥贫农的作用，应建立贫农团，注意树立贫农在农村中的领导优势。

团结中农是党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坚持的第二条基本原则。“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成了中农，只有少数人不是中农了”。“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而且，“因为侵犯中农利益，必使中农动摇，甚至可以被地主富农利用，而使贫雇农陷于孤立”。③ 这样，土地改革本身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能损害中农的利益。把依靠贫农同团结中农对立起来，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贫雇农的利益和带头作用必须放在第一位，但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中农是无产阶级的长久的同盟者，侵犯中农利益来满足贫雇农的利益，这是挖肉补创，得不偿失的。为了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中央规定，“对中农和其他阶层钉错了成份的，应一律改正，分了东西的应尽可能退还。在农民代表中、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的倾向和土地改革斗争中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必须纠正。有剥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2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314页。
③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421页。

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为富农。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的同意不得平分"。后来,中央为避免在平分土地中侵犯中农,决定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办法",① 即中农的土地不动,只将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富农出租的土地等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乃至部分中农。这样,团结中农的政策就真正全面落实了。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是土地改革的根本任务。

这句话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土地改革所要消灭的必须是也只能是封建剥削制度,而不能是也不应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将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也属资本主义性质,不应当消灭。消灭这部分工商业,会使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发生恐慌,造成民族工商业的破坏,这不仅不利于在政治上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会造成解放区产品供应的减少与内外物资交流的困难,对革命事业是十分不利的。

这句话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土地改革所要消灭的是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封建地主个人。对于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分子是必须镇压的,否则,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农民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挺不起腰来,但是"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如果这样做,只会使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只会激化地主的反抗,增强土地改革的阻力。因此,必须教育群众,把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加以保存并进行改造。为此,应在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后给予地主以不高于农民所得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必要的生活资料,在生活上给他们以出路,推动他们在劳动中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有步骤地、有分别地进行。

首先,对地主和富农应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把最重的打击只落在最反动的势力的头上,这有助于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推进反封建的事业本身。

同时,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大纲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正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条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24页。

件。因此，土改以后，必须将农村中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来，并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和私有制的基础上组织各种生产、消费合作，并采取措施反对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毛泽东强调，“农村中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①。

在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即有约一亿人口的地区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经过土改，原来的贫农普遍上升为中农，中农由过去占乡村人口的20—30%，上升到70—80%左右；贫农则由过去占乡村人口的70%，下降为占20—30%，其境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农中也有30%的农户分进了土地，而且由于免除了封建负担，他们在经济上也普遍获得了利益。广大农民翻身之后，无限感激共产党。他们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并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土地改革为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至于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则是从1949年冬到1953年春分三批先后完成的。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完成土改任务，还在更晚一些时候。

二、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官僚资本在中国由来已久。在大革命时期，有人就把清朝晚期、民国初期由政府官僚成买办把持的企业称作官僚资本。我们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则是特指“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取得的官僚资本”。② 这种官僚资本是在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后逐步形成的，并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这种官僚资本有几个部分：一、国民党政府所有、由官僚控制的国家垄断资本。二、国民党官僚直接拥有的私人资本。三、在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国民党政府拥有的“官股”和官僚资本家个人拥有的“私股”。其中第一、二部分尤其是第一部分是官僚资本的主体。

前面已经讲过，官僚资本主要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316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国家政权密切地结合着,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因为这种资本主义主要是依靠反革命政权的力量,利用超经济的手段,在掠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兼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把没收官僚资本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之一,符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的,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国民党官僚资本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认识和没收官僚资本政策的制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1928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尽管有一些错误,它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但这十条里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的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① 当时,官僚资本刚刚在形成的过程中,党还不可能认识到它同民族资本的区别,并提出相应的政策。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还说过,"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② 所以,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时,并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面且,由于抗战时期实行国共合作,提出没收官僚资本这个问题的时机也并不成熟。不过,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引证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节制资本之要旨"的论述,已经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的主张,并且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③ 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得到了大发展。大后方的人民开始主要对豪门资本(国民党官僚采用化公为私、假公济私以及巧取豪夺等手段而形成的官僚私人资本)进行揭露和斗争。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分析了有关的情况,在《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公开提出全国应实行"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等新的经济政策的问题。④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代表的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它"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78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①] 为此，他重申了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之要旨”，指出独占性的或者规模过大的企业，应由国家经营，并把“要求取缔官僚资本”列入了党的具体纲领。[②] 在讨论党的具体纲领问题时，有人曾主张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报告没有直接地采纳这个意见。对此，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作了如下的解释。他说：“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太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曾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主张“中国经济应走上公营私营及合作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以反对国内官僚资本，并防止外国独占资本之操纵国民生计，严禁官吏利用其权势地位，从事投机垄断，逃税走私，利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的活动”。[④] 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地还是指豪门资本即官僚的私人资本。全面内战爆发一年后，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时，1947 年 8 月 31 日，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关于在蒋管区作战的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没收战争罪犯、官僚资本、贪官污吏、恶霸全部财产”的问题。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⑤] 1947 年 10 月 10 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宣布“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是“本军的基本政策”之一，“本军所到之处立即实行这些政策”。[⑥] 同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科学地阐明了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明确规定“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⑦] 这时，党不仅对官僚资本的认识已经明晰，而且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提出没收官僚资本这个任务的历史条件也具备了。194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起新中国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04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062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22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44 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520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238 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 1253—1254 页。

领》,更把"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列人总纲的第三条,从而使之成了新中国根本大法中的一项内容。

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随着人民解放军转人战略进攻,许多城市相继获得解放,这样,没收官僚资本这项政策就已经有必要也有可能付诸实施了。而为了能够正确地执行这项政策,首先必须对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界定,以便没收真正的官僚资本,同时又不致不适当地扩大打击面,尤其不要把民族资本也当做官僚资本予以没收。为此,中共中央在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接管城市的经验的过程中,反复地对这个问题作出指示,日益明确地划清了有关的政策界限。1948 年 4 月,中共中央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① 这个电报指明了应没收的官僚资本主要是国家垄断资本即由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县政府举办的工商业。1949 年 4 月 15 日,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谈判时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规定:"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凡官僚资本属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和财产。"② 这个文件,对应没收的官僚私人资本作出了初步的原则界定。综合上述两个文件的精神,同年 4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明确宣布:所要没收的官僚资本,既包括国民党反动政府经营的、也包括大官僚分子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③ 全国解放后,1950 年初,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266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51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457—1458 页。

了《关于处理官僚资本的初步意见》,对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官僚资本企业以及应予没收的官僚私人资本均作出了明确而又具体的界定。考虑到政治影响、不致影响私人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台湾解放及争取外逃资金返回等四个因素,这个文件规定:"凡利用政治特权积累巨大财富者谓之官僚资本,时间则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起算,在此以前的官僚资本(除汉奸外),概不追究"。① 根据上述原则,官僚资本的范围包括:(1)四大家族;(2)现行战犯;(3)虽不在战犯名单内,但其罪恶昭彰、作恶多端者;(4)既未起义亦未立功的各地方豪门;(5)国民党党团假借私人名义经营的企业。② 针对某些私营企业中或公私合营企业中尚藏匿有若干官僚资本股份这种情况,1951 年初,政务院又制定了《企业中公股生产清理办法》(1 月 5 日)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2 月 4 日),规定凡国民党政府及其经济机关、前敌国政府及其侨民和国民党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等在私营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均应没收归人民政府所有。这样,对官僚资本的几个部分,即对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对大官僚分子的私人资本以及对在一般资本主义企业中官僚资本的"公股"、私股的处理原则和应当掌握的政策界限,就全部地明晰起来了。

在没收官僚资本、接管原官僚资本企业的过程中,除了及时划清有关的政策界限,避免发生把不该没收的加以没收这个问题以外,重要的就是应当切实注意采取适当的接管方式,不使这类企业的物资财产遭到损失,尽力保护并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1949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提出接管工作的明确方针。原官僚资本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具有两重性。中共中央认为,现时资本主义的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不仅为我国准备了科学技术,同时又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发扬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去掉其不合理性和反动性。因此,对这类经济组织的机构与制度与对反动政权的机构与制度,在处理的方针和方法上应有所不同。指示强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他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资料档案选编(工商体制卷)》(1949—195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7 页。
② 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

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经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维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这是马克思列宁多次谈过了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照这样来做。"根据这个认识,指示要求各地在接收官僚资本企业时"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职员愿意继续服务者,应令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① 所以,没收官僚资本,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同时,这种"自上而下按系统的接收",又是与"自下而上工人、职员的审查和检举相配合"的。接收工作,自始至终注意依靠工人群众,团结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结果,在实行从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根本转变的过程中,人心安定,企业得到有效的保护,生产和经营秩序迅速走向正常。在此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了把头制度、搜身制度等不合理的旧制度,使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日益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这样,原来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就变成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了。

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是从1946年解放哈尔滨市以后就开始了的。长江以北首先是华北、东北地区的没收工作,主要是在1948年和1949年初进行的。在官僚资本企业集中的华东、华中地区,这项工作主要是在1949年4月到1949年底期间进行的。之后,还进行了一般私营企业中官僚资本"公股"、私股的清理和没收工作。

既然官僚资本主要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那么,没收官僚资本就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据统计,1949年,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41.3%(在全国总产值中占26.2%)。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49%。国家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邮政、电信和大部分交通运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1—33页。

输业，控制了绝大部分银行和国内外贸易。[①] 在全国胜利前夕，官僚资本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香港，一部分被存入了外国银行，一部分官僚资本企业被变卖充作了军费。“据有关部门事后按固定资产原值估算，当时没收的官僚资本财产约为人民币150亿元左右”。[②]

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就被消灭了。所以，毛泽东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③]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当时主要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不过，国营经济还有其他来源，其中包括没收的敌伪财产；通过转让、收购、征用等形成成为国有经济的外国在华企业；苏联移交的它在大连市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和长春铁路的财产；解放区的公营企业，主要是收归国有的党政机关、部队、团体所办的企业。

这里简要地说一下征用、收购外国企业的情况。

按照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外国的在华财产，只没收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财产。一般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财产均不予没收，只是废除它们依靠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到全国解放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企业有1000多家，主要是属于英、美垄断集团的。解放初期，中国政府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对这些企业进行了监督、管理。尤其是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悍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赴中国港口。因此，中国政府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在华财产。其他外国企业，由于人民政府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后，也大部分陷于瘫痪状态。有些企业申请歇业，有些企业放弃经营，有些企业自动要求转让给中国政府以抵偿它们在中国的债务，有些企业则由中国作价收购。这些被征用、收购的企业也成了中国国营经济的一部分。[④] 本来，日本自1931年特别是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日本垄断资本在其占领区的经济领域中形成了独占地位，英、美资本受到了排斥。这些日本在华资本在日本投降时基本上由

① 《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② 《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
④ 《当代中国经济》，第61页。

国民党政府接收,成了中国的官僚资本。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采取商品倾销的形式,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社会局面极不稳定,它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并不多。据统计,从解放初期到1953年,外资企业从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由12.6万人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由12.1亿元减至4.5亿元。①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外资企业以各种形式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部分数量是很小的,对壮大国有经济的作用也有限。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它表明,由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②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要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国营经济的形成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就成了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的经济基础。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由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掌握了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它就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强大有力的。正因为如此,它就有能力推动、引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由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旧中国时期对于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有相当大的依赖性;这时它就不能不依赖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这是我们能够用和平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由于国营工业成了中国工业的主体部分,国营经济也就成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起飞基地。

三、保护民族工商业

保护民族工商业,也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这里所说的民族工商业,是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不同,它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程度不是那么高,同中国封建经济的结合不是那么紧,所以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工商业被称作民族工商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③ 与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推翻

① 柳随年、吴群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8页。
②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60页。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成分”。[①]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只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②]

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从经济上看，“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③] 从政治上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拥有者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统治阶级，它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是可以参加民主革命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④]

中国之所以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特有的性质是分不开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有进步性，但它仍然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⑤]

如果不是采取保护而是采取过早地消灭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在经济上，是不利于当时根据地自身生产的发展和根据地同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流的，是不利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6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06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479页。
⑤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

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增长的;在政治上,则会把可能的同盟者推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边,使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陷入孤立,缩小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否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确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还在大革命后期即1927年4—5月中共召开五大时,党就论定资产阶级已经叛变,当前即应为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而奋斗,资产阶级将被排除在政权之外了;在经济上,除主张"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工厂、大企业等归国有"外,还主张"实行高度劳工政策"。"左"的倾向已经发端。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提出了"工厂归工人管"、"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等"左"的政策。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制定的政纲,如前所述,对资产阶级,是政治上不要它,在经济上不动它。当时虽然没有提出大企业收归国有、对中小企业加以保护的政策,但并不主张在经济上采取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作法。但是,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的决议就主张在革命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银行、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这是违反六大的方针的。①

在1931—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党并没有直接提出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在根据地内部也并没有禁止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有关的经济政策,规定"实行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方针,"苏维埃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尚保留在旧业主手中,尚不实行没收",而"由工厂委员会及职工委员会,由工人监督生产"。② 但由于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如脱离根据地落后工业的实际,机械地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资方给予工人过高的工资及福利,规定过多的节假日等)和税收政策(如要求资方上缴过高的所得税),一些私营工商业因感到无利可图而纷纷停业,致使不少工人失业,许多工业品价格上涨,与外部的贸易呈现萧条状态,从而使根据地的经济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党的一些领导人曾对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左"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2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772页,第795页。

的错误提出过批评性的意见。张闻天于1933年4月著文指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但是要使私人资本投资到生产中或商业中来,那就必须使他们有利可图。"为此,《劳动法》中的有些条文如八小时工作制等就不能机械地执行。① 同年4月,陈云也著文批评了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的"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指出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适合于大城市的《劳动法》、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私人企业、年关斗争中举行总同盟罢工等等,"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②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更明确指出,"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③

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党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方针,相应地,党对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提出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根据地来"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使根据地成为"发展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④ 在这之后,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即走上了正确的轨道。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⑤ 194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⑥ 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宣布"保护民族工商业"是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6页。
②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33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1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49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他在十二月会议上说过,“不怕资本主义发展,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要利用。要允许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①] 在1947年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后,一些解放区的实际工作一度发生过侵犯工商业的偏差。这些偏差随后就得到了纠正。

为了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必须划清几个有关的政策界限,切实保证“反帝反封建,不反一般资本主义”。主要是:

第一,既要消灭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又不能侵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地主富农对农民进行的地租剥削,是封建性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必须加以消灭;他们经营的工商业所进行的剥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属于消灭的对象。“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②] 如果没收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这就是把反封建剥削同反资本主义剥削、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淆起来了。这样做,不仅犯了超越革命阶段的错误,而且还将引起一般资本家的恐慌,对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二,在没收官僚资本的过程中切实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说,没收官僚资本必须有明确的界限,不仅不能把民族资本当成官僚资本加以没收,就是对官僚资本企业中一般资本家拥有的私人股份也应当保护;在消除并没收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中官僚资本的“官股”和私股时也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必须是真正确认其为官僚资本的才能进行没收。

第三,把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区别开来。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右翼分子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毛泽东认为,对于他们的反动政治倾向是必须打击的,这样才能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应当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把少数右翼分子的工商业没收了,其他民族工商业者就会恐慌起来,以至离开统一战线,这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对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也是不利的。因此,对民族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注③。
② 《毛泽东选集》,第1269页。

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①

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② 为此,必须注意:

第一,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实行国民经济的必要的分工,并且按照这种分工,使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

第二,正确执行劳动、税收等项政策。"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工人生活必须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③ 总之,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有经营的积极性,不要妨碍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当发展。在这些问题上,1931—1934 年犯过的"左"的错误,是绝对不许重复的。

保护民族工商业,甚至提倡资本主义经济的广泛发展,对中国革命是否有危险,对它的社会主义前途是否会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发展是无条件的还是必须受到限制的呢?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情况:

第一,在一定时期内资本主义经济既是必要的,但又不应当是主要的。"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由国家经济、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④ 我们不仅要使资本主义有广泛的发展,而且"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⑤ 以发展工业为例。毛泽东指出,"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在革命胜利以后,"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⑥ 按照这个方针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28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25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26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058—1059 页
⑤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26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427—1428 页。

去办,即使资本主义经济在绝对量上发展了,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在绝对量上也在发展并且它的发展被置于优先的地位,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仅不会增大而且还可能相对地下降。

第二,需要广泛发展的资本主义,不是垄断性的大企业,而是中、小企业。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过:"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① 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的方针,他曾经在肯定的意义上多次加以引用,借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是无条件的无限度的。

第三,需要自由发展的,是那些"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需要保障的,是"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②,而不是不正当的私有财产。这个规定本身,就是一种条件、一种限制。1948 年 9 月,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结构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刘少奇在审阅这个提纲时,将其中"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这句话,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毛泽东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③

第四,即使纳入了国计民生的轨道的私人资本主义,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它仍然可能企图脱出这个轨道,因此,"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④ 比如,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既要保护工人的利益,又使资本家在合理经营下有正当赢利。这就是说,一方面允许资本主义的剥削;另一方面,这种剥削又不能是无度的、不受限制的。

---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25 页。
②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25 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06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431 页。

弄清了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就不难懂得，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种资本主义称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了。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确实已经是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制约之下的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发展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发展资本主义，才能“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才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因此，他提醒全党必须清楚地认识：“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①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需要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而且需要有文化纲领。

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② 我们这里所论述的，是作为意识形态（观念形态）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③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变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32页。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63—664页。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在提倡"。这就是买办文人所搞的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买办文化。"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① 在革命的过程中,要经过斗争,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域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在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后,则要提出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任务。

在近代中国,与旧的占优势地位的封建经济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新经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和壮大起来的新的政治力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新的经济、新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国新文化产生的根据。这种新文化是与封建文化、买办文化相对立的,它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的。

近代以来,中国新旧文化的斗争以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为界标,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的主导力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②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地方,首先和主要的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代替旧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领导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弱点,不能不在它的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在反封建思想的斗争固然曾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6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98页。

起过革命的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在五四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甚至“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了。①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就思想文化战线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② 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主张彻底的民主主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③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一旦登上历史舞台，“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尽管受到反革命的血腥镇压和反动的御用文人的攻击谩骂，这支文化新军还是势不可挡地生长了起来。它“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④ 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作用的坚强有力。

中国的新文化需要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攻击“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收起共产主义”的叫嚣，毛泽东强调，“现在的世界，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697—698页。
② 毛泽东1939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③ 毛泽东1939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697—698页，第686页。

是这样”。所以,共产主义,“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①

当然,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作指导,并不是要求“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与“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在这个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②

同样,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作指导,也并不是无条件地排斥和完全否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并不是不要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如果这样,那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文化。以自由主义而论,毛泽东就认为,“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党内不能有自由主义”,这一点不容含糊;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也就是说,在一些问题上,无产阶级是可以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③ 1938年4月,他说,“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因为我们要建立一切爱国者的统一战线;只是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④ 1940年12月,他在所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根据地应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⑤ 他还说过,在共产党人研究问题时,他不反对引用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这些人的话,而且应该“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只是不能将自己的思想与他们的相混同,而“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性的申明”,说明“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否则“有使读者根本上相信他们的危险”。⑥

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就把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向领导作用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应当提出哪些口号呢?

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提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

① 《毛泽东选集》,第697—698页,第6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05—706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33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21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4页。

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①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文化会上作报告也讲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样四个要求。② 1月9日,毛泽东在文代会上讲演,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概念,指出中华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并且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确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③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

这就是说,首先,就这种新文化的内容来讲,"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④ 这是一种"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和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的文化。⑤

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新文化工作应当张扬爱国主义,帮助人民增强反帝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长期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新文化工作应当张扬民族精神,帮助中国人民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力。它应当为凝聚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去进行胜利的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独立这一崇高的事业服务。毛泽东说:"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⑥ 尽管中国的这种新文化可以而且应当"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⑦

就这种新文化的形式来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是一种"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⑧ 事实上,任何文化的内容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显示和表现出来;而只有采取适合中国民族的实际和特点的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49页。
② 《张闻天选集》,第252—2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706页、7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706页、第708页。
⑤ 《张闻天选集》,第252—253页。
⑥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5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706页,
⑧ 《张闻天选集》,第252页。

形式,才能使新文化的内容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才能使新文化扎根于中国的土地而得以生长和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①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

这就是说,"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② 这是一种"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理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③

由于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原则、安于命运的思想等等在人民中的影响根深蒂固,而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为了维护自身的反动统治又在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想;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广大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迷信思想在中国的流行有着肥沃的土壤,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还愿意维持这种状况,因为"专制主义利于人民的愚昧"。④ 因此,必须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才能启发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自动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才能使他们获得个性的解放,懂得人的尊严,发扬历史的主动性,也才能使他们逐步离开愚昧状态和不卫生的状态,过上健康向上的生活。

这里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毛泽东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⑤ 同时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事实上,"要老百姓不信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⑥ 与专制利于人民愚昧相反,我们是利于人民聪明的。所以,我们要提倡科学,"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⑦ 不过,"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⑧ 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706—7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06—707页。
③ 《张闻天选集》,第25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9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0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1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9页。

革命论。新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来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

这就是说，“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步成为他们的文化”。① 这是一种“反对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又提高大众”。这种文化既是大众的，因而又是民主的。它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主张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②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是新文化的主要接受者、利用者，因此应当成为新的文化工作基本的服务对象。

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化工作者就必须与他们接近，了解他们，从他们中间吸取营养，以便反映他们的状况、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他们进行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就要正确地解决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是太贫乏了，受教育的机会是太少了，所以，首先的和主要的任务，是进行文化的普及工作。由于中国的主要群众是农民，“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③ 不过，“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要求着重做好普及工作并不意味着提高工作就不重要了。对于人民群众中文化较高的部分，仅仅进行普及工作是不能满足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的。而且，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所以，必须把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④ 事实上，也只有以提高作指导，普及工作方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卓有成效。

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化工作者本身尤其要解决一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706页。
② 《张闻天选集》，第252—2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9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862页。

立足点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 对于党的文艺工作队伍来说,“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使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他说,“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②] 我们的立足点,“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③] 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对党的其他文化工作也是适用的。

总之,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为了建设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如何对待外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式,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去社会的某些意识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没有这两个来源,任何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都无从谈起。[④]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以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对这种主张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⑤] 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同列宁的上述观点一脉相承的。他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

① 《毛泽东选集》,第8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5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56—857页。
④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285页。

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① “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②

社会意识遗产的继承归根到底要受社会存在及其发展的制约。任何时代对以前的文化遗产都不会无条件地原封不动地兼容并蓄，而是经过加工改造予以吸取。怎样加工改造，摈弃哪些，发展哪些，这在根本上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现实状况和需要以及思想家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③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④ “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也是如此。⑤ 之所以必须这样做，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以便为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服务，为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思想武器和精神食粮。

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要知道，“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⑥

中国的古代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统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封建时代的文化，也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也有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所以，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⑦ 其次，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⑧针对刘少奇关于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这个观点，毛泽东说：“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60页。
③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296—29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083页，第533—534页，第70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083页，第533—534页，第708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708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5页。

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① 再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所概括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固然主要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道德要求,具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的某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是可以批判地加以利用的。比如,父慈子孝是孔夫子提倡的。而毛泽东就说过,“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所以,“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无条件的。② 还应当注意到,封建时代思想家的一些理论,也是可以而且需要分析的。比如,毛泽东曾说过,“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即唯心论),从认识的全体来说,是不正确的,“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③ 最后,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毛泽东认为,这一点也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懂得应当吸取什么,摒弃什么,改造什么,才能正确地对它进行批判的继承。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清理的任务。他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④

在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对古代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概加以排斥是不正确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弥足珍贵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⑤ 鲁迅早就说过:“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子对子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不如此,新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是不可想像的。同样,对古代文化采取封建复古主义的态度,主张盲目搬用更是错误的。既然一定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那么随着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种文化的发展、变化归根到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5—11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0—16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707—70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534页。

底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的历史作用不容抹煞;但是,当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救地走向崩坏,反对封建旧秩序的任务已经被提上历史的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企图维持孔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了。它那些为旧的封建秩序作论证和辩护的纲常名教等根本的伦理原则由于不再适应现代生活,是决然要被否定的;尽管它所包含的一些有用的因素、成份会仍然被保存下来并且为适应新的情况而得到必要的加工和改造。毛泽东指出:中国有些人"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① 我们固然必须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② 显然,我们同文化复古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在于:第一,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批判地继承呢,还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以至连它的封建性的糟粕也加以吸收,对其中的封建性的毒素也加以颂扬?第二,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来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还是颂古非今,重新把孔学奉为正宗,使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这里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无关宏旨的若干细枝末节,而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这样的根本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反对这种文化复古主义的斗争。1940年9月5日,毛泽东在读了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座大纲后感到"十分高兴",曾写信给范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③

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他所说的外国进步文化,不但是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一句话,"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④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唐朝兴盛的时候,中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玄奘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08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706—707页。

法师更不远万里到印度去取经,并带回国进行翻译。他是一个大翻译家。在近代,从1894年到1911年那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以及自然科学。"那一次学习对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① 为了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化,毛泽东主张"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当然,首先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② 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应当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③

当然,外国文化也并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文化。正如对中国古代文化需要进行分析一样,对外国文化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哪些应当吸收,哪些应当摒弃,哪些应当改造。外国文化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④ 在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排外主义,又要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⑤

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的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⑥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⑦ 这就是我们对于外国文化应采取的正确的态度。

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推进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化工作,服务于人民大众。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推进革命的文化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2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02页。按:鲁迅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多种。今已编为《鲁迅译文集》10卷。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083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707页。

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而如果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但这并不是说革命的文化就是可有可无的了。“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① 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②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所以，“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个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事实上，“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③ 这个观点，毛泽东是讲过多次的。他认为，如果“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没有毛瑟枪，只有笔杆子是无用的；有了笔杆子，再加毛瑟枪，力量就大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派也不怕”。④

进行中国革命，包括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需要动员和组织群众，这就需要依靠革命的文化工作。这种工作的效果，是不能低估的。毛泽东曾举抗日时期党办的《解放日报》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因此，他提出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都“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不仅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就是建设拿枪的军队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离不开拿笔杆的文化军队的帮助的。“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⑤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⑥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8—1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4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7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011页。

文化战线的工作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来做的。为了开展革命的文化工作,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建设起一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队伍。毛泽东说: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① 五四以来,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党也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这项工作也发生过若干偏差。比如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个时期,过分强调注重工农成份的干部,认为知识分子政治上不坚定,不可靠;"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② 应当吸取这个教训。"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③遵义会议以后,尤其是抗战以来,情况已经改变了。不过,"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所以,"要把它扶正"过来。④ 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子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干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⑤

怎样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造就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工作队伍呢?这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一方面,"注意团结教育现有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而在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是互相依存的。因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并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而造成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党也就有了进一步团结、教育、改造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

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化工作曾经有过大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根据地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在配合革命战争、与群众结合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干反动派的阻隔,这两部分人的总的方向尽管一致,在实际工作中却未能结合起来。抗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08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24 页,第 233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424 页,第 233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43 磁。
⑤ 《毛泽东选集》,第 620 页。

战争时期，原来南方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经过长征到了陕北，而许多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奔向了延安。他们汇集到一处来了。为了推进革命的文化工作，毛泽东强调，这两部分人首先应当很好地结合起来，彼此学习对方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1938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在讲话时把原来南方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他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希望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尤其希望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之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①

抗日战争开始以来，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仅仅依靠原有革命文化工作者已经不能充分适应形势的需要了，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必须相应地扩大。为此，1939 年 12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所领导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人我们的军队，加人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人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人党”。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党的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队伍，决定还提出“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和使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的任务。②

由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文化工作而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又繁重的，仅仅依靠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也还不够，还必须调动一切可用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立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下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任务。1940 年 1 月 5 日，张闻天在论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指出，上述新文化的几个要求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其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第 25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618—620 页。

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但各种主义、各种学说的革命性、科学性及其对革命与新文化运动贡献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它们相互间的思想批评、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是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因此,虽然这种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① 1944 年 10 月 30 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的讲演,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他确信,"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② 1945 年 4 月 24 日,他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报告再次指出,我们"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③

毛泽东等的上述主张,对于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利用旧社会原有的知识分子、建立和发展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指导的作用,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进创造了思想上的前提,而且为中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④ 因此,这个民主革命虽然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它更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换句话说,这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同时也就为中国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前提。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客观上是具备了可能性的。

① 《张闻天选集》,第 252—25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01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083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704—705 页。

第五章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逐步赢得胜利的。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就是这个革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于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时就已经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在论述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时，曾经不止一次地征引过斯大林的上述论断，认为"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②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般说来，都是适用的。

我们知道，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为此，就要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过时的、反动的生产关系。由于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现存政权中也居于支配地位，这种生产关系也就受到现存政权的全力保护。这样，当着不推翻旧的反动的政权，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就不能改变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就不能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时，革命就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认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反动政权的主要成份是反革命的暴力机关，首先是军队。当着自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41页。

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①。革命的阶级为了反抗压迫,达成革命的目的,也就不能不使用暴力。因此,"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条件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因为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②。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地是反对对人们使用暴力的。他们从来认为,对人们使用暴力不是自己的理想。如果能够和平地达成革命的目的,这是他们所企望的。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必须区分反动暴力与革命暴力这两种暴力的不同性质。他们坚决反对反动暴力,同时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使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正义性。当着必须使用暴力手段才能达成革命的目的时,如果不分析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③,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下来的武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明确地讲过,"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④ 诚然,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说过,英国的"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当时的英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官僚制度,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例外。

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⑤ 他总结历史的经验,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揭示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这个真理。他认为,"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被虐待,被人当作奴隶对待。"⑥ 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可能,列宁也不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推进革命;只要有一点可能,他认为都是应当加以利用的。1917年2月以后,他曾经设想,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因为当时的俄国形成了两个特殊的条件,即"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3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22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8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631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723—724页。

是问题的实质”。只是到了7月，当资产阶级政府以武力镇压工人时，他即明确宣布，“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随后，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各国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既然这样，为什么斯大林又认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而毛泽东又赞同这个观点呢？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发生在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和发生在帝国主义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一个比较。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继续。这两个革命有着许多基本的共同点，比如，都是无产阶级领导，都建立了工农联盟，都进行了暴力革命，等等。当然，它们也有若干重要的不同点，除了革命的性质不同（一个是民主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进攻方向不同（一个先占城市后取乡村，一个先占乡村后取城市）以外，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进行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各有特点。

毛泽东指出，暴力革命，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但是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①] 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国家一般地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取得革命的胜利。利用议会，同走议会道路，并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政党在有条件利用议会讲坛时加以利用，是必要的。列宁说过，只要还有一部分劳动者（不仅是无产者，也有半无产者和小农）相信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工具，我们就应当利用这个讲坛来揭穿这种骗局，因为这个讲坛是工人中的落后阶层、特别是非无产阶级中的落后阶层最重视和最信赖的。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并不局限于从事议会斗争，而且它从事议会斗争主要地也是着眼于争取群众，以便于动员和组织群众举行起义和战争。只是这种起义和战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的。没有革命形势，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就不应当起义，否则就是勃朗基主义，即小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1—542页。

产阶级的盲动主义。列宁认为,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主要特征是:不仅被压迫阶级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也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即出现了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被压迫群众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由此,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形势迫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他还指出,即使形成了革命形势,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起义①。起义要获得胜利,第一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第二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第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② 正是依据列宁的上述思想,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中的起义和战争,"不到资产阶级真正处于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③。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从1898年创建,到1917年取得政权,中间经过了20年。在这20年中,俄国党只在1905年12月、1917年2月和1917年10月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其余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为组织起义作准备。在长时间里,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合法的,如组织工会、成立议会党团等,当然也有秘密工作与之配合;斗争形式基本上是不流血的,如组织罢工、利用议会讲坛宣传党的主张等。只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待到革命时机成熟时才举行暴力革命,而且这种暴力革命,主要是短时间的武装起义,不是长时期的革命战争。俄国党领导的三次起义,时间却很短促,十月起义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也只有四五个月。起义一旦举行,失败的不用说了,如果胜利,那就是首先占领首都,掌握中央政权,并且迅速地将革命推向全国,掌握全国政权。这就是俄国党走过的道路。俄国革命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取得胜利的。

中国革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革命要通过走这样的道路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是因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60—46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74—2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42页。

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①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具体地来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先占乡村后取城市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说明)。

前面已经讲过,封建剥削制度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也就建立起了军阀官僚的专制政权这样的上层建筑。这种政权,是依靠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来维持的。"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② 袁世凯由小站练兵起家,依仗着自己掌握的新建陆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了以自己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袁死后,直系、皖系、奉系军阀也都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轮番控制中央政权。地方军阀也都懂得有军则有权的道理,他们不愿做空头省长,而要当督军兼省长,因为当了督军就可以直接控制军队,就可以为所欲为。由于军阀个人各自直接控制着庞大的军队,以之作为政争的工具,中国的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也就不是由政治手段而是直接靠军事力量来解决的。辛亥革命以后,虽也有过国会,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并且曾经天真地以为中国由此可以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了。但是,北洋军阀是连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不允许实行的。民国初年,在国民党通过竞选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它的活动家宋教仁企图筹组责任内阁时,袁世凯就指使人把宋暗杀了。国会成了军阀专制统治的一块遮羞布。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人民不可能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北洋政府曾经以法律形式,取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等项自由权。它在1912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就明文规定,"以文书、图书、演说成他法,公然煽动他人犯罪者",将以"妨碍秩序罪"分别处以各种刑罚直至死刑。按照有关的规定,人民群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而斗争,就是犯罪。比如,"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就属犯"妨碍秩序罪",将对"首谋者"处以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其余参加罢工者也将处以拘役或罚款。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北洋政府犹恐刑律条文不够严厉,乃于1920年12月致函内务部,转发京畿卫戍总司令呈稿,使"议订惩治过激党专条","从严惩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京师警察总监再次呈文,要求北洋政府"速订取缔过激党人及代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46页。

党人运送物品发行文字专条法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争得的权利如集会、结社、罢工等,中国工人不仅仍然不能享有,如果这样做,还将被视为犯罪。比如,1923年初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惟一的原因,是为了争取集会结社的自由"。当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时,军阀吴佩孚竟命令军警包围会场,封闭并捣毁会所,并监视与会代表。在总工会决定全路举行总同盟罢工后,军警竟在江岸、长辛店等地对赤手空拳的工人实行大屠杀,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当时发表的文告中说到:"劳动者若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

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统治中国之后,上述基本情况并没有改变。与袁世凯由小站练兵起家相仿佛,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首领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他利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便利,培植亲信,控制军队,成了北伐军的总司令。在北伐过程中,他通过收编军阀部队极大地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凭借这个力量,发动反革命政变,窃取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果实。"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为了反革命,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他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据1929年3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实际的数字还远不止此。据1928年7月《国闻周报》报道,"全国共有八十四军(二百七十二个师),十八个独立旅,二十一个独立团",按每师一万五千人计算,兵员总数当在四百万以上。这就是说,旧式的北洋军阀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的国民党军阀。大军阀统治全国,小军阀统治地方。据1934年统计,全国二十二个省中,二十个省的省主席是军人,另两个虽不是军人,也还是受军人支配的。毛泽东称国民党的统治为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军事专政,这是符合实际的。

蒋介石集团不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不赞成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上台后不久曾公开讲过,"英美民治有其长久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认为,如果让"主张民治、高唱自由者,各据议席,论安言计,动引西人,亦不过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其结果只能是让人民革命力量"坐大于中原"。所以,他主张,"为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而统治之最有效能者,正是法西斯蒂式的政治。虽然他约许在不可计及的将来将实行"大同原则",因而声称自己的主张"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

但在用铁的手腕镇压人民这个根本点上，他对法西斯主义是无条件地赞同的。他们歪曲利用孙中山提出的中国政治的演进将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的说法，在一个长时间里，公开认定中国人民没有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中国必须经由国民党来实行"训政"。国民党于1928年10月通过的《训政纲领》规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行国民大会的职权，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如果说，北洋军阀时期还有一个徒有其名的国会来为它的专制统治加上一点"民主"的装饰的话，那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种国会也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外衣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倒是北洋政府制定的那些镇压人民的法律条文，被大量地保留了下来。国民党1928年3月公布的《刑法》，其有关条文，从内容到文字，都是沿袭《暂行新刑律》的。同年，它还颁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若干年有期徒刑，"凡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团体集会者"，其执行重要事务者处同上的刑罚，仅只加入团体或集会者，也要处有期徒刑或拘役。按照反动当局的解释，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加入共产党本身就是极大的犯罪。所以，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共产党是不允许合法存在的，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他们任意逮捕、监禁、杀戮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有时连共产党的嫌疑分子也不能幸免。实际上，他们对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者所施行惩罚之残酷，远远超出了它的法律条文的规定。为了镇压人民及消灭异己，蒋介石集团除主要依靠反革命的军队以外，还运用两个反革命武器，这就是特务系统和保甲制度。国民党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的"中统"（即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和"军统"（即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这两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及自己营垒里的反蒋的异己分子。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是特务横行的世界。30年代前期，国民党当局先在鄂豫皖三省后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内各户要"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事项；当局的征税、摊派，许多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这样，广大人民就被禁锢在保甲之内，失去了任何的行动自由。整个国家，都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

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建立公开的合法的组织，通过长时间的合法斗争来教

育人民,积蓄革命力量。在中国,要革命,就只有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这里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不是什么利用议会讲坛之类;"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①,而不是什么工会、议会党团之类。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② 他说过,"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③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以后,经过几年的群众工作的准备,就参加了1925—1927年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之后,它又进行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则从1931年起延续了十四年)、四年全国解放战争,接连打了二十二年的仗。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中间经过了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中,党差不多有二十五年是在战争中渡过的。这个时期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不仅参加过革命战争,而且曾经以主要的精力去从事以革命战争拯救祖国的事业。与俄国革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先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积蓄力量而后进入起义和战争,它是差不多一开始就投入革命战争的;这个积蓄力量的工作,不是在和平时期,通过议会讲坛等等去进行,而是主要地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进行的。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革命军队打开一个地方,同时也就发动和组织起一片群众。在中国,也不是经过短时间的起义一举夺取中央政权,而后迅速地把革命推向全国;而是经过长时期的革命战争,首先在局部地区建立革命政权,而后把它逐步地、波浪式地推向全国的。

当我们弄清楚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这种区别以后,我们就不难懂得,为什么应当把"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看作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了。

对于武装斗争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毛泽东曾经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作出了最深刻的论证。为了提高全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4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47页。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回顾了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指出孙中山和蒋介石是如何地注意于战争的，强调“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同时，他还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要求大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自觉地把组织军队、领导战争的责任担当起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党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提到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即一般地承认暴力革命的原则，但并没有认为这是党当前已经面临的实际任务。从1921年建党到1924年国共合作的三、四年中，党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首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人的组织和罢工斗争的发动等，以便教育工人，积蓄力量。这些工作是有意义的，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密切了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推进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动，为党建立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大革命作了一定的准备；但这个时期的党，确实还“不懂得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开始，党“已进到了新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党派出周恩来等重要干部到军校去担任各项负责工作，还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军校去学习，他们不仅在当时成了军校中重要的革命骨干，而且在后来成了党领导革命战争的早期军事骨干。“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党最早直接领导的军队，是1924年12月成立的大元帅府下面的铁甲车队，全队共一百五十人左右，其人员的调配都是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的。1925年11月，在党的领导下，以铁甲车队全部及从黄埔军校调来的部分人员作骨干，组成人数达二千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北伐时，这个团扩大为第四军二十四师。后来由叶挺任师长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由卢德铭任团长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以及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等，也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之下。党还领导着一批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但是，整个说来，党当时对这个问题仍然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阶段还没有到来，党不需要直接去掌握军队，而应当以主要精力去从事民众运动；党员可以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帮助国民党搞好军队建设，但自己不能担任军官，据说这样做有变成“新军阀”的危险。北伐战争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曾主张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中都建立如同独立团那样的由共产党员作骨干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由于陈独秀反对，这个主张未能得到实行。

北伐出师前夕,苏联顾问加伦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个政治问题如何解决?陈独秀委托张国焘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张国焘只说了两句话,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①。北伐出师前,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蒋的直系只有一个军;北伐时,蒋竭力扩展自己的实力,国民革命军从八个军发展到四十多个军,其中大部是蒋收编的军阀部队。当时的党,没有争取军权的思想,只是片面地注重民众运动。两湖农民运动高涨,许多农民要求参军,党把他们送到了唐生智等的部队里去,并没有想到依靠群众建立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1927年春,在武汉工作的共产党人决定将一个党员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筹划好了。但陈独秀表示反对。他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人好,怕引人妒忌,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这样,这个师就始终没能建立起来。"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国革命进入紧急时期。武装问题成了"一个中心问题"。这时在武汉国民政府辖区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武装力量,这就是党直接领导的一部分正规部队和工农群众武装,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党的领导机关"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共产国际在1927年5月曾指示中共中央组织七万人的军队,其中应包括两万共产党员。周恩来后来说过,"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队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但中央并没有利用这些条件,做成这件事。"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当时是群众革命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② 只是党还不懂得没有革命军队作支柱,群众革命的高潮是不能坚持的;不懂得群众起来以后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③。由于没有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作依靠,当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对党发动突然袭击时,党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中国革命力量由此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说过,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1927年8月召开的党中央紧急会议,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纠正了陈独秀忽视武装斗争的严重错误。党在政治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44页。

上的这个大进步，是在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之后才取得的。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①

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等人站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进入了“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这是两个革命之间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将是漫长的，革命的高潮只有在不可计及的遥远的将来才会到来。从对于形势的这种错误的悲观的估计出发，他们主张“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他们是把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俄国党参加杜马选举的策略机械地搬到中国来了。他们后来讲过，“必须到了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组织红军及在乡村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必要的前提”。如果在这之前组织红军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那就是实行“官僚的冒险政策”，就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就会“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的象征”。这“在革命运动上将没有一点意义，没有一点前途”。他们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承认，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在一个时期内主要地通过合法斗争来发动群众、积蓄力量的可能性。在当时条件下，要革命，就只有拿起武器来。所谓“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不过是十足的幻想。把这种口号提到中心位置，实际上无异于鼓吹合法主义，从根本上取消革命。党坚决地反对了这种取消主义的主张，而坚持了武装斗争的革命旗帜。那些坚持取消主义立场的人，也被从党内清除了出去。很明显，假如党采取这种主张，放下武器去专搞合法运动的话，党的力量很快地就会被反动派所摧毁，而中国革命的坚持和胜利也就从根本上成为不可能的了。

必须进行武装斗争，这一点在党内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怎样进行武装斗争，这一点在党内是有分歧的。当时党的许多领导人所遵循的，是十月革命的具体模式。他们以为，应当先做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后举行武装起义；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应当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应当是军队，俄国党的那种作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着重地依靠革命军队去进行战争，而不是先争取群众而后举行起义，那就是违反列宁所阐明的、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证明的关于起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就是犯了脱离群众的“枪杆子主义”的错误。他们不懂得，在中国的条件下，争取群众的工作主要地只能在战争过程中进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8页。

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方针,但会议并"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①] 会议提出了"建立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却又认为它"只能当作工农武装的副力看",党的主要工作应当是准备群众起义,否则就是单纯的军事投机。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3年初的近六年时间里,中共中央一直留在上海,以主要精力从事城市工作和白区工作,而没有到农村根据地去直接领导革命战争,就是同这种认识有关的。这种错误的认识,给党的事业造成过严重的危害。

前面已经讲过,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最先论证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他的正确认识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秋收起义以后,他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说过,当时党中央是明确地批评他们的做法的。中央的一位领导人从一个小册子里看到他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就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撤销了。湖南省委也攻击他们,说他们是"枪杆子运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党中央不赞成红军战争,他们是赞成红军战争的;只是他们认为,革命的胜利主要应当依靠武装起义,届时红军将成为配合起义的一个重要力量。这种认识,就是在从事红军战争的某些人中间,也是存在的。"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毛泽东指出:"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②]

当然,革命的实践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党中央以主要精力去从事城市工作和白区工作,并没有收到多少明显的效果。由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方针,中央在白区终于立不住脚,不得不于1933年初迁至中央根据地。从那时起,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央的主要精力用于领导战争了,只是它对于战争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1935年遵义会议"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③]。从此之后,中国革命,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也就走上了正确的、胜利发展的道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8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97—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48页。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完全是被迫的。它认为，只要存在着通过和平的方法达成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目标的那怕是微小的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也是应当加以利用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曾经真诚地希望通过和平的途经对中国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建设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因为，中国人民在经历长期战争之后，有和平建国的强烈要求。由于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进行了合作，不少人希望这种合作能在战后继续下去，即由共同抗战进而合作建国。党应当反映人民的这种愿望，即使这样做，会遇到复杂的情况，要走迂迴曲折的道路，但由于可以减少破坏和牺牲，归根到底是有利于人民的，所以党应当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力争中国出现这种局面。由于这时人民力量已经相当强大，而发动内战又极端不得人心，也由于英、美、苏等国当时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内战，而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准备一时也不易就绪，中国共产党估计，国民党当局"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①] 基于这种考虑，从日本投降到全面内战爆发的整整一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日本投降前夕，中共中央在准备应付内战的同时，即已指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考虑其恢复。随后，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变化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和平建国。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并明确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此，毛泽东还偕同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迫使他们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946 年 1 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抱着真诚的愿望去参加的。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对政协应作一些解决问题的准备，而不只是利用政协来作宣传。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与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达成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

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153 页。

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议会制、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实施这些协议,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将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得到推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将由此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条件。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与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这就是说,实施政协协议的结果,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可能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和平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将从两种制度的比较中,最终作出自己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地履行这些协议的。毛泽东在政协召开前夕颁布停战令时即曾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政协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法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全党要为"准备坚决实现(政协)这些决议而奋斗"。

不过,中国共产党懂得,能否以和平方式建设新中国,这并不取决于自己单方面的主观愿望。党不能把自己的方针建立在善良愿望上面。抗战刚刚胜利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形势,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他说,蒋介石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按照他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必须清醒地看到,要不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持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指出,蒋介石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也应当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①。在重庆谈判时,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党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了必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167页、第1131—1132页。

的和有限度的让步；但对于国民党当局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官做”的骗局，则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揭露，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出去。当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时，人民军队遵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给予了回击。党在认真地、耐心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自己的警觉，仍然积极作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政协闭幕后中央发出的党内指示在号召全党坚决实施政协协议时，明确指出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阴谋”，“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保持和取得”，而“练兵减租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由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对蒋介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争取和平时不曾放弃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这样，当蒋介石彻底撕毁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全面的反革命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就能够领导人民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且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的武装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是正义的，进行这个斗争是必要的。毛泽东指出：“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①] 很明显，当着反动派以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进行武装抵抗，如果他们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他们就不可能赢得自身的解放，中国就只能陷于黑暗世界，中国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它的优点之一。在中国，要坚持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因此也就没有改良主义幻想滋生的土壤。由于革命的过程主要地就是武装斗争的过程，革命对反动势力的扫荡也就比较地彻底。由于斗争的环境极其残酷、艰苦，这也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锻炼得特别的坚强。对于这支经历了长期战争考验的队伍来说，没有任何敌人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任何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74页。

难是不可克服的。

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但锻炼出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①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中国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除了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这一点以外,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最后才夺取城市,是这条道路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过巴黎公社的革命,那是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有过俄国的十月革命,那首先也是城市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而后才把革命政权推向了农村区域。在中国的大革命时期,有过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那时革命的根据地也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周恩来在回溯党内许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思考时,曾经这样说过:根据历史的经验,"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②。正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援引,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走上这条道路,不能不经过一段摸索,不能不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8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7—178页。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就指出，党“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①。当时的认识是，既然“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② 大革命时期，党中央强调，“政治总是以大城市为出发点”，因此工农群众整个的解放运动，亦“发动于大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只是“工人群众要得胜利，必须有广大的农民为后盾”。③ 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共产党由于在南方具有合法的地位，一个时期内，它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是可以的。当时的工人运动确实也搞得不错。工人斗争在全国革命运动中起着先锋作用，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大革命后期党所犯的一个重要的错误，是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农民运动，致使蓬勃发展的革命缺乏牢固的基础。这样，国民党一旦叛变，革命就失败了。

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④ 的任务，并且把进行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确定为党的总方针。这是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正是根据这个方针，党的农村的工作加强了。不过，当时的党还没有认识到，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国民党厉行白色恐怖，城市中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党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向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即农村方面。党仍然认为，“本党系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力量”⑤。党一方面肯定了农民暴动的意义，一方面又强调，“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应“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⑥。中央强调，对于上海、武汉、广州等大的工人区域的职工运动，应“特别注意加以指导和监督”，因为这些区域的“斗争一起来即是直接的与当地统治阶级的冲突，特别在工农暴动的当中，足以制统治阶级的死命”⑦。这说明，中央还不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到农村积蓄和锻练革命力量的必要性。

应当承认，城市中心论，这在当时是全党的一个共同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实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98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90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57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457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16页。

际斗争中反映出来,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原定计划是南下广东,"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建设新的革命根据地,准备第三次北伐。9月9日的湘东赣西秋收起义,也是计划夺取长沙的,原决定起义后,部队分三路会攻长沙,长沙城内则组织工人暴动与之配合。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不仅直接发生在中心城市,而且是企图依靠起义工人和士兵的力量来守卫这个中心城市的。值得注意的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固然是先后遭到失败了,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却都经过摸索,逐步地转向了农村,并在那里开始了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的新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与农民汇合,一部分由朱德等率领,转移到闽粤边界的农村区域活动。当时起义军的领导人曾"决定命令它们两处军队,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进行农村斗争"①。到达海陆丰的部队参加了当地农民的十月起义,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尝试。朱德等率领的部队则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到1928年1月湘南暴动时,更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开始着手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提出来了。又如,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即于文家市集合部队向南进军,于10月到达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胜利的斗争。再如,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一部分在韶关附近寻着了朱德率领的部队,以后上了井冈山;一部分从西北郊转入农村继续战斗,以后参加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起义。这期间,党在许多地区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十三个军,六万二千多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闽浙赣、湘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十余块。这些事实有力地表明,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激流归大海"。在当时环境的驱使下,确实有许多人经过各自的摸索汇集到这条道路上来了。这说明,中国革命的这条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着他们的集体智慧。

农村斗争发展了,农村根据地开始建立并巩固起来了,斗争的实践使党认识到,在一些农村区域实行武装割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1927年11月,中央即指

①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

出，应当尽量发动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摧毁豪绅地主的权力，“一有固定的革命区域，即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瞿秋白虽然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他也曾正确地指出，由于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没有组织成全国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①。他认识到，由于“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一举夺取全国政权是不可能的，而首先“开始于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②。当时中央还说过，“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这里要求建立中心区域的割据的意见也是对的，虽然发动全省总暴动的计划本身并不具备现实性。正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1928 年 6—7 月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肯定党应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这个斗争，将成为“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毛泽东曾积极评价六大的这些意见。他说过，六大“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③。六大以后，中央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还明确地讲过，“你们目前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这说明，党对农村斗争的认识，确实向符合实际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

不过，肯定可以在农村搞武装割据，肯定红军战争不应立即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这并不就是肯定全党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农村。周恩来说，六大时，“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当时虽然有了农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从我国当时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④。当时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农村武装割据应当搞，它的主要意义仍然在于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1927 年 11 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中央一再强调，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城市，“应当成为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

①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1927 年 12 月 10 日。
②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8 年 2 月 10 日。
③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44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77—178 页。

者";认为大城市中的暴动是"决定胜负的",而且"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认为"忘记城市应当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这是一最大的缺点。"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2月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批评了中国党1927年底、1928年初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指出"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同时却仍然认为,中国全国正在走向革命高潮,而城市则将成为全国总暴动的中心。因此,党"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在这以后,盲目暴动的倾向被制止了,城市中心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党的六大也仍然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认为"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能胜利"。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批评中国党一些地区"重视农民,甚于重视工人",认为中国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准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准备工作,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以便"以城市工人领导农民的自发暴动"。有的代表还指责采取"乡村对中心城市取包围形式的暴动策略",是"带有农民意识"的表现。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缺乏充分的估计,这正是六大的主要缺点之一。

周恩来曾经指出,"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因为"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①] 以乡村为中心,是不是会导致否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确实是当时党内许多人的一个很大的疑虑。中共中央就多次讲过,"这极单纯的农民暴动不单是可以影响到党的成份,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动摇无产阶级领导土地革命的根本问题"[②];"不要城市,就是否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结果就只有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③];共产国际也对中国党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
②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的信》,1928年3月10日。
③ 《中央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信》,1928年9月24日。

发出过这样的指示，说什么“假若在工人阶级群众中没有坚固深刻的根基，在各企业中和职工运动中缺乏广大的有组织的基础，党在中国革命中是不能够起领导作用的”。[①] 很明显，这些意见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像大革命时期那样，形成城市工人运动的高潮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主要地应当通过共产党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来体现；而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通过在党内进行深入的思想和路线教育，建立严格的组织生活，即使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就可以建设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作为农村斗争的坚强的政治核心。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问题。”[②] 率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对此作出理论上的论证，这就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所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③] 在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而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才能和巨大的理论勇气，主要地就在于他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在于他不迷信俄国革命的公式，不囿于前人的见解，而善于向革命的实践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论证了处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的农村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中，答复了在农村环境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且在1930年初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于党应以乡村为工作中心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应当说明，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论证这个思想，不是偶然的。随着农村斗争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说，到“1929、1930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④] 了。

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在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时，就对农村革命根

①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1929年2月8日。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689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

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意义作过一个有力的说明。全会的政治问题报告指出:"他们以为中国像西欧各国一样,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可以统治全国,所以大城市暴动成功以后可以影响小城市及乡村;而在中国,则找不到一个大城市的力量能统治全国的。中国可以划分为许多小国,他们的经济力量都可以独立的。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①。同年9月,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农村斗争这样发展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1930年4月,他又指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这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里虽然还没有明确揭示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也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思想了。同年4月,周子敬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的信中,对乡村中心这个问题作了相当明确的论证。他指出,"现今就全国看来,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动要快得多。农村已经正在发展着武装暴动、苏维埃、红军,但这些东西在城市中都还没有,并且连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政治罢工,都还是很少的。在这一种情势之下,若我们依然将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城市中,实不如用在农村为好,在农村一定得的效果更大。若用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它还是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他的结论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暂时放弃城市而以全部力量去发展乡村呢?"除了"暂时放弃城市"这个提法不够确切以外(因为以乡村为中心,不是不要城市,乡村斗争也需要城市工作的配合和支持的),周子敬在信中所阐明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在当时能够以如此明确的语言,论述应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尤属难能可贵。这个信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即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无疑占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位置。这个信件的发表也说明,以乡村为中心,已经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主张了。

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所接受。1929年2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并认真的组织群众,准备在某一适当的环境中来实现总的革命罢工,铁路工人总罢工"等等,认为这种斗争方法"于中国革命中将有极重大的作用"。② 同年10月,共产国际更认定"中国进行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

①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2月8日。

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为此，城市工人要准备举行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实际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接受了国际的这个错误的指示。李立三等夸大形势发展对革命有利的方面，不承认敌强我弱的根本格局并未改变，中国革命仍然具有极大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盲目判断“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在这个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决议认为，“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想“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① 6月15日，《中央致四军前委信》正式批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四军前委，说“如象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这是“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做土地革命”；强调“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果，使得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起来的中国革命力量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损失。共产国际没有同意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并曾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党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共产国际这时已经开始承认中国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状态，甚至认为要“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但它并没有认识到城市中心论是错误的。它仍然认为，农村斗争不过是为发动城市起义作准备的。在它看来，“确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表示中国共产党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义”。③ 这种意见，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根本上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方针，妨碍了中共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农村工作和红军战争方面来。以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为标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继续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工作方面。即使在1933年初中央被迫迁入农村根据地以后，他们也仍然以城市中心的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包括农村斗争。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23页，第13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39页，第138页。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930年10月。

们主张大城市要"真正"准备武装起义,只是由于后来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所以对于城市,是主要地要求红军去占领了。比如,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前夕,中央就指示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为此,"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与射击飞机的演习"等等。[①] 这样以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不仅使城市工作遭到了失败,而且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了失败。

本来,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总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对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这样的新问题,由于经验不足,党在一个时期内缺乏明确的认识,这并不奇怪。革命者总是在实践中学习并逐步校正自己的主观认识的。毛泽东等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当着实践已经表明农村工作确实应当成为党的工作重心时,一些人仍然固执城市中心的观点,这就不能简单地再以经验不足为理由来解释了,这就有一个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问题在里边了。因为他们的认识,不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实际情况、总结实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而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十月革命的公式中引伸出来的。这样,他们就颠倒了人的认识过程,否定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原理,而在实际上走向了唯心主义。以唯心主义思想指导革命,是没有不在实践中碰壁的。

当然,毛泽东对党的工作重心应首先放在农村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1930年初,他只是初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据朱德回忆说,1930年6月,当李立三提出要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之后,"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使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应当承认,提出这种怀疑,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如朱德所说,当时"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②];但他们那种矛盾的心情也说明,当时他们对乡村中心的认识确实也还是初步的,还有待于从理论上予以深化。

在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这些著作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79页。
②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16—317页。

中，他进一步总结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经验，对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对于以农村作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意义等，从理论上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证。

毛泽东认为，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中国革命应当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种与历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观念不同的特殊理论的客观根据是什么呢？它的根据就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①。下面我们就来比较具体地分析这两方面的情况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

首先，中国革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关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有必要再作一些说明。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作过具体解释的。他指出：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怕没有回旋的余地。"②

上述情况，至少规定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他们是封建势力的主要压榨对象和帝国主义者的主要掠夺对象，因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不是在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的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7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89页。

略基地。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趋向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相适应,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并且产生了本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这时发生的农民战争就有可能得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开创出与古代的单纯农民战争不同的胜利局面。毛泽东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① 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第二,中国的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地控制的地方。中国的反动派为了统治中国人民,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军队,1927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常备军即达二百万人以上,其后更发展到四百万以上,但是,由于它同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它想要用这支军队来统治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二千几百个县、五亿左右人口的国家,仍然是捉襟见肘、不敷应用的。这样,它就不能不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部署在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广大农村则主要依靠地主及其武装来维持统治。毛泽东指出,"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② 的。他从列宁提出的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国家首先胜利的原理受到启示,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革命可以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

第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里的城市乡村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着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比如,乡村的生产,就依靠城市供给农业机器、化学肥料、动力和交通工具才能维持,一旦城市的这些供应断绝,乡村的生产就要陷于瘫痪状态了。所以,"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情况就不同。"城市虽带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③。正因为乡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除了少量的农具、食盐等必需通过商品流通渠道获得以外,基本方面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所以,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9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52 页。
③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0—81 页。

的乡村在脱离城市的情况下也还是有可能相对独立地生存下去，只要在乡村中从事革命活动的人们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行了。相反地，一旦乡村革命化了，反革命占据的城市却由于人力、物力的供应来源被切断，要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问题。所以，把广大的乡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是可以给予反革命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的。当然，比较起来，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在反革命占据大城市与交通线的情况下，革命即使在一些乡村站住了脚，它在地域上也是被分割的，这就给革命斗争带来很多的困难，这就规定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肯定，“乡村能够战胜城市”。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在某一个农民区域站不住脚了，还是可以到另一个农村区域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根据地也是可以搬家的。

第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的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封建性的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它们分别扶持不同的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样，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就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种现象，成了“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也为农村斗争的胜利发展提供了一种机遇。“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①。如果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红色区域，几乎都是建立在省与省的交界处。最早的井冈山根据地就座落在湘赣边界。以后建立的根据地也基本上是在边区。因为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省与省的交界处往往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部分，革命易于在这些区域得到发展；有关的地方军阀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不可能联合起来集中力量镇压和扼杀这些区域的革命力量。革命的政权主要地首先在边区建立起来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统治集团的不统一，确实为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得到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的隙缝。

当然，即使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终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如果能够首先占领城市，那对革命的迅速发展是有利的；如果能够首先占领城市而不去占领，那是愚蠢的。事实上，“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9页。

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而且这样做,在当时也是适宜的,虽然"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①。这也就是说,决定党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并不仅仅限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点,这与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这一点也是直接有关的。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有组织的革命力量被极大地削弱了,而反革命力量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背叛了革命的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它建立了一支与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大体相同的庞大的军队,而且其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② 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被反革命占领的城市以便最后夺取这些城市,这是1927年以后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可行的道路。否则,就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放弃革命而在实际上去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如同鼓吹合法主义的人们那样;或者在力量不够的时候为夺取城市而去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如同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人们所主张的那样。这两者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即一要取消革命,一要继续革命,但其结局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导致中国革命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
② 《毛泽东选集》,第635页。

的失败。

不过，对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也不应作静止的、绝对化的观察。随着1927年革命的失败，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同中国人民的矛盾；由于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并且以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这些矛盾是更趋激化了。这就是说，引发革命的原因仍然存在，反革命统治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通过采取以血腥的屠杀政策来对付昨天的同盟者——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办法，来扑灭革命的火焰，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这样做，必然使得群众再也不可能存有改良主义幻想，留给他们的就只有奋起革命这一条路了。所以，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过："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正是在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败的时候，他认定"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正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似乎即将被消灭的时候，他确信"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①

认清形势的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如果全国革命形势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那么，稳定了自身统治的反动派就有可能集中全部力量来消灭农村中的小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企图通过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复兴革命和争取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不可能的了。从事农村斗争中的一些人正是由于没有认清这一点，对形势产生了悲观的估计，才认为在农村做艰苦的政权建设工作为徒劳，理由是一旦反革命发动集中的攻击，这些政权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他们也就没有用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显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实际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指出的那样，"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1页、第99页、第1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0页。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客观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具备任何主观条件,就可以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了。应当注意到,"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这就"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一句话,准备好了为开展农村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所必需的主观力量。

建立革命的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的一环。没有武装部队,就不能战胜敌人,开辟根据地;也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讲过,"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① 进行农村斗争的最初的革命武装,是由经历过民主革命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毛泽东总结军队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使得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得以在斗争中成长起来。这就为建立根据地创设了基本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根据地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1926—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那里的民众条件比较好,有利于党开展农村斗争。党和武装部队发动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在斗争中去进一步武装人民,建立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斗争中组织民众团体,采取各种组织形式,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民众团体之中,使之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一支统一的革命力量;尤其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革命政权,并在这个政权的领导之下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及群众关心的其他问题。这样,组织起来了的、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就成了根据地的真正的铜墙铁壁,而敌人要消灭根据地也就遇到了它无法克服的障碍。

"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建立、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一个要紧的条件"。② 党经过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在政治上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0页。

去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注意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逐步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问题；并且通过总结经验，逐步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样，广大农民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凝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农村斗争也就有可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观条件也是具备的。

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一个伟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反映了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所建设的农村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在当时说过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①。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由于深入农村，在这里从事发动农民和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才得以冲破白色恐怖的高压，使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时，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则主要在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它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一个时期内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但由于它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由于它是小国，人少、兵少，所以它在其占领区内，也只能占领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平原地区，而无法牢固控制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所以，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能够在每个省中组织大多数乡村中的人民一致武装起来打日本，建立许多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就包围了日本军。② 我们"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③。抗日战争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的。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敌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

① 《毛泽东选集》，第98—99页。
② 《解放》周刊第33期，1938年3月。
③ 《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第81页。

固和扩大,人民革命力量也有力地生长起来,这就不仅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而且为抗战胜利以后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乡村为中心,这是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所必需采用的工作方式。乡村只是暂时的根据地。革命的发展,最后还是要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随着敌强我弱的形势向着相反方向的变化,到一定时候,这种以乡村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也是要变化的。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就曾经提出,"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①。由于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抗日战争提前胜利,由于抗战胜利后美国命令日本军队不得向人民军队投降、由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决定将其占领的城市与地方划拨国民党政府管辖,由此出现了复杂的新情况,这个设想未能实现。在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在缴获日军武装以后,尤其是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的条件下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在一个时期内,党的工作重心仍然只能是放在农村方面的。在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主力被摧毁之后,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将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任务。全会的决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工作的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②。

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一个伟大的创造。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经过长期的、艰巨的、曲折的斗争,而赢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的。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426—1427页。

三、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取得政权并且保持它，谁就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中国，战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由于不可能合法地组织工会、开展群众工作、从事议会斗争等等，军队成了主要的组织形式。只有创建了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可能去开创根据地，才有发动群众的条件，才会去建设革命政权，才有条件去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当然，中国革命要胜利，不能仅仅依靠军队。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除了人民军队以外，还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

有必要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统一战线与人民军队是不可分离的。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必须以人民军队作为支柱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大革命时期，党忽视掌握军队，因而就没有能力制止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终于破裂了。1935 年 12 月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部队，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所以，“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①] 事实正是这样。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57 页。

无疑地,人民军队是由共产党创造的,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型的人民军队。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①,因为只有依靠人民军队,才能开创根据地,才能创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条件,而只有这样,才能在群众中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分子,从而为建立、巩固和壮大党的队伍奠定基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②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然得不到一点东西"③。为建设新型的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历史责任。

如前所述,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是1924年11月成立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成立了党小组,直属中共两广区委领导。所有的人员配备和调动,都由两广区委决定,有关的问题也直接请示区委解决。这支武装不仅参加过讨伐杨刘、东征、封锁香港等项斗争,而且还帮助过广宁和深圳一带的农民运动。1925年11月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更是直接受中共两广区委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的。独立团设立了共产党支部,团部、直属队和各营有党小组;独立团中还有共青团的组织,直属党支部领导。团长则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这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人民武装,重视内部的思想教育,进行过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的斗争,参加过镇压反动地主、帮助西江地区农民武装起来等项活动。在北伐过程中,独立团是开路先锋,它英勇奋战,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攻下武昌以后,扩大为第二十四师。党所领导的军队,一开始就展现了自己崭新的风貌。不过,这些军队"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④

人民军队的创建,主要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事。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革命军队的开始。1933年7月,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曾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因而"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这就是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由来。1949年初,在设计军旗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4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43页。

1927年8月1日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八一军旗就是按照这个思想设计出来的。南昌起义开始时，虽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部队也仍旧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在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取道赣南、向东江进发的过程中，即"在瑞金决定建立工农政权"，"在流沙决定革委去掉国民党的头衔"，从而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阶级性质。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领导的湘东赣西秋收起义，则一开始就不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的，起义部队也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统一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了。在这期间，党还领导了广州起义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武装起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1927年10月，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决定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有党委，整个部队统归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同时，在部队中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反对军阀主义，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官兵待遇平等。三湾改编确立了共产党对工农革命军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强调，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努力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使之掌握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知识，自觉地为工农阶级作战。还在1927年10月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就在荆竹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茶陵战斗之后，1927年12月，他在宁冈的砻市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必须担负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1928年4月，他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红四军在经粤赣边的龙南、定南、虔南地区时，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项，这样六项注意就发展成为八项注意。此外，红军在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在斗争中逐步地成长壮大起来了。

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

在民主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人民军队主要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

境中进行活动,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组织基础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这种情况,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就积极方面而言,这就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后期所指出的,"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团结的";就消极方面而言,这就是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的,红军内部经常反映出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①

这里有必要着重地讲一讲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第四军的情况。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说过:"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的组织,许多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② 党的建设是这样,军队的建设也是这样。事实上,搞好军队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搞好军队党的建设本身。由于党和军队处在这种环境之中,它们的内部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就不奇怪了。当时红四军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就有:单纯军事观点(如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主张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如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流寇思想(如不愿做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只想流动游击,扩大红军主张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③ 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准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由于在一些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发生争论,他的关于要反对流寇主义、加强民主集中制等正确意见没有被大会接受,他也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他即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帮助和指导地方工作。红四军党的八大也没有能够对有争议的问题取得一致的认识。七大后,陈毅前往上海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等如实汇报红四军的有关情况。中央除在口头向陈毅作了详细指示外,还于9月28日写出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90页、第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5页。

近万字的给四军的指示信。这个指示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后，作为中央指示发出的。指示信强调，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认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所以“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指示信还要求切实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出“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① 毛泽东等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召开干部会议揭发部队中存在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研究纠正错误思想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为同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规定了红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的路线。决议案经大会通过。会后，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职务。

中国人民军队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创始，到1929年古田会议，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中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②。比如，1930年1月，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就曾刊登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朱毛红军这个“怪物”，确“是在中国别开生面”。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1944年1月，“中央决定把（古田会议的）这个文件规定为军队干部的整风文件与全军的教材”，印发全军学习。古田会议之后，随着斗争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广大的发展和创造，“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③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路线，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这就是：中国的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④，这个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它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页、第41页、第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5页题解。
③ 《毛泽东选集》，第85页题解。
④ 《毛泽东选集》，第86页。

据地建设的工具”。①

我们知道,“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一命题本身,已经规定了军事对于政治的从属性,规定了军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离的也不是对立的,规定了“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任何军队,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为革命的阶级服务呢还是为反动的阶级服务,是为少数剥削者服务呢还是为广大人民服务?

资产阶级宣称,军队不是政治的工具,它们是中立的。这种说法,纯属欺人之谈。列宁说过:“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②

中国的人民军队,是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的,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的一种工具。我们这里所讲的政治,就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正因为中国的人民军队是为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所以它不需要像资产阶级那样,掩饰自己军队的阶级性质,模糊自己军队的政治面目。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③ 这个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这个军队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属于人民、保护人民,还是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这一点,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从中国的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阐明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人民军队必须绝对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根本原则,是保证军队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首要条件。因为只有在党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6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039页.

的领导下，军队才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建立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胜利的革命战争。

几乎所有的旧式军队，也主要地是由劳动人民出身的人组成的，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剥削者手里，它们成了维护剥削者利益和压迫人民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反抗压迫，劳动者也组织过自己的军队，由于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它们不是因遭受剥削阶级军队的镇压而被消灭，就是由于被剥削者篡夺了领导权而蜕化变质，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能造成劳动者自身解放的条件。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也曾经是革命的军队，由于领导权被蒋介石所窃取，它后来就成为国民党新军阀压迫人民和从事政争的工具了。中国的人民军队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关键。毛泽东在批评那种将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的主张和"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时，曾经严肃地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②。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对于中国的人民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曾经企图通过发动多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来加以消灭。当这个计划遭到破产之后，它又企图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机会，通过红军的改编，使这支军队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使之走上变质的道路。而在抗战胜利之后，它又玩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骗局，以实行"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否定共产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以便它吞并这支军队。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血的教训，深深懂得在兵权问题上绝不能患幼稚病。他们采取坚定的立场，既不怕反动派的镇压，也不上它的欺骗的老当，始终牢牢地掌握着人民武装的领导权，从而保卫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在这个问题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就都是不可能的了。

党对军队的领导，首先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为此，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经常对部队官兵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为贯彻执行党的纲领和路线、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必须有组织制度方面的保证。毛泽东领导的秋

① 《毛泽东选集》，第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47页。

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即确定"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的小组,营以上设党的委员会,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从而从组织上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住严重的考验。支部建在连上,使部队的基层组织有了党的领导核心,使党的组织与士兵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红军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古田会议决议更明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必须将军事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军队中担任任何职务的党员均需参加党的会议,向党报告工作。军队中的重大问题,由各级党委讨论后交军政首长分工负责,成为人民军队的严格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应尽可能地吸收同情革命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人民军队,改变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同时也指出,"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党掌握军队的领导权是完全必须的,不能动摇的。有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师以下不设党委,由军政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党的七大提出了军队恢复党委制的问题;各部队于1945年秋陆续恢复了各级党委。1947年,解放军总政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规定营以上各级设党委员会,"党委员会作为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同时撤销各级军政委员会。1948年,中央明确规定,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制度上已经比较完善了"。①

第二,人民军队应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等项任务,成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

军队要担负打仗的任务,这一点,无论旧式军队、新型人民军队,都是一样的。所以,人民军队首先是战斗队;而且只要有人民军队,它也就将永远是一个战斗队。

不过,打仗与打仗不同。旧式军队打仗,是为了少数人,所以它只讲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在通常的情况下(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时除外),它不要求军人去思考为谁打仗这个问题。列宁说过:"常备军就是脱离人民的军队。如果不是在营房里把士兵关上几年,不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没有人性的训练,难道他们会向自己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3页。

的兄弟开枪，向工人和农民开枪吗？难道他们会反对饿肚子的庄稼人吗？”① 新型人民军队则不同，它的成员是为多数人打仗的，“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的，所以它要求军人有高度的觉悟。军人的革命觉悟愈高，部队就愈团结，愈有坚强的战斗力。

应当看到，打仗是人民军队的重要任务，但不是唯一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并不“只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强调，“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②

人民军队之所以要做群众工作，这是由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性质和它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共产党人和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主要地集合在军队之中，军队做群众工作，就更是责无旁贷的了。所以，人民军队自创始以来，就一直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个工作队。这一点，也是人民军队同旧式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全国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估计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因而及时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③。由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展，所需工作干部，数量极大，毛泽东指出，“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④。我们必须把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必须把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开展了。这个方针，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的、有秩序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人民军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主要是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区域活动，怎样保证军队的给养，一开始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红军在初创时期，为了减轻人民和革命政权的负担，就担负起了打土豪筹款子的任务；后来，还建立了工厂，生产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40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406页。

自己所需要的一部分被服、弹药等。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由于日伪军的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解放区军民响应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指出,"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① 我们的这支军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② 人民军队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的目的,这在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因为它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在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并且使部队也受到了锻炼。

中国的人民军队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这样三位一体的任务,开始时,这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是独一无二的。对人民军队的任务作出这样的规定,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创造。

第三,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建立人民军队内部、内外部的正确关系和对敌军采取正确的政策。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军队和人民的一致,调动人民群众支援军队的积极性,就不能进行有力的对敌工作,有效地瓦解敌军。建立自己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是这支军队优胜于其他军队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这支军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还有不少是俘虏兵,而且长期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为了使这支军队能够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加强政治工作就显得尤其的重要。

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按照毛泽东的概括,主要是以下三个:

"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928页。

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的”。①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进行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在红军中，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在这里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的人的尊严。古田会议决议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规定在军队内部必须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实行“官兵生活平等”、“经济公开主义”、“废除肉刑辱骂”等等。毛泽东说过：“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② 这种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军队内部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通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③

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④ 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这个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的实质，就是尊重士兵。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可以达到，部队就会增加绝大的战斗力，艰苦的战争也就不患不能支持了。

“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⑤。

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手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讲的群众纪律方面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也强调，军队必须尊重人民政权和群众团体，必须“严格的执行三条纪律”并做好“上门板、捆禾草”等事项。军队拥政爱民、人民拥军优属（军属），在根据地内形成为持久性的群众运动。人民军队的补充，不是采取强迫人民当兵的方式，而是采取动员人民上前线的方式。根据地内，到处可以看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景象。

毛泽东认为，搞好军民关系，关键是尊重人民、尊重士兵。他强调，“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⑥ 由于人民军队不仅以用战斗来争取人民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主要职任，而且

① 《毛泽东选集》，第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27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6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7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512页。

时时、处处尊重人民、爱护人民、遵守群众纪律,他们就把人民军队看作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这样一来,人民军队就从人民那里获得了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对于这支军队来说,也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了。

"第三,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原则"①。

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在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实行过释放俘虏、医治敌军伤兵等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古田会议决议也明确规定,对俘虏兵"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或行动上的侮辱",给予"物质上的平等待遇",不愿留的"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以及"医治敌方伤兵"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政策"。"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溶化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反动派。"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②,被毛泽东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人民军队的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的成功。

为了使人民军队的全体指战员自觉地遵守党的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毛泽东在1947年10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统一规定三大纪律为: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在军队建设的方法上,则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这种办法,有力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官兵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是部队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284页。

毛泽东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重要贡献。正是在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人民军队经历了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南昌起义部队开始为三万人，失败后到信丰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为五千人，上井冈山时只是不足一个团的兵力了。相对于国民党的二百万常备军来说，这是一支很微弱的力量。但它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到 1930 年 5 月，全国红军即发展到六万二千人，1933 年 5 月，更发展到了三十万人。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长征路上右倾分裂主义的危害，部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敌后对日作战中重新发展，迅速壮大，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七万人。从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到 1950 年 6 月，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共歼灭美国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自己也空前壮大起来。1947 年 6 月为一百九十五万人，1948 年 6 月为二百八十万人，1949 年 6 月为四百万人。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创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支人民军队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四、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中国人民军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战争的。如何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有极大优势的敌军，这是人民军队一开始就面临着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后不久，就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他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退出广东前往湘南的过程中，也开始采取上山打游击的办法。到 1928 年 5 月，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适合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已经提出来了。1930 年 10 月，为了粉碎敌人即将发动的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在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新余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经过第一、二、

三次反"围剿"战争,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也就全部形成。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人民军队采取"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在敌人后方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游击战争被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也得到系统的阐明。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军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于1947年6月底开始,使自己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同年12月,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人民军队长期作战的丰富经验,结合人民军队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的新情况,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

中国革命战争具有哪些特点呢?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它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的特点,即: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人民军队的弱小;第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第四两个特点,规定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第三两个特点,又规定了中国人民军队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因此,"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一再反复,就成了中国革命战争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发展规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地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直至有一天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时,中国人民军队才能使自己转入战略进攻,从而去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四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具体地说:

第一,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敌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并且采取"围剿"的形式向根据地大举进攻,因此,人民军队在长时期内是在进行防御作战。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人民军队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所谓积极防御,也就是攻势防御,即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按照这个方针,人民军队的作战,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和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因为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才能保守并扩大革命的根据地。为此,人民军队应首先有计划地诱敌深入,以便使强大的敌人分散自己的力量,暴露自己的弱点,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而后抓住战机,适时地举行反攻,即以战役和

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采取“割指头”的办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一部或几部，从而打乱敌人的整个部署，粉碎敌人的“围剿”。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作战的指挥上，是否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区别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种战略方针的重要标志。在中央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时，中央红军不过三至四万人，而敌人出动的兵力则分别为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力量对比是极为悬殊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诱敌深入，寻找战机，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歼灭进犯军的一部或几部，即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并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采取同样的战法，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思想占了支配地位。“左”倾领导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既不敢诱敌深入，待机破敌，又不敢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它们的后方打去，以便调动敌人，创造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他们惧怕丢失土地，首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碰壁之后，又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搞短促突击，同强敌拼消耗。其结果，红军始终不能摆脱被动地位，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根据地，实行长征。两种方针，两种结局，对比极为鲜明。

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也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重要的战略思想。当1946年6月底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后，人民军队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或城市为主要目标，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尽管在战争的头八个月弃守城市一百零五座，却歼灭敌人七十一万，终于迫使敌人的第一线兵力由一百一十七个旅降为八十五个旅，敌人的全面进攻也就随之被打破了。接着，又经过四个月的作战，进一步大量地歼灭敌人，终于又打破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歼灭战的原则，不仅在战略防御阶段是必须实行的，而且在战略进攻阶段也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人民军队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从而大大地加速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进程。

第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最好的办法。

人民军队在长时期内是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从战略防御中改变敌我形势，争取胜利，基本上依靠集中兵力这一着。因为从战略上说，敌人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人民军队必须具有“以一当十”的思想，才能敢于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但

是,在战役和战斗中,人民军又必须采取"以十当一"的战法,才能具体地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也就是说,在战役和战斗中,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打击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且往往是敌较弱的一路或一部。这样,就可从使得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人民军队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也就可以打歼灭战和速决战了。由于速决,也就使得敌人的其它各路或各部来不及增援,使得人民军队可以迅速地转移,不仅不至于陷入强敌的包围,而且可以把兵力转用于对付另一路或另一部敌人,从而逐次把敌人各个击破。比如,在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央红军以三万兵力对付敌人三十万兵力,由于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集中兵力在七天内打了三个歼灭战,终于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在战略进攻阶段,集中兵力仍然是必要的。在三大战役中,如果不是集中兵力,就不可能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迅速地取得胜利。

总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人民军队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大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

第三,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即井冈山时期,人民军队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争;后期,即自 1930 年 10 月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以来,主要是具有正规战争性质的运动战。在抗日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即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游击战争,后期,即战略反攻阶段,主要是具有正规战争性质的运动战。在全国解放战争,则始终主要是正规战争。

运动战是指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游动性。人民军队采取运动战的作战形式,在广阔的战场上,在变动不定的战线上,大步前进,大步后退,迅速集中,迅速分散,这样就有利于调动敌人,使其脱离坚固据点,成为运动或临时驻止状态,充分暴露其弱点,同时,也有利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在人民条件、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场所,抓住时机,向敌人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以便最有效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取得速决和全歼的效果。比如,在中央根据地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人民军队就是主要采取运动战的作战形式取得胜利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和长征初期,"左"倾领导由于主要采取阵地战的作战形式,结果就使得人民军队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而在遵义会议以后,人民军队由于重新开展机动灵活的

运动战，迂回穿插于敌人之间，因而又重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地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又如，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出动二十三万人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当时，西北野战军主力仅二万余人。在兵力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人民军队主动撤离延安及其他一些地方，避开敌人的锋芒，用"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使之极度疲劳，而后集中兵力，在羊马河、清化砭、蟠龙镇等战役中，用运动战连续歼灭敌人的一路或一部。经过十个月的运动作战，共歼敌七万余，从而迫使敌人转入防御。而后，又在宜川战役中用"围城打援"的方法歼敌三万。这样，就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整个形势，为解放全西北创造了条件。

游击战，在一般情况下，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作战形式，在战役、战斗中对于正规战起着配合作用。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游击战也曾经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成为人民军队作战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争曾经显示过自己的神威。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民军队就实行了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友军是昨天的敌人、当时仍对人民军队怀有敌意的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对于保存人民革命力量是不利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把人民军队分散开来打游击，可以充分地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并且依靠群众创造各种办法，最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战略防御阶段，从战争全局来说，游击战虽然是辅助的（主要的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却使得敌人不能保持对占领区的牢固控制。这也就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所以，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对于停止敌人的战略进攻，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主要的地位。促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主要就是通过开展游击战来实现的。游击战还为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战不再是主要的作战形式，因为只有进行正规战争才能达到驱逐日本侵略者这个目的。但是，这个阶段的正规战争是由游击战上升起来的，后者在相持阶段就担负了为反攻阶段向运动战发展的战略任务。这种游击战争主要是在敌人后方的广大农村中进行的。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也就是发展人民军队、扩大根据地的过程。这是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阵地战，一般来说，是人民军队作战的辅助性形式。它通常是配合运动战的。如围城打援，攻点打援，攻坚阻援等。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期，由于人民军队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攻坚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它在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的同时，也更多地实行了阵地攻击作战。

整个说来，人民军队的这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由于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党就把进行武装斗争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样，也就使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得到了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农民的全力支持。为了胜利地进行革命战争，党建立了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即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了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实行这样的结合，主力兵团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机动作战任务，主要对付和歼灭敌人的正规军；地方兵团则在游击队、民兵等广大群众武装组织的协同下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和巩固根据地，积极配合主力作战，打击和歼灭当地的敌人。这样，既能做到全民皆兵，又能使民兵随时补充正规军，使游击队和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主力兵团，壮大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同时，党还把武装斗争同各种群众斗争，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以便最大限度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①] 正因为如此，人民军队所实行的上述战略战术，也就是任何反动军队所不能掌握也无法对付的。

① 参看粟裕《毛主席战争指导路线的伟大胜利》，1977年8月6日。

第六章

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一、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战争要胜利，首先要靠政治，要打赢政治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是革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政治性质使它不仅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胜利的必然性。但是革命战争要胜利，还要依靠正确的政策。这里除了孤立和瓦解敌人的政策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团结和壮大自己的问题，或者说，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革命战争必须由党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来担负，党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政治保证”。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正确地处理各阶级的关系，以达到团结和壮大自己和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革命战争就不可能胜利，甚至可能遭到失败①。

当然，统一战线同武装斗争也是不可分离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②。革命的武装，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革命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是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的重要条件。历史的经验证明，工农联盟的发展和巩固，主要是经过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而获得的；同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更要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有没有武装力量。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如果没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武装到牙齿的大资产阶级固然没有任何发言权，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人微言轻”的。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的武装力量愈强大，革命战争进行得愈胜利，统一战线也就愈广泛，愈巩固，愈强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

---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5 页、第 33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613 页。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①] 他把建立统一战线看作是"革命的根本政策"、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中国人民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比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过,"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②] 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他说过,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③] 在全国胜利前夕,他更说过,"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④]。这些论述,把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所占的重要位置讲得十分透彻了。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这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比如,"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去一起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⑤],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马克思还讲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被魔鬼领着你走"[⑥]。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强调要依靠基本劳动群众,而且注意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他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613页。
②⑦ 《毛泽东选集》,第55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25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47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6—30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3页.

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① 他并且说过,革命家倘若不善于利用一切革命力量,那简直是笨猪。即使这些革命力量是暂时的,动摇不定的,甚至知道明天就会变坏的,但倘若他们今天对于革命还有一些利益,就要尽量的利用使这一点用完。事实上,俄国布尔什维克从来也没有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它还曾同社会革命党人订立过短期的正式政治同盟,并且不止一次地与孟什维克同处一个党内;尽管在这样做时,它从来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它们散布的资产阶级影响停止过斗争。在反社会主义政党被人民抛弃之后,"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②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③ 无产阶级尽管革命性很强,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它的人数毕竟比较少,在全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及百分之一,力量比较弱;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也不多,但它毕竟有全国性的政权,有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因而仍然是比较强大的。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就必须使自己的各项政策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利益,必须同这些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一个时期内超过了革命势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不是一天就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化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化少一点力量就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要把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平衡的状态,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要化费很大的气力,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6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08页。

情来的"。[①] 正因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革命斗争是持久的、艰苦的,党就更加有必要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注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以便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地改变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的状况,逐步地扩大革命的阵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我国原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深重灾难之中,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无产阶级拥有广大的同盟军,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甘心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包括全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仅占了全人口的大多数,而且革命要求强烈,他们是统一战线中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压迫和排挤,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或者可以在斗争中保持中立,又由于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革命的彻底性,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机可能同革命的敌人妥协,可能动摇变节,他们是统一战线中的中间集团,是共产党应当努力争取的力量。"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②]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成了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成了共产党的暂时的同盟者。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始终存在的,只是由于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斗争任务不同,统一战线的阶级构成有所变化而已。从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06—607页。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于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的同时，就讨论过"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① 尽管大会确立"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在政治斗争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②；但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是有人主张，在"不能失掉原则"的前提下，"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分子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③ 1922年党的二大就正式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④ 1922年至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被反动派镇压下去这个事实，使得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懂得了"他们自己虽然是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⑤ 于是，党决定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3年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国民党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由于国民党曾经采取联合某些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些帝国主义、联合某些军阀反对另一些军阀的策略，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为自身的利益而资助过孙中山，他们在国民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正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

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实行了公开的叛变，而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内，革命统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自俄文）。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自俄文）。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645页。

战线中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农民,坚持革命的旗帜,推动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且通过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个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全中国的各个阶级、阶层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统一战线所包容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参加这个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进步势力,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而且还有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个顽固势力。只有亲日派、降日派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巩固和扩大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发展和最终赢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反革命战争,破裂国共关系,企图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统一战线中不再包括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的范围似乎缩小了。而在实际上,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的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政策迫使广大人民除了奋起斗争之外再无出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受到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的鼓舞,不仅解放区的广大人民,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明确地同情和支持革命、参加斗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这就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之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自身也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伟大规模。"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统一战线,从本质上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由于敌情和同盟军的某种变化,这个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也各有自己的某种特点,它们的具体构成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不过,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66页。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政治集团之间为了反对当前的共同敌人、实现当前的某种共同要求而结成的政治联盟。也正因为参加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之间除了有某种共同点以外，在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所制定的纲领和路线、所采取的斗争方法等方面，不可能是没有区别的，有的区别甚至具有某种对抗的性质。所以，统一战线本身也是一种对立的统一，它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斗争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进步势力发起组织统一战线，是为了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由此使中国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它并且主张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法来实现这个任务。以某些民主党派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参加统一战线，是为了在推翻外国势力和本国封建军阀的统治之后，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并由此使中国社会走上自由地和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①] 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在特定的条件下参加统一战线，只是为了反对直接威胁其生存的某个帝国主义势力，以便维持其本身的反动统治，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就是在这个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②]。这些情况说明，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没有消弭参加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只是使这种矛盾的地位有所降低（即不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斗争的方式有所改变（即不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已。

事实上，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应当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07页。

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①

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上。因为哪一个阶级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决定了革命走哪一条道路,采取哪一种方法,从而也就决定了革命的成败,以至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胜利的。"②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和加强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这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在统一战线中,正如无产阶级力图吸引、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样,资产阶级也力图影响乃至"溶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以,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这个问题,李维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一文中,曾经作过很好的论证。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要影响和争取别的阶级、阶层,别的阶级、阶层也要影响和动摇工人阶级。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经这样尖锐地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谁吸引谁、谁领导谁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内容会不同,尖锐性的程度会不同,但这无疑是统一战线中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斗争。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同盟者尽可能提高到当时革命斗争所要求的水平。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不但决不可以被其他的阶级、阶层所影响和动摇,以至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

① 《毛泽东选集》,第607—6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257页。

的水平；而且相反，必须积极地影响和吸引其他阶级、阶层，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政治上逐步地把同盟者提高到接近自己当前政治主张的水平，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首先同一切同盟者划清阶级界限，——既要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也要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而后在一定条件下同他们建立共同行动。这在政治上说，主要地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纲领和口号，而后在这种纲领、口号的一部、大部或者全部的基础上，同其他阶级或者党派找到共同点，建立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同时在一切相异点上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主张和行动，并且逐步地提高同盟者的水平。不这样，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在统一战线中犯投降主义或尾巴主义的错误。”

经验表明，“两个以上的阶级、两个以上的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作基础，才能有统一的行动。共同纲领，一般说来，总是反映当前历史条件下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共同要求，而不可能反映各阶级的全部要求，各阶级还会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要求。共同纲领表现统一，独立的要求表现矛盾，所以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就是对于共同纲领，各阶级各党派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也就不能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所以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就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纲领，这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又必须善于同别的阶级和党派达成共同的纲领，并经过共同纲领，又联合又斗争，逐步地把他们提高到自己最低纲领的水平。”①

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决不能放弃自己的旗帜。相反地，它应当坚持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且一方面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作斗争，一方面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即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劳动人民逐步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才能使民族资产阶级最终抛弃旧民主主义的幻想，使大资产阶级维护旧社会制度的政治主张陷于孤立并走向破产，从而也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或者在这个旗帜的指引下前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逐步地建立、巩固和加强起来。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396—397页。

二、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这里的其他劳动人民,主要是指农民,也是指城市小资产阶级(即独立工商业者、不剥削人而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和广大青年学生)。另一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这里的非劳动人民,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雇佣少数工人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资本家)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指开明绅士(即从地主富农阶级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个别人士),以及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爱国上层人士(他们是前资本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以及这些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爱国的宗教界上层人士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指一部分地主阶级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

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即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参加这个联盟的是属于进步势力的阶级、阶层、集团,他们不仅在人数上占了优势,而且在政治上具有较强的革命性,所以这个联盟构成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首先发展和巩固这个联盟,统一战线才能够真正地坚强有力;才有助于推动其他中间的阶级、阶层、集团参加革命和参加统一战线;才有力量去孤立、分化、瓦解和消灭敌人,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相对于第一个联盟来说,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是非基本的、辅助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这个联盟之所以不可缺少和重要,主要地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影响,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有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多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态度"。"工人阶级争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或至少使之保持中立,就有利于争取其他的中间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①

整个说来,统一战线本身就是这两个联盟的对立的统一。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正确地领导统一战线,就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两个联盟的关系。具体地说,"这就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321页。

是，第一，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使它真正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第二，尽可能扩大第二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它们互相促进”。①

对于如何处理两个联盟的关系，在党的历史上是有过许多经验教训的。

由于资产阶级具有害怕群众的特性，大革命时期，当农民运动高涨起来时，中层以上社会就发生了严重的动摇。是通过加强工农联盟来推进革命、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呢，还是用压制农民运动的办法来稳定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呢，这成了中共中央在决策时必须作出选择的问题。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采取了后一种办法，即为了第二个联盟而削弱第一个联盟。但其结果不仅没有稳定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反而使资产阶级更加动摇起来，大资产阶级随后就叛变了，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第一个联盟被削弱了，第二个联盟也不能维持了。

问题很明显，既然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和革命的主要依靠，那就决不能为了维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牺牲工农联盟。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尽力维护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资产阶级离开革命会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困难；但只要有工农联盟在，革命仍然是能够坚持进行的。1927 年革命失败以后，尽管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由于坚决依靠农民，努力发展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党不仅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革命的旗帜，而且把革命推向了前进。如果牺牲了工农联盟，那就一切都谈不上了。

实际上，巩固与加强工农联盟，不仅不会妨碍、损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且是建立、维护和发展这个联盟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② 工农群众的广泛、深入的发动固然使资产阶级感到害怕，但也决不是如同犯右倾错误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必然会由此吓跑了资产阶级；相反，只有工农群众的力量真正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了，资产阶级才会“吓”得不敢乱跑，而向革命靠拢。所以，“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③。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坚决冲破资产阶级的限制，着力发展进步势力，广泛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 32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76 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51 页。

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积极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其结果,不仅有效地推进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事业,而且使得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也不敢轻易破裂统一战线。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动员之广泛与深刻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因此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纷纷抛弃中间路线的幻想,而表示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扩大和巩固了。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巩固与加强第一个联盟,确实为巩固与扩大第二个联盟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怎样才能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之上,即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

前面已经讲过,在中国农村中,占人口(按户计)8—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劳动农民在租种地主及旧式富农的土地之后,需将收获物的四成、五成,乃至六成、七成、八成作为地租交给他们。这种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量,而且侵占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的必要劳动量。在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变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农民终年劳碌,所得往往不足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以致"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是农民感到的最大的痛苦。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购买力低微,广大农民无力提供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市场和资金等条件,这种情况,构成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根本性的限制。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不但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为地主豪绅所把持,许多地方还形成了封建式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情况,构成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因此,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和一项基本任务。只有完成这项任务,才能解除中国最广大的劳动者——农民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难,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才能扫除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使之走上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在中国,谁能够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

就能赢得中国多数人的支持，就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成了统一战线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在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农民自己没有提出过土地革命的纲领。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①

1927年革命失败，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之后，他们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蒋介石本人就公开否认中国农村存在土地问题，说什么“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得整理”，因此“认为经营及整理土地，实更急于分配土地”。他们在口头上也喊“平均地权”的口号，实际上只是规定“限制每一业主所有田地面积之最高额，自一百亩起，至二百亩”，“对于超过最高额部分之田租，应依累进法征收其所得税”。这种办法，既没有触动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也没有真正限制地主占有田地的数额，只是要求地主对其占有的超过规定限额的部分，多交若干田赋而已，而这些田赋归根到底还是要转嫁到农民头上、由农民来负担的。他们在口头上也喊“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实际上却把这个口号曲解成为耕者有其“佃”，所主张实行的“和平的计口授佃”，也就是“重在均耕，不是计口授田，或用暴动掠夺的手段来均其所有”。这种办法，完全背离孙中山的本意，其实际意义正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至于所谓“均佃”，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更是公开宣布保护地主的土地私有权；它随后颁布的有关条例更明文规定，根据地内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上述政策，表明自己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它把自己置于了同中国多数人对立的地位。这正是它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并最终陷于失败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75页。

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①

正是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工农联盟极大地巩固和加强起来了。这样,不仅使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具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得到了基本的实现,而且也为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实现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说:"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②事实正是这样。

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

统一战线中的第二个联盟,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联盟,首先和主要地,是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毛泽东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一起,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他在这里所以没有把党同农民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他指出,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于党的缩小和扩大、发展和巩固,对于革命的前进和后退、胜利和失败,关联极大。"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③。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所经营的,主要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族资本在它积累的最高峰的时候,不过七十多亿元(一九三六年币值),合二十多亿美元,而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估计达四十二亿八千万美元,比民族资本大一倍以上。稍后,官僚资产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7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04—605页。

级所积累的财产达一百至二百亿美元，比民族资本大四倍至九倍。前面已经讲过，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民族资本所开办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多数工厂没有现代化机器设备，属于工场手工业性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极不充分，主要原因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

上述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个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①

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经济实力不强，但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他们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以这个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出身于这个阶级，或者与这个阶级有比较多的联系。他们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也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族市场，同时传播了资产阶级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民主主义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有必要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是因为：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而在一个长时期内，中国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却相对地比较弱小。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官僚军阀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也就应当争取他们同自己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639—640页。

争中采取联合行动,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而决不应当把可能的友军推向敌人的营垒,从而增加革命的阻力。第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属于中间势力。他们长期地在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动摇着。他们好比是天平上的法码,加到那一边,就加大了那一边的份量,而减弱了另一边的份量。无产阶级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可以直接增加革命的力量,而且有利于争取在他们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从而有利于在政治上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事实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是极力争取中间势力,企图以此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讲过,"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①。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近代中国,它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在革命根据地内部,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可以利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发展生产、促进内外交流、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发挥某种积极作用。如果不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根据地要发展同外界的经济交流就会发生困难,工业品的生产也可能呈现萎缩状态,这对于中国革命的事业是不利的。

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争取开明绅士也是重要的。"开明绅士,即从地主富农阶级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民族资产阶级大略相同。开明绅士在政治上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大的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样的作用"。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左翼。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可以赞成减租减息,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赞助土地制度的改革。争取开明绅士,"这对于分化中小地主和中立富农,对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多数同土地有联系)和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可以起"相当的作用",并且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对于开明绅士,也必须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②。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也被当做中间势力,成为无产阶级争取的一个对象。地主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在抗日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748页。
②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391页。

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对于这部分势力，我们的政策也应是争取他们。

当然，在中间势力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角色。

应当看到，“民族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各有其出发点”①。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是为了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使中国走上自由地、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也就是要使中国走上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夕，他们的代表人物就说，“四民之中最有实力者莫过于商”，他们“进可以趋承军阀官僚，退可以领袖工农”，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之中坚”。他后来还说过，只要不为国际资本主义所侵迫，方在萌芽的、如幼孩然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可望长成”的②。大革命时期，曾经有人写文章说：“现在世界上有三条路，我们中国人，只有在这三条路中检一条走。一条是列宁走的路，一条是墨索里尼走的路，一条是基马尔走的路。”③ 一些人认为，列宁在俄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不能走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走的法西斯道路，中国是不该走的；只有基马尔在土耳其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才符合中国的需要。当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人就提出过“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样的口号，其目的正是为了在左右开弓之中实现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④。对于这种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各个时期，都不断地有人进行过鼓吹。这种鼓吹，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更达到了高潮，一度掀起过一个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的第三大党运动（详后）。毛泽东曾经指出，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实现其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⑤ 这种主张，不但一般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在一部分民主党派中更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0页。
② 杨杏佛：《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1924年1月，《资本主义与中国之将来》，1927年6月。
③ 转引自戴季陶《中国民族的生路》，1927年12月。
④ 转引自毛泽东《中国社会与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后来在实践中受到教育，不仅放弃了这个号号，而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⑤ 《毛泽东选集》，第4页。

一度占据过上风。

这种中间路线即走旧民主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究竟具有何种历史作用呢?应当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们是不满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政策和官僚军阀政府的反民主的独裁统治的,是不赞成大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的,因此,他们有可能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有可能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进步力量实行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对革命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抱有某种幻想,不赞成人民民主革命的路线,因此,他们又可能妨碍一部分受其影响的群众尤其是中间群众的革命觉醒,妨碍这些群众在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对革命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消极作用。至于这两方面的作用究竟哪一方面占主导地位,则"要看提出这一口号的具体政治形势来决定"。"当反动势力占优势,并且准备向革命力量扑过去的时候","有第三方面提出类似中间路线的主张,其所产生的客观作用主要的是牵制反动力量的;因为:尽管这种主张和想法在表面上,是要求双方同时让步,而自己并不附和两方中的任何一方,但在实际上,这种主张和想法的作用对于反动力量和革命力量二者比较言,更主要的是牵制反动力量,对于怀抱这类想法的人们自己言,则是拒绝为反动力量帮忙,更简单的说,当时中间路线的实际意义,是对反动力量保持中间"。虽然即使在当时,中间路线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整体方案,也仍然是错误的;而这种中间路线的宣传,对于一些尚未觉醒的群众来说,也是不利于他们走向革命的。"当革命力量取得了优势,并且在胜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倘有第三方面,提出类似中间路线的主张,其所产生的客观作用,主要的就要变成牵制甚至反对革命力量的了;因为:尽管这种主张在表面上是要求双方同时让步,而自己并不完全附和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但实际上,这种主张和想法的作用,对于反动力量言,是为它散布幻想,对于革命力量言,却是要它不再前进,总之对于革命是有害的;对于怀抱这种想法的人们自己言,则是拒绝彻底为进行革命而斗争;简单的说,这种情况下中间路线的实际意义,是对革命力量保持中间"。[①] 虽然即使在这时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一律视为反动派的帮闲乃至帮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主观上还是真诚地向往并希望中国能够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

① 于怀(乔冠华):《追击中间路线》,1946年9月。

正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具有两重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联合的同时，应当进行必要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他们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有利于争取他们，巩固与他们的联合；也才有利于更好地争取受到他们影响的那些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一句话，才有利于争取无产阶级对于革命、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果无视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政策同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的纲领、路线、政策之间的原则区别，在实行联合的同时否定开展必要的斗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革命、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也就无从谈起了。

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与斗争具有自己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大资产阶级那么多的反动性和对抗性，并且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和武装力量。因此，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武装力量的联合和斗争，而主要是政治上的联合和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而批评也是为着教育和团结”①。毛泽东说过，无产阶级“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进行武装斗争”。这里的资产阶级主要地是指大资产阶级，而不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否定在一定条件下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就要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联合时否定开展适当斗争的必要性，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两种错误在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并且都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的危害。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所犯的，主要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第一次大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即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国民党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反清绅士的联合战线的组织。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基本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其中也还有其他社会力量加入。所以，当时的国共合作，也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合作。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召开的有共产党员出席并参加领导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民党由此被逐步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392页。

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长期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政策说成是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共产党的这种作法"根本已毁其独立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而"步步投降资产阶级""乃必然的逻辑"。应当指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三大在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对于保持共产党自身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曾作出过明确的规定。大会的决议和宣言指出:第一,"我们在国民党中,必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府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3)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需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惕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第二,"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第三,"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由此可见,当时的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注意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的。

事实上,国共合作不仅没有阻滞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把中国革命的步伐极大地加快了。由于国民党在许多地区具有合法的地位,并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党就可以在自己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以便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同时从内部来影响国民党的政策,真正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以便更好地联合它所联系的资产阶级,并推动在它影响下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革命。正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工人运动复兴了,农民运动开始发动了,以"五卅"为起点的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掀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胜利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党自身的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大。三大时,党员总数还只有420人;到1927年4、5月五大时,党员总数已近58000人了。如果不是国共合作,中国革命要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巨大的进展是不可能的。

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存在着右倾的错误。虽然他说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每每分为革命的、非革命的、反革命

的这样三部分，并且表示“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但他强调“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而不懂得中国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是农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农民的土地革命。这样，在实践中，他由于耽心开展斗争会使资产阶级离开革命，因而一味对他们的妥协倾向乃至反动倾向作无原则的让步，甚至用压制农民斗争的办法来迁就他们，即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中的第二个联盟而宁愿牺牲第一个联盟，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错误，突出地从对待蒋介石集团以及汪精卫集团的态度上表现出来。

蒋介石“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过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大革命的初期，他“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①]。对于执行着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的蒋介石，陈独秀把他看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他是只讲联合、不敢斗争的。周恩来指出，在北伐的准备阶段，他就作了三次机会主义的让步。国民党召开二大时，不敢放手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使右派在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的选举中占了大多数，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中山舰事件后，不敢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使蒋夺取了第一军的军权，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使蒋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权，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本来，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蒋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而党仍然把他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敢与之斗争。在北伐过程中，蒋竭尽全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叛变革命，而党既没有采取措施去限制蒋的权力的膨胀，也没有对他的可能的叛变作相应的准备。中央强调，“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②]，实际上把自己置于资产阶级助手的地位，使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服从并服务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这个目的。大革命后期，当农民运动高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严重动摇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在党的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在1926年12月于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虽然指出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向右走的倾向，但是他又指责党犯了“左稚病”的错误。他认为，为了使联合战线不致破裂，一方面应防止党外的右倾，但主要不是靠发动群众向右派作斗争，而是靠国民党军事首领之间的制衡和用汪精卫来牵制蒋介石；另一方面应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5页、第208页、第114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15页。

防止党内"左"倾,办法就是制止所谓农民运动的"过火",反对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等等。在这里,他把通过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的妥协,提到了总方针的高度。这个方针为会议所接受,并形成了相应的决议。但这个方针的贯彻,并没有达到维护统一战线的目的,只是使右派的反动气焰更盛,并且在叛变革命时更无所顾忌而已。1927 年 4 月,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公开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时期召开的党的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根据国际执委七次会议的精神,认定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①,这时"资产阶级已经跑到反革命那边去了",留在革命阵线内的只有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他们"已成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陈独秀在报告中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于是大会的决议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党应当为"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而斗争。从这种论断出发,党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一方面,由于认定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叛变,大会决定"坚决的抛弃资产阶级","完全与资产阶级决裂",并提出实行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等。这样,不仅不利于集中力量孤立国民党右派,而且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并为右派攻击党提供了借口。另一方面,由于认定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陈独秀等就把资产阶级的代表武汉汪精卫集团看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群众的组织部分,党的政策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以他们可能接受为条件。这样,他们对汪精卫集团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甚至企图用投降式的让步,把他们稳定在统一战线之内。其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加速了他们叛变的过程。这是右倾投降主义导致统一战线破裂、革命失败的一个严重的教训。

在 1927 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了当时的党没有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 年 12 月 16 日)认为,中国革命将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在第二阶段,"工人阶级作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出现在中国舞台上","无产阶级同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农民、同城市小资产阶级、部分的也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在第三阶段,随着革命的深入,资产阶级将离开革命,"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无产阶级是这一联盟的领导成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 277 页、第 279 页)。这个论断,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内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方针的主要依据。

的思想，指出“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①。后来，他进一步对这种右倾错误作过多次批判，指出“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② 这是由大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党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犯了“左”倾错误。

应当承认，在当时，如何正确看待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不容易答复的复杂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从1927年“七一五”政变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一个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的营垒，当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他们幻想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将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以自由地发展起来。他们的个别代表人物甚至在南京政权中任职，充当了这个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品。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困难的。但是，他们又确实基本上没有掌握政权，仍然受到当权的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限制；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业虽一度有所发展，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也很快陷入了破产、半破产的境地。正如毛泽东在当时说过的，不仅全国工农平民，就是资产阶级，也“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③ 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因他们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可以对他们采取过左的政策。

在当时党内，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从前面所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五大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二阶段的论断中引伸出来的，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全部反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进行”。八七会议就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如今与地主买办阶级一样，“将要成为外国资本统治中国之支柱”，因此，反帝反封建革命之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因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混淆民主革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7页。

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影响,认为中国革命将"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并由此出发,提出了"工厂归工人管"、"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等"左"的政策。1928年6月党的六大正确地肯定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判了上述"不断革命"思想;但仍然错误地认定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甚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大会还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九次会议的精神,认为"第三党"等以中间面目出现的党派"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党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动摇犹豫和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六大之后,中央在致党员书中提出,"对于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应当一律给以无情的打击",因为他们极力宣传改良的口号,"只是(起)一种阻碍革命、破坏革命的反革命的作用","正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最主要的敌人"①。1930年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②。对于中间势力采取的这种过左政策,持续了多年,在立三路线时期尤其是王明路线时期,更是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抗抵日本的侵略,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表示不满。这就是说,他们开始了新的动摇:不是从革命营垒动摇到反革命方面去,面是从反革命营垒动摇到革命方面来。这种动摇是有利于革命面不利于反革命的。党应当适应这种新的政治环境,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无视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革命的长期性,错误地认为国内政治的中心是革命政权与反革命政权的决定胜负的斗争,并且把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面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言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③,理由是这些中间派别"用尽欺骗的口号,企图和缓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的这个策略原则不是从对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中得出的,而是从斯大林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96、698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7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1页。

公式中引伸出来的。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认为："一、在革命将获最终胜利的时期中，最危险的革命底敌人的社会柱石就是妥协的政党。二、要推翻我们的敌人（沙皇及资产阶级），首先必须设法使这些政党陷于孤立。三、在革命准备期中，我们的枪锋，应注射在这些政党上面，首先必须把它们孤立并和劳动群众隔离。"他们说，这一原则也就是1931年以来党的"领导的战略原则"①。但是，这样来引证斯大林，完全是教条主义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因为，第一，当时的中国革命并没有进入如斯大林所说的那种"革命将获最终胜利的时期"；第二，就是对于斯大林这个公式本身，也"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1956年4月5日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九一八事变以后，一些中间派别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口号：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宣战；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应付国难。这本来是有利于抗日救亡事业的。中央却认为，这是为国民党散布幻想，"抵抗广大群众的民族觉悟"，因而主张"揭破'国防政府'是卖国的屠杀群众的口号，把苏维埃的口号与'国防政府'的口号对立起来"等等，把正从反革命营垒动摇出来的中间派别竭力推回到反革命营垒去，从而丧失了与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

1933年秋，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组织人民革命政府，要求与红军采取联合行动。这本来是红军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有利时机。中央虽然同意与福建人民政府订立初步的反日反蒋协定，但又认为他们是企图"借'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的更进的革命化"，认为他们成了"一切在野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派集合的中心"，因而主张在政治上"最严格的、无情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95页。

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在行动上不积极给予军事援助。结果,蒋介石首先集中力量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然后继续集中力量进攻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时机就这样的丧失了。

在根据地内部,党和革命政府并没有禁止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但由于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如脱离根据地落后工业的实际,机械地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资方给予工人过高的工资及福利,规定过多的节假日等)和税收政策(如要求资方上缴过高的所得税),一些私营工商业因感到无利可图而纷纷停业,致使不少工人失业,许多工业品价格上涨,与外部的贸易呈现萧条状态,从而使根据地的经济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正是由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在实践中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困难,中共中央在后来曾对这个政策的若干方面作过某些调整。1933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红军准备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项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此后,中央还进一步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那也是有意义的。1934 年 5 月,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号召"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组成"反帝统一战线"。党在实际工作中已经不再强调"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个口号了。党的一些领导人还对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左"的错误作法提出了批评。上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若予调整,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发展,为尔后中央彻底纠正这方面的"左"倾错误、制定出相应的正确政策,作了一定的准备。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全部走上正确轨道,是以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为标志的,因为这个决议和报告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策略方面的诸问题,特别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建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之前,1935 年 7—8 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曾经提出过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纠正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的任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据此草拟了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人民书》(即八一宣言),并于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予以公布。这个宣言发出了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的号召,并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0月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指示信,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党的"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指示信明确指出,"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不管什么党(自生产党至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如果他们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都愿意"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① 这表明,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已经同那种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把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方针划清了原则的界限。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② 和毛泽东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上,主要是讲清楚了三个问题:

第一,指明了在抗日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决议指出,面对日本的侵略,反革命营垒必然发生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的以至参加的可能的",他们这种态度"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第二,提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会议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并且指出,这个人民共和国应当"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经济",使革命根据地成为"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

第三,号召着重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同时警惕右的投降主义倾向。会议的决议指出,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党的领导权,必须同目前的主要危险——"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纲领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64页、第565—56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8—628页。

动纲领,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关门主义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的民众和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赶到敌人一边去,"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他们主张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其实是患了幼稚病的表现。"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在着重反对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会议决议指出,党"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乡村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尾巴"。党必须警惕右倾机会主义在新的大革命时期"在部分的党部和党员中的复活"。毛泽东的报告也指出,必须记取大革命时期党犯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历史教训,坚持"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统一战线中实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1937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就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翼集团、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指出"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并且把被迫或被骗加入复兴社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 CC 团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当时其中非当权的部分)也列入这个集团的范围;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1940 年 3 月,他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在 1937 年 11 月的文章中,后两部分人还未列入中间集团的范围);指出与党把进步势力当做基本同盟者去争取有所不同,"对于中间势力,则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指出三部分中间势力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和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一些人可以参加或保持中立。地方实力派,除共同抗日和在对顽固派斗争时暂时中立外,不愿与我们共同建立民主政权"。因此,党"对于各部分中间势

力也有区别”，而总的说来，“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同年5月，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进一步把党应当争取的中间势力列为七种，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指那些在国民党内于一定时间内对反共不甚积极或采取中立态度的派别和某些个人），中央军中的中间派（指那些在中央军即蒋介石集团的部队内在抗日时期中对反共不甚积极或采取中立态度的军官或个别部队），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在1940年3月的文件中，后四种人尚未被列入中间势力的范围）。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抗战的积极性，这些中间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与1940年5月的文件比较，这里把“国民党内的中间派”具体解释为“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把“中央军内的中间派”具体解释为“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并且把小地主也列入抗日时期的中间势力的范围之内——由于顽固势力特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中小地主视为中间势力是可以理解的[①]。实际上，作为中间势力加以争取的，还不限于这七种人。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②]、宗教界爱国人士和爱国华侨领袖等，也都是党争取和团结的对象。由此可见，中间势力的范围是相当宽广的，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了其他阶级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同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矛盾的众多的人们。当然，中间势力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内涵不尽相同。比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小地主就不能再列入中间势力，作为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已经成为革命的直接对象了；在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想象“中央军中多数军官”都会成为中间派的；等等。

应当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呢？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③] 这些条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19页。

② 李维汉在《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56年9月25日）》一文中指出：“各少数民族内部多少都有一些上层人士，他们是前资本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以及这些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劳动人民间的矛盾，只有经过社会改革（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解决。另一方面，这些上层人士的大多数具有爱国立场，在民族关系上，部分的还在宗教关系上，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联系，成为本民族的公认领袖。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这种公众领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党很早以来，就对于少数民族公众领袖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作了正确的估计，并对他们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政策。”

③ 《毛泽东选集》，第747—748页。

件是:

第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由于中间势力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动摇着,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努力发展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人民军队和革命民主政权,使他们看到进步势力是强大有力的,是有发展前途和胜利希望的,他们才能在政治上向无产阶级政党、向进步势力靠拢。这也就是说,发展进步势力,这是争取中间势力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中间势力所以与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矛盾,是因为后者损害了前者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要争取中间势力,就应当照顾他们的合理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在这方面,主要是:在政治上,吸收他们的政治代表参加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权,注意听取他们的合理意见,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政权曾实行三三制,即参加政权的人员,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基本政治纲领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许多中间派人士继续参加解放区政权的工作。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时,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许多中间党派、中间人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切实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发展积极作用。

第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列宁说过:"谁想帮助动摇者,自己首先应当不动摇。"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施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对进步势力加以思想上、政治上以至军事上的压迫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敢于采取适当的步骤,率领基本的同盟军,在思想上、政治上以至军事上给予他们以坚决的打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基本的同盟者,稳定动摇的同盟者,而孤立敌人。如果自己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面前表现动摇、退缩,那么动摇者就会更加动摇起来,以至投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争取中间势力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了。

在论述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他们的动摇态

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① 这种说服工作，实际上也是争取中间势力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当他们抛弃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幻想时，他们才能进一步投向革命。

在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间派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给过无产阶级政党以很大的帮助。

中国各民主党派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它们中除中国致公党成立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以外，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初期成立的。"我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它们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采取了争取、支持、帮助的态度，同他们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且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了这种关系。比如，1940 年 4 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关于争取小党派及中间分子的指示》，指出"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中有反对内战停止磨擦实行宪政好意的要求，但他们对于国民党是内战的挑拨者磨擦的主动者则不了解，他们对蒋实行宪政的口号（头）允诺则有幻想"，党的对策应是争取"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联合"，为此应在同他们进行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帮助他们了解谁是内战磨擦的责任者，帮助他们抛弃对蒋的幻想③。又如，1948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对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反蒋派，"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份，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④

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的基本倾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主张抗日、反对内

① 《毛泽东选集》，第 747 页。
② 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344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第 12 页。

战、要求民主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是不满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国民党发动和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因此,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势力实行了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在革命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在抗战胜利前后,他们曾与中共一起,为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奔走呼号。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与中共代表团紧密合作,推动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会后,又为维护这些协议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还与中共一起,坚决抵制国民党片面召开的伪"国民大会"和制定的伪"宪法",并且揭露国民党当局玩弄"多党其名,一党其实"的"改组政府"的骗局,拒绝参加这样的政府。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们也是采取明确支持的态度的。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

当然,应当看到,一些民主党派是带中间性的,他们代表和影响着中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爱国分子。而且,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皆是,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这就是"情势发展的复杂性"。他指出:"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①。这条道路也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即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其他一些民主党派中的若干领导人物也抱有类似想法,主张以民盟为"'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从而掀起一个走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

民主党派中若干领导人物的上述想法,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是行不通的。

战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还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样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斗争。客观环境并没有给人们走第三条道路留下任何的余地。任何人,不管他如何真诚而热烈地抱有走中间路线的想法,"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② 原先加入民主同盟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分子,不久就跟随国民党走了,其他民盟大多数成员,在斗争的几个关键时刻,都是靠近共产党,同共产党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28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4页。

不应当忘记，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案；而且对若干民主党派领导人物和若干民主人士关于在中国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民主主义的主张，也是不能容忍的。尽管民盟一贯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诬蔑他们是"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他们施行迫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更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且援引《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明令"严加取缔"。同年11月，迫于反动派的高压，民盟有的领导人于是通告盟员"一律停止活动"、"总部亦即解散"。周恩来指出，这个事实证明，"想在国共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是失败了"，"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①]了。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团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曾经开展过多方面的工作。如，推动他们进行反对美蒋的共同斗争；照顾他们的实际利益；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等等。李维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说过，"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他们共同奋斗，帮助它们提高到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水平，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适当地尊重他们的独立性，善于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推动和帮助它们逐步前进"。帮助的方法，"是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它们"。[②] 这里所说的，也是党在建国前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比如，前面提到的1948年1月中共中央的指示，就强调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错误观点，不是要公开地揭发批判，而是要"采取口头的批评态度"；对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是要揭露和批评的，但"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人情人理"等等。这些作法，对于推动一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抛弃中间路线的幻想，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的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标志着许多中间派人士同中间路线决裂而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里程碑。会议明确宣告，"我们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今天民盟的立场，就是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它将为"彻底推翻国民党集团"、"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消灭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并在这个斗争中与中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4页，第283页。
②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11页。

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其他民主党派也表现了类似的态度。同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时,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6月发表的《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中,也明确宣告,"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纷纷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1949年1月,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五十五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完成民主革命,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的这种历史性的巨大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由他们代表和在他们影响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的中间势力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的。

四、特定条件下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革命的联盟,而且在特定的条件下,还同一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建立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曾经两次被迫参加统一战线,又叛变出去"①。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它与地主阶级一起,"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买办阶级,更"始终站在反革命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②。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会发生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这样的问题呢?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页。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第一次参加统一战线，是在大革命时期。应当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分化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一次完成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常常有新的分化。这种分化过程，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经过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逐步地显露出来”。①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大资产阶级分子暂时地混迹于统一战线内部，并不奇怪。还应当看到，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国民党在当时被改造成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个国民党原本虽然基本上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由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由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南方的某些大资产阶级集团或分子曾经支持过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这就使得他们在国民党内有着相当大的传统势力和政治影响。他们构成了国民党右派的社会基础。国民党改组时，一部分右派因反对国共合作而被清除出去了，更多的右派则仍然留在国民党内，他们虽然表示赞成反对北洋军阀，同时又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多方进行反共、限共的活动。

对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中国共产党比较早地就有了认识。1923 年 4 月陈独秀所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虽然包含着若干错误观点，但它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分为革命的、非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三个部分，而“官僚资产阶级”由于“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②。这是有道理的。1925 年 1 月，党的四大决议更明确指出，“中国的大商买办阶级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人（外债外资），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他们“完全是帝国主义工具”，且有联系地主压迫工农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③。而国民党右派，就是这个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因此，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指出，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④。

应当说，上述党对大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以及党制定的对待大资产阶级的策略，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如周恩来所说，“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 36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58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332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69 页。

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即不懂得"各阶级代表人物是能变化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①。这突出地表现在对蒋介石的认识和态度上。在大革命初期,蒋介石"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尽管他仍然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标榜,实际上他的立场已经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②。而我们党却仍然把他当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敢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这样做会导致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关系的破裂。党在这个时期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只想到国民党里来作客、当帮手,而没有以我为主的思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自动放弃了对于统一战线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样,当大资产阶级向革命发动突然袭击时,党由于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随之破裂了。

"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③。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领导人民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中国革命就会彻底失败。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第二次参加统一战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企图以此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④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得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的部分,即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出现了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并且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实际参加了抗日。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是灭亡整个中国,这就使国民党自身及其所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遇到了存亡问题。为了维护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蒋介石不得不实行抗日。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

① 《周总理选集》上卷,第167页、第208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8页、第165页、第16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70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54页。

侵略，侵犯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以英美为靠山的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英美的利益也不得不采取与日本对抗的态度。第三，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国民党政权坚持不抵抗政策，它就可能被人民的抗日浪潮席卷而去，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蒋介石集团也不得不实行对日抗战。

针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动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并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当时提议建立的统一战线还没有把这个集团包括在内。但是，中共中央已经指出，反革命也不是铁板一块，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可能引起地主买办阶级营垒的分化。毛泽东在会后所作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讲到，“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 这个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党提出同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与已经演变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主要根据。华北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紧，党估计到蒋介石集团有可能改变对日不抵抗的政策而转向抗日的政策，因而决定放弃反蒋的口号，而采取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方针。1936 年 1 月，毛泽东等在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首次公开宣布，“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②] 从 2 月开始，中共即不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5 月 5 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的红军东征回师通电，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随后，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中确认“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对手”，并提出“请蒋抗日”。8 月，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正式倡议“国共重新合作”。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12 月，中共中央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此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48 页。
② 《救国时报》，1936 年 1 月 29 日，转引自《国共两党关系通史》，第 543 页。

立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①

中国共产党与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第一,国民党是在全国当权的党,它拥有二百几十万军队。只有联合国民党抗日,才能形成全国性的抗日局面。第二,只有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才能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者,人民抗战的阻力也才得以尽可能的减少。第三,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可以获得某种合法地位和进行公开活动的可能,这对于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也是有利的。第四,实行国共合作,对于争取它的后台和靠山美国英国与中国一起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有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估计,认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②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中日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了,"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亦然"③。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但那主要地是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维护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与人民敌对的立场是不变的,他们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军事"剿共"基本上是停止了,但想用和平的方法"溶化"共产党,让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丧失独立性,让共产党交出自己领导的政权和军队,使共产党发生和平演变,变成他们的政治附属品,而且他们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周恩来在回顾国共谈判情况时说过,西安事变以后,两党代表已有接触,"那时他(蒋介石)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西安事变以后的一个时期,国民党的方针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国民党三中全会"根绝赤祸"的决议有四条,即: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在两党谈判中,蒋介石只准我们编三个师,"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363页。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说法形似而实非。事实上,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是独立自主地作出的。1936年12月15日红军将领的通电虽曾一度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但周恩来在17日自西安致中央的电文中即提到"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中央随后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形势,在18日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即公开提出可以保障蒋的安全自由,19日中央又作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和我们的任务的党内指示。共产国际16日虽有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但因电码错乱未能译出。据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国际指示还未到"。中共中央是在20日才收到并译出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的电文的。

② 《毛泽东选集》,第3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54页。

直接指挥”;他甚至敢于说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这样的话。直到八一三以后,他才同意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发表在实际上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同时却又把这说成是“接纳”共产党,使之在“本党领导之下”有效忠国家之机会等等。“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他们还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① 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但由于害怕人民力量的动员将危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它所实行的是只要政府和军队抗战、不要人民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它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革新政治,改善民生,限制人民的抗日动员。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更把越来越多的力量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路线。它在峨嵋山上避战、观战;它以大军包围、封锁解放区;它的大批将领投敌后打起伪军的旗号向解放区进攻;它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等,并且先后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②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它有着当时中国的特点。③这个“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是国共两党,中心问题也是两党问题”④。而在两党的关系上,以下几个情况是尤其值得注意的:

第一,如前所述,两党都主张抗日,因而有实行联合的基础;但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着不同的抗战路线,因而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第二,两党都拥有政权和军队。两党的合作首先和主要的是两党领导的军队的合作。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敌后战场作战的任务,二者主要是战略上的配合,而不是战役战斗上的配合。“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一个特殊条件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这也是使得两党能够长期合作的因素之一”⑤。这一点是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的。

第三,国民党控制着中央政权。在形式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是隶属于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3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00—601页。
④ 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07页
⑤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00—601页。

"国民政府"之下的特区政府,人民军队也是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建制的。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借口政令、军令必须统一,指挥一切,竭力限制、削弱人民革命力量。

第四,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共同纲领和以国民党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不同,这一次国共合作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共同纲领,也没有形成确定的组织形式。这也使得国民党不能受到应有的约束,它还企图利用自己在国民政府中所占的统制地位,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

以上情况说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确实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经历了两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积累了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经验、在政治上完全成熟了的党。它没有因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仍然很反动、国民党正在采取限共、溶共的方针而拒绝与之在抗日斗争中进行合作;也没有因为合作而不对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不对国民党的限共、溶共的方针进行必要的斗争。它总结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的教训,对大资产阶级、对国民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是以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

中共中央在提出争取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适当联系,是使抗日救国运动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的主要关键"。① 为此,"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② 因为事情正如党的领导人洛甫(张闻天)所说的那样,"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借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③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往往会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狂起来。毛泽东也指出,"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那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④ 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当国民党将原先对人民革命力量主要施行赤裸裸的暴力镇压,转变到更多地采取限共、溶共的形式来反共,并且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来引诱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时,共产党内有一些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4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97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2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8页。

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们忘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本质，只看到它的抗日的一面，只看到它人多枪多，就以为抗日主要应当依靠它了。他们借口民族斗争高于一切，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左中右三个阶级集团和国共两党之间存在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歧，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认为阶级斗争会妨碍民族斗争的发展。他们反对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自愿送给国民党。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为了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为了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针对抗战初期共产党内一些人一度离开阶级观点看待民族斗争问题，从而发生阶级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个情况，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指出：

第一，从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必须明确，“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日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①

第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②

第三，“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③

毛泽东关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这些科学论述，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地执行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防止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525页、第5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2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39页。

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做到既统一,又独立。

一般地说来,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为反对某个共同敌人实行联合时,都必须清醒地看到彼此阶级利益相对立的方面,从而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特殊地说,由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的力量比较强大,在"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占据着发号施令的位置,而它们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又没有改变,不仅主要采取和平方式来限共、溶共、防共,而且有时还采取军事方式来限共、反共,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就显得尤其必要了。

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其具体涵义是什么呢?

首先是坚持思想上的独立性。共产党人承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①,坚决反对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的反动叫嚣。

其次是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共产党人必须巩固与发展同国民党的抗日联合,同时决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党必须实行自己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路线,批评和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路线。

再次是坚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曾经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形成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形式,同时又坚定地认为,"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②,而必须在斗争中把自己建设成为政治上坚强的、组织上巩固的、具有广大群众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绝对领导,而决不与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相融合。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8页。

②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8页。按:蒋介石曾向中国共产党代表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据此,中共中央"决定给一原则上拒绝的电,以打断蒋此种念头"。这就是上述致蒋介石电的由来。

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他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②

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中共中央就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谁领导谁的问题，乃是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扩大、抗日战争能否坚持和胜利的关键。而共产党要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因为没有被领导者的领导者是不存在的，不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党的领导权就只是一句空话。在国民党实行压迫人民、消极抗日的路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不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人民的力量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而"没有群众，共产党就没有力量"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独立自主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④

遵循着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毛泽东指出，只有实行这个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得到扩大和巩固。这里所说的进步势力，是指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

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这个策略总方针，中心的一环，是发展进步势力。因为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39—54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6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84页。

拔的基础"。①

应当看到,日本侵略中国,固然是由它的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但它敢于侵略中国,则是由于中国民众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因此,战胜日本的侵略,关键就是克服这个弱点,把人民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人数虽多,由于它脱离人民,质量不高,因而并没有多少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②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就必须以我为主,必须依靠党直接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

发展进步势力,最主要的是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广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还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发展抗日民主运动。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③

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主要讲一讲孤立顽固势力的问题。

统一战线中的顽固势力是指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他们所采取的是两面政策,即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对立;一面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摧残进步势力。而他们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他们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对日作战;在反共方面,他们既要反共,又不实行彻底破裂。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也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即:对他们抗日、联共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反共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党应当尽可能地保持同大资产阶级的抗日团结;由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党在同大资产阶级联合时决不能忽视必要的斗争;由于阶级斗争应当服从于民族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可以无条件和无限制地使用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反复指出,对待顽固派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④ "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丧失自己的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注意软硬的'分寸'。只有这种斗争可以打

① 《毛泽东选集》,第7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93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52页、第253页、第254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15页。

破一切'防共'的阴谋"。[①] "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②] 无条件的妥协退让,并不会改变顽固派的大资产阶级本性,并不会感化他们,以致使他们对人民大发善心,相反地,只会使他们认为革命者软弱可欺,而更加放肆地施行反共反进步的政策。"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其原因就在这里。

有理、有利、有节,这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而以有理为第一条。所谓有理,就是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即斗争的防御性。具体说来,就是决不主动挑起冲突,"不为天下先";人家挑衅,那就"退避三舍",主动退让一步;如果对方欺人太甚,那就坚决予以还击,因为"来而不往非礼也"。对待国民党挑起的局部武装冲突,也取这个立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武装磨擦者向我进攻的行动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与教训"。[③] 所谓有利,就是胜利的原则,不轻易开展无把握的斗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即斗争的局部性。所谓有节,就是休战的原则,斗争要适可而止,即斗争的暂时性。中共中央指出,"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即使是友军中最反动最顽固者,"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其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对某些部分,只要可能,应与之订立和解协定,就地解决原有争议[④]。当然,对于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必须做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必要的斗争,不仅不会破裂统一战线,而且可以使顽固派有所顾忌、畏惧而不敢过分压迫人民力量、不敢轻易破裂,这是巩固国共合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考虑到当时的根据地政权在形式上是国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人民军队在名义上也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领导机构打交道时,不得不区别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对策。具体说来,凡需要而且可能征得对方同意的事,就事先"请示",叫做"先奏后斩";凡必须办、事先"请示"可能不会获准、但办了也会认可的事,就先造成既成事实再"报告",叫做"先斩后奏";凡必须办、办了对方不会许可但也不致妨碍合作大局的事,就只办不说,叫做"暂时斩

① 洛甫(张闻天)语,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67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74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154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488 页。

而不奏";凡办了就会妨碍合作大局的事,就既不说也不办,叫做"不斩不奏"。这样做,既不致破裂统一战线,也不会束缚党和人民的手脚,在实践中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两次同国民党进行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于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共产党在当时由于还处于幼年时期,犯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没有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以致在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发动突然袭击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和反击,使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损失,革命也陷于失败的境地。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和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成熟。由于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就使得党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住了正确的航向,面对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统一战线仍然得到了坚持和巩固,人民革命力量不仅没有遭受严重损失,而且还在斗争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抗日战争结束时,人民军队的正规军已达120万人,民兵已达200万人,根据地已拥有一亿人口。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仅保证了党能够坚持抗日战争并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而且保证了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破裂国共关系、把内战强加给人民时,党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去,并且在短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七章

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

一、在斗争中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①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② “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③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④

毛泽东把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的经验、三个主要的法宝，并且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他说过，“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⑤。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这两个武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但是，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政党也有自己的幼年、青年、壮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5页。
③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35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613页。

年和老年。即使是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共产党,也不能不经历一个从幼稚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而党的走向成熟,一方而依靠在革命的实践中积累经验,一方面依靠在斗争中加强自身建设。

在中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既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也有着相当严重的困难。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有利条件,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结合党产生的特殊条件,主要讲了三条。这就是:

"第一,中国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在主观上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

"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现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第三,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许工人阶级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①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都是好的。基于这些条件,刘少奇认为,"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在主观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于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关于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困难,刘少奇在上述文章中只讲了一条,这就是:"在中国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份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并有若干游民成份,这是中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③ 由于中国党内存在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成份出身的成员,他们把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了党内来,这确实对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妨碍极大,确实为党内发生"左"右倾偏向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不过,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在事实上,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党员或者愿意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5 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235 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235 页。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党员，并不能保证自己就永远不犯错误。因为党内一些人之所以犯错误，不仅有社会阶级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根源。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刘少奇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历来的组织工作，都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而"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其原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而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运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① 这说明，中国党要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必须在自身建设上下大的力气。只有在斗争中经历长期的摸索，并通过对自身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党才能系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任务，从而使自己在政治上达到成熟。

其实，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使自己走向成熟，都需要在长期的斗争中加强自身建设，逐步地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的任务。只是中国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化费更大的气力、走更曲折的道路就是了。

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先关起门来把自身建设好了，再投入实际斗争的。中国党的建设，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党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的斗争中进行的，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② 当着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时，党的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反之就会后退一步。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走过了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

---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73—2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05页。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创始,到1949年10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经过了二十八年的时间。就党的建设的历史发展来说,这二十八年又可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为标志,区分为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两个阶段。

在遵议会议前的十四年间,党曾经经历了胜利和失败、前进和后退、扩大和缩小的两次反复。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接着又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建立,并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队伍也得到了扩大,即从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的53人,发展到1927年4月五大召开的5.8万人。由于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这次革命的后期,党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以致在大资产阶级举行叛变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而使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党的队伍也由此被打散,党员人数则从近六万人下降为一万人左右。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举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了复兴。随着斗争的深入和扩大,党员人数也发展到几十万,党领导的红军最多时成了拥有三十万人的队伍,并且建立了有一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这个时期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党所经受的考验是十分严峻的。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离开了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犯投降主义错误的人则与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了取消派,被清除出了党的队伍。同时,由于当时的党仍然处在幼年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犯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30年6月至9月犯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1月至1934年底犯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几次"左"倾错误都使中国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特别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错误更使中国的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党员人数也随之从几十万人下降为几万人。只是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党才通过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而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并由此彻底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遵义会议之后的十四年间,从总体上说来,党的历史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更大胜利的历史了。首先是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接着经过八年浴血抗战,赢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随后又用了四年时期,打败了美国政府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在这期间，党内虽也发生过某些错误，如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抗战初期王明的新投降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和整党中的"左"的偏向，等等，但这些错误都是局部性的，而且很快就得到纠正了。它们并没有能够从整体上妨碍革命事业的前进。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党的队伍也迅速扩大了。1945 年 4 月召开七大时已有党员 121 万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 120 万人，根据地也拥有了 1 亿人口。到 1949 年时，党员人数更发展到 440 万人，党成了新中国的执政党。党真正成为全国范围的、广泛群众性的、政治上完全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了。

关于党的建设究竟应当怎样进行这个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同我们党成立以来的斗争史，"不能分离的"。[①] 上述党的历史发展情况表明，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不仅关系着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折，而且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前进与后退，党的队伍的扩大与缩小。所以，说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这是符合实际的。离开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历史考察，就不可能弄清楚党的建设的发展。

我们知道，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成了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捍卫者。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也就在斗争中逐步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汇集起来。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那种险恶的环境下，象贺龙、叶剑英、徐特立这样一些中华民族的精英也仍然勇敢地加入了党的队伍。"在(十年)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还是有许多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切证明我们党的力量是伟大的"。[②] 经过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更赢得了中国人民日益广泛而深刻的信赖，终于成为全中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公认的政治领袖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还几经反复、党的建设也经历了曲折的路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反动势力一时过于强大，一方面是党自身犯了错误。当着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时，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奇怪的。毛泽东后来在回忆建党初期的情况时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

① 《毛泽东选集》，第 603 页。
②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294 页

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① 共产党也不例外。问题并不在于共产党会不会犯错误,而在于它怎样对待错误。犯错误固然是消极的事情,如果能够正确对待,也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② 列宁说过:"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③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它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作掩饰,它是善于总结经验,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部分就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④ 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⑤ 由于党敢于以彻底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地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党也就一次又一次地使失败转化为成功,而党自身也由此变得聪明起来,成熟起来,成为得到人民群众信任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的历史道路并不是笔直的、一帆风顺的。它经受过大风大浪的考验。它是在同残暴的反动势力进行长期的艰苦战斗的过程中,在同自己的缺点、错误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加强自身的建设,使自己巩固和壮大起来的。回顾党的这个艰苦的历程,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了;唯其如此,它也就由于经受了"千锤百炼"而使自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17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0页。

已变得无比的坚强。试想，既然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那种极端险恶的环境下都坚持下来了，长征途中那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都被征服了，东方头号强国日本派出的一百几十万侵略军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武装的八百万中国反动军队都被战胜了；既然以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得到共产国际、斯大林支持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都被克服了……那么，还有什么困难能够压倒这个党，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个党在自己选定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胜利地向前迈进呢？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是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它在自身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也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同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我们知道，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①] 这是符合实际的。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新阶段》的下半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1943 年 4 月 3 日《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 年 6 月 1 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我们党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确的建党路线。我们党实行了这条路线，因而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因而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②]。

二、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应当怎样把握住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应当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怎样的要求？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把党建设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在党的创建者的思想上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比如，李大钊说过，我们要把"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要建立的组织"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贫民的劳动家的政党"。陈独秀更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

①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讲座》，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9 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414—415 页。

先锋队和指导者”。蔡和森也说过,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政党,它应当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正因为如此,党的一大即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纲领,明确地规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作为党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党的二大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①。党的七大更对党的性质作出了完整的科学界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②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基于对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阶级与政党的关系的科学认识。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早已揭示出,人类社会必然要从阶级社会走向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趋势。能够领导这种社会变革的力量,只有工人阶级。它同现代大工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能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别的阶级所无法取代的。③ 而工人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这种历史使命,就必须组成自己的先锋队,即建立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因为事情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④ 加入党的,不可能是也不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全体,而只能是这个阶级中的自觉的积极分子。实际上,“能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只有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工人阶级需要党,党也离不开工人阶级。明确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我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6页。
②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15页。
③ 《求是》1990年第13期。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473—474页。

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肩负的崇高使命，把握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精髓，保证党的建设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而在近代社会中，阶级通常是政党来领导的。近代世界和近代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政党总是建立在一定阶级的基础之上，总是体现着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总是由一定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分子所组成的。所谓党性，也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政党就必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当然，“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② 这就是说，阶级没有了，政党也没有了，超阶级的政党就是在未来社会中也是不存在的。否定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全民党”之类，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其结果，只能是使共产党蜕化变质，丧失自己的先进性，从而使自己不可能担当起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的历史任务。所以，是不是坚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对能否按照正确方向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关键性意义。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含混和动摇的。

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党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③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的科学分析，揭示了共产主义必定要实现的历史前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唯独共产党才具有的目标，是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包括那些以社会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党的重要标志。当然，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土地上开始自己的战斗的，它不可能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直接的奋斗目标，它首先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④。他就是把有没有

① 《求是》1990年第13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46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8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76页。

"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作为共产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点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否定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就可能将共产党混同于其他政党,就可能降低党的政治水准,直至使自己变质。这是不能容许的。共产党员必须"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他们"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①

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列宁早就说过,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工人接受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奴役。共产党之所以区别于任何自发的工人组织,具有先进性,就是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这是共产党的根本特征和主要优势。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②。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由于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共产党才能够通晓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奋斗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引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胜利的战斗。马克思主义需要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斗争中得到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也不容许任意篡改。如果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党就失去了自己的先进性,就难免受自发势力的支配,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被篡改,"如果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党内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③ 正因为如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斗争中把这个科学不断地推向前进,这是共产党的神圣的责任。

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党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

① 《陈云文选》第1卷,第1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417页。

也就不能得到解放”。[①] 这就是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更确切地说，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从而真正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②]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所说的党的政策，就是党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所确定的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应当指出，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是立党为私，还是立党为公？是为资产阶级、为少数剥削者服务，还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这是共产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③]；“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④] 我们看到，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对于同一个问题，往往有各种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看法和主张，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判断这些看法和主张的是非时，重要的也就是要看它是符合少数人的利益还是多数人的利益，是符合剥削阶级的利益还是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为了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重要的一条就是应当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研究问题时注意提出并思考列宁所说的“对谁有利”这个要点。因为当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人们就无法在那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把握基本的指导性的线索，并由此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即本质，就难免迷失前进的方向，从而在政治上犯错误。

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党必须密切地联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并且带领他们前进。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作他们的先锋队，这个斗争将由于得不到正确的领导而不可避免地陷于失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先锋队，共产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必须同他们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094—109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096页。

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①] 必须认识,共产党的事业是人民群众切身的事业,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无论怎样正确,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党的力量的源泉。失去了这种联系,党就失去了自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份量,就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党的生命也就在事实上终结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结束语中曾举安泰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安泰是一个不可战胜的英雄,他的无穷的力量是从大地母亲那里取得的,一旦他被托举起来,离开大地,他就被打败了,死亡了。党也是一样。一旦与哺育自己的大地母亲——人民群众相隔离,它就不再有力量,就会在政治上走向死亡。党的七大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是讲得很深刻的。党为了履行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职责,除了要制定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纲领、路线、政策以外,还必须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②] 不启发和等待群众的觉悟,不相信群众必须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站到群众的头上发号施令,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并行动起来,采取这种命令主义的作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想要积极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实际上并不能使党真正带领群众前进,只能使党脱离群众,甚至使群众对党发生怨恨。"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害了慢性病"。[③] 崇拜群众的自发性,追随群众的自发行动,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跟在群众的自发运动后面跑,采取这种尾巴主义的作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想要照顾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脱离群众,实际上否定了党必须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归根到底也是脱离群众的,因为群众不需要这种不能领导自己前进的人们来充当自己的向导。

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党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来吸收并教育自己的成员。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必须从无产阶级中发现和培育先进分子,吸收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同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095页。

如果他拥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交纳党费，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也是可以成为党员的；但是，他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必须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否定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必然会降低党员的标准，使党失去自己应有的先进性，从而瓦解党的战斗力。

由此可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对于党的建设确实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改变了党的这个性质，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就不可能在革命斗争中起领导作用了，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列宁指出："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①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它不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它坚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密切地联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它严格地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来发展党员，建设自己的队伍。它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集体。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一个朗如白画的真理。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无产阶级先锋性质，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没有疑问的。为了讲清楚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下面，我还想就一些人常常提出的有关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两个疑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初成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多属有产阶级出身。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说这个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由于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首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几乎是各国的通例。中国的上述情况，也是合乎规律的。

第二，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原本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奉者，经过十月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第246页。

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他们认识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才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他们不是作为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是以归附于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的身份,去从事创建党的工作,参加党的活动的。而且,这种建党工作,并不是与工人无关的孤立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这正是建党过程的主要内容。

第三,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密切了与本阶级的联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这样,即使就党员的出身来说,工人成份也占了大多数。据1926年11月的统计,在18526名党员中,工人成份的占60%;1927年4—5月党召开五大时,党员人数发展到约58000人,其中工人成份占53.8%。与此同时,280万工人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工会,整个工人阶级都在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了。所以,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的。

有人提出: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农村活动,它的党员主要由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份所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这个党仍然是工人阶级政党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答复。文章指出,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党员中农民出身的成份占了多数这个事实,确实使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大量反映出来,这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文章然后着重讲了以下三点:

第一,无产阶级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成员以补充自己的队伍,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中国的情况更其如此。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多数;但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由于阶级地位和阶级力量的不同,中国却只有两头即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各有一个强大的党,而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则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党。因此,大批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寻找出路,这是毫不足怪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完全有能力来改造这些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使之无产阶级化。

第二,不应当忘记,中国革命斗争的环境是极端残酷的。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共产党员,意味着必须随时作好流血牺牲的精神准备。这种环境,相当有力地保证了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的人绝大多数是真诚地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革命战士,而极大地减少了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的可能。同时,还应当看到,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因此,党员中的多数在当时是被组织在革命军队或革命武装斗争总体系之内的。如果说,从事大工业生产有助于养成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组织性、纪律性;那么,过严格的革命军人的生活,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集体主义的战斗生活,无疑也有助于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说,艰苦的生活和战争的环境也给党的建设提供了某种有利的条件。

第三,更重要的还在于,"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刘少奇:《论党》)。促使党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是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是党的战略目标的改变。党的工作重心是变了,但是党的纲领和宗旨并没有变,党吸收党员的标准没有变。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到党内,它在党内毕竟不是一种合法的存在。它必须被改造,而且事实证明也是可以被改造的。为了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党不仅加强了经常性的思想教育,而且开展过多次的整风运动。这样,就使得党在农村和战争的环境下,在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住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那种认为党到了农村、党就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三、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许多方面。而党的思想建设是它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一贯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把党的思想摆在党的建设的首要地位,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

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 刘少奇也强调:"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②

党要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首要的条件,是必须制定并贯彻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只有这样,党才能为革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这个目标的途径,才能为党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提供政治的基础。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一是要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需要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无疑地,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它"。③ 不改造思想,不具有坚定纯洁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理想,就不可能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也就不可能制定并自觉地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样,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党要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保持全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团结人民的坚强核心,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全党同志对于党的政治任务、政治路线有共同的认识,对于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维护党的纪律有高度的自觉性。不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帮助全党同志在思想上达到一致,要求他们做到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是不可能的。如果单纯依靠强制性的纪律,一时取得了形式上的一致,这种一致也是不巩固的;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党就不可能有生气,有创造精神,也就不可能有坚强的战斗力。

党要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重要的条件之一,还必须形成并发扬自己的优良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党的优良作风,体现着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9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09页。

反映着党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工作态度、道德规范，是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党的和党员的行动中的表现。而为了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关键仍然是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党要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还需要具备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这就是造就一支忠于马克思主义、了解中国国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干部队伍。而离开了党的思想建设，这样一支干部队伍是根本不可能建设起来的。

由此可见，首先和着重地进行党的思想建设，这是十分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环境，这样做更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人数本来就很少，不及全人口的百分之一；1927 年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又被迫转入农村，党的主要部分是在农村环境中活动。因此，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份很少。一方面，如果“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就占了大多数”，这个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是有血肉联系的，这些加入党的无产者半无产者有着很强的革命要求，他们可以接受党的教育，在党的领导下从事艰苦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确实比较薄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1928 年 6 月党的六大指出，“在党员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这种情况“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时常经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来源”。① 对于这个问题，1945 年 4 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过很深入的分析。《决议》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407 页

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地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经验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些情况表明,"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的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 1929 年 12 月,他在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② 为了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以便彻底地"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他进一步提出了共产党员必须真正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他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7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85 页。

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① 显然，这种情况对于党的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应当指出，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情况，不仅可以发生在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身上，而且也可能发生在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党员身上，因为党员的无产阶级出身，并不能决定他自然具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要做到这一点，是必须经过学习和在实际斗争中进行自我改造的。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曾经强调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②

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生长出来的”。③ 它没有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它不能不同各种社会力量发生各种关系。不仅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党，给党以重大的影响；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也通过某种渠道同党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对党施加各种影响。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有必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但由于国民党从以军事“剿共”为主转为主要以限共、“溶共”的形式反共，对共产党干部施行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结果就使得一部分党员滋长了不愿继续过以往那种艰苦的斗争生活的情绪，发生了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切实在党内加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教育，坚决反对阶级投降主义。这就是说，党“除开进行社会斗争，反对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势力和东西以外，还必须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党内某些动摇的不坚定的分子把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反映到党内来”④；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使自己、使自己的成员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是一项多么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前进的过程中所以经历各种曲折，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说过，这除了有上述的社会原因以外，还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经着重地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8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75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50页。
④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510页。

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党员之所以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由于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是由于当时的党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还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这就是说,党要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要做到少犯错误和力求避免犯大的错误,一方面固然要靠在斗争中逐步地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要靠教育全党同志自觉地掌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虚心地去领会和总结这些经验。这个情况,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强调必须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和基本经验。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主要地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使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端正思想路线,增强党性、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以便制定并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实现党的纲领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而奋斗。

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端正思想路线,党才能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来,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也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这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中,要求全党必须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并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作为这次加强党的建设的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他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①

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首先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它的精神实质。这是把这个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前提。陈云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著作,"一本一本读懂的办法很重要"。"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首

① 《毛泽东选集》,第813页。

先要掌握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然后才能使之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①

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认为，党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② 人们在政治上的坚定性，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性。离开了革命理论的指导，人们就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陷入盲目性，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所以，蔑视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到实践的惩罚的。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认识到了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过，主义好比一面旗帜，只有旗帜树立起来了，人们才有所仰望，才知所趋赴。他强调，党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哲学根据。他自己，自从在1920年夏天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再没有动摇过。1921年党的一大制定的纲领，就十分注意维护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要求志愿加入党的人们“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③ 在党的幼年时期，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理论准备不够，党在实际斗争中曾经走过不少弯路。正是考虑到这个方面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强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应当只是学习它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④。张闻天在这次全会上也讲过类似的话。他指出，“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真正精通的马列主义者，中国革命问题就可以说解决了一半。所以必须用一切方法使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在学校中学习马列主义”。“任何干部均应以‘不知为不知’，放下自己的

① 《陈云文选》第1卷，第189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74页，第31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33页。

架子,老老实实的来学习"。① 在这方面,毛泽东本人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在延安时期,他以极大的热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他还直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正是在他的带领和培育下,中国成长起来了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引下走向胜利的。对于这个问题,陈云作过这样的回忆:"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② 他还说:"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③ 陈云的这番话,代表了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感受。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不是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而是一般的指导原理;不是可以演绎的抽象结论,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④ 他还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去调查研究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总结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上的创造,并以这种中国化了的、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去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前进。按照这个思想原则办事,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就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为此,他要求把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8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285页。
③ 陈云:《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求是》1990年第8期。
④ 《列宁全集》第47卷,第464页

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同认真地过细地研究当前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1941年开始发动整风运动时，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赋予"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以全新的深刻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正是遵循着这样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的理论，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中国革命引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与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相对立的，是主观主义的、也就是实际工作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内那些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的人们，在理论上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他们并不象有的外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那样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回到康德去"、主张经验批判主义等等，但他们办事并不从实际出发，而是凭主观想象，凭一时的热情，凭死的书本，这就在实际上离开唯物主义面走向了唯心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种主观主义称作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是适当的。毛泽东强调地指出，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对于党的事业、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为它是中国党内产生"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还在1929年12月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他就已经指明，"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在《实践论》中，他再次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② 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就会犯右的错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就会犯"左"的错误。基于以上的这些分析，毛泽东认为，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在整风运动中，他是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中心任务提出来的。他指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95页。

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 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②] 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担负起伟大的革命任务,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

这种主观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从共产国际的具体指令出发。它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即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一绝对要求,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个别词句、共产国际的具体指令当做教条、当做公式到处生搬硬套,而丝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指令是否合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认为怀疑共产国际的某些指令,就是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的语言来讲话;声称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指明了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解决问题的道路和方法,但人们不可能离开实践从中逻辑地推论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因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他们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演绎出对于各种问题的具体答案,这就在实际上否认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唯心主义。他们也不懂得,如同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一样,任何一般都是个别,即使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也是必须与各国的实际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他们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相互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变成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这样,他们就颠倒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从而使自己离开了辩证法。他们在论证问题时,也列举一些事实。但他们不是从对全部事实的系统分析中形成自己的观点,而只是任意地选取某些事实来证明自己希望得出的结论。这种方法,仍然是主观主义的。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③] 所以,"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事实是零碎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800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7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

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为了剥夺教条主义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资本，毛泽东特别讲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②] 而我们所要的理论家应当“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③] 不了解实际、只会背诵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无疑地，书本知识是重要的、宝贵的，但如果一个人仅仅有书本知识，那么他的知识还是不完全的。这样的人，也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王明等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呢？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经验。什么是工人，什么是农民，什么打仗，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拿打仗来说，他们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无视敌强我弱这个事实，主张打阵地战，同强敌拼消耗。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碰了钉子以后，他们中有的人还不想承认错误。陈云讲过一个故事：“在遵义会议时期，一个同志硬说毛主席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主席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那个同志哑口无言，因为他本人连孙子兵法这部书也没有见过。”本来，实际经验不多也不要紧，经验是可以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的，但应当认识到这是一个缺点，是需要加以克服的。毛泽东说：“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④]

经验主义的特点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局部经验无条件地当做普遍真理，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经验主义承认认识开始于感性经验，从这点来看，它是唯物主义的，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就认识论的全体来说，它仍然是错误的，它只承认感性认识，不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而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批评经验主义者是一些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1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1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816页。

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①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② 因此,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和反对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应当同时并进。

怎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呢?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就必须使只有现成书本上的知识和偏于感性的局部的知识这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向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③。总之,要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重要的,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要做好这两件大事,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所以,他认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④ 为此,他提议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91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
③ 《毛泽东选集》,第818—81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802页。

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1941年8月，中共中央还专门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论述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设置调查研究机关的任务，列举收集材料的种种方法，要求在全党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浓厚的风气。毛泽东并将自己在十年内战时期所作的农村调查材料集结成册出版发行，以便为全党干部"指出一个了解下层的方法"。张闻天响应中央的号召，与几个同志一起，从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北、陕北进行调查研究，归来时写了《出发归来记》，总结自己的体会。他说，过去我从未怀疑自己是一个唯物论者，但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正是唯心论者的特点，所以自我改造，"还得从做一个真正唯物论者开始"。"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而"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这个体会，是很深刻的。①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与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提出端正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自觉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抓住了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最关紧要的问题，从而为党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所作的一项杰出的贡献。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本来就是很高的，一旦把握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他们贯彻执行正确路线、抵制"左"右倾错误的自觉性，从根本上就会得到提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得到极大的巩固，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这个作风，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培育下，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党的建设所取得的一项丰硕的成果。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除了要端正思想路线、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为党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提供思想基础而外，它的一个直接的和重要的目

① 《张闻天选集》，第318—319页、第321页、第322页。

的,就是要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使他们能够在带领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在进行自身建设时,从来都是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分子的。列宁说过,"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①]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时所遵循的原则。它认为,"在党的建设上,要解释一个原则问题,即党员与同情者的区别"。"通俗的说,便是党外要多兵",即党要密切联系群众,拥有众多的同情者,"党内要精兵",即发展党员要重质量而不追求数量。因为"假若降低党的水平,来追求党员的数目字,那会使党成为大而无战斗力的党"。[②]

当然,不可能设想,一个人必须首先彻底无产阶级化、马克思主义化了,而后才能入党。如果这样要求,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只能是一个狭隘的宗派和小团体了。事实上,按照党章的规定,只要承认党纲、党章,交纳党费,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内担负一定工作的人,就可以成为党员;尽管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能成为党员。但是,还有必要指出,"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只是做一个起码的够格的共产党员,而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力求进步","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③] 必须明确,一个人自愿加入共产党,这就意味着他决心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在入党时,可能还带有若干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与此同时,他必须承认,这些思想在党内是"不合法"的,是必须加以改造的。因为如果不改造这些思想,他就不可能在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时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他也就不可能充分地履行作为一个党员的义务。列宁说过,"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④] 为了使党真正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对自己的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1939 年 5 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共产党员的标准有六条,这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1 页。
②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在 1989 年版,第 214 页、第 249 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99 页、第 101—102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272 页。

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的义务有四条,这就是: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活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政策;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和改造,"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①] 其目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使自己成为能够全面履行共产党员义务的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

下面就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作一点说明。

(一)关于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问题。

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党。作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为实现共产主义面奋斗,这是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责任。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是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只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为了走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要走极其漫长的道路。这个斗争,将是十分艰苦的,中间不能不经历许多曲折,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忍受许多的痛苦,作出必要的牺牲。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对斗争的这种长期性、艰苦性、曲折性作好应有的精神准备。正如李大钊所说的,"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②] 还要看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而旧世界的现实是丑恶的。"我们改造世界,不能离开现实,不能不顾现实,更不能逃避现实,也不能向丑恶的现实投降"。我们应当"正视现实,认识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向丑恶的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18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92页。

现实斗争,改造现实,逐步地达到我们的理想"。[①] 共产党员对于斗争的这种复杂性,也必须作好应有的精神准备。

历史表明,在革命高潮时期,许多人都来靠拢党,要求加入党的队伍;而在革命遭遇严重挫折以至失败时,那些同路人就纷纷离开党了,更坏的还到敌人的报刊上去作公开的忏悔,有的甚至作出出卖党、出卖同志的罪恶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只有那些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人,继续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不屈的战斗。

共产党人的这种坚定的革命精神,这种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根源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对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们懂得,革命的环境越是艰难,革命者的责任就越是重大。正是这种严肃的使命感,驱使他们在黑暗中勇敢地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同时,这种精神也根源于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矛盾的状况与形势发展的趋向所作的全面的科学分析,和对于广大人民不可征服的革命意志的坚定信念。他们懂得,只要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并且继续发展,革命的火焰就是扑不灭的,革命的低潮就是暂时的,革命的高潮就是不可避免地会要到来的。一个革命者,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夏明翰烈士写下了这样的遗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党的许多先辈们,也正是怀着这种崇高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慷慨赴死、英勇就义的。陈毅说过,"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多了",但是,"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是不愧英雄的称号的,因为他们能够经受住困难和失败的考验。

除了经受住困难和失败的考验外,共产党人还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在斗争中赢得了某种胜利,这自然是令人感奋的,但如果对它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包袱、成为负担,从中引出相反的结果来。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全国人民兴起了抗日运动,又有一些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26页。

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王明路线的错误；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即王明新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1944年，史学家郭沫若为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在1645年陷于失败。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有单行本。毛泽东说，“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1949年3月，即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进一步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② 实践证明，提出这个告诫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对于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事实上，只有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怀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人，才能持久地保持住自己的革命精神，才能经得起胜利和成功的考验。我们知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这几乎成了一种通例，很少有例外。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打倒当前的敌人，使自己上升为统治者，他们就达成了自己的全部目的，今后只是如何利用这种权力来为自己牟利的问题了。然而，“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决不能这样”。“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面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它能够使革命进行到底，从人类社会中消灭一切剥削，消除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③ 取得某种胜利，是不值得骄傲的，因为更值得骄傲的事情还在后头；就是取得了政权，也不值得骄傲，因为这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9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438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97页、第98页

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是新的革命的开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必须将这一点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事实上,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乃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它促使他们"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②

(二)关于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的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而外,它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根本宗旨。这也应当是一切共产党员的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们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原则,是中国古代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提出来的。他们所考虑的,并不只是个人的眼前的利益、主要地是他们所属阶级的长远的利益。他们认为,为了封建阶级的长治久安,必要时应当作出自我牺牲。在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崇尚社会理想、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他们并非都是营营求利的市侩和提倡极端利己主义的庸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因为他们的眼界还没有冲破资产阶级的局限,他们奋斗的结局并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藩篱。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共产党人又是这个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分子,他们应当具有更加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不仅不能只是追求个人的眼前利益,而且也不能去维护某个剥削阶级或某个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应当自觉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的代表者和捍卫者。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③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否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标准。

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38—1439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97页、第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22页。

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在为悼念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而写的《为人民服务》和为悼念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所写的《纪念白求恩》等文中，他对共产党人的人生哲学，对共产党人关于人生价值的理解，作了很准确的表述。他讲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②。他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③。

共产党人要确立并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一方面要注意克服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个人主义；另一方面要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对自己的侵蚀。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内，党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份，并使其有一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如果由于执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就放弃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放弃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放弃对于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那么，一部分共产党员就可能蜕化变质，党就可能严重地脱离群众，就不可能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要求共产党员无条件地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党根本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期，李大钊就指出，“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④，“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⑤ 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热爱生活，才投身于反对阻碍生活前进的黑暗势力的斗争；正是因为希望人民大众都能享有美好的生活，他们才甘愿在必要时牺牲自己。他们是富于理想、感情、上进心和个性特征的人。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94—10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60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438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503页。

们个人的合理要求也是受到党的保护的。只是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不能够离开党的事业的发展去争取什么个人的独立发展"，他们的个人利益也"完全不应该在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实现出来"就是了。

从历史上看，任何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革命和革新的事业要想取得成功，没有一批为之献身的仁人志士，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的大地上推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它的成员也必须成为为中国的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仁人志士，这是不应当有疑问的。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部分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党章第二条，并且把"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①，列为党员的一项义务。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才能使广大的共产党员成为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前进的骨干力量，而党也才能真正成为受到群众信赖的中国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关于加强组织观念、模范地遵守党和革命政府的纪律的问题。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

党担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而艰难的改造世界的任务。为此，就必须摧垮站在社会进化面前的敌人。面"我们的敌人是强有力的，是组织得很好的，有全副武装的，而且有旧社会一切制度、思想、文化、习惯等等力量支持他们。要战胜这样的敌人，无产阶级自己必须有强大而坚固的统一的组织，必须有铁的纪律"。②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应当包括党员在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修养在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具有坚强的组织观念。因为他是自愿加入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的，他应当把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看作是自己对于党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③ 毛泽东在他所起草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集，第118页、第119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69—170页。
③ 《陈云文选》第1卷，第139页。

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了纠正非组织观念的问题，并且强调“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在《反对自由主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把“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列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并且号召共产党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

要求共产党员加强自我修养、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并不是要求他们象封建士大夫那样去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而是要求他们结合革命实践，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历来是很严格的。它不仅规定党员必须在一个支部中生活，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民主生活会，结合日常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进行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而且还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方式，使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集中解决党内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突出问题。比如，抗日时期的整风运动，主要的任务是在于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党员进一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解放时期的整党运动，主要是为了解决地方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组织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个方向，领导他们搞好土地改革，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这两次整风运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长期在农村环境中活动、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份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共产国际是有怀疑的。周恩来回忆说，“一九四〇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①] 但是，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结合斗争实践，切实加强了自身建设，不仅始终保持住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而且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这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创举，一个伟大的成功。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要能够团结中国人民去进行胜利的革命战斗，不仅依靠政治路线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179页。

的正确,而且依靠组织上的巩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①] 一个党,即使拥有数量广大的成员,如果允许人们各行其是,那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

无疑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是它在组织上的统一的基础。"先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证组织上的统一"。但是,"组织上的统一又能帮助和推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巩固思想上的一致"。怎样才能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统一呢?刘少奇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是保障党内团结和统一最必要的条件"。[②]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是党的组织形式、结合方式和组织制度。党有各部分的结构,有众多的成员。党并不是各部分结构的杂乱的混合,也不是各个成员的简单的总和;这些结构,这些党员,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它"反映着党的矛盾的结构",反映着"党员与党、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的矛盾关系。"[③] 它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重要准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它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是实现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因此,正确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他们所起草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国际工人组织的章程,是体现了既要民主又要集中的思想的。列宁就说过,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④]。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我们要进行顽强的工作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强调,"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⑤] 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成立初期,就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组织原则。1927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

①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127 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22 页、第 175 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21 页、第 326 页。
④ 参见《党的建设若干问题讲座》,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4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54 页。

正章程决议案》中，在“党的建设”一章的开头部分，就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党的六大不仅在党章中重申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而且对它的根本原则作了初步的说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更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明确的论证和具体的阐释。它规定：“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设起来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基本条件如下：(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二)党的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①

无产阶级战斗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就在于它有坚强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能够在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自己就应当首先成为在集中指导下的、具有统一意志和能够统一行动的战斗集体。“什么叫集中？”毛泽东指出：“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②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些社会主义者曾经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对权威原则、对集中统一的原则大张挞伐。对此，恩格斯说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现代化的大生产就是根本不能进行的。绝对地否定权威的论调，正是表现了一些人对于现代社会的无知。他指出：“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③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际斗争的经验，是深深地懂得集中统一的重要性的。他们反复地指明：“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能顺利实现。”④ 在这种情况下，党就不成其为党，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就同一个俱乐部差不多了。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⑤

实现党的集中统一，必然要求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部分服从中央，等等。这样一来，是不是不民主呢？刘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22—12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1—55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
⑤ 《陈云文选》第1卷，第276页。

少奇指出,这"不是不民主,相反,这恰恰是民主"。只有那些拒绝服从而根据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去自由行动的人,才是不讲民主的。"因为他们不服从多数与整体,不尊重多数与整体的意见和决定,他们自由行动去破坏与妨害多数和整体,他们或者还要多数与整体去服从他们少数的决定与意见。这样作,绝不是党内的民主,则是党内民主的破坏(当然也就是破坏集中),而是不民主"。①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进步的政党,它要求实行集中统一,要求服从这种集中统一,这绝不是意味着要在党内推行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绝不意味着要在党内建立封建帮会内部的人身依附关系。它的集中,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的,也只能是和必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本来,党的领导机关就是由党员或党员代表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必须是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才能制定出来并获得通过的。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的集中指挥的权力,并不是自封的,而"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②

事实上,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党的正确的决策,是只有遵循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才能作出的。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这也就是说,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即使实行集中统一,这种集中统一也"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③ 陈云也说过,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④

党内民主生活的活跃,是党朝气蓬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3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9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
④ 《陈云文选》第2卷,第242页。

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因此，他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① 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也作过很好的论述。他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② 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都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党的集中制并不是个人专制主义，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的。但是，我们也有必要指出，如果党内生活违反了民主的原则，集中制就可能蜕化，以至形成个人专制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过：“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③ 正因为这样，在党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家长制”式的统治。比如，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为了推行投降主义，就竭力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甚至施展“家长”式的威风，把共青团中央的意见书撕成碎片，扔到地上去。又如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央为了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更经常地把党内的不同意见任意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背离民主原则的集中制，为错误路线在一个时期内能以得到贯彻执行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必须指出，这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根本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种倾向危害极大，必须坚决地加以防止和纠正。为了防止和纠正这种倾向，一方面，要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以便全党同志都来维护党内的民主生活，抵制个人专制；一方面，要使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化，使

① 《毛泽东选集》，第528—52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29页。

党员懂得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个制度不得违反,如有违反,则坚决按党的纪律予以制裁。也正是为了预防和纠正这种倾向,刘少奇提出,党的领导者、党的领导机关应该特别注意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下列各原则:第一,党的领导者,或党的领导机关,首先要服从大多数,服从多数委员和多数党员;第二,领导机关应当合法产生。或者由民主选举,经上级批准,或者直接由上级指定委任。领导机关应向所属党员定期作报告,并请大家审查;第三,要注意在党内开展自我批评与讨论,批评领导机关的工作;第四,要尊重下级组织,尊重党员个人的权利和职权;第五,原则上多做说服工作,对同志的态度和方式要好,要虚心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执行这些原则,有利于维护党内的正常生活,增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所以是十分必要的。

党内的民主生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而不是发展自由主义,不是发展极端民主化倾向和无政府状态,不是发展党内那些不负责的非组织、非政治、非原则的批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与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一起,构成党内生活中的两个极端,而且前者往往是作为后者的一种惩罚而出现的。周恩来在十年内战初期就讲过,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① 显然,这种倾向对于党的事业是非常有害的。党的民主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高度集中的指导,都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发扬党内民主,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都不允许导致瓦解党的团结、松懈党的斗志的结果,都必须防止为党内的分裂主义者和野心家、投机家提供可乘之机。毛泽东在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案中,就曾经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决议强调,"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②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矛盾的统一体。它是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对立统一。它既反对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又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按照民主集中制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8—89页。

的原则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这就是要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① 民主和集中，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绝对分离的。至于什么时候强调民主多一点，什么时候强调集中多一点，这取决于具体的斗争环境。比如，抗战前夕，毛泽东说过，“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② 又如，在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的时期，中共中央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治权，这对于发挥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形势的发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战争的正规化程度大为提高，这种状况，要求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尽管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可能有所变化，但无论什么时候，民主和集中都是统一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政治路线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般说来，什么时候政治路线正确，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也比较好；反过来，什么时候正确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较少出现偏差，即使出现了也易于纠正。③ 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党就不能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党就会丧失自身的战斗力。正因为如此，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党的建设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自觉地维护民主集中制，严格地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也就成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的一种政治责任。“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只表现在他有最高的最明确的原则性上，而且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上”。④

共产党员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如果认为党的组织、党员的多数、党的上级以至中央组织在政治上错了，党员个人、党员的少数、党的下级组织和部分组织是不是仍然要服从呢？答复是：在一般情况下，仍然要这么办，仍然要服从。因为：

第一，党的组织、党员的多数、党的上级以至中央组织在政治上是不是真的错了，这是不能由党员个人或党员的少数、党的下级或部分组织任意自行论定的。“如果你认为错了你就不服从，他认为错了他就不服从，那就没有党，只有散伙了

① 《陈云文选》第1卷，第1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78页。
③ 参见《求是》1990年第13期。
④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02页。

事。"在这方面,党的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对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不赞成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而错误地主张南下,向川康边境退却,但他却声称中央犯了退却逃跑路线的错误,并由此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走上了极其严重的右倾分裂主义的道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① 他强调,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必须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文件,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直至中央政治局成员,均应严格遵照有关工作规则办事,均应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第二,党的组织、党员的多数、党的上级以至中央组织在政治上确实错了,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② 在这种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刘少奇认为,"退一步讲,即使大多数和上级或中央真错了,你也还要服从,先照错误的去执行。如果不这样,就会引起组织上的分裂,行动上的不一致,削弱了党的力量"。当然,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你可以而且应当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在服从的时候,也要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尽量减少错误可能造成的后果。"进一步讲,即使你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为了实行你的对的意见,也只有服从上级。否则离开了大多数,离开了党,你也就无从去说服大多数和党,你的意见也就无从实行。"③ 这也就是说,要使少数人的正确意见为多数人所接受,直至变成党的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52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4—835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31页。

志，需要有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说服、教育、等待多数人觉悟的过程。在这里，需要等待，需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而不是走组织上分裂的道路。周恩来也论证过同样的观点。他并且曾举毛泽东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比如，当时，“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①。毛主席这样做，既坚持了真理，又遵守了纪律，党和红军没有发生分裂，错误也得到了纠正。刘少奇也曾举过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在党成立的初期，他在一个地方做工人运动的工作。那个地方的大多数工人和支部的党员都主张发动罢工，而根据对客观情况的分析，他认为罢工是肯定要失败的。但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而且把他选为罢工委员会主席，要他下罢工的命令。他说，如果照我个人的意见去做，“那么我就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自己破坏了组织原则，而且造成自己的孤立，脱离了支部和工人大众”。其结果，也并不能阻止罢工的发动。“因此我决定照大家的意见发动了罢工”，只是在事先给大家讲清了这次罢工可能造成的后果。“后来，罢工果然失败了。但是，因为在事先已有预防，所以损失不大。大多数同志在失败后，想起了我早先的估计，因此对我更信任了。”②

考虑到“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是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③，因此，在党内，应当允许人讲话，允许党员向上级直至中央申诉自己的意见，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其前提是，第一，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不违反纪律；第二，不搞秘密集团活动。毛泽东认为，“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④ 在这种情况下让他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7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53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7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4—835页。

们保留意见,就是保护了他们拥护真理、坚持真理的权利。这对于发扬党员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对于在党内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良好风气,对于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以便推动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应当相信,党员和干部的大多数在主观上是要革命的,是愿意中国革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的。许多错误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人们缺乏经验,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所以,如果党员的多数的意见、党的上级组织以至中央的决断,一旦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是于革命、于人民的事业不利的,那么,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党内正常的民主程序加以纠正的。比如,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五次连任党中央的第一把手,在党内的威信是相当高的,但当他的投降主义使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在大资产阶级的突然袭击中因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而招致严重损失时,党的八七会议就坚决地纠正了他的投降主义,开始了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的斗争。又如,王明是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在党内曾经拥有很大的政治声势,但当着"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再次遭受严重损失时,党的遵义会议就坚决地结束了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央的主导地位。

党只有在团结统一的条件下才是有战斗力的,而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才是"达到统一这个目的的道路"。党的组织上的分裂,将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战斗力,造成长时期难以弥补的消极后果,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凡是搞分裂的人,从来是不得人心的,是没有成功过的;如果不加改正,是没有不最终垮台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站到了取消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结合,组织反对派。其结果是,他们遭到了全党的谴责,并且被清除出了党的队伍。他们后来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由于遭到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坚决反对,他们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有份量的政治派别,始终不过是一个孤立的狭隘的小集团而已。罗章龙借口反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组织实际上是第二党的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也遭到全党同志的强烈反对,而被党开除出去。后来,罗曾以他所反对的是王明为理由,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央认为,罗搞分裂,是不能容许的,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是对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也在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下遭到了破产。当他固执错误、投敌叛变时,更遭到全党的一致谴责,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就连身边的警卫员也没有跟他走。这些情况有力地说明,任何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高,影响多大,如果搞分裂,都

必然陷于完全的孤立，遭到彻底的失败。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曾经属于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的；俄国党也参加过第二国际，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同第二国际决裂，并成立第三国际与之对立的。这又应当怎么看呢？应当指出，有一个时期，列宁也曾经希望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起，通过斗争，从第二国际和各国党内清除修正主义，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个希望没有得到实现。列宁认为，“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① 当他根据斗争的实践判明，第二国际及其所属的各国党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并且在政治上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因而蜕变成了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时候，他才认定，已经没有可能通过内部斗争来帮助它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在政治上、思想上以至组织上与之彻底决裂已经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了。历史已经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如果不与第二国际、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决裂，俄国就不可能建设起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俄国人民要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党内，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等都是以列宁不服从第二国际、组织第三国际为借口，来反对中央、破坏党的统一的。对此，刘少奇指出，“列宁在那个时候，成立第三国际是对的，但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在今天这样做都是不对的”。因为列宁反对的是第二国际，那里的党已经“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是不革命、不战斗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它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是坚持革命的。“你同这么一个党分裂，就是同列宁主义分裂，同革命分裂”。“这是完全错误的。”②

那么，党员对于组织、对于多数、对于上级的服从，是绝对地无条件的呢，还是可以有例外？刘少奇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是带有绝对性和无条件性的”。“至于组织上的绝对服从，遇到下面两种情况之一，就应该作为例外处理”：第一，发现上级负责人有反党行为时，例如过去张国焘反对党的中央，自己另立“中央”，那时的党员就应该起来反对张国焘，拥护中央。第二，发现上级组织或负责人有叛党或奸细行为时（必须有证据），应负责向中央控告，听候中央解决，同时自己要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1920年7—8月。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32页、第333页。

提高警惕性"①。他还讲到,执行上级党的指示和方针,服从其领导,也应当是灵活的,不是机械的。"下级应有能动性、自动性,应当能灵活运用、灵活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恰是最好的服从。"当然,不是说可以任意改变上级党指示的原则和方针,而是说"具体的行动,要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况来决定。"②

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原则。历史的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把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一项最重要的纪律来遵守,要求每一个党员在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养的同时必须进行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

五、正确认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既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它就应当是一支思想统一、步伐整齐的队伍。但这不是说,它的内部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它就可以自然地发展、壮大和成熟起来了。

恩格斯曾经说过,"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指导德、法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建党的过程中,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封建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同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等,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列宁更是在主要地反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斗争中,进行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并指导拥护第三国际的革命原则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毛泽东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明确地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④ 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总结经验、克服自身的缺点和错误的斗争中,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地巩固和壮大起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38—339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5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06页。

来的。

怎样理解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个命题呢?

列宁认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①。应当说,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党也是适用的。中国党也不能把机会主义归结为单纯的个人行为,而应当看到它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他又认为,机会主义流派是"受资产阶级培养和扶植的、代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的利益的"。应当说,这个论断,主要适合当时欧洲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并没有工人贵族阶层,并没有同资产阶级有直接联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在工人运动中发号施令的寄生的阶层。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下列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党内矛盾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

首先,党内的某些错误思想、错误倾向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压力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生活在社会中间,因此它受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共产党内部最不坚定的分子反映出来"。比如,大革命时期,中层以上社会以至国民党右派都说农民运动"糟得很",陈独秀就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尽力加以压制;又如,抗日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害怕人民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独裁统治,王明也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等等。

其次,许多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他们是拖着一条或长或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尾巴加入党的,这种思想在没有得到改造、这种尾巴在没有被割掉以前,就成了他们接受错误主张或滋生错误倾向的土壤和温床。对于这个问题,张闻天作过比较具体的分析。他说,"一般的说来,中国党内工人贵族的成份是很少的。但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上层知识分子是占着相当的数量。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至于那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贫穷的知识分子,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盲动主义等的社会根源"。② 当然,这段话的意思只是说,出身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人,容易受某种影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94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57—258页。这里所说的"富农"等等,应是指一些党员出身于富农家庭,而不应是指他们本人具有富农成份,因为党是不允许包括富农在内的剥削阶级分子入党的。

响,犯某种错误;并不是说,他们中的所有的人都是自觉地站在自己出身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提出错误的主张、采取不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行动的。而且,这里所作的分析,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比如,出身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可能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犯右的错误,但不等于他在一定的条件下不会犯"左"的错误;出身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可能容易犯"左"派幼稚病,但也不等于他在一定条件下不会犯右的错误。

再次,错误的思想倾向,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客观上是不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有的是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甚至是适应了敌对势力的需要的。列宁说过,"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种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事实上,"谁直接维护,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②;又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还说,"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③;等等。

指明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有助于揭示错误的思想倾向和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的危害,从而提高全党同志与之进行斗争的自觉性,提高犯错误同志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性。

这样说,绝不是意味着所有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的人,主观上都是有意识地想要充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当然,这种人也有,但是极个别的。事实上,除了极个别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以外,除了极少数个人主义思想极端严重、在政治上毫无原则性、善于在党内窥测方向、见风施舵的人(无疑,对这种人应当提起警觉,因为他们虽然人数极少,但可能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以外,犯有"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党员,他们在主观上是要革命的,就是在他们提出自己的错误主张时,也还是认为这种主张是于革命有益的。他们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着深刻的认识上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党内矛盾不仅是阶级矛盾而且是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9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87页。

他并且反复地论证了主观主义是"左"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这个道理。他还说，"大体上说，(党内)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③] 这三个问题上发生分歧，都是有认识上的原因的。刘少奇也说过，"因为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②]。张闻天并且指出，"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是产生两种倾向的来源"[③]。意思是说，事物是充满着复杂的矛盾的，是在矛盾的运动中曲折发展的，如果人们对事物矛盾着的各个方面并不全面了解，如果人们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事物的矛盾运动进行科学的分析，那就可能引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党内的意见分歧。

应当承认，错误的主张也并不总是人们纯粹的主观臆想的产物，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任何的根据。事实上，许多错误之所以发生，常常是由于人们抓住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它的另一方面，或者把事物的支流当成了主流、现象当成了本质，或者把事物的现状凝固化、不能从发展中来把握事物；等等。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真理向前跨越一步就成了谬误。比如，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看到统一战线中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是对的，如果把这种矛盾过份地强调，直至将它置于民族矛盾之上，那就要犯"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了；看到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的，如果由此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要求从根本上取消阶级斗争，那就要犯右的投降主义的错误了。

指明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深刻的认识根源，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党内斗争的性质，懂得"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注意采取恰当的方式和方法处理党内矛盾，而不致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

"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党不进行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那么，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和发展，就要使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①]。开展党内斗争，应当是为了有利于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利于保持党的独立与纯洁、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97—98页。
②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53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58页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28页。

根本利益的路线上进行,有利于巩固与加强全党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进行党内斗争,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19世纪末,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迅速地蔓延滋长起来。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在考茨基等领导之下,对党内机会主义采取了调和主义路线,以致机会主义腐蚀了第二国际各国党。党内的左派只好分离出来,另行组织共产党。为了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列宁不得不集中力量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列宁是对的。到斯大林时,就发生问题了。斯大林反对机会主义是坚决的,但在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时犯有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曾批评说,"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①] 这种作法,后果极坏。党内从表面上看是一致了,鸦雀无声了,但党内的创造精神、活跃的气氛也没有了;犯错误的人不仅没有受到切合实际的教育,全党同志也无法真正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由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旦有机会,矛盾还会重新爆发出来,甚至可能达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内并没有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历史传统或严重影响。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大革命时期,党内的思想教育并不充分,党内的思想斗争也并不开展。毛泽东说,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以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除出去;党内涌出了许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在大革命的后期,尽管有不少党员批评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整个的党还处于幼稚时期,加上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压制党内的批评,这个错误终于未能及时地得到纠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内斗争仍然是有严重教训的。1927年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发动了全党的思想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对于推动党在政治上的进步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此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739页。

一个时期党内斗争中的一些错误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主要是：第一，“不是在两条战线上斗争”，反右时没有注意防“左”。会议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却“批准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不独在理论上批准了过去的‘左’倾错误，而且在组织上提拔了大批过去犯‘左’倾错误的人”。发展到后来，当“左”的错误已经成为主要倾向时，还是一个劲地反右，结果就只能是搞得越来越“左”了。第二，纠正过去的错误时，没有着重研究过去发生错误的原因、环境以及今后纠正此类错误的办法，而是过于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以至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就是不妥当的。“当时是采用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意的打击许多同志，大批的惩办同志，这就助长了党内的派别斗争，引起了严重的无原则斗争，伤害了党”。① “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作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② 1927年11月的中央全会就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错误地处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处分了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毛泽东等许多干部。第三，不适当地强调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单纯工人成份的意义。1927年11月的中央全会认为，“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为了实现干部的工人化，许多党部只是机械地找些工人分子进来，有的还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份的比例，结果不但没有起到改善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而且“甚至闹出秘书长专政的笑话”。正如六大以后的中央所说的，“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③ 这些错误，从八七会议开始；在瞿秋白、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得到发展；而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过有力的揭露和深刻的分析。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02—80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③ 《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

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毛泽东关于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正确方针,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他认为,党内斗争是必要的,不应回避的;但党内斗争必须正确地进行。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等着重地阐明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思想:

(一)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党。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党必须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才能巩固和壮大起来。①

我们党所以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斗争,这是因为,无论右倾或"左"倾,都是妨碍党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都会把革命引向失败;而且右倾或"左"倾的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都是唯心论和机械论,它们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毛泽东指出,"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30页。

'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正是因为这两种倾向都不好,都于革命有害,所以"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①。刘少奇也说过,"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如果我们疏忽对任何一方面的警戒与斗争,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那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②

反倾向的斗争,在一定的时期内,是不是应当有重点呢?答复是肯定的。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③。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发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十年内战时期,更连续发生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又发生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的错误。其中一次右倾,三次"左"倾,还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占据过统治地位。所以,在容易发生右的偏向时着重反对右,在容易发生"左"的偏向时着重反对"左",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当然,对于这一个问题也不可以作绝对的理解。这就是说,着重反右时,并不是可以忽略防"左"、反"左"。比如,抗日时期,毛泽东就说过,"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防共'、'限共'的那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也不许可有任何共产党员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④ 同样,着重反"左"时,也不可以忽略防右、反右。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当时党内"左"的偏向是主要的,虽然纠正并不困难,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右的偏向也有,它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但也必须改正。只有着重纠正了"左"的、同时也纠正了右的偏向,才能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⑤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反倾向斗争的问题上,也要记住这一点。毛泽东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29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5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297—1298页。

倾;在打败仗或者未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①

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历史的经验表明,"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② 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是非常注意的。1935 年 12 月的瓦窑堡会议在着重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就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尾巴主义的复活。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思想果然抬头了,党中央就号召全党同志坚决地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同时也要求大家不要放松对于"左"的错误倾向的警觉性。比如,1940 年 10 月 18 日,中央就曾作出过《关于防止执行政策中左倾错误的指示》,指出"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要求"尖锐的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③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总结教训,中央在着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的同时,曾对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当时,有的同志以为,皖南事变就是新的马日事变,国共关系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了。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再次指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会也不应当改变,对于党内正在滋长的"左"的情绪要注意加以克服。正因为中央在反倾向斗争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头脑的清醒、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及时地对全党同志进行了正确的引导,党的政策和策略才得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了赢得胜利的可能。

为了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党应当加强对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毛泽东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④ 所以,在发动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之前,都应当让干部和群众懂得,什么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什么是党关于此项工作的具体路线、具体政策,应当怎样防止和克服可能发生的"左"的或右的偏向,等等。这项工作,在抗日时期,尤其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做得很好、做得很有成效的。1949 年 1 月中央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268 页。
②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8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518—51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319—1320 页。

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这个文件，对于全党同志学会掌握政策、纠正"左"右偏向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文件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地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①

(二)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曾于1941至1944年间，对党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个时期的历史进行过认真的、深入的讨论。毛泽东在代表中央政治局就"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所作的结论中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② 这个方针，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既是这次整风运动的方针，也是整个党内斗争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毛泽东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③ 后来，毛泽东还把1942年采取的这种解决党内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④ 这个方针，既同那种取消思想斗争、模糊原则是非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那种不讲道理、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惩办主义划清了界限，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在党内斗争中要强调惩前毖后，注意弄清思想呢？

---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8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93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827—828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

党内斗争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和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党内原则上的分歧"。在这种时候,如果不以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以正确原则去纠正"左"的或右的偏向,党就不可能形成坚强的团结,就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就不可能带领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战斗。要知道矛盾是不可能被长期地掩盖起来的。"在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为维护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斗争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的斗争,矛盾才能克服'。任何妥协都是无济于事的"①。在这种涉及原则是非、关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决不允许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所以,"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②

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党内的思想分歧,虽然可能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甚至组织上的分歧,但党内斗争的实质和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③ 毛泽东说过,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④。刘少奇也说过,既然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那就"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⑤ 在党内开展机械的、过火的斗争,发展惩办主义,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个情况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活动,任何人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而错误的发生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思想条件相联系的。因此,重要的不是追究犯错误者个人的责任,而是要弄清楚错误的性质、犯错误的原因以及改正错误的具体办法,只有这样,犯错误的人才能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其他的人也才能从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只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61—1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59—361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29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
⑤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16页。

有这样，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内的畅通无阻的贯彻执行，才能获得思想上的保证。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须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而只有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了是非，才能实现并巩固党内的这种团结。如果对错误不揭发、不批评、不纠正，党内的思想认识不一致，那又怎么可能达到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呢？所以，在党内斗争中，惩前毖后是治病救人的必要条件，弄清思想是团结同志不可或缺的前提。

为什么在党内斗争中又要强调治病救人、注意团结同志呢？

党内斗争的方针是由党内矛盾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说过，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首先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如果是反革命的行为，那就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如果是革命者犯错误，那就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党内斗争所要解决的是党内矛盾，即革命者犯错误的问题；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基本上是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所以，进行党内斗争，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如果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犯了错误的同志，那就是混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就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毛泽东说过，“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藉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藉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种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①

党内斗争既然主要是思想斗争，那么，这个工作就“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因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②。在党内斗争中，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③ 是不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8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82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

有团结的愿望,这是区分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志。这种团结的愿望,不仅应当表现为对犯错误同志采取真诚关心、热情帮助的态度,而且应当表现为在批评帮助他们时采取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过极大的危害,党内许多同志在它的统治时期受到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延安整风时,许多人在批评那个时期的错误时表现出一种很激烈的情绪,以致不能对有关问题作比较冷静的分析。为此,毛泽东强调,"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他说,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①。这是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一个范例。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整风运动。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大部分准备出席七大的代表和各部门各地方的负责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这样,就以党校为重点,开展全党的整风。党校的整风,自始至终注意启发大家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地解决思想问题,真正地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暴露出来的问题,首先分清两类矛盾的界限。"对于党内的错误问题,分清它是原则性的错误,还是非原则性的错误;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还是组织纪律上的错误;是一贯的,还是偶然的;是全部错了,还是只错一部分。并且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吸取经验教训,找出改正办法,以免再犯,而不是单纯的追究责任"②。显然,只有采取这种与人为善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真正有助于人们弄清思想,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

党内斗争,首先要分清是非,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也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过,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938—939页。
② 张鼎丞:《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

给帮助，甚至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① 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决不能采取像鲁迅《阿Q正传》中那个赵老太爷采取的不准阿Q革命的方针，而应当采取允许犯错误的人继续革命的方针。当然，对于混迹于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对于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的分子，以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是必须提高警惕，并且进行严肃处理的。因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由于一时认识上的偏差引起的；他们是明知故犯。他们尽管人数很少，但对党的危害很大。不过，他们毕竟人数很少，多数人犯错误的情况，与他们是不一样的。应当看到，“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② 事实上，错误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损害党，损害人民，也损害犯错误者自己；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教育党，教育人民，也教育犯错误者本人。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愿意认识，愿意改正，他是完全可以把以后的工作作得更好，为革命作出更多贡献的。所以，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③ 刘少奇也说过，“党的纪律的执行和组织手段的采用，在一定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会使党的纪律失去应有的严肃性，也不利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取得必要的教训。“但是这种手段不可轻易采用，不可滥用”。因为“单是在组织上处罚同志多，并不能提高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党的统一，主要的也不是靠处罚同志来维持（如果要这样才能维持，那就是党的一种危机了）”④，而是靠党员的自觉性维持的。即使有必要采取某种组织手段，那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执行一种惩罚，而仍然是为了对同志进行教育，为了起一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

关于团结的问题，毛泽东后来还发表过一个精彩的独到见解。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⑤ 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的时候，一些代表不愿意选举王明、李立三等几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为中央委员。毛泽东认为，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⑥ 他们是旗帜。选举他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28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2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938页。
④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62—263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92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95页。

们,表示党还是在等待他们、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的。选举他们,也表示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和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等)是有区别的。这样一来,那些跟着他们犯错误的人就不会感到恐慌了,就感到自己只要真正改正错误在党内还是有出路的了。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增强全党的团结,有利于争取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从而也就有利于整个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经过毛泽东做工作,七大把他们选为中央委员了。我们知道,李立三在后来就是为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至于王明,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转变,但那也无碍于大局。当年跟随王明犯过错误的绝大多数人都被争取过来了,都真正认识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在以后的斗争中也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① 应当说,采取这种作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党内斗争中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方法是在1942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②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9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

第八章

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①

这个论断是不是正确呢？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

列宁说过，“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②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③ 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它们的集中代表就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基本上被打倒，民主革命已经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以夺取政权宣告结束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夺取政权，这仅仅是新的革命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因为在中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

① 见经毛泽东改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8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页

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① 毛泽东早就明确地讲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②

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不是紧接着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就中国的实际来说,是这样。

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中期的西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由此进入了一个自由和充分发展的时期。那里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在民主革命中就应当教育无产阶级认识自己同资产阶级之间在利益上的对立,并且在民主革命之后应当利用自己赢得的自由权利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在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尚处于上升时期,要立即发动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使这个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初期的俄国,列宁曾经设想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后使之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并由此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程度都不够,二月革命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的手中。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使这个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俄国也经历了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尽管比起西欧来,这个时期要短暂得多。

中国的情况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与西欧不同,中国革命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是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不是发生在独立国家而是发生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这就决定了这个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共产国际二大所指出的,"强制地向东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国帝国主义,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达到欧美已经达到的水平的可能性;因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力求阻止殖民地工业的发展"。③ 与俄国也有所不同,中国革命主要地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发动和发展起来并走向胜利的,这就决定了这个革命的果实不可能落入资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51—652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30页。

的手中，决定了在中国即使是建立短暂的资产阶级专政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无产阶级政党自己在政治指导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

由于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中国就可以既不要走西方国家的历史道路，即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也不要走俄国的道路，即在民主革命之后紧接着就去进行一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而是可以在民主革命之后直接转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

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上述历史特点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在他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典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认定，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就是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

本来，革命的性质是由当前社会的性质、由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为了判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是否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我们有必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一番分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①

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性质进行过分析。对于那种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资本主义"的提法，毛泽东作出了否定性的答案。他指出："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据此，他认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95 页、第 697 页。

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① 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基本矛盾问题。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他认为,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②

毛泽东在作会议的结论时肯定了刘少奇的上述意见。他指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其他矛盾,各民族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等等。他说:"我们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③

至于新中国的经济成份究竟有哪几种,怎样对这些经济成份进行分析,毛泽东认为,那"还要考虑"。他建议先由刘少奇研究,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用。④ 这表明,他希望这个问题能由七届二中全会来进一步加以解决。

同年9月15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该提纲指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份所构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141页。
② 见《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5—14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6页。

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尚有小部分自然经济，因意义不大，故略）。正确地认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地决定东北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也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在经济战线上把握住正确的路线，实现无产阶级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① 这个文件经东北局讨论通过，于9月30日报中共中央，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对这个文件进行了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比如，他在修改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要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他又把"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的办法"。② 他还指出："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③ 10月26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他特别提到刘在"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采取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中指明这个私人资本经济是指"现时还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我们整个的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④

应当说，在九月会议前后，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已经基本上明确了。

---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6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下册，第164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6页。

在此基础上,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着重地规定了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是因为,当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五种成份,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形式。因此,在上述五种经济成份中有三种是主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也可以被引导走向社会主义,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三种基本的经济形式和三个基本的阶级力量,就集中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事情很明显,既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中国人民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中国革命也就应当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担负着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任务。

毛泽东还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政策。他指出,在旧中国的经济中,大约现代化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的现代工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本形态,仍将是大量的分散的个体的。对于这种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就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经过合作社经济,引导它们向着合作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

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容许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的发展；同时，又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而这是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他强调，党必须领导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把中共中央在1952年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任务及其主要途径基本上揭示出来了。①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精神，在（1949年9月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经济政策的条文中也有相适应的规定”。② 比如，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多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等等。诚然，《共同纲领》并没有把“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这个前途明确地规定出来，对此，周恩来在当时就指出，“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③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指出，俄国当时有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五种经济成份。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基本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这种经济具有“过渡性质”。而过渡这个词的意义，就是说在经济上，“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份、部分和因素”。过渡时期，实际上“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④ 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新中国“目前时期的现实和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的历史一样”。⑤

新民主主义社会既然具有过渡的性质，它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发展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699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700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1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卷，第59—60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697页。

阶段,本身处于"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① 之中,那么,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当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不切合实际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针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于1951年4月9日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曾经出现过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种提法,为此,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11日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电报中指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这段文字应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即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③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统一的过程,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作过比较详细的记载和论述。他指出,"毛主席的批评,着眼点是在"确立"二字上","并未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他认为,"毛主席是对的。因为我国革命胜利以后,虽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要加以"确立"、"巩固",的确很难。"所以,当毛主席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了'确立'的观点之后,党内高层领导同志,包括少奇同志,大家都是心悦诚服接受的。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④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作出了深入的论证,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说法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说,能不能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现状永远保存下去,不要改变,从而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

① 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② 毛泽东在1953年6日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第211—212页。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最早见于1951年3月刘少奇所作的《共产党员八项条件》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6页。

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呢？答复是否定的。因为“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说法，正是反映了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还应当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想要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纯粹是幻想。“如果还有人不愿抛弃并且坚持这种幻想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危险道路上去。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①

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尽管“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立即可以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② 实际上，在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的过渡时期的最初几年，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党和人民面临的斗争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

首先，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一些地区还有待解放。在全国的4.75亿人口中，占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农村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那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各种封建势力，包括国民党留下的政治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各种特务分子，农村中的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城市中的封建把头、帮会头子等，还大量存在，有的还在进行猖狂的活动。这些是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3—14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说,民主革命还有大量的遗留任务有待去完成。

其次,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限制、反限制的斗争开始尖锐起来。毛泽东就说过:"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大搞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等的活动,企图与工人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之后,不法资本家又大搞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这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任务也开始提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面前来了。

再次,新中国从旧中国承袭过来的是一副破烂不堪的摊子,国民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就很落后;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年产量较之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又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这就是说,不首先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就无法开展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

从外部环境看:

为了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等更借联合国名义武装侵略朝鲜,武力入侵我国台湾海峡。这就是说,新中国面临着保卫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严重任务,面临着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严重任务。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形势,纷繁的工作头绪,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何种方针,应当如何确定工作重点,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战略策略?这是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他告诫全党,"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会上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15页。

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并且指出，为此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我们应当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上述任务。

很明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全面地分析当时的形势之后，决定把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以便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并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必要的前提。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据此，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以下的工作：

一、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项运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以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从1950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的。第一批，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1.28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二批，1951年冬到1952年春，在1.1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三批，1952年冬到1953年春，在0.3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

与进行土地改革同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着重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种公开的反革命分子。

与土改和镇反相结合，逐步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为在工厂交通企业中反对封建把头制度；在社会上严格取缔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

民主革命的上述遗留任务的完成，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二、进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三、恢复和发展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了20%。人民生活也有了切实的改善。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胜利结束，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

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同时，党还领导人民"初步进行了社会主义政造的工作"，[①] 也就是说，开始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

① 《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位。

前面说过,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掌握官僚资本的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国民党中央、省、县政府经营的企业,没收这些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管的日、德、意在中国的企业,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和国民党大官僚分子经营的企业。官僚资本集中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一些城市获得解放,人民政府已经开始没收了一部分官僚资本;到1949年底,中国大陆的官僚资本企业已经基本上被人民政府接管。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要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中也有一小部分是由没收的敌伪财产(日德意企业、伪满和汪伪政权的公营经济)或被征用、收购的若干其他外资企业转化而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原来解放区的公营经济。由于官僚资本是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占全部工业资本的2/3,占全部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这就使得在主要由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一下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它直接掌握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燃料、动力和工业原料以及将近一半的棉纱产量,掌握了全国的铁路、邮政、电信和大部分交通运输业,并且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国内外贸易。

没收官僚资本,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角度看,这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说这项斗争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难道不是很恰当的吗?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并为吸引、推动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方面的保证。

第二,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并开展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面临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局面。形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物价的剧烈波动,主要是商业资本在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的结果。这是在市场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

一场斗争。

为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人民政府首先加强了金融管理，取缔私自买卖银元、美钞的活动；同时加强了市场管理，运用行政手段，以惩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最后，更利用国营经济的力量和全国已经统一这个条件，调运聚积主要商品，在适当时机集中抛售，以抑平物价，打击囤积居奇者。从1950年3月起，物价开始趋向稳定。

通过这场稳定物价的斗争，国营经济已经确保了对于市场的领导权。“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败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与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了。”“从此以后，商业投机资本对于国内市场的领导权，永远不会存在了。”①

在物价稳定之后，由于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原因，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遭遇了相当大的困难。为了帮助这些工商业克服面临的困难，人民政府对它们采取了扩大加工、订货、委托经销、代销等措施。其结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大量地发展起来了。而国家资本主义正是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这样，资本主义工商业就被引导到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来了。

1951年底、1952年上半年，针对不法资本家施放“五毒”的严重情况，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一场“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较量，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通过这场斗争，无产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私营企业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了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资产阶级发生了分化，运动中出现的一批进步分子，成了以后改造工商业中起积极作用的一支力量；私营工商业进一步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比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收购部分的产值占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1951年为42.7%，1952年已经增长为56%了。

第三，各地区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党和人民政府根据“趁热打铁”的方针，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

① 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1950年10月1日。

到1952年,全国已有40%的农户组织在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里面,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劳动互助组织起来的农户,在老解放区一般占65%以上,在新解放区一般占25%以上。这就是说,个体农民也开始逐步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了。

由此可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有人认为,要求人们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这是重复了30年代初期来自共产国际的"左倾观点",即"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即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指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的问题在于:第一,它没有真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是30年代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自己的决议中"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立三路线就提出,一省或数省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①。第二,它没有真正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这个社会既然具有过渡性,即它本身就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形态,那么,这个社会一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即开始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步伐就是合乎规律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和需要责备的。第三,它没有正视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没收官僚资本,消灭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引导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所有这些,不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步伐又是什么?这些工作,有哪一件是不该做的呢?

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和初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基础上,1952年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作为基本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来了。

由于中国原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而且经历了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也就必然会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第一,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是直接衔接的,中间没有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1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虽然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比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法国革命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程度，因此，他们认为，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民主派将会取得统治”，而德国的工人则应“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①。

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前夕，列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俄国的社会阶级状况，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争取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的思想。他设想，依靠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在这个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将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应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但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因此，在推翻沙皇政权之后，没有能够按照原先的设想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是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在领导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首先也就必须进行一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在这个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也就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中国也就有可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逐步地直接转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而毋需进行一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了。

第二，中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不是通过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以革命暴力推翻现政权的方式即流血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领导、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来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人早就说过：“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② 由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并且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这个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第三，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新解放区尚来进行土改等等原因，党和国家仍然以很大的力量来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从集中力量完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54页。

民主革命的任务,到逐步加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份量,到提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经过了三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转变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实现的。由于步骤稳妥,实行革命的转变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

第四,考虑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中国在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仍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同它们的联盟。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成了革命的对象。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仍然保持着。为什么要同它们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呢?这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情况,也是中国所特有的。

正因为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的,所以这个转变进行得很顺利、很成功。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也是一个新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在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逐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①] 总路线从提出到正式公布,经历了一个过程。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毛的这个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并连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同年12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委托他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9页。

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总路线作了明确的表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他阐明了"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指出"社会主义成份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9 月 8 日至 11 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9 月 25 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里，向全国人民正式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①

在 9 月 8 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开会时，周恩来在所作的报告中曾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说，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指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他说，"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即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从国内方面看，开国快四年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种社会改革也已基本完成。尤其是这四年来，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人民的积极性也更加发挥出来了。"关于工商业中的公私比重：工业方面（包括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1949 年，国营占 33.9%，私营占 62.7%，公私合营占 2.4%，合作社占 1%；1952 年，国营约占 50%，私营约占 42%，公私合营约

① 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文献》2001 年第 4 期。

占5%,合作社占2.6%。"从相对数字看,国营的比重上升,私营的比重下降,但从绝对数字看,则国营私营都有增加。"商业方面——按商品流转总额计,1952年国营已占50%,按零售计,1952年国营与合作社占32%。以上情况说明,现在"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①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3年12月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这条总路线作了如下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表述,是由毛泽东最后改定的。② 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当时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就是把它比作一只鸟的主体和一双翅膀。"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③ 这里的意思是说,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改造,鸟的两翼丰满了,鸟的主体才能腾飞起来。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很清楚的:党提出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任务,不是出于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基于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实际需要。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就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奋斗。现在国家独立了,经过三年的工作,进行建设的基地也扫清了,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建设的任务也就可以而且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面进行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首先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呢?从历史上看,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究竟走哪一条路呢?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因此,这条道路,中国走不得。

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论证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首先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答复是,其结果是不美妙的。因为:

第一,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很脆弱。由于它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比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4—10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317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2页。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继续搞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就仍然不能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这样，中国就难免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现在很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那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经济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吗？这么一个大国，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直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中央指出，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

第二，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大量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这个条件的创设，意味着广大农民将要丧失他们在土改中得来的胜利果实，大批手工业者将要走向破产，这些人将要变成乞丐、流浪者，变成产业无产者的后备军。这样，不仅原来的工人要受资本家的剥削，而且已经得到解放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将重新遭受奴役。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几十年，流血奋斗，是为了走到这一步吗？广大劳动人民能够答应这样做吗？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社会就会不稳定，我们的建设事业也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的另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大量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在中国的条件下，少数人要积聚起大量的资本来建设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那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我们知道，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几百年的路了。西方资本主义时代是16世纪开始的，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依靠残暴的殖民掠夺，依靠对农民的剥夺，依靠种种残酷的手段，到18世纪下半叶才进入资本主义的确立时期。而在工业革命以后，又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其经济才达到今天的水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搞资本积累，能用他们这种办法吗？我们能到非洲去掠夺殖民地，去捕掠黑人、贩卖奴隶吗？能去剥夺农民、搞圈地运动吗？当然不行。那么，积累资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加紧剥削工人；一个是让小生产者自发分化。显然，对于要尽快摆脱贫困落后境遇的、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个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中国资本家的资本额本来很有限。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在1949年，不过是20.08亿元人民币（按1952年币值计算）。中国的富农经济尤其弱。据调查，大部分富农一年只雇78个劳动日。靠中国这样的资本家、富农，能够把中国的资本主义一下子搞得那么发达吗？他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积累起巨额的资本，使得他们能够去建设一个大庆、一个宝钢呢？靠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搞起一大批大规模的现代化农场呢？不

靠社会主义谁来搞这个？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所以能兴建，现代高科技事业所以能发展，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能够统一所形成的力量。不搞社会主义就靠几个资本家，几个富农，中国能搞成这些吗？以为中国靠几个资本家、几个富农，经济就可以一下子起飞，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这纯粹是幻想。

正是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解决，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可能解决中国的繁荣富强问题，中共中央在提出开展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就明确指出："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使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以便达到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如果具体地考察一下中国社会经济的以下情况，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中国惟一正确的选择；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是适应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目标而提出来的。

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决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因素是什么？主要是：

1.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较强大，理应成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发展工业，一方面就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一方面就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领导力量。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为34.8%，1952年上升到56%。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改进和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可能和需要改建和扩建这些工业。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不仅规模大，而且技术设备先进；不仅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

建设新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也就是要发展国营工业。因为在中国，私人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业企业的。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来做这件事。中国的经济虽然落后，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全

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以后，国家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建设。由于百废待兴而国力有限，为了使投资收到最大的效益，必须由国家集中力量直接投资搞好重点工程的建设。这样，从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尤其是兴建新的大型工业企业的任务，主要地就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

这就是说，工业建设的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2. 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它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地。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能不能设想，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自身的独立发展，中国就可能成为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呢？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不利的消极作用。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建国初期，政府、国营经济要帮助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府、国营经济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工商业调整之后，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它们与政府、国营经济乃至社会的矛盾"。这导致了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①

还应当看到，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对于当时的生产和新工业的建设也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浪费严重，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因此，"必须认真地在这些企业中实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的

① 《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质量,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积累资金。而为着这个目的,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①。

3. 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内有过相当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实行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个体农户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亩,一户十来亩,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仅占有耕畜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一个农户一年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仅52.3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工具的为6.5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收获,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有很大的困难。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是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的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中国农村是在1955年下半年掀起合作化高潮。以下两条材料对于我们理解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很有帮助。

其一,是陈云在1956年4月应邀访问越南时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等的谈话。

陈云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起初注意开荒,但可开垦的大片荒地在东北和西北,那里居民稀少,每年只能耕种一次,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在东北每亩需五十元,而年产量是一二百斤。假如开荒一亿亩,投人五十亿元,产量以每亩二百斤算,不过二百亿斤,收获不大。所以这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因为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很长,所以它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

①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56—257页.

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因为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旱地大量改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这两者的关键在于搞水。"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以后都不难了。"

其二,是毛泽东于1958年9月5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1955年上半年那种"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的情况。他说:那个时期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看也可以讲是一种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那些当了县区乡干部的党员,他们煽起一些农民,用各种办法来吵,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由于破除了种种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

以上材料表明:中共中央作出的大搞农业合作化的决策,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农村状况及农业增长途径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其首要目的,在于通过搞合作化,以增产粮食,从而适应国家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4.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①。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胡乔本认为,"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性,总

①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58页。

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是没有条件进入社会主义的。如果勉强地搞了,那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而陷入了农业社会主义或民粹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了。有的文章甚至公开断言,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次的理论根源就是民粹主义。

对社会主义改造提出的这种责难,因为事关重大,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给予答复。

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就是有严重争论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分子和俄国孟什维克这个机会主义派别,就是以"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作为惟一的论据来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俄国搞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认为,由于俄国的"农业还占优势,工业也刚刚拥有就整个说来很少受过训练的工人阶级","俄国的社会发展还根本够不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考茨基也认为,俄国在民主革命之后,必须"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成熟起来"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种观点在孟什维克内部占统治地位。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个别人(如加米涅夫)也认为,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内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环境之下,在乡村中甚至还没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候,是不宜于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的。这种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反映。陈独秀也是依照类似的根据,认定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他后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的认识根源。今天,某些人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所依据的,也是类似的理由。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革命前提条件的论述,因为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否定性的回答,正是以引证马克思、列宁的有关思想作为立论根据的。

诚然,马克思明确地说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② 这个论点

①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7页。

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本身就不可能被提出来的；同样，如果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也就缺少一种原动力，它的发生也就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取得成功了。但是，第一，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对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规定出绝对的标准，认为凡低于这个标准的国家都不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恩、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倒是说过，"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并"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① 第二，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把革命过程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过程，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即使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使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处于有利的地位，也不允许他们行动起来，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三，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说过，只有当工业无产阶级在全人口中占了多数的时候，它才有力量去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相反，他们只是说，无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并没有说要占到多数，而且紧接着这句话，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要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事情"，他们是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看待的，在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时，他们是把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走的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列宁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列宁就说过，"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把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许多同盟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已经一再地证明了这些思想的正确性。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是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呢？并没有。德国是在30年代才进入工业革命阶段的。到1848年革命时，德国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工业中工厂生产的比重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6—11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137—138页。

不大,工场手工业和零散的小工业还占主要地位。德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1849年,参加关税同盟各邦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虽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仍然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之后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他们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加以绝对化的规定。在他们看来,只要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许可,无产阶级就应当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停顿的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还有必要谈一下马克思与查苏利奇的通讯。1881年2月,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他能说明一下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马克思在复信中指出:他"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一切决定于具体的条件。他认为,由于农村公社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东西,俄国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的,所以,"它能够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①。条件是,"必须有俄国革命",必须对吸取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采取积极的态度。尽管在事实上俄国的农村公社并没有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马克思在这里所阐明的思想,对于观察俄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仍然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后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更说过:"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② 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是有启发的。

俄国曾经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直到1913年,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42.1%,农业占57.9%。虽然如此,列宁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还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和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过渡。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列宁胜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5、7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地领导俄国人民实现了这个转变。1923年,他写了《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一书中,曾经认为列宁的上述理论"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即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在他看来,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是缺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的。对此,列宁回答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应当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革命时机成熟,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应当不失时机地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制度,以便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创造前提。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呢?列宁认为,没有。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①] 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历史性胜利这个事实,有力地证实了列宁的思想,驳斥了苏汉诺夫等人的论点。后来,列宁在论述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时,还直接说过,"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②]

由此可见,认为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获得高度发展之前绝对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毛泽东在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伟大事业时,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的。他还结合中国的实际,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他进一步明确地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

① 《列宁选集》第4卷,1995年6月版,第778、777、77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9页。

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① 这个一般规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适用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工厂机器生产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据此,毛泽东指出,"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② 毛泽东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应当有步骤地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经历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1951 年,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毛泽东在同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时就"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据当事人回忆:"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③

应当指出,毛泽东虽然肯定在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实现以前,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可以长久地停留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之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④ 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他强调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⑤ 他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事业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且在有生之年,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奋斗,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31—13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31— 132 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191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07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432 页。

经过许多艰难和曲折，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观点是同列宁、毛泽东的观点相一致的。1977 年 10 月，他在同加拿大林达光教授夫妇谈话中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① 邓小平在这里所阐明的必须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一些人正是以这种庸俗的生产力论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中国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

很明显，为了科学地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我们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现在，有人把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中国搞社会主义改造说成是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事实上，不是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等在搞民粹主义，而是指责毛泽东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了。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四、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

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放松对于经济建设这个任务的努力。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1953 年，我国即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建设了一百几十项重点工程，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

在过渡时期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47 页。

路,保证了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胜利开展。

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本身,也不是孤立地,而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所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使之直接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震荡和经济破坏,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重要推动力量。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也仍然是逐年上升的。

下面我们分别对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情况和历史经验作一些说明。

首先谈农业合作化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呢?

(一)党采取了积极领导、稳定前进的方针,引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土改以后,党坚持趁热打铁,积极领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还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就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随后,中央在为印发这个决议草案所发的通知中,更明确指出全党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因此,紧接着土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就广泛地发展起来了。

由于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一般地是通过商业投机、高利放债和雇工剥削这3种形式,因此,党和国家在积极领导农民发展生产合作的同时,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是:

第一,国家对粮食以及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基本上取缔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有力地限制了农村的商业投机,从一个重要方面把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第二,领导农民大力发展供销合作,使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被大大地削弱,农村的商业投机活动也进一步受到了限制。

第三,大力发展信用合作事业,使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也大大缩小了。

大力发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结果,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受到极大的限制,富农经济遭到削弱,从而大大地减少了农业合作化的阻力,为比较顺利地和比较迅速地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党在坚持积极领导的同时,也注意稳步前进。所谓

稳步前进，就是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和农民觉悟程度的提高的情况，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而不是超过他们的觉悟程度和不顾可能的条件，在合作化的问题上，采取急躁冒进的态度。

为了做到稳步前进，党不是一下子就让农民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变成集体财产，而是经过几个过渡性的经济形式，有步骤地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首先，是组织互助组，即在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和对某些牲畜、农具的共同使用。然后，是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是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然后，再组织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即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就是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从单干到互助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的基础上，从个体劳动到集体劳动的过渡；从互助组到初级社，是从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的集体劳动，到生产资料基本私有、统一经营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则是从生产资料基本私有，统一经营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这是一个质变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上述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来完成的。“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① “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② 实践证明，这些过渡性的经济形式是恰当的，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这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作出的重要的新创造。

（二）党采取了群众路线的方法，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有着几亿农业人口的大国中，不依靠农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而企图用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合作化，这不仅决然不能取得成功，而且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搞合作化，一方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汲取了苏联一时发生过的由于“胜利冲昏头脑”、强制推行集体化而造成某种混乱这个历史教训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5页。

为了依靠农民群众的大多数来推进合作化运动,党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制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土改时,党在农村中的基本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但是,土改以后,农村阶级状况发生了变化。在农村总户数中,贫农已不占多数,农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中农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党究竟依靠谁来推进合作化运动呢?

当时,劳动农民中有贫雇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新上中农、老上中农等5种成份,其中贫雇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这3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对于这三部分人来说,个体经营的困难是很大的,为了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必须组织起来。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这三部分人加在一起,占了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一般估计,在60—70%之间。党从这种情况出发,把"依靠贫农"这个口号加以具体化,即以人们经济地位的高下和对于合作化是否采取积极态度为准,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上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将贫农和新老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贫农,作为依靠对象。依靠了这三部分人,也就解决了在新条件下如何依靠农民群众的大多数这个问题了。

在农村中,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即新老两部分上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30%。对农业合作化,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此,这部分人不能作为依靠对象。但是,他们也是劳动者,农业合作化从根本上也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归根到底也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党有必要也有可能去团结他们。党将这两部分上中农,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

基于对农村阶级状况的这种分析,党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首先引导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这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而且这三部分人,也是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逐步加以吸收。而对于一时还不愿入社的新上中农、老上中农,则不强迫他们入社,也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以此作为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

首先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可以避免命令主义,避免对上中农采取冒险政策。但是,一旦贫下中农的多数组织起来,合作化就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上中农被这种社会主义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好赞成入社了。事实上,上中农不愿入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想往富农的方向发展。而当贫下中农入社以后,他们要发展雇工剥削、高利货剥削等等已经变得极其困难;不仅是发展富农经济,就是保持原有的轻微剥削,也已经很不容易,倒是入社才比较地对他们有利了。

全面实行农业合作化，意味着从限制富农经济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

由于中国的富农经济本来就很弱，土改时我们又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也很坏。因此，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他们都是没有多大力量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象苏联那样采取驱逐他们到边远地区一类的办法，而是在已经基本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放弃剥削、从事劳动的富农入社，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这种办法，是只有在首先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而后将全体劳动农民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采用并使之奏效的。

(三)党正确地处理了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关系。

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明确指出发展农业社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看质量，要做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而"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

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主要注意了以下几点：

第一，从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

许多地区开始组织互助组时，主要是为了帮助单干户克服人力或畜力不足的困难。但当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这方面的困难相对减少时，互助组往往呈现出涣散、萎缩以至部分解体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就提出：要"把互助合作与新的技术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剩余劳动力用于精耕细作改造生产条件；要与副业结合，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农闲劳动力增加收入；等等。这样，就使互助合作运动获得了新的动力，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互助合作组织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采取切实指施保护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保证粮食增产和不死牲口，党明确指出，互助合作运动"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而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最为重要。

所谓遵守自愿的原则，就是说不要强迫中农入社，即使贫农下中农也要按其觉悟程度分期分批地加以吸收，从面安定农民特别是中农的情绪，避免使他们发生惊慌心理从而造成生产上不应有的损失。而为了做到自愿，必须贯彻贫农和中

农之间的互利原则。为此,党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如办初级社时,规定了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适当比例;办高级社时,注意做到耕畜和大农具入社作价公道、还款时间适当等。

第三、把农村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和技术方面的革命结合起来,注意发挥互助合作组织的优越性,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在农业方面,我们是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一个时期之内,革命的重点是放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也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的。各地十分注意发挥互助合作组织的优越性,来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来提高耕作技术(如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和增加生产资料(如土地、肥料、牲畜、农具等)。由于个体农民无力从事这种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因此农业社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由此保证了农业的增产这个事实,也就成了巩固农业社和吸引个体农民入社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起来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党是注意运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并取得显著成效的。

下面谈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在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首先把它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最后把它变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是中国条件下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这也就是说,中国是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暴力的方法、是用赎买的方法而不是用没收的方法来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在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这个问题时就说过,"但愿如此,共产主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他并且主张,当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之后,可以"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所有者的财产"。[①] 1894年,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240页。

进一步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个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①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提出过赎买的问题。他在1918年所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说过，要"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②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的上述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出关于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问题的富有独创性的政策的。

国家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政权之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列宁说过：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资本主义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的监督，它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因为在这里，工人并不是受个别资本家的剥削，而是受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也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的监督，但它有利于工人阶级。因为在这里，它已经成了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国家所"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它是同无产阶级的"国家联系着的"③。因此，"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④。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着列宁指示的原则，在实践中找出了"正确的方法"，把在建国初期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即使之成为"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⑤ 这样，就既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又可以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30—53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0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504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2页。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它通过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工业中,这种初级形式主要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

工业中的这些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为了巩固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并保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国家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掌握尽可能多的商品,并对一切产品实行有效的国家统计和监督,而采取加工订货等办法有助于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为了使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能够维持并得到发展,也有必要这样做。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原本就缺乏独立性,它在原料,技术等方面曾经不得不仰赖于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这时,它也就不得不在这些方面越来越依靠国营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具有很大的投机性,盲目性;这时,随着市场物价的稳定,虚假购买力消失,它也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没有国营经济的帮助,它的生产已经难以为继。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正是顺应形势发展的这种需要产生出来的。

在商业中,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各种类型。在进出口商业方面,有代购代销、公私联营。在零售商业方面,有经销代销。至于批发商,则是被逐步排除的。

在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原先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权仍然属于资本家。但是,它已经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建立了外部的联系,即在流通领域中建立了联系,并已经在许多方面直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这样,它也就与单纯的资本主义企业有所不同。一方面,企业本身虽然基本上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资本家已经不能自由取得原料和自由销售产品,它的生产和经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了。另一方面,企业中的工人虽然仍然受到剥削,但是资本家所进行的剥削已经受到了限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并不全归资本家私人占有。根据国家在1953年的规定,它是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即一部分以所得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一部分作为企业的公积金,一部分作为职工的福利金,只有四分之一左右属于资本家所得部分。所以,毛泽东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

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这时，原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已经不仅是在企业外部即在流通领域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也已经深入到企业内部即深入到生产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已经在原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发挥着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公私合营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在单个企业公私合营阶段，"由国家或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实行合营的工业企业，是公私合营企业"。在"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第一，合营企业的股份分为公股和私股两部分，这表明，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全部资本家所有，而是国家与资本家共有，因此，它已经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了。第二，国家干部即公方代表进入原先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掌握了企业的领导权，资本家对于企业已经不再拥有支配权了。国家明文规定，"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企业的有关事项，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企业的董事会，是公私双方协商议事的机关。遇有重大问题不能取得协议的时候，即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核定。第三，合营企业全年盈余总额在缴纳所得税以后的余额，依照下列原则加以分配："(一)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二)企业奖励金，参酌国营企业的有关规定和企业原来的福利情况，适当提取；(三)发付股东股息红利和提取企业奖励金以后的余额，作为企业公积金。"这里所实行的虽然仍是"四马分肥"的原则，但占盈余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一部分已归公股分得，它依照规定上缴，成为国家的收入，一部分仍归私股分得，私股股东可以自行支配，但它在盈余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了。第四，工人虽仍然受到部分剥削，但他们的收入一部分已是按劳分配所得。国家并且规定，合营企业对于工资制度和福利设施，"应当逐步向相应的国家企业看齐"。国家还规定，"合营企业应当采取适当的形式，实行工人代表参加管理的制度"。② 这就是说，工人的地位和待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原先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首先，资本家原先占有的生产资料这时已经转归国家使用，并由国家统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2页。
②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223次政务会议通过。

管理和调配。其次,合营企业盈余的分配,已经不再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国家对资本家实行了定息制度。具体说,就是国家对资本家交出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按照私股股额,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也就叫做定股定息,实行定息制度之后,资本家虽然在名义上依然还保持着资本所有权,并且由此给他们带来剥削收入,但是实际上这种资本已经不能继续作为职能资本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已经被排除出生产过程了。正因为如此,工人也已经不再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的工资也不再表现他们劳动力的价值,虽然他们的劳动还有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的(即为资本家提供定息)。这种情况,也就必然会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而与此同时,资本家的生活一般也不因此降低。他们除了领取定息以外,还有薪金收入,其中一部分资本家还获得了带有赎买性质的高薪。这种做法,对于团结原工商业者并推动他们接受改造,也是有利的。再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已经完全掌握在国家和工人手里。对于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国家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在企业中给他们安排了一定的工作职务。一些有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在各级政府部门、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某些人民团体中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样,工人阶级同原工商业者的统一战线也就仍然保持着,他们大多数仍然在原来的企业中参加劳动或从事管理工作,但是他们已经不是作为资本家而是作为工人、店员或企业管理人员在起作用了。由此可见,这时的合营企业,除了资本家领取定息这一点以外,已经同国营企业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它们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一旦取消定息制度,它们也就完全成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以上情况表明,我们对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处理,与对于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处理,是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地主,是在没收他们的土地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①] 实行这样的政策,当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一定时期内,工人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进

①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5年11月。

行生产时，也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作为向他们赎买生产资料的代价。赎买与购买不同。赎买所付的代价，不取决于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改造的需要。这不是等价交换的关系。这样做，从根本上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孤立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有利于在一定时期内利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并且使党和工人阶级有一个准备阶段去学会管理工商企业的本领；有利于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抵抗和破坏，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争取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整个改造期间，资本家一共获得了32.5亿元，其中包括“四马分肥”阶段的利润13亿元，1955至1966年的定息11亿元，高薪8.5亿元。正如毛泽东所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① 所以，这个政策是一项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

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无产阶级也曾经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办法，但是没有取得成效。原因是，“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② 中国所以能够采用这种办法，并且取得成功，这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上，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无产阶级同它建立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是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的。

无疑地，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最大快乐就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这对于许多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也就不能不是一个充满着相当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过程。

当然，在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资本家的态度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实

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责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7页、第294页。

际上,在资产阶级队伍中,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即存在着左派、中间派和右翼。党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的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接受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最顽固分子孤立起来。"这也就是说,党和工人阶级要贯彻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采取鼓励和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推动资本家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①

所以,用和平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和平长人"社会主义。这是一场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只是这种斗争主要地不是用暴力方式而是用教育方式进行的罢了。而这种教育方式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除了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这个特点以外,还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

第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是使资本家接受改造的一个政治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想用和平方法去改造资本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原来就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它在许多方面都仰赖于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因此,当这些力量垮台之后,它也就不能不依靠国营经济,与国营经济发生联系,从而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了。

第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逐步割断了城市资产阶级与乡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使他们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更逼得他们无法独立地存在下去,因而不得不接受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紧接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而来,这不是偶然的。

第四,"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这也是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使得资产阶级除了走上党所指出的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他出路。

如前所述,用和平的方法,赎买的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设想,是马

①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5年11月。

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的。但由于当时还没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也就没有可能把这个设想付诸实践。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经准备把这个设想在俄国实行起来。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具有反革命性，所以这个计划也没有能够得到实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出了对于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在中国把这件事情办成功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创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胜利、新证实和新发展。它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剥夺剥夺者"的理论，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剥夺剥夺者的新鲜经验。归纳起来讲，这些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倒之后，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逐步地改造他们。没收了官僚资本，消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体部分，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用和平的方法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而用和平的方法改造民族资本主义，也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彻底孤立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势力。这两个方面，是交互起作用的。毛泽东指出，私营工商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①。

其次，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实行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一定要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是原则性。而为了实行这个原则又必须结合灵活性。"灵活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面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面是'逐步'。这就灵活了。"② 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逐步地限制资本主义剥削直至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才进行得顺利、迅速面且并然有序。

再次，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继续保持同农民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然，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但是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来说，在一定时期内，这两个联盟都是必要的。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过："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327页。

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限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① 两个联盟,就是这样地相互起作用的。

又次,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改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即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即把资本家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般说来,企业的改造是人的改造的基础,人的改造又是企业改造的必要前提。人的改造是以原来的企业为主要基地来进行的。当资本主义企业变成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的时候,国家也为资本家在这个企业里安排了一定的工作,为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②。此外,在党的领导下,还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参加政治运动、到有关地区和单位参观以了解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等,以便帮助他们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懂得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以提高他们愿意接受改造的自觉性,并加速这种改造的进程。

最后,在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注意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国家所采取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是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直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在改造的过程中,工商业本身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的七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凯歌行进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经过这七年的时间,到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也就在辽

①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4页。

阔的中国大地上基本上结束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由此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即1952年，各种经济成份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19%，合作社经济1.5%，公私合营经济0.7%，个体经济72%，资本主义经济7%。就是说，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合计为7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到1957年，各种经济成份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33%，合作社经济56%，公私合营经济8%，个体经济3%，资本主义经济0.1%。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为97%，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这表明，中国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全面地建立起来了。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出了正式的结论。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项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这些方面的教训，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实际上，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正是当前社会主义改革所要实现的任务的一个方面。"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有人提出，中共中央在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是计划用10年到15年来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面在实际上，从1953年算起，只用了4年，加上1949—1952年的3年也只有7年，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不是说明这项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甚至发生了原则性的错误呢？

应当指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是参照苏联的经验制定出来的。这个计划规定的时限，并不科学，因面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也正因为这样，这个规定就不能作为我们衡量工作中的是非得失的标准。

从实现国家工业化任务这个角度来说，这里提出的工业化标准（即工业产值

超过农业产值)是太低了。毛泽东后来说过,我国要成为发达的工业强国,大约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的估计,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大约需要100年的时间。所以,即使我们在这15年间工作一直干得很出色,什么错误都不犯,到1967年,我国的经济虽然会得到比后来实际在1967年得到的更大一些的发展,但离开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也还会有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中国在那时也还只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不可能是一个发达国家。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的话,就是用原定的15年时间,也是不应当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见,事情的要点,并不在于是15年还是4、5年,而是在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这个角度来说,15年的时限就不是不可超越的了。因为这个时限是根据苏联的经验制定出来的。为了判断这个时限是否可以超越,我们有必要把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作一点分析。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苏联并没有用15年的时间,因为那里的资本家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办法,所以在革命胜利后不久,政府就把资本家的企业没收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也是大大提前完成了,但比起苏联来,我们花的时间比他们要长得多,工作也要细致得多。就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苏联从1917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1937年完成农业集体化,一共用了20年。但是,实际上,苏联从1917—1929年这12年间,基本上没有搞农业集体化。1927年时,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还不到1%。我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经指出,苏联大搞集体化,是从1929年开始的。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决定,要求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应在半年或一年内完成,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应在五年计划期间完成集体化任务。而结果,到1930年3月1日,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就达到农户总数的56%;1934年,集体农庄已经拥有全国农户总数的75%、耕地的90%了。这就是说,半数以上的地区,集体化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其余大部分地区,也只用了4、5年的时间。与苏联相比,第一,我们合作化的基础较好,合作化的高潮不是突然到来的。合作化高潮到来前夕,1955年6月,全国农户的60%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组织起来;全国农户的14.2%已经组织在农业社里面了。第二,我国各地的合作化都有一个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的过程,不是用行政命令限期完成的。在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几乎每个乡都已兴办了若干农业社,这些社一般都办得比较好,它们不仅使广大农民从实践中认识到合作化的优

越性，而且为农业社的大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第三，我国大搞农业合作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到1956年完成，也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并不比他们短多少。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粮食大幅度减产，牲畜头数也锐减。而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是逐年上升的。由此可见，根据苏联的经验，以我国是不是按照原定的15年期限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衡量进行这项工作是否适当、进展是否健康的标准，是不妥当的。当然，这项工作有时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但这是方法、步骤上的缺点，不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

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变革。衡量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否正确和必要，应当以什么做标准呢？主要的标准应当是看这种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破坏作用。

我们看到，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期间，即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比如，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变成公私合营工业之后，每个工人的平均年产值，1952年为9297元，1953年为10800元，1954年为13401元。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比私营工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高一倍。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合营工业的产值比1955年增加了32%，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营业额比1955年增加了15%。又比如，农业生产在这期间基本上也是逐年上升的。1956年，农业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还是增长了4.9%，其中粮食比1955年增产4.4%，稻谷、小麦、薯类、烤烟、茶叶等的产量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57年的生产指标。畜牧业的情况稍差一些，但也没有发生农民大批宰杀牲畜致使畜牧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这些事实生动地表明，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

我们尤其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由于党在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果，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决定的），整个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在这期间，我们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在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又赢得了

经济上的独立。而且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来看也是相当快的。工农业总产值,1952 年为 810 亿元,1978 年为 5634 亿元,1953—1978 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8.2%;其中工业总产值 1952 年为 349 亿元,1978 年为 4237 亿元,1953—1978 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11.4%;农业总产值 1952 年为 461 亿元,1978 年为 1397 亿元,1953—1978 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2.7%。1957 年和 1978 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谷物 3→2;棉花 2→3;猪牛羊肉 2→3;化学纤维 26→7;布 3→1;煤 5→3;原油 23→8;发电量 13→7;钢 9→5;水泥 8→4;硫酸 14→3;化肥 33→3。① 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这些事实,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应当而且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动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显示。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这个制度不可能一开始建立就比较完善、比较成熟,它不能不带有与经济文化不发达这个情况相联系的许多特点;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而产生的一系列特殊的困难,不能不经历长时期的严重的、艰苦的斗争。对于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过艰难而曲折的探索,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也取得过积极的成果。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建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毛泽东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过程中说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② 这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我国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的。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原本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先于发达的

①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33 页、335 页、473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6 页。

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的胜利。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张启华　著

目　录

引言 …… (397)
第一章　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 (399)
第一节　提出问题的背景 …… (399)
一、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 …… (399)
二、"社会主义无矛盾论"的长期影响 …… (401)
第二节　第一次提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 (402)
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矛盾推动我国社会发展 …… (402)
二、要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 (403)
第三节　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 (404)
一、此前这方面的理论状况 …… (404)
二、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405)
三、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相适应
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中前进 …… (406)
第四节　反映在政治上是两类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 …… (408)
一、提出的历史过程 …… (408)
二、提出的理论意义 …… (410)
第五节　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411)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 (411)
二、科学地规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严格界限 …… (414)
三、两类不同矛盾根本不同的性质和解决方法 …… (415)
四、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 (416)

第二章 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 …… (419)
第一节 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419)
一、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 (419)
二、对过渡时期时间长短的考虑及其变化 …… (421)
三、决定实行三大改造 …… (425)
第二节 建国初期大刀阔斧进行多项民主改革 …… (427)
一、土地改革 …… (428)
二、改革旧有文化教育等制度 …… (429)
第三章 从"向共产主义过渡"到"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 (431)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认识 …… (431)
一、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的正确认识 …… (431)
二、三大改造完成后提出区分"建立"与"建成" …… (433)
第二节 一度误入歧途及其纠正 …… (434)
一、急于求成、急于过渡错误的发生 …… (434)
二、一经发现失误便及时纠正 …… (436)
第三节 对阶段问题的重新思考 …… (436)
一、区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436)
二、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 …… (438)
三、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 …… (439)
四、要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 (439)
第四节 三点结论 …… (440)
一、这是个宝贵见解 …… (440)
二、但这个认识还不牢固 …… (440)
三、不成熟的认识是和不成熟的实践相联系的 …… (440)
第四章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 …… (442)
第一节 思想渊源和历史根据 …… (442)
一、思想渊源 …… (442)
二、历史根据 …… (443)
第二节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思想的现实根据 …… (444)
一、美国方面的情况 …… (445)
二、苏联、东欧方面的情况 …… (450)

三、国内、党内的情况 …… (450)
第三节 毛泽东逐渐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 …… (450)
一、50年代中后期 …… (450)
二、60年代中期后 …… (454)
第四节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思想的要点 …… (455)
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 …… (455)
二、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在党内 …… (455)
三、决不相信帝国主义会完全放弃武力的一手 …… (458)
四、应该采取的对策 …… (460)
第五章 对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探索 …… (465)
第一节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矛盾和
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 …… (465)
一、马、恩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 … (465)
二、列宁全部接受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社会
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 …… (466)
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 …… (466)
四、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根源的思考 …… (467)
第二节 阶级斗争之弦重新绷紧的原因 …… (467)
一、毛泽东一度认为国内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 …… (467)
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使他头脑中的阶级斗争之弦重又绷紧 …… (469)
三、1957年整风开始时并未想搞政治运动 …… (472)
四、反右中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 (477)
五、反右后认为工作重心应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480)
第三节 对毛泽东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几点分析 …… (482)
一、毛泽东的新贡献 …… (482)
二、毛泽东的失误 …… (487)
第四节 6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开展与失误 …… (491)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 …… (491)
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 (493)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 (495)

第五节 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 …… (497)
第六章 无产阶级政治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 (500)
第一节 一贯致力于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 (500)
一、革命战争时期的认识 …… (500)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论述 …… (501)
三、谈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 …… (502)
第二节 经验和教训 …… (503)
一、处理好政治问题才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 …… (503)
二、经济建设不能不问政治方向 …… (506)
三、重视群众的力量 …… (510)
第三节 坚持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 …… (514)
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 (514)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由共产党领导 …… (515)
三、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517)
四、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实现形式 …… (521)
五、专政机关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 (524)
第七章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的创造 …… (528)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528)
第二节 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过程 …… (530)
一、首次提出"用阶级专政方法" …… (530)
二、工农红色政权的理论和实践 …… (531)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共和国" …… (532)
四、在一定历史时期作为过渡形式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 (533)
五、人民民主专政原则的提出 …… (533)
第三节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 …… (536)
一、社会主义阶段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特点 …… (536)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 …… (540)
三、人民民主专政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 (546)
四、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 (550)
五、国家机关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 (553)
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 (556)

引　言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在开创初期的探索,其艰难困苦自不待言,其经验和教训于后人更为可贵。"以史为鉴",这条中华民族的千年古训,说明了认识历史和理解现实的密切关系,史学亦由此被称为治国之学。恩格斯在称赞马克思的著作《雾月十八日》"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时指出,马克思所以能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它有这种透彻的洞察,就是因为他"深知法国历史"。可见,为了理解现实,必须懂得历史。在我们今天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时,了解一下我们的共和国在最初踏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的历史,了解一下那最初的艰难探索,其借鉴作用更为直接。今天的现实正是此前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彼此之间有着可以感觉到的割不断的联系。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的规律、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种重要的现实的启迪。

尽管如此,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踊切过去的历史都与现实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因而也须联系到当前才能有较深刻的理解,但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历史研究的一般性原则中很重要的一条:绝不能忘记了特有的历史条件,更不能只是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获得的新的眼光和新的认识成果来对历史加以评判。我们的眼光一刻也不要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是怎样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伟大的中华民族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为实现社会主义纲领,为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的历程。

还有,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记住列宁的这句话是有益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

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 这对于我们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必须的。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54页。

第一章

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是否还存在矛盾?若存在,该如何解决?这些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是刚刚步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碰到的一个理论难题。正是在努力求解这一难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具体实际,同时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学说,在此后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示出不可磨灭的真理的光辉;即使是教训,亦从反面证明了它的正确。就是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节 提出问题的背景

一、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

任何理论都在实践的需求下应运而生,其理论意义在对实践的指导中体现。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也不例外。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建立起来,我国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如何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伴随着历史转折面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也使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复杂的情况。我们党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开始了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是复杂而严峻的。

国际方面，主要是1956年2月14—25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看法，特别是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尖锐批判，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赫鲁晓夫在会后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基本上对斯大林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固然在一方面促使各社会主义国家尽快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但其消极作用是更大的。第一，由于报告对斯大林的功绩所做的不公正评价，引发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尖锐分歧；第二，更严重的是，东欧一些国家的人民，主要是波兰和匈牙利，为了摆脱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控制采取了一些过激行动，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插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就在这年的6月和10月，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和群众暴力行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世界范围内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则围绕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以及如何认识、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问题，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有些党员退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国内方面，苏共二十大引发的问题对我们党内和人民群众发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在上述重大问题上产生了种种怀疑。波匈事件对我国也有很大影响。加之不少人对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全适应，党和政府工作部门中存在的某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也引起群众的一些不满。诸多原因加在一起，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方出现闹事风波。据统计，当时全国各地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农村还有部分农民闹退社、分社。由于当时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缺乏经验，对中国国情也缺乏深刻了解，因此，面对出现的问题，许多党员、干部思想没准备，在惊慌失措茫然不解之中，有些就对少数人闹事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压制，不仅没能化解矛盾，反而令矛盾更趋激化。

为了澄清是非，清除混乱，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并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表示我党基本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同时，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全面论述了斯大林的功过，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历史地、公正地分析和认识斯大林的错误。两篇文章的发表与其他方面的工作相配合，在国内外都起了稳定人心、稳定局势的作用。

国际国内的上述形势,使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社会主义无矛盾论"的长期影响

很长时期内,"社会主义无矛盾论"广为人们接受,至少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这个问题,认识上是不清楚的。

在当时的苏联,斯大林及苏联国内理论界,基本上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失去了它的普遍性"①。理由是,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剥削阶级,阶级对抗就结束了,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取得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甚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斯大林在1936年以后的一些著作中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完全适合"的。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观点,不但影响了苏联理论界,对我国理论界也有很大影响。斯大林晚年对这一观点有所纠正,但也只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却没把它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因而不可能做出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着矛盾这样的理论概括,更不可能得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的科学结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理论界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许多人开始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仍然存在。但这种认识是不系统的,并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讨论也未深入进行下去。

这方面理论准备不足的结果是,不但造成苏联当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具体制度的僵化,而且,当此后相继发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包括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矛盾,以及在当年波兰、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这些事件有着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时,苏联领导人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致使矛盾更激化了。而此时我国,不少人受苏联理论界"社会主义无矛盾论"的影响,只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团结一致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不愿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矛盾和斗争。因此,当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闹事等现象时,他们不能解释,不知所以,陷入悲观苦闷之中。这就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是存在矛盾的,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就谈不上正确地解决矛盾,矛盾处理不好就会激化,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后果。这样,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

① 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年第6期,第76页,《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真实的和虚构的矛盾》一文。

题，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的迫切需求下，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并根据中国情况，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

第二节 第一次提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矛盾推动我国社会发展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并且正是这些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他针对上述国际国内出现的问题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① 1957 年 11 月 18 日，他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②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都是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③，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是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矛盾"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④。这就说明，历史过程中依次发展的阶段，都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变化所形成的某种发展段落；只有掌握了矛盾发展的线索，才能够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和表面的偶然性，揭示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⑤。毛泽东正是依据这一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观点的。正如他在 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6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4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462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31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第 286 页。

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① 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根本理论基础。

二、要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倡应用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他在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十大矛盾,堪称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典范。他并且认为,通过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篇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许多重要思想。此后,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和1957年1月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都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对于解决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也主张运用这个方法。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对同志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而的统一。"② 他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要让我们的支部书记懂得辩证法。

事实早已充分证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矛盾、充满矛盾斗争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就是在不断认识、分析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迈进的。矛盾产生、发展、解决,又在新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解决的不断的过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综观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始终面临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三类:第一,党领导人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0、642页。

民为发展生产而进行的斗争，即人同自然的矛盾；第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我们国家、民族同世界列强的矛盾，从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到60年代中期的抗美援越，以及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犯等等，都属于这类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三类矛盾中发展的历史；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就是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斗争中，因各种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出现的曲折。

总之，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并且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观点，是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当然，这一思想的萌芽在列宁那里已有。列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论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 但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出应该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是毛泽东。

第三节 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一、此前这方面的理论状况

当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一致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时，斯大林特别强调"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②。作为这一问题讨论组织者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也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完全适合，不是要求而是排除这二者之间的矛盾"。③ 这种观点在苏联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极少数持"有矛盾论"观点的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矛盾，并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④ 这就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概念。虽然他们还未能对这一概念和这一论断作出科学的规定和充分的论证，但毕竟是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晚年思想有所转变。他1950年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别承认并论述了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282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③ 见该刊第8期。
④ 见该刊第8期。

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矛盾及其辩证关系,并提出,对这些矛盾如果政策不对,调节不好,就会发生矛盾,甚至弄到冲突的地步。这是斯大林在该问题上认识的一个进步。但他最终没把这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斯大林逝世后,他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再思考。苏联理论界在1955—1957年期间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基本矛盾问题的讨论。此时,大多数人已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承认矛盾是任何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矛盾并未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消失;并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特点是矛盾的非对抗性。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在这次讨论中则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有人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基本矛盾,只承认有局部的和暂时的矛盾;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关系与资本主义残余之间的矛盾;有人认为,这个基本矛盾是人们在利用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地位和享受物质待遇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之间的矛盾;还有人认为,这个基本矛盾是全体人民无限增长的需要与物质文化资料生产的发展在每个时期内所达到的水平之间的矛盾,等等。这种情况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已经成为实践中提出的一个迫切需要给予科学回答的问题。

二、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党尚未经过充分的社会主义实践,故不能发表系统意见。只是到了1956年下半年,经过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取得胜利,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实践,同时也了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在该问题上的一些理论观点及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提到了日程上。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取斯大林及苏联理论界在此问题上的积极成果和教训,结合我们自己多年的正反经验,集中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系统理论。

毛泽东创立的这一理论明确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经济基础中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正是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们为发展生产、推动社会前进而进行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这一矛盾运动

才引发出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所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是各种社会形态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毛泽东在提出应该用矛盾的观点、方法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时，强调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作出这一概括，同样是依据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并第一次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提出了“基本矛盾”概念。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的具体分析指出，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① 他们并以对这一矛盾的具体分析为基础，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列宁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指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② 列宁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帝国主义，揭示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得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科学论断。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还没有明确地规定过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

三、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中前进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旧社会由于存在阶级压迫，所以其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点，这就从根基上排除了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国家也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人民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58—75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37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这个根本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认为,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面,主要是指,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国家可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可以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二者又相矛盾,因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①,这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与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力之间,社会主义各项具体制度内部各个具体环节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等等方面,都会产生矛盾。有些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容易解决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这种又相适应又不完全适应即相矛盾的状况。对此毛泽东分析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② 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中,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的方面,相矛盾的一面虽然是局部的和次要的,却是不可忽视的。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前进的。他认为,这种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一些矛盾解决了,一些矛盾又会出现,又需要去解决,由此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正如他指出的:"矛盾不断地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③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提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必须经常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理论根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8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8—769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9 页。

第四节 反映在政治上是两类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在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出,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重大发展。

一、提出的历史过程

还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已提出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早在1925年我党建立不久时,毛泽东即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①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复强调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② 即对敌人要坚决揭露和打击,对同盟者要有联合有批评,对人民群众的缺点则要进行长期的耐心教育,而不应讥笑甚至敌视他们。1944年9月,他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同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指出:"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6—1437页。

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 综上所述,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把社会矛盾分成了两类。

建国初期,毛泽东在新的实践中重申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在1950年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重申:"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② 1955年5月他又提出:"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而"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③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概念,并明确提出两类社会矛盾问题,是在经他修改后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文中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5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418页。
③ 《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① 这段话不仅明确使用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概念，而且谈到了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的原则方法，还谈到了两类社会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等问题。只是，这里所讲的两类社会矛盾仅限于国际范围，而且是把敌我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上，还未专讲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问题。

真正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是毛泽东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② 他还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③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具体阐述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系统学说。

二、提出的理论意义

首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是毛泽东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他们的时代，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因而不可能对此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列宁在他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来不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具体研究，只是在谈到对抗和矛盾问题时原则性地提出："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灭，矛盾仍将存在。"④ 面斯大林则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把苏联当时存在的矛盾归结为内部和外部两类，他说："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

① 见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③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④ 《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282页。

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① 在苏联于193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却认为没有矛盾了，如果有矛盾，那只有外国帝国主义。正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失误，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混淆了国家政治生活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肃反严重扩大化，造成极大损失。斯大林逝世后，如前所述，苏联理论界虽然经过1955—1957年的讨论开始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但未形成统一意见，更无从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以形成系统认识。所以，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人。

其次，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如本章一开始讲到的，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矛盾和社会动荡，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感到茫然不可理解面无所措手足。毛泽东恰在此时正确指出这种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科学地揭示了这一矛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方针。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第五节　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从哲学思想上讲，毛泽东的一个观点是："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② 运用这一正确的哲学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应该着重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还在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前，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322页。

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①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② 这就说明，毛泽东不仅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这篇著作的中心内容，而且是把它当作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所以如此，毛泽东的根据有二：

一是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敌我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居于主要矛盾的地位。正如此后不久毛泽东在3月29日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到的：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二是他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旧社会的矛盾有根本的不同，那么解决的方法也就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与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因而不能通过社会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而只能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情况下存在某些不适应即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解决这样的矛盾，不需要运用社会革命的方法进行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变革，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各项改革来实现。所以，相对于解决旧社会基本矛盾所采取的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

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以往存在着剥削制度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因此，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国家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6页。

政治生活的主题,"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①。在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原有的社会矛盾有的消失了有的还存在,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出现了而且突出了。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便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必须回答的一个事关重大的新问题。毛泽东就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和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这一论断,明确指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它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

更重要的是,这一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第一,主要矛盾的变化同主要任务的变化的依据是一致的。这依据就是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所以,"过去的那种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我们在这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②。"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

第二,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决定着主要任务的变化。既然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应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④ 他还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08页。
② 《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上的谈话》,1957年3月20日。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9、773、771—772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页。

的了。”①

毛泽东这些论述都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过去的搞阶级斗争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知，毛泽东确定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此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理论根据。

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贯穿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全文，是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和主要价值所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性的贡献。

二、科学地规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严格界限

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首先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人民”和“敌人”概念作了科学规定。他指出，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②

毛泽东对“人民”和“敌人”两个概念所作的科学规定和区分，实际上也是对“人民内部”和“敌我”两个概念所作的科学规定和区分。由此他具体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70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7—758 页。

的一个矛盾"①。毛泽东还专门指出,在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②

三、两类不同矛盾根本不同的性质和解决方法

在科学规定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矛盾严格界限的基础上,毛泽东阐明了两类不同矛盾根本不同的性质和解决方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面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③ 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④

正由于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有严格的区分和截然不同的性质,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这不同的方法,简单讲就是"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⑤ 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指"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⑥。例如,逮捕他们并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他们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⑦ 对人民内部矛盾则不能采用专政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8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8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8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8 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5 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9 页。
⑦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9、765 页。

方法解决，“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① 还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反复强调，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不能用强制的方法解决，“企图用强制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② 他主张：“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③

但毛泽东又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在人民内部就不需要法制、纪律和集中，他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④ 而且他认为，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但与对敌人的专政有原则区别。⑤ 他把这概括为“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⑥，即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结合和统一。

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概括来讲，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具体来讲包括，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要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搞好民族团结、特别是搞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

无论是处理敌我矛盾，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都一再强调，一定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路线，一条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对具体矛盾作出恰当的处理。

四、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可相互转化一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毛泽东举例说：工人阶级和民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本是对抗性矛盾,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如处理得当可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如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这个政策,那么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矛盾。① 又比如,反革命是消极、破坏的因素,但在我国条件下,其中大多数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② 同样,人民内部矛盾若处理不好,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也可能发生对抗。对于1956年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事件,毛泽东作了具体分析。他在1957年3月批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批评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处理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是错误的,不但没认识到官僚主义是造成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还常常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而造成了矛盾的激化。3月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主题也是这些内容。其中,他在亲笔写的一篇南京讲话提纲中明确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即由阶级斗争转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批评许多人不认识这种转变,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在这些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处理这种事情,第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第二,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对闹事的带头人物,除违犯刑法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法办外,不应轻易开除。对少数坏人,则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总之,毛泽东认为,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就一定能够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创造了良好开端。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正确理论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都未能真正贯彻,以致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对于认为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也有许多未能正确处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错误更加严重,造成了极大的失误。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5页。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章

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

第一节 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即从百年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却屡遭失败的教训中坚定地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走向繁荣富强,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落后的旧中国无法一步到位,因为当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只能搞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能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认识,是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确定的。但由于当时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还不十分清楚,因此存在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意见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需经过一段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而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则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反对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确解决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问题,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科学地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内在原因,因此既说明这条道路必将是艰难曲折的,又深刻说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前途。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原则和方针,毛泽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确定为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方面组成,并对这三种经济成分当时的状况作了具体分析,指出这种两重性的经济政策是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经济

政策的特点，这种两重性特点是由民主革命的社会经济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对于这个革命的领导权这两方面的客观事实产生的。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更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内部应该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解放战争时期，当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这个基础上构成的新中国经济成分为：(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新中国建立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加注意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农村个体经济、城市私人经济三部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尽管它量小，却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后两种经济虽然量大，但不起决定作用。毛泽东还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我们要利用它来发展生产；我们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还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我们并不去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去破坏农民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所以这时候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但由于中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所以，新民主主义这种两重性的经济政策不会永恒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平分秋色。所以，在研究和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时，毛泽东时刻都没忘记，为坚持和保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支持其发展的同时，必须加以限制。为此他提出，在一定时期内要保留资本主义，又必须限制资本主义。

毛泽东关于限制资本主义的思想，主要包括：(1)要将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2)即使对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也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给以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3)对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而又积

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两点基本结论是:第一,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前途,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早晚要进行的;第二,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要保留资本主义,同时对其加以限制。

二、对过渡时期时间长短的考虑及其变化

中国革命取得的第一步重大成果,即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当时生产力状况看,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仍有一定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在一定时期内还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然而,诚如毛泽东 1940 年 3 月所说: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①]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段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多长?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三大改造的实行时间。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所设想的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物质、精神条件完全成熟后,或曰具备了政治、经济一切应有条件时,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了过渡时期的时间长短问题,另一方面也明确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条件。所谓政治的条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所谓经济的条件,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两个条件,既是毛泽东在当时考虑需有一较长过渡时期的依据,也是他在以后要把过渡时期缩短的依据——因为后来这两个条件发生了变化。

当初主张要有较长时期新民主主义的理由,从生产力状况讲,毛泽东认为,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空想。所以新中国诞生前夕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郑重指出,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建国后继续搞一段时间新民主主义,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迅

① 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讲话》。

速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使新民主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待条件基本成熟时即向社会主义转变。从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来说，正因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以资本主义还不发展，也因此，“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①

总之，一是生产力状况，一是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两点，始终是毛泽东考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则及其实施时间长短的两个基本点。从这两点出发，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都还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他在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刘少奇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讲话讲到“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时，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这年7月他又说：20年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在开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有民主人士提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会议期间当民主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回答说：大概要二三十年吧。建国后，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词中也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很远的将来的事，要10年或15年以后才全面开始搞社会主义。所以那时，毛泽东采取了保留资本主义的政策。

这种认识后来发生了变化。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面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这年11月3日的会上他说，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1953年2月27日的会上他又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说法显然与此前不同了。毛泽东这时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开始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这一结论，在1953年12月

① 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经毛泽东审改最后确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作了如下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在《宣传提纲》中讲明是3个五年计划,加上经济恢复的3年,共18年。后来,毛泽东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①这是毛泽东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大致有三: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状况看,虽然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短短三年即胜利完成,农业生产已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现代工业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作为最重要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壮大起来。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历史最高水平,钢、煤、发电量、原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业产品的产量大大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②。同时,国家拥有的这部分生产力,主要部分是高度集中的,控制着全国经济命脉。所以,已具备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定的生产力条件。其他各项工作也进展顺利,全社会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工业化的计划已水到渠成,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具备了应有的物质条件。

第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随着土改在全国的完成,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有计划开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愈趋激烈。到1952年底,在五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虽有增长,但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仍占绝对优势,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尚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及个体经济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官僚资本虽被没收而成为国营经济,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量个体小生产者(包括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仍然存在。个体小生产不仅同民族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它本来就具有资本主义的倾向。于是出现这种情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② 钢产量达135万吨,发电量达72亿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64.2%,职工人数已达1600万。

况：一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因而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又开始暴露出来，一些不法资本家采取各种违法手段大肆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和经济情报，甚至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品中偷工减料，极为恶劣；二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有所发展，资本家常用不正当手段同国营经济争夺原料和市场，或利用国家分配的原材料制造计划外能获高利的产品，破坏了国家的购销计划和价格政策；三是在农村，广大农民经过土改生活虽有改善，但约有60%—70%的人仍有困难，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不少农户出卖土地或劳动力，或靠借高利贷维生，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新富农。因此，广大农民特别是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四是技术和管理都十分薄弱的民族资本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极低的个体小生产，以及一片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和在全国占绝对优势的小商品生产，同国家的工业化发生了尖锐矛盾。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在大规模开展的经济建设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家计划经济之间、个体经济的分散落后与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毛泽东认为，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斗争。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1952年6月，他在统战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 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革命发展阶段的转变。

第三，对原先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毛泽东现在认识到，其实已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或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如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过去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现在则明确这同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这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所以毛泽东说，就没收官僚资本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同样道理，对民族资本采取的利用和限制政策，过去也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现在则认为，这种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已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于农业合作化，解放区已有初步实践，建国初在老区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广泛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虽说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的,故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但确为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正是在这种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党也积累了新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要不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认识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原先想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全国胜利后经过10年、15年或20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向资产阶级进攻,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是准备从现在就开始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向前过渡,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增加,争取用10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10至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毛泽东在这里是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看成一个渐变的过程。从上述生产力状况和与资产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看,这种想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三、决定实行三大改造

正是上述情况,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实行三大改造。

当时有人提出,应当先搞机械化再搞合作化。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发展生产力和改变生产关系两者相互关联、不可分离。他在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曾把"一化"和"三改"比作"主体"和"两翼",认为实现工业化是一只鸟的"主体",实现三大改造是鸟的"两翼","主体"和"两翼"是个整体而不可缺一。即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商业,用新技术政造个体农业、手工业,迅速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战胜私有制经济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另一方面,只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扫除障碍,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有力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所以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生产关系的变革能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三大改造的目的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他不同意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合作化的观点,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也是在革命之后。195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有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提纲》时增写的一段话,其中说:"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来一

个革命，把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事实证明，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的确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宽广道路。这是三大改造这项工作总体看是成功的根本标志。

还在三大改造处于高潮中时，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①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解决了此前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之间越来越突出的矛盾，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这个时期，在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存在一些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这是符合我国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很不平衡的状况的。由于这个时期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因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国家有可能把十几万户私营工厂加以改建、扩建、合并、改组，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并将其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对私营商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和调整，使之分布更合理，更适合满足城乡居民的需要，并逐步开始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由于已经不必顾虑惟利是图的资本家的捣乱和破坏，可以更放手发展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同时，手工业合作化以后，由于组织了大规模的分工协作，从手工生产逐步转向机器生产，很多手工业合作社在两三年内已发展成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工厂，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在农村，农业合作化后，生产力也获得了新的解放。由于打破了土地私有制度和小农个体经济的限制，可以更合理地使用劳动和土地、耕畜、农具，进行各种小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并更有利于把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中的最主要因素——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得到充分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7 页。

发挥。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三大改造运动的顺利进行,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和苏联及其他各兄弟国家的援助下,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绝大多数指标都已提前完成。同时,大批新建和改建企业投入生产,开始改变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我国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等新的工业部门。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逐步建立起来。加之当时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因此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提高。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始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

当然,三大改造工作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尽管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此之后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但终因对"左"的错误认识不彻底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纠正,且对部分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作法匆忙加以否定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致使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长期来一直比较单一。此后,这一"左"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所发展,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出现严重不适合的问题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前进。"文革"结束后,为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通过调整各种经济成分的合理配置和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方面的改革,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现阶段的生产力状况,这证明改革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目前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50年代进行的三大改造也是正确的,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丝毫没有相互否定。这样看待历史问题,就是遵循一定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一历史辩证法所要求的。

第二节 建国初期大刀阔斧进行多项民主改革

毛泽东是一位极具改革精神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人。建国后,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其中较大的有三次:建国初期的民主改革、五十年代中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的经济体制改

革。其间有成功有失误,可贵的是,他一旦觉察到失误,便力图纠正,并进行再次改革。

一、土地改革

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久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目的是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即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封建土地制度的最不合理之处是,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90%以上的贫雇农则只占20—30%的土地。地主富农用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残酷剥削贫雇农,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生活极端贫困。这种土地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也是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民主进步的最大障碍。为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于1950年冬天开始在有2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逐步实行。

土地改革运动,无疑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为减少阻力,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制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此,规定了一些保存富农经济,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和分化地主阶级的具体政策;同时建立了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团,也欢迎和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视察土改工作。这些做法,消除了各界人士的疑虑,也利于发现和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偏差。由于方针政策正确,工作细致,所以,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不但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搞得最好的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也涉及到毛泽东在家乡的财产。土改时,毛泽东家"具有'富农'的地位"。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许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十五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有二十五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七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1936年10月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所以,在1950年冬天韶山的土改进人划分成分阶段时,韶山的农

会主席就很为难。一是毛泽东家该不该划富农成分？二是他家的财产该不该分？于是他给毛泽东往北京写去一信委婉询问：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分、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不久，毛泽东即派他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回到故乡，转达了他的几点意见：第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第二，划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三百元，作退押金；第三，人民政府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才会相信政府。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真正的人民领袖的宽阔胸怀，看到了他坚定不移的改革家风貌。

全国的土地改革于1953年春基本完成。其意义在于，挖掉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和我国贫困落后的老根，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此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二、改革旧有文化教育等制度

毛泽东认为，经济制度的改革必将引起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而后者又反作用于前者。在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①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即规定："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一个月后，10月15日，他在一封信中又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②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和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这样，对旧有教育文化制度的改革就逐步展开了。

首先是对学校进行改革。废除其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国民党设置的反动课程和教材，实行民主管理，开设以人生观教育为主的政治课，在大专院校增开《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少年儿童队、学生会和教工组织。1950年开始实行高等学校有计划的统一招生和毕业统一分配。同时改革旧学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进行高校的课程改革，并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改革旧有的社会文化事业。对电影旧片进行清理，对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新片上演制定了暂行办法，对旧片内容中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进行删剪或禁止上演。与此同时组织力量摄制了一批优秀影片。这些做法，迅速改变了旧中国由美国电影垄断我国电影市场的状况。再有就是进行戏曲改革。为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1 年 5 月政务院公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为了继承遗产，必须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对旧有戏曲必须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历史的、艺术的观点重新加以评价和审定。对其中一切好的剧目都应作为民族传统节目加以肯定，对其中颠倒或歪曲历史事实，丑化劳动人民的东西坚决加以修改，同时删除表演方法上的糟粕。戏曲改革一般不应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方法，而是依靠与广大艺术工作者合作，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1952 年 10 月初到 11 月中旬，文化部主办的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就是这次戏曲改革的成果。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观看了演出，为新中国的戏曲艺术事业奠定了基础。

此外，还进行了婚姻制度的改革。1950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这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废除，是建国初期肃清封建影响的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生活的一个巨大变革。

第三章

从“向共产主义过渡”到“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什么阶段,这是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都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对该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何种阶段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痛苦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后,他终于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的认识。这一认识,是他的社会主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认识

一、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的正确认识

毛泽东判定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同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认识紧密相联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思想,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得比较早。

还在建国前夕 1949 年 3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时就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1439 页。

新中国成立后，当我国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时，毛泽东就在1954年6月提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① 回答这一问题，毛泽东是以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状况为出发点的，——正像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这一论断时，所根据的是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占10%而农业、手工业占90%这一基本事实一样。他当时认为：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② ——这就是："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③ 正是根据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毛泽东在回答"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这个问题时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④ 这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十五年左右只能打下一个基础，真正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又反复重申这个看法，以加强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性的认识。他在1955年3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⑤

此后，他又把时间作了延长。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在结论中提出，要在50年到75年即10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期间，在接见参加八大的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团时，他提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二、三大改造完成后提出区分"建立"与"建成"

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个区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

我国的三大改造是提前完成的。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定,应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大大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正如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的:"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①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整个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这时,毛泽东的头脑是冷静的。他在此前于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从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程出发,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一年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② 这年7月,他又指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③

总之,他在这个时期认为,即将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不但将是半个世纪以上的长期奋斗的过程,而且,在这个长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有不同阶段,即三个五年计划内打下一个基础,再经过十个五年计划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这就区分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一思想,是他以后在纠正"左"的错误中提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不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550页。

同阶段的思想萌芽。从这一段来看，毛泽东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有时估计得长一些，有时估计得短一些，即使估计得长一些的时候，现在看来也还是短了。然而无论如何，他确实是认识到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第二节 一度误入歧途及其纠正

一、急于求成、急于过渡错误的发生

但是，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很长时间这一正确估计，却在中途发生了变化，一度误入歧途。

由于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以及1957年整个经济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因而在思想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又有所忽视。加之当时国际上波匈事件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发生促使毛泽东对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加强了警惕，因而在建设速度上更加急于求成。与此相适应，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也出现了急于过渡的情况。其表现：

第一，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方面，决定对城镇个体工商业者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力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提出：第一，组织个体手工业户入社。除少数不适合组织集体生产的某些特种手工业品允许继续进行个体生产外，其余全部组织加入手工业合作社；第二，把集体工商业并入或转为国营企业。1958、1959两年，由商业合作店、组并入国营商业的有109万人，由手工业合作社(组)转产过渡的占总人数的86.7%，其中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的占37.8%，转为合作工厂的占13.6%，还有一部分转到人民公社。余下留在合作店、组的约90万人员，虽保留了合作商店的形式，但大部分由归口国营企业统一核算，或者吃"大锅饭"，按国营办法统负盈亏；第三，限制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规定不得超过同行业合作社或国营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超过的要采取经济措施(例如加税等)加以控制。这种更加趋于单一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严重挫伤了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

第二，在农村公有化程度方面，毛泽东先是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全国大

兴农田水利建设活动中,提出把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继而又于1958年8月上旬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肯定了在并社中出现的"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的人民公社,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这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当时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从思想、理论来说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已包含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这全民所有制成分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并逐步代替集体所有制;以为这种过渡很快就可以实现,有的地方三四年,有的地方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即可完成;而且以为这种过渡完成后,还是实行按劳分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之后再经过多少年,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因此《决议》提出,要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宣布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并进而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此期间,诸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不断涌现,原先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思想,已不见了踪影。

第三,在建立物质基础所需时间方面,毛泽东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还说:"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① 但到1958年6月22日,他在向军委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中却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②

这里姑且不论怎么理解"建成社会主义",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那就是对于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充分的物质基础"的艰巨性、长期性估计得太不够了。

上述这些在城乡两个方面都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制程度的做法,显然超越了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要求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物质基础,也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并远远超出了实际的可能,因而对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损害。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55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

二、一经发现失误便及时纠正

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觉察到了这一"左"倾错误。而且应该说，毛泽东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通过调查研究较早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的领导人。他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提出，要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1959年又批评去年的大跃进，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当时采取的纠正措施主要有：

首先，从八届六中全会到1959年9月，先后在有关文件中规定："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自留地可以占耕地的5%；鼓励社员利用零星闲散地进行耕种，谁种谁收，不征公粮和派购任务；等等。同时调整了城镇手工业所有制结构，提出凡转为全民所有制后，对生产不利、对居民不便的手工业合作社，要采取适当步骤退回来，还强调了家庭手工业的作用。

其次，对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也开始进行局部调整，主要是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采取的措施主要表现在经济核算单位的变更上。先是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一般性地规定生产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后又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明确提出生产大队是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基本单位，这就比最初实行的公社所有有了明显进步；最后到了60年代初，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明文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并决定这种制度至少30年不变。应该说，到这时，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关系已经调整得比较合适了。经过调整，我国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

第三节　对阶段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区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上述总结教训、纠正"左"的失误的过程中，毛泽东率先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以往有过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结合一度所犯错误的教训，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

主义阶段"的科学命题,并认为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在郑州召开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专门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关理论问题和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并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这个《决议》在后来1958年11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提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强调"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从这一基本理论观点出发,《决议》强调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性质,指出认为公社是全民所有制是不对的。《决议》说:"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现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公社集体所有,同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全民所有不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但是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合理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却不能作到这一点。认为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议》还批评了那种急于过渡的思想,指出,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议》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为此,《决议》深刻地提出了必须注重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

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①

二、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

在1959年二三月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达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逐步建成社会主义。这里，仍然是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来考察分析和规定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的。他是这样说的："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② 之所以如此，毛泽东是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分析的。他说：要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③ 他还非常具体地提出了时间的问题："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他还作了这样的自我批评："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④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单行本，第12—15页。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党的文献》1994年第4期，第79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67—68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9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三、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

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的读书活动(即毛泽东带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三版)》)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及我国当时所处阶段问题,作了进一步探索,提出了新的重要见解。他明确提出,要通过生产力与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边",即阶段特征问题。根据这个道理,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一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创见,是他在以往三大改造刚结束时提出的区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阶段思想的基础上,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其深化和发展,不仅在于概念更具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他过去所说的"建成"社会主义实际上只相当于他现在所说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提出上面这些思想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我国现在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观点。这些思想,不但在实践上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有效地指导了我国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从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力状况的错误中摆脱出来,走上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使我国6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在理论上是一个巨大的创造,为我们党在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不失为这一理论的思想渊源。

四、要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的时间,又作出了新的思考。他在1961年同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蒙哥马利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毛泽东则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告诫全党同志:"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

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①

第四节 三点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这是个宝贵见解

毛泽东在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错误之后,曾经认识到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不仅多次提到中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后来又明确地说要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且明确地使用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提法。这在像中国这样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问题上,无疑是提出了一个宝贵的见解。

二、但这个认识还不牢固

由于实践经验不够,这种认识还不牢固,以致在特定条件下,还会重犯急于求快、急于求成的毛病。最明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谈了理论问题。毛泽东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在此前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就讲过我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指出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有它的负面作用,这是对的。但是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很不发达的阶段,对于商品经济在长时期内都要大力发展。这里只强调"加以限制",显然是超越了历史阶段,同他以前的认识不那么一致了。

三、不成熟的认识是和不成熟的实践相联系的

不成熟的认识是同不成熟的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7—829页。

已经经历了几百年,尽管它还有发展有变化,但作为基本制度已经定型。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二十多年时间,要求他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搞得那么明确,无疑是对前人的苛求。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过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是这样,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看来不经过事物在运动中的多次反复也是不可能的。

第四章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

在毛泽东二十多年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是他始终竭尽全力思考的两件头等大事。而在巩固社会主义这件大事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和平演变。

在我们由于长期深受“左”的错误的危害而批“左”的时候，一度对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正当毛泽东的这方面思想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被淹没的时候，80年代末发生在苏联、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急剧演变的事实，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思想的关注。人们不能不钦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不能不认识到，既然和平演变的危险现实地存在着，认真研究反对和平演变问题便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和理论，确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不可轻率地抛弃。

第一节　思想渊源和历史根据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在五六十年代形成，70年代得到深化、发展的。这一思想的产生，并非头脑里凭空想出，亦非根据逻辑推论而来，而是有其思想的渊源、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根据的。

一、思想渊源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特别是在《法兰西内战》一文的导言中，就已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想。用现在的语言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果无产阶级的官员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了，这就是一种和平演变。

列宁作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一个实践者，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极其敏锐地洞察到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

并于1920年3月29日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鲜明地、尖锐地提出了警惕、防止和反对"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任务。那时,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意识到,从此,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社会主义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就此起步,面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和较量也由此开始了。所以,苏维埃政权在地平线上刚一出现,各帝国主义国家就迫不及待地联合起来,同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妄图通过武装颠覆,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是他们的硬的一手。遭到失败后,他们即考虑用软的一手,妄图"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这次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发表在《中央委员会通报》上的加米涅夫同志的提纲,把这个问题的基本点完全表达出来了。他们想使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① 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提出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严重问题。

以上是毛泽东提出反对和平演变问题的思想渊源。

二、历史根据

其历史根据,可以追溯到早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即把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材料印发给大家学习,指出要吸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这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如何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本色、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再次提出要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解放军快进城的时候,演了《甲申记》,戏中有首歌是陈圆圆对着李闯王的大将刘宗敏唱的。歌词是:"今朝呀今朝,旧江山换了新主,正要把基业稳固,莫因妾,逼反了儿父。"毛泽东希望以此告诫共产党人,进城执政后,不要贪图享受丧失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127页。

革命意志。据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回忆，进城前后，毛泽东最大的担心莫过于人们革命性的衰退。1949年进入北京城的那天，他曾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否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尽管毛泽东仍把同国内外敌对势力斗争的重点放在反对他们的武装颠覆上，但他已经预见到，由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敌人对我们的斗争方式也将有所变化。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极具远见地提出，在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党要站住脚，要维持并巩固革命政权，必须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各种斗争。斗争将采取公开的和隐蔽的多种方式，要对付不拿枪的敌人。他还预见到，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和"捧杀"将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的主要危险。"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① 时隔不久，当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明确表达要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身上后，毛泽东即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玩弄的种种阴谋，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存在某些幻想的知识分子，即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作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并指出，艾奇逊们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在此时已经充分注意到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了。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文章，揭开了同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进行斗争的序幕。

但到这时为止，李自成的教训也好，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问题也好，毛泽东还都是着重于注意防止掌权者个人的思想腐化变质，尚未涉及整个党的政治思想理论路线问题，还不涉及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问题。

第二节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思想的现实根据

直至50年代国际国内发生一系列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把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提到了整个党的路线问题上来对待。这些事件的发生，是毛泽东提出反对和平演变问题的现实根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8页。

一、美国方面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充分暴露并日益膨胀起来,特别是把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当做最大的敌人。当时的杜鲁门政府以霸主自居,到处侵略扩张,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实行战争政策和"遏制"政策,发动了侵朝战争,还企图武装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对我国和苏联实行军事包围和冷战政策,进行原子讹诈,在全球范围建立军事基地,等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断壮大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实力地位相对削弱,杜鲁门的战争政策和"遏制"政策遭到了彻底破产。其后任艾森豪威尔政府于是制定"大规模报复"战略,企图凭借实力挽回颓势,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玩弄"战争边缘"外交,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出来。然而,这一着也被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所击破,以至后来连约翰·肯尼迪都说,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政策已被证明是"幻想"。

正是在这样的战争和"遏制"政策遭到惨败的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整个国际敌对势力也逐渐变使用武装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为更加注重用所谓"和平"的手段实现其颠覆的目的,在不放弃继续推行武装侵略和干涉政策的同时,越来越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

让我们来看一看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自 1947 年 5 月至 1966 年 7 月的形成过程。

1.艾奇逊

早在 1947 年 5 月,美国就成立了专事制定战胜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的机构,这就是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所谓遏制政策,即不限于以军事手段,也包括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 年 7 月 30 日,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致信总统杜鲁门,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要把今后在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他在信中写道:"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这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开端。几天后,这封信连同《中美关系白皮书》于 8 月 5 日由美国政府发表。

2.艾森豪威尔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进一步把和平演变提高到整个西方世界的战略高度。1957年他在北大西洋组织会议上发表演说道:“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他把这种所谓的和平手段称作是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需全力以赴地执行。这年年底,他就抛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作为战争的补充手段。

3.杜勒斯

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和平演变政策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推行者,他关于和平演变的言论是最为系统和富有代表性的。

还在50年代初期美帝国主义对朝鲜武装侵略节节失败的形势下,杜勒斯就开始鼓吹用“和平的方法”“解放”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8月27日,他在布法罗演说中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解放铁幕内的卫星国家的三叉计划,着重提出,美国之音和其他机构应该“挑起”铁幕后各国(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抵抗情绪”,并让他们确信我们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他预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曾任美国参议员的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五年后将此称为杜勒斯提出的一种“新的‘解放’政策”。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美国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发表的一篇证词中,就提出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并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政策”;他认为,这是与“遏制”政策相反的、“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政策”。他说:“只要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现有各国人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只要它正在设法至少把它的统治扩展到许多其他的国家,我们便绝对得不到巩固的和平或是欢乐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得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

1954年1月,杜勒斯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说中,又一次提出要把“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要促使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立即被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来作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5月15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的,在十年或者一代人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

目标"。

1956年6月、10月波兰、匈牙利事件先后发生,杜勒斯倍受鼓舞,认为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是可能的,于是更加拼命鼓吹和平演变战略。12月28日,他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撰文说:对付社会主义应采取"在道义上的攻势"和"在军事上的守势"的两手政策。1957年4月23日,他在纽约发表演讲,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1)"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通过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2)借助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3)"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4)"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励暴力的起义;(5)"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与自由;(6)"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可见到了这时,和平演变的政策已具有相当的系统性。1957年7月2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两代人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时,他回答说:"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台湾呆了三天回到美国后立即发表谈话,扬言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声称美国的外交政策要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西方"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他在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声称要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支持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搞颠覆活动,并扬言要"用和平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的精神"。

时过不久,他于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中提出:"我们远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服务的工具。这种威望是非常大的。"他还说:美国应"不让国际共产主义取得外部的胜利,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政策。这种做法将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他认为,应"全力以赴地执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一个多月后,他于1959年1月28日在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中说:"美国的政策是基于实现公正的和平的愿望的",但"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只会使得冷战很可能以国际共产主义胜利告终"。

过了三天，即1月31日，他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演说谈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的战略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是，第一次——在联合国宪章下——决心致力于以法律和正义作为武力的明确的和重要的替代物。""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一个多星期后的2月8日，他在众院外委会意见听取会秘密会议上的证词中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上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

值得注意的是，杜勒斯之所以积极鼓吹和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除了深刻的国际背景外，还因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着发生和平演变的一些因素。1958年11月18日，他在美教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称："国际共产主义在它单一的、独裁的、纪律严格的制度中有许多有利的因素。但是，它也有许多重要的弱点，面临着许多困境。对于共产主义来说，除了它也必然要变化之外，没有什么'必不可免'的东西，使它发生变化的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而且已经可以看出来。"

4.肯尼迪

杜勒斯的这套和平演变战略，深得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肯尼迪的赞赏。还在1957年8月，肯尼迪就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讲话表示赞同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主张，并强调美国应当为达到这种战略目标而"制定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1959年10月，肯尼迪在威斯康辛州的演说进一步提出："只有通过和平转变，东欧才能得到自由"，西方要与杜会主义国家"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美国参议院在1959年末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肯尼迪和佛蒙特的埃肯参议员联名提出的巴特尔法案的一项修正案，其目的是向美国政府提供一套更加灵活的经济工具，借以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肯尼迪于1960年当上美国总统后，即明确提出了促使苏联、东欧演变的"和平战略"，同时提出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因为这时美国已失去独揽核威慑力量的绝对优势。

1960年1月17日，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10号研究报告，强调美国应当采取坚持不懈的积极行动来"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以西方生活方式加以渗透，认为这是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报告认为："东欧和中欧，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已经不甘心让苏联统治下去"，"东欧国家一向瞩

目西方,特别容易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东欧来影响苏联内部的演变也许是一种更有效的办法"。报告强调:"为了促进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应该"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上层和中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至此,和平演变政策更加完善化了。

1962年年中,当时美国国务院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托提出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五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吸引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自由大家庭"。

60年代前期,哈里曼、腊斯克等人提出了"通过接触促进变革"的策略。1961年10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专门对联邦德国驻美大使建议,"应该利用联邦德国的引诱力去同苏占区(指民主德国)接触,不要把这样的接触认为是让步的表现",后来联邦德国政府采纳了美国的意见。

以上情况说明,在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已初步形成了"和平演变"的战略。

5.约翰逊

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他继承了肯尼迪的和平演变战略,继续采取同苏联、东欧缓和的政策。1964年3月10日,哈里曼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演说,强调"'和平演变'是一种缓慢而可靠的实现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办法"。"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现有的每一种和平的接触,借以鼓励现在正在发生的演变。美国政策能够在许多方面鼓励和帮助这种演变"。

根据这种通过和平接触促进演变的构想,约翰逊总统曾经考虑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谋求同中国建立关系。1966年7月,约翰逊就亚洲和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宣告美国要坚持同中国大陆进行人员交流的政策。

1968年尼克松就任总统后,更加系统地发展了"和平演变"战略。

总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在战争和"遏制"政策屡遭惨败的情况下开始制定用和平的方法战胜共产主义的政策,经过50年代的艾奇逊、艾森豪威尔,到杜勒斯达到系统化;又在整个60年代经过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而更加完善。他们不但进一步发展了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想,更重要的是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指施,明确提出了具体策略,并加强了宣传攻势,利用现代化传播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宣传渗透。这一切都表明,与社会主义敌对的国际势力原先只是作为辅助使用的和平手段,这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理论的"和平演变"战略,并开始逐步加以实施。

二、苏联、东欧方面的情况

1956年苏共二十大，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发生，毛泽东认为，这是国际反动势力发起的一次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风潮，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促使毛泽东把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到了日程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① 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应该说并没有错。这从当时美国副总统在1956年10月29日幸灾乐祸地所说的话中可以得到验证，他说，苏联在波兰和匈牙利所受的"挫折"，证明了美国政府"解放政策"的"正确"。为了防止在我国发生类似的事件，毛泽东提出，要抓阶级斗争，抓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还要考验和培养各级干部，并使群众在大风大浪中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等等。

三、国内、党内的情况

1957年，在国内发生了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时，毛泽东认为，这是共产党"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的夺权斗争；这场斗争是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同国际上的敌人相呼应而发生的，因此，共产党要进行坚决的反击，以捍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纯洁革命队伍，锻炼无产阶级；要使民主党派和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第三节 毛泽东逐渐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

上面所叙述的事实说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开始盘算要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特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尤其是发生匈牙利事件以后，他们越来越把和平演变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战略方针。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50年代中后期

1956年苏共二十大，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把反对国际敌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4页。

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到了日程上予以充分注意。他认为,国际上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国际反动势力发起的一次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风潮,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① 为了防止在我国发生类似的事件,毛泽东提出,要抓阶级斗争,抓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还要考验和培养各级干部,并使群众在大风大浪中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等等。

当作为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杜勒斯在此时越来越把和平演变作为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战略方针时,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讲话中,引了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话,指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杜勒斯在给我们上课了。

当1957年国内发生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时,毛泽东认为,这是国内反革命分子同国际上的敌人的相互呼应。在反右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化了他这方面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于1957年10月就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概括——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这个概括没有强调阶级斗争,不能有效地反对"和平演变"。虽然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明晰的概念和论断,但他在论述"闹事问题"、"乱子问题"、反对反革命复辟等等问题时,其基本内容及采取的相应措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布以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但资产阶级政治家中也不是没有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见到我们的文章后说,要看看。不到半个月,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

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时指出: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杜勒斯讲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他又说: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4页。

1958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崩溃的危险，如果大家不警惕就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艾森豪威尔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对帝国主义斗争有益。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会前，他要自己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找出他看过的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给他。林克选了三篇，即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上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毛泽东阅后同林克谈了他对杜勒斯三篇讲话的看法，并要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语。这些批语连同杜勒斯的三次讲话都在会议上印发给了与会同志。

批语全文如下：

（一）对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的批语：

“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人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二）对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的批语：

“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三）对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

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演讲的批语:

"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

11月12日,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对杜勒斯的讲话和上述批语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里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毛泽东接着说:"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笑声)和平演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最后说:"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本主义

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①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对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背景、实质、和平演变战略与实力政策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等作了深刻的说明。

12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他在《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中除了谈到敌人的战争策略外，又谈到和平策略。他说："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这两次会议表明，毛泽东要求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二、60年代中期后

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并提出应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步骤。他在1964年6月16日的讲话就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从这次讲话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向着不同的对象，他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他警告人们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1971年2月，毛泽东抓住时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使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往出现了新的局面。毛泽东欢迎双方关系的这种进展，但绝没有被相互之间"和平"、"友好"、"老朋友"之类的词句所迷惑。他清醒地了解，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于中美双方在国际关系中的互相需要，也是由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所以，中美双方都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仰。毛泽东深知，尼克松以反共著称，是右派。所以，在他第一次同尼克松见面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右派。尼克松也同样深知这一点，他了解毛泽东的立场。因此，尼克松在他所著《真正的和平》(1984年)一书中，在提到1976年毛泽东又一次会见他的情形时，说："他(毛泽东)问我：'和平是你的唯一目标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这种和平不光是不打仗。我对他说，'这种和平必须是一种保持正义的和平。'倘

① 以上材料参见林克著《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林克著：《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及毛泽东的评论》，湖南《党史月刊》1991年第10期。

若我用仅仅强调和平友好的必要性的论述来回答毛泽东的这个问题,他不仅会认为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还会认为,我是个傻瓜。"所以,即使在这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知道,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依然是不能放松的。

第四节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思想的要点

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

前面第一章已经阐明,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第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全部矛盾的焦点,或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讲,是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补充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材料:

1960年1月4日,我国驻大马士革总领事馆就纳赛尔(当时任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与叙利亚社会党全面破裂的情况给中国驻阿联大使馆并外交部发了一份电报。电报说,纳赛尔最近一举免除叙利亚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等五人的副总统和部长职务,这表明纳赛尔同叙利亚社会党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全面、公开破裂的阶段。阿联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这种激化,是因为叙利亚人民同埃及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所促成的。纳赛尔同叙利亚社会党发生破裂后,埃叙矛盾已转变成全体叙利亚人民反对埃及统治集团的民族性矛盾,这件事有可能成为埃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电报还对纳赛尔与叙利亚社会党的矛盾、埃及统治集团与叙利亚地主资产阶级和人民的矛盾,作了具体的分析。毛泽东阅后,批示将这份电报印发给当时正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位同志,并写了如下批语:"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例外。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①

二、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在党内

鉴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中国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和重大损失;也鉴于趁我国处于暂时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页。

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国际上出现了反华浪潮，国际共产主义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在这时把防止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特别重视防止共产党变质，警惕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实现其和平演变的阴谋。因此，他在这时提出以抓阶级斗争作为反对“和平演变”的手段，提出整党内走资派的问题，也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更加密切注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并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帝国主义在和平烟幕下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同时批评赫鲁晓夫散布美化美帝国主义的错误言论。

1960年5月25日出版的一份内部刊物，登载了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写的《有关美国军事生产的一些资料》，其中有美国军事部门有多少人在工作？军事采购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这样的问题。结果是：据估计，1960年财政年度美国的军事及其他支出约456亿美元，将雇用约644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将达3700万人，其中包括军火及军事建筑方面303万人、部队中有250万人。另据估计，目前有关国家安全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开支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是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资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于6月8日批示把此件印发给将于14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同志阅读，并写道：“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第二天，他又写信给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此件送给你一看，值得严重注意。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呢？”①

这年7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外交部电报反映，苏联《政治自学》杂志第七期发表了四篇关于国际问题的辩解性文章，鼓吹“应该不仅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量的变化，而且应该看到现代帝国主义和国际局势的深刻的质的变化，以免不加思考地重复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前，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文章坚持认为现代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内存在明智派，可以孤立反动势力，并把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排除出去”。电报说，该杂志是政治理论教育的普及性刊物，在这一期发表大量国际问题的文章，是一个新的现象，表明苏联正在对国内广大人民进一步灌输其右倾观点。毛泽东阅后批示将此情况报告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并批道:"越右倾,越把自己暴露在人民面前,不像样子。"①

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在《支持巴拿巴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此时,毛泽东提出要以抓阶级斗争作为反对"和平演变"的手段。1962年,他在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② 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在这个时期用了很大的精力来抓阶级斗争,并鉴于苏联的教训提出防止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故而把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党内,反对党内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一向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③ 他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能不能得手,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何,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此,他一再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尤其要警惕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他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专门讲到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他讲到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有五条,第一条就是"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④ 当然,他那时对修正主义含义的认识有模糊不清的一面,有时把一些不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去批判了;同时,对党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也有过于严重的一面。但是,比较明确的一点是,他常常把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是一回事,例如他说: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1964年1月,他在一份总结上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⑤ 这月28日,他在对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行修改时,加了这样一句话:"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247页。
② 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2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物”[①]。他在这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什么叫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这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所以他特别重视反对修正主义,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他认为,中央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1964年,他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又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如果说,我们一度由于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而对毛泽东提出的反和平演变重在党内的思想观点更多地看到了它所造成的危害方面,却忽视了这些观点提出的历史背景,从而忽视了这些观点的正确一面的话,那么,经过80年代末苏联东欧相继发生的和平演变,就不能不说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极富远见的。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也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端正党内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党内指导思想的正确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起着决定的作用。所以,现在党中央特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从中央到地方,必须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相关,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反对党内腐败的问题。从1944年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学习,引以为戒,到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到解放初期发动“三反五反”运动,都是为了防止和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所以在50年代,我们国家政风比较清廉,社会风气也比较好。人民对这一点是满意的。60年代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它对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其中包括腐败现象),改善党群关系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毛泽东一贯坚持不懈地同党内的腐败现象,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同这些丑恶现象是不相容的。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三、决不相信帝国主义会完全放弃武力的一手

美国政府的和平演变战略,虽说是它外交政策长期的总战略之一,但毫无疑问是以军事实力政策为后盾的,和平演变战略,不过是实力政策的补充手段而已。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关于这一点,杜勒斯1958年2月4日在美国加州商会发表的演说中讲得很露骨,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制止共产党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办法是拥有报复力量,并且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但是仅仅有进行报复的巨大打击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受到威胁的地点有实际存在的军队。""此外,必须有能力来对付不像全面核战争那样激烈的有限的试探。""大部分进行'有限战争'的军队都是我们的盟国提供。我们用在必要时供应武器并且有时也给予一些财政支持的办法来帮助维持和支持这些军队。""我们还有对付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策略的政策。……积累了资本的自由国家有必要协助不发达国自由地执行发展计划。"杜勒斯在这里使用的是倒打一耙的手法,就是这样也掩盖不住帝国主义分子并不排除利用武力消灭共产主义力量,妄图独霸世界的野心。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从来都没有放松警惕。1960年1月13日,他让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一段话,这段话在表示感谢赫鲁晓夫1960年1月8日的来信中关于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从苏军人员中裁减120万人的通知,并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的步骤后指出:"我们也同意你来信中的这种估计,即帝国主义阵营还远来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狂妄阴谋,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以高度警惕性来教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合作。"①

也是在这年1月,毛泽东阅读了《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一书的摘录。这本书是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和波娜罗·奥佛斯特里夫妇所作,1958年10月在美国出版。杜勒斯临死前曾将这本书介绍给艾森豪威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对其中同当时国际形势关系密切的问题和有关美国反苏反共基本政策方面的内容作了摘录。摘录的第三部分《谈判"必须从实力出发来进行"》中说:"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出席会议的代表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国家。更深刻地说,他们代表的是阶级斗争的某一方;而这在任何基本意义上说并不是可以协商的斗争。其所以不能协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因为:在资产阶级没有被消灭之前阶级斗争是不会产生和平的;面这个阶级'决不会自动地放弃丝毫的权力和特权'。因此,会议桌——即使管它叫做和平桌——也不过是进行战争的另外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一个场所罢了。"在这段话的旁边,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道:"说得对。"①

这年4月,毛泽东对送审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一稿的批语中,有一处写道:"和平、战争,要有两手。"②

还是这年4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摘登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4月22日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主要论点:"一、只是重复帝国主义具有侵略性这样一个老的真理是不够的,教条主义的立场是落后的立场。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出现了广阔的'和平地区',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和平力量已经更加团结,更加有组织了。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要充分利用有利于和平的新的因素,以使人类摆脱新战争的灾难。二、新式的战争武器开始显示出有利于和平的压力。列宁曾经预言: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有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根本成为不可能。三、帝国主义内部出现了头脑清醒的国际活动家,他们也意识到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是不理智的,这无疑对争取和平的胜利斗争是有意义的。"毛泽东对这些论点很不以为然,在批语中提出"此文须批评",并具体提出:"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章,有根据地有说服力地批评库西宁文章中错误观点,先给中央少数同志看看,加以修改,然后考虑是否可以公开发表,或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阅读。"③

由以上诸材料可见,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掩藏在"和平"一手背后的武力干预一手,从来是洞若观火,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四、应该采取的对策

1.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

毛泽东把这一条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措施。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④ 所以,他始终强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170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调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努力学习并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

2.开展三大革命运动,特别是高度重视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1963年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① 这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对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二大矛盾所提出的总的、全面的路线和方针。

毛泽东把抓阶级斗争作为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因而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而他要求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问题都要提高警惕,不仅要注意国内的也要注意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1962年,他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② 之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的主战场移到了党内,1964年,他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又提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最终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严重错误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这些错误搞破坏活动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令人痛心的。我们要善于把理论上的基本正确与实践中犯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既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也不要麻痹大意搞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西方敌对分子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得逞。

3.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鉴于帝国主义提出的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实现和平演变的企图,毛泽东提出,要通过抓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干部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保证。

根据1964年3月3日安子文在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透露,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那两年多所考虑的问题总起来就是"如何把我们的革命事业传

① 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② 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下去，不致中途发生问题”①。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郑重地说：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话灵不灵？我希望它不灵，但也可能灵？为了防止第三代、第四代出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专门讲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7月，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为反对“和平演变”的一项重要措施提了出来，并明确阐述了他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他指出，要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就要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他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国际共运所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为此他指出，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他还提出了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并认为，接班人应当在群众斗争中挑选和培养。在这里，毛泽东把接班人问题同反对和平演变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到了全党工作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英明的。试想，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资本主义的复辟会是可能的吗？如果说我们在当时对毛泽东上述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思想还不能完全地理解其深意的话，那么纵观当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烈演变的全过程，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见解之精深、眼光之辽远了。

4. 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②。所以，早在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老新，除年龄太大、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参加能够胜任的体力劳动；这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

①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安子文讲话》。
② 摘自1963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

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搞试验田,把体力劳动同做到"又红又专"结合起来。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指出,目前,干部队伍大多数是年轻干部,一般都没有经过或基本上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的锻炼。为了建立一支有阶级觉悟和业务才能的、经得起风险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干部到基层主要是参加农村劳动。这就把干部参加劳动发展为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中央认为,这是实现干部"又红又专"的重要措施,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一项重要制度。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指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在群众中出现,有利于改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广大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加强他们对于干部的信任和爱戴。为此,《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毛泽东后来还把群众中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两参"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在他所批示的"鞍钢宪法"中确定为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

事实证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增强干部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回顾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党员干部由于比较认真地实行了这条措施,因而较好地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群关系是好的,人民群众信任党,与党有着深切的感情。这是党风好的根本标志,是我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保持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新的形势下以多种不同方式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但也有些地方,由于干部少参加甚至不参加生产劳动,党群关系疏远,党风不正,这是值得警惕的。

我们在今天重新学习和认识毛泽东关于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和理论,有着长远的普遍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因为,从时间上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理论在几百年之内都是有意义的;从空间上讲,全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幼年时期,本身就不完善,同资本主义的整个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所以,这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很大。只在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几个主要国家都胜利

了，才稳固了，而现在是特别脆弱的。

不仅如此，我们在今天还应该发展毛泽东关于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对毛泽东关于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要坚持和继承，但已经不够了，所以要发展。如何坚持、发展毛泽东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第一，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各部门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第二，要反对搞多党制；西方议会制，要坚持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制度；第三，要维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与其他几条相比，这一条更带有根本性。

第五章

对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探索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有着极其复杂的情况,任何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的说法都难以对这种正确与错误的相互交织做出准确的说明。然而这一说明,对于全面了解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与实践却是不可少的。

第一节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

一、马、恩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

首先,我们要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放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总的看法的背景下来考察。

主要是所有制问题。因为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与所有制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马、恩由于把社会主义当作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因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

在马、恩时代,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纯粹理论形态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商品货币亦退出历史舞台,因而没有阶级,当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很显然,他们设想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处时代(即19世纪初期到中期)最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并不意味着马、恩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带有什么"空想"的因素,而只是马克思为了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把它同别的经济形态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运用科学的理论抽象,把社会主义作为纯粹的、成熟的形态,来推断它的基本特征。这是揭示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惟一可行的方法。至于在不同的国家经过多少阶段和多长时间达到这种程

度,在每个阶段又应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并没有凭空设想。《共产党宣言》最后一章,曾根据西欧一些国家的情况,提出某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为达到成熟的社会主义可以采取的过渡性的政策措施。后来他们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最近5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

二、列宁全部接受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

马、恩这种社会主义的设想,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全部接受,其代表作就是《国家与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白卫军的武装叛乱,被迫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但这并不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全部原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了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超前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其结果,当然是碰壁,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就发生了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甚至连有些红军也发生了暴动。列宁在这时承认发生了全国性的最大的政治危机,并为纠正错误果断地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其核心就是与小生产和"耐普曼"紧密相联系的恢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往。这样做了以后,情况很快好转。列宁认为,这是找到了切合实际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和方法。半年后,列宁又提出,我们不能再退却,现在应该进攻了。这说明,他仍然是急于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做,而把新经济政策当作一种暂时的退却。1921年11月他写文章认为,不久应该停止退却了。然而还未来得及实行,他便去世了。

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

斯大林将新经济政策又延续到了30年代。当时苏联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程序是:初级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有组织的自然经济。这就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在本质上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斯大林批评了这种观点,说这些人失去了起码的生活嗅觉,是唐·吉诃德,应该"把这些'左派'畸形儿打击一下"②。后来,斯大林指示苏联的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件事由于二战的爆发而停止,战后又恢复,写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原则上承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斯大林对书稿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再加上他在此过程中与其他经济学家的来往信件,又出了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8页。
②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50页。

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这两本书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承认了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并作了相当好的论证。当然,书中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中带有过去的一些错误观点,例如,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很短,等等。这些错误认识在后来被赫鲁晓夫继承并加以发挥,说:在巴黎公社100周年时我们将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将在共产主义下生活,云云。正是在那时,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和苏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好的问题。

四、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根源的思考

三大改造之初,的确是想实行全部公有制的,但实践证明不行。所以很快,陈云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思想。毛泽东也在1956年11月提出了使自由市场合法化,可以开私营工厂、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但未付诸实践,所以,后来在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大二公",在所有制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经过调整,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小队以后,农业生产即恢复到了初级社的水平,并且此后几年农业生产一直恢复很快。

从经济上说,存在着工农差别。它们虽然不是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但毕竟还是不同的阶级。毛泽东说得对:农民毕竟是农民,在没有实现全民所有制之前,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动摇性。还有少量的个体小生产,还有极少数地下工厂、包工队。在党群、干群关系中,还存在着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特权阶层。当时有些同志所提出的分田单干的主张就是证明。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坚决主张不能分,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并认为如果分田到户的话农村的社会主义就要垮了。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因为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结果是,1964、1965、1966年,一直到"文革"前,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一直发展很好。现在有人说实践证明当时主张分田单干的主张是对的,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节 阶级斗争之弦重新绷紧的原因

一、毛泽东一度认为国内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

就像斯大林由于未能搞清楚当时苏联处于社会主义什么阶段,因而在1936年完成集体化后即宣布阶级消灭了一样,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完成后也短时间内产生

了这种想法。但是，毛泽东在实际生活的启示下，通过波匈事件，特别是国内整风后出现的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论，开始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毛泽东达到这一认识，有个过程。

由于我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提前而且顺利完成的，这使毛泽东在三大改造进行的过程中就乐观地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将基本解决。1955 年 12 月，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说："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①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共八大召开前，1956 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所作的批语和修改中，有这样的话（以下粗黑体字为毛泽东加写、改写的文字）："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种情况而不是否认这种种情况，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和尽一切努力争取不犯极端严重的错误**，而**决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帝国主义者还会要在许多地方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会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地方，决不会轻易放手。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因此，斗争还会要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②

9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大，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明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阶级斗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6—527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7、140 页。

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上来。

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使他头脑中的阶级斗争之弦重又绷紧

然而,继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使毛泽东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又开始绷紧,特别是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八大召开前,苏共于1956年2月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批评斯大林,揭露个人崇拜的危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批评教条主义的潮流。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是有所保留的,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意在未同兄弟党打招呼前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批评斯大林,不同意“和平过渡”的观点,等等。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也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于教条主义性质的,有必要批评教条主义。

但是,八大开过后一个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以及在此前发生的波兰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党员退党;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利用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利用波匈事件,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再掀起反共反人民的浪潮。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不能不对我国国内发生影响,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国内形势是,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广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刚刚走上合作化道路还感到不大习惯,加上合作化工作中的缺点,夏收以未,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急躁冒进的毛病,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某种紧张,这年下半年,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在少数城市里,由于一些群众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同时由于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以及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等原因,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和闹事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这一年,仅就中华全国总工会收到的报告和直接处理的事件统计,罢工29起,请愿57起。据团中央统计,从1956年6月到1957年1月,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发生罢课请愿事件达30起。在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粮食问题、

灾荒问题等。

上述这些情况的发生，使毛泽东头脑中刚刚松弛了的阶级斗争这根弦重又绷紧起来。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先是在一次小组长会议上发言，共讲了七点，前六点都是讲的建设方面的问题，第七点讲："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① 15日，他又在讲话中指出："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民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的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②

在这次会上他还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了。"他还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246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① 他的这一分析不无道理。从当时公布的材料看,在匈牙利事件中,旧时代的反动分子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猖狂进行阶级报复,屠杀共产党人。镇反不彻底,确实是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重点提出了要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说:"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积极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由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批评修正主义。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指出: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给了共产党人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的斗争。"② 这些话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从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主要是思想动向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后来,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回顾说: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动向方面"。)毛泽东根据下面反映上来的情况指出: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少数社员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②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闹退社，党内外刮起一股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歪风；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有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怪议论，有些人想复辟；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他还认为，党内干部中少数人也是动摇的，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苏共二十大及匈牙利事件把党内的蚂蚁引出了洞。他提出，要准备出大事，准备出全国性的大乱子，甚至准备再回到延安去。“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① 为了避免出大事，他认为必须反击歪风，打的办法是说理，对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书记要管好报纸，亲自写文章。他敏锐地觉察到1956年下半年以来，有一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主义的逆流。他要全党提高警惕，这是正确的。问题是他对逆流估计太过头了。

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在1957年春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还没有全部结束，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论断是正确的，它既不同于阶级斗争熄灭论，又不同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到向自然界开战为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他改变了对社 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看法，认为阶级斗争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

三、1957年整风开始时并未想搞政治运动

应该说，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并非事先就想搞一场反右政治运动。如前所述。他在1957年1月认为应对社会上存在的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进行反击，但并不想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是希望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具体讲，就是沿用延安整风的办法进行全党整风。

实际上，自从1956年四五月间提出“双百”方针，尤其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党内外各界人士已经开始向共产党提出大量的批评与建议。所以，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全党整风的问题。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① 这年11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以当时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决定明年开展全党整风,现在就要进行酝酿和准备。12月24日,毛泽东在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又指出:"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予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②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判大会或斗争大会。毛泽东在后来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也作了这样的说明: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次整风与延安整风不同的是,我们党处在全国执政党的地位,有一个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希望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希望他们提意见。当时的顾虑不是怕别人讲话,而是怕别人不讲话。所以在此之前,毛泽东、刘少奇分别从北京南下,沿途作报告,希望大家批评,希望大家讲话。毛泽东一直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讲到上海,一路上都宣传这个思想。他在一次讲话提纲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③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需要造成空气,没有这种空气是不行。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8日至6月3日,分别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各部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204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时，虽然有些人对向共产党提意见还有顾虑，但由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国内民主空气高涨，所以多数人还是敢说话的。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党衷心欢迎这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5月间，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这些党内指示说明，党确实是诚心诚意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总的来说，当时的整风形势是很好的。

但是，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之机，大肆散布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这些人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对此，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中列举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1)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

(2)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

(3)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

(4)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根本政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私人办

报,办新闻社;

(5)他们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

(6)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李维汉的这种概括,是指整个反右运动中反映出的问题而言的,并非全是根据5月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5月份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另外一些人反驳前述意见的发言中,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的思潮。例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5月15日的座谈会上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针对有人提出的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认为,党委制有它的好处,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陈劭光在5月22日民革中央小组的扩大会上说:现在各地都"鸣""放",有放得好的,有放得不好的。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应本着爱党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的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不要把整个共产党都说成是宗派主义的,那样就说不到长期共存了。他认为,一方面要大胆地"鸣""放",一方面也要防止反党倾向。李维汉说,我认为,马寅初和陈劭先的发言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在说这些话时并没有了解到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文章的内容。国务院的秘书长卢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的发言中说: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他还说,在提出批评和建议时不要忘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要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后来,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辱骂他"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确有一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机反对党的领导。

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知识分子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本来就估计到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这些人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所以,正如李维

汉说的：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

据李维汉回忆：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诸如“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这些话，当时报上的报道中都没有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反驳，让他们放。李维汉说，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汇报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毛泽东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学习。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罗隆基说的“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话，给了毛泽东很深刻的印象和很强烈的刺激。他后来多次谈到这句话。1957年10月9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① 在1957年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他一开头就尖锐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修正主义，然后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右派“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在整风运动中，“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党内外的右派都不懂得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② 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下决心要反击右派。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布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主要内容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471页。

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人民日报》又于9日、10日、11日相继发表了题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

从此,党内的整风运动即转为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

从上述过程来看,在当时的鸣放和整风过程中,确实出现右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否认这一点是无视历史事实;对这些言论进行批评、反击是必要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邓小平在对起草这份决议的意见中讲得也很明确:"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① 这一评价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四、反右中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正是在反右的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前面讲到,在反右派运动以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说基本结束就是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在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

在反右的过程中,他在这方面的认识发生了以下变化:

1.从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到认为过渡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

这首先可以从1957年6月发表的《关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与反右开始前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讲话比较,看得很清楚。他于1957年2月至4月间在北京和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作了多次关子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94页。

的报告，其中心内容都是说，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的任务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自然界开战，搞建设。反右运动是6月开始的，在这期间他多次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时便加进了这一内容："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① 毛泽东过去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次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修正了他同年2月讲话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的认识。

其次，在这年7月，毛泽东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篇文章中，也明确讲了这样的话。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他写道："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② 在其后不久发表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他写道："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③ 这就在阶级斗争的内容上有了发展。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说："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④

最后，在这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提出，对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8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46页。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不少人认为应坚持八大的观点。在全会最后的讲话中,毛泽东作了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① 他批评八大决议上关于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此外,反右后期,1957 年 12 月 25 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报告中说:"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篇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作了一些修改的,因此,这一看法,可以说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观点。

2.从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向主要批判修正主义。

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后,我党也提出了批评教条主义。1956 年 4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说:我们"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我们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精神"。"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虽然这时由于国际上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毛泽东也提出要批评修正主义,但不是主要的。就是 1956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重点是提出了反对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 年 10 月 9 日。

修正主义的问题，但并没有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但是到了反右斗争开始以后，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要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并指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他写道：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他认为，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中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① 从此以后，他重点转向批判修正主义。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需要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莫斯科宣言中写进了"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五、反右后认为工作重心应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认为，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取得了基本的胜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470页。

利,党的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去了。

他在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谈到国内情况时讲:"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①

他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上作结论的提纲中写道:"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②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开头就讲:"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③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我国国内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已经有所变化。

应该说,毛泽东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方针的真正提出,是在这个时候。当然,关于革命胜利后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是党和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确立的信念,只是当时不具备实行的条件;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以反右斗争为代表的政治运动实际上一度中断了这个进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即反右斗争结束后,毛泽东才算是真正明确地提出这一战略方针。

以上所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两个根据说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651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决不是根据逻辑推论出来的，而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是在出现了阶级斗争的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主要是由于国内出现的阶级斗争事件的强烈刺激，他才会对波匈事件作出较强烈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看，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1957年初认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而时过几个月后就改变了看法，认为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一观点上的变化的根据，正是当时出现的阶级斗争的事实。这些事实，使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内容在理论认识上发生了一个变化，即从单纯的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增加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事实，是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也可以说，1956、1957两年间国际国内发生的一连串阶级斗争事件，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事实根据。

第三节　对毛泽东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几点分析

一、毛泽东的新贡献

不少论者认为，毛泽东在反右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观点上的变化是从八大时的观点后退了，是一种"左"的错误理论，为日后进一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至于发展到搞"文化大革命"埋下了根子。

笔者认为，并不尽然。笼而统之地肯定或否定这一理论，都有些简单化。还是应该做一些具体分析。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1957年少数右派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事实，证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确实存在的；国际敌对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战场也一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的观点，确实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这是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重大贡献。

1.对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

八大的理论是否完全正确？

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做出这一论断，是在当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中国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已经消灭的情况下提出的，有它合理的一面。

但是,这一论断归根到底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说,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说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能够成为一个时期的矛盾,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这一客观规律不相符合。只能说,这一说法是当时现实状况的一种反映,但这种状况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必须解决。

从实际情况看,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是同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一方面,苏联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也曾经认为社会上的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只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与斗争。而此后苏联、东欧出现的严重问题,说明作出这一判断是为时过早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受苏、东某些事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些闹事现象,以及以后发生的右派攻击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也同样说明作出这一结论为时尚早。

2.得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结论是正确的。

也正是由于面对这些事实,才促使毛泽东重新冷静思考这个问题,改变了认识。反右之前,他的确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事情,会有这样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上还会有阶级斗争。直到这些言论都放出来之后,他才提出要进行反击,就是他说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面对这些事实,加之此前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国内一些人闹事的事实,他才得出了新的认识。

其实,在当时,毛泽东反对的是两种错误倾向,既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把阶级斗争越搞越升级,也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不会立即消灭,但也不能把它看得太严重。用他的话讲就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阶级斗争的。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有不少人天真地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就是毛泽东自己,如前所述,也一度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当国际上出现了波匈事件,国内也随之出现闹事等现象,特别是发生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攻击后,他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做了重新估计。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

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①]。应该说，他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清醒的，而且用词是准确的、有分寸的。他当时还以作为阶级斗争重要组成部分的“肃反问题”为例，指出：“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②]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在当时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一方面纠正了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错误思想，提醒全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忘记还存在一个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状况做了比较准确的恰如其分的估计，以便防止把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越搞越升级情况的出现。

在反右斗争后期，1957 年 12 月 17 日，毛泽东通知部分领导同志阅看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 12 月 9 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在这篇报告的第一部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讲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是有起伏的。在这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被迫退却，斗争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缓和下来”。“这种斗争的起伏形势，将在若干年内反复地发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通过这种起伏，逐步地减弱以至消灭”。报告既批评了当时党内看不到敌我矛盾仍然存在的右的倾向，也批评了夸大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左”的倾向。这篇报告于 1957 年 12 月 28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为此加的“编者按”指出：“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29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2—333 页。

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报告针对党内的思想分歧,批判了忽视敌我矛盾和夸大敌我矛盾的两种错误倾向,坚持了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篇报告,可以看作是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挥。

在上面提到过的柯庆施的文章中,也这样讲:"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只占极少数"。

3.应慎重进行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情况下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要慎重地进行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情况下的阶级斗争。

首先,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只在人民内部还存在阶级,在敌人中已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反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从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人民"和"敌人"所确定的内涵来看,属于"人民"范畴的是"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属于"敌人"范畴的则不是阶级和阶层,是"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这就是说,他认为,在我国,属于敌人的,已不是社会上完整的阶级和阶层,而只是少数敌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如反革命分子、严重犯罪分子等。

其次,他认为,既然敌人已不是社会上完整的阶级和阶层,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我们准确地区分和处理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变得比较复杂,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混淆敌我界限、混淆两类矛盾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阶级斗争。由于阶级斗争与两类矛盾有时是交叉的,贯穿在两类矛盾中的阶级斗争往往又可以成为两类矛盾互相转化的条件,即由此到彼的桥梁。因此,只有严格区分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反过来,也只有正确地开展好阶级斗争,才能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① 这反映了他对于慎重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重视。此外,他还针对我国把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特殊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虽说这一特定概念是否正确,是否科学,还值得探讨,但毛泽东意在慎重处理这种斗争,使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对抗性的矛盾的思想，是十分鲜明的。

4.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与敌对分子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或正在消灭，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虽然还有，但已让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即这种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搞得不好，就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高度，十分重视国际敌对势力采取“和平演变”的策略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并警觉到“和平演变”的主要战场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因此，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①

在上面提到过的可以作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补充的江华所作的报告中，也是这样写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段话，更为清楚地表达了阶级斗争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此外，在江华作上述报告的半个月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审阅了这一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这一段话后面加写了“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347页。

的动力”一句。这篇报告中还明确地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观点,都是可以代表毛泽东当时的想法的。

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作出的新的阐发,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二、毛泽东的失误

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他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就反右扩大化来讲,他的失误主要在于:第一,他把1957年的斗争估计过高了,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了,因而作出了过火的反应,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第二,他没能把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常常把阶级斗争置于一种不恰当的突出地位,而且把一些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现象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这一失误的结果,必然是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训是沉重而且深刻的。

从理论上考察,发生失误是在1958年3月以后。失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1.混淆了“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残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提出当前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错误论断。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这个估计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

联系到九个月之后,他在这年12月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1937年还杀那么多人。毛泽东认为,苏联知识分子里阶级消灭得不干净。所以他说:我看消灭阶级

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里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残余"。他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或正在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原先的民族资本家，仍然划作了剥削阶级，甚至把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划为资产阶级，这是明显脱离实际的。

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他在4月的武汉会议上讲：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复杂的，如果世界出了大事，中国出了大事、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还会造反，中间派还会起来反对我们。他提醒各省的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在摸工业、摸农业时，还要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应首先抓思想动态。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在这次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的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说明，由混淆两个不同概念得出的我国当前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错误论断，一经提出，便在实践中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不良后果。

2.上述错误论断，加之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他错误地把人民内部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据此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错误结论，进而得出要"准备党的分裂"的更加错误的结论。

在确定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认识下，毛泽东把党内关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中存在的不同意见，当作路线分歧，并进一步提出党有可能分裂。

他把不赞成搞冒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称作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有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他甚至把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人也当作不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解散食堂说成向党猖狂进攻。这就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

据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党内，由反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转到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一些省、自治区领导汇报的省委里面的斗争情况说：省委里的阶级斗争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另一种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部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

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的思想动向值得注意。

在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已转移到党内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准备党的分裂"。1958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一再提到要准备党的分裂问题。5月17日,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讲到要"准备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5月20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5月23日他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当党内外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怀疑以至反对的意见以后,他在8月30日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在这年11—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又说: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12月23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份分成两个是可能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把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看成是党内阶级斗争,甚至是党的分裂的估计有多么严重。

3.如果说以上两个错误还仅仅停留在认识上的话,那么,由于这种错误认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行动上更为严重的错误——毛泽东在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并进而将这场斗争扩大到全党全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阶级斗争引申到党内。

与上述错误的理论相关,导致斗争引发的具体因素,一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否定三面红旗。的确,毛泽东是在觉察到"左"的错误并决心纠"左"的情况下才召开包括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及庐山会议在内的好几次会议的。但他纠"左"的前提是,必须肯定成绩是伟大的,而且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改正缺点后继续跃进。他还认为缺点正在改正,形势已开始好转。他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了。那么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了基本否定的意见,这当然违背了毛泽东纠"左"的前提。毛泽东又联系到庐山会议之前党内外就已有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言论,所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信时说,现在党内外右派攻我们。接

下来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又讲：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没有了，实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攻的大问题。

二是毛泽东认为，党内一部分人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摇摆，说明他们只是党的同路人。毛泽东把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上纲为，党内一部分人可以参加民主革命，但不愿搞社会主义革命，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联系到此前早在提出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就反复说过这个话。1957 年他还讲："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① 可见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在这次的庐山会议上他也按此逻辑认为：有些人是党的同路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但是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些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发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的一条重要根据。

三是毛泽东对彭德怀把三面红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特别反感，认为是向群众运动泼污水。毛泽东说：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意搞，你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以上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看作是一次党内严重的路线斗争，把彭德怀看成是右倾路线的代表，进而认为彭德怀是反党，甚至提出彭德怀以及支持彭的意见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是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党。8 月 10 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要"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再进一步，毛泽东提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8 月 16 日，他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 20 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经过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斗争，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有了发展。

---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

走到这一步,除了上述主要原因外,也不排除毛泽东个人专断、骄傲自满,不能听取不同意见方面的原因。此外,与党内,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左"的情绪也不无关系,他们不愿多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教训,对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很反感。在这种气候下,毛泽东才会把彭德怀的信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裂党的纲领,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所以,将此仅归结为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再有,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在当时,赫鲁晓夫不但反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而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目的是控制中国。彭德怀访苏时,赫鲁晓夫挑拨性地称赞他是国际英雄。庐山会议召开时正值彭德怀访苏归来不久。毛泽东遂疑心彭德怀的信与赫鲁晓夫有关,所以才有了毛泽东在8月1日会上说的彭德怀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这种说法。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关于这一点,可从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得到证实。他说,庐山会议开展反对彭德怀的斗争不只是因为他写了这封信,而是由于有个彭、高(高岗)联盟,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当然是牵强附会的错误的说法。

第四节 6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开展与失误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

经过几年的经济调整,到1962年国民经济形势已日益好转,初步扭转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被动局面。但在这时,国内、国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在国际上,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南大门外;印度政府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向我边境地区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苏联政府则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我北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进行武力威胁。在国内,党内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对大跃进以来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不同看法,同时,由于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反动集团利用国家的暂时困难公然叫嚣"反攻大陆",社会上一些没改造好的反动分子也一度活跃起来,致使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有点紧张。

为了统一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进一步贯彻全面调整的方针,把国民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召开工作会议。北戴河工作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农业、商业等方面的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矛盾、形势"的讲话，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由此改变了会议原定的经济工作议题，改而以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为主。这个议题延续到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工作会议。

1962年9月24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由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内、国际形势和农业、商业等问题，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关于有步骤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还提出了合理整顿企业、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把农业放在首位等问题。这些，对于当时克服困难，争取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以及他在其他人发言的多次插话中，着重讲了阶级斗争形势的问题，并把这一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他还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他在修改这次会议的公报稿时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① 这就把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198页。

化和绝对化了。

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提出要注意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他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因而得出了过于激烈从而不尽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他所得出的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结论,则背离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也否定了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的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论断,脱离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会议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情况的分析,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批判了毛泽东提出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黑暗风"是指1962年2月和5月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认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困难这一实事求是的分析。"单干风"是指1961年、1962年在安徽、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一些生产队为克服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及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对生产责任制的支持。"翻案风"是指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其实,被批判的观点和做法中很多都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把这些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认为是国内党内上层出现的修正主义,这个结论是不对的。

总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重提阶级斗争,并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这是错误的。这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的继续和发展,对以后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严重的错误观点起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当时还是采纳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在会上提出了不要因为强调抓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工作,提出"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所以,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经济调整工作还是继续按原计划进行。这说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此时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时,并提出了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所以,十中全会后,一些地区就开始进行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河北保定地区进行了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小四清",查出一些干部确有铺张浪费、多吃多占、

贪污盗窃等行为。湖南省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即推荐了河北、湖南的做法，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要求各地加紧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这次会后，许多地区就开始训练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工作。3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之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这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城市中开展“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此外，规定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政策和方法。这一文件发布后，各地都开始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了准备。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当时第一批社教运动基本结束，一些地方向中央反映城乡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要篡夺基层领导权，使集体经济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受这些报告的影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并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会后，中共中央先后向各地转发了几个地方的典型经验报告，把开展对敌斗争和夺权斗争作为社教运动的中心环节。根据这些地方提供的经验，中共中央于9月18日发布了由刘少奇主持修订并经毛泽东批改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了团结95%的干部和团结95%的群众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但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文件对形势做了更加严重的估计，提出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阶级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次运动是比土改更广泛、更复杂、更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还提出，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就改变了原来提出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观点。这些指导方针的贯彻，造成许多地方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以至于混淆了敌我界限的错误。这个文件发布后，中央和地方就派

出了大批工作队,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中央政治局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议对此前出现的诸如打击面过宽等"左"的做法进行了部分纠正,提出要一分为二看待干部,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这对于解脱一大批基层干部,稳定农村形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个文件又提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并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观点就更"左"了。

这次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到1966年春,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面城市的国营工交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据1965年7月统计,约占总数的3.9%。

党发动和领导的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和解决经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次运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指导思想下,对于城乡阶级斗争的估计过于严重,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当作了阶级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在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思想指导下,意识形态领域从1963年到1965年间,开展了一系列过火的政治批判。

实际上,这一批判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及会前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就已经开始了。会上,康生提出小说《刘志丹》有严重问题,是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等,并将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或对其修改提出过意见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对他们立案审查。毛泽东则据此说: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这次会后,文艺界即开始按照全会的精神检查工作。1963年3月决定停演"鬼戏"。5月,《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点名批判了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认为是借"鬼"影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意识形

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报刊即开始了公开的点名批判。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他又在一个批示中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下旬，他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的整风作批示时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上述并不符合文艺界实际情况的批示和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对文艺界有很大震动。文化部及其所属各文艺单位，以及文艺界各协会，都根据这些批示进行了整风。整风过程中，对文化部、作协的许多领导人和文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伤害了不少好同志。

1964年8月，文艺界成立了整风指挥部。1965年4月彻底改组了文化部党组，撤换了各协会领导。从这时开始公开批判了一批较优秀的戏剧、小说和电影，如《刘志丹》、《怒潮》、《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当然，这些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或多或少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上的缺点甚至错误，对此，完全可以运用党的"双百"方针进行正常的文艺批评。但把这些都当做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给以批判，甚至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就背离了党的"双百"方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妨碍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样的批判，显然是过火的甚至是错误的了。

文艺界的这种过火的错误的批判，不久就扩大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例如，先是在1964年夏季批判了哲学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就批判了经济学界孙冶方关于要重视价值规律、重视利润的经济思想。在历史学界，则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等人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等。

当时，党内有些同志觉察到了这种过火批判的错误，提出应该赶快刹车。但是，由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推波助澜所起的极其恶劣的作用，这种错误的批判不但未得到制止，反而迅速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了。

第五节 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

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简单地讲,就是要采取扬弃的态度。即应看到,这一理论,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既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其受历史局限的不正确的甚至是严重错误的东西。因此,保留其合理成分,抛弃其错误部分,是研究者应取的态度。

具体来讲,其合理的成分是: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前,首要的任务是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以后,就面临着双重的或曰二位一体的任务,即进行阶级斗争以巩固政权,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然而,完成这两大任务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开始的几年里,阶级斗争的任务确实是相当严重的,若不予以重视,政权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基本上是应予肯定的。问题在于,当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以后,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就要提到首要地位。这时,如何正确处理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成为历史提到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说起来简单,实际是非常不容易的。认为这个问题能够一下子就解决得很好是不现实的,从认识论上来讲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在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也有"左"的失误。若完全忘记阶级斗争固然是右的表现,而把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犯了"左"的错误。这是应该予以否定的。

毛泽东所犯的这种"左"的错误,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当时存在的一些阶级斗争现象反应过火,以至于对形势作出不切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甚至把一些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事情也划到了阶级斗争范围中去,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二是未能处理好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常常把阶级斗争放在一种不恰当的突出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建设。相比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时期即1949--1956年,这两方面就都处理得比较好。那时的阶级斗争较严重,也属全局性,但是,由于处理恰当,问题解决了,经济建设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我们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解决这个问题,应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认真

研究，扬弃其错误的、"左"的东西，吸收其合理的、积极的成果，再根据现实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不应该是凭空的，而是对历史的批判继承和扬弃。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有三条最主要的内容：生产力的最终决定论、阶级斗争论、群众创造历史论。这三论应统一起来。这就是抓好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两大任务，并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1963年曾经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并不相互抵触的。这三大革命运动，正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矛盾：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和人类社会之中的矛盾。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作为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阶级斗争作为解决人类社会之中的矛盾，二者是同样必须进行、并行而不悖的。

不但是并行不悖的，而且是紧密相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 而在他们看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又是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有一定的发展但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相联系的，阶级的划分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它的消灭以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所以他们又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 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定生产基础上，即生产有一定的发展但尚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到目前为止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同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的观点，是统一的。

陆定一1991年2月为他自己的文集《陆定一文集》所作的序言，总结了他自己一生的经历，他是把自身的经历同党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在文章的结尾，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从陈胜、吴广算起，经历了两千余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林则徐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至此，两个革命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我们老一辈的人，再没有'革命尚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成功'的慨叹。余下的任务,是反对'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①] 他在这里,也是把阶级斗争的任务与生产建设的任务相提并论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历史,符合我们国家的历史的。

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不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吗?是否如此,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的。

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比较全面的话,是他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认真分析这段话可以看出,这段话并不是对我党的路线和方针的表述,而只是说,我们必须有一条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在上面那段话中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认为,这三大革命运动,才是我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解决各种矛盾的总路线和总方针。

①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第六章

无产阶级政治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当急风暴雨般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宣告结束，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后，无产阶级政治是否还必要、起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遇到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时间里，作过认真的探索，并努力付诸实践，其成功的经验和挫折的教训，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是弥足珍贵的。作为他的事业的后继者，我们之所以不能漠视这笔丰厚的精神遗产，是因为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着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一贯致力于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统 ·

一、革命战争时期的认识

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是毛泽东倾其毕生之精力与心血所孜孜以求的。而运用政治的力量为经济服务、统帅经济，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则是贯穿在他领导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思想。这一点，也是毛泽东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之一。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和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据此可知，他在那时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统一的基本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对此有很明确的表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

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

当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即将冒出地平线时,他已高瞻远瞩地提醒广大干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② 其发展新中国经济的殷切之情跃然纸上。在1949年2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当他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浴血奋战终于扫除了横挡在中国通往现代化、强国富民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后,便立即率领党和全国人民投入到了经济建设的新的战斗中。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艰苦的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经济情况得到基本好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到巩固,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根据总路线的要求,我党又确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规定的经济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到1957年底胜利实现了。对于三大改造运动,毛泽东指出,其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了社会条件。"③ 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前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6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0—1481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他在讲话中号召："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① 为了说明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他特别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我们仍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他作这篇讲话的目的，就是他在全文结束时所指出的："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 同时，他对于如何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也作过许多研究和探索，如对农、轻、重的关系问题，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民主管理问题等等，都有许多具体的思想，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发展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三、谈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毛泽东把能否用较快的时间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看作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能否生存和巩固的重大问题。1963 年 9 月，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增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国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共计 105 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③ 毛泽东的这段话，显示了他对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落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20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21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48—849 页。

后状况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深邃远见。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政治的领导,看成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须的。他明确指出: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①。与此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他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并强调:"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在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时,进一步论述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工作、技术工作的重大意义,专门写了"又红又专"这一条,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②

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继承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给予经济巨大的反作用的基本原理。

那么,毛泽东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社会主义经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和实践,有哪些主要的内容,其中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第二节 经验和教训

一、处理好政治问题才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

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处在国际、国内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搞经济建设,所以,必须处理好政治问题,经济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的阶级斗争是严峻的。那时,外有美帝国主义人侵的威胁,内有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还有不法资本家种种破坏经济的行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先是针对当时苏联理论界普遍流行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观点,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些矛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页。

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继而又把这些矛盾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到了60年代，毛泽东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特别是提出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与此同时，他也警觉地注意到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并多次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同时，面对来自国外的种种军事挑衅和各种压力，他坚决顶住，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所有这些，使他形成了在阶级斗争环境下搞经济建设不能不处理好政治问题的观点。

从毛泽东主观上讲，是想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起抓，即并非只为抓阶级斗争而放弃生产斗争。这从他经常谈到的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目的是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使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可见在他看来，对国内反动派和国外帝国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全的国内环境，从而有效地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顺利地进行。在建国初期的几年里，的确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两手抓，两手都取得了胜利的。抓阶级斗争的结果保障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安全顺利进行，而经济建设的成就也为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阶级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物质保证。从1949年到1956年，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成果是同样丰硕的，被后来称为共和国政通人和的辉煌时期。其中的经验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正确地处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之间的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处理得当，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是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 他们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的划分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它的消灭以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当今社会，毫无疑问处于这一阶段之中。斯大林指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③。这就说明，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既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又是生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贯穿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中。不仅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警惕旧制度的复辟需要抓阶级斗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2页。
③ 《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7页。

而且只要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没有完结,都是需要这样做的。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要巩固并且发展自己的统治,都不能不既抓生产斗争,又抓阶级斗争,都不能不为发展经济而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强化本阶级的政治。如果不是这样,政权削弱以至丧失了,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概莫能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因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政治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① 恩格斯说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② 也是这个意思。

对敌人的专政是同对人民的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无产阶级政治还有在人民内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其重要的一而。列宁说过:"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③。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总之,我国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紧密结合起来:一方而,打击敌对势力以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健全民主以保证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得到切实的体现,从而更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建设事业获得极大的推动力量,这是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阶级斗争,必须"突出政治"的理论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一个阶级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政治问题,就不能顺利地解决经济问题、生产问题。他在 1958 年 2 月 18 日一篇讲话中说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④ 一语,很好地表达了他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和政治统一起来的良好愿望。

那么,他为什么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呢?他的错误,不在

---

① 《列宁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2 版,第 279、28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50、705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 版,第 405 页。
④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1958 年 2 月 18 日。

于抓了阶级斗争，而在于：

第一，他在许多时候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因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并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行动，特别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第二，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建设二者之间，他有时过分强调了前者而减弱了后者，因而在一段时间内不适当地批判所谓的“业务挂帅”、“白专道路”，搞了一阵“拔白旗”运动，不但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空头政治”的不良倾向。

此外，在民主的实践方面也做得不够，还犯过错误。这些沉痛教训都是应该牢记不忘的。

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关于在阶级斗争还存在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注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的思想，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强调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同时，一再提醒全国人民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①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失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下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政治问题，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才能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展了。

二、经济建设不能不问政治方向

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不能不问政治方向。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不同，它不能自发地发展，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下，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进行。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搞经济建设的目的，就是为实现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最终目标——经过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因此，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必须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有坚走正确的政治方向。早在延安时期,在一次讲话中就说:"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① 他给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认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②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依然是极其重要的。从我们的党;国家、民族来讲,经过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因而能够成为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励精图治,百折不挠地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一致行动,奋勇夺取胜利的强大的凝聚力量和不息的动力源泉。从每一个共产党员、先进分子来讲,这一理想是坚强的精神支柱,使每一个人都能在任何艰难坎坷中执著奋斗,自强不息。如若不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基础,成为一盘散沙;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眼光短浅、迷失方向、缺乏崇高动力的庸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如何搞得好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③ 毛泽东的这些话,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贞,体现出他把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既作为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又作为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二者统一起来的深刻的辩证思想。

从经济工作本身来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工作本身也有政治方向的问题么?当然有。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剥削阶级都不会承认。正如列宁举例所说的:"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似乎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

① 《在延安庆祝五一节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1日,《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第1版。
② 《抗大二周年纪念》,1939年5月26日,《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第4版。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页。

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而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来管。”① 这里所谓“经济方面的政治”，就是维护资产者根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即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这种统治和影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断不能存在一天，资本的统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进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断不能维持一天。这就很明白为什么资产阶级只要工人、农民工作而不要他们过问政治了，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只能维持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同工人农民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如果工人农民都问起政治来，就一定会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资产阶级鼓吹的政治与经济脱离，是虚伪的，他们只是要所有被剥削的人民不要去过问政治。

然而无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是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所以我们要公开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这是符合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而要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和各个经济组织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都有赖于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措施。这些路线、政策的制定及组织实施，都离不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的指引。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这里的问题在于，不能把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实行共产主义的具体政策混淆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② 他和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一方面坚持对党员和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教育；另一方面，又制定了符合各个历史阶段实际情况的具体路线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放以后，在50年代末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党犯的一些“左”的错误，不是由于进行了共产主义教育，而是由于搞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的政策。这样的作法，违背了客观规律，因而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大肆鼓吹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08页。
② 《论新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新华日报馆1939年5月版，第228页。

政治决定经济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正是从反面证明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的关系,证明了破坏这种统一,必定造成严重后果。应该纠正的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是,将这一时期的"左"的错误的发生,归咎于强调了政治,归咎于多谈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以为这是"假大空"、搞极左。这是我们有些地方和部门思想政治工作显得软弱无力的原因之一。产生这种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混淆了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实行共产主义具体政策之间的区别。

如果能够正确地区别二者,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认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应该时时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提倡共产主义的精神,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是这一漫长征途中不可缺少的一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有极其深刻的论述。他说:"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① 他还说:"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共产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② "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③ 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总是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④,他对此解释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他还说："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② 在这里，邓小平的意见很清楚，我们搞的现代化建设不是一般的现代化建设，而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现代化是个生产力问题，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受到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制约并为其奠定物质基础。所谓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下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奠定物质基础，促使其巩固和发展的。这就是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方向。邓小平的论述，同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搞经济建设不能不问政治方向，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的思想。

三、重视群众的力量

毛泽东一向重视群众的力量，对人民群众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说过："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③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④"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⑤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依然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我们一切事业的胜利之本。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⑥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存在。"⑦ 正是由此出发，毛泽东认为，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将这一工作摆在第一的位置。

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要全心全意依靠群众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年就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⑧ 列宁更是多次指出："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③ 《论新阶段》，1938年10月。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6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12页。
⑥ 转引自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⑦ 转引自1967年4月29日《解放军报》。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① "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② 想当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曾经针对托洛茨基把战争时期的强迫命令手段搬用到经济建设中来而反对对工人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方法的主张,提出,这样只会造成党和群众的对立并因此而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灭亡,当然更谈不上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了。列宁并且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事业比之以往一切运动,都尤其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这就决定了它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毛泽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同他重视群众的力量紧密结合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向党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把本职工作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同时,还深入、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这样,大家才能有极大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做好当前工作;才能在任何时候都对前途充满信心,不被一时的困难和挫折所吓倒。列宁曾经说过,工人群众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这只能从外边加以灌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未来的人民的国家,还担负着对全体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职责。他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③ 在毛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12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6页。

泽东看来，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提高思想觉悟，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保证。50年代初，毛泽东和党中央曾经组织干部集中学习社会发展史，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干部群众中得到一次大普及，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理想和信心。

2.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让广大干部和群众了解党在一定时期制定的调整各方面关系和指导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并自觉地贯彻执行，以统一思想，指导和规范活动。

毛泽东曾经说："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①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刊物上进行宣传。……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要取得经济建设的成功，关键是干部和大批优秀的群众。他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③

3.保护并且协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

毛泽东始终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切切实实地关心群众生活，"替人民着想"，切实解决群众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问题，特别是必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些，都是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如果不是这样，那这些同志的头脑就"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18—1320页。
③ 《在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的讲话》，1956年1月25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第1页。

民的东西。""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① 毛泽东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作党的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民群众所进行的生产活动直接就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活动,最终也是为了物质利益的实现和保证。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广大人民得到物质上的利益。所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同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群众从看得见的利益中感受到党的温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得到的物质利益还存在一个很好地协调的问题。物质利益有当前的和长远的,局部的和全局的,个人的、集体的和国家的之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但在一定的情况下也经常发生矛盾。因此,正确处理好这些利益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有赖于经常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劳动者把这些方面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既要纠正忽视劳动者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现象,更要克服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一味计较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倾向。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特别强调这项工作。他说:"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②。

同时,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应该教育群众不能把注意力只限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要树立起为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的志向。有了这样的精神动力,才能够在物质利益暂时得不到足够的满足时,也能够以饱

①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5月版,第876—877页。
②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5月版,第876—877页。

满的热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奋斗。

第三节 坚持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

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一个基本理论是：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坚持并不断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这不但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所必须的，而且是无产阶级领导全体人民在夺取政权以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首先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必需的。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第一步，就是从剥削者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由共产党来执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这里说的，就正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取代资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列宁也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②

这也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才有保障。所以，列宁强调，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要"使无产阶级转化成为统治阶级"，就必须"不与任何人分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③。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④

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19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131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页。

并在长期实践中,对如何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毛泽东的一个鲜明的观点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一再从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质、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群众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等方面,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她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由她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在实践中形成的。这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选择。所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没有这样一个核心力量,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由共产党领导

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②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专政,作为一个国家机器,是不可能由全体群众来直接行使政权的,而只能由代表着无产阶级意志的一部分人们组成的组织来行使政权。这一部分人,受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委托,组织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领导全国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部分人组成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正确观点,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对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是"经过共产党"③ 而实现的。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谈到政权问题时指出:"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0页。

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①

首先，这是由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决定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②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是全国各族人民公认和拥护的。

其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最先进分子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因而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支队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因而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这支队伍，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因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信任和拥护。

当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实犯过不少错误。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理由。客观世界的无限复杂性，人的认识能力的种种局限性，使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能不经过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所犯的错误，是在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谋利益、谋幸福的过程中犯的错误。并且，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纠正各种错误。

以上这些，是中国其他政治力量和派别所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由共产党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国家和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在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 在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他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5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

核心力量。"① 1957年5月25日在中央领导人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②

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在我国的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宪法的序言载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宪法用法律形式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对全国人民共同意愿的反映。共产党的这一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也是其他任何社会政治力量所无法取代的。

三、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创立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我国的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这些民主党派自1949年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这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介于代表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与代表无产阶级及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之间的,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即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具有爱国和革命的要求。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又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在与中国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见195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见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各民主党派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是中国的希望，真正代表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因而逐步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因如此，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了在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内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设想。他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和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①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又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1—1062页。

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①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当时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②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1950年6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③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互相监督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监督。"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政权,参加政治协商,推动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民主党派,都成了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了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7页。
②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见1951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页。

大会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来。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专门发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把这一制度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其基本精神：一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不但在"四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中，有了一个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不但不是外在的附加，而且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在需要。它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它便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广泛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群众，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它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有效地反映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发展新型的民主即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对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成功的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所做的新贡献。

在这一伟大贡献中，毛泽东起了突出的决定性的作用。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特别是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旧中国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非常落后且发展困难，因而工人阶级占人口比例很小。而资产阶级则分为两个部分：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官僚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一起成为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软弱而成为一个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的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则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种国情和阶级状况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人士，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国的各个民主党派，就其社会基础来说，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

分子,因而成为共产党团结这些阶级、阶层和人士的桥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依据中国社会性质所规定的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不但不主张消灭民族资本主义,而且主张使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的发展,因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纲成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赎买政策,因而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赞同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原来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各民主党派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统一祖国而奋斗。因此,在我国,各民主党派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参政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论述为这一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政治基础、策略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精神财富。

四、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实现形式

我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

党的政治领导,最根本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制定出适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多次指出过这一点的重要性。在1948年3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中,毛泽东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① 在这年2月《关于工商业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批评了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指出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他强调说:"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98页。

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①

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极端重要性。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则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他强调说：“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②

那么，判断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说，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③ 经过人民的实践，什么样的政策是好的政策呢？毛泽东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④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对国家政权的政治领导，主要表现为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变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决定，使之具有法律效力，成为国家意志，从而保证其贯彻执行，通过国家政权组织加以实现。

党的思想领导，主要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并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的思想领导。他说：“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⑤在思想教育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与中国具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1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8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4页。

实际相结合。他指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① 所以,他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③。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把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归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我党一贯的思想原则。在 1956 年 9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④

除了理论工作以外,实现党的思想领导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还包括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等等。毛泽东认为,党的政策要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来证明其正确性,来贯彻和实行。所以,他说:"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⑤ 为此,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组织领导,主要是通过选拔和培养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充分发挥各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9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532—53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533 页。
④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见 1956 年 9 月 16 日《人民日报》。
⑤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286 页。

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来带领广大群众完成党的各项任务。毛泽东一向认为，要有最好的群众领袖和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才能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①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② 搞经济建设也是如此。"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要有计划地训练大批干部。他说："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④ 毛泽东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⑤ 因此，他认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95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⑥ 党的组织领导是服从于党的政治任务，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

五、专政机关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毛泽东特别强调作为国家机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坚强柱石的军队、警察、法庭，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即党必须对军队等国家机器实行绝对的领导。

有一种观点主张，军队应"非党化"、"非政治化"，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一党的军队"。这完全是一种欺人之谈。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军队历来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的。任何一个阶级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必须凭借武装力量，即要有自己的军队；任何军队，也都只能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共产党没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27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52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2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347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277 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8 页。

有自己的私利,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只有共产党敢于公开声明党对军队要实行绝对领导。而资产阶级则相反,它不剥削广大人民,不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自己就不能生存,所以它必须欺骗人民。欺骗的论调之一,就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党的军队"云云,以此一方面掩盖资产阶级的军队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劳动人民的本质;另一方面不允许军队介入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这种纷争往往具有你死我活的对抗性)。正如斯大林尖锐地指出的:"各国资产者都在撒谎,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这是不正确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军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这是事实。然而这绝对不是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队过去和现在都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①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批评了当时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因而形成了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② 在1938年11月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③ 在1947年10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指出:"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④ 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清楚地强调了人民解放军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这个道理。

为了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一贯主张在军队中一定要坚持党代表制度,主张支部要建立在连上。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就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⑤ 他还说:"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4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3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4页。

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① 到了1929年，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队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立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方法。实践证明，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做到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军有党委，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有效地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的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我国的新宪法规定，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党中央即通过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同以往一样继续实行对全国武装的领导。这样做，不但使军队及其领导机构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得到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有利于党和国家对军队实行统一领导，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军队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作用的发挥。

五十多年来，由于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始终保持着人民军队的本色，为打败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建立新中国，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保卫人民的利益，作出了突出的、重大的贡献。

除了军队以外，审判、检察、公安、安全等专政机关，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道理和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是十分难得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把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万众一心，埋头苦干，使每一个人都有用武之地，都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江泽民同志在国庆40周年讲话中曾指出过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逐渐产生了某些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年来，由于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更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5—66页。

加重了党内思想、作风、纪律、组织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恢复和发展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统一的基本原理,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在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经济上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通过改革,革除那些不利于群众积极性发挥的东西,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一定能顺利发展,再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第七章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核心。毛泽东以自己毕生的精力，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并根据中国国情对这一理论加以丰富和发展，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他的功劳，在他以前很久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和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的新贡献是什么呢？这就是马克思自己说的："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由此可见，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核心。

我们之所以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核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产阶级完成自身使命的关键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奋斗目标，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已指明，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必将伴随阶级的消灭而逐步消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并不是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7页。

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

然而,所谓国家消亡,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自行消亡。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都是不会自行消亡的,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被消灭。无产阶级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国家形式,随着阶级的消灭,它便逐渐失去作用,最后自行消亡。而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的过程是极其漫长的,需经历从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再到国家的完全消亡这样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最初,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所以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但由于阶级斗争还存在,因而它还具有镇压阶级敌人的职能,还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所以它还是政治国家。只有当阶级、阶级差别消失,阶级斗争不复存在,因而国家对内镇压的职能随之消失,然而仍需国家行使组织经济的职能,特别是保证按照劳动分配消费品及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时,国家的社会职能才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管理职能。只有这时,国家才从政治国家转变为非政治国家。从非政治国家再到国家的完全消亡,还要经过发展生产力的长期努力,最终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有了极大提高,使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全世界消灭了资本主义和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战争。只有在这时,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才能真正实现。而在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不会消亡的。为了在将来使国家完全归于消亡,在当前就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消亡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4页。

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这个过渡需要多长时间,马克思没有讲。现在看来,要比马克思估计的长得多,特别是在一个革命胜利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没有几百年是不行的。

无产阶级首先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不能消灭剥削制度,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然后,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巩固和加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努力发展生产力,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直至建成共产主义,实现国家的完全消亡。总之,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所肩负的消灭阶级从而使国家消亡的使命。

由此得出的结论正是,无产阶级完成自身使命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反复强调指出:“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② “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

第二节 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过程

一、首次提出“用阶级专政方法”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于他青年时期所投身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日臻完善的长期的发展过程。

当毛泽东还是一个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时,他是一个在政治上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172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0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9页。

张推翻君主制,赞成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思想上主张彻底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三纲五常的民主主义者。1918 年 8 月,他来到北京,接触到各种新思潮后,开始表现出一种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并集中表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的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付诸他与蔡和森等人为试验新生活而搞的新村运动的计划,这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的设想。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那时还没有学到马克思主义,因而没找到一条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

不久,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斗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看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进而初步具有了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历史的思想,再进而认识到仅靠他曾经主张的"温和"的"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是不能使中国得到根本改造的,必须通过暴力革命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能达到目的。他在 1921 年 1 月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他在这时提出的"用阶级专政办法",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用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以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最早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二、工农红色政权的理论和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也还没有形成完全正确的认识。因此,党在当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领导全国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罢工运动上。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作了认真的总结和分析。当 1927 年 9 月进攻长沙的战斗受挫后,毛泽东就立即改变计划,决定率领起义部队向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起工农红色政权。与此同时,我党在其他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在进攻城市的计划受挫后转到偏僻的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我党在这些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工农红色政权,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壮大,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工农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的新道路。

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

①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 1980 年,第 23 页。

可以燎原》等文章，发展并深化了工农红色政权的理论。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小块的工农红色政权，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通过星星之火，造成燎原之势，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道路。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共和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

这个"改变"，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过去的政府即工农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而从现在起即人民共和国，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具体地讲，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①。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这一"改变"的原因、这一"改变"将导致哪些政策上的变化、这种"改变"为什么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错了、人民共和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什么等等问题。这些分析概括起来讲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这是由中国革命的这一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一点决定的。

事实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及其各项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都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完全实现了。人民共和国政权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的人民共和国继续存在。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随着战争的进展，人民解放区逐步扩大到整个中国大陆，最终出现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60页。

以说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

四、在一定历史时期作为过渡形式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939 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反共投降的倾向日益明显,终于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叫嚣取消抗日民主根据地,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企图走路线",幻想战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则发生了"左"的偏向,一些人混淆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于是,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一个问题。

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发表文章对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作了科学的说明。毛泽东更是写了一系列著作,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将其作为一定时期内的过渡形式的设想。他在 1939 年 5 月 4 日《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认为"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①。它不同于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也不同于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在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允许资本家存在。1939 年冬季,毛泽东与其他同志合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在他撰写的第二章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在 1940 年 1 月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并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概念。194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着重从路线、纲领及具体政策上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存在的根据、内部政治关系即国体和政体、内部经济关系即"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化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前途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等问题作了说明。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运用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的产物,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杰出贡献。

五、人民民主专政原则的提出

1949 年初,正值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平津战役也即将胜利结束,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之际。全国解放以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是全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563 页。

人民非常关心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给予及时的明确的回答。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毛泽东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①。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又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②，并提出，第一，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是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团结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孤立反革命势力。第二，彻底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这个专政应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第三，我党必须实行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既反对右的迁就态度，也反对“左”的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否则，就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

这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根据马列主义国家学说，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论述了对人民的民主方面和对敌人的专政方面的关系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从而完整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阐明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毛泽东首先阐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阶级是要消灭的，政党和国家是要逐步消亡的，这是人类进步的远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是一个过程，要有时间和条件。这时间，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这条件，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③。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就是马克思主义在阐述无产阶级时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消亡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上的过渡时期，这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68页。

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真理,是正确的宇宙观。他说,谁不承认这一条真理,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之后,毛泽东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救国斗争的历史,深刻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惟一的道路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②

其次,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论述了社会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

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各阶级在人民政权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作了这样一个精辟的概括:“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是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③

具体来讲,毛泽东指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对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他们在其现阶段有其很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所以,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毛泽东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这是由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缺乏远见、缺乏勇气、害怕民众等弱点所决定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5页。

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的正确运用，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科学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将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的基础。

第三节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

一、社会主义阶段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人民民主专政也随之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形式，无论是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还是在概念的文字表述上，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这一特点，首先表现在政权的阶级结构和专政对象上。

社会主义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权的阶级结构，仍然是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组织，即仍然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这样的阶级结构，是由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之所以要坚持工农联盟，是因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若离开工农联盟，单靠工人阶级，不可能形成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统治，也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所以要坚持让民族资产阶级也参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但由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就使得我党能够把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不作为国家政权所压迫的对象，把这一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对之采取赎买政策；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与之继续保持联盟的形式，即民族

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不仅享有选举权,而且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其成员(除极少数反动资本家以外)和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还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社会主义阶段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专政对象,毛泽东说,是"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以及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侵略的国外敌人。①

上述社会主义阶段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阶级结构和专政对象,充分体现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处理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相比,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阶级联盟,这个联盟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联盟的范围扩及到了民族资产阶级。这就使得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范围扩大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找到了自己的某些特殊的补充形式。实际上,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在1918年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能不能保留富人、剥削者的民主问题时就指出:"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②。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一设想未能实现。而在中国,这一设想却实现了。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一个新贡献。

今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代表人物,也不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是作为这些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代表来参与政权的领导工作。总之,我国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其阶级构成,依然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这种阶级结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

其次,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还有其概念的文字表述上的特点,它比较明白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9—7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257页。

又确切地表明了政权的性质和内容。

本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掌握和领导的国家政权，阶级关系上，原本就包括民主与专政两个方面的内容和职能，即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 由此可见，他们是把"争得民主"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一个过程，把民主与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也是明确地把"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当作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具备的两个方面，并具体解释说，"新型民主"即"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新型专政"即"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②。在纪念十月革命4周年时，列宁进一步指出："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③ 这个"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更清楚地表达了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二者完全是一致的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提法，从字面上看，只有"专政"而没有"民主"。这往往容易使一些对这一问题了解不够的人产生误解，也容易给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以可乘之机。例如，列宁当年指出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最爱用工人阶级专政来吓唬农民，现在他们还想用它来吓唬农民"，而农民"没有看见过专政这个词，他们不理解专政这个词。但是，他们从实际中领悟到，还是苏维埃政权好"④。考茨基当年也钻空子说："就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就本义来讲，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列宁曾对此给予有力的驳斥。

而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在概念的表述上不仅有"专政"，而且有"民主"；并采用内容更为广泛的"人民"一词，来包括、代替"无产阶级"一词。这就不仅在实质上表明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形式上更加明白确切地直接标明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个方面，标明享有民主权利和行使专政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广大人民。这就更加准确地表达了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14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566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34—335页。

实践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是科学的,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正确地理解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内容和职能,从而避免在实际工作中产生误解和片面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鼓吹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恶意歪曲。这就是他们那时不允许"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在文件、报刊上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是合乎中国国情,合乎人民意愿的。

总之,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是在我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我国国家政权形式的最好选择。正如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剥削阶级的专政,在保持其专政性质的基础上都各有多种政治形式一样,无产阶级专政也有多种政治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止一次指出,就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而言,没有什么适合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时候的所谓统一的模式。每个国家都应该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采取真正适合本国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各国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政治形式,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的组织结构(国家结构)、不同的专政范围和专政形式、不同的民主范围和民主形式、不同的民主集中制形式,等等。到底采取哪种形式,应该由本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经验、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等因素来决定。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已经采取过几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巴黎公社形式、恩格斯设想的民主共和国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等等。尽管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和专政的对象上,特别是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处理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同马、恩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以及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但它本质上毫无疑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的关键在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由我国的无产阶级经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执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担负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① "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② 由此来衡量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9—50页。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

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应有如下职能。

第一，对反动派实行专政。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②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具体的说明，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对反动派实行的专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即"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反对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③；二是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即"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④。由此可见，毛泽东一直是把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职能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原则区别是，后者是少数人压迫多数劳动者，面前者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极少数反动派的专政。这就是毛泽东早就指出过的，二者性质是相反的，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然而，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却常常否认这一点，总是自称为社会的代表，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凌驾于社会阶级矛盾之上并作出一种力图缓和矛盾的假象，而事实上，它是道道地地的压迫广大劳动群众的工具，只能使阶级矛盾愈益加深和激化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公开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极少数反动派的专政，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民主专政"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⑤。

人民民主专政对国内反动派实行专政的范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9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6页。

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① 毛泽东认为,对这些人实行专政,并不是说要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而是要对其中的大多数人实行改造的方针。毛泽东主张,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毛泽东认为,这种改造反动阶级的工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特色,是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的。"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消灭了。"②

毛泽东关于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之一的思想,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斗争从总体上说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从国内情况看,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虽被消灭了,过去的剥削分子经过多年改造,许多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妄图恢复旧制度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其他敌视、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灭。他们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里进行破坏和捣乱,严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剥削阶级的各种影响,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遗毒,还将长期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原理说明,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不能随着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改变而立即随之改变,而且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留自己的影响。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制度被消灭、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不能立即消失,并将长期存在。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的时间还不长,因而,上述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势必存在。这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会使我们的少数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受到腐蚀,成为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从国际情况看,当今国际形势的特点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不放弃军事威胁和军事入侵的同时,正在加紧展开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全面攻势。他们加紧意识形态的渗透,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宣扬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诋毁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59—7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7页。

共产党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经济援助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支持、收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等等。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总是连在一起的。国外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而在我们国内也存在与之相呼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所以说，在国际范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国内阶级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这种对立和斗争是长期存在的。正因如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削弱。

实行专政的目的，毛泽东说：“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这就告诉我们，人民民主专政行使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和防御国外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的职能，其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从而有效地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顺利地进行。

第二，组织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毛泽东认为，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职能中极其重要的内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明确指出，在取得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之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② 我们的困难在于，原先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而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在等待我们的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③ 他在那时就明确指出，中国要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并且说明，“没有农业合作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④。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48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48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477 页。

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① 还在那时,毛泽东就已经明确地把组织经济建设规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责之一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②。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当时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他在讲话中号召:"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③。为了说明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他特别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我们仍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最后他指出:"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④

毛泽东把能否用较快时间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看作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能否生存和巩固的重大问题。1963年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增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页。

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① 从总体看，毛泽东的这段话，显示了他对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状况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由此可见，把组织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看作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职能，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即变革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工具。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首要的任务是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就面临着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和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建设不断推向前进的双重任务。并且，在基本上完成了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之后，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正如列宁在谈及苏维埃政权从军事任务过渡到经济建设任务时强调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新的意义”，即无产阶级的专政，“应当善于在新的更完善的基础上组织经济，同时利用和重视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就。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②。

其实，任何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集中代表，都有组织经济的职能。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职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从内容上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可以使用政治力量去干预经济生活，甚至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的压力下，可以把一些企业和经济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但从总体上看，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因此，各个企业生产的组织和领导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国家是无法统一组织全社会的生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国家直接掌握重要的经济部门和重要的企业，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进行组织和领导的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大得多。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③

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组织领导经济建设职能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努力探索并正确地认识、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以促进社会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48—84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2 版，第 33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09 页

义经济的发展;二是依照国家的统一计划,集中地指导经济发展;三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能够组织和动员起全体人民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本国实际,制订出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及规划、指令等,以此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不仅一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在如何组织领导经济建设方面也作了许多研究和探索。

第三,对全体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① 这就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职能,即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提高思想觉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精神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具有这一职能,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却不能立即消灭旧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由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的。意识形态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不能随着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消灭而立即消灭。我国是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又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至今仍严重地存在着。这些残余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着,争夺着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腐蚀着其中的意志薄弱者,危害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同形形色色腐朽的意识形态进行不懈的斗争,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逐步提高,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6页。

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改造旧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更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应该是努力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一职能，充分表明无产阶级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民主。

三、人民民主专政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要不要民主？有没有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里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它与资产阶级民主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摆在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面前。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此作出了回答。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是对广大人民的民主。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在谈到劳动人民的所指范围时，他说："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人民是社会财富的主人，这就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享有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提供了保证。他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6—14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87页。

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① 而资产阶级民主是什么呢？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②，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③，"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这就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由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实质。哪一种专政好呢？毛泽东认为，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总是理亏的。这样，毛泽东就阐明了两种不同的民主观相区别的根本点。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的民主的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民主有形式和内容即实质之分。对民主，即要看其形式，更要看其内容即实质，决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从实质看，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形态，本质上是谁统治谁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和国家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民主，是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统治。这样的民主，是广泛而真实的民主。适合这一民主内容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和形式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工作中的失误，我们的民主形式还不够完善，具体体制上还存在违反民主原则的弊端，还必须进行改革；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正是从民主的内容即实质上看，列宁说，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要高出百万倍，社会主义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本质上是资本(首先是大垄断资本)专政的政治形式，因此，它是供少数资产者享用的民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不管它采取什么具体形式，也不管其形式如何巧妙、完备，都改变不了它的这种性质。50年代中期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一些人思想上发生了动摇。毛泽东指出："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03页。

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① 这就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改变不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

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清楚地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其目的的，这种民主的实质，只能是少数人享用的民主，只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则相反，它的实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是绝大多数人享用的民主。这是两种不同的民主观相区别的根本点。

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借口"民主"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都不曾断绝过。毛泽东就针对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独裁"、"不仁"的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②。"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③ 毛泽东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无产阶级民主的一致性。这是对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的简单而明确的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其实，把无产阶级专政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借口"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新老机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同作法。早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就在攻击暴力革命是"布朗基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封建专制的"隔代遗传"的同时，主张社会民主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改良，通过"民主"的道路，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这种假借民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把改良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的主张，是伯恩施坦为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确立的基本内涵。他的后继者考茨基也是这样，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违反民主"，攻击苏维埃政权是"用专政来毁灭民主"、是俄国历史上最暴虐的一种专政形式，等等。

借口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荒谬的。这是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是指谁统治谁的问题——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统治极少数敌对分子，还是相反。因而民主与专政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东西，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国家权力形式的两个方面。对一个阶级讲民主，必然要对与之相对立的阶级实行专政；离开了专政无所谓民主，离开了民主也无所谓专政。由此可见，把民主与专政当作是两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1 页。
② 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民主派》，见 1950 年 6 月 24 日《人民日报》。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475 页。

个对立着的、互不相容的东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其错误的根源，在于不了解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实质，从而取消了民主与专政的阶级性。这使我们想起当年列宁同考茨基的一场争论。考茨基从他的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民主与专政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他说，就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就是表明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而列宁则认为，专政和民主是统一的、互相补充的。他说："社会主义导致任何国家的消亡，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①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把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一方面，他驳斥了反动派骂无产阶级专政"不仁"、"独裁"和"极权主义"的谬论，指出："革命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另一方面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② 解放后，他进一步指出，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人民是社会财富的主人，这就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享有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提供了保证。他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③ 毛泽东认为。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才使民主达到历史上的最高阶段；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统治，从而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使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拥有真正的平等和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利。所以他说："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④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1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6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四、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毛泽东创立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权组织形式，指的就是相对于国体而言的政体。所谓国体，毛泽东指出："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①，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表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奴隶主阶级专政、地主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四种国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所谓政体，毛泽东说："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②。

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国体决定政体，政体表现国体。也就是说，国家的阶级本质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表现出来；这个政权组织形式必须与这个国家的阶级统治相适应，它是阶级统治的具体体现。但是，正如在内容和形式的一般关系中，形式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而是对于内容有着重大的能动作用一样，政权的组织形式对于一个国家的阶级统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同一国体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政体。例如，同是奴隶制国家，其政体可以是君主专制，可以是民主共和制，也可以是贵族共和制。不同的国体也可以有相同的政体，例如，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都可以（事实上大都是）采取君主制政体。所以，掌握了政权的统治阶级只有采用适合本国国情的恰当的政权组织形式，才能充分体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本质。

即使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虽然由阶级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采取共和政体，以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本质，与一切剥削阶级专政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共和政体本身又有着不同的形式。例如，历史上有过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有巴黎公社形式，有苏维埃形式。而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所采取的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则是毛泽东指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7页。

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①,"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②。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是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③ 毛泽东还指出了这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即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国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建设的传统和经验的。北伐战争时期湖南等地的农民协会,土地革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和许多革命根据地工农民主政权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形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参政会的组织形式,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乡村农民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等形式,可以说都为解放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那时,毛泽东就充分肯定了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④ 在那时,毛泽东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各方面问题作过许多详细的论述。例如,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等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民代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57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57页。

大会制度所作的论述，以及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权组织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解放后，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惟一能够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家性质的基本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在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要求有一个保证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保障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这个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人民正是通过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的。所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的直接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政权性质的直接体现。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也不等同于巴黎公社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一制度，而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把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内阁（或总统）、法院掌握，各处独立行使职权又互相制衡的制度。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于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其特点是，立法权由议会行使，行政权由总统或内阁行使，司法权由陪审法院行使，从而把国家权力分给三个不同的机关行使，以发挥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的作用，保持三种国家权力之间的均衡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整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缓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起到了维护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统治的作用。由此可知，三权分立制度，虽然给人民以民主的外观，但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换句话说，三权分立制度用民主的外衣掩盖着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一种适合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然而，即使是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三权分立的制度也还是存在许多弊端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必然造成各个权力中心之间的相互掣肘、相互拆台，以至相互抵消力量。这种制度显然不适合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最适宜的政权组织形式。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经济制度,必然要求建立一种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同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其对国家事务的政治领导,从而体现其执政地位的,而人民也是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这就实现了党对国家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二者的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之上,充分保障广大人民享有民主权利,便于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参加国家的管理,也便于人民依法对行政、司法、检察机关实行监督,防止和克服党政干部的腐败现象,因而无需搞三权分立。但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1871 年巴黎公社的实质是一致的。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原则,即由人民直接选出的 86 名代表组成了公社委员会,统一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即由它制定法令,决定重大问题,并直接指挥执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了适合自己的形式,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即在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对各种国家机关明确分工,使权力机关和行政、司法、检察机关各司其职协调一致地工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五、国家机关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①。毛泽东并在这时阐明了所谓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② 即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又是民主的指导和归宿。具体来讲,就是毛泽东说的:"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其广泛的民主表现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其集中表现为"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57 页;第 2 卷,第 67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5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57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民主集中制成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我国的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同时，我国的国家机构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这样做，既有利于全国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也有利于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效地处理国家事务。二是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当地的权力机关。一方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自主解决地方事务的权力；另一方面，地方的法规不得与国家的法律相冲突。这样做，既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也有利于国家法令、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

在国家机关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① "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②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

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不但是我们国家政权的根本制度和组织原则，而且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和组织原则。早在1942年延安时期，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就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③ 他还说："要党有力量，依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21页。

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①

在国家机关和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民主和集中作为一个统一体中两个矛盾着的侧面,二者之间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决不可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②

毛泽东关于在国家政权机关和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正确处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民主与集中关系的上述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解决国家生活和党内生活中各种复杂的问题,单凭个人或少数人的智慧和才能是很不够的,要靠集体智慧、集体领导,靠群策群力。要进一步发扬民主,疏通和拓宽民主渠道,使人民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来,支持和保护人民依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发表意见,对侵犯民主权利、压制批评、进行打击报复或诬告诬陷的人和事,要认真查处。各级国家机关必须坚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一经决定就要分头认真负责地去办。个人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行动上一定要服从和执行集体的决定。既要反对离开民主基础讲集中而势必造成的少数人专断的行为,也要反对离开集中指导讲民主而势必造成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以及各行其事的行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违反宪法和法律,都必须依法处理。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要达到的政治生活的目标,仍然是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国的国家机关和党内生活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7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762页。

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是保持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重要保证。

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阶级的历史的范畴，最终是要消亡的。但是，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仅不能马上促使无产阶级专政消亡，反而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处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为国家消亡作准备的历史使命二者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时候，就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竭力反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提出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而也最后消灭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暂时性和国家消亡问题，指出，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①。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则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此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②。在《哥达纲领批判》、《论权威》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对未来社会国家制度的设想时，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建立的自己的最终组织，它在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以后将失去意义。这同时也就指明，在共产主义，即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这一天到来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会消亡的。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他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强调，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462 页。

彼此斗争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经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当时,被列宁称之为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一些人,打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①。在这里,列宁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是必然要消亡的,但是,正是为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消亡,在过渡时期又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列宁并且指出,这个过渡时期是非常困难的、漫长的,在落后国家尤其如此,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只能加强,不能有丝毫的削弱。他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② "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③ 他还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者应怎样进行斗争,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并且早已解决了。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产生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一过渡搞得好也需要许多年。"④ 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着无产阶级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最终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毛泽东继承并在新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一步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必然消亡,但是现在不能,反而必须加强这样一个道理。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在提到人类进步的远景这个问题时,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最终必将消亡,共产党人正是为着这一消亡而努力奋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6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4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8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113页。

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进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① 毛泽东这段话，非常精炼而又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终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实现这一消亡，正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这一普遍真理。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不能消亡，相反，必须加强。全国解放前夕，面对一片咒骂人民民主专政“独裁”、“不仁”的叫嚣，毛泽东这样回答了关于“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这样的质问：“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多次重申过这个道理。在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68—14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5—1476页。

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巩固。"[①] 在1968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他明确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②]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即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革命,同以往一切社会革命的重要区别之一是,过去的一切革命不过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去执掌政权,因而无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社会主义革命却要推翻一切剥削阶级,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因而必须打碎旧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这就是马克思强调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有力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国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政权的柱石。在阶级社会里,军队都是有阶级性的,是一定阶级的统治工具。所以,资产阶级从来不能容忍武装工人的存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法国在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了的,"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④]。同样的道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就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者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旧军队"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⑤]。

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坚决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警察和常备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4页。
②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页。

军，建立了一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列宁指出："实行普遍的人民武装，取消常备军，这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忽视的任务。"① 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坚硬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服从的最坚固的柱石"，"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②。列宁还多次指出："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生存。""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③ 在列宁的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摧毁了旧军队，并在极短的时期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红军。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消灭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叛乱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无产阶级专政就得不到巩固。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军队的建设，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的一个基本原理。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1938年11月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讲话中，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也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阐述了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④ 毛泽东常常把军队比作刀把子、命根子。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演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⑤ 在1949年1月《评战犯求和》一文中，他又指出："'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大观园里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3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641—64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25、12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4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26—1127页。

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① 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一定要建立人民的军队。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② 他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后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的骗局,揭露道:"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党同盟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③ 毛泽东在这里所分析的建立一个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坚决指出:"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了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作用。在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镇压国内反动派的反抗的叛乱、统一祖国大陆、保卫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在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入侵、挑衅的战斗中,在参加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中,在抢险救灾中,等等,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表现出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作风,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除了人民军队以外,我们的法庭、警察、司法、公安、安全等部门,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重任,必须不断加强。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卫人民利益"⑤。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82—138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2—107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6页。

警察、法庭等部门作为人民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同人民军队一样，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人民的刀把子、命根子，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好。

总之，毛泽东充分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消亡，因为现在还不具备消亡的条件。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虽然剥削制度、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都已经消灭，但是，各种敌对分子还远没有消灭，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还大量存在，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进行侵蚀和破坏，加之我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能非常有效地完全克服某些政府官员中官僚主义现象的产生，也不能完全防止某些政府成员中腐化变质现象的产生，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上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产生。这种情况就决定了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从现阶段社会经济关系着眼，我们还会看到，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根据。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这种居于主体地位的经济关系，不但不能排除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一定的存在和发展，而且还要以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来作为补充。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使处于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中的人们（表现为阶级、阶层和群体）不但有着利益差别，而且必然存在着反映这种利益差别的政治立场上的差别。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本质属性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因而这两个阶级就其阶级本性来说，是以自身的辛勤劳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工农联盟则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基础。私有经济是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私有企业主既可能在国家政策、法律、法令的指导和规范下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活动，又可能在追逐剩余价值的驱动下干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个体劳动者不同于私有企业主，但他们也存在着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某些表现。江泽民同志在国庆40周年讲话中说："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我们的方针，一是要鼓励它们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发展，二是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既发挥它们的积

极作用,又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① 这种既要鼓励又要限制的工作,必须以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前提。只有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才能有效地处理好社会经济结构中主体与补充的关系,保证经济建设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迅速发展,一步一步为国家政权的最终消亡创造条件。这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必须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②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1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329 页。

毛泽东国家学说

刘德厚　主编

目　　录

导　言 …… (573)
第一章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确立 …… (583)
一、“茫乎未定”的国家思想 …… (583)
(一) 早期爱国、救民思想 …… (583)
(二) 国家问题的最初思索 …… (586)
二、理想中的国家 …… (589)
(一) 民众大联合 …… (589)
(二)“新村”设计 …… (595)
(三)“湖南共和国” …… (598)
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形成 …… (606)
(一) 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 (606)
(二)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的确立 …… (607)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萌芽 …… (613)
一、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 (613)
(一) 劳工应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613)
(二) 将工人组织起来，推翻旧国家 …… (616)
二、建立农民政权的思想 …… (616)
(一) 革命必须依靠农民 …… (616)
(二) 建立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 …… (618)
(三) 农民政权的性质和任务 …… (621)

三、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基础的最初奠定 …… (627)
（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 …… (627)
（二）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的最初论证 …… (629)
第三章 苏维埃共和国的理论和实践 …… (634)
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 (634)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上山”的主张 …… (634)
（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 (639)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 (643)
二、从局部苏维埃政权到苏维埃共和国 …… (648)
（一）率先举起“苏维埃”的旗帜 …… (648)
（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理论 …… (651)
（三）中国式的苏维埃共和国模式 …… (655)
三、实践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658)
（一）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和任务 …… (658)
（二）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形式 …… (662)
（三）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与建设 …… (665)
（四）对苏维埃共和国模式的反思 …… (669)
第四章 抗日民主政权的理论 …… (673)
一、从工农共和国思想到民主共和国思想的转变 …… (673)
（一）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新变动的分析 …… (673)
（二）“人民共和国”口号的提出 …… (676)
（三）“民主共和国”的方策的制定 …… (680)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和任务 …… (686)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 (686)
（二）抗日与民主的施政方针 …… (690)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体制及其建设 …… (692)
（一）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 …… (692)
（二）政权机关中的“三三制”原则 …… (693)
（三）“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与实行 …… (697)

第五章 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到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 (701)
一、“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 (701)
(一)“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政治主张的提出 …… (701)
(二)对“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性质的论证 …… (704)
(三)“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及实施构想 …… (705)
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纲领 …… (710)
(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形成 …… (710)
(二)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和政体的分析 …… (713)
三、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 …… (720)
(一)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 (720)
(二)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和纲领 …… (723)
(三)坚持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夺取全国政权 …… (726)
第六章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系统论证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 (731)
一、“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形成 …… (731)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集中总结 …… (731)
(二)国际人民民主潮流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 (733)
(三)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选择 …… (734)
(四)“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形成 …… (737)
二、对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理论的系统论证 …… (740)
(一)论证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精髓 …… (741)
(二)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性质和任务 …… (745)
(三)论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 (748)
三、《共同纲领》对建国初期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定 …… (750)
(一)《共同纲领》的基本思想 …… (750)
(二)《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国体的规定 …… (751)
(三)《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政体及结构的规定 …… (752)
(四)《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经济结构及其性质的规定 …… (753)
四、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理论与实践 …… (755)
(一)对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分析 …… (755)

（二）为巩固人民政权奠定物质基础 …… (757)
（三）巩固人民政权的战略措施 …… (757)
第七章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 …… (760)
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性质 …… (760)
（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 (760)
（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变化的经济基础 …… (761)
（三）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依据的 …… (764)
（四）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新变化的意义 …… (767)
二、民主与专政相互结合的新构思 …… (768)
（一）新构思及其理论基础 …… (768)
（二）新构思的理论贡献 …… (770)
三、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历史任务 …… (774)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提出 …… (774)
（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组织经济、文化建设的大政方略 …… (777)
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 …… (779)
（一）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思想的提出 …… (779)
（二）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律制度 …… (780)
（三）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的建立 …… (782)
（四）反对官僚主义，发展民主监督制度 …… (783)
五、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 (785)
（一）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 …… (785)
（二）党对国家实行领导的内容和方式 …… (787)
第八章 对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制度的贡献 …… (790)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 (790)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 …… (790)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 …… (791)
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 (792)
（一）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 …… (792)
（二）在国家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794)

（三）民主集中制的真谛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 (796)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 (799)
（一）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 (799)
（二）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 (800)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801)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 …… (801)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的依据 …… (804)
（三）毛泽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的贡献 …… (805)
第九章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战略思考 …… (807)
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战略意义 …… (807)
（一）发展生产力，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强大物质基础 …… (807)
（二）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及原因分析 …… (814)
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 (818)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新理论 …… (818)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 …… (820)
三、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 …… (822)
（一）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提出 …… (822)
（二）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824)
（三）对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价值意义的分析 …… (827)

导　言

一

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每一次政治大革命、社会大变革，都必然要产生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要求、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政治学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作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伟人——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心位置。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光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业绩，而且，也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理论遗产。作为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其政治思想、学说，十分丰厚。使之无论是在20世纪的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上，都不能不占有崇高的地位。关于这一点，许多中外著名学者都为之作过高度的评价。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今日伟大思想家》一书中，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评述，把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与政府”等方面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学说，誉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理论革新与创造。①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宝库中，又是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而闻名于世的。毛泽东最为辉煌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就是他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并以此构成了他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

1993年，我们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曾集体编著了《毛泽东国家学说》一书出版。当时，除了以此表达对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

① 参见［美］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伟人的敬仰和眷念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力图对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作一番系统化地整理与阐述。因为到此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比较有份量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史的书问世。人们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中，迫切需要有一本能历史地论述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形成过程、全面地反映它的基本观点、准确地表达它的主要概念、完整地概括它的思想体系、深刻地理解它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专著出版。为了推进毛泽东国家学说的深入研究，我们几个人，于是萌发了借纪念之机，承担编写此书的任务。然而，这是一项十分浩繁而宏大的工作，凭借我们的能力，难以如愿于读者的上述要求。但我们还是愿意在这方面尽一点微薄之力。在出版至今已事隔8年，此书又被入选《伟人毛泽东》大型丛书，重新同读者见面，这是我们原来所没能料到的。

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如此引起人们关注和高度评价，那是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的胜利。而今天，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又获得如此兴旺发达，日益昌盛，在一定意义上也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确立起来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有力保证。正如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主要公式”、“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同样“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②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抓住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就等于掌握了毛泽东政治学说的真谛和中国革命经验的根本。

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造就了一部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史。宣传它、学习它、研究它、发扬它，成为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一项光荣任务。

二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毛泽东随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全党同志的智慧逐步形成起来的。并且，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早已被人们视为理论创造最成功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始终坚持沿着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实践轨迹，寻找适合于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因此，我们只有按照这一轨迹，才可以从事实到理论弄清楚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来龙去脉，它怎样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两大历史阶段的衔进历程而得以建立起来的。具体地说，这一进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建党前后，毛泽东从主张资产阶级类型的民主共和国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第二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工农运动的实践中，开始认识中国社会阶级的基本特点，萌发了被后来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观"的最初构思；第三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中国革命必须走"枪杆子里出政权"、"建立农村红色政权"的道路；第四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五是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巨历史任务，党和毛泽东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由工农民主专政转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第六是从《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到解放战争时期，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系统化的阶段，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重大历史性飞跃；第七是从解放战争的胜利时期，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成为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体系化的基本标志；第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相联系，加强了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建设。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上述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是伴随毛泽东近60年革命生涯成长、发展，并沿着如下基本线索演进的：即由民众共和国——工农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使毛泽东国家学说包含着十分的丰富的内容：第一，关于坚持夺取国家、消灭国家的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第二，关于坚持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的思想。第三，关于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思想。中国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革

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第四，关于坚持扩大同一切革命阶级、阶层和进步力量结成爱国、民主的联盟（即最为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先进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的思想。第五，关于坚持民主与专政辩证的统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扬人民民主，实行人民当家的思想。第六，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人民国家国体、政体制度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思想；第七，关于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组织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新国家的思想。第八，关于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第九，关于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思想。第十，关于坚持与国际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联合和团结一致，实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大联合的思想等。

经过毛泽东的科学总结、精心提炼与准确概括，使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有了严整而科学的体系。我们把这一学说的精神实质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由不断发展着的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坚持把社会中的最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坚忍不拔地、有步骤分阶段地为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奋斗。

根据上述所有方面，我们以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本书的基本结构。导言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及其本质特征作了总体论述；第一、二章论述了毛泽东早期关于国家问题的思想转变和对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初步探索，为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第三、四章论述了毛泽东怎样组织发动建立红色政权，从工农民主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第五、六章论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形成的实践前提和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系统化论证；第七、八章论述了毛泽东国家学说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发展；第九章着重分析了晚年毛泽东关于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战略思考和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对毛泽东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这也算是本书的一个小结。

本书试图通过这些历史叙述，比较完整地向读者提供有关毛泽东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基本史料和完整体系，让人们比较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是怎样带领

全党，在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国情，勇于实践，总结经验，科学创新的，从而深刻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学说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三

凡论及到“人民民主专政”一词，人们总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始终坚持要用“人民民主”一词，来替换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的“无产阶级”一词？进行了这一替换有什么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是毛泽东国家学说中的一大发明。我们可以说，本书的各章几乎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开展论述的。毛泽东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主要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点所决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西方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构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日趋简单化，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垒。而且，无产阶级已经或者必然要成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①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相反，现代工业的工人阶级是人口中少数，农民则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则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压迫，使之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因此，如果只提“无产阶级”，就不完全符合中国的革命阶级、阶层实际复杂情况。虽然无产阶级能够从根本上代表这些阶级、阶层的利益，但它们之间在其具体阶级利益上，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及在对革命的要求所抱的具体出发点上，又有很大的区别。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不能简单的与之等同。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所产生的新型的国家政权，用“人民民主”替换“无产阶级”，就更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要求，更能如实地反映这些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政治地位。

从国家的阶级本质性意义上讲，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改换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国家观点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有完全一致性和统一性。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的一个根本点，就是要公开承认，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②；又说：“代替那个存

① 参见《共产党宣言》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284页。

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这些话语如果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的意义上理解，那就是说，无产阶级是把解放全人类和直到每一个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最崇高的使命的。而且在为之奋斗的过程和每一个阶段，是不断的将自己阶级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自觉地转化为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最本质的要求，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坚持的这个道理。而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关于国家政权问题上，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党性与人民性三者的高度统一。国家政权从来就是占政治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最高利益的集中体现。工人阶级不仅要将自身的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而且，同时只有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升国家利益，才能使新型国家，真正成为多数人的政权。这就是工人阶级国家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的真谛所在。

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作为新型国家的核心，使我国人民政权，能够适应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便中国工人阶级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组织成最广泛的社会联盟，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长期以来，在这个根本理论问题上，在党内和社会上产生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片面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阶级性，借口我国进人社会主义新时期后阶级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借口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正确观点，来反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所谓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人民民主专政，执行"左"的孤立主义政策，其结果扩大打击面，使党的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和失败；另一种则是借用"人民民主"，否定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要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改换为所谓"全民国家"。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右的方面将人民国家引向斜路。毛泽东始终坚持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问题上，实行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始终不渝地反对上述两种错误的倾向。只有牢牢把握住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这一精神实质不动摇，才能在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长河中，坚持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284页。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有一个最为显著特点：就是它在历史的发展中，政治上的包容性很大。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随着其发展，人民作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段上，人民的具体内涵不同，国家要实现任务也不同。因此，“人民民主”这一表述，就给新型国家政权在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空间上，以更大地活动余地，更为广泛的包容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具有鲜明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使它在历史发展中有更大的适应性，在处理社会阶级、阶层的变迁中有更多的灵活性。中国革命和建设所获得的成功，证明它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上具有无限生命活力。我们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就是要牢牢地把握这一重要的精神实质。

现阶段，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已经形成的社会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多元化；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变化，使大力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成为主要任务。尽管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社会主义占着主要或主导的地位，但总的说来，一些非社会主义的因素，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过的那些旧社会遗留给社会主义的各种旧的痕迹，还无法避免地将长期和大量存在。这之中虽然大部分已转化为属社会性的问题，但无法否认，其中一部分仍然属于阶级的历史遗留，或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新的形式。诸如与剥削方式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法新生成长；一些明显的旧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以种种赤裸裸的形式，死灰复燃，滋长蔓延。这些都是具有旧的剥削制度的历史遗留阶级。加上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面临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共存的复杂局面。因此，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说来，社会生活的一定范围内，仍然是处于一种由阶级向非阶级过渡的状态。属于阶级性质的现象，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扩大，而必将逐步地消失，但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人民国家的阶级性也就不能一下子完全消失。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讲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而不能讲什么“全民国家”。毛泽东所说的新型国家的“人民性”与所谓“全民国家”的主张是有原则的区别的。决不能将两者混淆。如果在理论上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原则的区别，那就会有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左”的或右的政治性、方向性的错误。

实现人民民主国家的阶级性与人民性、国家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统一，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通过阶级性实现其人民性，通过人民性体现阶级性。我

们只有用历史的、发展的社会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所必然产生的许多复杂而多变的政治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现实性社会大变革和制度大创造新的试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面临的一切崭新的历史任务，都是在试验中，变化中，发展中，许多问题只能依靠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来解决，靠实践来检验。关于国家发展、政治变革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我们必须勇往直前。然面，在国家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坚守“人民国家为人民”根本原则不动摇，而且要创新各种可行的制度来保证。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广大工农劳动的疾苦、社会利益冲突日显突出的情况下，认识和把握国家的人民性、社会性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办事情，处理问题，进行决策，都不可以脱离人民，更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方面去。正因如此，我们才提出要从理论到实践，加深对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史、实质的科学认识，全面进行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国家学说的研究，从而充分发挥人民国家在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比强大的政治生命力。

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党中央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其中第一条就指出：要“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捍卫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毛泽东在创立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伟大理论的进程中，由于复杂的历史条件所限，在某些问题上也产生过失误和偏差，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在如何巩固和建设人民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发生了严重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偏差。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之作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找出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基本的总结。我们党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国家学说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

在导言的结尾，我们还要说几句本书这次能重获出版的事。

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伟人毛泽东》丛书编辑部，组织专家从已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纪实性、研究性著作的优秀作品中，选编出版《伟人毛泽东》丛书。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事情。它将对进一步推动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弘扬毛泽东的彻底革命精神和科学创造精神，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为这一大型丛书的出版热烈欢呼！也为我们编著的《毛泽东国家学说》被选入而由衷地高兴。

《毛泽东国家学说》原系武汉大学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中的一部，曾由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发行。这次应《伟人毛泽东》丛书编辑委员会的邀约，对部分章节进行修改、补充和重写后，编入新的丛书出版。我们虽然在书名、书的整体结构体系上保持了原样，但对于原书中的导言、第六章进行了改写和内容补充；第九章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改由丁俊萍重写；第五、七、八章的个别节目略有调整和内容改动；其余各章对个别文句和注释进行了校正。书的主编仍由刘德厚担任，负责对修改后的书稿进行审定。

作者按章节顺序排列：刘德厚教授、博士生导师（导言和第六章）；虞崇胜教授、博士（第一、二、三章和第五章第三节）；丁俊萍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第四、九章）；宋俭副教授、博士（第五章第一、二节）；梅荣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八章）。

最后，我们要感谢《伟人毛泽东》丛书编辑部主任杨福云教授，由于他的学术慧眼和精心挑选，我们的书才有可能列入丛书出版。我们对曾经参加过本书1993年版的部分节目撰写和提供有益资料的戴德铮教授、陆德山博士表示感谢，向武汉大学出版社支持本书的重新出版表示感谢！

第一章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确立

一、"茫乎未定"的国家思想

近代中国曾沦为深受列强欺凌和封建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特殊的国情，使得解决国体和政体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结起来，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富强。这两个问题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志士仁人的种种探索和追求，都是围绕着这一历史主题而展开的。毛泽东一走上政治舞台，就以敏锐的目光注视到这一历史的主题，并且为解决这一历史的主题，耗尽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为形成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早期爱国、救民思想。

如同近代中国许多进步思想家一样，毛泽东也是从爱国、救国进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观的。少年的毛泽东，经历了劳动——读书——劳动——读书的过程。通过劳动的实践和接触劳动群众，使他产生了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为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鸣不平的思想感情；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了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书，又使他由同情劳苦群众的朴素感情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倡导变法图强的书，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迪。特别是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更是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1936年他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

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从此立下了献身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的鸿鹄大志。

在东山小学堂学习期间，毛泽东先后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宏愿。他还向同学肖三借阅过《世界英雄豪杰传》。在这本书里，他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传记。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他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在书中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其中圈点最多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他在还书时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② 为了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他给自己取名为“子任”。

在他读过的那本《新民丛报》原件中，留下了他许多批语。在该报第4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一段末尾批写道：“正式而成立，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③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谈论国家问题的文字。尽管其含义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青年，能够如此清楚地将“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政体区别开来，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当时毛泽东还只是希望有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杰出人物来辅佐朝政，实现君主立宪，通过变革使国家富强起来。毛泽东对君权的否定，是在1911年春来到省城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以后的事情。这年4月，孙中山、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1—112页。
②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注4。

黄兴等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给予毛泽东以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 年 4 月 27 日），黄兴在广州起义，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①] 他通过阅读《民主报》和其他一些革命宣传品，了解到广州起义的情况和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心情非常激动。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表政见。在这里，他虽然并未从政治上明确划清革命和改良的界限，但已经表明毛泽东开始从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的转变。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一度参加了湖南新军。半年的军旅生涯没有遇上什么大的战斗，却开阔了他的视野。他用节省下来的军饷订了《湘汉新闻》等进步报刊，从中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名词，不过那是江亢虎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

1912 年春，毛泽东退出新军后，考取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在这里，他除继续学业外，更加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6 月，他在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中，借商秧徙木立信的故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怀。文章紧扣"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政府要取信于民，不仅要有于民有利的法律，而且政府本身必须是民治的政府。他写道："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理"。文章指出："商秋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蠹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弩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然而，国民对此为何"惮而不信"？政府又为何"必徙木以立信"？究其"非常之原"，是因为政府早已失信于民，对政府的言行，"黎民惧焉"。由此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来也。"[②] 文章运用"逆折而人"的手法，初步分析了近代中国国破民瘼的原因，论证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府的不合理性，流露出对民治政府的强烈向往。

---

① 《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 4 号，1919 年 8 月出版。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 页。

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涉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是在1912年下半年。这年7月，他离开高等中学后，寄居于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以湖南图书馆为基地，过了半年的自学生活。面对湖南图书馆浩若烟海的图书，他象“黄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只顾拼命地吃”。在这里，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肯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西方名著，以及世界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些书籍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于青年毛泽东国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曾对人言：“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①

（二）国家问题的最初思索。

1913年春，毛泽东考进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春，该校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也就来到一师续读，直至1918年毕业。在师范学习的五年，是毛泽东文化科学知识取得长足进步的五年，也是他早期国家思想形成的五年。

在师范学习的初期，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首先接受了斯宾塞尔的社会有机论思想。杨昌济从孔孟正统思想（无我论——小我服从大我）出发，结合斯宾塞尔的社会有机论，主张“舍世界主义而取国家主义”。他在《修身问题》的讲义中，用“毒蛇螫手，壮士断腕”的事例，启发学生认识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国家的道理。他反复向学生宣传：“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家有大难，死一男而生一家，孝子所愿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把杨昌济的观点作了详细记录。他写道：“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之”。正是基于这种“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国家”的认识，毛泽东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为此，他与朋友们约定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情，不谈家庭琐事，而只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②

而对外国列强的步步紧逼和北洋军阀的卖国求荣，毛泽东忧心如焚。他一

① 周世钊：《回忆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3页。

方面鼓励同学为挽救国家的危亡而储才蓄能，将自己培养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奇杰”，另一方面深入地探讨了救国救民的各种方案。他认为，要救国，必须变革现状。而要变革现状，又不能只从枝节入手，而必须从“大本大源”上解决问题。他说：“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者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那么，“本源”又是什么呢？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只要“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①

毛泽东认为，“宇宙之真理”（即大本大源）是有二重性的。一方面，宇宙真理作为最高本位意识的体现，它是国家的本质，规定着国家的面貌。有什么样的“宇宙真理”，就会创造什么样的国家。因此，他号召用极大的力量廓清中国五千年的旧思想和旧道德，重建“宇宙之真理”。另一方面，宇宙真理存在于个体之中，个体体现宇宙，宇宙是由无数个体构成的，“各我集合，而成宇宙。”因此，宇宙、国家只有体现个体的利益，才是合理的。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显然受到卢梭天赋人权论的影响，表明他已从斯宾塞尔的“社会有机论”中走了出来。

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阅读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写下了大量批注文字，其中有许多是探讨国家问题的。综合起来看，他着重阐述了三层意思：

第一，个人与国家等值，不存在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权威关系。泡尔生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对权威服从的产物。因此，国民有服从国家的义务，而不能有所反抗。对此，毛泽东大不以为然。他批注道：“此处吾有疑义”。他认为，“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益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因此，团体、国家乃“大个人也”。既然“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那么，“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②

第二，个人有无上的价值，一切“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的恶魔都必须扫除。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② 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16—285页。

早在1912年，毛泽东在《商鞅徙木伦》的作文中，就提出过要改变不能取信于民的政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进一步指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他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认为国家作为强权之一，与教会、资本家、君主一样，都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的"恶魔"，都在扫除之列。

第三，国家只有不断更新改造，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他反对"社会有机体论"将国家与个人说成是躯干与四肢的关系，强调国家与个人的起源是不一致的。他指出，国家、国民及政治语言之产生，"皆人类进化以后之事，起源之时固不如是也。且此等后天之事，皆各人互相联合而作，以便宜各人。"既然国家与个人不存在不可离解的联系，那么更新改造国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明确指出："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国家只有不断"改造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才能"由毁而成"，"时时涤旧，染而新之"。

不应否认，毛泽东的上述认识在理论上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首先，他混淆了文化共同体和国家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是一定文化模式的产物，从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模式；而国家是由许多人组成的特殊政治共同体，从一个人身上不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国家。毛泽东把个人和社会、国家等价，不自觉地把国家混淆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表明他对国家的本质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其次，他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解释也是片面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是群体性和个体性相统一的共同体。它肯定社会由个人构成，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活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它并不把个人等同于或凌驾于社会、国家之上，相反，它同时也强调社会、国家对个人存在和个人活动的依存性和制约性。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个人也不能离开它而存在。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作用时，一度将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个人至上的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之不能正确把握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真谛。

当时，毛泽东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立场出发，强调个人高于国家，其用意在于说明国家是可以改造的，特别是那些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的国家，就应该坚决地否定它、打倒它。这样，他就用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思想，为改造封建军阀横行，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提供了基本的根据。

毛泽东对社会有机论的国家主义持批判态度，并不是不主张国家主义，而是

另有隐定。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华夏中心论”和“天朝上国”、“威慑四方”的传统观念来束缚人民的思想，使得国人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严峻地位，不能树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观念。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为了打破这种传统观念，他以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为武器，向斯宾塞尔的社会有机论展开了批判，以促使国人清醒地思考中国的改造和生存发展问题。然而，近代中国国难频仍、民智暗愚的现实又使他感到一般国民中国家意识的淡薄，急需在国民中进行国家主义观念的教育和启蒙。因此，他在批判社会有机论的国家主义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只要国家符合人民的意志，个人就应当毫无保留地支持国家，为国家作出贡献。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肖子升一道游学，在离开安化向益阳进发的路上，曾讨论过国家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乏民族感情。肖子升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夸大国家观念与夸大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毛泽东则指出：国家有好有坏，坏的国家当然应推倒它，“但是一个好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有义务保卫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子民。在未来理想国家中，儿童将由国家来抚养、教育他们。”“最重要的事，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一旦建立了好的强有力的政府，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① 可见，毛泽东反对的是建立在社会有机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而对于天赋人权基础上的国家主义是持赞成态度的。他这种在国家问题上的矛盾观点，是和他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国家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还处在探索之中相适应的。诚如他自己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所说：“自揣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②

二、理想中的国家

(一) 民众大联合。

1917年以前，尽管毛泽东对于国家等问题的认识仍然“茫乎未定”，但并未放弃对宇宙、人生、国家等问题的探索。萦绕在他脑际的始终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这样的“本源”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杨昌济“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的影响下，他与他的同学们经过上百次的讨论，逐步得

① 肖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116—117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页。

出这样的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①]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以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为纪律，希图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

1918年4月，为筹组赴法勤工俭学事，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使毛泽东倍感振奋，耳目一新。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激烈变动，他作过如下描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急待研究的问题"。这次北京之行，他除了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到北京大学去听课，参加邓中夏等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与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知名人士有所交往。当时，他对政治问题十分敏感，思想越来越激进。但他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并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191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送走第一批赴法学生后回到长沙，经周世钊介绍，在修业小学当历史教员。"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亲拟传单，动员青年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28日，在毛泽东的串连发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毛泽东虽然不是学联的成员，但他每天都与学联领导人研究问题，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成为"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②] 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急需创办一种刊物，以扩大革命宣传，提高群众觉悟，推动爱国运动前进。为此，毛泽东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主持创办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想为主旨"，于7月14日正式出版。毛泽东不仅是这个刊物的主编，而且也是主要撰稿人。他除了撰写创刊宣言和长篇论文《民众大联合》外，还写了国际、国内大事记述和杂感30多篇。这些文章虽不是专门论述国家问题的，但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仍然是如何改造国家和社会以及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第一，初受十月革命的启迪。

同毛泽东"五四"前的文章相比，《湘江评论》上的文章最显著的特色，是

---

①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1920年编。
② 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斗争》（未刊稿）。

以满腔的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论证了十月革命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驱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美、意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①

毛泽东还把中国的"五四"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新的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强调"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产物。他写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好邪为之辟易。"②针对当时的军阀政府把一切新思潮称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还称为"过激党"，毛泽东发表了《研究过激党》的杂评，辛辣地指出：那些盲目乱喊过激的人，对"过激党"也应该研究研究，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什么"洪水猛兽"、"抵制"等等。不然，"一晃眼，过激党布齐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定处了。"③

第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揭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大肆宣扬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是所谓"人道"和"公理"的胜利，国内也有人对此表示附会。毛泽东则结合我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事实，指出：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了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了强权"。④他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强权，为政治的强权，国际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他还写了不少短文，揭露英、美、法、日、意五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活动，指出克里梦梭、劳合·乔治、牧野、欧兰杜，都是"一类的强盗"。他们在和会上所争吵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⑤提醒人们不要轻信帝国主义的谎言，不可对帝国主义存在任何幻想。

---

①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三)，《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
②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三)，《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
③ 毛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创刊号。
④ 毛泽东：《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湘江评论》第2号。
⑤ 毛泽东：《可怜的威尔逊》，《湘江评论》创刊号。

巴黎和约签订后，劳合·乔治回到英国，在下院演说中，表示“我们英国，得了许多成功，是我们伟大国民团结兴奋的效力”，希望国民保持“获胜的精神”，“不要浪费精力于彼此相争。”对这段话，毛泽东予以深刻揭露，指出其实质是英国统治阶级妄图以对外侵略来掩盖国内的阶级矛盾，并正合劳合·乔治一类的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① 他还从经济根源上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是少数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他说：“地球上第一个实业专制国”的美国，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②

第三，发出了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呼声。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话，于是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社会变革运动，毛泽东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各个领域变革运动的发展方向时，他说：“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有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他认为，各种改革的性质，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而对抗强权的指导思想，为“平民主义”。他明确宣告：“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③ 表现出与一切反动势力势不两立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认为，国家和社会的改革与进步，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才是我们“最切最要的大问题”。他号召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作敢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④ 他宣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

① 毛泽东：《政治家》，《湘江评论》第3号。
② 毛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创刊号。
③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④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①] 这说明，他已从《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不要国家，将国家看成是与民众对立的异己力量，转到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通过变革建立理想的国家和社会的正确认识上来，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第四，阐述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要变革国家和社会，依靠什么力量呢？毛泽东认为应该依靠广大民众。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已注意到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次社会变革运动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社会变革成败的关键。在《湘江评论》上，他以《民众大联合》为题，对民众大联合的意义、目的和大联合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初步提出了民众国家的思想。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意义，他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历来的改革和反抗，两方都必有其大联合。而“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他指出，古来的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而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实现政治变革、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实现社会改革以来，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尽管其胜利尚未达到完满的程度，但其发展趋势“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全世界”。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呢？毛泽东认为：“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虽然占有大量的土地、机器、房屋和金钱，垄断了教育，掌握了武力，但毕竟人数很少，只要广大民众提高了觉悟，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就可以推翻少数人的统治，求得自身的解放。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们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

①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三)，《湘江评论》第4号。

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要从小联合做起。先从小联合入手，由许多的小联合，进而为一种大的联合。小联合以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做基础，大联合以各革命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农民要和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农民的种种利益；工人要和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工人的种种利益；学生、教员、女子、警察、车夫也都要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在各阶层人民联合的基础上，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前景，毛泽东在文章的结尾满怀信心地写道：“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过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以前许多研究者都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看成是毛泽东以后提出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①] 我以为，还不止如此。“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还是毛泽东民众国家思想的最初表述。因为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群”、“社会”、“联合”等概念实际上是与国家、政权等概念同义的。他已认识到，皇帝、贵族、资本家所以享有种种特权，就在于他们有“群”，有“社会”，有“联合”，即有政权，有国家；广大民众所以受压迫、受剥削，则由于他们没有“群”，没有“社会”，没有“联合”，即没有政权和国家。因此，广大民众要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就必须联合起来，形成“群”，建立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才能得到“共同的利益”。可见，毛泽东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他后来提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思想的最初萌芽。

细读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一股国家本位、社会本位、民众主体的时代意识奔涌而来。在毛泽东的意念中，过去抽象的人已演化为具体的“民”，简单的个体已被复杂的“国家”所代替，广袤无垠的宇宙已被丰富现实的“社会”所取代。与“五四”前他的言论相比，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① 参阅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汪澍白、张慎恒《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

第一，从注重精神生活转向注重物质生活。“五四”前，毛泽东究心于思辨哲学，力求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却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物质生产基础。《湘江评论》一反“五四”前期的唯心观点，坚持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实际说话”，“研究事实和真理”。第二，从寄希望于圣贤转向寄希望于民众。“五四”前，毛泽东十分崇尚历史上有作为的圣贤，盼望有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湘江评论》则立足于民，论证了民众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民众的大联合才是国家和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清楚地表明了他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性变化。“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问题提得十分深刻，回答得也十分明了。它说明毛泽东的整个世界观正在向唯物史观靠拢，其国家思想正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

勿庸讳言，毛泽东当时的国家思想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时流露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他当时并不赞成暴力革命，而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幻想通过“社会互助”的和平方法进行社会变革和更新。毛泽东指出，打倒强权有两种方法：一激烈的；一温和的。而他是主张温和方法的。他说：“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着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基于这种理由，他“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①] 可见，这里留着克鲁泡特金主义和胡适改良主义的明显印迹和影响。正是在胡适改良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于1919年9月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并向国内各方面发出《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强调要研究现实问题，指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依据”，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就《章程》所列的140多个准备研究的问题看，明显地凸现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痕迹。这就说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尚未完全从社会改良主义中走出来。

(二)“新村”设计。

青年毛泽东对理想的追求是十分执着的。1917年9月，他和张昆弟、彭则

①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厚访游昭山，夜宿昭山寺内。宁静的秋夜，勾起青年人的种种思绪，三人畅谈了各自的理想。毛泽东感慨地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因此，"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①] 至于怎样解决经济问题，他当时并不清楚。第二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工作尚无定向。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也为了实现"数年来梦想的新社会生活"，他和蔡和森、张昆弟等新民学会会员搬到岳麓书院半学斋搞起了新村实验。他们一面读书，一面实施新村规划。在生活上他们实行"共产主义"，大家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用蚕豆拌米煮饭吃；他们共同讨论学问，互相交流学习体会，一起到核子洲头游泳，傍晚到湘江边去散步或登山远眺，有时在爱晚亭露宿通宵；他们无情地揭露和抨击社会的各种黑暗现象，讥议反动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明确表示对强权的鄙视和不满；他们尽情地抒发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宏愿，渴望通过建立模范新村进而达到改造全中国的目的。总之，他们对未来充满无限的信心和美好的憧憬。然而，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新村实验不可能持久。8月，蔡和森率领一批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北上后，新村规划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不过，毛泽东并未放弃对新村理想的追求。1919年春夏，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仍在设计理想中的新村。同年冬，他在《学生之工作》[②] 一文中，对新村的模式作了较具体的描述。

他当时所设想的新村，是以新学校、新教育为中心，将新家庭、新学校和新社会连成一体，"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毛泽东指出，新学校、新教育的基本特征，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他认为，这种工读生活是新社会的细胞，可以使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工读同志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一定期间内，不得取出其所存之利益；一定期间以外，可以取出其利益之部分而留存剩余部分，用此办法，保持学生与学校的长久联系。

他主张学校教授的时间应该减少，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他对一天的作息时间作出如下安排：睡眠8小时，体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他特别强调，工作4小时是实行工读主义必具的一个因

① 《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16日。
② 载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素，而且“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生产的事项，全然在农村进行，学生可以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等工作。为除去学生毕业后“多骛都市而不田园”的弊病，他提出：第一，须有一种经济工作，可以直接生产；第二、此种工作的成品，必为现今社会的普遍需要；第三，此种工作的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直接参加生产，接触实际生活，养成乐于农村生活的习惯。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提出了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的问题。他认为，学校、家庭、社会是紧密相联的统一体，仅有学校、教育的改造是远远不够的。“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就是“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因此，“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而创造新家庭、新社会又必须从创造新学校做起。“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构成新社会的主要要素有：公共育儿园、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总之，一切都是公共的，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相友爱……。这就是毛泽东所描绘的新社会，一个理想中的国家模式——新村。

这种大同社会的美妙理想，曾经较长时间萦绕在毛泽东的脑际。他于1919年12月底第二次到北京后，仍怀着很大兴趣参观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写信给陶毅介绍了女子工读互助团的情况，“觉得很有趣味!”他还写信给周世钊，提出继续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生活”；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对于生活费用，他提出通过教课、投稿、编书、劳动等方法来解决。而所得收人，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①] 就在这时，他还和陈独秀、王光祈、彭璜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5月，毛泽东由北京到达上海后，在继续进行驱张活动的宣传外，亲自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具体担任洗衣和送报工作。但是，上海工读互助团也没有维持多久，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很快失败了。6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写信给黎锦熙，表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停止。”[②]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

① 《毛泽东致陶毅信》、《毛泽东致周世钊信》，均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

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①] 毛泽东构想的理想社会——新村，尽管带有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畸型社会状态下人们的普遍心理。面对军阀混战而希望“社会互助”，面对国事繁乱而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面对阶级分化的剧烈而追求理想的“新村主义”。应该说，这些都是身处近代的中国人，在探索理想国家和社会过程中的一种直观的反映。它虽然并不真正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也与世界潮流不合拍，但它却实实在在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和对现存国家的一种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它是与不成熟的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只是从人们头脑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因而一开始就注定只能是空想的。它制定得愈是详尽周到，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毛泽东建立新村的构想，虽然他一再提起，但终究没有能够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剩下的只是一个一度存在于他头脑中的先验的国家模式。

（三）“湖南共和国”。

随着各地“新村”活动和工读互助活动的破产，毛泽东暂时放弃了对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新村的幻想。不过，他并没有停止对理想社会的追寻，仍然执着地追求着理想中的国家模式。1920年至1921年初，毛泽东在发动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力图探求一个治理湖南和中国的理想方案，憧憬创设一种崭新的人民自决自治的国家体制。

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倡导驱张运动的时候，即与彭璜等人研究将来驱逐张敬尧以后，如何促进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的问题。他与彭璜草拟了一个题为《湖南建设条件问题商榷》的材料，明确提出要废督裁兵、银行民办、增加教育经费、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5月初，毛泽东到达上海后，又与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并与彭璜共同起草《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湘军头目谭延闿、赵恒惕打着“湘省自治”和“湘人自治”的招牌进入长沙。毛泽东及时发表了《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治》等文章，提出“废除督军”、“人民自治”等项提议。接着，他又写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的公开信，全面阐述了“改造湖南”的各项主张。随后，他在湖南自治运动的高潮中，自9月3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409页。

日至10月11日的--个多月内，个人或联名在长沙、上海等地报纸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和讲话，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构想。

首先，他论证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必要性。

湖南自治运动萌发的时期，正是北洋军阀横行无忌、国家政治腐败达于极点的时期。面对当时虽有中央政府而实际上权力分散、政出多门的现实政治状况，毛泽东指出，拯救湖南和中国的“惟一法子”，不是维护旧的军阀统治的中央政权体系，而是在分散、多元的基础上，实行“各省自决主义”，重组政治机构。他认为，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腐败不堪、气数已尽，不仅失去了管理统一国家的起码能力，而且已成为引起国内祸乱的根源。他说：“中国之乱……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势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而“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①] 因此，不除去此种祸根，中国就没有救治的希望。

既然要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自然就不能维护它的“统一”。毛泽东公开宣布：“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②] 他指出：“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塔，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③] 他以当时政局为例指出：尽管军阀、政客们统一的口号高耸人云，但现实是“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④] 因此，他坚决反对在北洋政府之下实现“统一”，并认为南方政府的统一意图也难于实现。他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至此地步，“推究原因，吃亏就在‘中国’二字，就在于中国的统一”。[⑤] 中国的事，办不好者，就在于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组织。他说：“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的，“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的，“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的，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

① 毛泽东：《湖南人民的自治》，1920年6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
② 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解决——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
③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强书》，1920年6月28日上海《申报》。
④ 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解决——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
⑤ 毛泽东：《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

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比如俄革命亦是如此。“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他很赞成杨昌济的话：“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①] 他指出：“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惟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②]

其次，他描绘了“湖南共和国”的具体模式。

建立“湖南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当时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湖南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对此，毛泽东作了具体描绘。

第一，国家拥有独立的主权。毛泽东认为：“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而“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是否具有独立处理内部事务的完全主权，是立国的起码要求。他指出：“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为‘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期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因此，“可以取革命精神，推倒一切，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③]

第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认为，国家主权的神圣化，仅仅在于它的人民性。他号召人民起来当家作主，与闻政治法律，过问国家大事。他说：这次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着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干的。”[④] 他还指出，那种认为政治是特殊阶级的事，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是大错而特错了”。他明确宣布：“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

① 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湖南《大公报》。
② 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
③ 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6页。
④ 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7—518页。

么定就怎么定。"[①] 可见，毛泽东设想的"湖南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

第三，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共和政体。毛泽东十分推崇瑞士直接民选的政治制度，明确指出要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象"。他设想，"湖南共和国"应采取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直接民主政体，彻底实行"民治主义"，政府一切举措，"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做到"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②] 在他参与起草的《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中，明确提出了"直接选举"和"普遍选举"的原则。他坚决反对将省自治法委托少数"无职业的游离政客去制会议"的做法，认为"自治法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制能够议的，并且要这么大多数人制出来议出来才好。"他主张，凡年满15岁，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工人、商人、学生、教员、兵士、警察、乞丐、女人，"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③]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第四，在野党和在位党相互制衡。毛泽东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凡属重大的事情，如果没有许多人"做促进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件事是一定办不成的。他举例说："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④] 因此，他表示希望在野党和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推进湖南自治运动的成功。

第五，国家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作为支柱。毛泽东指出，湖南自治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文明民主的新湖南，而在土匪横行、兵乱不已的环境下，没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是不行的。他说：那种"不设一兵"的意见，虽然"陈义甚高"，但难以实行。因为肃清土匪，维持地方秩序，需要军队；抵抗强暴势力袭击和外省干涉，也需要军队。因此，他提出在废除一切守备队、镇守使之后，在"顾到民力，顾到土匪，复顾到至不得已时抵抗强暴"的前提下"暂保存正式有纪律之陆军一师"，[⑤] 仍是必要的。

---

① 毛泽东：《释疑》，《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9页。
②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0—491页。
③ 毛泽东：《释疑》，《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0页。
④ 毛泽东：《再说"促进运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2页。
⑤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9页。

第六，国家的基本职能是发展实业、创造文明。毛泽东反复强调，建立湖南共和国的目的，决不是“自处于小部落”，将自己禁锢起来，而且是要象一百年前北美的各州一样，“自办教育，自办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他将湖南与日本和瑞士作了比较，指出：湖南的人口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差不多，地理环境比瑞士好得多，可是“瑞士光华之国，日本立宪之邦，终未见于大江流域之湖南也。”因此，湖南今后刻不容缓的任务是“积极的建设之进行，世界大势之观察，民治之敷施，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①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理想的国家模式，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国家性质上，它是全民的，是三千万湖南人的国家；在国家管理形式上，实行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在党政关系上，实行两党对峙制或多党分立制；在军政关系上，军队隶属国家但在政权中保持中立。也就是说，一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特征在“湖南共和国”模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纲领。”②

尽管“湖南共和国”的模式并没有超出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所允许的范围，但不应忽视它在毛泽东早期国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如前所述，毛泽东早期国家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改造国家和社会。为了解决这一中心问题，他在《湘江评论》时期，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后来又具体设计了理想的“新村”方案，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尝试。民众大联合——新村——湖南共和国，这正是毛泽东早期国家模式中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环节。如果说“民众大联合”是对旧有国家的否定，并提出建立民众国家的任务的话，那么，“新村”就是民众国家的最初模式，而“湖南共和国”则是“新村”的放大和发展。就“新村”和“湖南共和国”的关系而言，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新村”是“湖南共和国”的先导，“湖南共和国”是“新村”的升华；从地域上看，“新村”是“湖南共和国”的部分，“湖南共和国”是“新村”的整体；从改造程序的角度看，“新村”是“湖南共和国”的前奏，“湖南共和国”是“新村”的延伸。总之，“湖南共和国”的模式，并非“新村”理想的中断或倒退，而是在更宽广的范围下的运用

①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8—490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

和发展。

当然，“湖南共和国”与“新村”毕竟不完全一样。“新村”作为一种憧憬、规划和设计，具有抽象性和理想色彩，而“湖南共和国”作为一种实施方案，则显得明确、具体和实际多了；“新村”撇开了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企求创造一种超脱凡世的理想社会生活，具有空想性和不现实性，“湖南共和国”则紧扣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实际，企望通过政治改革创造一种“民治”的环境，进而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如果说，“新村”侧重于社会改造的话，那么，“湖南共和国”则侧重于政治改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缺乏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下，空喊“社会改造”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以政治变革为先导，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统治，社会改造才有可能得以进行。毛泽东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已经将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造划分为两个层次，前者是先导、措施，后者是方向、目的。如他在1920年6月30日易礼容来信的批语中写道：“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并希望从事自治运动的青年“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① 同年10月1日，在他参与起草的《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中，也表示湖南自治实现后，“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②

毛泽东能够将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从而扬弃了“新村主义”否定权威、漠视政治，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国家的理论空想，无疑是他早期国家思想的一个进步。但是，他所设计的政治改革蓝图——“湖南共和国”，仍然只是一个理想中的国家模式，存在着一些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其一，民权与官权的矛盾。毛泽东设计的“湖南共和国”在权力结构上，是由两个权力中心构成的。一方面，他表示承认以谭延闿为首的官僚政府在湖南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拥有“召集宪法会议之权”，是“湖南共和国”的象征；另一方面，他依据“主权在民”的原则，反复论证“湖南共和国”是民众的国家，是三千万湖南人的国家，人民有完全的立法权和选举权。这样，在同一个国家里，就有了两个权力中心。而这两个权力中心无论在社会利益或发展

①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01页。

目标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根本的冲突。一旦政治设计进入到运作阶段，两个权力中心必然各自东西，最初表现出来的相互依赖很快被相互对抗所代替。于是，理想中的“湖南共和国”迅速坍塌下来。

其二，自治与民治的矛盾。在正常情况下，自治和民治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民治是自治的基础，自治是民治的保证。但是，在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相对贫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自治和民治却不可能统一起来。由于缺乏民主政治和民主意识作为基础，所谓的“自治”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种状态下，企图通过“各省人民自决”，把中国划分成二十七个“国”，先邦后联的途径去实现人民民主，除了遭到旧有国家机器的无情碾压外，只会被封建军阀的割据与私争所利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放弃“湖南共和国”理想后，曾有过相当程度的认识。1923 年，他在揭露赵恒惕的“省立宪”时指出：“我们历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省割据；我们历来反对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夺利的保障。湖南最是个明证。”①

其三，国体与政体的矛盾。毛泽东设计的“湖南共和国”最终是要改变国体的。他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过程中，也反复强调“湖南共和国”是三千万湖南人的共和国，要求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湖南共和国”的建设是在承认以谭延闿为首的官僚政府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使国体的变更遇到了困难。于是，毛泽东就将变更国体的希望寄托在政体的某些改良上，企图通过实行联邦制和议会制，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想。然而，这种本末倒置的改革主张，正是马克思早就批评过的那种“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的支柱的革命”，其结果不可避免地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②

其四，民主政治与自然经济的矛盾。近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基本特征是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部分。因而，在政治上，摆脱资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与控制，谋求国家的独立，推翻封建主义的压迫和统治，争取人民的自由解放；在经济上，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以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和文明的国家，这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而毛泽东在设计“湖南共和国”方案时，着重注意的是湖南人口、地理等自然条件与旧

① 毛泽东：《“省宪经”与赵恒惕》《向导》第 36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197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11—12 页。

本、瑞士等国类似的特点，而没有深入考察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重视的只是中国政治结构上存在的严重弊病，却忽视了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和落后。他的思维重心全部倾注在对专制集权的上层建筑的批判上，对它赖以生存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则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湖南共和国”模式的致命局限在于，幻想在分散、落后和保守的自然经济的枯树上，嫁接上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枝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湖南共和国”模式的上述理论局限，随着湖南自治运动的深入，日益显露出来。1920年双十节和十月革命节的两次游行请愿，都遭到谭延闿、赵恒惕的镇压和破坏，没有能达到预期目的。事实教训了毛泽东，使他逐渐打消了对自治运动的幻想。他在1920年11月25日写给向警予的信中，不胜感慨地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① 16年后，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对自己当时的思想变化作了十分清晰的回顾：“我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②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一再碰壁的教训后，进一步认识到寄希望于谭延闿、赵恒惕之流搞“政治改良”，是“绝无希望的”；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治权力”，也就是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以后，才能实行真正的改革。恩格斯说得好：“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③ 从“湖南共和国”模式破产的痛苦教训中学习来的东西，正是推动毛泽东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树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最直接的因素。

---

①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形成

（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毛泽东所以能够实现由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抛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国家思想，进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有深厚的思想渊源的。首先，他坚持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这与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相通的；其次，他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其三，他坚持了依靠民众的大多数的观点，这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其四，他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这也推动着他不断地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提供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

据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早年在湖南求学期间，他就非常注意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开始时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后来接受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对托尔斯泰的学说也很感兴趣；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又对胡适和陈独秀“非常钦佩”，并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楷模。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①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他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1918 年 8 月—1919 年 4 月），就曾阅读过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在与李大钊的接触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初的了解。他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1919 年 12 月—1920 年 4 月），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过，他当时还没有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 年 3 月 14 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他表示“想从译本及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25 页。

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中，剌取精华，使之“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①]

毛泽东正式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在1920年下半年。这年5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正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多次提到李大钊、陈独秀在他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早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②]

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他在以主要精力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同时，先后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认真研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开始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他的世界观处在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前的矛盾状态。在理论上，他已被马克思主义所折服；但在情感上，他又不愿意马上放弃自己正在为之努力的建立“湖南共和国”的理想。因此，他当时在易礼容来信中批道：“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的根本改造决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从具体的改造做起。因此，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③]

毛泽东世界观的这种矛盾状态，以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而告结束。他通过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理解，从而最终放弃了对其他政治学说的追慕，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的确立。

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的会友，在蒙达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②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2—133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92页。

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方针。在讨论中，大家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产生了不同意见。蔡和森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用教育作工具，进行“温和的革命”。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萧子升、李维汉等也分别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及各自的意见。

毛泽东接到这些信件后，经过认真比较研究，于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先后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两封回信。同时，他在新民学会1921年1月召开的新年大会上，报告了开会的宗旨和学会工作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在其他场合，也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发表过一些意见。在上述活动中，毛泽东除了表示完全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外，着重阐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和方法问题。

第一，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指导问题。

毛泽东历来认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1919年9月，他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问题研究会章程。这个《章程》，虽然受到胡适《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影响，列举了一个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他也表示不同意胡适不要主义指导，孤立地研究一个个问题的主张，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要求人们“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① 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表示：要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②

毛泽东在自己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时，就在进步师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组织进步师生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文章，另一方面指导进步学生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20年冬，他和何叔衡等还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筹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

① 见《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3日。
②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97页。

义理论和俄国革命访历史的影响和指引。“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①

第二，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

如前所述，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毛泽东曾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对“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仍存在一丝幻想。1920年10月，英国学者罗素到长沙讲演。毛泽东受《大公报》委托，担任记录员，并将记录稿整理发表。罗素在讲演中，虽然赞成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以避免兴起战争，引起革命。毛泽东当时就认为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长沙群众的示威游行遭到赵恒惕的镇压，将毛泽东对于改良的一丝幻想最终打破。11月下旬，毛泽东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教训时，已经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主张“另辟道路，另造环境”。正是在这种心理状况下，当他收到蔡和森和萧子升等的信后，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12月1日的复信中，他明确表示赞同蔡和森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目的的主张；而对肖子升等“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意见，认为“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的世界，钱尽在资本家手中，主持教育的人尽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学校和报馆等教育机关又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总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而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是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止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有军队和警察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为资本家提供财货流通，有工厂为资本家制造垄断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他指出，从人们心理习惯和历史上考察，想通过教育的方法，使资本家信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的事。他认为：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欲望的扩张，只向扩张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然想做大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他还指出，革命者不但要有理想，尤其要认清现实。现实如果是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还要遭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而现实是无产者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的，因而产生了共产的要求。“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商，只是自然的结果。”

他明确表示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放弃，指出：“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所以我对于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①

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赞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其效果的。故是宜采用。”②

在1921年1月21日复信中，毛泽东又列举了不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强固的理由”。他指出：“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昧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③

应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在选编《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二集时，对易礼容的一封信写的按语中说：要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就必须“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④ 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更明确

①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47—150页。
②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
③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
④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92页。

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并告诉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① 而当时他和何叔衡正在组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

综合以上引述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1920年冬到1921年春，毛泽东的思想观念中已经建立起四个理论支点：其一，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活动，大家才"有所趋赴"；其二，只有用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手段才能推翻资本家阶级，夺得政权；其三，只有采取"阶级战争"、"劳农专政"的方式，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其四，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才能完成"根本改造之计划"。这些认识今天看起来还相当肤浅，但它却明白无误地标志着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转变。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毛泽东在复蔡和森的信中反复表示"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那么，蔡和森的信提出了哪些主张呢？以下作点附录，以供参考。

在1920年8月13日信中，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积极的阐发，对无政府主义作了中肯的批判。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同时，他还指出，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②

在9月16日信中，蔡和森比较了俄德革命的不同点，指出：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方法是阶级战争加阶级专政，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取消国家。他明确指出："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资本家利用

①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
②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30页。

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是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引者补）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他还针对一些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错误认识，指出：“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和国家一律取消。”“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惟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①

由上可见，蔡和森阐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对此表示“深切的赞同”，说明他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① 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54—162页。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萌芽

一、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就在毛泽东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时候，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加紧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受陈独秀、李汉俊等委托，毛泽东等在长沙开始建党活动。1921 年 7 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毛泽东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初步论证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劳工应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肃清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

毛泽东分析了争取湖南劳工会的可能性，多次找黄爱、庞人铨等谈心，热情赞扬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精神，同时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的工人运动方针进行了批评。1921 年 11 月 21 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专门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的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同时，对劳工会的改组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应明确劳工会的中心任务，在于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第二，严密工会组织；第三，培养成工人的组织观念。

黄爱、庞人铨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使整个劳工会变成指挥灵活、组织严密的坚强的工人革命团体。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过程中，十分注意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劳工群众在国家中的权利和地位。早在1921年4月，毛泽东为揭露赵恒惕假立宪真独裁的骗局，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强调真正代表民意的省宪法，必须注意保护劳工利益。他指出，省宪法最大的缺点有二：其一，“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他认为，人民不分男女，都应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在这三项权利中，第三项最重要，而省宪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其二，是“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他说，这样一来，将来事实上仍然是“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因此，他主张对省宪法作根本性改变，不仅应充分规定人民的权利，同时应明确规定惟有正当职业的人才能参加政治，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将来的政治成为一种职业政治”，而不是现在无正当职业之人当权的“游民政治”。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正当职业之权”，就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因为没有劳动权就失去了生存权。他当时将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和求得正当职业权（劳动权和生存权）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列为公民最起码的权利，说明他已经抓住了人权问题的根本。同时，他主张只有正当职业者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不给无正当职业者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表明他所追求的政治是“平民的政治”，他所憧憬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又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更注意的问题》一文，强烈要求政府必须给予劳工以应有的权利。他指出，所谓劳工，是指以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以此谋生的人，他们与那些依靠剥削为生的人有根本的区别。他说：“除开那些重利盘剥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劳工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理应享有正当的劳动权利，而湖南省宪法虽然打着“全民政治”的招牌，却丝毫没有劳工政治的影子，劳工的权利在宪法中没有得到肯定。他幽默风趣地说：“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三项权利：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全收权。所谓生存权，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获得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的权利；所谓劳动权，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有工作做，社会无事可做时，社会应本着罪不在工

人的理由而给他们平常的工资；所谓全收权，是指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的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扣外，应完全归工人。

毛泽东突出地将劳工的生存权、劳动权和全收权提了出来，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劳动人民的共同呼声，同时也是对赵恒惕等反动军阀无视劳工权利行为的反抗。他以湖南省宪法为靶子，揭露“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他警告那些劳工群众的死对头，“‘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家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一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毛泽东争取劳工权利的观点，与中共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倡导的劳动立法运动中所申明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922年8月26日，邓中夏等向北京参众两院提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毛泽东代表湖南分部参加联署。《请愿书》以欧美和苏俄解决劳工问题的经验教训为例，强调了劳工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最近如苏维埃俄罗斯，更完全由劳动者建设劳农政府，掌握政权，国内宪法悉由劳动者手定，即此可知一国劳动者立于建国上的重要地位，此乃世界自然进化公例，无容置疑者也。”① 为此，毛泽东积极配合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劳动立法运动。9月6日，他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会、长沙理发协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成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界工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工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等四项基本权利。通电提醒议员们：若劳动立法案被否决，则君等“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权威，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②

主要由共产党人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是一个切实保障广大劳工根本利益的行动纲领，其核心内容是争取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和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尽管它没有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采纳，但“劳工神圣”、“劳工解放”的呼声，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

①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② 《劳动各团体致两院电》，1922年9月10日湖南《大公报》。

（二）将工人组织起来，推翻旧国家。

劳动立法运动的开展，要求工人尽快地组织起来。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斗争目标。1921 年冬，毛泽东先后两次到安源，深入矿井，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启发工人觉悟，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搬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① 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1922 年 11 月 5 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干事会总干事。到 1923 年下半年，湖南产业、行业工会达 30 多个，有组织的工人共 7 万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去争取工人团体的合法地位和工人群众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关于工人的政治态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办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②

1923 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但是，湖南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仍然持续了一个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工会组织在继续扩大，工人的罢工斗争次数增多，而且还表现在工人运动开始与反帝反封建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把争取生活的改善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推翻反动政权的斗争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这对于毛泽东后来形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农民政权的思想

（一）革命必须依靠农民。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他投身革命之初虽然用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但对农民运动仍然给予了高度关注。据张国焘回忆，在中共“三大”上，特别注重农民运动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

① 《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5 页。
② 以上引文见《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湖南《大公报》1922 年 12 月 15 至 17 日。

重要的。他还证以历代的革命和造反，每次都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广东这类局面。毛泽东的发言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农民。张国焘认为，上述见解“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①

由于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因而大会委托他和谭平山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不过，毛泽东在此之前并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因而对农民问题缺乏具体的了解，所以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显得较为抽象空洞和不切实际。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和不久发生的“五卅”运动，是中共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同盟军地位的转折点。中共四大在阐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同时，强调农民“是中国革命中主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益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② “五卅”运动中，上海工人的斗争因来得到农民的支持而陷入孤军奋战，广东的工人罢工因得到农民的支持而长期坚持下来的鲜明对比，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农民地位的重要和工农联盟的意义。张太雷、邓中夏等纷纷发表意见，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如果不与农民同盟军紧密结合，要达到“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方面，开始了他领导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漫长而又艰苦的生涯。1924年冬，他回到家乡——韶山领导农民运动。后经长沙、衡阳、宜章等地“问道入粤”，到达广州后继续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毛泽东被推选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月，又被聘任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主讲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并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和建立农民政权的重要意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适应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11月，毛泽东从广州到达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制定了《目前农民运动计划》，视察了江浙一带的农民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6、29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③ 见《劳动运动复兴时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运动。12月，抵达武汉，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次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2月16日，给中共中央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3月，又专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详细地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热情赞扬了湖南农民的革命行动，批评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随后，他又在武昌都府堤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各地培养了一批开展农民运动的人才。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毛泽东被推为组织部长，实际负责全国农协的日常工作。4—5月间，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上，就农民土地问题和农民政权问题作过多次发言，又阐述了一些重要思想。

由上可见，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他在发展各地农会组织，培训农民运动干部，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着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建立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

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何组织农民进行乡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党的许多实际活动家，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创造农民协会组织形式，吸引和团结贫苦农民进行斗争。1925年1月，中共四大肯定了在农民运动实践中创造的农民协会这种乡村革命统一战线的形式，并且强调在农会中要“特别保障贫农、雇农的特殊利益。”[①] 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告农民书》，根据各地农民组织农会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广东的经验，对农会的性质、任务、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都作了详细规定。1926年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对农协的性质、地位、作用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表明党已经认识到农民协会既不同于原始的、落后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秘密团体，也有别于被地主豪绅控制的农村旧式农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斗争实践中创造的农村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并为农民谋利益的政治机关。

对于农民运动中的这一伟大创造，毛泽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他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对于农民协会这种组织形式作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比较完整

① 《对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 (1921—1925)，第296页。

的关于农民协会的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

首先，他充分肯定了农民协会的伟大历史功勋。他指出，农民协会将农民组织起来，“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这场农村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针对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的攻击，他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指出这些事情是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倒乡村的封建势力。而打倒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精得很’。”因而，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国民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其次，他指出了农民协会是革命时期乡村的过渡性政权组织。他认为，农民协会不仅是乡村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应成为革命时期乡村的过渡性政权组织。他以十分赞赏的笔调写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亡。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一项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可见，农民协会已经取代豪绅地主阶级的政权，成为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组织中心和决策中心。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革命时期，把农民协会变成新的政权形式，乃是革命的必须。因为反革命政权倒台之后，

革命政权还不能很快地组织起来，农会便起了过渡政权的作用。他认为，农会这种过渡性政权形式非常重要，如果它能强有力地发挥作用，就有利于完成乡村自治，使“农村中的武装、民食、教育、建设、仲裁等问题也才有最后的着落。”①

其三，他强调了必须树立农民协会的绝对权威。他指出，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在农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造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样强烈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大、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另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因此，在革命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质言之，每个乡村都必须造成一个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是革命的定律。

其四，他强调了贫农必须掌握农会的领导权。毛泽东指出，农民协会是乡村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为了扩大革命力量，必须把雇农、贫农、中农、农村知识分子，乃至富农都组织进农会。但是，农民中的各阶层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对子农会，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而“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毛泽东认为，“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对于贫农领袖中的不良分子，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下进行，决不能有意损害贫农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

① 《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会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气势。

毛泽东关于农民协会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积极成果的理论总结。农民协会作为农村革命政权的雏形，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形式的萌芽。

(三) 农民政权的性质和任务。

毛泽东对政权问题历来十分重视。早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就已认识到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923年4月10日，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中指出，军阀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推翻军阀政权，就必须改造其经济基础。1925年底，针对直奉战争军阀混战的情况，他明确提出了“人民夺取政权”的口号。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他比较深入地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的若干重要思想和原则。

(1) 关于中国政治和农村权力结构的特点。

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体分析了中国政治的特点。他指出：中国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方法有二：一是家法，二是王法。家法是地主阶级的家族政治制度。家族政治组织是祠堂。它是缩小了的国家形式，其组织如同一个国家，是地主用王法及其家法统治农民的一种机关。祠堂除族长外，设有刑长、传长。族长由地主豪绅垄断，对农民动辄以破坏家规处以酷刑。平时家法很严，农民有事，很少见县知事，祠堂就解决了。若绅士们有事，才可以见知事诉讼。团防总局、联团局是军阀压榨人民的机关，县议会则为地主阶级所掌握。每县的政权机关由知事公署和县议会组合而成。它是土豪劣绅的巢穴，多由他们把持一切。省与县不同的地方在于各省城都有一些新式的工业，反动军阀的实力，十分之六七建筑在地主阶级身上，而十分之三四建筑在买办阶级身上。因此，中国政权的结构形式，由祠堂到县政府，由县政府到省政府，由省政府到军阀政府，而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权都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基本特点。①

1927年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又对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的特点作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包括政权、族权、神权、夫

① 《农民问题第五篇：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毛泽东讲，冯文江笔录，1926年。

权在内的权力体系。他说：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神仙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而在这四者中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主干。地主权力既被打倒，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动摇起来，“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①

（2）关于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必要性。

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已认识到农民运动兴起后，必然要遭到地主政权的压制，于是就提出了推翻地主政权的任务。他指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②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进而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地主权力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屏障，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首先必须推翻他们的政治机器，代之以农民阶级的政权。对于农民在农村建立的农会组织，毛泽东认为这是农民运动的第一件大事，“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只有把地主的权力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其他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认为，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因此，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为了建立农民武装，他在广州主持第六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明确规定学员在5、6、7三个月内，共进行10周的正规训练，“学成之后，能为农民武装自卫之领导。”③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具体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途径：一方面，直接从地主手里夺取武装，并将其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② 《农民问题第五篇：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毛泽东讲，冯文江笔录，1926年。
③ 《中国农民》月刊第9期，1926年至11月。

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另一方面，建立农会的梭标队，使之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他建议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武装力量，普及于各县之中，使每个农民都有一柄梭标。

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民常备武装力量，并将其从属于农民政权的主张，已经突破了原来建立农民武装仅仅为了自卫的原则，而把建立农民武装与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农村权力转移联系了起来，从而为他后来明确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3) 关于建立农民政权的具体形式和办法。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斗争进入了夺取政权的时期。1926 年 12 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指导草拟的《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提出了摧毁农村地主政权，从乡民会议产生乡村自治机关的民选政权的具体办法。

《决议案》指出，乡村旧有的三级（都、团、牌甲）自治机关，都是封建性质的东西，早已变成地主阶级勾结军阀鱼肉乡民的工具。各级自治组织中，尤以接近县这一级被地主阶级牢牢把持，他们利用团防，压迫良孺，滥杀无辜，侵吞公款，勒索捐税。其下级组织也多为其爪牙所控制。农民视这种机关为“头张衙门”或“铁门坎”。这种乡村自治机关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最后基础，只有推翻这个基础，国民革命才算得相当的成功。

《决议案》强调，农民在推翻乡村旧的自治机关之后，为了保证民主运动的胜利，必须发展革命的民权，建立民主的自治机关。这种民主的自治政权是乡村旧有地主政权的对立物，它只“属于乡村一般民众，封建余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当然不允许其参与”。实现这种民主自治的方式，是召开乡民会议，建立新的乡村自治机关。乡民会议是乡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任务是集合乡村各种民众势力，树立民主革命的真实基础，实现乡民的要求，发展农村经济。乡村自治机关由乡民会议产生，采取委员制，在自治委员会下，设立各种事业的委员会，以管理民食、财政、教育、农事、交通、水利、森林、自卫、救济、公所等各项具体事业。

1927 年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期间，通过对县政权的深入考察，得出了“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的结论。他指出：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而当时南方各县的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在农民势力极

盛的县，农民协会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县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和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他以湖南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为例，具体介绍了第一类县政府的决策情况。在这一类的县，凡事取决于县长与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席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称之为“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称之为“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的代表等。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从。因此，毛泽东认为，湖南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实行民主的委员制的县自治政府的组织条件。他及时提出，当前最要紧的是由第二期农会的临时政权形式，过渡到正式的农民政权形式——乡村自治机关的管理之下。

1927年4月19日，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讨论农民政权问题时，邓演达提出：农民政权宜从下层着眼，消灭封建势力，建设乡村自治机关；而建设乡村自治机关，须有农民武力以保障，解决农民武装问题。毛泽东表示赞成邓演达的意见，并对邓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指出，农民政权问题，主要是组织形式问题。一般说来，农村政权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在农村革命的时候，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革命过后，乡村政府应在国民政府的系统之下，实行区乡村自治。这就需要各省中有几个中心的县份做榜样。现在湖南已经颁布过区乡自治条例，湖北亦可开始。这些条例最重要的是必须规定某些人不能加入自治机关之内，以保证乡村政权掌握在真正的农民手中。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权，我们应给予积极领导，“现在我们需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为此，他建议“国民政府农政部应即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事项。”①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主张，对于乡村政权建设乃至整个革命政权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明确规定了新建立的乡村政权的性质是乡村一般民众的民主政权，这种政权“只属于一般民众”，而不许“封建余孽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参与；而且还规定了这种新政权的组织式即乡民代表会议制度，以乡民

① 《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4月19日。

会议为其权力机关，由乡民会议产生它的执行机关——乡村自治委员会。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政权，为以后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诚然，乡村自治能否达到，这也是个问题。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缺乏实行自治的传统和习惯。但是，毛泽东提出建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主张，也并非主观的臆想，而是根据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因为农民革命初起时建立的农民协会虽然起过临时革命政权的作用，但其本身并非政权组织形式。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正式的政权来代替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乡村自治逐级建立正式的革命政权，不失为当时可行的一种方式。

(4) 关于农民政权的基本任务。

农民政权是乡村中一般民众的民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倒地主的权力，建立农民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为农民争得经济利益，建设农村民主新秩序。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具体提出了农民政权担负的三个方面的基本任务。

第一，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一切反革命实行革命专政。

毛泽东指出，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后，第一个行动，就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的权力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为此，农民通过实行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等方式，分别对地主豪绅实行专政，在农村造成一个短期的恐怖现象。对此，有人认为农民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现象既是地主自己造出来的，也是农民运动第二期（革命时期）非常之需要的。不如此，就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就不能打倒地主的权力，也就不能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那种所谓农民举动“过分”的观点，就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

第二，领导农民开展经济斗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铲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农民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一旦地主政权被推翻，发展经济的任务就提了出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曾指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唯土地”。他认为，农民的土地问题应分两个步骤解决，第一步是减租减息，第二步是解决土地问题。目前应先进行第一步，待解决农民政权问题后，

再进行第二步。随着各地农民协会向乡村自治政权过渡，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中规定，乡民会议的使命“在集合乡村各种民众势力，树立民主革命的真实基础，实现乡民之要求，发展农村之经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又提出了“经济上打击地主”的任务，指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1927年4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上，具体列举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六点意义：（1）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农民；（2）增强农业的生产力；（3）保护革命；（4）废除封建制度；（5）发展中国工业；（6）提高文化。他强调，目前革命形势虽见发展，但仍存在着危机，如无农民生力军，革命必归于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解决了土地问题，既可解决财政问题，也可提高士兵的积极性。这样，毛泽东就从消灭封建压迫和剥削，解放社会生产力，保护革命以及解决财政问题的高度，论证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摧毁农村封建旧秩序，建设农村民主新秩序。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于是，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议论闹得满城风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用大量的事实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攻击，肯定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摧毁封建旧秩序，建设民主新秩序的历史功绩。

为答复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第二件，政治上打击地主；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第四件，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即打倒旧式的部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第六件，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第七件，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第九件，禁牌、禁赌、禁鸦片等诸禁；第十件，清匪；第十一件，废苛捐；第十二件，文化运动；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他指出，农民所做的这14件大事，既是农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创造，也是农民政权摧毁农村封建旧秩序，建设农村民主新秩序的具体工作，实在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

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一切革命者必须坚决地反对。

毛泽东关于农民政权的思想，虽然还不很完备，但基本上是在农民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特别是他已经将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农民土地问题三者结合起来思考，这为他后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理论理下了伏笔，并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萌芽作了直接的准备。

三、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基础的最初奠定

(一)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是国家构成的细胞。要认识国家的性质，首先必须认识国家中的各阶级。1925年底和1926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①] 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科学分析，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思想。

第一，分析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和最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第二，分析了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

毛泽东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二是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夹

① 《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一文，最早发表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后经过修改，又发表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期和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合刊上。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作过修改。现根据《毛泽东选集》上修改后的内容引述。《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发表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1期上。

缝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有联系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当他们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他们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是企图实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

对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作了细致的分析。他把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小商人都归为这个阶级，并根据各自的经济状况，分为“有余钱剩米的”、“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人数较少，是小资产阶级右翼，对革命取怀疑态度；第二部分人数多，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是中派，对革命取中立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第三部分人数也不少，是小资产阶级左翼，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比较重要。小资产阶级各部分在平时对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在革命高潮时，其左翼、中派都会参加革命，右翼也会附和革命。

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毛泽东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而是根据其经济状况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其中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雇农属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属于半无产阶级。毛泽东强调，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这部分人地位低下，受地主压迫较重，极易接受革命宣传，是革命的主力之一。

第三，分析了无产阶级，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代表了中国新的生产力，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人数集中，经济地位低下，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压迫深重等特点，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四年来的多次大罢工已经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上述分析，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根据调查得来的材料，对农民的不同阶层又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情况不同，对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在革命刚刚兴起时，态度消极，在革命高潮形势下，才慢慢进入农会，但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很积极，农会应向他们多做工作，争取中农入会；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70%以上，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这样，就进一步弥补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不够全面的缺憾。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科学分析，其直接目的是要辨明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进而为革命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提供依据。然而，这种科学分析的结果，不仅仅是辨明了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明确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实际上也确定了各阶级在将来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构架了新国家的国体模式。因此，这种科学分析，应该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思想，正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

(二)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的最初论证。

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上写道：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①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明确指出：

“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会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总第5期。

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192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又一次具体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论证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他写道：

“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大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因为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许多人到现在还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种阶级利己主义，必然“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因此，“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①

① 《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上述所引的文献极其重要，在这些文献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设“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观点的两个层次；由于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企图是行不通的，所以只能建设“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反过来说，中国民主革命之所以必须建设“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必须建设“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呢?

首先，这是由中国民主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现在世界是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革命阵营以第三国际为代表，高举着“赤色的革命大旗”，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集合于旗帜下”；反革命阵营以国际联盟为代表，高举着“白色的反革命大旗”，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于集合于旗帜之下”。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就与18世纪欧美和19世纪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本世纪初中国的辛亥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前代欧美和日本的革命及中国的辛亥革命，乃是“资产阶级--阶级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当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由于受到世界两大阵营的裹胁和影响，只能有两个结果：要么集合于以第三国际为代表的“赤色的革命大旗”之下，走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路；要么集合于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白色的反革命大旗”之下，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向左跑人革命派，或者向右跑人反革命派，没有他“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个幻想。”

其次，这是由中国国内阶级状况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有过系统的论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既需要革命又惧怕革命，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小资产阶级各部分对待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在革命高潮时，都能参加革命或附和革命；农民阶级人数最多，他们受地主压迫较重，极易接受革命宣传，是革命的主力之一；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革命，“乃

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

其三，这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决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既参加革命又怀疑革命的阶级。他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财”，“准备做到新的压迫阶级”。这种阶级利己主义，使他们既疑忌国内工农阶级的兴起，又疑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种阶级利己主义，还使他们看不清世界大势，“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为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这就使他们既脱离了时代要求，违背了历史规律，又“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因此，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毛泽东初步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思想：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同于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适合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中处于领导地位，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左翼，是这个国家的依靠力量，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是这个国家的专政对象；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争取中国社会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里已经初步显露出后来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萌芽。

遗憾的是，上述所列文献中没有谈到有关政体问题。这当然不是主观上有意疏忽这个问题，而是实践上尚未提出这种要求。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初步构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集中群众智慧，吸收党内许多领导人积极探索的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由毛泽东作出理论提炼而独创的。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际，通过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正确分析，从而用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标志着毛泽东本人对国家问题的认识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了由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到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最初构想，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既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又不同于俄国苏维埃国家的新的建国方案。这个方案虽然还很粗糙，还不很完善，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希望，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一出现，就成为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

第三章

苏维埃共和国的理论和实践

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上山”的主张。

如前所述，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政权问题。革命一次又一次失败，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严酷历史事实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权问题与武装问题紧密相联，不建立革命的武装，不摧毁旧的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已经建立的革命政权也是不可能维持的。正如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革命的民众政权只有在用武装力量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才有可能建立和巩固下来。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深入分析和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毛泽东、邓演达等在1927年4、5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上，已经开始将农民的土地问题与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结合起来，提出建立农民政权必须有武力的保障、解决农民武装问题的主张。会议决定由中央组织农民武装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分配武器于农民，并建议将汉阳兵工厂50%的产品拨给农民。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阻挠，这些主张和决定未能实现。

“马日事变”后，革命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蔡和森等力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团结邓演达等到国民党左派，敦促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和工农武装；另一方面，号召各省农协严密农会组织，迅速动员工农武装，反击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队的武装袭击。蔡和森向中共中央具体提出了夺取湖南、建立两湖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旅社召集驻汉的湖南同志会，要求大家“回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

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①

6月下旬，毛泽东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为此，必须重建全省总工会、全省农民协会；恢复各地党组织，健全领导力量；洗刷动摇变质分子；在工农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要设法保存武装，具体办法是："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② 随后，毛泽东对工农武装作了安排，有的"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有的退到边界做"山大王"；有的组织"工农义勇队"；有的仍保持"挨户团"名称，待起义时再打出自己的旗帜……。

7月4日，毛泽东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湖南局势和农民武装的对策问题。与会者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省农协的策略：1. 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 此外尚有两路线：a. 上山，b. 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给养可以卖枪。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就上述发言来看，与会者虽然都主张保存农民武装，但在如何保存农民武装问题上则意见不一。③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悍然宣布"分共"，国民革命惨遭失败。7月底，毛泽东起草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湖南运动的大纲》（即《湖南暴动大纲》），表述了如下意见：

"湖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1）使唐在湖南本来不稳定的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为全省农民暴动之先锋队，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

这个大纲体现了毛泽东以军事暴动为主，在湖南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基本思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已露端倪。

---

① 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见《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第5集，第104—112页。
③ 参见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记录。

8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揭露了陈独秀放弃领导权，致使国民革命惨遭失败的严重错误，阐明了革命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共领导，由工农大众作主人的道理。在谈到武装斗争问题时，他指出：

“对于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这一思想，是毛泽东从国民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它将政权问题和武装问题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问题，用中国化的语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

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出席“八七会议”新选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有人看轻湘省暴动，提出由湘南工农武装编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赴粤。毛泽东对此表示反对，指出：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即《湖南暴动大纲》——引者注），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②

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回答：“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决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③

这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湖南特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即返回湖南，着手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18日，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研究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页。
② 见《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记录》，1927年8月9日。
③ 何长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伟大实践》。

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①

会议讨论起义区域问题时，争论十分激烈。大多数人主张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在全省4个区域同时暴动，即：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对于这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全面铺开，分散使用力量的意见，毛泽东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起义首先不应该在长沙，而应该在农村。因为长沙敌人力量强，如果首先在长沙起义，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因此，应该首先在反动统治较薄弱、经过大革命洗礼、群众基础好的保存有革命武装的农村发动。经过充分的讨论，绝大多数的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8月30日常委会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安源等地组织武装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在攻打长沙途中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果断地放弃了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提出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的主张。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不要长沙，而是现在不能要。因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敌人对农村的控制薄弱，有利于我们找个落脚点，深入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反对意见，毛泽东指出：历史上从没有消灭过"山大王"，如果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它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起义部队转兵罗霄山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毛泽东早已提出的"上山"主张开始付诸实践。

毛泽东"上山"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却遭到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责难。9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认为"湖南失败是临阵脱逃"，"鄂南农民必须设法夺得城市才有办法"。瞿秋白也认为：现在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在平湖崇通之间我们显然有一部分力量，因此力

①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量或可有进攻长沙的可能，故不宜只做游击队的工作。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负有严重的责任，因此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毛泽东“上山”的主张，虽然遭到临时中央的责难，但它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在毛泽东国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毛泽东前期思想中，国家与政权是同义的，因而他对政权问题历来十分重视，并多次论述过建立民众政权的意义。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革命的民众政权怎样才能建立起来呢？国民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给中国共产党人上了生动的一课，推动着他们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至此，中共党内对要不要枪杆子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就连最保守的陈独秀也一再说，我们要使农民武装化。此后，中共党内争论的焦点已由要不要枪杆子转化为如何拿起枪杆子，拿起枪杆子问题了。陈独秀力主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当兵”，待适当时机举行哗变；张国焘主张脱离共产党，上山抢富济贫；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主张攻打大城市；毛泽东则主张党领导下的武装上山。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顾当时的情况说：“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一军遭到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看，这个运动好象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①

当然，也不能认为毛泽东“上山”的主张提出时就具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毛泽东“上山”的主张也是被逼出来的，是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三期二大队讲话时曾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的山，并且来了游击战。”5月4日，他在扩大·大队成立大会上又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2页。

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8月2日，他在对抗大四期一、二队毕业同学讲话时再次指出；“被逼上井冈山，为什么能够在山上？就是有枪杆子。它打出游击队，从小到大，打出红军，打出政权。”① 后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一再申明：“我毛泽东不是一上井冈山就有现在这个水平的，我是摸索试验前进的，我们的经验是打出来的”。②

尽管如此，“上山”的主张和行动，毕竟将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要不要武装斗争的问题的话，那么，“上山”的主张则进一步解决了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比前一个问题的解决更有意义。因为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过深刻的论述，同时还有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里，如何开展武装斗争，这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毛泽东提出的“上山”主张，初步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如何建立革命政权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课题，从而使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有了具体的实现途径。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上山”的主张，就不会有“上山”的行动；如果没有“上山”的行动，就不会产生“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既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上山”主张的历史地位。

(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委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湘赣边界两省国民党各派军队混战的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湖南农军也陆续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

正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割据局面”、“创立革命区域”、实行“农民割据”和“工农割据”等主张的基础上，先后写下《中共红四

① 以上引文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80页。
②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军军委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8 年 5 月 2 日）、《关于红军情况的报告》（6 月 11 日）、《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①]（10 月 5 日）、《井冈山的斗争》（11 月 25 日）等报告和决议，比较系统地论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首先，分析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其二，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没有打下之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又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6 至 1927 年的革命，由于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权，遭到了失败。但是，导致革命发生的原因仍然存在，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新的革命形势迟早会到来。他强调指出；“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 毛泽东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才具备上述条件，因而在中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完全行得通的。

其次，阐明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具体形式。毛泽东在总结湘赣边界割据局面不断发展的经验时指出：“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

① 即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为该决议案的一部分。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7 页。

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①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阐明了三者各自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只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② 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农村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基地，不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入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就无法保持。而农村根据地建设最基本的是政权建设，只有建立起工农当家作主的政权，农村根据地才能巩固下来。这样，毛泽东就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而且全面地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的三者密切结合。

再次，强调了实行“工农武装出据”必须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由于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又由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地区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因此，割据地区对四围的敌人必须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毛泽东指出：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时期和破裂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应采取不同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侍而不恐。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苏区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而策略上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他批评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中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等错误意见，指出：“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湖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失败的根本原因。”①

最后，揭示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②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使地方工作人员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③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信中；他再次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④

1929年4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前委起草的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通过四围割据争取江西的计划。其部署是：在赣东北、赣西、赣南、赣东的革命势力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下”，“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进而争取整个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时间为一年。⑤ 9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争取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作出规划，其中对党、政权及群众发展的方式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建立中心工作区域，“以为全闽西向前发展的根据地”；二是消除赤色区域之间的空隙地带，使之“互相连属”；三是“依傍着已有工作的地方如波浪一样的向前发展，不是不相关连的冒进。”⑥ 以上两个文件具体规划了在一个地区和一个省的范围内如何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两个文件所提出的必须注意建立巩固的中心区域以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根据地的发展必须依傍着已有区域逐步推进，必须逐渐把各个相邻的割据区域连接起来等原则，以及对割据区域斗争内容的规定，都是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72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2页。

际斗争经验的总结，充实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至于把争取江西的时间规定为一年，则是过分估计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

毛泽东阐述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本质上看，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削弱乃至动摇反动统治，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夺取全国政权的有效形式。

这一形式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斗争形式根本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虽然都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但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要么是走州过府的流动游击，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要么是安营扎寨，却没有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终都归于失败。“工农武装割据”，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并且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了起来，因而能够坚持长久的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一形式与中国共产党以前的斗争形式也不一样。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及其相互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在反动派的叛变面前束手无策。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认识大大加深，但对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仍然认识不清。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仅充分论证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将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从而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斗争形式，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形式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形式也有区别。俄国十月革命采取的是“工农暴动夺取政权”，即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直接取得全国政权的斗争形式，而没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式，这是由俄国国情决定的。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不可能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而必须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斗争形式。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解决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式问题，用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

(三)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但就当时毛泽东的认识水平而言，他也还没有确立

以农村工作为中心即“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这样讲并不是要贬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作用，而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夺权道路是何其艰难。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诚然是正确的，但中外历史上找不到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而当时农村根据地的处境困难，显示不出其优于城市斗争的特点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能否锻炼成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尚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系统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需要有一个过程。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城市里搞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以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城，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以乡村为中心。”①

是农村革命斗争的实践推动着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发展。土地革命兴起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根据地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虽然不断提高，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全党的指导思想仍然受着“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即把开展城市工人斗争，准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作为工作的重心，视城市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农村斗争为辅助形式。直至1929年以后，随着农村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并且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旋起旋落、朝不保夕的困难境地。实践证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从“城市中心”转到“乡村中心”的轨道上来。

周恩来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1929年3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人土地革命”。“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② 9月，他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更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③这两封信说明周恩来对开展农村斗争与占领中心城市、发展农村红军与建立城市政权的关系，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他当时尚未突破城市中心的局限，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18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七卷，第32页。

强调农村斗争应“与城市工作配合起来，得到城市的领导”，认为农村红军只是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①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代表人物之一。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沉浸在“城市中心论”的旧模式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对两年多农村斗争经验的总结，初步明确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1929年4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通过四方割据争取江西的计划，已经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的雏形。1930年1月5日，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具体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特殊道路。

他阐明了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否定了照搬外国经验的错误观念。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由于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的国情认识清楚，因而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不愿意做建立农村政权的艰苦工作，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他明确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里，他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照搬外国经验，重视城市武装起义，轻视农村斗争的错误观念。

他分析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强调了农村斗争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说：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他批评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了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特别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他总结了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明了坚持农村根据地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33页。

斗争的意义。他指出，那种“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才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建立小块农村红色政权提到了将来夺取全国政权的必由之路和必然结果的战略高度，否定了“城市中心论”仅仅将农村斗争作为配合城市斗争的辅助力量的观点，初步确立了以农村斗争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虽然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当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尚缺乏充分的估量。特别是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并未立即被中共中央所接受。1931 年到 1934 年间，中国革命虽然实际上已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总结。直至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才有可能继续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括。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通过总结中外革命战争的经验，特别是北伐战争和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1. 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2. 敌人的强大；3. 红军的弱小；4. 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他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大，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我国北伐战争有许多不同。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以及不同于苏联内战、北伐战争的特殊规律。这就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在充分肯定“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原则的正确性的同时，强调了由于各国社会条件不同，各国无产阶级在执行这个原则时必须有所区别。他指出：由于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①] 这相反的道路就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乡村包围城市。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胁，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②]

经过上述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毛泽东已经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起三个理论支点：第一，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第二，由于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乡村是反革命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乡村，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为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第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深入农村，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才能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才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的特殊规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这一理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上山”的主张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的发展和升华，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夺权道路，成为毛泽东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局部苏维埃政权到苏维埃共和国

（一）率先举起“苏维埃”的旗帜。

“苏维埃”是俄文 COBET 的音译，原意为会议、代表会议、委员会，多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因此，她直接来自苏联。关于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组织和实行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所论及。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报告》中指出：“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落后国家或殖民地的共产党“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列宁并且预见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对于殖民地国家如何实现苏维埃，列宁除了阐明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之外，没有规定具体的模式和框架。相反，他强调指出：“这不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①

事隔 7 年，在中国国民革命失败前后，列宁上述指示的精神被纳人斯大林关子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之中。斯大林在 1927 年 4 月 21 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宣传提纲、7 月 28 日写的《时事问题简评》以及 8 月 9 日发表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的演说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论”。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人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革命的主要锋芒是国内的封建势力，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35—336 页，

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七·一五政变后，汪精卫集团转入反革命营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了。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的论述，与中国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实际有较大的差距。当时，中国革命形势非但没有出现组织苏维埃所需要的革命高潮，相反是处于明显的低潮；加上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仍然没有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幻想着组织“左派国民党运动”；以及托洛茨基反对派正在利用组织苏维埃来攻击斯大林继续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所以，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没有马上提出组织苏堆埃的问题。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案》和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都批评了试图建立苏维埃的作法，认为“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① 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中，虽然指出：“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但同时又指出：“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②

对子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善良愿望，国民党反动派却用不断的反革命政变作了回答，迫使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策略。8月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通过的关子国际形势的决议中说：“当前时期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在其遭到严重失败的同时，发生了各派力量的激烈改组，在各派力量的改组过程中，工农和城市贫民结成反对一切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同盟。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转人了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即直接为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既然共产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将该党转变为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并使其实现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势将走向高涨，那就必须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为直接斗争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和手工业者苏维埃。”③ 这就是说，在8月上旬，联共（布）中央已经放弃争取国民党左派的策略，而决定在中国实行建立苏维埃的计划了。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22—323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345页。

然而，中共中央的策略向苏维埃阶段的转变则比联共（布）中央要晚一个多月。8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在肯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的同时，仍然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①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放弃国民党旗帜，打出苏维埃旗帜的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在吾党是很久的问题。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直到现在，才改变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8月18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改组后的中央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指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到7月15日，汪精卫等假革命派的叛变，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被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夺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到张作霖都可以拿了这块招牌来作他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因此，湖南对此次暴动，是主张用C、P名义来号召，国民党不过姑C、P的后面摇旗呐喊，将来听其自消。”② 8月20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更明确指出：“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从前总认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的极大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首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立，必须迅速的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以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在红旗领导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89—290页。
② 1927年10月8月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

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①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就没有再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而是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鲜艳红旗。秋收暴动之日，毛泽东还赋诗予以纪念："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虽然有过高之嫌，如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1917年等，但他提出的放弃国民党旗帜打出苏维埃旗帜的主张，则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中共中央的认识却落后于实际，尚未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三阶段论"的模式中走出来。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复湖南省委函中，批评了毛泽东放弃国民党旗帜，立即组织苏维埃的建议，指出："政权形式，已在政治决议案中说明，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②

直至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根据国民党的旗帜在群众中已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的形势，才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取消8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实行暴动的条款。同时，对苏维埃问题作了新的规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涨中应成立苏维埃。"③ 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明确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④ 至此，中共中央就将苏维埃作为新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了下来。此后的近10年中，中国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一直在苏维埃旗帜下进行。

(二) 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理论。

苏维埃旗帜的公开打出，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推动了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分配田地浮财，建立各级工农兵民主政权。11月，湘赣边界第一个革命的县政权——茶陵

① 《湖南给中央函》，1927年《中央通讯》第3期。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12—313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4页。

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建立。1928年初，遂川、宁冈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工农兵民主政府。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大会提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与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等项任务，选出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随后，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这样，湘赣边界就在中国大地上最早形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创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而割据一方的局面。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创造了一个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立，又与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有所区别的新的政权模式，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农村环境里进行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当时中共中央的许多领导人仍然醉心于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经验，不认识或不承认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在红军和根据地内也有一些人，面对强敌的不断“会剿”，根据地时得时失，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他们不愿意做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工作，主张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就成为全党和根据地军民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为此，1928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该决议案的一部分）中，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全面地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经验，具体分析了中国苏维埃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由于中国基本的经济形态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的广大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农村却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这就是在农村建立并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又由于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深了中国各派军阀势力的矛盾，形成了

他们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不仅削弱了其本身的统治力量，而且给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只要“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苏维埃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革命力量大有回旋的余地，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正因为如此，小块的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就能够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坚持和发展起来。

第二，国民革命政治影响的存在，这是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苏维埃政权首先发生并能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国民革命时期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地区的工农大众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苏维埃政权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这是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个客观条件。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帝国主义之间和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的加剧而日益发展着。因此，不但小块苏维埃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苏维埃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苏维埃区域如果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就难以对付近代装备的反革命常备军的进攻，而有了坚强有力的正式红军，便能够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武装割据的局面，从而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苏维埃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要紧的主观条件。苏维埃政权是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组织是否有力，政策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而就当时湘赣边界的情况来看，共产党不仅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组织，而且制定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因此，小块苏维埃政权不仅能够存在和发展，而且将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关于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的分析，其主要依据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他通过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入分析，得出了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可以首先建立小块苏维埃政权，并运用这小块苏维埃政权去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而取得全国政权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

平衡规律的分析，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一样，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都是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革命实践，经过大胆的创新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就当时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而言，阐明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① 毛泽东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既划清了同那种怀疑苏维埃政权能否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的界限，又划清了与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暴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界限，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发展。

论证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诚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苏维埃政权要长期存在和发展，还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毛泽东从苏维埃政权建设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问题。他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和1929年12月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在总结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一些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

其一，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指出，在苏维埃区域，由于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布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而在苏维埃政府中，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委员会也很少开会，通事由常委决定，区乡两级政府甚至由主席、秘书等个人决定。所有这些，都说明苏维埃政府工作中缺乏“民主集中主义”。因此，他特别强调：“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②

其二，必须健全工农兵代表会制度。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广大民众由于不知道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代表会，而以“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代替工农兵代表会；另一些地方虽有代表会，但仅仅作为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不再提起。毛泽东指出：“这是不懂得什么叫苏维埃，不懂得工农兵代表会议是固定的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只是代表会定期会议闭幕时候的一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处理各事机关，这是边界许多地方对于政权机关的最大的错误。"① 他建议尽快"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

其三，必须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针对苏维埃区域普遍存在着"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的情况，毛泽东指出："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而"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他强调："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②

其四，必须正确处理军队与政府的关系。苏维埃区域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党和政府不得不一齐军事化。因此，正确处理军政关系显得特别重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初步提出了正确处理军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凡没有建设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当地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与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至于帮助地方武装的建设和训练，"均须尽可能的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③

毛泽东提出的这几条原则，虽说还很不完善，但其精神实质无疑是正确的。仅此，已足见毛泽东心目中的苏维埃政权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区别。

（三）中国式的苏维埃共和国模式。

1928年和1929年是中国农村苏维埃运动发展较快的年份。当时，除了毛泽东、朱德率军下井冈山创建了赣南、闽西苏维埃政权外，方志敏等在赣东北，周逸群、贺龙等在洪湖、湘鄂西，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左右江，曹学谐等在鄂豫边，以及广东东江等地，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着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好转，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又有所发展。他们过分地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忽视敌强我弱的特点，试图在短期内实行城乡工农革命配合，夺取一省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进而实现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为此，中共中央加紧了对苏维埃运动的干预。

---

① 本段文字《毛泽东选集》中已删除，详见（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2卷，第25—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35页。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30年2月4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第68号通告，规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促进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更一致的行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工农联合；讨论城市工作的配合布置，确立每一苏区及每一红军的发展方向。5月5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土地暂行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等决议草案，提出了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严重地干扰了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大会作出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等9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具体负责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930年9月12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临时常委的工作报告、政治宣言、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一苏大”的宪法大纲草案、土地法草案、经济法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草案等，决定“将中准会移至赤色区域去，公开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① 会后，中共中央根据土地革命是否开展和有无群众基础，有否强大的红军存在，是否便于向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发展等三个条件，将全国革命根据地划分为六个区域：赣西南、湘鄂边为苏维埃中心区；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为鄂豫皖特区；鄂西、湘西北为湘鄂西特区；闽西、粤东北、赣东南为闽粤赣特区；赣东北、闽北、皖赣边为赣闽皖特区；广西左江、右江为左右江特区。并决定“一苏大”将在苏维埃中心区召开。

由于国民党在1930年、1931年4月和6月先后三次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原定召开“一苏大”的时间不得不一再延期。1931年11月7日，时值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这

① 《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经过》，《红旗日报》1930年9月19日。

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自己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宪法草案还规定：以“全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全苏大会闭幕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以“人民委员苏维埃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和行政机关，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部政务的责任。”

大会还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以及经济政策等法律文件，具体体现了宪法草案的基本精神。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等64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会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各苏维埃区域政权建设的领导，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颁布和实行了各种政策法令。1932年和1933年各苏维埃区域普遍进行了基层选举，大批工农群众被选进各级政权的领导机关。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致开幕词、闭幕词，并作工作报告和结论。大会通过了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建设、苏区经济建设等决议案。大会决定成立正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取消“临时”二字，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模式正式确立下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完全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的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最初尝试，是解放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第一个雏型。尽管它曾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带有许多“左”的痕迹，但在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史以及毛泽东国家学说发展史上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实践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担任苏维埃共和国领导职务的几年，正是中国革命极其困难的时期。在外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经伸向中国东北，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苏维埃政权时刻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在共产党内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统治了中央，并且不断地对苏维埃政权施加‘左”的影响。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毅力，领导农村根据地的军民，为创建和巩固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主张和意见。

（一）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和任务。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与“一苏大”通过的宪法革案相比，宪法大纲增加了“同中农巩固的联合”这个重要内容，这个带有政策性的重要补充，是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斗争的积极成果。

宪法大纲对苏维埃共和国性质的规定，毛泽东原则上是同意的，并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是工农的政府，他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对于工农和广大民众是广大的民主。同时他是一个

专政，是对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专政。"①

那么，工农民主专政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国家呢？对此，毛泽东作了具体阐述。

首先，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1933年9月8日，由毛泽东签署的《苏维埃选举法》规定："无产阶级是苏维埃的先锋队领导农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对于居民与代表人数的比例，工人比例的居民，要享受优越的权利。"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必须适当增加工人代表的比例。他提出市乡代表会议采取工人及其家属每13名选举代表3人，农民及贫民每50人选举代表3人的办法；区到中央的各级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工人与农民的代表也应有适当的比例。"这样便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上保证了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并使工人站在领导的地位。"

其次，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给广大工农群众以最宽泛的民主。毛泽东指出，工农民主专政是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它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它不能一刻离开群众。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贫民、职员、革命知识分子等大多数民众，则不使用强力，而表现出来的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

他指出，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在它的选举上。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给予女子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其次，苏维埃的民主，见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议，通过市与乡的代表会议，保持与当地居民的密切联系。再次，苏维埃的民主，又见之于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苏维埃政府下的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集会结社与言论出版，苏维埃政府都给予领导和支持。复次，苏维埃的民主，还表现在吸引广大民众对于政府工作进行批评和监督。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检举揭发，苏维埃政府则应立即予以惩处，决不姑息。最后，苏维埃的民主，还见之于行政区域的适当划分。苏维埃取消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把从省至乡各级苏维埃的管辖范围适

① 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当划小，使之更加接近于民众。

再次，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毛泽东指出，苏维埃实现了最完满的民主制度，它给予广大民众一切民主权利，对于民众绝对不使用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强力。但是，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即对于一切被革命民众推翻的剥削分子，则必须实行专政。这是因为他们是剥削者，是过去的统治者，所以他们对于苏维埃是怀着极端深刻的仇恨的。因为他们虽被推翻但并未消灭，他们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有优越的知识与技术，所以他们虽被推翻，却时时企图复辟，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原来的剥削制度。特别在国内战争时代，敌人对于苏区不断举行军事进攻，更使这些被推翻的剥削者时刻企图以反革命行动响应进攻的敌人。因此，苏维埃政权不能不从各方面对于这些分子施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

他提出了制裁剥削分子的政策：第一，将他们排斥在政权之外，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完全取消他们的选举权，取消他们在红军和地方部队中服兵役的权利；第二，剥夺他们的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第三，利用革命武力与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严厉镇压，绝不姑息，但对于已经逮捕的犯人，则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坚决废止肉刑，并对死刑以外的罪犯采取感化主义，用共产主义的精神和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的犯罪本质。这就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复次，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毛泽东认为，工农民主专政只是过渡性的国家，只是共产党人一个阶段的目标。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政权，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在大会的闭幕词中，他在强调彻底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之后，清醒地指出："革命的担子挑到这个地方去就完了吗？工农民主政府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同志们！还没有完，还不是最后的目的，革命的担子还要挑到更远的地方去。在今天我们就要指出这种地方，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但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要消灭地主阶级，而且现在就要准备着，准备到了将来，到了适当的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象苏联现在所做的一样，最后还要进到

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办法，进到最自由光明伟大的世界去。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是人类最后的解放，才是人类最后的胜利！”①

毛泽东在阐述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的同时，还具体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任务。

1933年8月，他在中央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除提出猛烈扩大红军，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普遍实行劳动法，改造各级苏维埃，发展群众文化运动等工作外，突出地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工作。他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苏维埃动员群众，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开展经济建设工作，不仅是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保障红军的供给，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需要。他批评那种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有工夫去做经济工作的意见，指出：“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革命战争就会失败。因此，这种意见是“极端错误的。”②

同年9月，他在中央根据地南部18县选举会议的报告中说，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它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它用战争消灭外部的反革命，同时又用法庭镇压内部的反革命，因为只有战胜了这些反革命，工农阶级才能成为统治阶级，苏维埃政权才能成为统治的政权；第二，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农民有了土地，工人有了劳动法保护，劳动阶级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③

1934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具体提出了苏维埃国家的基本任务：领导全国革命民众进行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组织领导红军与民众为着保护苏维埃领土发展苏维埃领土而斗争，以坚决的进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屡次“围剿”。严厉镇压苏维埃领土内的一切剥削分子的反革命企图。一切土地给予农民红军兵士。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救济事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给一切革命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完全自由。引进广大工农群众管理自己的国家机关，不准极少数剥削分子参加。组织民众的经济生活，使民众生活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受尽饥寒的地位，

① 《红旗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7期，1934年2月3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③ 毛泽东：《今年的选举》，1933年9月6日。

进到不但完全免除饥寒并且日益向上改良的地位。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已经清晰地概括了苏维埃共和国内外两个方面的职能：在内部，苏维埃共和国要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和破坏，要保障工农民众的民主权利，要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要组织经济文化建设，要改变工农民众受饥寒的地位；在外部，苏维埃共和国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要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一个目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将几万万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阻止灭亡中国的殖民地道路，建立自由独立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①

（二）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形式。

《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时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按照这一规定，1934 年 2 月 17 日由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署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再次规定了中央苏维埃的组织体系。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由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直属市、直属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召集，每两年召集一次。如遇特殊情形，得延期召集。必要时，可召集临时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职权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其他法律；决定全国的大政方针；选举和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听取并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由大会选举产生，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 6 个月由主席召集一次，如遇特殊情况可延期召集，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它有权颁布法律和法令；审核和批准一切关于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政策和国家机关的变更。

---

①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 2 辑。

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其主席团、人民委员会及其他机关的法令和决议，有停止执行和变更之权。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全国最高政权机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其职权是：监督宪法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各种命令及决议的实施，颁布各种法律和命令，审批、停止或变更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及省苏维埃的决定、法令、条例；负责解决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各省苏维埃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责指挥全国政务。由主席、各人民委员及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等组成。人民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权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范围内颁布各种法令和条例，其所作出的与大政方针有关的决议和所颁布的法令和条例，均须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审核批准，紧急事项可先行解决，然后报告备案。有权审查修改或停止各人民委员部所提出的法令及决议。各人员委员部及各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如对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和法令有不同意见时，可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提出，但不得停止执行。

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

此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分别负责审核国家财政收支、监督国家预算执行和重大案件的审判工作。

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形式的具体模式。

至于地方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形式，一般分为省、县、区、乡（市）4个层级。省、县、区设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执行委员会之下不设人民委员会，直接设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裁判等部和工农检察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乡（市）设乡（市）民代表会议，不设执行委员会，只设主席团，主席之下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分工管理基层行政事务。

对于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三点：第一，加强省苏维埃的工作。他说："省苏维埃是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政府与各县区苏维埃之间的连锁，必须极大地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个省苏的领导，密切中央政府与各个省苏之间的联系（中央区各省与中央区以外各省），严密检查各个省苏

的工作。"① 只要省级政权巩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加强乡、村委员会制度的建设。1933 年 11 月毛泽东实地考察并总结了长冈乡、才溪乡设立各种委员会的经验，认为"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到雄厚的力量。"② 村虽不是一级政权，但是乡的工作重心。因此，有的村也组织了必要的委员会，作为乡的委员会的分会。对此，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予以肯定："长冈乡的村委员会（许多的委员会在村都有），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③ 第三，加强对苏区群众团体的领导。当时苏区有许多群众团体，如工会、贫农团、合作社、革命互济会、女工农妇代表会、儿童团等。它们各自联系着不同方面的群众，经过它们去动员群众，可以保证苏维埃决议的贯彻执行。对此，毛泽东也给予充分肯定。他在总结乡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④ 1933 年 7 月，他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还专门颁布了《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对贫农团的组织和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和引导。

毛泽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种种设计，是俄国苏维埃国家模式与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劳动人民有选举代表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对选举它的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乡、市苏维埃则直接向选民报告工作，接受选民的批评和建议。这样就能使政府的各项决定和措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实行高度集中，政策法令一经制定颁布，就必须遵守和执行，各级政府之间，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这样又保证了各项方针政策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第二，议行合一的原则。苏维埃共和国决定和执行重大事务的权力，由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统一行使。苏区各级政权机关，既是议事机关，

①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 2 辑。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0 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0 页。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6 页。

又是工作机关，议决并执行各该地区内的一切事宜。各级苏维埃的代表，一方面代表选民到苏维埃去工作，传达选民的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将苏维埃的决议传达到群众中去，并领导选民贯彻执行。这就保证了由工农劳动群众选出的各级代表大会，有充分的权力，不仅可以反映、讨论面且可以直接实现、贯彻执行广大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第三，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苏维埃是工农群众的政权，工农群众是苏维埃的力量源泉。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绝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我们要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要夺取全中国！"① 苏维埃政权为了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一方面通过在乡苏维埃之下设立各种委员会（有的村也设有委员会）吸收工农积汲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另一方面通过支持和扶助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依靠它们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这样做不仅密切了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感，训练了工农群众参加管理政权的能力，而且提高了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效率，改变了政权机关作风。这就是苏维埃制度优越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本质特征。

（三）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与建设。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的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② 这是毛泽东1933年9月在中央根据地南部18县选举会议的报告中阐述的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他又指出："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快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③ 在这里，毛泽东就及时提出了一个远比夺取政权更加艰巨的任务——巩固政权的任务。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呕心沥血，积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珍视的主张和措施。

毛泽东认为，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只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苏维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成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

① 毛泽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1934年1月17日。
② 毛泽东：《今年的选举》，1933年9月6日。
③ 毛泽东：《今年的选举》，1933年9月6日。

变的杠杆。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完全错误的。"为此，他提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①]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更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人是主人翁，工人领导着广大农民担负了巩固苏维埃的伟大责任。""加强工人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健全苏维埃工作的重要环节。"[②] 为此，他提出了适当增加工人代表在苏维埃中的比例；健全苏维埃中的党团组织；加强党对党团工作的领导；坚持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最主要的政策，必须经该地党委批准后方可执行等具体措施。同时，他也多次指出要防止"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危险"，避免"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

毛泽东还认为，能否巩固苏维埃，搞好选举工作是关键之一。

1933年9月，他在南部18县选举运动会议的报告中，专门就选举中应注意的问题发表了意见。第一，关于选举的宣传问题，他强调，必须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讲清楚，必须把苏维埃的革命作用讲清楚；第二，关于城乡苏维埃选举问题，他指出，城乡苏维埃最接近群众，上级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均需经过城乡苏维埃才能实际去实行。因此，城乡苏维埃的选举是最基本的选举，必须尽力抓好；第三，关于选民登记问题，他强调，必须将有选举权的人与没有选举权的严格区分开来，做到到会的选民都是有选举权的，而没有一个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混过来；第四，根据以前选举的经验，他提出将选举单位适当划小，以便选民都可以参加选举，更好地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人；第五，关于乡市苏维埃向选民报告工作问题，他指出，以前的选举，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一制度，今年一定要实行起来，因为实行这一制度，能使政府的工作在群众中得到检验，提高选民的选举热忱；第六，关于候选名单，他指出，准备好候选名单，是争取选举胜利的重要环节。候选人首先应注意成分，其次应注意政治表现，再次应注意工作能力；第七，关于选举大会，他强调，必须有充分准备，按程序进行，不得走过场；最后，他指出，要做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②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以上工作，必须组织一个选举委员会来具体负责，避免单独由政府人员指导选举。[①]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民主选举的精神，为苏维埃政权的选举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指出，组织经济文化建设工作，不仅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职能之一，而且也是巩固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措施之一。1933 年 8 月，他在中央根据地南部 17 县经济建设大会的报告中，充分论证了经济建设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障红军供给、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意义。1934 年 1 月，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经济建设的中心。他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②]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任务。他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他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群众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根据这个总方针和苏区的实际情况，他提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③]

毛泽东十分重视经济文化建设工作，但并未忘记革命战争这个中心工作。他指出：“在现在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是为着它的，是服务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

① 毛泽东：《今年的选举》，《红色中华》第 108 期，1933 年 9 月 6 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0 页。
③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 年 1 月。

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① 就当时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环境而言，它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威胁：第一，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第三，苏维埃内部反革命分子的颠覆破坏。因此，苏维埃的根本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去开展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最终巩固下来。为此，毛泽东提出，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加强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使苏维埃“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动员和武装全苏区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以坚决的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对于反苏维埃法令的剥削阶级分子，及一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实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②

毛泽东强调，要巩固苏维埃共和国，还必须搞好各级苏维埃自身的建设。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多次就苏维埃建设问题发表了意见。

他说，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全国苏维埃运动有了总的领导机关，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意义。两年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中央政府在组织上与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全与不充分的地方。他提出，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运动的总领导，必须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工作上划分开来，健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组织与工作，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从而使中央政府“能够充分发挥他总的发动机作用。”

关于地方苏维埃的建设，他指出，省苏维埃是地方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政府与各县区苏维埃之间的连锁，必须加强中央政府对于省苏的领导，密切中央政府与各省苏之间的联系，严密检查各省苏的工作。同时。必须大力改善省苏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实行集体讨论，分工负责制度，加强对各县苏区工作的检查，纠正过去工作上松懈与不集中的现象。

毛泽东特别重视乡市苏维埃的工作。他认为，乡苏市苏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对于巩固苏维埃共和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加强乡市苏维埃的工作，必须建立和完善代表会议制度，设立代表会议主席团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建立代表与居民联系制度和村主任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将苏维埃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各村各街道的实际工作中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②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为了改善苏维埃人员与工农民众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任务。他指出，苏维埃人员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去动员民众执行苏维埃的工作，而不应该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执行苏维埃的工作；苏维埃人员应该注意民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建议，而不应该忽视这些要求和建议；苏维埃人员特别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应吸引广大民众检举揭发苏维埃中的不良分子，直至用法律制裁他们；苏维埃应与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合作社及其他一切民众团体发生密切联系，经过这些团体去动员广大民众，执行苏维埃工作。

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速度和质量，毛泽东要求革除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松懈拖拉不紧张的现象。他指出，必须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工作热忱，使之自觉地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而努力工作，同时，必须森严工作纪律，对于工作不积极、疏忽与废弛职务者，必须进行斗争，直至开除他们的公职；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坚决打击贪污浪费行为：必须把“一切服从战争”、“争取工作的速度与质量”的口号，提到每个苏维埃工作人员面前，使一切工作完全适合于战争的要求。

毛泽东的上述种种主张，集中了全党同志的正确意见，是巩固苏维埃共和国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这些主张与他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性质与任务、苏维埃共和国组织形式的论述一起，共同构成毛泽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理论的体系。

(四) 对苏维埃共和国模式的反思。

毛泽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构想，是他在一个特殊阶段里探索国家问题的初步成果。对于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模式，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毛泽东都是给予肯定的。

1935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的加紧，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适应这种需要，毛泽东及时提出，工农民主政权包含的范围应该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应该划人人民的范围之中。这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正式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对这一决定作了解释。他说：“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因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仅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

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①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又说："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惟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工农共和国的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确的。"②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一直成为人们评价苏维埃共和国的参照标准。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总结阶段，有的同志对"苏维埃"这个名词提出不同看法，并对工农民主专政提出疑问。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③ 他还肯定了当年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正确性，说："毛泽东同志在并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④

直至1948年，随着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提出，毛泽东对苏维埃和工农民主专政的认识才有了变化。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1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3页。

中指出："六大的规定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与无产阶级合作。"又说："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过去又叫'苏维埃'，又叫'大会'，就成了'大会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①

根据毛泽东上述报告的精神，解放后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过程中，凡入选著作，只要出现"苏维埃"字样，均作了改动。如将"苏维埃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改为"政权"、"红色政权"、"民众政权"；"苏维埃"改为"我们"；"苏维埃区域"改为"红色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改为"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等等。显然，作这样的改动决不是随意的。它反映了毛泽东对过去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组织形式在认识上的变化。

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评价，综合毛泽东关于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苏维埃共和国的提出及其实践，是以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为依据的，它适应了国民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已经退出革命，革命动力只剩下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因此，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具有一定的阶级基础，反映了广大工农民众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的普遍愿望。

第二，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既是代表工农阶级的，也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并不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它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

第三，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元化的，非常便利于工农阶级行使政权，是广泛的民主制度；后者是两权（或三权）分立的，是调节资产阶级各派别集团利益的工具。

第四，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的国家，它既是以前局部苏维埃政权的深化和发展，又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基础和准备。有如毛泽东在

①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14 页。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言：苏维埃共和国将“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

第五，苏维埃共和国基本上是参照苏联政权模式建立起来的，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痕迹。作为苏维埃共和国政体的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是照搬外国名词，选成“大会大会”的同义反复，是不妥当的。

第六，苏维埃共和国产生和发展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将地主和富农同等看待，把地主和资产阶级，特别是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打击的对象，这就缩小了苏维埃共和国的阶级基础，使之不能完全适应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需要。

第七，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虽然名义上将各地苏维埃政权统一了起来，但就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条件并不成熟。这不仅因为革命斗争尚未取得全国胜利，而且各地苏维埃政权并不连属，互相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难以形成政令统一的局面。因此，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仍然只起到局部政权的作用。

探索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尽管苏维埃共和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它却真实地记录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奋斗的足迹，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最初尝试，为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章

抗日民主政权的理论

一、从工农共和国思想到民主共和国思想的转变

(一)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新变动的分析。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它早就利用同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东北南部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设置关东都督府、南满铁道珠式会社、关东军等殖民机构，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27年6月至7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独占东北、内蒙，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1929年，日本统治集团为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更急于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为此，日本加紧进行武装侵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部署，并在东北制造多起事端，作为增兵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①] 次年3月，日本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并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开始对中国东北实行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全面的经济掠夺，以及法西斯文化专制和奴化教育。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企图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注意，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它占领东北的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1933年，日军侵占长城各口和察东、冀东，矛头直指平津。1935年5月起，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方式，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东北沦丧，华北危在旦夕，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盾由此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① 为了向全中国人民回答这一历史性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决议》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②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已经和正在变动的阶级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毛泽东指出，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他们是抗日的最坚决的力量；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他们除了抗日，再没有出路。

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地主买办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曾一度追随、附合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但在日益尖锐的民族危机面前，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他们纷纷发表时评、宣言、通电，阐明自己的政见，谴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抨击所谓“抗日必先剿共”的方针，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易张，实行抗日民主。各地工商业者还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进行抵制日货的斗争。华北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更是日益增强。这表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有起变化的可能性，“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③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599、604、6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毛泽东的这一分析是以大量事实为依据的。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主义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营垒出现新的分化。1931 年 12 月，位于国民党军“剿共”前线的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名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1932 年，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1933 年，中国守军进行长城抗战。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举起了抗日反蒋旗帜。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主义更明显地表现出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亲日政策的不满情绪，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则有举抗日之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之趋向。这些表明，“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①

关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毛泽东指出，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内部并非完全统一，不同派别之间矛盾重重。国民党内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在华北事变后逐渐加深。九一八事变后，英美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并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幻想利用日本充当反对苏联的先锋，因而表示无意干涉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亲英美的代表蒋介石采取了与亲日派的代表汪精卫合作的态度。华北事变后，日本愈益明显地将其势力扩展到华北以至整个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权益，使它们对日本的态度有所改变。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同时，通过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来抑制日本侵略的野心。1935 年 11 月，南京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这一措施，既加强了四大家族对全国金融的独占，也因法币与英镑发生固定联系而使日本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随后不久，南京政府同美国订立“白银协定”，使法币又与美元发生联系。1935 年 11 月，汪精卫遇刺受伤，亲日派力量受到打击。同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说，在表示“决不放弃和平”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 页。

态度之外，也表示了“是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这反映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并将南京政府中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这说明，“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在多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

所有这些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阶级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新变动。这种变动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② 因此，怎样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以挽救民族危亡，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最紧迫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彻底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并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正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国家问题上，提出了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继而又改为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随着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抗日民主政权理论。

（二）“人民共和国”口号的提出。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政权问题上，一直坚持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旗帜。其主要原因在于：1927国民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革命阵营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这种阶级关系状况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民众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工农共和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5年华北事变前，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奉行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政治上采取关门主义策略，再加上“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环境，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政权问题上，未能改变由工农两大阶级组成的工农共和国模式。

1935年华北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中国革命呈现出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原有的由工农两大阶级组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的苏维埃共和国即工农民主政权，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以一种新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它。为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逐步形成了适合新形势需要的抗日民主政权理论，胜利实现了从工农共和国思想经由人民共和国思想到民主共和国思想的转变。

在1935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的同时，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号明确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并且规定了适应这一重大变化的政策原则。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对人民共和国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第一，关于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转变及其原因。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转变问题。他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① 毛泽东认为，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利益的，而且是代表民族利益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80%至90%。但是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把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②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是工农共和国转变为人民共和国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关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

毛泽东对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作了重点论述。他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不把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放在人民之列，而同他们“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③ 人民共和国首先代表占中国人口80%至90%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同时也代表其他人民的利益。因为人民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并摆脱封建制度，这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人民共和国有权利称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①

毛泽东还着重说明了人民共和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包容性。他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利益上的冲突，但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要给予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工人阶级“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② 保护工人的利益，但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所以说，“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③ 这里，毛泽东实际上点明了人民共和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性质。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但看到中日矛盾上升带来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而且预料到将要继续发生的变化，即：随着日本侵略的继续加剧，随着英美和日本之间矛盾的发展，地主买办阶级中依附于英美的那一部分反革命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争取它们站在反日战线上来，或使它们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④ 这就明确了人民共和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同时，也为后来进一步向民主共和国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

以上论述表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基础比工农共和国明显扩大了。它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分子。这其中，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抗日人士、愿意抗日的国民党官兵等。而地主买办阶级中那些虽然不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人们，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到人民共和国政府中来。这一具有如此广泛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人民共和国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政权理论上的集中体现。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第三，关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和政策。

毛泽东指出，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其施政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①] 据此，中国共产党对过去工农共和国的政策作了适当修改，主要是修改对富农、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以及外交政策。

对待富农，改变以前消灭富农为保护富农的合法经济利益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②]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即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到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人民共和国区域发展工业。[③]

外交上，改变了过去只提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政策，采取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政策，宣称人民共和国愿意“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发生友谊的关系”。[④]

“所有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⑤] 这些政策的改变，更加充分地说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⑥] 是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

第四，关于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共和国中的领导作用。

鉴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的严重教训，特别是鉴于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共和国中的领导作用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必然会多方使用威逼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和发展，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②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612页。
③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
⑤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7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将发生极大的困难"。[①] 而共产党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将对"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起保证作用。[②] 因此，"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③] 毛泽东要求全党，坚决同党内的主要危险——"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同时，警惕新形势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和人民共和国中领导权问题的强调，表明经过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确已走向成熟。

为了顺利执行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政策，尽快实现对日作战，保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提出了人民共和国当前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贼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等。

人民共和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在政权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国家学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为实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践的发展。

（三）"民主共和国"的方策的制定。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工作，并首先在西北地区实行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联合。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全国性的抗日政权问题上，努力探索更适合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政权形式，终于在"人民共和国"口号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提出来的。1936年2月，红军主力强渡黄河，东征抗日，遭到阎锡山部队阻击。蒋介石急调10个师20万人的兵力增援阎军，并令河西的国民党部队与之配合，企图一举消灭红军，摧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决定红军回师陕北，结束东征。5月初，东征红军全部回师，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了争取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到抗日阵线上来的主张，正式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与这一转变相适应，中共中央于8月25日致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员，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并首次提出了"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9月17日，中共中央专门作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式将民主共和国口号作为"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实现团结抗日的"最好方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①] 毛泽东本人在同一时期写的一些书信中，也多次宣传"民主共和国"主张，认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②]，"是全国人民的旗帜"[③]。此后，"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商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政权问题时所坚持的基本口号。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第一、关于民主共和国的基本职能和主要施政纲领，强调民主共和国以抗日救国为职能，以抗日、民主、改善民生为施政纲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乘虚直入、得寸进尺，中华民族沦亡惨祸迫在眉睫的危急形势，"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及其政府的主要纲领："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致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④] 也就是说，只有以抗日救国为基本职能，以实行抗日、民主，改善民生为主要施政纲领的民主共和国及其政府，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才能求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现时代所真正要求的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8—89页。
② 《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③ 《致许德珩》(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家政权。

第二，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构成，强调民主共和国政府必须建立在抗日民主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中华民主共和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它包括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和由此产生的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及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即国会）。其中，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国防政府从国防会议中产生，实施国防会议决定的抗日救国大计；国会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①。中共和毛泽东指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防会议和国会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②。依照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国民党所主张的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仅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咨询机关。依据国民党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国民党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也仅仅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装饰品。显然，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任务的，是“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的。相反，只有中华民主共和国，只有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和从中产生的国防政府，以及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和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③。这里，实际上阐明了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性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基本构成。

第三，关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过程，强调全中国人民的普遍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是民主共和国实现的前提条件，其斗争过程始自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开始实行，迄至民主革命基本任务的彻底完成。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推动国民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而这一切均需经过艰苦的持久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①。

针对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② 因此，党要善于领导这种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发展、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③。这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全民族抗战发动后得到系统发挥和全面阐述。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既独立又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明确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其基本思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④ 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尽管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的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而，不顾另一方面，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将不利于抗日。"① 总之，进行抗日的民族斗争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的阶级斗争是一致的，二者不能分离，互为条件。毛泽东关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理论依据。

第四，关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政治保证，强调共产党独立性的保持和政治领导作用的发挥，是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根本保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三强调共产党在实现民主共和国斗争中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必须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这一"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危险"的同时，及时纠正忽视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人民民主政权和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的错误政策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无论是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前还是之后，共产党都决不放弃对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绝对的领导"。相反，党在坚持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坚持"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以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的胜利。②

第五，关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与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强调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既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与彻底胜利提供保障，也为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条件。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明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历史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态度。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的形势下，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惨祸的最好办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民众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这种体现抗日和民主精神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便更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①。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②。正因为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能够将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共产党"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③

在当时的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方策的提出和系统阐述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它向国人昭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面前，以民族大义为重，尽弃前嫌，愿以放弃两个政权敌对政策，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状态的重大让步，换取"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换取"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④ 这是何等宽广博大的胸襟，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它也表明，历经磨难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深知实现民主共和国方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因而所作的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就是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⑤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无疑是建立、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及人民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其次，它进一步发展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在抗日民主政权问题上的国防政府主张和人民共和国口号，成功地将抗日与民主有机结合在一起，将挽救民族危亡与夺取民主革命胜利乃至实现社会主义前途有机结合在一起，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与新的民主主义制度的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国家学说开始走向成熟，在思想理论上已经实现了从工农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的伟大转变。这不仅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也为后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系统阐述作了重要准备。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和任务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悍然发动了旨在灭亡全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侵略者点燃的熊熊战火中，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终于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伴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展、持久和深入，全国相继出现了大小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们分布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广阔地域，含19个省的一部或大部，总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近1亿。在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①] 这些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统称为抗日民主政权。它们之中，除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是在瓦窑堡会议后逐步由工农民主政权转变而来之外，其余都是由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立之初，关于政权的性质问题，不仅许多党内外群众不了解，而且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也不甚明确，以致于有人提出，这种政权“在政策上是统一战线的，而在其阶级性质上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有人认为这种政权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为共产党员应该“完全独占政权工作”，包办一切。鉴于以上种种在抗日政权性质问题上的糊涂认识，毛泽东提出，必须对抗日政权的性质有一个“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这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面“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②]

为了澄清党内外在抗日政权问题上的糊涂认识，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中共中央于1940年2月1日发出了《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向全党说明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指出：我们领导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革命的专政。抗日民主政权在其阶级成份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然而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分子及进步士绅加入。“抗日民主政权应当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加入政权，但绝不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在现实不适当，“因为这个口号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不适合。”①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和阐述。

在1939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② 随后，毛泽东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团结到底》、《论政策》等著作中，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作了专门阐述。他指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③ “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④ 总之，“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⑤ 是主张抗日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⑥。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抗日民主政权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

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历史已经判定，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具体到抗日战争这个民主革命的特殊历史阶段，“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269页。
②③⑤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①]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在抗日民主斗争中的动摇性，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团结抗日问题上的两面性，“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它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成为“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③] 这就使得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紧要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没有共产党的绝对的领导权，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不可能坚持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因此，“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④]

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正是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一个具体体现。实现这一领导权，就能够克服统一战线内部中间势力的动摇性，防止统一战线内右翼势力的分裂投降倒退活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从而为夺取抗战胜利创造最基本的政治条件。

第二，抗日民主政权以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们为社会基础。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体现，抗日民主政权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不论是工人、农民（含雇农、贫农、中农）、其他小资产阶级、富农、地主、资本家，不论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也不论是居住在边区的各民族，均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均可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虽不曾加人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和破坏抗战的反动派，就不是专政的对象。抗日民主政权专政的对象，仅仅限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理论根据”。[⑤] 因此，抗日民主政权，是一个由主张抗日的共产党人和赞成抗日的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人物组成的政权，是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对汉奸和反动派进行专政的联合政权。它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必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动员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持久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从而弥补抗日根据地物力、财力之不足，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且最终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

第三，抗日民主政权是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的抗日民主政权之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性质的中央政权，彼此之间亦无隶属关系。在名义上，它们都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但在实际上，它们都受中共中央统一领导 并在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它们根本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是一种新型的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它们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保持党政军民上下一致；它们以工农群众为主体，首先依靠工农并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包括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它们与抗战前的工农民主政府及后来的人民民主政府同属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体系，是抗日战争历史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是这时的人民范畴极为广泛，专政对象特别集中，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赞成抗日和民主，只要不是汉奸和反动派，都属于人民范畴，都不是专政对象。它们由人民普选产生，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政行合一的权力机关。它们实行贯彻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以抗战、团结、救中国为历史使命。因此，“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①

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及其基本特点，表明它是根本不同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也区别于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一种新型政权。“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② 显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各敌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表明其所在地区的社会性质已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轨道，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二）抗日与民主的施政方针。

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通过实行某种方针、政策来行使自己的职能，引导自己的事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那么，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是什么呢？

毛泽东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的施政方针应该体现出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①。它所施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② 这一体现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的施政方针，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要求，是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制定施政纲领的基本指导原则。

抗日民主政权的这一施政方针，具体体现在它的民权政策、土地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以及防奸镇反政策等各项政策中。各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纲领》及其他法律法规，对这些政策作了法律上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保障团结抗日。在日本侵略者蹂躏中华国土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决定了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把团结抗日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因此，各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纲领均明确规定，要加强边区内部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抗日军队及全体人民的团结，亲密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为此采取下列主要措施：一是扩大各边区的武装力量，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加强抗日民兵、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二是改善兵役制度和后方勤务动员制度，提高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三是制定优抗条例，保护军婚，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抚恤荣誉军人和烈士遗孤；四是坚决肃清和严厉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汪派、托派及阴谋破坏边区的反动分子，对于其中愿意改悔者，争取感化转变，实行宽大政策。

第二，发展民主政治。彻底的民主政治，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本质特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区别于其他任何地区政权的重要标志。抗日民主政权把发展民主政治提到促进和加强全国人民团结、保障团结抗日的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度，并且采取了若干项重大措施来健全和发展根据地的抗日民主。1. 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 在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中实行人员分配上的“三三制”原则，规定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以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使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权力（民意）机关的工作。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3. 保障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民的人权、参政权、财权及集会、言论、结社、出版、居住、迁徙、信仰之自由权利。除司法、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均不得对任何人加以压制、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游街或施以任何侮辱人格的行为，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4. 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妇女特殊利益。5. 反对民族歧视，实行民族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第三，减租减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认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①] 为了团结一切阶级、阶层一致抗日，增加根据地的财力物力，活跃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粉碎日本侵略者及顽固势力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实行了抗日的经济政策，并把经济建设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在敌后根据地，实行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土地政策；在已经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保证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以调动农民抗战积极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待遇，发展农业、林牧业、手工业和工业生产及商业流通；奖励扶助私有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华侨和敌占区同胞来根据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活跃市场；实行统筹统支的财政制度，征收统一累进税，调整金融关系，稳定边区货币。

第四，普及文化教育。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把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作为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提高民众文化水准和政治觉悟的目标下，实行普及、义务、免费教育，举办各类学校，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和失学青年。

---

① 《致谢觉哉》(1941 年 8 月 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7 页。

上述内容表明，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①] 它所实行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显然，这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②] 这些政策，贯串着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体现了团结、抗战、救中国的基本立场。其贯彻实施，必将加强抗日军民团结，有力地打击日寇及汉奸，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体制及其建设

（一）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

抗日民主政权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为了确保这一政权的性质，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实行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一般设立边区、县、乡三级政权机构，三级政权机构均以参议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各级参议会“固然不是苏维埃时代的工农代表会议，但也不是三权分立的外国议会制，它是人民代表会议，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③] 参议会制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④]

根据参议会的组织条例和选举条例规定，参议员由人民采取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同级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参议员。但名额不得超过议员总数的1/10）。选举出来的边区、县、乡三级议员，分别组成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是边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拥有选举、监察、弹劾、罢免边区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制定本地区单项法规，审议批准政府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③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7页。

项计划，议决政府、人民和民众团体提请审议的事项，督促、检查同级政府对参议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等等职权。各级参议会均需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监督和罢免参议员。

参议会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基本活动原则是议行合一制。参议会在由人民选举组成后，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选举同级政府，监督、罢免政府人员，创制法律。各级政权之间的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同级政权机关内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政权各机关之间是相互统一的关系，只有分工，没有分立。参议会作为人民代表机关行使立法权；由它产生的各级政府行使行政权，对参议会负责，接受参议会监督。由参议会产生的司法机关，其工作“应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进行”①，彼此共同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参议会所采取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议行合一制的活动原则，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是互相统一的。

抗日民主政权的参议会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1940 年以前，各级参议会员虽然也经过普选，但非党人士和富有者当选参议员的很少；政府所聘请的参议员因对他们重视不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不能使各阶层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影响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而且因缺乏各方监督，妨碍了政权机关工作的改进与加强。1940 年春三三制原则提出并得到认真贯彻后，就使得各级参议会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

（二）政权机关中的“三三制”原则。

为了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健全解放区的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一个高效有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1940 年 3 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政权机关中人员分配的三三制原则，即无论是在权力（民意）机关还是在行政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 1/3 或少于 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 1/3，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 1/3，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政权机关。毛泽东指出：“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

①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4 页。

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的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① 这里的最下级政权，主要是指乡（有些地方叫村）级政权。由于乡（村）级政权是整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所以，"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② 通过贯彻政权机关人员分配中的三三制原则，确保凡是不投降不反共、赞成抗日与民主的人，都可以参加政权工作。

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中人员分配的三三制原则，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项具体政策。之所以要约束自己，是由于共产党得到广大民众拥护而在政治上占有较大优势，在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中，共产党员在政权机构中所占比例可能较大。为使其他抗日党派、阶层的代表得到参政议政的充分权力，共产党把自己的代表限制在 1/3 的数额以内。

三三制原则作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在各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纲领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 18 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 6 名；9 名参议会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占 3 名；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平均占 1/3 左右。县参议会情况大致相同。有时某一地区共产党员当选人数高于 1/3，一些当选议员或政府委员的共产党员即用辞职的办法主动减少所占比例，以保证三三制的大体实现。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常驻议员 51 名候选人中，因共产党员较多，即有 6 名党员自动退出。政府委员 39 名候选人中，共产党员超过 1/3，谢觉哉、马锡五等 12 名党员主动申请退出。1942 年 10 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会前选举 145 名参议员，其中共产党员 49 名，超过 1/3 比例不足 1 人，却有 2 名共产党员退出。

共产党严格限制自己的候选人和当选人的数额，尽可能创造条件让更多非党人士当选，使他们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获得说话办事的机会。担任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后再去做。同时，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切实改进自己的工作，使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尽职尽责，党内外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9 页。

关系日益融洽。这种民主合作的至诚精神，赢得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赞誉和衷心拥护。一些原来对抗日民主政权持怀疑态度的党外人士态度发生变化，盛赞边区“选政三三行伟制，名扬何让古唐虞”。认为“边区的章程越来越好了”，“虽尧舜之世不如也”。①

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和实行，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② 因而从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这对于增强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之间的团结，调动广大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限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人员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当然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正确处理和改善党政关系，在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同时，充分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应有作用。

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日民主政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保证，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化，即在同级党政军学各组织相互关系上，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接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占领导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由此产生了一个共产党如何保持自己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地位的问题。因为根据三三制原则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各党各派，在民主的法律上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任何阶级、任何党派均不能有任何的特权，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共产党既不在政权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又不能靠法律保证领导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保持自己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优势和领导权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主要靠两条，一靠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二靠参政的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③，使他们拥护、赞成和信赖共产党人。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体现抗日和民主两大精神的施

① 《解放日报》1941年9月19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政方针下，制定了一整套政策。如：以减税减息为核心的土地政策；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的财经政策；既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待遇，又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劳动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政府工作效能为目的的精兵简政政策；保证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与工农享有同等人权、财权、选举权和集会、结社、言论、思想、信仰等自由权的民权政策；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锄奸镇反政策；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抗日的知识技能，增强民族自尊心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政策，等等。这些顾及了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利益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必然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确立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优势和领导地位。为此，党委要加强对政权贯彻执行路线政策情况的督促、检查和指导。其方法主要是：通过政权机关中的党团组织贯彻党的决议和精神；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政权机关的多数；发挥政权机关中党团员的模范作用；按照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正确处理政权内部的分歧和斗争；教育党员、群众、军队拥护抗日民主政权，遵守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党的指导机关定期讨论政策、法令，检查党团工作，做好政权机关中党团和支部工作等。总之，“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①

参加政权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是共产党领导权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明确要求，参政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②。“应该是政治上、工作能力上、同群众关系上、统一战线作风上的优秀党员”③，应该“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④。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奉公守法，尊重非党人士，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诚恳热情地与他们合作共事；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处理好与非党人士之间发生的政策上和政治上的分歧。总之，共产党员应把参加政权工作的非党人士当成心坎里的干部，而不是面子上的干部。这样做的结果，赢得了非党人士的极大信赖和广泛赞誉，使他们深感“共产党对子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和尊重”⑤。从而与共产党人真心合作，创造性地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③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⑤ 李鼎铭：《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

开展政权工作。

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中人员分配的三三制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各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存在着的党对政权的包办代替、党的领导陷于日常事务的现象提出来的。这种现象既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也影响了政权工作的开展，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推行。三三制原则的贯彻，彻底改变了政权创建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既加强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充分发挥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积极性，对于改善党与政权的关系起了重大作用，从而更加有利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实现。

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和实施，固然带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它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却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与施行。

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中后期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休养生息民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精兵简政最初是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等，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上提出的。他和其他10名参议员在向参议会提交的《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人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中指出，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这一提案当即为边区参议会通过，决议交边区政府速办。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政府发出指示信，指出，精兵简政是“健全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能最有效的方案”，是保证今后完全实行一切重要决议案的“重要步骤”，希望各地“切实执行”。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指出精兵简政的方针，“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切合时宜的主张”。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强调这是目前迫切重要的任务，并对党、政、军、民机关提出了精简人员的具体要求。

毛泽东高度重视“精兵简政”，不仅亲自领导制定了精兵简政大政方针，而且多次在不同场合演讲，或批文、著述，赞扬、宣传精兵简政。1941年11月，当李鼎铭递交精兵简政提案时，有人出来反对，说提倡精兵简政，部队就不能

发展，有人甚至怀疑李鼎铭的诚意。但毛泽东却极为推崇这个提案，他把提案中的主要段落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说精兵简政“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①。在参议会讨论精兵简政议案时，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精兵简政政策推出后，鉴于“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毛泽东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从理论上阐明“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再次强调“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阐明了实行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一、精兵简政是克服物质方面严重困难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来认为，1941年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五个年头。五年来敌后抗战的结果，使我各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域犬牙交错地存在着，敌寇依据着铁道、公路、据点包围着我们，我们则依靠广大的农村包围着敌人，形成彼此包围的对峙局面，进行着拉锯式的反复战争。抗战初期那种长驱直人进军敌后的蓬勃发展形势，已经成为过去。今后的问题在于保持自己的力量，克服严重的困难，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而1941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它既接近着胜利，但又有严重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③ 它突出地表现为：日伪军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逐步“蚕食”，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对解放区进行封锁和夹击，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解放区军民面临着根据地缩小、人力财力减退这一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要战胜这一困难，我们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紧缩自己，保存力量，渡过难关，准备将来的反攻和更大发展。

第二，精兵简政是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由于敌后战争频繁，战线不固定，部队和政权机关的流动性都很大，庞大的机构和过多的非战斗人员会造成行动不便，影响作战，为战争环境所不容。只有紧缩机构精简人员，保持部队的高度灵活机动，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第三，精兵简政是休养生息民力，解决“鱼大水小”矛盾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人民的财富有限，

① 转引自《毛泽东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0—88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1页。

如果兵多政繁，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发生“鱼大水小”的矛盾。倘若“竭泽而渔”，根据地的物力财力濒于枯竭，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区军民便会失去“生存条件”，抗日战争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在这种严峻形势面前，只有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才能克服根据地所面临的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休养生息民力，坚持敌后抗战，才能“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①

总之，精兵简政政策，“是根据全面考虑得出来的一个切合于敌后今天的实际情况，而又照顾到将来发展的政策”②。

毛泽东还系统地提出了精兵简政所要达到的五项目的和要求。他指出：“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③ 所谓精简，即行政工作抓中心，行政机关求精干；干部使用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财政工作要“取之合理”，“用之得当”；军事上要把重心放在强化地方军和发展民兵方面，并提高主力部队的战斗力。所谓统一，即克服“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④ 所谓效能，即发掘潜力，提高工作效率，加强部队战斗力，使政权机构和部队成为身体虽小但更加扎实的“孙行者和小老虎”，以更好地对付并最后战胜“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⑥ 所谓节约，即减少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增加生产的收入，“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机关尤其要注意”⑤。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即反对一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坏作风，当时主要是反对“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上述五项要求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并且对党、政、军各个系统均适用。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⑦。

精兵简政的政策提出后，其贯彻实施工作成为各抗日根据地 1941 年冬至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82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5—896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83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6 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6 页。

1943年底整个工作的中心环节。各抗日根据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建立了各级领导机关的编整委员会，统一领导精兵简政工作。各边区政府制定、发布了有关简政的实施纲要、整编方案等文件，并根据三三制原则和精兵简政政策，颁布和修正了各级政权组织法。在简政工作中，各地实行了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人民负担的简政方针，采取切实措施裁减骈枝机构和多余人员，抽调有能力有文化的干部充实基层，以提高区乡政权的工作效能，克服人浮于事、头重脚轻的弊病。简政后，政府费用明显减少，各边区征收公粮的数量相应下降，人民负担大为减轻。同时，政府工作面向实际，效率大为提高，工作互相推倭、议而不决等官僚主义作风得到清除，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从而最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精兵简政政策的施行，对于克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五章

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到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一、“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一)“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政治主张的提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形成，不仅是建立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其思想发展上也有一个过程。抗日战争初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促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我们党和毛泽东曾提出，以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为基础，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形成所走的第一步。我们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就不能不首先探讨他曾提出过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大主题一是抗战，二是建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肩负着合作抗战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合作建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抗战建国主张；与此同时，国民党亦在1938年3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行”，“共同努力于三民主义之实现”。抗战初期，各党派对于抗战建国同时并行并无分歧。但是，在如何建国及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的问题上，各党派从各自阶级的立场出发，纷纷提出自己的建国方案，都试图以本阶级的意志去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毛泽东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下，从坚持团结抗战、维护民族利益大局的前提出发，代表中国共产

党提出了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表示：“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①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明确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随后，毛泽东在阐述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时提出“现在的急务在谋三民主义的实现。”② 在回答合众社记者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的提问时，毛泽东回答：“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③ 他还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国共两党不仅能合作抗日，而且能合作建国，三民主义“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其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我们同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并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全部彻底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

抗战初期，毛泽东先后使用过“三民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新三民主义共和国”、“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革命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等不同的概念。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系统阐明了现阶段党在抗战建国问题上的政治主张，正式提出了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主张，他指出：“虽然我们的党还在一九二六年的九月间，就公布了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案，虽然中央同志曾经多次的说明过这个问题。但外间对于我们的主张仍有许多不明白的。这是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问题。抗战的结果将怎么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4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样呢？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那么，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共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护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①]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概念，但是，很显然，他所说的三民主义是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的新三民主义，而决不是为国民党所篡改的三民主义，正因如此，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②]

毛泽东关于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构画，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并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毛泽东将他设计的这个国家称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页。

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而奋斗。

（二）对“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性质的论证。

关于“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问题，毛泽东曾多次作过论述。

早在1937年5月3日，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即指出：“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许多同志已提出来了。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① 抗战初期，毛泽东在正式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后，沿袭了这一基本思想，他一再指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所主张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② 也就是说，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③ 他认为，中国革命从鸦片战争以来，始终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而“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尽管“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不同的性质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各有其特点，然而通体看来，无一不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抗日战争也同样“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中国革命的性质便决定了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完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它的前身是封建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从封建社会来，要到社会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
② 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富克难先生之谈话》，《解放》第45期，1938年7月23日。
③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义社会去，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则是为了完成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这个民主主义社会具体来说，“就是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同的，但同时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但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则还是容许资本家存在”。那么，中国是否永远都要保留私有制度呢？毛泽东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不要的，而且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他作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说明；“苏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他走，‘前头乌龟爬烂路，后来乌龟照路爬’。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一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目前阶段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起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明确回答了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性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共和国；前途——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简单地视为一般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已无力完成，须靠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因此，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是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①]，它“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②] 这就表明，毛泽东所构想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尽管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但已经不再是那种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旧式民主共和国。而且，在这个民主共和国里还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抗日民主政权，它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实行新的民主制度”。[③]

(三)“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及实施构想。

如何在中国建成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按照毛泽东的构想，并不是要推翻现

① 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中国青年》第6期（1939年）。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83页。
③ 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解放》第2期，1937年5月1日。

有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着眼于改造现有政权，要通过民主改革，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改造成为真正实施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1937年5月，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之下，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独裁专制政体，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国民大会选举与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改变为民主的选举与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①] 那么，怎样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呢？毛泽东指出："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他特别提出："民主运动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条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②]

毛泽东非常注重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认为召开国民大会是中国政治制度"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桥梁"。[③] 召开国民大会本是孙中山的建国主张，按照孙中山的建国理论，"训政"为期6年，然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8月宣布实行"训政"。1932年12月15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于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但未能如期完成。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议定延期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36年10月15日，国民党又以"国大代表"来能如期选出再次延期。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当时，毛泽东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任务，主张"全国应参加国民大会"，并明确表示，"共产党是准备参加的"。同时，他也对国民党一党包办选举国大代表，拒绝开放民主，实行普选提出了严厉批评："南京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和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则国民大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① 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解放》第2期，1937年5月1日。
②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解放》第4期，1937年5月24日。
③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解放》第4期，1937年5月24日。

因此全国应联合要求南京修改其不正当的规定。”他呼吁：“国民大会的选举，应由人民参加，他的召集与开会，应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务应不限于谈宪法，而须展扩到彻底而具体的讨论抗日救亡的方针”，从而，“使国民大会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务”，[①] 肩负起中国政治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使命。

七七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号召坚决抗战，反对妥协的同时，更为迫切地提出了开放民主，改革政治机构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他在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纲领中，明确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主张，他先是提出“容纳各党各派及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汉奸分子，使政府与人民相结合”。[②] 接着，又将这一主张完善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③] 他认为，国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④]，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参加，实行民主集中制，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同时，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⑤] 这样一个政府实际就是一个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府，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的纲领便是“孙中山先生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正是“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毛泽东一方面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在发动民众与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⑥] “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政府”。同时真诚地呼吁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改造政府和军队，实行真正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他指出：“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三民主义十大纲领的实行，没有一个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政府是不可能的”。要求国民党当局下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与军队的制度，[⑦] 他认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符合于客现的需要

①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解放》第4期，1937年5月24日。
②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解放》第12期，1938年8月15日。
③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中国图书发行公司，1951年10月。
④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解放》第12期，1938年8月15日。
⑤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中国图书发行公司，1951年10月。
⑥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中国图书发行公司，1951年10月。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0—371页。

的”，并表示：“这个改造的责任，我们尤其盼望于蒋介石先生”。①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对于民主共和国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及如何实现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说明。他指出，“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与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这种组织形式“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与政府制度”。他解释道，“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跳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面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个有利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认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总结已经证明，无论平时或战时，民主集中制都是“最好的组织形式”。

如何实现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制度与政府制度呢？毛泽东表示：“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与军队制度”，并提出：“为了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已宣布停止原定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毛泽东认为“那个停止是对的”，因为“那个大会按国民党规定是一点权力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及社会各界都不同意这样的国民大会”。为了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召开临时国民大会的主张。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同已经停止的那个大会“根本不同”，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与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他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临时国民大会的召开，将使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同时，毛泽东

① 毛泽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解放》第18期，1937年10月2日。

还表示："我们是主张普选制的，因为只有普选制才能彻底的表现民意。临时国民大会是一种过渡方式，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不许可从容的选举，目前也没有保证选举出于民意的条件。此时求其能够比较的代表民意，还是依照孙中山在世时候的主张，由政党军队与民众团体各自推出代表的好。这个办法，当然与普选制有区别，我们一定要达到普选制，这个办法仅是到普选制去的桥梁，然而他是当前比较最好的办法。"①

毛泽东希望能够通过召开临时国民大会来改造政府，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这是当时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可行之途，但这一主张并没有为国民党当局所接受。对此，毛泽东表示，共产党对于采取何种方法"并无成见"，"只要真正有利于抗战，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②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为民意机关，作出了开放民主的姿态。毛泽东一方而表示积极鼓励，同时，进一步督促国民党加快开放民主，改良政治的步伐。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将"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作为"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提了出来，其中心内容就是改造政府，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如保证国民参政会工作的顺利进行，将该会议决事项全部付之实施，并认真的建立各省各级地方参政会，推进民主政治；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内之充分实施；从战区与敌人后方开始实行多量的民主制：民选各级地方政府再由上级加以委任、战区各级政府采取民主集权的委员制，并设立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等等。③ 总之，当时毛泽东是希望通过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民主改革这样一条途径，来实现在中国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的。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他一直对此抱有很大希望。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谈到："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建国方案的基本构想是：以孙中

① 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解放》第23期，1937年11月13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为共同纲领，各党派合作建国，通过对现在政府进行民主改革的方式，逐步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改造成为彻底实现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性质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它已不是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具体来说，是一个各党派联合的政府，其政权组织形式采取民主集中制，“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其发展前途必然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构想，应该说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雏形。

毛泽东关于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既符合广大人民要求抗日民主的愿望，又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并有可能为各党派共同接受的惟一可行的建国方案，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全国各派抗日的政治势力、将各族各阶级民众凝聚在同一而旗帜下，统一在同一个政府中，并为战后中国走向真正民主化奠定基础。但是，这一建国方案能否得到实施，主动权并不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手中。如前所述，这一建国方案是通过对现政府的民主改革来实现的，而且，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现在并不参加政府。这实际上把自己摆到了客体的位置上，只能起到推动、促进和督促的作用，而关键则在于执政的国民党是否愿意接受并实施这一方案。事实上，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的。他们不仅拒绝了这一建国方案，也顽固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的主张。进人 1939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肯进一步进行民主改革，而且将抗战初期开放的一点点民主也收了回去，重新走回了独裁专制的老路。这样，毛泽东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建国构想就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实现了。

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形成。

抗战初期，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的确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抗日政策，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但是，国民党从来就不曾

准备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制度及改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政府便迅速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民主。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在中国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法西斯专制主义，并诬蔑积极主张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共产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辟垒，分化统一，破坏团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紧接着，国民党在1939年上半年又开展了一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肆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以巩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一人独裁；他们以三民主义为幌子，大肆攻击共产主义，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一切革命都已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

在国民党开始转向反共后，曾经和共产党一起积极争取民主政治的中间党派也产生了动摇，其右翼甚至为国民党所利用，参与了对共产党的理论“围剿”。如国社党领袖张君劢于1938年12月10日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主政权和抗日军队。

此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突出地表现了两面性格，他们对国民党的转向也是不满的，但是，他们又害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达到改善他们政治经济地位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他们以“调和党派关系”的第三者面目出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如乡村建设派领袖梁漱溟提出的“一多相融”、“透明政权”方案，国社党领导人罗隆基提出的“多党制”与“公开政权”方案等。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了国民党提出的“国家至上”、“一个主义”的宣传，攻击共产党“把持地方政治，分裂国家行政”，指责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这时的国内政治局势，正象毛泽东指出的：“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方去，又成为问题了。”①

面对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中国向何方去”的问题，具体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说，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抗战初期，毛泽东曾代表中共提出与国民党和各党派合作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方案，很显然，这一方案是被执政的国民党拒绝了。那么，中国的前途是什么呢？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或是中间党派的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抑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国家形式呢？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所处的时代的科学分析，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中间党派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明确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①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在论证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概念的同时，再次强调了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他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②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正式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649页。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①

那么，这个"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他认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他还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最后，毛泽东宣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② 至此，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式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正式确定下来。

(二) 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和政体的分析。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理论是构成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和新民主主义的政体理论，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思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所谓国体，乃是指国家的阶级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任何国家都实行一定阶级的专政，不同阶级的专政形成不同的国体。毛泽东指出："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接着，他具体分析了各种类型的国体："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① 中国现阶段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自然应当采取"第三种形式"，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② 他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级构成，突出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③ "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④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毛泽东认为，"他们虽然在1927年以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页。

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① 因此，他们也是构成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几个革命阶级之一。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由于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异常软弱"，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他们"都不能解决"。② 因此，他们不可能担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导责任。同时，毛泽东还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③

在这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国体作出了完整的表述：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构成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阶级基础的4个革命阶级，概括而言，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④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国体理论的论述，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强调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的领导地位。尽管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毛泽东突出的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在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是新民主主义国体的一个基本特征。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也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肩负起领导责任，因为"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①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不可能肩负起这一责任的，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② 因此，"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国家的基本阶级构成是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③ 这一认识，较之于抗战初期毛泽东阐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方案有了巨大的飞跃。尽管有时毛泽东仍然使用"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概念，但其内涵显然已经有了质的不同。

第二，突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统一战线性质。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④ 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阶级的专政，而是几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区别于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统一战线的国家形式呢？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在他的论述中，实际对此有着明确的答案：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他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⑤ 中国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它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67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他特别强调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认为：“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① 既然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奋斗才能成功，既然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基本的革命的动力”，那么，理所当然地，现阶段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毛泽东非常重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形式，一再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② 这种合作，显然包括了合作抗日和合作建国。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就是统一战线的政权，他说：“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③ 他认为，这样一种统一战线形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④

第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种过渡性的国家形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是过渡的形式”，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⑤

这一特点，是由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而中国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6页。

主义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又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所以，“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过渡性，也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过渡性。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论述中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从此，中国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因此，尽管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由于它“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①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样一种国家形式正是中国革命由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桥梁。

第四，新民主主义国体理论的又一个特点在于它所表现出的坚决的革命性。毛泽东在论述国体问题时，批评资产阶级总是隐瞒国体的阶级性，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他说：“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② 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的联合专政。”一切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阶级、阶层和人们是被排除在外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种国家的性质应该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这样一种坚决的革命性，是以往任何资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71、6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阶级民主主义国家所没有的。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国体的论述，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他还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问题。他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

政体是与国体相适应的。那么，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应当采取怎样的政体呢？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这种真正的普选制，较之于一般资产阶级的民选制更为民主，因为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有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限制，实际上把广大人民排斥在政权之外，而"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一种"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他将这样一种政权组织形式，称之为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对此早有论述，他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

在上述对于新民主主义国体和政体问题全面论述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思想作出了基本总结："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应当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国构想与抗战初期提出的三民主义共和国方案颇为相似，毛泽东本人甚至也没有严格地将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在论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时，常常代以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概念。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否就是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呢？

回答是否定的，无疑，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构想是在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方案基础上的发展，二者的联系和继承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政体问题上的主张几乎没有区别，对于国家的阶级构成也基本一致。但是，二者的

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确立了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判断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当然要看它是否是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政权，而最主要的是要看它是否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最本质的特征，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重大区别也正体现在这里。其次，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很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促使国民党进一步开放民主，加强统一战线的团结与巩固，具有政治策略的色彩；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建国方略；再次，二者在实现的途径上也是不同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方案的基本出发点是要改造旧中国，即通过民主改革，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专制政府改造成各党派、各阶级参加的民主政府。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基本出发点则是要建设新中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中国。由此可见，尽管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方案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它本身还未形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科学体系。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形成的标志是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的形成，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它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在政权上的交替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科学构想，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同时，它也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为中国人民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

三、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

（一）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其目的是企图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地位确立下来。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宣言，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年9月15日，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报告了4个半月以来国共谈判的经过以及失败的症结所在，并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拒绝和阻挠。他们先是拒绝在国民参政会上进行讨论，后来又采取种种措施，压制民主联合政府的宣传和组建工作。然而，由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要求，因而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很快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人民的普遍呼声。

历史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建什么国的问题又一次突出地提了出来。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就可以看到联合政府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个报告和大会开幕词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①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而奋斗。”② 作为这种新中国的政府形式就是民主联合政府。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民主联合政府呢？毛泽东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

民族矛盾即将得到解决。但是中国内部仍然不团结，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因此，中国急需成立临时的民主联合政府，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动员和统一全国的抗日力量，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再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政府，领导解放后的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全国人民翘首以望，迫切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从国际上看，抗战胜利后，苏美英三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已达成某种妥协。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一致同意扶助国民党政权，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开放政权，成立一个包括各党派在内的在蒋介石控制下的联合政府，企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尽管它们提议建立的联合政府与中共所要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不一样，但它们的态度对中国政局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欧洲有 17 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包括共产党在内或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也给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榜样。

从国内来看，由于蒋介石集团始终没有退出抗日阵营，因而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对国民党蒋介石还抱有某种期望和幻想。一些中间人士也表示不赞成彻底否定国民党和蒋介石业已存在的统治地位，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民主改革还不能采取完全撇开或绕过国民党蒋介石的方式。因此，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①

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看，抗战以来，党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与国民党相比，仍然处于劣势。因而，党的民主改革目标的确定，必须考虑到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抗战胜利前后阶级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决定了在当时条件下党不可能通过和平改革直接过渡到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必须"走些迂回的道路"，② 这就是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总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9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61 页。

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①

(二) 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和纲领。

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他指出，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是纯粹的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当然，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②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现阶段的一般纲领。这个一般纲领要求：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三者组成，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原则；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推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根据这个一般纲领，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这些纲领包括：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给予全国人民以民主权利；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取缔官僚资本，扶助民间工业；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取消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改善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华侨，等等。毛泽东认为，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③ 这样，毛泽东就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任务直接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5页。

那么，民主联合政府是什么性质的政权呢？毛泽东认为，不论是临时性的联合政府，还是正式的联合政府，都是为了“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① 因此，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不能由任何党派或个人包办，必须通过召开党派会议，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商，制定出各方认同的政治纲领，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而各党派联合的基本原则是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就是民主联合政府赖以成立的基础。

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阶级性质，毛泽东认为，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必要的，但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独占。他明确指出：“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② 他还认为，各国采取何种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都是历史形成的。他以俄国为例指出：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于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③ 可见，所谓民主联合政府，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政权形式。

如何建立这样的民主联合政府呢？早在 1944 年 10 月，周恩来在阐述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时，就曾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和步骤：第一，组成联合政府的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第二，国民政府应予最近期召开成立联合政府的国事会议；第三，在这种国事会议上，必须通过切合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2 页。

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从而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错误政策；第四，在各方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联合政府应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胜利；在联合政府成立后，立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实施。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和步骤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人民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是内战的祸胎。因此，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全部主张。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民主联合政府既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要实现的反映最高纲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也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要实现的反映一般纲领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而是一个在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后建立的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共同组成的民主联盟。民主联合政府虽然不同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但却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坚持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正确方向。它虽然包括国民党在内，但由于建立的前提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地位，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创造了基本条件。它虽然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有一定距离，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能够保证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仅意味着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而且意味着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改弦更张。因此，如果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可能保持下去，中国社会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党也将获得通过和平斗争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条件。总之，抗战胜利前后，成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局显示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的条件下，在充分准备应付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同时，争取避免内战、用和平方式改革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所作出的一种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为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的反映，既有它本身独立的内容，又带有争取国内外舆论，教育人民，揭露美蒋政治阴谋，孤立国民党内的独裁者，争取时间以准备和坚持武装斗争等策略上的考虑。同时，将国民党包括在民主联合政府之中，这样做，既是为了争取国内和平的实现，也是出于在双方力量对比我居劣势条件下的一种策略需要。

当然，也不能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仅仅看作一个策略性的方针。因为成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的一项基本主张。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公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先后提出过包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的阶级、党派、集团和个人在内的国防政府、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等口号。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这些口号合乎逻辑的延续和进一步明确化。正如周恩来在中共七大所说："自从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① 同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依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对于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的规定。民主联合政府把国民党蒋介石包括在内，并不意味着要把他们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中划出去，长期保留他们的统治地位。而是在民主联合政府之下，通过对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通过争夺领导权的反复斗争，逐步废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支持他们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毛泽东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既有策略上的考虑，也有战略上的考虑，体现了战略和策略、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三）坚持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夺取全国政权。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十分真诚的，并且是准备努力促成其实现的。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的积极工作，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代表大地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1页。

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一反映全国人民利益和要求的正确主张，并且不断地采取措施，遏制这一主张的实施。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民主联合政府没有能及时建立起来。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甚至用内战的炮火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一主张作了回答。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得不对原来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作某些重大调整。鉴于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自己走到人民的对立面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又及时地确定了成立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奋斗目标。

1947年6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且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适应战局的这种变化，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里所讲的民主联合政府已经将蒋介石排除在外。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作了解释。他指出，这个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从表面上看，排除了国民党蒋介石，革命的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是在实际上，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内战之后，只是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在抗日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他们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现在不同了，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因此，过去的民主联合政府应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现在的民主联合政府将蒋介石和国民党排除在外，都是正确的。毛泽东还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坚持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因为它是一个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① 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此时的民主联合政府，与内战爆发前的民主联合政府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如果说，内战爆发前的民主联合政府，只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范畴，只是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政治纲领的话，那么，现在的民主联合政府，就已经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形式了，已经是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政治纲领了。这不仅表现为新的民主联合政府已经排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且还表现为无产阶级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处于领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建立不包括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的政治目标，成为毛泽东国家政权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转折。

1948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建立不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识。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民主联合政府的阶级性质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参加这个革命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因此，“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① 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表示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新的政协会议，其他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随后，毛泽东又分别致电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后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都讲到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将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直至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中，仍然坚持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他认为，只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页。

有成立这样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他还指出，目前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国人民应积极促成这个政府的成立。而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心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最后，他还喊出了“民主联合政府万岁!”的口号。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全面内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间内，一直是坚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的，只是这时设计的民主联合政府与内战爆发前设计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内涵上有所不同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虽然没有再提起，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放弃了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情况及其实施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政策来看，完全可以说，它们实际上就是以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把坚持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同夺取全国政权紧密联系起来，及时提出了建立全国政权的战略决策。1947 年 6 月，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初，毛泽东立即向全党全国人民阐明了关于建立全国政权的任务。在 10 月 10 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并且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及时地制定了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纲领和政策。1948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对即将在全国建立的人民政权的性质、组织形式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初步完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代替被打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新的国家机器的设计工作。当时，夺取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何时建立全国政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毛泽东在 3 月 20 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中，作了这样的预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

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①

直至1948年11月，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以后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新形势，对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指出从1948年11月起，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来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正是基于对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在1948年底正式提出了夺取和建立全国政权的战略决策。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正式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② 1949年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一决策。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工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会见民主人士时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就要垮台了。这个时假如果我们还不去建立新政府，在中国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抓紧夺取全国政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9年4月20日，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6月15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起来。

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来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1948年底，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及时组织并且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实施了这一决策，并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国家学说的伟大胜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9页。

第六章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系统论证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一、“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形成。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集中总结。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28 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专文，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作了系统地论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建立在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实践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概念是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们知道，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到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百般宰割东方沉睡的雄狮。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这期间，尽管人民的反抗和斗争绵延不断，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但先后都告失败了。以孙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80 页。

山为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清王朝的最后统治，废除了帝制，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使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旧式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新阶段。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没能发动广大劳动人民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结果使革命夭折。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落到了被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以北洋军阀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手中。大资产阶级后来也走上了叛变革命和反人民的道路。所有这些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在近代的中国，这个旧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走不通。关于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① 因此，“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但是，当时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不仅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比如工人阶级虽是先进的革命领导力量，但是人数很少，力量很薄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受压迫和剥削十分深重，虽然成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分散于广大农村，组织得不好。中国的资产阶级内部构成比较复杂。它被分化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或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由于它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政治态度各异：小资产阶级成为了人民革命的重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具有两面性，随着革命形势变化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而大资产阶级一般则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附庸。这样，就形成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特有阵势：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它有可能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团结力量，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了民主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其性质只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要求建立的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以此作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1949年10月1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伟大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民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认为，把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① 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以新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以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形态和科学的体系建立了起来。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一个东方大国的土地上诞生。

（二）国际人民民主潮流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从整个国际范围内来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属于20世纪30、40年代以后兴起的国际人民民主潮流的胜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民主新潮流紧密相联，互相促进。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理论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际人民民主潮流的历史经验。

在本世纪30—40年代，伴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争取人民民主的潮流在欧洲乃至世界逐步兴起。后来，通过世界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战争，使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发展壮大起来。基本事实是这样的：早在1933年，德国共产党率先提出，用"组成一切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同年，法国共产党也明确提出了"只有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才能击溃法西斯"的主张。1933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扩大）全会确认：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不仅是革命工人阶级的神圣事业，而且也是广大劳动人民和民主阶级的事业，各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必须要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欧洲的人民抵抗运动也随之全面开展起来。它不仅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群众运动，而且它也成为了各国人民争取人民民主，建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革命运动。各国社会中各种进步力量，在民族联合阵线的旗帜下，建立起了为争取人民民主政治权利的政治运动。各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成为这一阵营中的重要领导力量和中坚斗士，形成了有战斗力的各种联合阵线的政治集团。这就为后来欧洲各国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很注重总结这些新的历史经验，提出以建立一种“新的人民民主制度”，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过渡。根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特·哥特瓦尔德的回忆，斯大林也曾经认为，随着希特勒的失败，一条新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打开了。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东欧先后建立起了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8个人民民主国家。它们的胜利的经验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也应该被理解为是对这些国家新鲜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的深人思考。它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争取人民民主，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三）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纲领，总的说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介绍而得来。据文献记载，是由党的一大代表李达最先在1921年1月发表《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8卷第5号）一文，比较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他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第二条第二款中明确写道：“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② 自然，毛泽东作为党的一大的代表也是接受这个纲领的。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第一个党纲领中“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与当时共产国际直接参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活动分不开的。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加人共产国际的条件》提纲，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党，“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

①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无产阶级专政》，载《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第27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第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①]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声明自己忠于共产国际的纲领和条件。于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所决议案》，宣布"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②]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总的政治路线来说，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理解了自己的一般历史使命，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说，这就是"五四"时期探索中国社会改造道路的新突破。但正如李达在后来回忆中所说的，"'一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路是肯定的，但革命以后怎么办就不知道了。"[③] 因此，党的"一大"纲领所表述的不过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般原理和原则，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不够好。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建立怎样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模式，当时还不可能、也来不及解决。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摸索、在理论上创新的过程。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表达过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东方共产主义者面临的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在那里，农民是劳动群众中的大多数，要反对的首先和主要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解决这种任务的方法，无论哪一本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必须根据欧美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严格遵循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在国家问题上不断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探索着中国式的国家理论和革命道路。正如本书前面各章所叙述的那样，毛泽东自己的国家学说经历了从民众共和国——工农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演变。

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的选择，表明了毛泽东身体力行，坚持自己一贯倡导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9页。
③ 见《"一大"前后》(一)，第53页。
④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的伟大理想，必然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他曾经明确地说过："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的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十分明显，这个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趋向简单化的事实提出来的。在那里，"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 但是，中国的国情则完全不同。关于这一点列宁曾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有所阐明。他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虽然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而这里的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就不仅要依靠农民，也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受列宁这一光辉思想的启迪，开始学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独立地分析。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一系列文件，是这种独立分析的最先尝试。在中国革命发展战略上，开始提出了分两步走的主张，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为了使自己的纲领和理论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改换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来代替。并提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 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到主张实行"劳农专政的政治"、"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纲领作了第一次新的选择。历史地看，这当然是党政治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党当时还终究处于幼年，在对待无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上，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阶层的战略策略问题上，认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理论局限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77页。

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是建立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正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深刻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道路、前途，把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形成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国家理论。所以，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毛泽东的头脑中所固有的。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逐步形成的，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痛苦摸索的过程才得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它只有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不断被认识，最后终才由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加以科学地提炼与概括，形成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也就由之坚实地建立了起来。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起来的专政。"① 这样，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实质与特点随之被揭示了出来。中国人民选择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道路，是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由中国近代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所必然。

(四)"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形成

为了深刻理解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理论，有必要在这里就"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新的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一番考察。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回顾，他说："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作。"① 但是形成人民民主专政的系统理论，主要是毛泽东的功劳。研究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的概念，不能不研究毛泽东本人在这一的思想由来和发展。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意味着在中国已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② 同时，标志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国家理论上成熟和创新的成功。我们知道，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在于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民主。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首先与"人民民主"的概念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不仅有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而且，也与他本人所追求的人民共和国国家模式的理念分不开。我们在本书的前五章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进行了系统地论述。

毛泽东早年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和提出了建立"民众国家"的主张。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国家属于民众。人们从这里已闻到了他的人民民主思想的浓郁气息。大约在 6 年之后，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自己的原本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人民民主思想，彻底地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基础之上；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国内各阶级关系的变化，根据党的决议，毛泽东在苏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关于"工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1935 年 12 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为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并确认："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③ 因此，"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势力的阶级"。④ 关于人民民主的国家的实质，在这里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了；1937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民主共和国"或"统一的民主共和国"⑤ 的口号。毛泽东在解释其性质时指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

①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8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9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0、262 页。

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①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立足点。

毛泽东首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一词，是他在1939年5月4日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的。他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称为"人民民主革命"，② 把要建立的国家称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所要实行的政治制度叫"人民民主主义制度"。③ 同年冬季，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谈到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时，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④ 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民主，不是一般的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中国人民大众的民主。

人民民主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并不是指一种空泛的意识观念。而是指的必然要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以新型国家政权作保证的政治制度。列宁说过，"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⑤ 因此，毛泽东必然要把人民民主与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就在上述的文章中，毛泽东又说："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⑥ 这里几乎把"人民民主专政"最实质性的思想说出来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关于这一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更为系统和完整的论述。

把"人民民主"与"专政"联为一词，作为新型的国家概念，应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首创。就现有党的文献查明："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页。

先出现在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为重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章时所写的前言中。[①] 接着，在1948年9月8—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自己首次正式使用了它。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②] 11月，毛泽东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论文中声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③]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民主专政”与“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是同一意思。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中国人民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④] 这里，是毛泽东首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并与“共和国”加以连用。此后，在党的文件和毛泽东本人的著作中使用这一词就逐渐多了起来。《论人民民主专政》专文发表，它标志着我们党和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系统论证的完成。

二、对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理论的系统论证

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我们除了从上述大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它的意义之外，还需从1949年所面临的具体历史背景来看。在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关键时刻，有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科学的理论和基本政策的回答。这些主要问题是：怎样认识新的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后，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性质和样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应该占有什么政治地位？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这个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它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对内对外基本政策？以及这个新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怎样？等等。同时，为了驳斥国内外反动势力对即将建立的人民政权

① 转引自林代昭、潘国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48页。
② 《共和国走过的路》（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所发出的种种攻击和诬蔑，为了澄清在一部分人当中产生的误解和纠正某些错误的看法，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系统论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使新的共和国建立之后，全体人民能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基本行动纲领，以便团结人民，继续奋斗。

(一) 论证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精髓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造成的阶级结构的实情。毛泽东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理论中国化，使之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精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其精华之处，就在于它对政治学核心思想所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其主要内容包含有如下三点：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中国化道路。

在人民革命即将彻底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面对这个新生的历史巨人，帝国主义和要被打倒的反动派为此发出了绝望叫嚣，咒骂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是极权主义“独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在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人物中，有些人仍然幻想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有的人则提出轮流执政的主张。一些中间政治势力的代表，则动摇不定，希望走中间道路，要求建立一个带有所谓温和色彩的新政权，建议对反动派要施“仁政”，不要对帝国主义“太刺激”，等等。

所有这些攻击、责难和要求，都可以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待即将产生的新型国家政权应该怎样认识？持什么态度？毛泽东根据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人民革命的胜利必然要导致人民政权的建立；人民共和国“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生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①] 这就是说，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人民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15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只有这样做，才能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将人民解放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因此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人民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就成为了全体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大事。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精髓。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国家问题。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所造成的特有阶级结构的具体实际出发，选择自己的国家发展道路。毛泽东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第二，坚持新型国家本质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我们知道，中国人民所需要和所坚持的国家，不是历史上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问题上坚持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只有通过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才能使人民权力真正回到人民手中，国家才有可能做到逐步消亡。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政治保证。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制度，与历史上产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人民的政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从根本上意味着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人民在国家中的这种不可动摇的政治核心地位，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从这一根本立足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人民国家”。它体现了这一新型国家彻底的人民性。也正是基于这一新型国家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才将之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恩格斯称之为“非政治国家”（或“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列宁称之为“半国家”，而毛泽东则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赋予“人民国家”这些称谓的根本目的，既然突出了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自己国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所享有的主人翁地位，又从国家的政治战略发展上扩大了政治联盟的范围。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明确地、公开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

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①

为了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关于“人民国家”的思想，这里有必要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再作一点说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它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它经济上是先进大机器工业生产力的代表，在政治上肩负着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这一根本阶级特性，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确认：“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②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同其人民性在历史的发展中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主宰世界的决定力量。在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是按阶级划分，但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基本消灭了旧的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在经过长期的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将会逐步走向消灭，社会要走向了大同，人民概念中阶级性也终将归于消失。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自然也就同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完全一致。工人阶级是代表这种历史趋势的惟一进步的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本身就包含有社会性的一面。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作为历史社会范畴的“人民”，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人民民主，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在今后加强民族的团结，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历史进程中，都具有极大的政治包容性。使我国的国家制度，在政治战略发展中形成的社会政治联盟不断扩大，社会基础不断巩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人民性历史的、社会的统一。而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既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先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307页。

进的阶级性和广泛的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新型工人阶级国家的阶级性与人民性最为完满的结合，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的政治奥妙之处。毛泽东的这一体现工人阶级远大历史眼光的政治原则的创新，给人民国家在完成实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艰巨任务中，以无限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第三，坚持国家发展观上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在说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谈及侨民国家的发展和前途时指出："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利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① 共产党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最终消灭国家。他们懂得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他们比资产阶级高明，看得更远。消灭国家是一个时间和条件问题，但是现在还不能消灭国家机器。在当今世界，由于资本主义统治还存在，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建立与加强人民政权，镇压敌人，巩固国防，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暴力机关，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可施"仁政"。毛泽东坚定地号召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② 否则，"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③

毛泽东这里关于人民需要国家是为了最后消亡国家、人民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为了最后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存在的条件的基本原理，不仅澄清了当时人们心目中存在的各种疑虑，而且还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为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指明了光明远大的前途。工人阶级的政治，从其发展的结局，就是经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政治，走向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政治，随着社会走向大同，现实的阶级性政治也就自然回归到社会之中，成为新的表现社会关系的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政治同社会的统一性关系必将最终地实现。

说到毛泽东的这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使我们联想到十年后他说的什么叫“社会政治”的话：“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只对严重的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跟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场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① 毛泽东根据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论及阶级后社会的政治，自然就是非阶级、非国家形态的社会性的政治了。这种新的社会政治，虽然是未来的事情，但作为指导我们用发展、变化观点看政治生活的科学方法论来说，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总之，在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中，从总的发展观看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的高度统一，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政治关系同社会关系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这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政治理论，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政治观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新贡献。

（二）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性质和任务。

关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毛泽东有一个权威性的概括，即“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②。或曰“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③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3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前者是从其阶级基础意义上说的，后者是从其基本的政治职能来说的。而这两个说法又有内在的联系。这一内在联系的核心在于对什么是人民的理解。

什么是人民？毛泽东认为，人民是按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来确定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社会阶级状况，人民主要就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型民主国家中的地位，列宁早已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的领导权和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高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贡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除了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皆可划归人民的范畴，留在革命阵营里与工农劳动者结成长期的政治联盟。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进行了创造性地分析，给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以独特的内涵。使它能适应于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社会阶级结构复杂多变的实际。只要我们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对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能容易得到正确理解的。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它在前期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专政，后期随着革命历史条件和任务的变化，国家政权的性质也要随之转变为实质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整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实质上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①] 因此，"按政权性质讲，按政权的政策性质讲，又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面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②] 关于这一点，刘少奇在 1949 年 7 月再次明确的重申："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在解放前夕和新中国建国初期，党强调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既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范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就是他后来说的，"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是解决

①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5 页。
② 《共和国走过的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21 页。
③ 《共和国走过的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58 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① 这一分析是符合中国当时的政治发展的实际的，于是成为了党的报刊宣传和理论研究的主旋律。当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党内外认识比较一致。

当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随着社会的性质和任务的变化，它的性质和任务也发生了变化。

1952年秋，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社会性质在理论上作了新估量。毛泽东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随即认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周恩来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时期，也就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增长的时期。"② 从这一认识出发，直到1956年6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就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与任务作新的概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但又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不仅工农联盟是它的阶级基础，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党派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机关，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联盟"。④

目前，尽管我国理论界对从1949年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这一段期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还有不同的认识，但如果把建国以后作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历史阶段来看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在道理上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基本任务与职能。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有了明确地阐述，他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页。
②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校出版社，第227—230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245页。

机器，……以此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 在这一总的目标下，毛泽东结合革命即将胜利所面临的实际，就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基本职能作了如下规定：

第一，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是人民国家的基本政治职能。毛泽东说，对人民实行民主，"施仁政于人民内部"，对一切反动派的反抗和破坏实行坚决镇压。坚决驳斥了反动派所鼓噪的"你们独裁"的论调。"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②

第二，组织经济建设，逐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③ 经济建设问题在这里虽然谈及不多、但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

第三，采用民主的方法，教育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清除掉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应用人民政权这个有力武器，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促进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

（三）论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类型的国家，应如何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④ 列宁后来对《宣言》中这一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的表述”。[①]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及时总结了工人阶级新型政权的经验，进一步确认：工人阶级国家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国家。[②] 或曰无产阶级民主制，即无产阶级专政。[③]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意义是指的一种新型国家制度。我们从国家的国体与政体制度两个方面来理解列宁的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则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与专政的内在联系和两者的原则区别。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在表述上的一个发展。是对工人阶级国家民主与专政客观辩证关系最深刻的阐述。

关于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这一点决定着人民国家的本质。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主要就是指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革命力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选举自己的政府，组织自己的国家，建设自己新型国家的政治制度，实行真正当家作主；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的国家要全力保护人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各项民主与自由的权利。用民主的方法，教育人民，正确认识和处理属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

关于对敌人实行专政。所谓人民的敌人，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有所不同。国家对反动派和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里说的“专政”主要是从国家的职能意义上来理解的。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要受到制裁。当然我们说的专政，并不是要把他们一律予以杀掉，而是要分别不同情况，按照国家的法律，实行镇压与宽大、制裁与改造相结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毛泽东十分强调民主方面与专政方面两者的结合。既反对把两者混为一谈，也反对把两者绝然分开。因为，对人民实行民主，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前提；而对敌人实行专政，又是保证人民民主权力的必要条件。“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对反动派和反动分子的反动行为绝不能施仁政”。[④] 如果没有对人民的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同时，也只有对敌人实行了有效的专政，彻底地粉碎他们的反抗和破坏，才能真正保护人民，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正确理解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方面和专政方面的辩证关系，有助于从理论上克服一些人对待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与任务问题理解上的片面性，从而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为后来《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共同纲领》对建国初期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定

（一）《共同纲领》的基本思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宣告成立的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举行。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说道：《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根本大法。也就是说，《共同纲领》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是起着新中国的“临时宪法”的作用。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临时宪法”，这是因为，它是由当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和通过的，它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国策和根本任务作出了原则的规定，成为全国人民的基本行动纲领和法律准绳，并在事实上起到了宪法所应该起到的作用。

《共同纲领》共七章，六十条，贯穿着几个基本思想。第一，确定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继续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及其残余的同时，要努力为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昌盛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第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

民民主专政；第三，坚持发展和扩大统一战线。《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规定，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第四，坚持实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因此，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纲领。

(二)《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国体的规定。

《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国家政权性质，首先在法律的形式上作了确认，序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旨在确保新中国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依据这一共同确定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将新中国的国体规定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从《共同纲领》的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的人民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这个领导权又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工农联盟是政权的基础，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是工人、农民劳动者同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联盟。在爱国、民主的原则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这里，我们还要对《共同纲领》总纲中使用的"人民"和"国民"两个概念，稍作一点法理的说明。《共同纲领》的第四、五条中．使用了"人民"一词，而在第八条中又使用了"国民"一词。这是为什么？应该说，这两个概念

在法理和政治学理上，都是有区别的。一般说，人民是一个国体上的概念。主要是指他们在国家中政治地位。当时，在中国，凡属工人、农民基本劳动群众，和被列为统一战线内部的社会成员，都是人民。在《共同纲领》中，所指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分子，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是人民民主国家的主人。而《共同纲领》中的“国民”在法理意义上，是与“公民”含义基本相通。在当时，它不仅包括了人民，而且包括了具有中国国籍的全体公民（含敌对分子在内）。在《共同纲领》中之所以注意到了“人民”与“国民”在含义上的区别，就是为了更加鲜明地体现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性质。

对于人民的敌人，《共同纲领》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它们属于专政的对象。这一规定，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待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的总政策。

（三）《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政体及结构的规定。

《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了新中国的政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毛泽东早在1948年9月就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她的。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搞资产阶级的三权鼎立。[①] 事隔一年之后，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府和人民联系的最好形式”。[②] 至于“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以后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这个制度是肯定的”。[③] 因此，作为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政体制度理应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在当时，只是因为新中国刚刚建立，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不具备全国普选的条件。为此，《共

① 《共和国走过的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页。
② 《共和国走过的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7页。
③ 《共和国走过的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6页。

同纲领》特地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作为国家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分别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从而形成了中央一级的政权机关。

关于地方政权机关及其建制：根据《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设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大行政区设人民政府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置于中央政府与省级人民政府之间，作为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的代表机关和派出机构。1952年11月，中央决定把大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改称为区行政委员会，代表政务院监督指导本行政区所辖的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撤销大行政区的行政机构，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政权机关体制。这样，我国地方政权机关的组成框架得以基本确立。它们是：省（直辖市）、市、县（市辖区）、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在普选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政权组织形式中，"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四)《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经济结构及其性质的规定。

《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基本经济结构作出了规定：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和发展。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皆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国营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当时的合作社主要是商业性质的、消费的、经销的，以及农业变工合作。毛泽东指出："合作社既有退股自由，股票可以转让，就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它是两重性的，小生产者加入了合作社，

就带有两重性了”。[①]

个体经济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劳动，没有雇工，没有剥削。《共同纲领》关于个体经济虽然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但在第二十六条中提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这实际上承认了个体经济必然还要作为一种经济成份而存在。

私营经济是依靠雇工劳动，有剥削的性质。根据刘少奇当时的解释：其中有的是资本家的，有的是小生产者的。资本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者在国家的帮助下，以机器的条件，可以走向合作，定向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小生产者的发展，也可以走向资本主义，但小生产者本身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②] 刘少奇对私营经济的分析，既包括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也包括了对小生产经济的分析。二者虽然在规模和性质程度上有区别，小生产经济的自然发展就会成长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经济都是私营经济，这一点又是共同的。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合作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包括为国营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的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

针对当时存在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时，经济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国营经济虽然起领导作用，而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大量的。经过1953年开始的“一化三改”运动，到了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而使我国社会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人民政权获得了巩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此外，在《共同纲领》中，还对教育、民族宗教、外交等问题的基本政策

① 《共和国走过的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2页。
② 《共和国走过的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页。

作了明确的规定。

总之,《共同纲领》作为伟大的历史性文件载入了史册,体现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意志和要求,成为建国初期全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基本的建国方略和行动的指南。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就国家学说史方面来说,这个胜利,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新篇章。

四、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理论与实践

(一)对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分析。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东方巨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人民政府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情况和繁重的任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大敌人”,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但在胜利面前,存在很多困难,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比如:首先在军事上,国民党在西南、华南和沿海一带,还有上百万军队进行负隅顽抗;新解放区国民党残余与土匪、苏美恶霸勾结,甚至以武装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帝国主义国际反动势力进行战争叫嚣。因此,人民继续面临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军事任务;为了彻底扫清封建残余势力,需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在经济上,人民政权所继承的是被国民党破坏到千疮百孔面难以维系烂摊子,面临的是生产萎缩,失业严重,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成为了当务之急;对外方面,面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战争威胁;等等。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建设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

展都十分落后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新课题，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和回答了这些问题。除前面提到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所确定的基本战略原则外，毛泽东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和《不要四面出击》等重要的讲话，集中地阐明了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基本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

首先，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逐步实行由军事向经济的战略转移。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从全国的主要地区来看，军事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的严重任务，提到了全党工作的首位。关于这一工作的战略转移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①。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直接成为实际面迫切的中心任务提到了日程。毛泽东代表党中央电告各地，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②

全党首先要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努力做好统一财政、调整商业、统筹外贸、安置就业、治理淮河、生产救灾，并组织、动员军队参加生产建设。这里我们还须提及的是，当时刘少奇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口号，曾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文件（1951年2月），把“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构想加以具体化，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最初规划蓝图。这表明了党的领导核心在建国初期头脑是清醒的，是极为重视以经济建设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

其次，针对新中国面临的复杂斗争形式，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知道，在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互相交错，异常复杂。一方面由于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起来，但另一方面，当时作为主要对象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仍在千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方百计地负隅顽抗。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具体工作策略方针。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讲究斗争艺术，以利于顺利完成主要任务，狠狠打击最主要敌人。这一斗争策略，为解决当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三，规定了建国初期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完成下述历史任务：第一，合理调整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全国范围内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第二，在广大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第三，在城市进行民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第四，进行抗美援朝，反对以美帝国主义入侵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第五，加强民族团结和推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 为巩固人民政权奠定物质基础。

党在完成上述这些任务的同时，自觉地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放在重要的地位，以便从物质基础上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新中国成立之际，面临的是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濒临崩溃的经济烂摊子。

面对着这样虚弱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 土地改革的完成；(二) 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因此，从 1949 年至 1952 年这三年时间，是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的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如上述提到的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保护、利用民族工商业；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所缔结的一切卖国条约；改革海关、统一外贸；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交通、工商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贸易，促进城乡物质交流等。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 1952 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城乡人民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特别是国营和合作社公有经济成分的比重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国民经济的结构发生了有利于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的变化。这些成就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 巩固人民政权的战略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建国方策和战略措施。

第一，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1950年3月，毛泽东发出《征询对待富农策略的意见》，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出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土地改革法》的指导下，土改运动在全国全面铺开。至1952年下半年，全国范围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全国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共分得4600多万公顷土地。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的剥削制度，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

第二，坚决进行抗美援朝，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叫嚣要一举灭亡朝鲜，进而威胁中国。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的完整，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经过三年的英勇奋战，中朝人民军共歼敌109.3万人，其中美国侵略军达39万多人，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抗美援朝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发展国内建设，争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力的保卫了全世界的和平。

第三，镇压反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彻底清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9月接连发出了《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等指示，1950年7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全国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2年，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残留下来的大量反革命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使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经济繁荣的崭新局面。

第四，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之际，党又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开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接着又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了“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等六项

指示，使“三反”、“五反”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到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又取得了伟大胜利。从而有效地打击了不法资产阶级的种种反社会行径，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所有上述方面的实践，和取得的成绩、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理论。

第七章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

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性质

（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1956年下半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正式宣布：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即开始进入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获得了新的性质，成为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中开始用“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谈论我国政权。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指出：“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又明确肯定：“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1962年他进一步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①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中国历史的转变关头及时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作出论断，是很必要的。因为国家政权问题是政治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不仅表现为夺取政权，而更为重要的在于维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3页。

护政权、巩固政权。要维护、巩固政权，首先就要弄清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任务；再者，任何政权都是一定阶级利用来为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的工具，而要正确地运用国家政权，就要准确地把握国家政权的住质。所谓“准确地把握”，就是不仅要把握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性质，而且要把握它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共性和个性。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任务和目标的，这一根本性质是各国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的共性。人民民主专政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共性以外，还具有自己的个性。这主要表现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存在两个联盟，这就是：工农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与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联盟。国家政权机关同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极为密切。国家的重大决策，重大问题，都通过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讨论，认真听取其意见，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较之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民主性质。全党准确地把握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根本特性，就可以防止某些人对它性质的肆意歪曲和权力的滥用。

（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变化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和党中央适时地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作出论断，有坚实的理论依据。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社会经济方面的依据。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动进行了科学分析，确认了这方而的依据。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人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

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①

毛泽东这段论述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其一，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动。这种变动不是在原有社会制度范围内作的某些环节、局部关系上的调整，而是根本质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根本否定。具体情况是，1956 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其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已上升到 32.2%，合作社经济已上升到 53.4%，公私合营经济上升到 7.3%。这三种经济已达 92.9%。资本主义经济接近于零。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上升到 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上升到 32.5%，资本主义工业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上升到 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合作化商业上升到 27.5%，私营商业下降到 4.2%。这些数据表明，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躁和粗糙，遗留下许多问题，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了。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②

其次，人的相互关系的大变动。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大变动。对于这场变动，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八大"政治报告中，作了集中的说明。刘少奇同志指出："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 1949 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了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7—268 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1 页。

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①

党的八大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文件也是毛泽东领导起草的。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自然代表了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自己也明确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②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指出：我国知识界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③ 阶级关系的大变动，说明"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④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1957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阶级关系及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带来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阶级构成、担负的任务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再不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在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议论中，有两种意见的是非需要澄清。一种意见是，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人民民主专政只是形式的区别，实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议论忽略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结构和担负的任务发生的重大变化。从阶级结构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复存在，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由个体所有者变为集体所有者。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再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参加政权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再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关系了。概括说来，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工农两个劳动阶级之间以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2 月份，第 202—203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1 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2 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4 页。

社会主义爱国者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关系。从担负的任务说，1956年以前，它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1956年以后，“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显然，如果混淆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性质，容易导致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忽视和破坏，容易导致我国政治生活的混乱。

第二种意见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如英国的戴维·麦克莱伦写道：“毛超出列宁关于专政只是一个革命阶级的专政的论断，他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性质。”② 这种评论，实际上混淆了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否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所包含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从其共性看，毛泽东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从个性说，毛泽东和列宁生活在不同国家里，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主张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类型和形式也不同。列宁本来就讲得很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④ 因此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三）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依据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有其极为深刻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这个学说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各个领域中的具体矛盾。它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正义性、长期性等奠定了崭新的理论基石。

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一下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

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论证了“两个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的新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把“基本矛盾”仅视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并没有从更普遍、更深的层次上把它概括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更没有可能去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列宁辞世以后，斯大林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60页。
②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27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直坚持“无矛盾论”，到1952年他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不懂得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想法，“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① 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发生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更深的层次上，与他这个时期的形而上学思想直接相关。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贯彻到底，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理论，并且从1956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起，就把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概括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因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以及其他著作中，都透彻地说明现存阶级社会是现存国家的基础，他们主张必须从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上去考察国家问题，坚决反对“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②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规定，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内容、社会一切矛盾产生的总根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规律，这就从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上，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职能作出了深刻论证。因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同整个人类社会一样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其基本内容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由它们构成社会主义有机体。它们的特定内容是生产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以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为核心的上层建筑。那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存在就不是外加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体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得以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到质的规定的基本要素。它的性质当然就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更不能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只能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被概括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仅在于它深刻地论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它使人民民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专政实质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先进性和正义性得到科学论证。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不相适应是次要的、非基本的。在这两对矛盾中，第一对基本矛盾的内容规定着第二对基本矛盾的内容，而第一对基本矛盾的解决又依赖于第二对基本矛盾的解决。而第一对基本矛盾所谓基本相适应，主要是指：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脱离的情况，实现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同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结合；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根本摆脱了在生产过程中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劳动者为自己劳动，人们在国民经济运转中结成了互助合作关系；在分配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主要为社会也为个人所有。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① 这就表明以这种生产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并与之基本相适应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是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需要的，它保护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一致的先进生产关系，因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性、正义性，按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说具有不可抗拒性。

从不相适应方面看，在所有制方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的矛盾，公有制和个体经济以及其他经济形式之间、不同所有制在生产过程中的管理、分配方面也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需要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管理职能才能解决，这就是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从全国规模上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这就进一步论证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反映到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地位，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面使上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优点和特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等理论得到了科学论证。

上述分析可见，我国进人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67—768 页。

的建立，为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作出了新的论证，这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在新时期得到重大发展的突出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论证人民民主专政新性质的上述两个依据，不是彼此孤立的，也不是独立并行的。毛泽东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者，他作出的社会经济的和哲学的论证，是同一方向的两个层次的论证。前者是从社会关系上作出的直接论证，后者是把社会经济关系引入物质生产过程内部，从历史的深处作出的深层论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扎根更深。列宁曾评价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① 这里，我们亦可以借用这个话来评价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

（四）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新变化的意义。

毛泽东在50年代后半叶，根据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及时指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新的性质是很有意义的。第一，从概念的运用来说，在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中，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映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工农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其任务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专政才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那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更详细地谈论这个专政。”② 正如本书第六章所叙述过的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提炼出“人民民主专政”新的科学概念，把“民主”和“专政”结合起来，使人民政权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这就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成熟的形态，在这种高度理想化的社会中，国家已经自行解体和消失。③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917年1—2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等著作中，明确指出：“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59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主义。"① 不过他根据自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② 斯大林在苏联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作出过"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③ 的结论，但是他在长时间内认为，苏联内部只有团结统一而无矛盾冲突，断言"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④ 这种认识和论断自然无助于论断社会主义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与此不同，毛泽东则明确肯定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⑤ 并且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职能及其理论基础作出系统地论述，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三，社会党国际自50年代初成立以来，在一系列文件中声称"国家也并非必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工具。"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独裁政权"，宣扬它们的"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⑥ 赫鲁晓夫相应提出"全民国家"。我们国内也有些人向往"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作出科学论断，有利于帮助人们划清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界限，澄清是非，明辨政治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二、民主和专政互相结合的新构思

（一）新构思及其理论基础。

民主和专政的互相结合，正如本书第6章已论述过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和根本的东西。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中继续重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论及"民主"与"专政"互相结合，无疑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新的内容。

---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4页。
⑥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951—1987）第3、72、5页。

毛泽东认为，民主和专政都是历史的政治范畴，各有自己的具体对象和具体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与专政的正确结合，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发展规律的表现。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民主与专政这两个方面各自包含的内容、相互结合的形式、各方面在国家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会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过渡时期结束，民主与专政结合担负着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是一个被消灭的对象，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专政对象处理，而是把它作为人民的一部分，让它享有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其代表人物还参加国家政权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在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中，他们有的还担任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经济上采取和平“赎买”的方法通过阶级联盟与和平改造的途径，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变革，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处理民主与专政的相互关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社会主要矛盾、国家的历史任务随之发生了变化，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与专政“互相结合”关系进行了新的构思。

新的理论构思是奠立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这是毛泽东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复杂矛盾，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的新理论和新方针。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提出了两类矛盾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种矛盾和两种“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

方法。"① 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出了国际范围内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并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人民内部矛盾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文章还提出对两类矛盾不同的处理方法。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他计划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紧接着在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将他久久的思考化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毛泽东作出的这一伟大理论创造，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使他能够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对民主与专政的"互相结合"进行新的构思。

（二）新构思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在对民主与专政互相结合的新构思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作出了重大的新的理论贡献。

第一，以对待社会主义建设持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为标准，重新规定"人民"和"敌人"两个范畴的内容。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②

第二，在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性质的基础上，确定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③ 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质，是因为它"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51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57—75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57页、第758页。

致的基础上的矛盾。"① 敌我之间的矛盾则相反，它产生的基础是根本利益的对立。因此，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能混淆。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两类社会矛盾是不平衡的，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大量的、经常的。这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② 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确定这个"主题"，在毛泽东关于民主与专政"互相结合"的新构思中，具有战略转变的意义。

第三，确定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这里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分清敌我，按矛盾性质确定解决方法。毛泽东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③ 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专政的第一个作用，是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在毛泽东论述"专政"的作用时，他指出：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对他们必须实行专政。这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利益的要求：他又指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论断同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④ 的思想是一致的。这说明"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在概念的内涵上是不同的。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来说，专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为保证实现人民民主和国家组织社会经济创造条件。毛泽东还强调：行使专政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⑤ 明确这一点，对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使民主与专政"互相结合"具有关键的意义。否则，就有可能把专政手段扩大到人民内部，发生由一部分人民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的危险。

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呢？人民内部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所产生各种矛盾，对于这种是非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58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66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59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35 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60 页。

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① 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有自由和民主权利。即使对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要予以法制的制裁，但是这同对压迫人民的敌人实行的专政也有原则区别。

这里要说明的是，民主制度与民主方法、专政制度与专政方法，本来是不同义的。毛泽东把民主与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两个方法，是从国家管理职能的角度讲的。

第二个层次：按专政和民主的不同范围，确定各自具体实施的方法。

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除了从划分矛盾性质上确定是采用民主还是采用专政手段外，还必须有实行民主或专政的具体方法。毛泽东在对民主与专政关系进行新的构思中，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和方法。

对敌专政的政策和方针有：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利用矛盾，争取改造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顽固分子的政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专政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镇压反革命，要稳、准、狠的方针；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等等。

毛泽东在系统总结对敌专政的经验时，已经注意到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按照法律程序，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压迫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剥削者、破坏者。通过这种总结，丰富了"专政"概念的内容，实际操作性也更强了。

同样，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方法也系统化了。如：把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思想认识上的是与非的矛盾。明确肯定对于思想性质的问题，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人民内部不能由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方法不是不需要法制、纪律和集中。相反，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要求实行自我约束。"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62 页。

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① 发布行政命令，要伴之以说服教育，执行法制的强制性手段，同压迫敌人的专政亦有原则区别。把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面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② 确定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指导方针。

根据人民内部矛盾所表现的形式与状态的不同，相应采取的具体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自我教育、广交朋友的方针，和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平等的原则。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艺术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科学、艺术的实践去解决；对于人民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坚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政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对于人民群众同政府机关的矛盾，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去解决。

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生命线，通过加强政治工作，在人民群众中确立共同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基础。

第三个层次：从执政党的根本路线上确定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相互关系的方法。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相互交织，极其复杂，容易混淆，甚至出现错误处理的问题。为了有效地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外部实行专政，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与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从"总题目"和"方法"的内在联系上，确定了根本的工作路线和方法。1957年7月毛泽东说："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③ 毛泽东这些思想极为重要。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6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9—460页。

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必然坚持群众路线，而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就必然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这就把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相互关系的理论奠立在我们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根本的工作路线上，把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的力量注入到国家政权建设中，这不仅对社会矛盾性质的判断和正确处理提供了保证，而且。保证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正确方向。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以他创立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与基础，在对民主与专政互相结合的新构思中，提出的上述一系列思想，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遗憾的是，“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 后来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问题，这就完全背离了他的正确思想，其结果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极为深刻的教训。关于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还将在下一章有所论及。

三、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历史任务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家的历史任务的大政方略，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作为新时期艰辛探索的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历史上各种剥削阶级的国家比较，其经济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强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7 页。

调这种意义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①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作用是特别巨大的。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他遵循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的原则，就如何发挥人民民主主义专政国家的经济职能，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创新，规划了国家的历史任务。这就是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任务到1962年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确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毛泽东提出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史任务，反映了他多方面的深刻思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提出新的历史任务。1956年9月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对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了新的概括。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 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构想，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③ 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又把"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视为"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的基础，并且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④ 把对待生产事业的态度作为衡量干部是否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说："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工作重心或中心的问题。他说，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继而他在人们称之谓“建国纲领”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要“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② 并将上述指导思想载入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又发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号召。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具体化为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建立在自己应有的而不是异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其固有的规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其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种社会制度才算最终建成并巩固起来。在此之前，这种制度还不能算是巩固的。但是由于历史辩证法的作用，任何新的社会制度在诞生时，虽然自己应有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产生并得到一定发展，但在总体上还是建立在异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因而这种新制度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曲折甚至倒退，发生旧制度复辟的事件，这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后在长达半个世纪至1个世纪里发生动荡的根本原因。因此，国家政权对巩固基础的反作用，除了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的直接任务以外，最根本的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职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从我国社会发展客观进程出发，站在最终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论述建立充分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必要性，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历史任务。他在1957年写道：“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④ 毛泽东当时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时，世界上正掀起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高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13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2页。

社会历史进步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是深谙科学技术对于提高生产力和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的重大意义的。他对聂荣臻说过，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另外还指出，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① 中国在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之后，面临世界现代科技革命的历史环境，必然以追赶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②

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的历史任务，正是建立在对世界现代化科技革命发展的情况和趋势的敏锐观察和了解上的。而且它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迫切感。他写道：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有优越性，结果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毛泽东提出了用五、六十年超过美国，甚至提出15年内赶上英国，赶上美国的口号，这些口号虽然脱离了中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性，以致后来步人迷津。但不能以此全部否认毛泽东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正确性。

（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组织经济、文化建设的大政方略。

毛泽东为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许多重要决策，概括起来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集中反映在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著作中，其主题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为实现这一总目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是要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在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既可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又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从面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片面发展重工业，欲速则不达。我们要多发展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4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49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1页。

些农业、轻工业才更有利于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他指出，为了平衡全国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但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以便有力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他指出，国防建设必须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进行，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展。

第二，他论述了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国家的经济职能，是在一定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实现的。国家经济职能的发挥，依存于经济体制，同时又是保障、推动经济体制的手段。经济体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及其适应程度，也反映着国家经济职能能否正确发挥及其正确程度。我国在建国初期和“一五”时期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由于国家和各级行政机关权力过份集中，各种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①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倡导下，对如何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改进经济体制以利于实际操作方面，在某些具体环节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整个体制没有根本的改变。

毛泽东认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文化不行。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说：“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于那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于。”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指出要争取在三个五年计划内造成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于。这 150 万知识分于包括些什么门类呢？1957 年夏，他又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②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2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62 页。

为了实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思想，作出的上述决策，从现在来看亦是正确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在他领导的28年中，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如《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① 毛泽东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当然也勿用讳言，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他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在总结这个历史教训时，重温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的一段话是有益的。现在我们把这段话引证如下："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因此，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具有远见。"②

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

（一）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思想的提出。

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本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一个新课题。但是就其基本要求看，许多重要内容早已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得到阐发，而且就其思想核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质要求。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初期，毛泽东较多地注意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问题。他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大"就极为关注国家政治生活。"八大"的几个文件都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以此作为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当时总的设想是，要通过发展民主，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我们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下，第804—80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8页。

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必须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 造成这种民主的政治局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通过立法的程序，把人民的民主权利转化为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使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相结合，以进一步推动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二）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律制度。

民主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密切。社会主义法制既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内容和基础，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备程度，则标志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成熟程度，人民的民主权利（不管是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权，还是他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确认。因此，毛泽东当时比较重视法制建设。1956 年 9 月，由他主持的党的“八大”，在决议中明确提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② 以明确说明和保护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所享有的民主权利，人民管理国家的程序，规定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措施。

首先是要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即宪法，为新中国法制化建设奠定基础。1949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 1954 年 9 月以前曾经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继后，1954 年 9 月 15 日至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它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③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在 1954 年颁布宪法以前，创制各种法律 3400 多件，这以后至 1958 年，又有 600 多件。这些法律制度把人民的民主权利初步规范化、定型化了，使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具体法律制度的保障。毛泽东不仅领导制定法律，而且强调法律的实际运行。他反复教育人民和干部要学法、守法和执法。他说：宪法颁布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

①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248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19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10—711 页。

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①] 1958 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特别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点法学”。法律的约束力源于国家权力。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使我国法律得到国家权力的保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到 60 年代初，毛泽东还指出要创制刑法、民法和编案例。

毛泽东在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的过程中，为保证其民主性和人民性，要求一切重要立法都要采取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他指出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就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 800 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毛泽东还依据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关于两类矛盾学说，创制了一条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改造敌人的法制总纲领。这一总纲领一直规定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所有立法和司法的法律强制措施，有利于保护人民及其利益，有利于教育人民自觉地拥护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和遵守革命秩序。同时有利于打击、瓦解和改造反社会主义势力。

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许多明确规定。如我国第一部宪法的《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在确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根本性质以后，在许多条文中，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的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如规定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规定国家要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这些自由；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和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并且规定国家要逐步扩大现在还不充分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权利；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国的宪法和一切法律还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不容许任何人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妨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妨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10 页。

中，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公民享有上述权利，同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依照法律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宪法所规定的这些义务，不仅是每一个公民无例外地必须遵守的，而且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于伟大祖国的庄严的责任感。

（三）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的建立。

劳动人民以主人翁身份，通过各种基本制度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的基本标志。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建和不断完善的基本制度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集中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等等。这些基本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自由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的发挥，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证。这是因为这些基本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如选举制度，我国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年限，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种选举制度与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情是相适应的。我国法律还规定，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从而为选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供了物质保障。选举权还专门规定了对代表的监督权、罢免权和罢免代表的程序。我国选举制度虽然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但由毛泽东当时领导建立的选举制度，从基本方面保证了人民真正能选出自己信得过的代表，并使代表具有广泛性，使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代表都能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参政议政。这里顺便指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必然影响社会生活民主化。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有许多重要论述。如 1961 年毛泽东签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确认它为我国企业管理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基本制度。又如 1960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对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关系，

用民主方式解决各方面矛盾，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有重要指导意义。又如毛泽东十分重视建立群众来信来访制度，以便不断巩固和扩大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待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的态度非常严肃。如刘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要认真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① 总之，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提出的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思想原则及其建立的相应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行使民主权利，发挥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积极性提供了指导和保证。

(四) 反对官僚主义，发展民主监督制度。

反对官僚主义是实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官僚主义本来是伴随剥削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剥削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它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毛泽东一贯坚持反对官僚主义。早在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中就尖锐地批评过官僚主义。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② 毛泽东当时把不顾具体的环境和群众的情绪的命令主义，也视为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全国胜利前夕，面临党的地位即将变化，毛泽东考虑党内可能会滋长官僚主义现象，多次告诫全党，要提高警惕，防止滋长官僚主义作风。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可能沾上官僚主义习气，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及其危害比过去增加了，并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不要滋长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大敌，更加重视反对官僚主义。他主张打倒官僚主义。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活没有，就是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毛泽东认为，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其思想认识根源在于认为“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人民，同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1963年5月29日）中揭露批判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中是非常危险、十分有害的。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呢？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一是要从制度上保证，重视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度。因为光有集中，没有民主，或者权力过分集中，就会发生官僚主义；二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① 党内党外都要坚持这一条。特别是要鼓励人们讲真话，允许人讲错话。毛泽东说：“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② 三是要精减机构。毛泽东说：“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③ 这就会发生官僚主义，因此要精简机构，减人。四是发展民主监督。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和监督之下。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监督。邓小平当时提出三个方面的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党对党员的监督、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共产党员的监督。他说：共产党员“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④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实行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制度，加强集体领导制度，等等。这些都对克服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制度化的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3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34—83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7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

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提供了初步经验。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毛泽东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后来形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些错误使毛泽东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的许多重要思想未能得到彻底贯彻，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被忽视，甚至受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和制度化才加快了进程。

五、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一) 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在自己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关于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原则。1954年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①]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人大开幕词中再次强调：“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195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中又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自己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最重要的两条标准之一。到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现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②]

毛泽东为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1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3页。

位呢?

执政的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除了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之外。与当时国内外存在有一股否定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思潮有关。譬如，在国际上有人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学说；在国内有人欣赏西方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也有人把党对于国家事务方面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削弱党的领导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强有力的回答：关于全民党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① 毛泽东通过对“全民党”的批判，从党的根本性质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

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两党制的人是社会上一种民主个人主义者。他们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宣扬抽象民主、绝对民主。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要求实行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② 毛泽东对西方多党制的批判，说明判断政党的性质、地位和历史作用，不在于政党的数量多少，而在于它是什么阶级的政党，代表和维护谁的利益，保障社会财富掌握在谁手里，保障生产资料所有制及政权真正属于谁。西方的“多党制”实际上是维护资本统治的“一党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多党在政治上斗来斗去，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只不过反映资产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我国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以后，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整个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社会生活资料的分配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制度，已经没有实行西方多党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而我们在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33—834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61 页。

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和基本职能。

关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议论。这些人混淆了两个问题：党对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们以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应当领导这些工作。实际上这是不同的两回事，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国家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政治上说，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的论述，在中国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解决了一个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根本问题。

(二) 党对国家实行领导的内容和方式。

毛泽东不仅科学地论述了“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地位，而且科学地规定了“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①] 的领导内容。毛泽东指出的党的领导内容概括起来，是五个方面：第一，党要领导各级政权组织，包括人大、政府、司法机关，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凡属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然后分头执行。这些政权机构的党组，应对同级党委负责；在政权机构中任职的党员，应执行党的决议，接受党的监督；第二，坚持党对经济建设、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主要是从政治上保证其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而的积极性；第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既然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核心，理所当然地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党指挥枪”、[②] “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③]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军队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条例，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四，党要坚持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我国在50年代初就逐步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构架。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是以这种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6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3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多党合作为基础并由它作支持的。毛泽东在论述党与非党关系时强调“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党的方针”①。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② 第五，党要坚持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群众团体或组织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桥梁。党和群众组织要明确分工，但不能混合。党必须坚持对群众组织的领导，群众团体（组织）必须保证党在群众组织中的领导。

关于共产党领导国家的途径和方式问题。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内容确定之后，究竟党如何进行领导呢？围绕这个党的领导途径和方式问题，毛泽东强调党领导国家要采取“放”的方针，不要采取“收”的方针；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以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党对国家的领导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要通过群众路线的方法，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说服教育群众和干部，统一其认识和行动；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等等。这时期，党中央其他领导根据毛泽东的主张，也大量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如1962年3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集中地论述了实现党的领导的五个问题。从而把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具体化了。周恩来指出：第一，党的领导范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第二，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党员俨然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第三，上下级要有区别。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第四，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第五，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讲外行能领导内行，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90页。

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外行变成内行，要通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①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在国家中领导地位的原理，后来由邓小平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中一个“基本点”的重要内容。当前民主社会主义竭力否定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作用，在这种时候学习、研究和坚持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在国家中领导地位的原理，具有特殊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第八章

对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制度的贡献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

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属于“政体”范畴。它从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并充分体现和维护其阶级本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本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长期政权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历史创造。毛泽东在倡导和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里不说更早的历史，就解放战争时期创立的各届人民代表会议，这些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政权形式，为革命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重要经验。特别是1948年成立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由它选举的政府，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政体。他指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条件所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3年，我国在基层政权普选的基础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677页。

国一届人大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根本政治制度。后来我国的几部宪法又分别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丰富和完善。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倡导和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充分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国家事务，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遵循以下原则进行活动。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由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人民具有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法律地位。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表明的各阶级、各阶层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第二，民主选举原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我国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全国和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 年以后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人民负责，受原选举单位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

第三，最高国家权力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它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修改宪法，制定法律，讨论决定国家一切重大事务。它还可以通过立法活动建立诸如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婚姻制度以及财政、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制度。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遵守和执行的前提下，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有权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务，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机关。我国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这个划分，表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央的积极性，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完全符合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有利于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四，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下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活动要以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地方上重大事情，不得违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法律的制定，全国和地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须经过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民主决定，并由行政机关认真负责贯彻执行，使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得到实现。民主集中制要贯彻合理分工和集中统一的原则。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毛泽东倡导和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后建立苏维埃制度的经验，同时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有根本区别。毛泽东早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① 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原则的确定，保证了我国政体制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一）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

民主集中制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最先是指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而后随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在毛泽东的著述中，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条件，民主集中制范畴有不同的含义。他在国家组织所采取的形式，即政权构成形式意义上使用民主集中制范畴，始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时他在论述政权问题时，称"民主集中主义制度"为"新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②。在江西瑞金时，我们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工农兵代表大会。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时，明确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③ 后来他进一步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

① 《共和国走过的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①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集中制被确定为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正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此民主集中制原则就由国家根本大法确定下来。作为国家机关组织形式、原则和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区别于作为社会公共组织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它是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共命运的。当"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② 的时候，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权力构成、活动原则也将自然消亡。民主集中制的性质由什么决定呢？毛泽东认为，国体决定政体。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性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中，列宁曾经明确区分过两种集中制。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一种是"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③ 列宁认为，由剥削阶级组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对被统治的劳动人民的意志来说，也是一种集中制，不过这种集中制根本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民主集中，毫无统一意志可言，这"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④ 资产阶级乃至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政体，对于人民群众来说，都是这种进行征服和压服的军队的、官吏的集中制。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国情后写道："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⑤ 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政府”。[①] 当然，这种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这种阶级特性，反映在政权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上表现为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就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②]

（二）在国家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一贯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首先，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从党和国家命运的原则高度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很高的原则高度来讲，讲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事实确是这样，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要复辟。”[③]

毛泽东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时期，要把民主集中制提到这样的高度呢？这是因为：

（1）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任务的客观需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史任务是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这一宏伟历史任务，一要科学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二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两个方面都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前一点，毛泽东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④] 这里，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化过程，不是公民的个体行为，而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执政党不断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的过程。而要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民主集中制的统一。即“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0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6页。

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①] 这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尊重科学，民主决策，以正确解决主观指导和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促进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若没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就既不能实行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还会在国家机关的组织关系上，使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这就不可能科学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但人民内部是存在各种复杂矛盾的。由于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都要求在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得到体现，甚至要求政策作某种有利于自己的倾斜。这种多方面的需求和实际满足程度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往往集中地、突出地表现为“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这是由经济的、物质的利益矛盾转化、反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它一般地表现为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只有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这种矛盾，才能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这里最紧要的是，要“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去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②] 这样就能在人民内部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③] 就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其次，“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④]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要实现这个专政，必须以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569 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1938—1965 年)，第 258—262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19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23 页。

专政”。[①] 如若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泛的人民民主，就不能达到人民的广泛团结，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毛泽东说：“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搞乱，还有复辟的可能。”[②] 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民主与专政这对范畴同民主与集中这对范畴既有严格区别又是紧密相关的。本来，“民主与专政”是解决敌、我两个不同领域的矛盾的，“民主与集中”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但是，不能正确处理前一对范畴的问题，就不能正确处理后一对范畴的问题，反过来不能正确处理后一对范畴的问题也不能正确处理前一对范畴的问题。就后者讲，若忽略人民民主一面，过分强调集中，或离开民主讲集中，就有可能发生滥用权力的危险。这种危险或表现为混淆敌我界限，用专政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的一般性错误。或表现为违法乱纪，侵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惩罚打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刘少奇曾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常常用专政的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和说服的办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他们不只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对人民群众有时也实行专政。这样，他们就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人民的地位。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在实际上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国民党专政。”[③] 因此，刘少奇要求明确区分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是就人民的民主和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而言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是只在人民内部实行的制度，不包括人民的敌人。“我们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人民中，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④] 不能独断专行，称王称霸，以免发生滥用权力的现象。

（三）民主集中制的真谛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科学地概括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明确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23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24 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2 月份，第 375 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2 月份，第 434 页。

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①] 毛泽东这段论述揭示了民主集中制的真谛。所谓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是说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包含着民主制与集中制两项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制度。这是毛泽东早就论及过的。贯穿于民主集中制之基本精神就是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有民主就有集中，有集中也同时有民主。民主是以集中为存在形式和保障的民主，集中是以民主为基础、由民主自己造成的、借以实现自己和制约自己的集中。在民主和集中这两方面不能否定任何一方，不然就会破坏两者的统一。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②] 因为不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便失去了集中本来的意义。毛泽东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③] 反之，人民的政权愈能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群众中提供的加工原料数量越充分，质量适当，越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④] 建立真正的集中。“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⑤] 把民主绝对化，不会造成真正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也失去了社会意义。人民只有通过享受的广泛民主，自觉地去造成巩固的集中，加强纪律，增强自己队伍的战斗力，民主本身才能获得保障，否则，民主本身就会失去保障。

列宁在论述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时曾经指出：要真正懂得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应当开始严格区分民主的两种职能：一种是辩论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项执行的职能建立最严格的责任制和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纪律地、自愿地执行各项必要的指令和命令，以便使经济机构真正像钟表一样工作。”[⑥] 列宁还指出：“民主的组织原则，其最高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62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19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19—820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19 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19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中文第 2 版，第 143 页。

行国家的法律。”① 在列宁看来，如果人民群众在行使自己民主权利时，没有由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建立起来的严格秩序，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列宁这段话不仅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生活的实践中，论述了民主与集中之间互相从属、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把民主与集中这对范畴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责任》紧密结合起来，给民主集中关系注入了新的思想。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从更深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观和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并化为实际运作中的群众路线，这对于国家政权的建设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在论述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时，十分突出地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集体领导不要个人负责，是现实生活中不能存在的虚幻的状态，但是个人负责如超出、脱离民主集中制而独立，就转化为个人独裁。毛泽东提出要搞无产阶级的阶级独裁，不要搞个人独裁。他引用《霸王别姬》、酈食其见刘邦的故事，教育干部充分认识是发扬民主还是搞个人专断，这是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和兴衰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把在国家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度，与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不仅不能正确地运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而且还以自己的坏作风玷污这个制度，削弱和丑化这个制度。反对官僚主义，正是在改善这个制度的某些环节、改善运用它的方法，使其更加完善，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无政府主义是从另一方面对民主集中制度的破坏，它除了暴露小资产阶级“夸大革命性，忘记了适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② 来表现自己的散漫性、无纪律性、反对任何权威、任何集中领导等特性以外，无助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因此必须警惕和反对这种危险倾向。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从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上保证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性质，保证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实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长远指导意义。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中文第2版，第14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 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毛泽东国家学说中，是一项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存的基本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在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构想国防政府时就提出："必须吸收各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的政策。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中，毛泽东指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具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各界爱国人士，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建立、发展了合作关系。毛泽东的多党合作的思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也逐渐为各阶层的人们、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所认识和拥护。新中国前夕，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正式确认，会议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我国统一战线内各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54年我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制定第一部宪法以后，毛泽东指出，作为统一战线的人民政协不再起国家政权机关的作用，但是人民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强调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在同年9月将这个方针列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为中国的一种政治制度进一步确定下来。毛泽东在回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的难题时，明确提出："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② 他喊出"两个万岁"的口号，即共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3页。

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毛泽东论述坚持这种方针的原因时说：民主党派有三种情况。一是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二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员，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三是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① 这是有意识地留下反对派，而且民主党派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② 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正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框架。

（二）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列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1989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并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强调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在这些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多党合作的范围更加广泛，政治协商的内容进一步扩大。有关国家领导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名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充分协商。政治协商的程序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中央和地方有关政治协商制度日益完善。政府有关部门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和协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主义两面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推进“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33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34 页。

更加牢固，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全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领导的多党合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对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大作用。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

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范围内，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国内的少数民族在最高国家机关统一领导下，以其聚居地方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区，设立自治机关，由当地民族行使自治权，管理本民族本地方的事务。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民族观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科学结论。正确观察和处理中国的多民族问题，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十分重大。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① 事关重大，要求我们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采取适当形式解决这"一个统一"、"两个团结"的问题。这反映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必须根据我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注意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确划分行政区域；二是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这是两个相互渗透的方面。究竟如何解决这里的问题呢？有人主张照搬苏联的经验，采取苏俄模式，在中国建立联邦制。这是较长时期以来，包括早期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瞿秋白等一些人的主张。如1926年瞿秋白就认为，应当以苏联为模范来组织革命政权。与此相反，毛泽东主张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根据中华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任何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制度和政策，都必须以尊重民族特点和民族关系中的传统为前提。党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探索过程。早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页。

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他指出，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这里，毛泽东针对聚居的少数民族，实际上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由当地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事务”、并设立专门政府机关，由当地少数民族成员任职，以确保其参政权。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41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获得通过施行。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而获得法律效力。同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还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民族自治的要求，他说：“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① 这里，“民族自治权利，概念的出现，就把他自 1938 年以来所提出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到 1947 年 10 月，毛泽东又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② 这就扩大了自治民族的范围，即不仅人口较多的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可以享有自治权，而且人口较少的民族也都有平等的自治权。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的精神，拟订了关于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47 年中国共产党帮助蒙古族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这标志民族区域自治开始由理论走向实践。民族自治区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与支持下，在健全和完善中不断积累经验。到 1949 年，毛泽东亲自领导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民族区域自治上升到我国基本国策的高度。《共同纲领》第六章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原则和办法作了基本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总原则是，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38 页。

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办法。民族自治就是以一个大的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区，区域自治就是在民族自治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自治。民族自治机关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等方面的自治权利，其具体形式依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决定。等等。继后，自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民族区域制度一直受到国家根本法的确认与保障，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民族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的两种历史趋向：一种趋向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和交流会日益密切。在全国形成的统一经济体系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关系将不断增进，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局部融合因素将日益增长；另一种趋向是，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在走向繁荣和发展过程中，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文化、民族特色也将会增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两种趋向中后者将占主导地位。因而社会主义时期并不是民族融合和消亡时期，而是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时期。毛泽东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考察了民族的历史命运，强调必须尊重民族发展的客观历史阶段。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国民党压迫少数民族，也压迫大多数汉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消除。”① 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事实上的不平等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民族问题将会在很长时期里存在着，不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既然民族问题会长期存在，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又事关全局，在国家政治制度中就必须采用一定形式来合理解决民族问题。毛泽东正是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主张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民族问题。因为这种制度能够保证我国各民族在国家统一的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规范下，、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自主地解决具体的方针、政策，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事务，以加速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促进其发展繁荣。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地、渐进地促进民族融合因素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产生和发展，为最终实现民族融合和消亡创造条件。新中国建立以后，多民族的中国没有可能实行联邦制，而建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人民共和国。这种国家结构形式不同于联邦制共和国。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自治地方充分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它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有包括自治地方在内的全国都要共同遵守的统一的立法机构和立法原则。这些法律和原则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以平等的权利和直接或间接参加对整个国家事务的管理，而且权利和义务高度统一着。这就有利于组织先进地区帮助、支援后进地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从而保证祖国大家庭的团结统一，保证各民族有效地抵制民族分裂主义，共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周恩来曾经所指出的，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这样的理论自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的理论。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的依据。

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是从中华民族的深深沃土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它完全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求。它的确立，第一，有历史依据。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其间虽有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分裂割据的漩涡，但具有同一历史本源的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息繁衍、合作与交流却是主流。鸦片战争以来，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团结奋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使命，在斗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系。毛泽东说："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① 第二，我国共有56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3%，各少数民族占7%，但分布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交错居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毛泽东早在1939年底就指出：在中国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面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② 第三，在社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主义建设中，国家建设需要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物质资源，少数民族的发展也需要国家的扶持和帮助。毛泽东说："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① 帮助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第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有利于挫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因为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策动和支持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动乱，正是"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制度，同上述几方面情况紧相联系，因此它是受中国各族人民欢迎的制度。

(三) 毛泽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的贡献。

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毛泽东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有特殊的贡献。他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如：他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前提。这就是他一贯主张实现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坚持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内容。这就是他很早就提出的各少数民族的"自治的权利"。1945年，毛泽东还要求"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②，明确地把组织民族自治地方武装部队作为少数民族自治权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论述了保证聚居少数民族和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的基本政策。这就是他反复阐明的自治机关民族化、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保障各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等有关政策。如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要求，尊重各小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③ 为保证自治机关民族化、毛泽东提出："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④ 他说："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⑤ 他强调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他具体规定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必须出身于少数民族，能够代表本民族群众的利益，能够团结本民族群众；二是要树立共产党义信仰，使民族问题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解决服从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于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毛泽东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职权时，注意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他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以更好地联系群众，开展工作。他重视提倡赞助少数民族用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开展文化教育。他认为，汉语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各少数民族干部也应当学习，以便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但是不能强迫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风俗习惯，尊重这些风俗习惯，就是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毛泽东认为，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的，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对于不利于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要进行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应当由各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不能搞强迫。关于宗教问题，这是与民族问题紧相联系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毛泽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他认为不能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不能强迫人们放弃宗教信仰。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制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这些思想在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得到进一步法制化。《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名称、行政地位、区域界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及其保障，法制建设、宗教信仰、民族干部的配备都作了具体规定，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更完备、更科学、更具体了。这是毛泽东辞世以后，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法律表现。

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民族理论的卓越贡献，是他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中的辉煌篇章。它在长时间内以巨大的导向力量指导和规范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从而对巩固祖国统一，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加速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们渊源流长而又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的光耀将长在！

第九章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战略思考

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战略意义

(一)发展生产力,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强大物质基础。

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如何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能不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全新问题,不能不成为毛泽东重点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

首先,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我们进行革命、改变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和生产关系的根本目的。

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提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我们发展了一些,还很少。"[①]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从世界历史的高度,阐发了革命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的思想,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他认为，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基础上，“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而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① 1963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进一步揭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他说：“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②

毛泽东始终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旧中国一切灾难祸害的总根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并且维护这种经济基础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凭借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一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广阔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的政治大革命，其基本功能是解放生产力，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破”与“立”，即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而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必要前提和先决条件，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点，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更谈不上充分发展。然而，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革命本身毕竟不是发展生产力，它所解决的只是发展生产力的外部条件问题，是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1—13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1 页。

生产力大发展的直接动力，只能是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源泉和动力，只有发展生产力，社会才能进步，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不断地由初级向高级发展，因此，在革命任务基本完成、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须及时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否则，革命就没有意义，通过革命面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就没有价值，社会主义就不能成长，其优越性就表现不出来，向更高级阶段的过渡就不可能。"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①

总之，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建立、生产力的大发展已经具备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主要任务，做好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变，即："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②

第二，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性质的首要条件。

早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了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重要性。他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这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③

很清楚，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需要很多条件，而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后提四个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则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是其中的首要条件。因为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①。

1962年初，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讲到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对于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性质的决定意义。他说，我国这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质，“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②

毛泽东之所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保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性质的首要条件，是与他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紧密相联的。他认为，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改变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先进生产力代表——工人阶级的产生和成长壮大这种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生产力，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前提。但毫无疑问，这种一定程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相当有限的，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相比，也是十分落后的。中国毕竟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1952年增加到26.6%，1957年包括手工业也只达到50%左右。因此，我们在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短时期内确实获得显著增长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无法相比，比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容纳的内涵相差更远。对于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四个字加以高度概括。他还多次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③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农业不发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823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①。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实具有某种超前性。而建立在仅有一定程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很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如果不尽快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就会因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失败。所以，尽管毛泽东对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持有异议，认为这样的表述不完全、不准确，但对其突出我国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国情，强调以主要精力发展生产力的着眼点还是充分肯定的，并在多种场合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全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

毛泽东关于充分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首要条件的认识，与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惟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③。列宁还清醒地看到由于生产力落后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历史缺陷，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④。他甚至认为，推翻剥削者只是完成了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一半”，而从事经济建设，迅速提高生产力的现代化水平，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才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后一半胜利”。他还认定，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迅速提高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那么，我们在推翻内外反动派的革命事业中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就会付诸东流，旧制度的复辟就会不可避免。⑤ 显然，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上述思想，他关于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列宁的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42—743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71—772 页。
③ 参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01—302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3—294 页。
⑤ 参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30 页。

第三，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这是履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对外职能，保障中华民族真正独立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曾经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是，一个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仅仅只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并不等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经济落后、国贫民穷的国家往往蕴藏着政治危机，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和有效保障真正的独立和解放。毛泽东深深懂得，要真正保持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得到真正解放，仅仅在政治上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清楚地阐述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密切关系。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他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①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任务，强调只有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使经济上有广大的发展，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中国才能达到完全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到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指出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将仍然处于被动状态，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落后而再次挨打将不可避免。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一份送审的文稿中，加写了一段关于落后就要挨打，为了避免挨打就必须彻底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状况的重要文字。在这段文字中，他简要概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历史事实及其原因，指出，我国从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47页。

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他同时指出，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①。

经济技术落后，也就是社会生产力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凌。这是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深刻记取这一教训，防止因落后而挨打的历史悲剧重演，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正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因。

以上所述表明，毛泽东对于充分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的，对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也是相当明确的。不仅如此，他还在一段时间里，以其主要精力抓经济建设，提出了不少关于搞好经济建设的正确的思想观点。其中包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思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的思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认真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制定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以及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等关系，走中国自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49页。

己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发展科学技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学习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等等。

毫无疑问，上述思想的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它们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巨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在经济建设上曾经出现严重失误，就否认他关于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正确思想，就认为他只抓阶级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或者只重视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而不重视发展生产力。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指出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失误，特别是要严肃认真地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从中总结出可供今后借鉴的经验教训。

（二）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及原因分析。

应当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六十年代，对如何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确实进行了积极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人们也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尚未真正找到一条发展生产力的好路子，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太对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这突出地表现在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用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法，用不断提高生产关系所有制基础的公有化程度，无限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等方式，来进行经济建设，企图以此取得人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急于求成，盲目冒进。但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事与愿违，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除此之外，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对头，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严重失误，还突出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企图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不断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来“促生产”，致使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我国与发达国家本已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

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此时的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同时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穷国。它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各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人口多、底子薄、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的状况，短期内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毛泽东所概括的“一穷二白”四个字，正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形象描述。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国情的东方国度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着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当时，我们党和毛泽东都认识到，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但同时又感到照搬苏联模式未必适合于中国。因而决定另辟蹊径，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在于缺乏经验。毛泽东1959年2月2日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应该承认，我们搞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①]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主观上希望尽快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处境。结果违反事物“循序渐进”的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冒进，酿成了大错。后来，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估计不足的错误，多次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②]。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预备会上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着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我们“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③] 后来，他又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

①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237页。

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他明确指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解。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没有一套，没有把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没有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坦诚地承认：“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而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力，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他告诫全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① 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对于克服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急性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出现严重失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及运用有某些偏差，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辩证法大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而有深厚造诣。但其晚年，却在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及其相互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上有某些偏差。譬如：毛泽东过分注重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却忽视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是决定生产力性质、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忽视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不是人尤其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物质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因而他企图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经济乃至大办现代工业，以求得生产力发展的超高速度，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又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之后，应着力解决生产关系中的另外两方面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毛泽东对前者比较重视，试图通过不断调整人与人之间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28—529 页。

关系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所热衷的政治运动的方式，不仅没有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他对日益突出的分配关系不够重视，在分配原则上，比较强调政治挂帅、精神鼓励，但却相对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特别是个人物质利益，客观上助长了平均主义，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再如，毛泽东在理论上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原理，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明显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这种反作用是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前提下产生并且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忽视刚刚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基本适应的现实。他在实践中，不是保持新的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是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一味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试图通过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乃至不断进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来“促生产”，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做法，只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总的说，毛泽东晚年在指导思想上比较对忽视了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国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经济建设对政治的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即最大的政治就是社会主义的四化，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忽视了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甚至提出用“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办法，来解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那时全党“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①

毛泽东曾经虽然正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但后来却在长期的实践中，违背这一正确认识，实际上没能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由于缺乏确立正确道路的先决条件，而不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逐步找到一条较快较好的发展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也因此获得比较巩固、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关于毛泽东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本书在第七章中已经讲过了。这里的问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重新认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新理论。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战略任务，就是要科学认识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处理各种由社会矛盾而引起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以保护国家政局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分析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基础上，首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作为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提了出来，把“人民内部矛盾”纳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范畴，进行观察和处理，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思想。他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他特别强调：“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①] 接着，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次明确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对概念，并正式作为两类社会矛盾问题进行论述。只是这篇文章主要讲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而是国际范围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并且把敌我矛盾放在首位。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515页。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名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指出，我们提出正确区分两类社会矛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目的在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①。至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理论正式创立。

综合毛泽东1957年前后历次讲话和文稿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观点：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它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它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集中表现；三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则大量涌现、层出不穷而在社会矛盾中占居主要地位；四是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用专政的方法，后者用民主的方法；五是两类社会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其中人民内部矛盾因处理不当而发生对抗，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但总的趋势是对抗性的矛盾向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六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其目的在于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特别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0页。

会矛盾学说所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这一理论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性的发展方向。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

我国在三大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随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丧失而失去了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和奴役劳动者的条件，也就失去了自身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同无产阶级对立、对抗的、完整剥削阶级形态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全国范围内的人民群众同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有哪些新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怎样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无从找到答案新论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因此，不能不引起毛泽东从政治战略上加以思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①，而需要人们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进行科学研究。然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战略性探索并没有获得成功。

为了讲清这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经验教训，我们需要就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基本观点及其形成，作一必要的回顾。毛泽东在这方面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② 只是斗争的形式和斗争的重心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③ “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④ 第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中心内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9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3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786页。

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① 共产党人"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会走向反面，即走向资本主义，就会变质。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② 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因此，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有可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毛泽东认为，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还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集中表现出来。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③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④ "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⑤ 第四，毛泽东认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第五，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相呼应，互相影响的。例如，1957 年初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⑥ 在 1958 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认为："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⑦ 要充分研究国内和国际上存在的阶级斗争情况。

我们从上述各点，已经比较明显地看到，毛泽东把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中心任务贯穿于整个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7 页。
② 毛泽东在 1962 年 9 月 24 日的一次谈话。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4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5 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5—786 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1 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1 页。

三、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

（一）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提出。

20世纪，一批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因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首先建立起来。这个新生的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比，在许多方面还处于暂时的劣势地位。在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巩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带全局性政治问题。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结合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业已形成的东西方冷战高潮的具体形势，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和战略发展上看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西方利用自己在综合实力上暂时处于优势，想方设法地进行军事的、经济的进攻外，还千方百计地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杜勒斯就曾公开叫嚣：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四代身上。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国际反动势力确立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从历史上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国际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把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他们的既定战略方针。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他们就开始这样做了。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中，就比较明显地包含了“和平演变”的思想。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提出：“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这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新中国的最早表露。毛泽东亲自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评论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玩弄的种种阴谋，指出美国的“白皮书”和艾奇逊信的评论，实际上是企图和平演变新中国的开始。1953年1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证词中，表示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放铁幕卫星国，即把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解放出来”。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后，杜勒斯受到鼓舞，更加起劲地鼓吹和平演变战略。1957年7月2日，他在

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并认为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二代人所能实现的，而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之由来。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从台湾回到美国后立即发表声明说，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同年12月4日，他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商会的演说中提出：“美国应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应“全力以赴地执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旨在用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1959年下旬，杜勒斯又分别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和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中，分别表达到了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愿望。

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反对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是有其国际、国内的充分客观事实依据的。现在，略略回顾一下毛泽东在这方面论述：1956年12月，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提醒人们警惕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文章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① 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同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想问题的。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要看杜勒斯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1959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如果大家不警惕就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艾森豪威尔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对帝国主义作斗争有益。1959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印发了杜勒斯关子和平演变的几篇演说，要大家看一看。他说：杜勒斯说他们要以“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2页。

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消灭社会主义。毛泽东还特别讲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同年12月初，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中，除谈到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外，还谈到其和平政策。他指出：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更加密切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1964年1月12日，他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① 同年6月16日，他在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郑重说到：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话灵不灵？我希望它不灵，但也可能灵。针对帝国主义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专门讲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向不同对象讲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告诫人们：我们国家也不太平，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二）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显然，毛泽东十分密切地关注着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动态，并一再提醒党的高级干部高度警惕和平演变问题，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和平演变，以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是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富有远见的政治战略思想。从毛泽东的有关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大体包括：

第一，要高度重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充分认识和平演变战略的危害性。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背景，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它们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扩张野心。毛泽东揭示了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指出帝国主义在标榜和平演变的同时，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等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这就是，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演变腐蚀我们，要保持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毛泽东论述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和实力政策之间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与它的实力政策紧密相连、相互配合的，它们并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则是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① 毛泽东提醒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要保持高度警惕，采取必要措施，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否则，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②

第二，警惕和防止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是保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1957 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本质及危害作了如下判断：“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③

毛泽东剖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指出：“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④ 后来，毛泽东在 1964 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对修正主义作了进一步界定，说什么叫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

20 世纪 60 年代初，毛泽东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他坚信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打垮中国共产党不容易，但认为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变质分子而又未能有效制止的话，党和国家就有可能改变颜色。也就

① 参见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 年第 6 期。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22—823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8 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23 页。

是说，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特别是取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因此，他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第三，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防止和平演变、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重要战略措施。针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认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即：(1)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3)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4)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因此，我们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①

第四，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一贯重视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问题。从1944年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学

①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2页。

习，引以为戒，到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可以说都是为了防止和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在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战略方针确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更是把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看作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措施之一。他认为，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能否得到及时清除，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能否得到有效遏制，是关系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是否变成现实性的重大问题。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① 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滋生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必须毫不手软地予以清除。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出了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各种腐败现象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蜕化变质以及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斗争。他经常思考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出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问题，担心党的干部一旦被腐蚀侵袭，党外也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② 他努力寻求恰当的方式来发动群众对干部进行民主监督，揭露和克服党内的阴暗面，并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③ 毛泽东关于反对腐败现象、防止和平演变的基本思想和决心是无庸置疑的。

（三）对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价值意义的分析。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是他晚年留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检验可以看出，在这份丰厚的思想遗产中，既有深刻的、表现了很强的历史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正确论述，也有对当时现实情况的主观主义的估量和理论上的偏颇。我们应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合理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① 转引自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1期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总起来说，毛泽东的防止和平演变思想是极为深刻和富有远见的，是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高瞻远瞩和深遂的历史洞察力的一个战略思想，其基本精神将对我国加强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机关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起长远的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虽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社会主义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而只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就势必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谋求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但帝国主义的本质却驱使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孤立、封锁、禁运、遏制、武装干涉等硬的一手屡遭失败之后，便在其实力的基础上将策略的重点转向软的一手——和平演变，即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执政党从内部发生演变，进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而防止和平演变的实质，则是如何保持执政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即不变质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和平演变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执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严峻课题。毛泽东及时地提出和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严峻课题，并力图解决这一课题。为此，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虽然在探索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但也有一系列深刻的有远见的战略设想，如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议，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出修正主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现象和各种不正之风；培养千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他还提醒全党要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问题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这是十分难得、非常可贵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指导下，对和平演变问题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至今未能在中国得逞的重要原因。这也可以说是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重要价值所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忘记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提出的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不可忘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的

形势和在总结新的经验基础上，对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问题所作的概括："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①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把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加强执政党建设、国家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经常注意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和平演变，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毛泽东的防止和平演变思想及其实践，至少给予人们下列启示：

第一，在帝国主义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必须把防止和平演变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和平演变。

第二，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实力政策，而是以实力为后盾，将和平演变方式作为其实力政策的补充。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和平演变与反对和平演变的长期斗争中取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更加充分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

第三，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得逞，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而"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说到底，关键是我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1页。

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①]。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要科学制定并长期坚持一个正确的中国发展路线。要注意培养人才，并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高级领导班子，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坚决同党内腐败现象作斗争，不断清除蜕化变质分子。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构筑防止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确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毛泽东晚年关于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战略思考，就其出发点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就其基本内容来说，经过实践的检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他本人的原因，相当一部分论述也是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或比较错误的，有些则是正确和错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无论它们是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还是错误和比较错误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共产党人继承了这笔巨大的精神遗产，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对毛泽东晚年关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作了具体分析，对于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则予以继承和借鉴；对于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是错误的，则予以彻底的否定和坚决的抛弃；对于其一些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则予以谨慎的剥离，肯定和吸收其正确部分，否定和剔除其错误的部分。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开放的世界环境，站在时代的高度，用世界的眼光观察思考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他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对毛泽东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是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手段，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我国解决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因此，全党全国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经济建设作为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① 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和根本任务的论述，奠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顺利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理论基础。

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二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邓小平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② 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就是在保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同时，对这一根本制度的具体运行形式、组织方式、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整个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作革命性变革；同时，扩大对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③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④。总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① 邓小平明确阐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构成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②

第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指出：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③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由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行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并以其正确有效的工作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同时，要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寻求有效的方式，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正确地解决它，防止它的蔓延和激化，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运行，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总之，一方面，绝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也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漠然视之和放松警惕，而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它。邓小平的以上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指明了方向。

第四，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和法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④ 邓小平指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制度上解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必然要求，在整个改革大业中处于重要地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成果，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总的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 为此，要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制，实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② 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政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③ 邓小平还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若干标准，他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④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第五，实行“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为了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我们党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⑤ 这里当然也包括澳门在内。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统一是个大前提。“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⑥ “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能允许两种制度存在。”⑦ “一国两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制”政策的实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5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不变，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合法性。“一国两制”的立足点是通过谈判方式，求得台、港、澳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利稳定局势，照顾有关各方的利益。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特别是“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①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清晰地勾画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最佳蓝图，开辟了积极稳妥地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可行途径，并已经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得到成功运用，也正在为愈来愈多的台湾人民所接受。“一国两制”构想还以其具有复合制某些特征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邓小平的以上论述，继承了毛泽东晚年关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战略思考中的正确方面，纠正了其中的错误方面，并根据新的经验进行了新的概括，从而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国家学说。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②

我们将永远铭记历史伟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①

我们将继续以包括毛泽东国家学说在内的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和精神支柱，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奋斗。

(原书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①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

毛泽东与党的建设

罗小凡　著

目　　录

导　言 …… (847)
第一章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党的理论与
　　中国党的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创建
　　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创建了
　　系统的建党思想 …… (859)
一、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党建实践,
　建设了一个好的党,创造了系统的党建理论 …… (859)
二、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865)
三、建设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 …… (867)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思想基础 …… (868)
(二)为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而奋斗,
　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基本要求 …… (869)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落脚点 …… (871)
(四)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组织保证 …… (872)
第二章　坚持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 …… (874)
一、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 (874)
(一)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
　双重任务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担当 …… (875)
(二)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

这种领导只能经过共产党来实现 …… (878)
(三)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 (880)
二、坚定不移地保持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权 …… (883)
(一)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在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争取领导权 …… (883)
(二)党的领导的实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
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 (885)
(三)实现党的领导要靠党的正确政策和模范工作 …… (886)
(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888)
三、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 (890)
(一)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 …… (891)
(二)领导者的责任及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 (892)
(三)掌握领导方法,讲究领导艺术 …… (895)
(四)增强领导者的修养,提高领导者的素质 …… (899)
第三章 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 …… (902)
一、党的事业的胜利和发展必须
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 (902)
(一)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
革命事业的成败和党的兴衰存亡 …… (903)
(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 (904)
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 …… (906)
(一)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 (907)
(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 (910)
(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912)
三、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 …… (913)
(一)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围绕
党的政治纲领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 (915)
(二)对党员进行政治路线教育,
保证全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 (915)

(三)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 (916)
四、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 (917)
(一)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同"左"右倾错误
倾向斗争中发展完善的 …… (917)
(二)正确有效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 (918)
第四章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 (920)
一、群众路线的提出和发展 …… (920)
二、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 …… (923)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923)
(二)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 …… (924)
(三)在一切工作中依靠群众 …… (926)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927)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 (928)
(二)决策和决策的执行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 (929)
(三)党员、干部要当好人民公仆 …… (930)
(四)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 (931)
四、必须对群众进行教育和引导 …… (931)
(一)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 …… (931)
(二)坚持两个原则,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 (933)
(三)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 (935)
五、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 (936)
(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 (936)
(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 (938)
(三)抓住中心,兼顾其它 …… (939)
(四)骨干带头,面向多数 …… (940)
(五)突破一点,带动一般 …… (941)
第五章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 (943)
一、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 (943)
(一)从思想上建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 (943)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
党的本质矛盾决定的 …… (944)
(三)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 …… (945)
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 (946)
(一)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 (946)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 (948)
(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949)
三、端正思想路线 …… (954)
(一)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解决新问题、
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 (954)
(二)端正思想路线是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
组织路线的基础 …… (955)
(三)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 …… (956)
四、解决思想入党问题 …… (958)
(一)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是
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 (958)
(二)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 (959)
(三)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改造世界观 …… (959)
第六章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 …… (961)
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规律 …… (961)
(一)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 (961)
(二)民主集中制是发挥全党积极性和
巩固发展党的重要武器 …… (962)
(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 …… (964)
(四)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在
党的政治生活中的运用 …… (965)
(五)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努力造成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 (967)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反对个人专断和
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倾向 …… (968)

二、“四个服从”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
是全党的组织纪律 …… (972)
(一)“四个服从”是民主集中制的
基本要求和纪律保证 …… (972)
(二)严格遵守以“四个服从”为
中心内容的党的组织纪律 …… (973)
(三)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 (974)
(四)坚决反对党内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 …… (974)
三、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 (976)
(一)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是
党的根本领导制度 …… (976)
(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 (977)
第七章 正确选拔、培养使用干部 …… (979)
一、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 (979)
(一)党的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 …… (979)
(二)从国情党情出发建设干部队伍 …… (981)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 (985)
(一)“任人唯贤”是公道正派的干部路线 …… (985)
(二)德才兼备是我党的干部标准 …… (987)
(三)实行知人善任的干部政策 …… (988)
(四)坚持搞五湖四海的全面团结干部的原则 …… (990)
第八章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 (997)
一、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 …… (997)
(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
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 …… (997)
(二)党员是党的战斗力的源泉 …… (1001)
二、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 …… (1004)
(一)基层党组织的任务、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必须适应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要求 …… (1004)

(二)按照社会基层组织的特点确定不同的
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 (1007)
(三)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 (1010)
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党员素质 …… (1012)
(一)积极慎重发展党员,整编党的队伍,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1012)
(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 …… (1013)
(三)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1015)
第九章 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 (1018)
一、党风直接反映党的形象 …… (1018)
(一)"党风"概念的提出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风
建设实践和理论的一个飞跃 …… (1018)
(二)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体现 …… (1019)
(三)党的优良作风是保证党的发展、
推动革命事业的强大动力 …… (1022)
二、反映中国共产党本质的优良作风 …… (1023)
(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 (1023)
(二)密切联系群众 …… (1025)
(三)自我批评 …… (1026)
(四)谦虚谨慎 …… (1028)
(五)艰苦奋斗 …… (1031)
三、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 (1033)
(一)党风好坏关系民心向背 …… (1033)
(二)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持久的斗争 …… (1034)
第十章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 (1037)
一、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 (1037)
(一)党的团结和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基本原则 …… (1037)
(二)党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和
建设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 (1041)
(三)党的团结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 (1042)

二、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 …… (1044)
(一)党是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 (1044)
(二)党内矛盾是社会阶级矛盾和
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 (1046)
(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 (1048)
(四)整党整风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 …… (1050)
三、党的领导干部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模范 …… (1052)
(一)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党的团结 …… (1053)
(二)要坚持搞"五湖四海"的原则 …… (1054)
(三)力戒骄傲,是领导者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 …… (1055)
(四)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和
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 (1056)

导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同时,提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四项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对于一切重大的历史过程,都只有明了它的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温故知新是人们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事物,解决其现实问题的常用的方法。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要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尤其不能不对80多年来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做认真的研究。从1919年酝酿建党开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党的创建发展,壮大巩固的历史是同毛泽东直接联系着的,时至今天他的思想仍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要研究、了解党的建设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活动。

所以,1977年,邓小平刚恢复工作,就立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为了克服林彪、"四人帮"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使党经受住风险,就要在全党、全军、全国造成毛泽东提出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此,"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邓小平文选》)第45、46页)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清楚地指明了从毛泽东的建党理论和实践中吸取丰富营养,对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实现党的新的历史使命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系统地深入研究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伟大

贡献，进一步开发和整理他在这一领域内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既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最好纪念；也是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做的一项实际工作。

毛泽东是中国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最早的一批先行者之一，他直接参与了党的酝酿和创建的全部工作，是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党的"一大"的代表，而且从此一直居于党中央或地方党委的重要领导岗位。1935 年遵义会议后到 1976 年始终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期间虽然有几度受到排挤，打击，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但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 1935 年前，他对端正中国革命的航向所起的作用，超过任何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35 年后，更是保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巨轮沿着正确航向驶向目的地的主要舵手，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进行了艰辛而有意义的探索。

为了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领导人民夺取和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必须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熟与巩固的、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各个历史时期担负着党的领导责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建设这样一个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贡献最大、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他就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建设思想。经过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对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原则、党的作风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必然会以丰富的经验使这一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作为成功地解决在中国建设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成果的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科学地回答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不曾遇到或不曾解决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以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学说。邓小平说，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指明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的地位，指明了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备的思想体系，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根据它们在党的建设史上所起的指导作用，联系当前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运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首先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建党路线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工作重心不能不长期放在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党的队伍的壮大,就必须而且只能主要靠吸收革命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毛泽东指出:在杵臼时代、宗法社会的农村环境里,以农民为主要建党对象,要建设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真是难得很":但是,决定党的性质的主要不在于党员的社会出身,而在于党的政治方向和党员的世界观。他批驳了传统的"城市中心论"和在党内一度盛行的"唯成分论",强调既要看到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确实比较严重,如不加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他们就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按小资产阶级的而貌(即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又要看到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性,完全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改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基于这一科学认识,党逐步确立了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路线,在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突出、贯穿思想建设,使之成为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础;紧紧掌握思想教育这一中心环节,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针对性地克服阻碍党的政治路线贯彻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员的党性不断增强,党内思想日臻统一。因而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就能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内状况的基础上宣称:我们党虽然工人出身的党员比重不大,却完全无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力地解除了当时国际共运中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怀疑。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理论斗争的传统。指出: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使广大党员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本地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此。弄懂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全党亟待解决而且必须致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只要在党内培养出一批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具体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就能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顺利地实现党的政治任务。他始终把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及时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写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大促进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熟。每当党的任务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关头,党就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党,因而使党能朝着明确的目标,步调一致、朝气蓬勃地战斗。这是党在多数情况下,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顺利开创新局面的决定性因素。在党的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失误,这些失误之所以能够纠正,也在于党严

肃认真地分清理论是非,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统一。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的杰出贡献就在于遵循这一原则,指明了端正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他投身于中国革命时,就强调了解中国是改造中国的起点,1930年,明确提出要确立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延安整风中又把正确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并加以系统地阐述,有力地克服了对党危害极大的主观主义的路线,使党内真理抬头,党性巩固,大大促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毛泽东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党的生命线。牢牢掌握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毛泽东建党路线的精髓。

马克思与他以前的哲学家不同,强调人们的责任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要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性修养,解决党员思想上人党问题的独具特色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是党内的本质矛盾,表现在党的建设上就是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还是按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的斗争。依了后者,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鉴于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占大多数,因此,他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人党,面且要在思想上人党,为此,需要对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进行整顿,为了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为了实现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党的任务,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强调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创造的这一整套思想建党的原则、方针和方法,是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和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切实保证。

二、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原理

一切政党的直接目的都是要夺取和掌握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都十分重视纲领和策略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也不例外。马克思、恩格斯把纲领视为判断党的水平的界碑和旗帜。列宁认为战略、策略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把这些原理运用于中国党的建设的实践,创造了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理

论。建党初期,他就指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党的正确引导,而党正确引导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分清敌我。为了制定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路线和策略,他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就大力倡导作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调查,要求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洗刷唯心精神,纠正主观主义的策略指导。这种出自"山沟"的马列主义,真正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与策略问题。而当时掌握着党中央领导权的王明等人,崇奉"本本",高喊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由于路线、策略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结果不但没有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反而把百分之百的白区党组织、百分之九十的苏区党组织统统"化"掉了。毛泽东总结建党18年内这种鲜明对比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原理,强调要实现正确领导,全靠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而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又是以政治路线的正确为前提的,精辟地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地位和任务。

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制定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纲领,并为实现这一政治纲领而确立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为了贯彻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制定各方面的具体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要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一方面强调我们党的名称和宇宙观决定了党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整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另方面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力争较快、较好地解决各个历史阶段所容许解决的课题。他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科学地联系起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总政尺,同时在实现纲领和总路线、总政策中抓紧党的建设,从而使党迅速走向成熟。毛泽东强调,总路线是照耀党的各项工作的灯塔。总路线正确,党的各项工作就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各项具体路线和方针政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总路线,否则正确的方向难以坚持,各项工作也会偏离正确的轨道,从而造成政治上的混乱。所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所谓议大事、抓大事,主要就是指切实掌握政策和策略。这不仅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全党的共同责任。

正确的政治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列宁一样十分重视两条战线的斗争,强调不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正确路线就建设不起来。他要求全体党员要善于识别风向,坚持原则,当违背正确路线的错误思潮"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要引起警觉,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错误思潮

已形成气候，严重干扰正确路线时，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决不做骑墙派；当错误思潮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时，要不怕孤立，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争取党组织接受自己的正确主张。他还强调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对一种倾向时要防止掩盖另一种倾向。在上述各个方面，毛泽东都堪为全党典范：当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毛泽东倍受打击，但他既毫不动摇地坚持正确的立场，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力争按组织原则解决问题，终于通过耐心艰苦地工作，争取了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从而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当国民党顽固派大喊大叫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时，毛泽东立即严正申明共产主义决不能"收起"，一"收起"就有亡国的危险，指引全党高举共产主义的大旗巍然不动，从而保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牢牢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为了全面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十分重视广泛、深入、系统地对全体党员进行总路线教育，曾数度亲自参与、指导撰写对党员进行总路线教育的教材，使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明确党的奋斗目标，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创造性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和纠正一切离开中央路线、政策的倾向和行动。经过党内生活的长期锻炼，执行和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已成为了全党的政治纪律，为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规律

无产阶级战胜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力量，就在于组织。而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就需要一个统一集中的党作为阶级团结的核心。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需要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所谓组织的物质统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及由此而派生的党的纪律。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就深感在中国这样一个小生产者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一方面民主生活严重不足，一方面无组织纪律性特别突出，妨碍党员和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党的凝聚力的形成。因此，他特别强调党需要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需要民主主义，只有把民主主义运用于建党、建军、建政的各方面，才能破坏中国的封建传统，焕发党员和人民的革命精神。为此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认为没有这种健全的民主生活就会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遵义会议上结束王明的家长式统

治,长征途中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都是靠民主集中制解决问题的范例。正由于我们党在关系党的存亡的斗争中积累了如此宝贵的解决党内矛盾、巩固党的统一的经验,因而对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党的"七大"在此基础上,做出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遵循这一规律,总体的力量将大大超过各部分力量之总和,违背这一规律,党就会因内耗不断而导致组织解体。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依据他揭示的原理,我们党先后将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为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毛泽东认为,扩大民主是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难关,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武器。为了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克服和防止党员违背党的意志自行其是的自由主义和在党内立山头、搞派别活动的宗派主义。为此他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这"四个服从"既肯定了党员对党内事务当家作主的权利,又严格要求党员必须履行实现多数意志的义务,从而使民主集中制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性,而且具有实际操作性。为了正确掌握民主与集中结合的"度",毛泽东指出:"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主动性"。党的"七大"、"八大"通过的党章,根据这一理论原则制定了正确处理党员和党组织之间、上下级党组织之间关系的各项制度,使健全民主集中制有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保证。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主集中制同时也是国家的政体,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与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1945 年当黄炎培问到共产党能否找到一个跳出历史上的成功者都摆脱不了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办法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可见当时毛泽东已经科学地预见了民主对于执政后的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在 1949 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 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只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民主集中制,运用民主的方法引导人民,教育自己、提高自己,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加强自身团结,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幸福的新生活。

四、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权的原则

政党是阶级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作为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代表，毫无疑问它要力图领导本阶级或阶层并尽可能扩大其领导的范围。政党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过有的党敢于公开宣告，有的党却不愿承认；有的党比较自觉，有的党不太自觉罢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创建时起就充分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的领导责任，把确立党的领导地位作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成为其他工人组织的中心和核心；列宁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应该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成为无产阶级直接执政的先锋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对于建党的目的是为了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就是明确的。蔡和森、毛泽东一致认为，只有先组织共产党，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陈独秀等人主张把领导权让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批驳了这种错误的主张，强调唯有工业无产阶级才有资格充当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随后又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完成，都只能靠共产党领导，别的政党都担负不了这一任务。但是，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获得和巩固，要靠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坚决斗争去争取。其关键，一是要掌握武装，二是要掌握农民。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满腔热情地支持和领导农民运动，时刻注意巩固工农联盟，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还要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扩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使党逐步牢固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局部政权发展成全国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特征和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因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就能够迅速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性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经由共产党才能实现。1957年他明确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区别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的两项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大政方针只能由共产党决策，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旗帜鲜明地捍卫了党的执政地位。

巩固党的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要正确地对待被领导者。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

家服从我们,而应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为基本条件。为此,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诸如: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执行正确的政策,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依靠全体党员以高度的自觉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各方面的模范行为,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启发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说服群众接受党的主张;扎扎实实做好组织工作,充分发挥整个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领导的其他群众组织的纽带作用;合理安排、运用群众的力量,爱护群众的积极性;等等。这些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领导与剥削阶级统治间的本质区别,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规律,指明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取得群众拥护,以坚持党的领导的正确途径。

五、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原理,列宁强调,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领导人民获得胜利。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倡导全党在思想上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逐步形成了我们党独具特色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使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究竟是把群众当成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还是仅仅把他们当成被治理的对象,正是无产阶级领导者与剥削阶级统治者在根本立场上的原则区别。毛泽东一再强调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放自己。领导者的责任和作用只能是了解群众的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提出反映群众根本利益的口号和方案;启发群众的自觉,使他们认清自己的利益;指导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向更高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和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先生又是学生,而且,如果不首先虔诚地当好群众的学生,就没有资格充当群众的先生。任何人如果企图充当代替群众包打天下的救世主,就一定会失败。

党不仅不能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且应该自觉地把自己当做人民群众实现其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全在于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从广义上说,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从直接的含义上说

为被领导者服务。领导就是服务。这就是党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与群众关系的根本立场。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把关心群众生活与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紧密联系起来，把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作为实现领导的根本条件之一，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准则。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取得领导资格，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才会产生从根本上代表群众利益的政策、方法、方式。

领导是以掌握一定的权力为前提的。从思想上真正搞清楚权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人，领导者不过是秉承人民的意志执行任务的公仆。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领导者为人民作主，而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群众对权力的服从正是服从自己的集体意志。领导者在运用权力时如果违背了人民意志，人民随时可以收回权力，将其撤换。所有党员和干部都必须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公仆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为理论依据，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认识论的高度，强调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以避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充分发挥和调动人民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确保领导作出正确的决定并顺利付诸实施。这种领导方法的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组织保证是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三者之紧密结合，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各种领导方法的本质特征，体现了最基本的领导规律。实事求是是指引领导者科学决策和纠正错误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一切工作，成就成在实事求是，但难也难在实事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就在于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紧紧联系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实事求是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前提。毛泽东在解决领导方法问题时，首先是从解决领导者的思想方法、洗刷唯心精神着手的。他首先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伟大真理，把“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作为领导方法的基本口号反复宣传阐述，从而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成为全党干部思想行动的首要准则、实现正确领导的第一法门。实事求是又必须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了解实际最基本的渠道就是向群众做调查，一切真知只能来源于直接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群众。领导者如果不虚心向群众学习，不亲自动手到群众中去做周密的调查，就想

当然地作出决定、发表意见、解决问题,那就只能是无知妄说和轻举妄动,注定要犯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离开了群众实践,光从本本中讨生活,不仅必然陷入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而且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危险。

群众路线又是实现领导意图的根本保证。从群众中来的正确决策,只有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才能实现。没有领导积极性和群众积极性的紧密结合,就不可能成就任何大事。因此,相信群众和相信党,是我国党和人民长期坚持的两条不可分割的根本原理,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依据。越是工作遭受挫折,遇到压力和困难,越要强调这两条原理。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有人相信外国力量超过相信本国党和人民,或者把党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结果没有一次不闹大乱子。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这才是遵循领导规律,改进领导工作,提高领导水平的正确途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国家政体,其实质是要切实保障每个党员和公民对党内事务和国家事务当家作主的权力,充分发挥每个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都是以信任、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为前提的。领导者如果相信自己超过了相信群众,就会走向个人专断;如果相信周围少数人超过相信群众,就会走向宗派主义。这都会破坏民主集中制,打击群众积极性。民主集中制又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组织保证。从群众中来,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这里所说的集中,只能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程序集中多数的意见。到群众中去,见之于群众的行动,需要一定的权威作保证。这种权威也只能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群众路线,深刻阐明了坚持民主集中制是领导规律的客观要求。

毛泽东从党的丰富领导经验中,提炼出生动的领导艺术,其基本点就是着眼多数,着眼群众,着眼全局,讲究策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求更实在地为人民服务。他指出:领导者要取信于民,根本的一条,是要靠对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靠讲真理,办实事。这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才能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自己不相信群众,又不让群众了解自己,充其量只能得到被领导一时的盲从,一旦被领导者认识到受骗上当后,其结果就是领导威信的彻底崩溃。领导者要善于激励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这种激励主要应该建立在群众需要、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使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了解领导者提出的主张的合理性。当群众一旦掌握真理,就能不计眼前得失,相当一部分先进分子就能自觉牺牲个人利益,无私奉献,从而激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领导者要多谋善断,这就要审时度

势,沉着、冷静、机智、周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些对科学决断不可少的品质,只有以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从群众中汲取智慧,才能培养起来,把决断单纯理解为敢冒风险,极易流于鲁莽和不负责任。领导者要知人善任,在用人艺术中,除了强调领导者要有惜才之心,识才之明,任才之能,容才之量外,更重要的是要善于依靠群众,鉴别人才,着眼于各级领导班子的群体建设。靠群众选人,选任群体,就能把用人艺术提高到新水平,以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连绵不绝。

上述五方面既是对本书主要内容的概括,也是作者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体会。毛泽东建党思想博大精深,写完本书后,作者深以只作了鳞爪之探为憾。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之处,敬请读者驳正。

罗小凡谨识

2003.2.24 于拙学斋

第一章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党的理论与中国党的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创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创建了系统的建党思想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建党理论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最初的只有几十名党员的政党,发展为一个拥有6000多万党员、领导10多亿人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条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指引。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用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教育全党,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好的党。

一、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党建实践,建设了一个好的党,创造了系统的党建理论

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只有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够成为具有蓬勃生命力的科学,才能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建设引导到胜利。历史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解决中国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这是一项特殊的、困难的然而又特别崇高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就要把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这不但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和党的现状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需要对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具有无限的忠心,相信群众,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的实践中去。中国共产党依赖于自己千百万党员和一批杰出领袖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奋斗,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极其

艰巨的历史任务，并形成了这一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即毛泽东建党思想。这一理论体系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主要因为他是实现把马列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出色的代表。他不但长期从事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极大的理论勇气，在理论上他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在实践中形成的独创性的经验的理论总结，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得到了全党认同，成为进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壮大巩固，成熟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创立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开始产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还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一方而，党一成立就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了解得不深，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还缺少经验。这种状况，反映在党的建设上，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还不成熟，更多地是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照搬共产国际某些条文，党章中的各项规定大体上也是仿效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章程。从总体上讲，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还只是处于转述、吸收和照章办事的阶段。但是，毛泽东从来不满意于照抄照搬，而是针对当时建党而临的实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作了如下探索。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毛泽东强调“唯物史观为吾党哲学的根据。”[①] 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并努力用以说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在党的性质问题上，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成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组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党”。

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宣告自己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

---

①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62页。

在组织建设上,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中央的要求。明确了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奠定了党的组织基础。

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提出了实现党的领导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二是坚持工农联盟。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无产阶级之最大最忠实的同盟军;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当受到外国资本打击、军阀压迫时有可能赞成革命;但当革命的发展威胁他们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时,又怀疑革命,"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党的领导权问题的理论。

第二阶段,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遭受极大损失,党员数量从大革命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在关系党的存亡的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领导了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随后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后,党的建设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党的组织大半处在农村,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成分激增,农民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到党内来。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由于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党的大部骨干力量需要转到农村工作;党不能不主要靠从拥护革命的农民、士兵、农村知识分子(从总体上都可以说是农民)中吸收成员来壮大自己,一方面又指出在处于宗法社会,杵臼时代的农村环境里,要建设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实在难得很";"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 针对了这一特点,毛泽东强调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

一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内容。

毛泽东在1929年12月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案中就思想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原则。他指出,思想建设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去克服、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全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能够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下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思想建设的内容，主要是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正确路线的教育，加强党的知识的教育。党的思想建设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党员，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同时开展积极的思相斗争，进行党内的批评。为便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二要明确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和措施。

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指出组织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的贯彻。为了解决党员质量差、组织松懈等问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坚持正确的发展党员路线。

三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

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为保持党的领导而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努力克服和防止脱离群众，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提出了要求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措施。

第三阶段：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臻于成熟、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

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使全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指出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在全党的努力下，广大干部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有了很大提高。

党的组织迅速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大党，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比如，关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策与策略问题，关于党的三大作风问题，关于整风运动等等。特别是毛泽东倡导的整风运动，创造了进行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新鲜形式，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明确了怎样以实事求是的观点去看待马列主义理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理论与实践上成功地回答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成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表现为：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批判了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阐述了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基本观点，为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哲学说明，完整地概括了

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都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 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根据中国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包含有"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等"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原理,表明党的建设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的原则。指出党在处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时的正确与失误,都与党的建设、党的前进与倒退、壮大与缩小紧密联系着,构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踊个重要特点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大基本特色。

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对民主集中制作了系统的理论上的概括,提出用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他说明了民主和集中的滑义,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就是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使党的干部路线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对党员标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建立了完备的党员队伍建设理论。

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指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述了三大作风的具体内容,把它上升到世界观与党性的高度来认识,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使党风建设理论具备了完备的形式。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关于党内斗争。论述了开展党内斗争的必要性，指明了开展党内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斗争的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上的是非，又要团结同志，形成了处理党内矛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系统理论。

第四阶段，从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前，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

党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党，从领导革命战争为主，转变为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为主。在这种变化中，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经受住了新的考验。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形势，毛泽东及时作出决策，将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党的建设上，要求全党克服过去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而形成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为了保证党对于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提出建立健全党委制，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为了适应党的地位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号召党的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学习经济建设的本领，告诫全党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防止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等不良倾向的滋长，鼓励全党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使党能够顺利地完成革命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规律认识还不深，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自身建设的经验还不多，党坚持以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指导，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在实践中创造出大量的新鲜经验，使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关于党员队伍建设。要求全党特别重视组织工作，慎重发展党员，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为更高的党员条件而斗争，使党员队伍建设逐步走上正规化，保证了在执政条件下保持较高的党员质量。

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多次强调执政地位使党的作风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作风，开展整党整风运动，把宏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建立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脱离群众的措施、制度，防止蜕化变质。

关于民主集中制。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个人作出决定，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

德,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把实行民主集中制同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强调要在党内开展广泛的民主生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同时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关于党的领导。强调党必须全面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应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改进一揽子领导方式,党委应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的工作,即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地管他们的业务。

关于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强调执政党条件下要增强党内团结,反对搞阴谋、搞宗派;党内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在党内斗争中,要严格区分党内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界限。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首要的问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如果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势必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无党的团结可言。

关于干部队伍建设。指出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干部应学知识,学会经济管理,做到又红又专;要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要开辟脱产干部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实行干部交流,以便使干部开阔眼界,提高工作能力,防止山头主义倾向;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防止产生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

二、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党的建设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这一体系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为它的从属性,即毛泽东建党思想从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一完整体系。这个体系所包含的基本特点在毛泽东建党思想中都能反映出来。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等等,都体现在毛泽东建党思想中。毛泽东建党思想之所以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学说,是由这些特点决定的。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毛泽东建党思想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具有完备的、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建党思想包含如下基本原理：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是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基本条件；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前提等等。这些原理之间包含有自身的逻辑关系，回答了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以及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如何实现党的领导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使毛泽东建党思想成为一门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其核心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领导地位问题，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毛泽东建党思想之中。

毛泽东建党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其他部分具有交叉性，即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显然，毛泽东建党思想体系不能与毛泽东关于其他专门问题的思想混为一谈，但也不是绝对独立、截然分开的。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而党的建设就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不可能不反映出这种历史特点。再如，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映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马列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方法论，是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问题的思想武器，是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前提，因此，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必然地反映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它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问题，又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政党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没有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就缺少完整性；第二，党是掌握武器、冲锋陷阵的战士，没有坚强有力的党，党的一切任务都无法实现。因此，没有毛泽东建党理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就缺少实现的可能性；第三，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的重大发展，没有这一部分内容，就不能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卓越贡献。

三、建设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党必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指明了这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他不仅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近代世界革命发展的基本趋势出发,论证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而且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不间断地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措施,奠定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石。他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使中国革命斗争除了具有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即反对封建主义外,又具有新的历史特点,即反对帝国主义。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不是一般地实现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一转变靠农民阶级或资产阶级领导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指导这样一个复杂的特殊的革命斗争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通过其政党才能实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自身,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了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成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按照这样的目标来建设党,必然会遇到许多其它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所不曾遇到的特殊的复杂问题。由于中国封建、半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工人阶级人数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了人口的大多数,由于中国革命走着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造成了党内的组织成分不是以工人为主,而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居多数。1928 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党内农民成分占到 76.6%,工人党员仅有 7%。直至 1949 年底,工人党员也只占 12.24%,农民成分仍占 75.8%。这种由中国国情造成的党的组织构成的特殊性,带来了党的建设的特殊性,如何把一个以农民成分占居多数的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风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是经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所不曾遇到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文献中,一讲到党的性质,一讲到无产阶

级的领导权，就总是同城市工人联系在一起的，对在农民成分占多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的不少领导人和理论家都曾表示过怀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从事农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关系党的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有很强的革命要求，并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党要扩大自己的队伍，要完成中国革命所赋予的任务，就必须不断吸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到党内来。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又有动摇性、散漫性的一面，在他们的世界观得到彻底改造以前，必然要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来，成为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这就使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成为党内最本质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不解决，共产党就会丧失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会丧失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从事物的本质矛盾出发，从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主导地位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组织、作风上的建党原则，使广大党员在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中得到锻炼，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保障了党在农村环境中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因此可以说，如何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贯穿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红线，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各个方面、各项基本原理，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并由此而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依据毛泽东建党思想，即使工人成分不占多数，中国共产党也能够、并已经建成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毛泽东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是无产阶级宇宙观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的体现。早在1929年红四军党的九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思想方法的科学化问题。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又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第一次把"思想路线"这一概念运用到党的建设、党内生活中来。在经历了三次"左"的错误之后，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

泽东于1936年12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批判了不顾中国特点照搬外国战争和北伐战争经验的教条主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标明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始形成。《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了哲学的概括和表述,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去检验、发展真理,"实践—理论—实践"循环往复就能不断使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这就把党的思想路线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之上,奠定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他生动地概述了"实是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要求全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① 从而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党性联系起来,而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体现,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保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思想基础,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具有了完备的理论形态,而且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二)为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而奋斗,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基本要求。

政党的阶级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党的纲领路线上,表现在它对于社会的作用上。外界正是根据党的纲领路线,根据党的行动、作用来判断党的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突出表现于它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纲领路线,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这样的目标来确立党的纲领路线的。党在其创建伊始就确立了共产主义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而且从未动摇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概括这一认识过程时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① 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在最高纲领之下，还应有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党的二大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这一纲领后来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同样简明地概括了这一认识过程，将最低纲领具体阐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精确地表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并精辟阐述和深刻论证了实现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 把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揭示了党的纲领、路线，最终都是为了改变旧的生产关系，造成"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的政治条件。"③ 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条件"，即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由中国人民取得并掌握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指引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这一奋斗目标，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打下了基础。历史表明，只有在正确的纲领路线引导下，党才能真正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仍坚持上述观点，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而党的这种性质和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上，另一方面又通过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来进一步巩固党。为此，他领导全党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再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④。在他的倡导下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政治路线。在 1963 年和 1964 年间，他又几次提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出这一目标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只有经过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样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动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在几十年内始终一贯地坚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5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1 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17 页。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落脚点。

党的宗旨是党的性质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体现,共产党的先进性,同样突出地表现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

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 阐明了党的宗旨的内涵、准则和基本要求。他强调党的一切决策,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 "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③ 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引导群众为实现自身的切身利益而奋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的经验和创造,重视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了全体党员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这种表里如一的品格,使人民认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坚持党的宗旨对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极端必要性,而且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贯彻党的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大革命时期,他深入到农民群众中调查研究,热情讴歌了推动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变革的湖南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① 这一论述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宗旨。

（四）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组织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把党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规律。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领导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他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以此“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象钢铁一样”②。他详细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对于党的性质的影响，指出“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③ 毛泽东还提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④ 强调党只有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基本制度，才能不断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发扬民主的同时加强组织纪律，防止和克服各种削弱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错误现象。严格的组织纪律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本质特性在组织上的表现。毛泽东把纪律看作无产阶级政党的武器。他强调共产党员要严格执行纪律，对共产党员的要求要高于对一般平民的要求。要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⑤ 为此，要“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82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在科学的组织原则、健全的组织制度、严格的组织纪律规范下,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锻炼中,许多来自不同阶层的党员在党内得到了改造和提高,最终锻炼成为了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能忠实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先进分子,使党在农村环境中锻炼成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执政以后,绝大多数党员能顶住资产阶级糖弹袭击,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使党无愧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

第二章

坚持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

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研究对象是党与群众的关系，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是与党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现对人民的正确领导，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目的；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又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前提。毛泽东领导思想关于领导的本质与意义、领导的职责和原则、领导方法和艺术，领导体制与结构、领导者的修养与作风等问题的阐述，都是围绕党的领导地位与作用展开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领导的理论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的科学论断，精炼而准确地指明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一、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问题，在马列主义党的学说中早已形成相当明确而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点包括：无产阶级是实现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唯一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本阶级的自觉的、独立的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普通开展的条件下，尚未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而且能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夺取和掌握政权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领导权的集中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以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透彻分析，对上述各项原理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和符合中国特点的表述，同时根据中国的特点，把坚持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对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领导问题作为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广泛探索，

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丰富了关于党的领导的理论。

(一)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担当。

在党创建前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中起过骨干作用的许多人,都切身体验到要进行较大规模的联合行动,非有一个能起领导、指挥作用的中坚组织不可。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是可以操战胜敌人的胜券的。有了这种组织意识,在党的筹建中,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建党的目的是为了领导和完成中国革命。毛泽东首先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鼓吹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不觉悟,没有能力领导革命的谬论,指出,深受压迫而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若干倍,他们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的,他们为改变无产的地位,实现共产的要求,必然要革命,必然要党领导。共产党人数目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是自然的结果。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而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只有先把党组织起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因有主义、有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所以能发动劳动阶级,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中上阶级,建立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从人民革命迫切需要党的领导的角度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

党的三大,把实现国共合作,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党内在领导权的问题上,认识分歧极为尖锐。毛泽东从1925年起,连续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通过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环境的透辟分析,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系统的阐释与深刻的论证。

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① 认为:辛亥革命这种以民族革命为表现形式的民主革命,缺乏民众大联合为基础,尤其是缺乏中坚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陷于失败。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一开始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就使革命得到了迅速发展。而1926年后,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不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2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受到很大打击，非买办豪绅的资产阶级也受到了打击。历史表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及中国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一个紧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①

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它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它的人数集中，最易组织起来；它身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三重压迫，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特别能战斗。只有它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必须以它为阶级基础，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也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党对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领导；二是党代表无产阶级的意志对参与革命的各阶级实施领导。

毛泽东揭示了农民尤其是贫雇农是彻底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主力军，但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的这种伟力才能得到发挥。占乡村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先锋，没有他们就不能造成乡村的革命状态，完成民主革命。对待农民运动是坚决领导还是漠视、反对，是检验党能否掌握领导权的基本标志。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是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② 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毛泽东指明，党对于武装斗争的领导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他首先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科学论断，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党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时又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特别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通行的原则是“有军则有权，枪多就势大”。因此，一方面，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页。

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另一方面,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是使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只能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必须争党的兵权,但决不容许争个人的兵权。在总结中国革命18年来的基本经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概括出了对于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作用的三大法宝,抓住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要领。

毛泽东独创性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而且可能实现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长期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只限于争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争夺资产阶级的大部分;要让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走,而不能让无产阶级及其它革命群众跟资产阶级走,不能让资产阶级扰乱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阵线。这些论断大大丰富了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理论,不仅大大减少了民主革命的阻力,而且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领导的本质内涵并指明了实施正确领导的首要问题是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分清敌我,确定正确的策略路线,把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为了分清敌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中的各个阶层进行了具体分析,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判定他们的政治态度;由他们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人数、阶级素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等因素及其相互联系上判定他们对整个政治局势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以此确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团结力量,争取力量,中立力量和集中打击力量,从而为党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指明了科学方法。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作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概括。指出,党以自己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实践,被人民选中为领导者,而人民作出的这种选择,又是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决定条件。"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雄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人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的考验过因

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①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②

（二）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这种领导只能经过共产党来实现。

政权是政党实现自己主张的主要武器，执掌政权是政党活动的直接目的。但是在大革命时期党中央领导核心并未把争夺政权的任务直接提上议事日程。

毛泽东于1927年初尖锐提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农民（主要是贫农），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取农村基层政权的任务，并且认为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还是站在它的旁边乃至对面，是检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反革命的标尺。在大革命失败后，他立即毫不退缩地领导了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并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长期存在，逐步发展直至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的客观可能性。把夺取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摆到了全党面前；并且坚持不懈地领导全党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根据地建设，由夺取局部政权逐步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也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过程。

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自始至终强调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政权的作用，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明确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维埃具有强大的力量，已经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和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要把争取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认为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政权的一般形式，这种政权，“对于动员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特别积极有效”③。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抗日民主政权要容纳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在政府组成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1/3；给中间派以1/3的位置，以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一方面又强调，必须保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1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7页。
③ 《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1939年版，第310页。

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使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是抗日政权多方招致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而不致造成危险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在1940年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扩大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由于其属无产阶级领导,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一点对革命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政权虽然完成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它的每一项成功都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指出,由于中国出现了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就决定了消灭日本侵略者后建立的国家制度,不仅不可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制度,而且也不能是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制度。而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全面肯定,这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大革命阶段之间的衔接点。1953年毛泽东再一次指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把建立体现全国政权的民主联合政府确定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指出将由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基础力量、应团结的力量以及为了建立、巩固这个专政应采取的基本策略作了系统的阐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49年,毛泽东在纪念中共建党28周年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全面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政策。他指出:政党和国家最终都是要被消灭的,但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历史时代,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正是为促使党和国家的消灭而创设的条件。他通过对中

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基本国情的精辟分析，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从而得出结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力量团结一致。对党执掌全国政权后的基本纲领作了高度概括。他具体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一方面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破坏和反抗，捍卫革命成果，同时对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加以改造；一方面是使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继续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进一步肯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巩固革命成果，奠定和平建设基础的重大意义。指出，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如果不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学会对付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革命就会失败，人民就会遭殃，国家就会灭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继续进行了广泛的探索，突出强调了国家的专政职能和党对国家的领导。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① 1957年毛泽东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从党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态度出发，指明了党领导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活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与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话时，把民主当成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基本办法的思想对照，表明毛泽东是把民主当成维持党和国家长盛不衰的关键环节看待的。这一思路，作为党和政权建设的正确道路被党中央历届领导集体所多次肯定。对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政权建设始终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但在根据地建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4页。

设中党仍然把经济建设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上。1928年毛泽东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① 1933年又发出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号召",强调为着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面是削弱战争。他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②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很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③。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为中国有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光明前景,面且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④

解放战争中随着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中共中央及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并制定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在国内,就是要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他还指出:党的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在土改任务完成后,"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各级党委要把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7—1098页。

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领导工作的适当位置。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清晰刻画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提出了把发展生产作为中心任务的思想。强调只有恢复发展生产，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所以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向着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全党要用极大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管理生产的方法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等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会，各群众团体，文化教育，肃反，新闻等其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进行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将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几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及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作了具体分析，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宣告：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党面临着镇反、土改、抗美援朝等巩固政权，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繁重任务，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仍然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作为全党全国的总口号和总任务，始终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由于全党谨慎从事，认真学习，很快掌握了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在同资产阶级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胜利，迅速克服了财经领域的困难和混乱，三年内，国民经济即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

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于是，党中央及时调整战略步骤，于1953年底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经济建设工作摆在了整个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并有步骤地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通过总结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处理社会革命问题，从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上，都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和有利情况的作了充分的估计和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对策，全党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虽然急躁了一点，留下了较多的后遗症，但总的方面是顺利的，其最显著的标志是在此期间社会生产力是全面上升的，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绝大多数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在这一巨大胜利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听取34个经济部门的汇报的基础上写的《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一条跟苏联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围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基本点,在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措施。同时,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的政策,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的号召。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上述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要以国营与集体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为补充等设想,计划生产为主体,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由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开创性的探索。

二、坚定不移地保持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一直没有放松争取和巩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对于如何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如何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团结群众,把领导权扩展到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等问题,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了创造性的回答。

(一)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争取领导权。

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决不会拱手让出领导权,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始终未放松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革命后期,党内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倾向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就一再告诫全党不仅不能忘记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也要时常提防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在同情,参与革命时,扰乱我们的阵线。土地革命后期,主要倾向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限制了革命力量的扩大,从而也就限制了党的领导权的扩大。毛泽东又指出,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国

内主要矛盾大变化时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1937年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在共产党内有些人特别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等人，幻想主要依靠国民党抗战，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要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之初就看到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将更为尖锐严重。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这是原则分歧，忘记了这个原则性，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了无原则的地位。所以，“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①。所谓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力量，领导人民坚持全面抗战。这一原则的提出和坚持，其实质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根据这一原则，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所谓斗争，就是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对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予以回击，反对无原则地退让妥协，以斗争求团结，并从精神上、工作上作好应付顽固派发动完全破坏统一战线的突然事变的准备。这些策略原则的坚持，使抗日统一战线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通过这一统一战线，共产党不仅把广大工农群众吸引到了自己周围，而且团结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乃至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使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作用。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仍要注意同不拿枪的敌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否则，就不能维持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的领导地位得到宪法的确认，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权问题就已彻底解决。毛泽东提出要把是坚持、巩固还是消弱、取消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区别大是大非的两大标准之一，这一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394页。

对于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维护全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二)党的领导的实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毛泽东一贯认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这种历史创造活动不可能自发地进行,需要有坚定正确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只有党的正确领导与觉悟的广大群众相结合,才是克敌致胜和实现伟大艰巨的建设任务的决定因素。早在党的幼年时期,他就明确指出,党是群众的向导,它在革命中的职责就是把群众引上正确的道路。这种依据唯物史观对领导内涵的科学界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全部领导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领导思想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石。

毛泽东于1929年就明确指出:党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其职责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政权。1938年他又说:"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①。共产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其全部作用是当群众还没有自觉时,启发群众自觉,当群众有了自觉后,指导群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领导就是服务。这首先体现为自觉的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有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

领导就是服务，也体现为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一是要平等待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是否真心实意的以平等态度对待被领导的群众，这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他们"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② 二要对人民负责。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③

领导就是服务，还体现为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群众。毛泽东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为了充分动员群众，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必须使党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群众知道"④。总之，所谓引导，就是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⑤

(三)实现党的领导要靠党的正确政策和模范工作。

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⑥ 又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做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10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页。

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①,他认为,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大体需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一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并保证其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1937 年毛泽东指出,党要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1953 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总路线是照耀党的各项工作的灯塔。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体现了党在一个较长的革命阶段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它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党关于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是总路线的具体化和付之实施的不可缺少的具体步骤和办法。没有总路线、总政策作为灯塔,各项工作就会陷入盲目性,而没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作为落实的基础,总路线和总政策,就会沦为空洞口号。领导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制定并坚持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

二是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1937 年毛泽东指出,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条件之一。1940 年他又指出,争取中间势力需具备三个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1948 年他又进一步阐发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②

三是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和具有坚强的战斗力。1937 年毛泽东指出,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又一基本条件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不能象资产阶级政党那样由少数政客来体现,而必须依靠整个党组织来体现。这就要求党的组织坚强、有战斗力。

四是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要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只能靠群众自觉信服而不能靠从外部压服;而群众对党是否信服往往又是直接根据党员的形象来判定的。正由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73 页。

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它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有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宣传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37年毛泽东再一次指出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又一基本条件是：党要提起自己的无限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党所指明的具体目标的模范。

(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战争环境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条件下，党、政、军、民的机构、人员、职责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即战时全力作战，战斗空隙时各自执行原来的党、政、军、民职务。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基本上形成了既统一又分工的一元化领导方式。

抗日战争中，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三三制政权的普遍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迅猛发展，党、政、军、民的机构相应增多，扩大，这就远不如过去机构小、人员少时那么容易集中统一，因而迫切要求有更明确的领导方式来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王稼祥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论述了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必要性。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民主制度的实行和抗战的地区性、游击性的增大，要求每一地区活动的独立性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种组织更加密切配合，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决定》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决定》根据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处理党与政、军、民；政与军、民以及军民间的关系从政策和组织原则上作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决定》指出，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指示，同级军政委员会及其政治部、政府、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在其中工作的党员均需无条件执行；同时政、军、民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则应报告上级有关机关。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决定、决议、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

级和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决定》还指出,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中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这就是说,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决定、指示和纪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最有效的行动。《决定》还说:"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这也就是说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是统一领导的目的,一切服从政治任务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解放战争中,解放区迅速扩大,逐渐连成一片。全国胜利在望的形势,要求党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为此,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以后中央又接二连三发出了关于执行这一制度的指示,严厉批评了那种把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和控制的部队看成独立王国的危险倾向,强调"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加强党对一切工作、一切部门、一切地区的统一集中领导,对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均发挥了重大作用。

1962年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鉴于几年来党内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有所滋长,特别强调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会议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论述了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的必要性。认为政权是直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有效的机关,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科学、文化、教育、文艺作为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紧密联系的上层建筑,给予在上层建筑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权以多方面的支持,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必须切实加强对这些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并且充分肯定了通过制定各种《工作条例》,明确具体方针、政策、办法,以实现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的作法。毛泽东还多次说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不可能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所谓"集中统

一”，主要是指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三、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毛泽东亲自领导革命和建设达半个世纪，积累的领导经验十分丰富。从30年代以来，毛泽东就注意不断总结领导工作经验，引导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进领导方式、方法和作风。从而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不仅在自己的哲学、政治、军事著作中，有意识地总结领导工作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还亲自起草或建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专门阐明党的领导原则、方式、方法、制度的文献。这些文献及毛泽东的许多论述紧紧围绕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主题，构建了相当系统的领导理论。

七大在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时，对毛泽东的领导思想也作了精炼的概括。指出党在领导工作中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正确分析形势，确立正确策略，并由此而确定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毛泽东于1949年又再一次强调了解决领导方式、方法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改善党的领导问题给予了更大关注，建国初期，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以及随后进行的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和解决“五多”（任务多、会议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等项工作，都是为改善党的领导而采取的及时有效的措施。八大总结了党执政七年来的经验，指出，执政党面临艰难的任务和严峻的考验，特别需要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并就坚持群众路线、健全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员素质，改善党的组织形式和完善党的制度等几个对于改善党的领导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发，为执政党如何实施正确领导指明了方向。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解决大跃进中

党的领导方法和作风方面出现的一系列不良倾向,毛泽东针对大跃进中的教训特别是领导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作了更深刻的论述,亲自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并倡议制定了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条例,使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进,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得到了明显恢复,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在60年代中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

1928年毛泽东首先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1929年分别提出了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概念。指出决定党的性质的东西,是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强调建立从中央、地方直至基层、党小组的有机的统一的组织领导关系,这些论述从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理顺党内领导关系,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高度阐明了党的领导必须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三者之统一。

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毛泽东于1937年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所谓政治领导就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也就是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并最终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抓紧思想政治领导,必须做到:注意大事,提高政治警觉性,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外思想斗争,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为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首要条件是要制定和坚持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形成和贯彻,又要靠全党特别是党中央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统一的了解和广泛的共识。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路线问题,认为它的正确与否,决定党领导的全部事业的成败、党的路线不但要使党的领导干部都知道,而且要使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都知道。

思想领导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讲党的思想领导总是把它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同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联系在一起。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用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指明了党的思想领导的内涵。1937年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在军民中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即用进步的政治工作贯注进步的政治精神,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清楚地指明:党的思想领导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用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就是对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引导党员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对人民群众贯注进步的政治精神，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毛泽东多次提到政治工作是军事工作、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 指明了思想领导是实现政治领导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在解决组织问题时，总是强调做人的工作首先是做思想工作，离开思想领导，没有群众的自觉性为基础，组织领导就会沦为强迫、包办。指明了思想领导同时也是组织领导的前提和基础。

组织领导是实现思想、政治领导的保证。毛泽东一再强调，明确政治任务之后，要从组织上切实保证，它包括：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端正组织路线；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扩大党的队伍和防止奸细混入；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通过恰当地分配使用干部以之为骨干，组织动员党员和群众实现党的政治任务；严明党的纪律做到是非清楚、奖惩分明，以激励、督促被领导者切实完成任务等。从确保政治领导实现的角度，阐明了组织领导的意义及其内容。

(二)领导者的责任及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明确领导者的责任是实行领导的前提。领导者如果不清楚或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领导工作就抓不住要领，形不成领导。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②；又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③，加上他一再强调的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他把领导者的责任概括成为了四个方面：第一决策，第二执行决策；第三用人；第四做政治思想工作。

1929年毛泽东就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领导过程也就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决策正确与否，是能否实现正确领导的先决条件。所以，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就是正确分析形势，实行科学决策。为此，要求领导者要作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依此与总任务联系，确定一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定适当的口号和策略,估计前途远景;要掌握规律,了解全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局部与全体、眼前与将来、权利与义务、消费与生产等各种利益关系;要吸引广大党员和群众参与决策,即由党员和群众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然后由领导集体起加工厂的作用,制成完成品,即拿出办法;要注意决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既要考虑各个不同阶段上决策的前后衔接,以及同一阶段内,从总体上考虑各方面决策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保持统一性和连续性,又要注意不断地总结经验,修正完善决策,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要求领导者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他说:"领导者的任务,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①。指明了领导者的又一项责任是认真推动决策的实施,即在贯彻执行决策的过程中要通过亲自办点和抓紧对下属机构、人员的检查督促,掌握情况、经验、政策、方向,及时纠正偏差,使决策真正落实。毛泽东认为组织实施决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修正、完善决策的过程。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考验;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过程中得来的。各地所犯许多错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来能明确的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来能分清政策的界限。

"用干部"是毛泽东把它与"出主意"相提并论的领导者的另一大责任。他指出,使"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也就是要围绕实现"主意"的需要,合理地调配干部,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在"实行主意"的过程中培养、提高干部。为此,要求领导者用人时必须公道正派。

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者的一项经常性的责任。各级领导亲自动手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再强调,领导者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要首先做好领导者的思想政治工作。执政以后,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忘记这一责任。指出:工、农、商、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46页。

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中央和省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

领导原则，是领导活动规律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活动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反映了党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划清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与剥削阶级统治、管理的原则界限。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所谓坚持原则，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①。这一论断指明，所谓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指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革命时期，正确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是检验政治方向是否端正的首要标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处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检验政治方向是否端正的首要标志。

二是坚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1941 年毛泽东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结合的高度阐明了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思想。他说，"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 1948 年他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三是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在投身社会革命之初就在对群众力量充分信任的基础上，表明了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对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的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对群众观点的理论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从多角度多侧面作了广泛阐释。1957 年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国家生活中的总题目，强调，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们党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四是坚持集体领导。1948 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对于加强党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4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1 页

集体领导,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掌握领导方法,讲究领导艺术。

毛泽东一贯强调实现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提出任务与明确作法统一起来。"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工作方法上求得进步,他组织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领导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把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紧紧连在一起。他认为,领导方法,说到底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既是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法。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鲜明的党性,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这三大活的灵魂,也就是毛泽东领导方法论的活的灵魂。这三大灵魂又是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盲从迷信尖锐对立的,毛泽东强调:"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①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②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具有丰富的内容。最能反映本质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三方面,这就是调查研究,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精练地指明了调查研究是端正思想方法改进领导方法的不二法门。只有调查所要解决问题的现状和历史,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③。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只有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社会各阶级现在的及历史的政治经济情况,主要方法是解剖社会各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调查的技术是:开调查会作讨论式调查,提出中心问题,经过辩论,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调查对象应为深切明了情况的人;领导者要亲自作调查,要深入了解一处地方、一个问题的底里,要自己做记录。1961年党中央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48—949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0页。

我们的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要求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党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亲自作调查，因为他们"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指示信》还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抱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理，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表面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实践证明，毛泽东所一再倡导和阐明的调查研究方法，始终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在工作方法中的统一。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同时也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这一论述，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正是他关于理论来源实践，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思想，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化；二是正确的领导意见要见之于群众行动，必须善于使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他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②；三是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在实际工作中所经常采用的解剖麻雀、以点带面，典型示范的方法，都是一般与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别相结合的方法的具体运用;四是总结、推广经验。总结、推广经验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是实现一般与个别结合,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有效途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的基本方法。毛泽东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极坏。"① 为了解决矛盾,首先要认识矛盾,所以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他强调,研究矛盾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要求对千复杂事物,要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不要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为此,他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说,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只见局部,不见整体;所谓表面性,就是不分析事物的内在规律,抓不住本质。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为了克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是局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

毛泽东对领导艺术的意义及其运用作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论述。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多次指出,指挥艺术运用得当,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就能凭着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领导艺术是领导者运用领导理论的切身体验。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反复阐明的领导艺术,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抓住主要矛盾,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毛泽东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又说:领导人员依据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种领导艺术,通常被简洁地概括为抓住中心,带动全盘,保证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点，照顾一般，注意综合平衡。

二是照顾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和同盟者一道干，毛泽东强调，当多数群众还不觉悟时，切不可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而要善于等待，耐心启发。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强调要爱惜群众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在对敌斗争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他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他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策略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都体现了依靠绝大多数人的力量，团结自己，孤立敌人的思想。这一切就构成了毛泽东策略思想的基本点。

三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1)审时度势，力争主动。毛泽东说：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为主动性的东西。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期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考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2)随机应变，善用策略。毛泽东说：“当着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② (3)在曲折迂回中前进。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应该允许必要的让步、妥协、退却。他说：“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③。(4)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毛泽东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④ (5)针锋相对，敢于斗争。毛泽东认为，在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就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在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我党处于明显劣势，毛泽东仍然针对蒋介石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强调：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4页。

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骗去,那是办不到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胆略的胜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① 这就是被毛泽东提到了无产阶级党性高度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四是巧妙而及时地提出口号。毛泽东十分重视口号的作用,1929 年他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说: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要依不同的时间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四)增强领导者的修养,提高领导者的素质。

1937 年毛泽东从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要求出发,阐明了加强领导者修养的重要性及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他说: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有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泽东认为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主要有:

一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毛泽东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注意思想意识修养。毛泽东认为思想意识修养的集中表现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6 页。

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人民的人”①。

三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毛泽东号召党员要像白求恩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更是一再号召党的领导干部学会领导经济，指出各行各业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四注重纪律修养。我们党历来要求任何领导干部不管他资历多高，功劳多大，都必须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而不能成为脱离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对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应当遵守的纪律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级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无条件地执行该委员会和该代表会的决定，如有意见分歧，除提请该委员会或代表会再议或向上级党委申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与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未经党委授权不得以党委名义向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不得向党内党外任何人泄露党委内部活动的机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和干部的模范。

五保持良好的领导作风。优良的领导作风是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它是党性纯正的外在表现；领导作风端正，不仅能使被领导者心甘情愿地服从领导，满腔热情地完成领导者交给的任务，还可以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②

为了提高领导者的素质，领导干部要自觉的加强修养，党组织要加强教育、帮助、监督。毛泽东主张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自由主义的倾向，以提高全党的素质。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一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保持崇高的理想情操;旺盛的学习热情,良好的工作作风,健康的精神面貌,始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表率作用。

第三章

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

毛泽东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政党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相互关系，找到了党领导人民克敌制胜、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致力于将这一原则运用到革命和党建的实践中去，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不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也因而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理论主要包含：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和党的兴衰存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出自己的政治路线；党的自身建设要密切联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就是同“左”右倾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党要积极正确地开展反倾向斗争；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有赖于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

一、党的事业的胜利和发展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迅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流中，斗争坚决勇敢，因而受到了渴望改变中国面貌的志士仁人的拥护，党的队伍也迅速扩大，但是毕竟由于理论准备不够，对中国国情了解不深，缺乏一条适合国情的对内团结队伍、对外号召群众的政治钢领和路线，党的步调不统一，以至连续遭致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失败，党和革命群众都受到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大革命与土地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事业和党的建

设所以会出现两起两落,从主观因素看,主要是缺乏一条明确地能实现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的政治路线,党要真正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致力于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据此制定和坚定地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代表着人民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是党实施政治领导的主要内容。它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行动方向,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一)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革命事业的成败和党的兴衰存亡。

党的路线决定党的事业的成败。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①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党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②。正由于抗日战争中,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与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和国内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路线,从而迅速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的路线决定党的组织兴衰。党的路线是党克敌制胜的"武器",而党本身则是掌握"武器",实现对敌冲锋陷阵的"战士"。路线的制定、执行在于党,但又对党的建设有决定性的影响。党的历史充分说明,坚持正确的路线,党就壮大、巩固;反之,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出现偏差,党就必然遭到挫折,蒙受损失,甚至被敌人打散或本身分裂瓦解。毛泽东指出:"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8、610页。

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①

毛泽东揭示出来的这一建党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条普遍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而在短时间内顺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的建设也出现兴旺发达、蓬勃向上的景象。党的"八大"虽然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由于未能很好地执行，致使在后来的10年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由于政治路线处理不当，而导致错误地进行反左倾、拔白旗等党内斗争，使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遭到不应有的打击，严重挫伤了党员的积极性，虽然党员的数量没有减少，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却明显加重了。

(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政策和策略是党根据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规定的具体行动路线，以及为实现这一路线所采取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和革命口号。政治路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政策和策略则是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的政策，是政治路线的延伸和具体化。

毛泽东深刻阐明了政策和策略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多次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因为：第一，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第二，政策和策略是实现党的路线和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

证。党不但要提出自己的战略、路线和方针,而且还须提出实现这个战略、路线和方针的具体政策和策略。第三,政策和策略对实现党的领导具有重要作用。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要靠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才能争取到。第四,政策和策略是统一全体党员和干部思想的锐利武器。

毛泽东还指出了党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所应遵循的原则和依据。一是毛泽东一再强调,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就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切实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其变化。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阶级的利益要求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阶级力量对比作出准确的分析。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这是党实现正确领导的主要依据;而党所犯的错误,则来自于离开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二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出发。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① 三是要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② 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的主要表现是:在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的前提下,依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来潮或退潮的形势,及时提出适应情况变化的斗争方法、组织形式和行动口号,以代替已经不适应情况的过了时的斗争方法,组织形式和行动口号;正确区分两种性质的妥协,善于实行革命的妥协,有争有让,争有原则,让有限度;正确对待谈判,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等等。

毛泽东是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代表,在制定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同时,提出了丰富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策略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对敌斗争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

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和坚持党的政治路线，以之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并指明了制定和坚持政治路线的三条原则：第一，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都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性的结论来。第二，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际出发，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即中国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必须学会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第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和经验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毛泽东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路线的确立。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并没有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当作教条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强调建立符合中国特点的统一战线，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解放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没有接受国际上有人劝说同国民党合作，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的意见，而是从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策略。当解放战争快要取得完全胜利时，党和毛泽东又坚决顶住了主张国共划江而治的建议，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针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特点，采取赎买政策和自愿合作的方式，在不造成大的社会震动、不影响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前提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一)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入进行理论探索,逐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所作的精辟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上,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①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还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保持,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很软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治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军阀官僚的统治和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由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由于中国实际上长期处于不统一状态,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因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在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上,毛泽东指出,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毛泽东认为,确定革命对象的标准,是要看哪个阶级"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②,是看哪种生产关系束缚和破坏生产力。依据这一标准,他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6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统治;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① 不能把完成这两大任务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

在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的性质上,强调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已经属于已迅速成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更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成为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任务仍然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反帝反封建,仍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已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在革命的动力上,毛泽东指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他们能够而且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完成革命的任务。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些优点外,还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觉悟、最便利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因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阶级中的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革命中的态度是不同的。富农带有较多的封建性,在反帝斗争中可能同情革命,在反封建斗争中可能保持中立。中农不但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接受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农和雇农占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因而反抗最强烈,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可靠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但是,这个阶级具有先天的弱点,有时容易受资产阶级影响,不太坚定。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另一面又有对敌人的妥协性。这种两面性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②,由于先天不足,在政治上经济上异常软弱,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两面性表现为革命中的动摇性,有时"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有时则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①。

在革命的方式和道路上,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② 而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对于革命的镇压异常残酷,又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③ 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④,中国革命只能和必须走一条独特的、不同于欧美国家的道路,即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阶级,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再者,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革命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顽强地奋斗下去,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农村的红色革命政权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有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可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受大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基本矛盾会日益激化,从而有利于红色区域的发展;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正确,是保证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要紧的主观条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必须放手发展人民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红色政权,并且把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54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2、634—63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2、634—635页。

四者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可走的道路的论述，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在革命的步骤和前途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① 而“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② 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力量不容许。第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容许。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到巩固，国民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国际形势也不断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发展。这样，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就历史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深刻总结了建国3年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围绕这条总路线，还制定了关于工业化和公私合营、合作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前10来年，实现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大部分任务，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毛泽东还深刻揭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必然性，他指出，新民主主义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和增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内在驱动力，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在过渡的条件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必须彻底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必须有力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

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反动分子的进攻,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必须搞好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必须抓紧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等等。

在过渡的道路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人口多,耕地少等基本国情,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表现、现实特点,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在过渡的方法上,毛泽东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改造;要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积极引导,使它们逐步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在过渡的步骤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同步进行,而不能等待工业化发展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过渡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不能急躁冒进,不能一蹴而就。

总路线规定要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和唯一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使现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起支配和领导作用。总路线规定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决定的。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政策、国营企业、它们本企业的职工以及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把它们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总路线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化"与"改"之间,这一"改"与那一"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

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进行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生产中使用的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工作，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相适应，我们党又制定、实行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工业化方面，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探索了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到1957年，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五”计划各项经济指标胜利完成或超额完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党积累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很高，干劲很大，对于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愿望也很强烈。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制定出来的。

1958年5月5日到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通过了党

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总路线的各个方面。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由于毛泽东同志及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使中国经济和党组织本身都遭受了严重损失。

三、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

1939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18年来的基本经验,概括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成长和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都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

级的欺骗,而使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

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党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更多地领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就能够胜利地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获得了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党的领导机关中的一部分人因为不领会过去的经验,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理解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故没有能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迫使党和红军不得不离开革命根据地,实行长征。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都损失了近90%。直到遵义会议,党才开始走上正确道路。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人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革命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均获得了伟大的成功。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党的建设理论也逐步完备:首先,对党的建设的历史及其正误得失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毛泽东指出,从党的各个发展阶段看,当着我们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时,革命就胜利,党就发展;而当我们认识不清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能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时,就会犯路线错误,革命就会失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决定党的命运的根本因素。其次,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建党路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党的建设,关键是要在全党确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并把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起来。着力于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和把握,这条路线用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在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的同时,还须对党本身进行组织上的整顿和建设。这就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毛泽东建党路线。按照这条路线,进行党的建设就要做到:

(一)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围绕党的政治纲领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革命的转折时期,他特别重视党的政治建设,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积极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主客观条件,为了开创、坚持、发展革命根据地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强调指出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①。1929年12月,他针对部分党组织政治领导软弱无力的情况,指出了"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②。1930年,针对红军中存在的照搬外国经验、照搬书本,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再次指出了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由于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主张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被排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遵义会议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险时刻走上全党的领导岗位。在遵义会议上,首先解决了最为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又领导全党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正是由于毛泽东把确立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摆在党的建设的中心位置,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实现正确的政治领导,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二)对党员进行政治路线教育,保证全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重视对党员进行政治路线的教育,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密切联系政治路线进行原理的内在要求。早在井冈山时期,针对红军中农民和游民无产者较多的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89页。

况，他提出要对红军“加强政治训练”，使他们懂得党的路线和任务，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1929年，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了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① 提出大力加强对党员的政治训练，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提高党员对正确政治路线的认识，使红军真正成为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分析我党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原因，引导全党认清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提高全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自觉性。并通过整风形式，引导党的高级干部及全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清除党内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把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了党的政治路线上来。

（三）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在思想建设方面，毛泽东指出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为保证正确路线的执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员要自觉进行党性修养，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同党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党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如果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党的任务分离开来，那便使得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

在组织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拔使用“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的干部，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都“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与友军发生关系时，还应“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②。要加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527、522—523页。

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调动全党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奋斗。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毛泽东把培养良好的党风上升到党性原则的高度,指出,只有党风良好,"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

四、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同"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在同"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坚持贯彻执行和完善发展的。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必须学会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以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一)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同"左"右倾错误倾向斗争中发展完善的。

毛泽东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曾遭到两次严重的失败。1927 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之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 6 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 1 万党员。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而转战陕北。王明的"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 30 万人减少到 3 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 30 万人减到 4 万人左右。1935 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左"的右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真总结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教训,深刻分析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坚决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或从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0 页。

主观主义，在肃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的斗争中，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正确有效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要正确有效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什么是“左”、右错误倾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把“左”的错误当右的错误反，结果越反越“左”，使“左”的错误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社会主义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许反右，不许反“左”，反“左”成为禁区，结果使“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登峰造级的程度。事实上并不是工作中思想上的一切偏差和错误都是“左”和右的错误，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

第二，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斗争，还必须深刻认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危害。毛泽东认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左”和右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 “左”并不比右好。“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

第三，实事求是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要注意一种错误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历史的经验证明，反右的时候，容易出“左”；反“左”的时候，容易出现右。“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可以互相转化，殊途同归，共同危害革命事业。

第四，要正确把握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方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时，曾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机械的过火斗争。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都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他指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毛泽东分析了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① 针对机械过火的斗争,毛泽东提出了反对错误倾向应遵循的基本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的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有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② 对犯错误的人要进行具体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犯错误的同志,一看主流、二看本质。过去反倾向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要坚决克服上述缺点,必须认真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党的团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9—3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828页。

第四章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

一、群众路线的提出和发展

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就重视群众的作用，重视群众工作。他深入农村，向农民作社会调查；创办工人夜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建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公团联合会，广泛进行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1917 年 7 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明确提出了要以民众大联合对抗强权贵族和资本家，以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主张。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兴起，他说：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思想。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为着实现党的政治任务，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教育他们，使战争能不断得到新的群众力量，要动员群众进行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条件；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满足群众的

需要,做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就能使群众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务极为艰难,面对强大的敌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更为迫切。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对广大的群众做"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在组织、宣传工作的实践中,党关于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日渐丰富。党的群众路线日趋成熟,形成了完备的理论形态。

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是1943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各个环节及这种领导方法的哲学基础作了十分完整而深刻的论述。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作了系统的阐释,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说到底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为了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树立群众观点,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党的七大对群众路线的系统阐述,促进了全党对群众路线从感性认识到向理性认识的飞跃。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把坚持群众路线与领导人民巩固政权,运用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联系了起来,使群众路线获得了新的丰富内容。毛泽东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② 毛泽东认为,广大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领导机关应把群众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0页。

次把群众路线写入了党章的总纲，指出“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①。同时对群众路线作了更为深刻的阐述，明确地把群众路线概括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两个方面，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对执政党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根据党执政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贯彻群众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强调执政党要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第二，强调联系群众，必须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指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② 第三，强调贯彻群众路线，必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说：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国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们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特别是由于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和自满情绪，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的错误，以致使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受到了破坏，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失。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重新提倡开展调查研究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1961年4月，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把“反对恩赐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列为“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之一，并且郑重地提出了要向群众寻求真理、端正党的作风。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让群众说话”，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联系1958年以后的工作经验教训，他指出：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而不能搞那种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利益的“群众运动”。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6页。

二、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泽东一贯重视人民群众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① 的著名论断。人民群众对于党的事业的作用,说到底是由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我们党的群众观点,首要和基本的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② 没有人民群众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人们便无法开展其它一切活动,便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任何精神产品都是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对精神财富的创造固然有重要的贡献,但这种创造的最终动因和认识源泉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但成为精神文明日益进步的动力和源泉,而且许多劳动者也直接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许多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艺术家就是在直接从事生产的普通劳动人民中涌现出来的。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不仅表现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和不断进步上,也表现在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上,毛泽东认为,在这种变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也是人民群众。这是因为,社会的变革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由于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不断产生着量的变化,往往使原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从相适应逐步变得不相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页。

适应乃至最终产生尖锐的矛盾。当着原有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一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时，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民群众，就必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并且会积极行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以摧毁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发展的飞跃。一切真正的社会革命，实际上都是劳动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摧毁腐朽的旧制度而建立富有生机的新制度的斗争。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巨大变革，每一次社会形态的交替，都是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结果，诚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阶段，有的剥削阶级和集团也能参与摧毁旧的制度的斗争，有时甚至还是这个斗争的领导者。但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和决定力量终究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充分肯定这种作用。他指出，个人的社会活动对历史起或多或少的作用，其中顺应历史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历史的前进。这种杰出人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们提出的先进思想，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他们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担负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任。但是，毛泽东反对夸大个人作用，不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也不承认“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而只承认归根到底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他认为杰出人物也是历史的产物，是从群众斗争实践中产生的；他们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及怎样改善这些条件，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时，才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任何杰出人物的作用都离不开历史条件，离不开群众及其实践。

(二)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

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深刻地指出了人民群众成为党的力量源泉的客观必然性，然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能成为我们这样一个党而不会成为非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源泉，又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党与群众的特定关系决定的。

第一，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代表，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常常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当作同一概念使用。“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解放靠自己去争取，自己

的利益靠自己去奋斗,而不是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人民群众一旦认识到党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就能在自己的先锋队领导之下以真正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极大的政治热忱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第二,人民群众是个整体,党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党的外延不能包含群众的全体,否则的话,就抹煞了党同群众的区别,党的先锋队性质也就不复存在。但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一个局部的力量毕竟有限,而整体的力量才是没有穷尽的。所以,毛泽东强调,单有党还不行,党只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

人民群众作为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表现在各个方面。它既为党赢得自己事业的胜利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又为党的队伍的壮大输送新鲜血液,为党的建设的加强提供有力的支持;既为我们党提供精神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又为我们党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第一,民心所向是党夺取胜利的前提和基础。民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多数人的意向。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政治集团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都要受到民心向背的制约。"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是一条铁的规律。党的事业的成败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比做"水",告诫党要顺群众那个"水"而不要逆那个"水"。"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

第二,群众是在物质上的支持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依托。党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党进行活动的物质条件就是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财富。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的思想。

第三,群众对革命斗争的积极参加是党夺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毛泽东说:革命靠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新生的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战胜腐朽然而却是强大的反动派,只有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

第四,群众及其实践是党的智慧的源泉。党的智慧、党的聪明才智,归根结底来源于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来源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所以毛泽东强调

共产党员要“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①] 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每当发生革命转变或党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特别强调到群众中去请教，让“群众想办法”。

第五，党组织的扩大和巩固也离不开群众。党的力量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群众的力量，它作为党自身系统的一种功能，直接地取决于自身的状况，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首先是数量，党只有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才能在群众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和更大的凝聚力，才能在斗争中表现出更大的战斗力。毛泽东对党员的数量和党的规模十分重视。他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②]，使自己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其次是质量。毛泽东更重视党员的质量。他一再强调共产党员要增强党性，做各个方面的模范。毛泽东认为党要有力量，就要处理好个人与党、少数与多数、下级与上级、军队与地方、这一工作部门与那一工作部门、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全党与中央等等关系，“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下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③]。而党能否扩大自己成员的数量，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不但决定于自己的工作，而且也取决于群众对党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党如果不能不断地从群众中吸取新鲜血液，不仅党的队伍不能扩大，原有的规模也难以保持。只有广大群众认同党，向往党，他们当中涌现许多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党才能按照自己的建党方针不断地从党外群众中吸收新的力量，使党员的数量得到增加，规模得到扩大。同时，党员素质的提高和党在结构上的改善及优化，也离不开群众对党的建设的关心，特别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这一切都只有在群众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之后，才能实现。

（三）在一切工作中依靠群众。

毛泽东把相信群众提到了党的根本原理、根本观点的高度。他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关于信任群众的思想包括丰富的内容：一是相信群众的觉悟，坚决反对“群众落后论”。群众觉悟的过程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从整个过程来看，只有落后的工作，没有落后的群众，如果党的决策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肯耐心细致地做启发群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60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7页。

众觉悟的工作,群众就一定会觉悟起来的。二是相信群众的力量,坚决反对群众无能论。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只要我们提出的口号和任务不脱离实际,群众就一定能实现的,三是相信群众的聪明才智,坚决反对群众愚昧论。毛泽东说:"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①,只要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诚心向群众请教,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群众总是能找出恰当的答案的。四是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作为个体,只有融入整体之中和整体的目标、步伐相一致,才具有作为整体中一个有机部分的力量。

毛泽东关于依靠群众的思想是相信群众的信念在具体实践中的贯彻和体现。相信群众是依靠群众的认识前提,但不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就只是一句空头的毫无实际价值的口号。毛泽东说: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党对群众的依靠,贯串于党的活动的全过程和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搞革命要依靠群众,搞建设也要依靠群众;在工作遇到困难时要依靠群众,在工作顺利时也要依靠群众;开展重大的带全局性的工作要依靠群众,开展日常的、局部性的工作也要依靠群众。在20世纪50~60年代,有人认为搞建设不要依靠群众。毛泽东批评说:有人认为,做革命工作,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建设工作,只要依靠少数懂得技术的干部就行了。这个说法不对,在任何时候党都要依靠群众这个整体。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出发,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出发,鲜明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 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串于党的事业的始终和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毛泽东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在一定时期或一些工作中,可能产生失误,这些失误也确实会不同程度的损害人民的利益。但只要党对所犯错误采取郑重负责的态度,敢于承认错误并切实改正,这就不仅没有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恰好是坚持党的宗旨的体现。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是出现了错误以后怎么对待。毛泽东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① 历史上我们党的每一次错误,正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教导自己加以纠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是对各级党组织的要求,也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需要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党对共产党员正当的个人利益是充分尊重的。但是,共产党员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共产党员只能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正当的个人利益。

我们党之所以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由党所代表的阶级基础和党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天然对立物;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的利益,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利益,何全人类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其它阶级的政党根本不同,它能把为绝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7页。

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指出:"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①

(二)决策和决策的执行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首要的问题是要保证决策及其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强调,党的"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②。决策依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检验决策是否正确的最终标准,即是决策付诸实践的社会效益是否于人民有利。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时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这是我们检验党的组织、干部和党员对党的宗旨究竟抱什么态度的首要标尺。

要保证决策正确并使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决策过程中紧紧依靠群众。决定政策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执行政策也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一切政策的决定、修改和执行,口号的提出与转变,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在决策前要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决策是对未来目标的确定,它是一种将要见之于客观实际的主观活动方式。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决策者对社会问题和人民利益、意志、愿望的正确认识为前提。毛泽东说: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只有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所在,才能为制定正确的决策奠定科学的基础。

在决策过程中要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要使决策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就必须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决策方案的制定,以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确定决策的基本依据。

在决策制定后,要依靠人民群众去贯彻执行,并在群众实践中不断完善。毛泽东说: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轻视群众的实践,不认真发掘、总结群众的经验,也是背离党的宗旨的表现。

---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5月出版),第8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三)党员、干部要当好人民公仆。

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不少党员在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担负着一定的职务,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毛泽东更是不断告诫他们要牢记和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在这种情况下,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就是正确对待自己的职务和权力,树立起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当好人民的公仆。

我们党之所以强调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首先是由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因为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高代表,它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决定了党员和干部的责任都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担任一定的公职,这决不能成为党员、干部参加革命、参加党的目的,而仅仅是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条件。毛泽东曾多次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其次是由我们国家权力的根本属性决定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是说,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才是权力的真正主人。人民群众为了有效地行使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就要推选出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作代表并赋予他的相应的权力,行使管理的职责。因此,我们的干部不管是选位的还是委任的,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和程序产生出来的,他们手中的权力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赋予的。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只能用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否则,作为权力所有者的人民群众有权将其收回。有些人认为权力是凭自己的本事挣来的,或者认为是对自己贡献的一种酬劳,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自觉不自觉地把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这就是对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人民的背叛,歪曲了权力的性质,亵渎了权力的神圣性。

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① 这已经包含作为人民公仆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必须勤政和廉政的要求。勤政就是要为政勤勉,即对人民交给自己的工作,要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尽职尽责地干好。在工作中要勤于思考,开动机器,多想办法。而不要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知难而进,而不要畏首畏尾,消极怠工,当懦夫懒汉;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和解决问题,而不要深居简出、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廉政就是要为政清廉,即在工作中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刚直不阿,不凭感情用权,不用权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力搞亲亲疏疏;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图名,不图利,除了政策和制度规定的正当的个人利益外,绝不利用权力谋取任何私利,不搞政治上生活上的特权。在执政实践中,勤政和廉政是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正是人民公仆政治本色的体现。

(四)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指出,只有解决了群众从土地、劳动到柴米油盐等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痛痒,才能说我们党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①]。关心和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体现,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还关系到能否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实现党对群众的领导。毛泽东指出,领导者要实现对被领导者的领导有两个必要条件,即给以政治教育和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要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首先应对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做好统筹安排,找出恰当的解决办法。群众的实际问题,包括群众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他们难以处理的实际矛盾,表现多种多样。比如,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经济困难问题,一些地方交通不便的问题,待业人员的劳动就业问题,群众关切的社会治安和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表现又有所不同。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不应该而且不可能有固定的方案,必须看当时当地的情况而定。但是,有两点是确定不移,到处适用的,一是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二是要办实事,求实效,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切实保证群众得到实在的好处;而绝不能增加群众负担,劳民伤财。

四、必须对群众进行教育和引导

(一)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处理同群众的关系上,也要讲辩证法:既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引导群众前进,深刻揭示了党和群众之间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双向关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

“党离不开人民”。党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是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解放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政治代表。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代表群众和为了人民群众的，离开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人民群众又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党的事业”要取得胜利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

“人民也离不开党”。在人民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个体，这些不同的群体和个体在局部利益上往往又存在着一些矛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不是由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群体能代表得了的，能集中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只能是他们当中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最先进的一部分，这就是共产党。由于共产党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进的、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一部分，它通晓社会发展规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民群众自身根本利益的实现，也就离不开党的教育、组织和引导。

首先，处于各种具体条件下而又缺乏科学世界观作指导的群众，往往只能认识和把握他们具体的、眼前的利益，而要认识与把握自己的根本利益，认识自己的伟大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党的奋斗目标与自身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必须掌握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社会主义意识不能在群众中自发地产生，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只有对群众宣传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党的政治主张，才能使他们大大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自身解放的目标而斗争，在具体利益与根本利益发生矛盾时，才能以具体利益服从根本利益。毛泽东强调：“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①

其次，人民群众要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整体的力量，必须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和领导的责任，必须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承担。离开党的组织和领导，群众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因此，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第三，人民群众的事业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正解分析客观形势和科学预察其发展趋势，把握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这就离不开先锋队在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这种政策对群众进行指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4页。

人民群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共产党作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的实践顺利达到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的预定目标的必要条件。

(二)坚持两个原则,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在对群众进行教育与引导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坚持两个原则,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这就是:坚持自愿原则,反对命令主义;坚持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反对尾巴主义。

第一,坚持自愿原则,反对命令主义。

毛泽东认为,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尊重群众的意愿,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建立在群众自觉与自愿的基础上。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党员、干部代替群众下决心。

与自愿原则相反的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群众接受党的主张,按照党的要求行事。毛泽东批评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这就是急性病。犯急性病的人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成群众自己的任务,不知道如何才能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行动起来,这就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命令主义往往和"左"倾盲动主义、官僚主义相联系,它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只凭少数人的主观愿望办事,其结果适得其反,只会把事情弄糟。

坚持自愿原则,不搞命令主义,就必须善于等持。毛泽东指出:"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①] 党率领群众开展的工作,虽然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群众自身的利益,然而,为群众谋利益的事情并不见得一下子都能为广大群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2页。

如果群众还没有这种认识，客观上的需要还没有变成他们主体的觉悟和需要，不耐心等待，而是依靠行政命令强迫群众去做，只会欲速则不达，甚至好心办坏事，引起群众反感，甚至发展到行动上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在多数群众暂时还不觉悟的情况下，善于等待，就是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好的艺术。

坚持自愿原则，不搞命令主义，必须用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对群众觉悟的等待，是积极能动的等待，它要求在等待中创造条件，做好工作，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启发群众自觉是必须做的第一步的工作，当着群众已经有了自觉以后，就要指导群众行动、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再从群众的行动中通过总结群众经验、表彰先进，进一步启发群众的再自觉。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实现党提出的基本口号而斗争。

第二，坚持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反对尾巴主义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批评了命令主义之后，进一步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① 尾巴主义是一种崇拜群众的自发性，放弃党对群众的领导，迎合群众中的落后意见的思想和行为。它往往和落后于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相联系。搞尾巴主义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时机乃至断送革命事业，显然也是损害群众根本利益，违背党的群众路线的。

坚持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不搞尾巴主义，就必须敢于站在群众的前面对他们进行大胆的教育和引导。毛泽东指出："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② 在广大群众中，能体现他们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的，是居于先进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最有觉悟，在实践中走在最前面。虽然广大群众特别是后进群众与他们之间暂时还存在着距离，但他们终究是要向先进部分靠拢的。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首先应集中那些能体现群众根本利益、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正确意见，并努力启发群众认识实现这些意见正是他们自身利益之所在，然后组织他们努力实现这些意见。对于有碍于群众前进的一些落后的意见，不仅不应接受和迁就，而且要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教育，为引导群众前进扫清思想障碍。

毛泽东认为，党要领导群众前进，必须掌握好前进的"度"。既不能跑得太快，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0页。

也不能太慢,这个"度"是以大多数人的觉悟程度为依据的,为此,他提出了"照顾多数"的观点,指出: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

(三)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工作实践中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也存在相矛盾的地方。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有可能损害另一个方面。但是,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因为:第一,它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与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一致。党的领导就是党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率领人民群众按照一定的目标前进的活动过程。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人民群众越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发挥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主体作用,就越能信任、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作用也就发挥得更好;党的领导越正确、越有效,领导作用发挥得越好,也就越能把广大群众的力量真正凝聚、组织起来,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中的主体作用也就发挥得越好。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作用与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一致还突出地表现在党的执政地位与人民群众在国家生活中当家作主地位的一致上。第二,它体现了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来表达,也就成为"党的利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同志却往往把二者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它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地强调"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唯上级之命是从,不考虑群众利益,不体察群众情绪,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从本地群众的具体实际出发,机械地盲目地照搬上级决议。毛泽东对此批评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①] 另一种是片面地强调"对群众负责"、"对下级负责",把自己工作范围内的群众的局部利益当作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甚至为了迎合一些落后群众的要求,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于不顾,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强调指出:"要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①

只讲"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一般又和工作上的命令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只讲"对人民负责"、"对下级负责"一般又和尾巴主义联系在一起。

坚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就要求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需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决议,领会党的意图和主张,把握其精神实质;同时了解群众的情绪、意见和要求,掌握群众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恰当地处理党和人民的全局利益和一定范围内的群众局部利益的关系,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同时又在维护全局利益的前提下注意兼顾局部利益;恰当地处理政策的原则性与执行中的灵活性的关系,善于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而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五、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党的领导实践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它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指导原则一起,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完整内容。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在各项工作中不仅应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原则,而且应切实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群众是实践中的群众,实践是群众的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认识路线讲,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基础。实行群众路线的方法,首要和基础的一环就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即深入到实践着的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1930 年就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并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② 的口号。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5、109 页。

他多次告诫领导者要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而对不作调查,下车伊始就发议论的人提出了业肃的批评。他自己对调查研究更是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榜样。1941 年,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① 1941 年,中央根据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专门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强调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基本的环节。调查是通过考查、测度等形式了解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一种以感性为主的认识活动。它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将调查获得的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②,舍弃那些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质的东西,找出内在规律,得出正确结论,它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是调查的继续和升华。调查和研究尽管是各具特性的认识活动,但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说:"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③

调查研究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毛泽东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有:(1)全面调查。又叫普查,是对事物总体中的各个部分和各种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调查。这是准确掌握总体情况的一种科学方法。(2)典型调查。就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局部现象进行调查分析,从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方法。毛泽东曾把这种方法叫"解剖麻雀"。(3)抽样调查。就是从总体中抽取一部分单位或样本进行观察,并用以推导出总体情况的方法。贯串在这些基本方法之中的,又有开调查会,发调查表,利用报刊、会议等渠道收集材料,听取下级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间接汇报,领导下去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等等。

毛泽东强调搞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基本的要求有:要眼睛向下,艰苦深入,而不要深居简出,高高在上;要谦虚谨慎,不耻下问,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虚心向群众请教,而不要自视高明,好为人师。他强调:"没有满腔的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91—79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1、28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1、286 页。

忧，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①。

（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概念。所谓“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集中起来”是从群众中来，是通过调查研究将群众中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化为系统的、更能反映事物本质的“领导意见”，即形成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实施方案等。“坚持下去”是到群众中去，把“领导的意见”也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的意志和行动。他还说过：“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② “综合起来”和“号召群众实行起来”，是“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集中”贵在集中正确的意见。集中的意见如不正确，只会把群众引入歧途。为保证集中的正确，毛泽东要求做到：第一，到群众中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好的、坏的；正确的、反面的都要听。尽可能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第二，对各种意见进行分析和取舍，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改造制作。提炼出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集中起来”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集中起来后形成的领导意见只有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推动客观世界的改造。这是一项领导艺术性很强的工作。毛泽东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③ 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基本方法和艺术有：（1）思想教育。即通过讲道理、摆事实，大力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把党的政策主张交给群众，使群众认识到只能实行这种而不能实行别样的政策，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2）目标激励。即通过行动之前的广泛动员，以既振奋人心、又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去鼓舞和激励群众，使群众认清实现这一目标对自身利益实现的意义。“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④ （3）党员示范。即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共产党员不仅对群众言教,而且更重身教,用执行政策的模范行动为群众作出表率。(4)实践引导。即根据人们行为发生、发展的特点,把带原则性的大政方针转化为一些具体的行动口号、实施步骤和实施方法,以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对群众实践进行具体的引导。在坚持下去的过程中,党的政策主张不仅变成了物质的力量,同时还要经受实践的检验,通过实践检验应视情况作适当的调整、修正和补充。

"集中起来"与"坚持下去"是两个各有特定内涵而又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阶段。从认识论上讲,集中起来是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或者说是物质变精神的阶段,属于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坚持下去"则是从理性认识回到社会实践的阶段。或者说精神变物质的阶段,属于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其中,"集中起来"是"坚持下去"的前提与基础,"坚持下去"则是"集中起来"的目的和归宿。从"集中起来"到"坚持下去"的过程周而复始,就能理论和实践相互交替地一步一步向着更高一级的方向发展。

(三)抓住中心,兼顾其它。

党的事业包括非常广泛而复杂的工作,它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在纷繁复杂的工作面前,党必须既抓住中心,又兼顾其它,有重有轻、有主有从地把各项工作开展起来。这一方法毛泽东称之为"弹钢琴"。采取"弹钢琴"的方法,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根本工作方法的必然要求。

党在一个时期的中心是由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①,"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② 抓住主要矛盾,就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就能带动其它工作的开展。因此,毛泽东强调:"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③ 他认为,一些领导同志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被种种矛盾搞得晕头转向,如坠烟海,就是因为抓不住主要矛盾的缘故。要抓住主要矛盾,在实践中就必须做到:首先,不能凭主观随意性在多种矛盾中任意确定某一矛盾为主要矛盾,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3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32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上，真正弄清主要矛盾；其次，按照主要矛盾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之后，不能轻易动摇，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再次，在力量的组织上，不能搞平均主义，“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必须集中最主要的力量去实现党的中心任务。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毛泽东认为，当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党就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否则的话，党就可能脱离客观实际而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毛泽东认为，我们固然要集中力量抓中心任务，解决主要矛盾，但也不能搞单打一。这是因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主要矛盾决定非主要矛盾，反之，非主要矛盾也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为此，他要求我们党在对各项工作统筹兼顾，集中精力抓中心工作的时候，“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①，“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②，以中心带动一般，努力从各个方面发挥中心工作对一般工作的推动作用；在完成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努力为其它任务的解决开辟道路；善于运用抓中心工作的实践经验指导其经常工作的健康发展。

“单打一”思想不知道任何事物都有两点。他看到了事物的重点，但却把重点变成了一点。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毛泽东对于工作中的“单打一”思想从来都是反对的。他强调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③。毛泽东关于抓住中心工作同时又要兼顾其它工作的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

(四)骨干带头，面向多数。

毛泽东一贯强调，党开展各项工作都应坚持把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骨干带头，这是由认识的一般规律及骨干的特殊作用决定的。首先，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先有后，觉悟有快有慢，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广大群众中总会出现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个部分，群众接受党的政策主张并付诸实践的过程，总是从少数到多数、由积极分子到广大群众逐步展开的。其次，由主要负责人为核心团结少数积极分子面组成的领导骨干，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毛泽东说：“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 "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②

强调骨干带头,并不等于说可以只依靠骨干而丢掉广大群众,领导骨干总是少数,党的事业却是广大群众的事业,依靠骨干不是目的,而只是团结多数、团结最广大群众的手段。党的工作的着眼点必须是面向多数、面向广大群众。"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③这种"空忙"对党的事业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坚持把骨干带头和面向多数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求在实践中做到:第一,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的原则,调查可先在骨干中进行,政策可先中骨干中传达,各项工作要求骨干积极先行动起来;第二,依靠骨干而又不能囿于少数骨干的狭小圈子里。让骨干先走一步后,党应当把政策主张适时向群众公开,把工作的基点放到广大的群众之中。让领导骨干的作用在调动广大的积极性中去发挥。第三,骨干队伍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并发展变化的。党应当在群众斗争中,按照领导骨干的标准依靠群众去发现和组织骨干队伍,并时刻教育骨干紧紧扎根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同时注意"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④,使骨干队伍能真正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

(五)突破一点,带动一般。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⑤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一基本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这种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突破一点,带动一般的方法。

"点"指的是个别的事物和现象。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个别的事物具有个性,即矛盾的特殊性。一类事物的共性就寓于各个具体事物的个性之中,或者说,在个性之中有共性,特殊性之中有普遍性。世界上不存在脱离一个一个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普遍性的东西。因此,我们要认识一般,就必须从个别开始,即从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页。

上开始。我们说认识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这和认识从点上开始是一致的。在工作中，我们要指导一般，带动一般，必须首先深入到点上作个别的、具体的指导，突破一点，从点上获得对一般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面上工作的一般口号，如果不在“突破一点”的基础上提出对面上工作的一般号召，这种一般号召就没有科学依据，就无法做好面上的工作。毛泽东说：“如果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

要“突破一点”，又决不能满足于“一点”。突破一点是为了带动一般，指导广大群众开展面上的工作。只有面上的工作在点上经验的指导下全面地开展起来，党的工作任务才能真正付诸实现。这就离不开一般号召，离不开对广大群众的动员。“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② 而没有由一点开始进而引导面上广大群众的行动，没有点上的经验在面上的开花结果，一点的突破也就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

由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带动一般，这对于党的工作来说，算是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然而，从过程的推移来说，党的工作任务又没有完成。因为从点上取得的用以指导面上工作的一般经验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还需要再到许多个别的单位去检验，并经过检验加以充实、完善和总结出新的经验，然后再去带动一般。毛泽东说：“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③ 这种“个别——一般——个别”的过程，也是一个循环往复没有穷尽的过程。这个循环过程，和“群众——领导——群众”、“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的每一个循环，都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和实践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9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9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900页。

第五章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条基本原理,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坚持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开展组织、作风、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设,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

一、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一)从思想上建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工人阶级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并保持其先锋队性质的首要和必要条件,没有先进的理论,就没有先进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建立,就认定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毛泽东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明确提出,在党的建设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路线,妨碍极大,必须彻底纠正。遵义会议之后,他要求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延安时代,他一再号召,广大党员要学习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在党执政以后,他多次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由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才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了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

重视思想建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共同经验。这一共同经验正确反映了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客观要求。工人

阶级政党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和发展的，它只有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才能克服和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工人阶级政党要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而只有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才能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党员必须在理论上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上始终站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前列；只有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它的党员才具有先进性；工人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才能使自己的纲领合乎客观规律和人民的意志要求，保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性。总之，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必然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党的本质矛质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对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贡献的精辟概括。

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时，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仅有200万左右，尽管党的"六大"前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反复强调要增加产业工人在党员中的比重，可是在六大之后中共中央公布的党员构成中，农民仍占75%；直到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时，也只有职工800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49%。特别是从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直到1949年中国大陆全部解放的20多年内，党主要活动在农村，发展的党员产业工人很少，大多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极少数人还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到1942年开展整风时，共产党员由长征结束时的4万人发展到了80万人，增加了20倍，但新党员中90%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直到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全党共有党员10734284人。其中，工人党员1502814人，占党员总数的14%；农民党员7417459人，占党员总数的69.1%；知识分子党员1255923人，占党员总数的11.7%；其他成分党员558188人，占党员总数的5.2%。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占比重如此之大，要建设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就显得十分艰难。农民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党，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工人阶级政党要按照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而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则总想按照非无产阶级面貌改造党，

改造世界。因此,在我们党内,长期以来,最本质的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极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左"倾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政治上"左"右摇摆,组织上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左"倾错误被纠正后,一些党员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自成系统,在思想意识上追求个人主义,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在共产党内,若不真正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党就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历史赋予党的任务,是断然担当不起来的。为了及时解决好党内的本质矛盾,认真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注意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毛泽东的这一建党原理,注意从思想上建设党,保持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

(三)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党的纲领、路线、组织等方面的建设,更特别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与思想建设相联系,创造性地把作风建设也作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把党的建设归结为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几个主要方面。党的思想建设是贯穿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的,是进行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基础。不管哪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思想建设,只有抓好思想建设,有了好的思想基础,才能搞好其他方面的建设。

在政治建设中,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 党的纲领、路线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广大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党才能制定出正确的纲领和政治路线;也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引导广大党员正确认识和掌握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提高自觉性,才能保证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政治建设才有明确的方向和强大的动力。

在组织建设中,毛泽东一贯强调,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思想素质;教育党员和干部,是各级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对党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一切都表明加强思想建设,是抓好组织建设的前提。

在作风建设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就是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延安整风运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中精力抓党风建设的体现。延安整风的第一步,是阅读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和党的有关文件。整风参加者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了思想认识,就有了纠正不正之风,树立马列主义作风的思想基础和自觉性。我们党几十年作风建设的实践集中说明,作风建设的基础是思想建设。

在制度建设中,毛泽东从来认为,一个章程、一种规章制度要得到贯彻实施,一定要得到人们的拥护,一定要提高人们贯彻实施这种制度的自觉性。毛泽东亲自拟定或领导制定的党内法规,既有具体的制度规定,而且还明确提出建立某一制度的必要性。毛泽东强调制度是人制定,也是由人执行的。没有必要的思想基础,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一纸空文。显然制度建设同样要以思想建设为前提和基础。

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一)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党的思想建设最根本的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在全党普遍贯彻党的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地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和正确解决革命、建设中各种重大问题。1935 年 12 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全国逐渐形成了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形势。为了使党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 1938 年 10 月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突出地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

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① 1938 年 9 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鉴于党在短期内有了猛烈的发展,党员质量亟待提高的迫切要求,发布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1940 年上半年,中共又相继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都强调要加强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1942 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整风运动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5 年党的"七大"党章的总纲首次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的总纲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中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党的"七大"修改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从此成为了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我们党很快地而临着夺取全国政权的形势。1948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迎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对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是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为了适应全国解放的需要,培养具有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党中央于 1948 年 7 月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称为"马列学院"。党中央指出: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我们党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但有许多同志的理论修养不够,有的人在工作上犯错误,就是因为缺少理论,有盲目性。以前在山头上,事情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3 页。

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巨了。没有高深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中央提出一个任务，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使党员和党的干部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1951 年 2 月，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并把它作为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教育任务。根据党员和干部的原有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把所有干部分别编为高级组、中级组和初级组，要求所有党员和党的干部无一例外都要参加理论学习。在全国干部中建立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和考试制度，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正规的理论学习的热潮。为了适应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1950 年，党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著作的编选、注释和出版工作。1953 年，又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负责马、恩、列、斯的《选集》和《全集》的编译工作。马、恩、列、斯、毛著作的相继出版发行，大大推动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是团结和组织一切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动员大会。为了实现建设新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党的“八大”再一次号召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抽象化，对马列主义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对革命实际不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对生动复杂的革命实际不是从马列主义著作中找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分析、说明；而是生搬硬套马列著作中的词句，用书本中的条条来剪裁复杂的革命实践，这种对待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态度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为了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在 1935 年遵义会议之后，不断地揭露和分析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危害，强调革命的理论必须同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① 他通俗而深刻地指出,理论与实际结合,就是"有的放矢",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不是单凭热情干工作,而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中找出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响导。他十分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②

(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③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随着革命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毛泽东历来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累了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从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其基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分。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和一定的时期内,无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建立起一定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动摇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的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又有跟着官僚资产阶级跑,成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当着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当着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积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旧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可供利用,反动资产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斗争。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来不断提高农民的觉悟水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三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四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①

2.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依据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采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

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逐步改造的具体政策,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在政治制度上,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政策。他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敌人的专政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不巩固,还需要一个巩固的过程。他又及时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压制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全国人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方针。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毛泽东强调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的道路。他十分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积累和消费等各种关系,注意综合平衡。毛泽东还指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技术、艺术的一切真正的好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一再指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做到技术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还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3. 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从实践中逐步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革命的真理,注意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注意研究军事理论,研究中国的战略战术。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是突出的代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强大战斗力、严格的纪律性、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作为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处理党和军队关系的重要建军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明确提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使军队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方针和方法。他不断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主张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式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极为杰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又及时地提出必须加强国防，从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方面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在内的现代化国防技术等重要指导思想。

4. 关于政策和策略。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革命，应采取何种政策和策略，是一个崭新的面又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毛泽东精辟地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深刻而明确地阐述了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政策和策略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出政策和策略，在政策和策略的实施中，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要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5.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党组织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坚持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文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他一再指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还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对革命极端地负责任,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等等。

6. 关于党的建设。

在现代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要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和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毛泽东创造性地应用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成功地解决了这一艰巨复杂的问题。他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在他领导的建党实践中,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要求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党内斗争曾经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党内斗争应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整风形式,在提高党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基础上,有效地解决党内矛盾,及时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他反复强调,在夺取全国胜利后,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特别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总是可以学会

的。

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内容、活的灵魂，是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也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毛泽东的认识论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他的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的统一，他提出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独立自主，就是指解决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都要立足于中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由自己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对我国有益的东西，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落后，我们对待任何大国、强调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卑膝，卑躬屈节的表现，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这三个方面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部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三、端正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端正思想路线，是思想建党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共产党员党性的首要要求。进行思想建设，要着重引导党员端正思想路线，所谓思想路线，是指人们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路线。在人们的认识领域内，从来就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一条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路线。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了要确立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首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毛泽东一贯认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的思想要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就要调查了解外界的情况。打仗要知己知彼，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规律，并应用

规律指导自己的行动。毛泽东把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毛泽东在他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这条思想路线,在理论上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斗争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邓小平说得好: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实事求是,才能突破"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束缚,才能认识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正确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

(二)端正思想路线是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要合乎客观实际,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客观实际,这就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客观世界,制定和执行路线要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从党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经过北伐战争的胜利到1927年革命遭到失败,又到土地革命战争取得很大的胜利,到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才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必然王国,全党统一了认识,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套具体政策。正确的路线和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都是按照正确的思想路线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为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制定出我国民主革命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而使全党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了认识,为贯彻执行民主革命的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过渡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贯彻执行打造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并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从而保证了建国初期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实践充分说明，正确的思想路线是确定和实现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

（三）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

实事求是同主观主义是两条相对立的思想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思想路线基础上的。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①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错误思想，就是通常讲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在我们党的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本中的片言只语，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一种是拘守于本身的片面经验，不注重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在党的历史上，危害最大的是教条主义。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产物，是在不断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影响的过程中为全党所接受的。《反对本本主义》的锋芒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和报告中都深刻揭露了教条主义的表现、危害以及产生的根源。特别是在《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中，深刻阐明了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的认识依赖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实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需要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形成。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又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客观世界的变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认识、再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们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指导,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在《矛盾论》中他又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他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深刻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指出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精辟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这个"精髓",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教条主义者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个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认识诸事物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认识了诸事物的共同本质之后,还必须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的具体事物,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才能正确认识具体事物,真正掌握矛盾的普遍性。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作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不可捉摸的纯粹的抽象的公式,千篇一律地使用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研究问题,要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原则。片面性和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是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① 把反对主观主义提到了纯洁党性要求的高度,使端正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了区别是坚持发展还是否定、修正党的指导思想的试金石;成为了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各个方面的总体性要求。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四、解决思想入党问题

(一)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是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毛泽东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的理论,对党员个人来说,最集中的要求,就是必须从思想上入党。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员的质量决定着党的战斗力。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才能称得上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所以,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共产党员必须从思想上入党这个重要的建党思想,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1942 年 5 月,他针对党内许多同志还不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的状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① 20 多年后党的"八大"继续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观点,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重大现实主义。指出:过去无数的经验证明,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党的各级组织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加强对于广大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的学习,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思想上具备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党员从思想上入党,就是要求党员自觉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党性修养的标准:一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二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三是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四是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五是做群众的模范;六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提高党员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共产党员最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5 页。

本的责任,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重视党员的党性修养是解决思想入党的关键一环。1941 年 7 月 1 日,中央专门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首先尖锐地指出了当时必须纠正的三个方面违反党性的倾向: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治,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这些违反党性的倾向,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党的战斗力。为了适应党的政治任务的需要,巩固和发展党,《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必须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二)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从来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危害极大,既妨碍党的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也妨碍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必须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党的建设的长期实践证明,党内矛盾和斗争,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和斗争,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主要是纠正"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党执政以后,毛泽东不断提出,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个大问题,就是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个大问题。要求经常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并切实加以解决。

(三)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改造世界观。

共产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努力改造世界观,树立无产阶

级世界观。毛泽东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 并深刻分析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分歧和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途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经济上,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应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在政治上,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主义。共产党员应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又进一步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② 他还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和我们党的建设的传统经验,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途径是:在改造社会和自然界的实践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克服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7页。

第六章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理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从而构成毛泽东建党思想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规律

(一)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仅因为它在政治上有正确的纲领和路线,思想上有一致的理想和信念,而且在组织上是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和开展活动的。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组合的基本规律。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只有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这三个党员中必须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党的组织结构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矛盾的结构,是矛盾的统一体,即两个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东西而存在。共产党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而成的,它的基本结构是支部。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的结合,或是组长和组员的结合,都是矛盾的结合,即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有了这种统一的组织才有力量。这种统一组织就是党，这就是党的基本组织结构。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这种"结合"是党内生活的客观规律，是党的战斗力的来源和组织保证。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组织发展的客观规律，制约党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

(二)民主集中制是发挥全党积极性和巩固发展党的重要武器。

依靠实行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靠扩大党内民主去巩固发展党，是毛泽东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规律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作的科学结论。

1937年，中国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奋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中，把民主提到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的高度，指出要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党就必须有力量。要党有力量，就必须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象钢铁一样。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前夕，日本侵略者把主力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王明右倾错误，放弃党的领导。同时，"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①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对如何依靠民主集中制发动全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529页。

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①。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突破战争难关,毛泽东在这个政治报告中还着重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武器。"② 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指施和要求:

一是领导者要以充分的民主精神去对待同志。扩大党内民主,首要干部要有民主修养,在行动上做模范,然后才能在同志中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训练。真正的民主精神,与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道德是不能分离的。自私自利,是与大公无私相反的。自高自大,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

二是要注意发动党员讨论党的重要问题。这是提高广大党员积极性最重要的方法。1929 年 12 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在《右田会议决议》中强调: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他执行的方法。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他。这样,会议不仅解决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为来了。

三是要正确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对党内的意见,包括同志们相互之间、被领导者与领导者间的不同意见,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方法去解决,还是采取强制的办法去压服,这是关系到能否调动广大党员积极性、巩固发展党的大问题。毛泽东在 1938 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了同"左"、右倾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明确指出: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证着交换意见,并使之概括起来作出结论,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针。1957 年,毛泽东针对我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以及国际上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的重要思想,指出: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8—52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8—529 页。

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制的方法去解决。

（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生活的规律，是由民主和集中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构成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内的民主制和集中制的辩证统一。要正确地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就要正确理解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关于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思想。1927 年“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在讨论和纠正党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就已经看到组织上违反民主集中制是政治路线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并明确提出要“最大限度的集权”和实行“党的民主主义”。毛泽东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以陈独秀等人实行家长制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的教训，强调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①。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更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② 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执行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历史经验，针对党内民主不够、集中也不充分的实际情况，首次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作了完整、明确、科学的表述，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进一步作了全面阐述，他说：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看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 1965 年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关于民主和集中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概括，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

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其实质是既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发扬民主、发挥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对我们党组合的基本规律的高度理论概括。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是在共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8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83 页。

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基本原则作了相当完整而又科学的规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本质要求及具体制度理论化、系统化而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章首次把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总的要求,概括为:"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同时,完整而系统地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原则,即:(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把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反对分裂党的组织而提出的"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基本原则首次写入了党章。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是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的第一个党章,它总结了党执政后自身建设的经验,将"七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的概括,改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同时,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六条,比"七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地方范围内是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是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两条。它既体现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正确反映了党的组织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党的总体的力量将大大超过各部分力量之总和;违背这一规律,就会因内耗不断而导致组织瓦解。

(四)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的运用。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从党员群众中来,再到党员群众中去的过程,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和体现。

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把民主集中制同群众路线联系起来的思想。从他提出的"厉行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直到党的"七大"会上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可以清楚地看到认识的逐步深化和逻辑的紧密联系。

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重要发展,在党的"八大"得到了充分肯定。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总结了自"七大"以来特别是党执政7年多来的经验,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

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这是因为：党是依靠全体党员和全党的各个组织，来联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为了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为了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一般地都必须经过党员的努力，经过党的下级组织的努力。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建议采取"先把报告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的开会方法，并且指出，这种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在这里虽然讲的是开会方法问题，但实际上指明了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一致性。同时，也说明了这两者与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的一致性。在毛泽东建党思想中、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实质上是三位一体地联系着的，把握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

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基本方法，其基本点是要坚持从党员群众中来，保证党组织决策的正确；同时要坚持到党员群众中去，保证党组织决策的有效执行。

坚持从党员群众中来，就是要坚定地相信党员群众，紧紧地依靠党员群众，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引导和支持党员参与管理党内事务，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党员群众的集体智慧，对有关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说："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①

坚持到党员群众中去，就是将党员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党员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党员群众的意见，通过党员群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主张意图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820页。

和自觉行动,使之落实、见效果;同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主张、意见是否正确。这样,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把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同党的群众路线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

(五)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题目。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个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创造性的论断,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途径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因而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目标。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新发展。

要在党和国家生活中造成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关键是要把民主集中制,全面运用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这既是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基本要求和保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和保证。

早在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创造时期,毛泽东就要求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应用于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当时根据地的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虽普遍地组织起来了,但"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种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强调:"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①

1937年10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2页。

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①

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简政实施纲要》，规定：新民主主义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是不能分开的，我们需要民主，同时又需要集中，在战争环境里，尤其需要集中。各种政策法令是根据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制成的，基本的政策法令是由边区参议会议决的，这是民主；但政策和法令等等，一经决定发布，就必须通行，必须遵守，这就是集中。这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在政权机关中要切实贯彻，给人民做出榜样来。

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总结了各革命根据地政权组织和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完整而科学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②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反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倾向。

个人专断是同民主制、极端民主化是同集中制相对立的两种错误倾向。如果对民主集中制不适当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忽视另一个侧面，这两种错误倾向不仅会交替发展，而且极端民主化会作为对个人专断的惩罚，而随之发展，以致严重削弱乃至否定民主集中制。只有同时警惕和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才能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全面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同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

我们党在幼年时期，还没有就如何保证党内民主、防止个人专制，和如何实现正确集中、防止无政府主义等作出相应的规定和制度，大革命后期党内家长式统治和右倾错误日趋严重。蔡和森在1927年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深入分析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

这一历史教训。他说: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党内群众的政治讨论,素来是没有的。党内虽然有"最精华的工农党员群众,他们的倾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指挥机关与群众的关系很不良,不仅隔断,甚至背道而驰。群众完全离开党,党的指挥机关完全抛弃群众,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做了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的酋长时代的工作。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没有工作,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员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这便成了组织上的系统的机会主义。"针对这种组织上的不正常状况造成的政治上的种种危害,蔡和森在1927年党中央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大声呼吁: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为了铲除党内过分集中造成的弊端,蔡和森还就建设党内民主、防止家长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同时还明确提出了不容许党内有"极端民主的要求"的重要思想,他说:我们现在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不是削弱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觉自动与创造精神的,不是弛缓党的纪律和组织。乃是强固党的纪律和组织;铲除那种旧军队式的组织毛病而改造为自觉自动的群众党的组织,铲除那种机械的宗法的纪律而代之以真正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同时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应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组织的重要任务。但这些施行到什么程度什么界限呢?以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动的需要为界限。超越此界限的极端民主的要求亦是不能容许的。

1928年六、七月间,党的"六大"通过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批判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同时,明确指出在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由家长制转变后,倾向于极端民主主义"的现象。比如"极端的自由选举观念"以及"尾巴主义与盲动主义"等等。大会主张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同时严厉的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同年11月,针对各地在贯彻党的六大决议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家长制的习气尚未洗除,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已发生"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中进一步强调:"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包括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为此,"在检查了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把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严密检查一下"。中央要求检查的第一项错误就是"极端民

主化倾向”。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

在红军初创时期,红四军党内的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和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相当严重。由于在组织上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导致后来政治上的错误和军事上的失败。1929年8月21日,党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批评了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同时指出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同年9月28日,党中央再次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强调党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1929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的报告中,分析了极端民主化的表现及其危害,指出:“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接着毛泽东提出了纠正极端民主化的方法:首先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第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一)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二)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三)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四)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

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五)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①

1945年,党的七大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倾向的特征都作了深刻、系统的分析和概括。指出,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个人专制主义倾向的特征是:认为自己的领导权力,无须由党员群众授予,领导地位,无须经过选举,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的信任,而可以自封;党的方针和政策,无须由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种领导者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而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服从党,不是受党的支配,而是站在党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特征是:认为自己可以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利益,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自由行动;可以不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决议,在党内传播各种非组织的言论,利用群众多数一时的盲目,来表决自己的要求,实现自己的目的,等等。党内的专制主义倾向和极端民主化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

反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采取主观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总的是应该有什么倾向就反什么倾向。但在一定时期内主要克服什么错误倾向,需要作具体分析。根据一定时期的形势任务、历史环境和党内生活的实际状况,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侧重。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和地下工作时期,在坚持党内民主的同时集中制表现的多一些。在党领导全国政权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了适应和平建设的需要,从总体上说,是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在防止和反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上,有以下两点值得着重注意。

第一,民主作风要注意首先从领导干部做起。民主集中制,既成为制度,就非遵守不可,首先要负责同志来遵守,要党的书记来遵守。毛泽东在1945年针对有些领导干部"习惯于独断专行"的现象指出: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不无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既然作了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8—89页。

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提起责任。不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第二，要注意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形成个人专断的基础。它把党的领袖神化，轻视和否定人民群众的作用，无限夸大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只有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反对个人专断。

强调禁止个人崇拜，决不是也决不能否认领袖的个人作用。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有了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的、真正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善于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二、“四个服从”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全党的组织纪律

（一）“四个服从”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和纪律保证。

在党创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内对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认识并不一致，以致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现象屡有发生。陈独秀、王明先后实行家长统治，罗章龙、张国焘先后另立中央，分裂党，都已严重到危及党的生存的程度。特别是张国焘明目张胆地在党内搞独立王国，对上公开进行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对下级要求对他绝对服从，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直至叛党而去。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为了个人争领导权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在自己领导的区域内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和政策，并且违反党的纪律，擅自发表同中央主张相反的言论和主张，给党造成很大损失。毛泽东针对这种状况，为了使广大党员懂得并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了使象张国焘这样的野心家不能利用党员的无知以得其奸，将全党要遵守的组织纪律简明地概括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并强调指出：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

“四个服从”，贵在“服从”。这种服从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以任何借口提出条件而违犯“四个服从”的纪律，就既破坏了党内民主，也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

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有些同志或者以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件。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组织原则,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强调"四个服从"应该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是要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服从,决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这就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

(二)严格遵守以"四个服从"为中心内容的党的组织纪律。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严格遵守以"四个服从"为中心内容的组织纪律,是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

要严格遵守以"四个服从"为中心内容的组织纪律,就要深刻理解"四个服从"的具体内容及其本质要求,提高遵守"四个服从"组织纪律的自觉性。

强调"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是党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选举产生的,它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决定党的方针,而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接受党的监督,执行党的方针,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党员积极参与管理党内事务,也就会自觉地执行党的决定,服从党的分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党员参与民主管理党内事务的积极性愈高,执行党的方针愈坚决,党组织的战斗力就愈强。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下级服从上级,核心是对于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必须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创造性的贯彻落实。在上下级关系上,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应该

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①

全党服从中央，是最重要的纪律。这是因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它的重大决策，是经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作出的，是代表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真正做到全党服从中央，最根本的要严格遵守两条：一是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二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自觉地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是有组织的整体，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地方决定的问题，在不与中央与上级决定抵触的条件下，党的地方组织应有自主决定权，以利于因地制宜。

(三)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坚持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共产党人的纪律，它既是铁的纪律又是自觉纪律的前提，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一项重要准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在党的实践中不断赋予其与当时形势、任务相适应的具体要求。党是有铁的纪律的。这些纪律都是正确的，每一条都要维持的。任何企图稍微削弱党的纪律的倾向，都只能帮助敌人。特别重要的是纪律不只是一般党员应该遵守，负责人与指导者更应该遵守。不只破坏集中原则的人是违犯纪律，破坏民主原则的人也是违犯纪律。为了确保这些要求得到严格贯彻，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②。

(四)坚决反对党内的派别组织派别活动。

决不容许党内有任何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存在，是民主集中制题中应有之义。

1935 年到 1936 年间，正值红军处于最困难的关头，党内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事件。毛泽东在分析张国焘反党派别活动的教训时指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36、43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8 页。

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① "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进行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处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中,党在反对派别活动问题上,理论上有新的认识,实践上也有新的经验,这主要是:(一)在反党派别活动的特征上,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如果嗅觉不灵,就大有上当的可能。毛泽东说:高岗就是在组织一个"地下司令部",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二)要划清发扬民主与搞派别活动的界限。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当经常向所属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或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党反对的是避开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个人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但并不反对全党高级干部直接向中央或者经过自己所属党组织提出个人的政治意见或积极的建议。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进一步阐释说:一切党的领导人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三)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的方针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822页。

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它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三、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要善于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不能搞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因此要全面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制度，不断改进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一）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制度上的体现，是各级党委实行正确领导的可靠保证。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首次作了完整的阐述。其主要点是：1.分析了健全党委制的必要性，指出了健全党委制的客观依据是，“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2.指明了健全党委制的重要意义。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3.明确了扩大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和党委制的基本要求。指出：“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讨论解决只等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4.阐明实行党委制的途径，指出党委会开会“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

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5.指明了党委常委会和党委全会的关系。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6.强调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关于党中央这个《决定》的意义,党的"八大"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在我们党内,从长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

坚持集体领导首先是党组织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要严格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防止和反对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1954 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针对高岗、饶漱石搞家长制和"独立王国",篡党夺权的阴谋,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要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自满和个人崇拜。1955 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上又告诫全党:"鉴于种种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

防止和反对分工不负责或分工分家的现象。"个人分工负责"就是要明确地规定每个领导成员所负的具体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不要事无巨细统统拿到党委会上讨论。书记或第一书记担负着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的主要责任。不应借口集体领导而降低和抹煞书记或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中的重要作用。每个党委成员都要把党委分工所担负的工作抓起来。凡党委已决定了的重要事项,就要维护党委集体领导的权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逐项落实。凡属自己权限之内的事,就要独立自主地及时处理,不要事无巨细都推到党委会上去讨论。对于需要党委讨论决定的重要问题,应及时、主动提出,积极参与党委的集体领导。

(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注意改进党委的工作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了适应建国后的繁重任务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提高各级党委的领导水平,而且由于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有必要把它提到理论高度作为指导各级党委工作

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他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概括为十二条：1.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2.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3."互通情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4.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不耻下问"，善于征求下级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5.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6.要"抓紧"。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仅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7.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8."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9."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10.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11.力戒骄傲。就是没有犯过很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传统，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2.划清两种界限。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混淆了。

第七章

正确选拔、培养使用干部

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来都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总结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和路线。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一)党的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说过:"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① 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组建自己的干部队伍,作了最精辟最深刻的说明。党的干部问题是同中国的革命事业以及党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革命需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这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前提和基本依据;建设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是为了实现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这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目的。

1935年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党中央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为了实现这条策略路线,党中央提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问题。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据此《决议》规定了一系列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养、使用、爱护、教育和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原则和政策。

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专门讲了干部问题。他指出："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① "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② 毛泽东还提出了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党的干部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指出："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的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③。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再一次全面地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重申了建设一支宏大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干部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④ 在我党建设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关心爱护干部的干部政策，相当完整地阐明了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政策和制度。

在提出和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以后，党又要求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⑤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⑥ 为此，《决定》要求大量吸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页。

收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并且要求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根据党的干部队伍的构成状况,《决定》着重提出了实现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问题。

随着民主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为了适应夺取全国政权和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需要,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做好干部准备的问题,并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解放战争的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区域,大约将包含1.6亿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大的城市。[①] 为了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需要准备5万3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还很小,还不能满足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方针,指出"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解决。"[②] 并且告诫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③] 这个方针的提出对于解决新解放区干部问题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依然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根据地工作中,党培养和训练了大批的革命工作干部,这是赢得革命战争胜利和在胜利后组成新的国家的重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事业仍将不断发展,需要的干部仍将在不断增加,而老党员的数目又总是不断减少,这就需要坚决地放手使用经过选拔的新干部。党的"八大"强调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工作,帮助他们同老干部建立团结一致、互相学习的同志关系。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

(二)从国情党情出发建设干部队伍。

毛泽东不仅从中国革命事业和党的领导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而且,他还从中国的国情、党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面如何建设一支好的干部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6页。

伍的问题。

第一,形成了一个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领袖群体。

毛泽东在高度重视建设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的同时,也高度重视领袖人物的产生以及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党不仅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而且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党的领袖群体就是党的领导核心,党有了一个领袖集团即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和引路人,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们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找到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能够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提出正确的纲领和奋斗目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排除来自"左"和右的方面的干扰,领导人民进行正确而又有成效的斗争;能够把握革命的航向,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或转折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驾驭局势,果断而又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从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指引革命继续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应运而生的。他们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谋利益,时刻倾听人民的呼声,与人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他们熟悉马克思主义,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集聚了全民族的智慧,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使之成为从理论内容和表述形式上都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以及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都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是为亿万人民群众所公认和拥护的。

第二,提出和解决了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的问题。

党的干部大致是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这两部分人组成的,他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两部分干部又各自有其优点和缺点。工农干部同群众联系密切,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缺乏理论和文化;知识分子干部有较丰富的书本知识,但缺少实际工作锻炼,有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思想。因此,强调这两部分干部应该各自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结合,很好地团结与合作。作为工农干部,"应

努力保持和扩大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群众作风,而努力克服自己文化上与理论上的缺陷。""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① 当然,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了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以学,才能使学习理论成为可能。作为知识分子干部,要实现工农化,一是要去掉轻视工农的思想,培养工农感情,和工农打成一片,把立足点移到工农群众这方面来;二是要去掉唯心思想,培养实事求是的观点,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这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又是存在同一个过程之中,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也就是到实际工作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既培养了工农感情,又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旧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中,而且在党内,由于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了大多数。在党的干部队伍中,自然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所谓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艺工作者讲到的"大众化",也就是工农化的问题。他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② 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说的,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一个转变思想感情、转变立场的问题。当时,确有不少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立足点还没有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不解决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知识分子干部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到群众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向工农兵学习,和群众结合,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根本的变化。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毛泽东提出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干部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8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农化与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地说，知识分子干部由于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工农干部由于有较多的实际经验而缺乏理论，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实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向工农干部学习，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另一方面，可以使有经验的工农干部有了良好的老师，使他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避免犯经验主义错误。这样，就促使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互相结合起来了。

第三，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和依托。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缔造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始终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①]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又确实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②] 军队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不仅是一支战斗队，还是一支宣传队、工作队，人民军队在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党组织的过程中，培养、锻炼了一批又一批能文能武的干部，并不断地把他们输送到地方党组织，担负起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领导工作。

经过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不断扩大，干部队伍也在不断扩大，随着各地政权的建立，军队受党组织的委托，派出大批干部到各个部门、系统、行业、单位担负起领导责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但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增加了。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甚至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把这210万野战军看成是一个为地方培养、输送干部的巨大的干部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军队继续发挥着干部学校的作用，依然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同时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群众工作。人民军队不仅要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要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人民军队在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但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国家做出了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大贡献,而且还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一)"任人唯贤"是公道正派的干部路线。

干部路线是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所规定的干部工作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上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①

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求有一条公道正派的干部路线,"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适应正确政治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党的历史表明,组织路线总是与政治路线紧密联系的,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党在各个时期规定了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组织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是以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为前提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符合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路线,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因而它也同时要求有一条正派的干部路线来保证它的贯彻执行。与此相反,一切错误的政治路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违背广大党员意志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因此,在其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反对和抵制。这时,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就会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搞宗派主义,搞任人唯亲,对抵制他们的错误的优秀干部打击、压制,以便推行他们那条错误的政治路线,这种干部路线只可能是不公道正派的路线。

土地革命时期,当"左"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同时推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而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而是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些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

党的历史表明，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是相辅相成、同步形成的。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正确政治路线的同时，也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全面地论述了建设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关心干部、受护干部、使用干部、识别干部的原则和方法，使党的干部工作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为干部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毛泽东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是一条内容完整的干部路线。这条干部路线从理论与实践上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一是清楚地指明了党的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骨干，是坚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确保党的任务实现的决定的因素。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是要通过干部去实现的。这是我们党制定干部路线和加强干部队伍的前提和出发点。二是明确回答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需要什么样的干部以及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的问题，即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标准问题。强调党的干部，必须德才兼备，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坚持德和才的统一。三是明确回答了如何合理使用干部的问题。这就是以德才兼备的标准去识别、选拔、考察、使用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真正做到知人善任。四是明确提出了全面团结干部的原则，指出干部队伍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要处理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以及党内各个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要搞“五湖四海”，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五是明确提出要爱护干部，培养和教育干部，指出要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要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使二者结合起来。

(二)德才兼备是我党的干部标准。

"德才兼备"是中国共产党识别、选拔、使用干部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同"任人唯贤"一样,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德"与"才"作为任用人才的标准,只不过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罢了。毛泽东吸取和借鉴了中国历代政治家用人思想的精华,赋予其新的内容。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除了因为它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还因为它又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用人路线提出来的。譬如,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不断发展,在组织问题上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认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认为"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的策源地",由此,一味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把一些经过了较长时期锻炼的知识分子子硬性地从领导地位撤换下来而把一些缺乏领导经验的工人一下子推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问题,这种"唯成分论"的用人政策,严重的削弱了党的领导,也使大批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遭到无谓牺牲,这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不仅使党的工作变的严重损失,而且使党的队伍大伤元气而难以弥补。

正是基于这一严重教训,毛泽东强调、选拔、任用干部主要不能看出身,而要看看德才他提出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包括有三层含义。其一为德才兼备,两方面缺一不可。德,包括一个人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等。不同阶级赋予德的内容不同。无产阶级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德相比,有着本质不同的阶级内容,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德。毛泽东把德才兼备的内容概述为: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这里"除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属于才的范畴以外,其它方面均属于德的内容。"才",指干部的才干,工作能力。"德"是政治标准,"才"是工作能力标准。我们党在干部标准问题上,之所以要求德才兼备,两者不可缺一,从"德"的方面来说,是因为干部有"德",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的各级领导权才能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因而也才能保证党的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才"的方面来讲,是因为干部有"才"、才有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党才能通过广大干部去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因此,在一个优秀干部身上,"德"和"才"应该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德"是通过

"才"来体现的。政治条件好,可以使他的工作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个人工作能力的充分发挥,又可以使他更加坚定地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斗争。相反,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标准,仅为满足个人的私欲和享受而尽力发挥个人才能,这种"才能"越大,对人民利益的损害也越大。但是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应有的政治标准,而无工作能力,不能做好党和人民托付给他的工作,同样会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所以说,在干部标准问题上,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重德轻才,用德代替才,否认知识和才能的重要性;另一种是重才轻德,用才代替德,忽视对干部政治素质的要求。这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德才并重,以德为主。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德是头脑,管政治方向。才从属于德,受制于德。有德无才,政治上固然可信,但是难当大任,重用了,既贻误党的事业,也势必助长不学无术之风;有才无德,才适足以济其奸,重用了,对党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德与才比,德更具决定意义,所以德是确定选拔使用干部的前提条件。

其三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历来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系。德才标准,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赋予其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即使是同一阶级在不同时期也赋予其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干部队伍建设要适应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德和才的内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由于在不同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及其方针和政策不同,对干部德和才的具体要求也就不完全一样。

(三)实行知人善任的干部政策。

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认识人,了解人,善于使用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和结果。

第一,善干识别干部。毛泽东认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① 也就是说,要全面地看待干部,历史地看待干部。所谓全面地着待干部,就是不能"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而要"面面都看到"。既要看其"德",又要看其"才";既要看其言论,又要看其实际表现;既要看其资历,又要着其水平。总之,由于各自的出身经历不同,经验水平不同,工作岗位和条件不同,每个干部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一个人阅历再深,能力再强,也难免在工作上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现失误。一个人经验再少,能力再差,也有办对事的时候。因此,看待干部,不能只看一面,不看全面,以偏概全。只有对干部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才能把握干部的主流和基本点,对干部做出正确的评价,从而扬长避短,合理地安排使用。所谓要历史地看待干部,就是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看干部,也不能不顾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用现在的眼光苛求干部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工作和表现。干部成长过程中,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进步有快有慢,有的人甚至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同任何事物一样,人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了解人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才能对干部有一个根本的估计,也才能合理地使用干部。党的干部总是置身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才能在实践中锻炼出来。干部的成长要有一个过程,只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干部,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一个人,真正做到善于识别干部。

第二,要科学地使用干部。用人要"人、事两宜,适得其所"。把干部安排到党最需要并能充分发挥其才干的岗位上去。当然,干部也必须服从工作需要和安排。按照这样的原则,党在使用干部时,一是做到不拘一格,量才使用。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是指在选任干部上不拘泥于形式,不论是组织分配、他人推举,还是毛遂自荐,只要符合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符合工作的实际要求,都可以安排使用,做到人尽其才。为此需了解干部有何特长,能力大小,以便根据本人的素质状况安排适当的工作。既不能大才小用,使干部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造成人才浪费;也不能小才大用,使其力不胜任,勉为其难,贻误工作。二是做到大胆放手地使用干部。这样,才能广聚各方人才。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大的气量,要有宽阔的无产阶级革命胸怀。其次让干部在职权范围内自主负责地办事和处理问题,除进行一些必要的指导外,不去随意插手和干预。这种对干部的尊重和信任,可以增强其自信心和责任心,并且能在彼此信任之中形成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再次,要让下级敢于做事。作为上级领导,如果对下级办事总是不放心,要求他们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或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上级请示,这样就会降低干部的责任心,降低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工作就不会做好,还会妨碍下面同志工作能力的提高。当然,让下级敢于做事,难免会犯一些错误,但也不可怕。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不会进步。因此犯了错误可以得到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就会增加经验,提高能力,取

得进步。三是要科学地组建协调合作的领导集体。任用干部,不仅要注意干部本人的状况,考察究竟放在什么岗位上才能使他们施展自己的才能,在组建领导班子的时候,还要注意人才的搭配问题。在一个领导集体里面,固然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是有才干的人,但是又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特长进行科学的搭配,使之在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上达到互补,从而形成一个合力,成为一个协调合作的领导集体。毛泽东使用干部并不要求"完人"和"全才",而是识人之长,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安排干部的工作,善于按照干部的性情习惯、品质个性组织领导班子,使之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益。

第三,要热忱爱护干部。这是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宝贵的历史经验。民主革命时期,当"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和过火的党内斗争,严重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当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以后,他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那种过火的党内斗争,保护了党的大批干部。1935 年 10 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了解到在陕北有很高威信的刘志丹以及和他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许多战友被作为"反革命"抓了起来,有的甚至被杀害了。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迅速派干部控制了事态的发展,并亲自为刘志丹等人平反。1938 年 10 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全面地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而且为过去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了反。

关于如何爱护干部,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作了系统的阐述。一是指导干部,让他们放手工作、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指导下发挥其创造性。二是提高干部,给他们以学习、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在理论上、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是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四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方法。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五是照顾干部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四)坚持搞五湖四海的全面团结干部的原则。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没有全党干部的团结,就没有全党的团结。因

此,在实现党的团结方面,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干部队伍的团结,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团结是实现全党团结的关键。只有我们党的干部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一致,真诚合作,才能带动全体党员和群众,齐心协力,实现党的目标。在党的干部队伍里,中央领导班子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于实现党的干部队伍以及全党的团结,使党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具有决定意义。党的中央领导层是全党的决策者、领导者,是全党的领导核心,对党的事业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实践表明,愈是突发事件和党的生命攸关的时刻,这种主导的决定性作用便愈突出。因此,讲干部队伍的团结,首先是中央领导层的团结,有了这个团结,才能由党的干部队伍的团结进而达到全党的团结。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就是这样逐步从形成一个团结的领袖群体,到整个干部队伍的团结,全党的团结,并依靠自身的团结,得以在全国人民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团结全国民人共同奋斗,战胜敌人,征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正是在总结我党历史上在团结干部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所处的环境和党内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五湖四海的全面团结干部的原则。其具体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党内干部的团结。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子部队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大致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另一部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出身的。这两部分干部中,按照工作性质、工作历史和工作地区的不同,又有新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一部分军队在干部与那一部分军队的干部、这一工作部门的干部与那一工作部门的干部等等区别,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党内各个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加强干部队伍团结的问题。

要搞好党内干部队伍的团结,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非常重视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团结与合作,努力实现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这里,尤其是要处理好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新老干部不团结的实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干部与新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就是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新老干部的团结,对于党的事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是从长远的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指出:"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因此,总要有新干部补充进去,新老干部一致合作,才能保证党的事业不致中断。

从党的事业的需要出发，老干部应该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

老干部参加革命时间长，经受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内政治生活的锻炼和考验，政治上坚定，组织性强，有好的传统作风和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其中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低。而文化又与政治密切相联，不提高文化水平，就学不懂马克思主义著作，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所以，党通过举办抗大、党校来提高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但是，学校没有那样大，工作还要有人做，不可能大家都进学校学习。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特别强调老干部要进"长期大学"，这就是有计划地、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学。他们认为，经过这样长期下苦功夫自修，完全可以学好，可以成为全才，成为"博士"。在处理老干部同新干部的关系上，党要求老干部不要卖老资格，要主动团结新干部。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老干部应负主要责任。老干部要了解新干部，不单指摘其缺点，还应教育、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伴和将来的替手。而且，老干部还要学习新干部的长处，取得他们的帮助。

由于我们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以及党的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新干部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占了多数。新干部年富力强，文化知识水平比较高，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快，工作热情，对新鲜事性敏感。当然，由于新干部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缺乏经验，缺乏实际工作锻炼，也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的锻炼。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即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因此，思想上容易犯主观片面的毛病和产生患得患失情绪。但是，他们的这些缺点又可以通过教育和革命锻炼逐渐克服掉。对于新干部，我们党始终既爱护他们，教育帮助他们，又严格要求他们。实践表明，这些干部工作上积极刻苦，能与老干部团结，能接近群众，在思想意识上有极大的进步。针对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看不起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我们党教育他们，知识分子干部的书本知识、文化程度虽然比农民出身的老干部高，但是这些老干部的革命实践比他们多，新干部不应骄傲，应该尊重老干部，向老干部学习。

在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外来干部同本地干部处好关系、搞好团结的问题。在这问题上，外来干部负有重要的责任。外来干部要尊重、爱护、帮助本地干部，学习本干部的长处，充分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不可在那里包办、垄断一切，不让本地干部参与工作，更不可在那里称王称霸，盛气凌人。就一般情形来说，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搞得不好，外来干部要负责主要责任。当然，本地干部也要去掉狭隘的观点，学习外来干

部的长处,欢迎与尊重外来干部,而不应排挤外来干部。除此而外,在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我们党特别强调培养本地干部,并把这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严重问题来看待。在一个地方,光靠外地干部工作搞不好,只有依靠本地干部的配合,把大批本地干部培养提拔起来,各项工作才能开展起来,党的事业才能发展起来。本地干部土生土长,扎根在群众中间,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外来干部要经过本地干部才能联系人民群众,在群众中生根,脱离了本地干部,就是脱离了本地人民群众。不尊重本地干部,糟蹋本地干部,就是不尊重和糟蹋党和外来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党则要求两者要互相帮助,有了纠纷要互相原谅,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作为人民的军队,军队干部更应主动搞好和地方干部的关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关心照顾地方干部。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军队干部要负主要责任。

在正确处理党内各个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党和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正确处理军队之间、地方之间,工作部门之间的干部关系问题,因为这也是加强党内干部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处理这种关系时,特别注意反对不顾大局,不顾别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看想的本位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同样是损害党的团结,损害党的事业的,发展下去也是很危险的。

总之,为了增强党的团结,推进党的事业,党和毛泽东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党内的实际状况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党内干部队伍的各种关系问题,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的内容。

第二,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

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是党一贯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① 在政权机关中,军队中,民众团体中,经济组织中,国民教育机关中,城市及乡村中,都是党与党外群众联盟的,党通常只占少数或极少数,党外(包括和党合作的民主党派)通常总是占多数或绝大多数。而党的事业则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要团结党外的多数或绝大多数共同奋斗,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所以,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毛泽东强调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实质是"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的问题,他告诫全党:"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① 党高度重视同非党干部的团结还在于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而是要使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在吸收和提拔非党干部,以及共产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步,但也还存在着缺点,主要是不注意吸收党外各种有用人才来为人民服务,不善于与非党干部共事,不善于帮助非党干部进行各种工作。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有宗派主义情绪,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不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针对这种状况,党要求一切党员必须严格检查自己,去掉这些方面的缺点。为此,党员干部要自己先召开检讨会,然后在非党干部中进行自我批评,发动非党干部对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做到双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除误会,纠正缺点,达到进一步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服务。而且,为了改善党员干部与党外干部的关系,要求在一切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中普遍地实行这种方法。此外,还必须善于发扬党外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做成功许多事业,在人民事业中建立功绩,建立威信,从而吸引人民中广大的优秀分子来为人民服务;对于党外干部原则上的错误,及其和党组织在政治上的分歧,则应进行很好的耐心的说服;共产党员干部在党外干部领导之下工作时,必须是服从领导,执行任务的模范。

在加强同非党干部团结方面,党团结李鼎铭先生合作共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1 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等人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人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个提案经参议会讨论通过,"交政府速办"。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于 1941 年 12 月 13 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6 页。

展经济的指示,普遍推行李鼎铭等人的建议。毛泽东还就此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以后毛泽东还说过:"'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① 在陕甘宁边区,有一段时间同党外人士的关系搞得不十分好,把李鼎铭当客人看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不够尊重。李鼎铭对此不满意,边区政府副主席也不想干了。边区政府党组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采取了改进措施:一是要各厅、处、院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汇报工作;二是每次政务会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他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三是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例行手续;四是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结果,李鼎铭先生很高兴,认为自己有职有权,不再是以客人的身份,而是以主人的身份对待工作了。

第三,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加强党的团结和干部队伍团结的重要方面,也是党实行正确的领导的必要条件。党所讲的团结和爱护干部,当然包括团结和爱护犯过错误的干部。党的历史实践表明,能否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反映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当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总是用错误的方针和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一方面,对那些对错误路线持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给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另一方面,对那些真的犯了错误的同志,又不是使他们从思想上彻底认识犯错误的原因以及改正的办法,而只是简单地把人撤换掉,达不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所以,用这种错误的办法进行党内斗争,结果只能是"造成了党内是非不明、死气沉沉的状况,使党内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这当然不会增强党的团结,而是削弱党的团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纠正了错误的路线以后,也改变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从而也就为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党内矛盾,进行党内斗争,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

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1.在党内斗争的问题上,首先要严格地区别党内的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的界限。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党采取坚决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了错误的同志,则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

2.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属于思想性质的是非问题。

3.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团结帮助,只要分清了是非,改正了错误,就应该受到信任,不要抓住不放。

毛泽东一再申明,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只是错误的大小不同而已。犯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愿意革命,能够改正错误,因此,要允许人家继续革命,要相信人家能够改正错误。而且,还要为其创造条件,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过:"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①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党的历史实践一再证明,这一方针对于增强党的团结和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具有巨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9页。

第八章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无产阶级政党在争取自身彻底解放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这种组织既不是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庞杂而松散的联盟;也不是像秘谋组织那样严密而狭隘的宗派团体,而是按一定的组织原则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严密组织起来,并能容纳一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先进分子的广泛群众性的党。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切实保证每个党员都在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工作,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充分说明了,只有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把党员严密组织起来,党才有力量。因此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是巩固党的战斗力的基础,它既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

一、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就开始把基层组织建设与党员队伍建设紧紧联在一起,作为发展党、巩固党、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重大组织措施。正确处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员队伍建设的关系,提高党的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由于党员人数很少,当时建立的小组或支部,实质是党的地方组织,但也执行一部分基层党组织的任务。一大以后随着党员的增加,二大通过的党章,才开始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当时称为小组),并指出它"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阐明了党的基

层组织在党内生活中的重要作用。1924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届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要求、"小组的工作除教育党员征求新党员外,还应当常常在工人群众里做宣传的工作"。1925 年 1 月召开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认为,党要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发展到鼓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工作,就需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就需要自身有坚固的组织。为此,《议决案》将"章程上有 5 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的规定,修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从此,党的基层组织即明确称为支部。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1923 年党的"三大"以后,毛泽东在担任中央秘书和中央组织部长期间,签发的文件,论述了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1925 年 6 月,毛泽东在韶山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① 连队没有党支部,就抓不住士兵,也就不能有效地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因而也就丢掉了革命的武装。党的"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和组织了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时,斗争极为艰苦,悲观失望的情绪在部队蔓延,以至多次发生逃跑事件。怎样把这支主要成分是农民和旧军人出身的队伍建设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呢?毛泽东利用频繁战斗的空隙,经常深入到红军士兵中,了解战士的思想情况,考察研究怎样才能抓住士兵、抓住军队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红军,主要成分是农民。他们既不是巴黎公社的工人,也不是攻打冬宫的工人,而是穿上军装的中国农民。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把他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党的组织只有深深扎根于士兵之中,才能真正掌握军队,团结群众,战胜敌人。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在红军中普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实现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置党代表。这个决定,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的贯彻,使党的组织进一步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奠定了党的发展与巩固的可靠基础。

1927 年 10 月中旬,红军在湖南酃县水口休整。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师长余洒渡只身逃跑,被站岗的士兵抓了回来。毛泽东运用这一事例教育红军各级干部,使大家认识到,只要认真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是可以迅速将许多红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6 页。

军战士的觉悟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上来的,可以使他们都象这个站岗的士兵一样坚定。只要连队有了一大批共产党员,革命武装就有了主心骨,即使个别干部动摇,也不会搅乱军心。由于毛泽东的反复教育,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到了连队建党的重要意义,迅速实现了三湾改编时规定的任务,建立和健全了红军中党的各级组织,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1928年,团长陈皓,营长袁崇全先后在湖南茶陵和江西崇义叛变,都未能带走一兵一卒,就是因为连队党支部在关键时刻起了稳定军心的作用。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中"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① 连队的党代表,同时担任连党支部书记。他们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党员和群众中威信很高。这是党支部能在连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为此总结道:"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②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③ 1929年5月,中央派往井冈山巡视的特派员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也说:支部建在连上,我们觉得这个组织很便当。因为作战大都以连为单位,每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去处理和指挥一个作战单位的事。军队其所以不溃散,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重要原因。1929年,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又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还认为,党小组是党支部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有搞好党小组建设,才能搞好基层党支部建设。因此,毛泽东很重视党小组的建设,提出了小组的"混合编制法"。所谓混合编制法,就是把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知识分子党员和工农分子党员混合编制在一个小组里,以便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增强团结,共同进步。这种编制法,对于当时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官兵结合,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红军的战斗力起了明显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反映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普遍规律,对确保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基层的战斗堡垒具有重大意义。在军外以外的生产工作单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实际上也是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和经验的延伸和推广,因此,它成为反映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以后基层组织建设的长期实际上中许多方面都是"支部建在连上"的理论观点和实际经验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66页。

新的环境中的坚持发展推广应用。因此,"支部建在连上"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伟大创造,而且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一直为党中央所高度重视。党中央多次推广这一作法,并根据这一思想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1929年12月,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的红七军发出了《红军前委通告》,要求各级党部要"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1.前委之下,各纵队设队委。2.纵队之下,各营设营委。3.各连队设一支部,军官与士兵混合编组。4.各营委及各支部由各直属队委指挥。教导队支部、训练所支部、政治部支部、军部支部及特务营营委直属前委指挥。这一事实,说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迅速为各地红军所接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毛泽东又根据军队的建设经验指出,地方党支部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好,那么,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将是很困难的。从而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到决定党的整体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原则广泛运用于各类党的基层组织,确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应成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的思想。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得到了全面展开。党的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任务、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生活制度与其他组织的关系都有了明确的确定:党中央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应真正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要在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农场、农村、兵营、商店、学校、机关等生产场所和工作单位中,组织党的支部,其目的在于使党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和军事战斗第一线"建立、巩固和坚强党的堡垒;在白区和敌占区坚持"短小精干"的原则建立支部,使支部活动方便,容易隐蔽,以便于保存党的有生力量。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形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为着实现这个目的,支部必须建立起它自己的基本工作,分配和责成每个党员去执行。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要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日常的宣传组织工作,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口号、主张、政策之下,进行革命运动。支部的这种地位是由它以下的作用所决定的。第一,党支部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切实贯彻,使其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第二,在工厂和农村中,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第三,支部直接领导、教育、发展党员和培养党的干部,是党的力

量增长的主要源泉。第四,根据地的党支部还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如自卫军)的领导者,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只有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做好行政村的工作的关键在党支部,党支部要真正成为乡村一切组织的核心,成为完成一切任务的领导力量。

党的"七大"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党的基层组织(当时称基础组织)如何成为社会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的问题。强调:党的基础组织,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组织,是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中。党的支部,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工作单位,是党的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的领导机关密切结合起来。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支部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必须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各自的问题。在解放区,党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的支部,应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协助与保证该工厂,机关、学校的计划之实施,并与阻碍这些计划实施的现象进行斗争。正是这一系列规定,确保了党把自己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之中。因此,整个单位都围绕着党的基层组织运转,党的基层组织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本单位的工作和群众的利益,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维护人民的利益,就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执掌全国政权后党关于基层组织的地位、作用、任务和工作方式的基本观点没有大的改变,以毛泽东关于"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为核心的一整套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措施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党的八大,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强调要围绕发挥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要求,要建立基层党组织的经常工作,健全党支部和党小组的生活制度。

(二)党员是党的战斗力的源泉。

在坚持党员条件的前提下,积极、慎重的发展党员,切实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确保党拥有一支有一定数量而又合格的党员队伍,是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基本措施。在党的初创阶段,毛泽东就主张,必须发展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同志"做党员,对不能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要"除名"。1921 年 7 月党的一大党

章规定:党员"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把发展壮大党作为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局关于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召开二大前要把党员人数增加到30人。1924年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六次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之议决案》指出,国共合作后,党只注意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而忽视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必须着重抓好自身的组织建设,"要求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立刻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中把28岁以上的工人收入我们的党。1925年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要求继续贯彻四大确立的以扩大党的组织和拟定的政治宣传、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为中心的组织路线,广泛吸收一切革命分子入党,数倍地扩大党的组织力量,把党变成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在中国农村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确难得很,一方面则强调在中国要建设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以农民为主要对象。为此,毛泽东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把农民中的先进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工作。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讲了党员的质量问题。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因此,要求红军中的全体党员同志应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当时的党中央在毛泽东等在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的要求下也改变了只注重从城市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思想,开始强调在壮大党的问题上,既要注重发展产业工人入党,又要对在农村发展组织极端关注。强调不论发展工人还是农民入党,都必须切实保证党员质量。提出了把组织发展工作同思想教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以确保党员质量的重要思想。

抗日战争初期,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发展,毛泽东立即把提高党员质量作为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首要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根据毛泽东关于党员条件思想及迅速扩大基层组织的要求。党中央系统地总结了这一时期党

员队伍建设的经验,从理论高度作了简明的概括,指出,党员问题在党的建设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明确提出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在党的事业发展比较顺利、特别是执政的条件下,对于维护党的战斗力乃至维护党的生存权利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①

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更加重视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提高党员的质量。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胜利后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这一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关键意义的重大问题,对提高党员的条件和质量的必要性和党员应具备的新标准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全面的阐述。指出:当革命还没有胜利时,反动派还统治着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人,还要担负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而党也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一切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形下,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自然就不来或少来加入共产党。这是过去我们发展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但是,"革命已在全国胜利,情形就不同了。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这次会议根据这一精神,制定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会后,依据这些条件,在全党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整顿,对所有党员和要求入党积极分子普遍进行了一次八项标准的教育,克服了党内某种程度上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页。

象,提高了党员的质量。

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党员的要求,是随着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格的。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又指出: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因此,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

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按生产、工作单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思想。"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普遍化,就是要按生产、工作、行政的基本单位设置党的基层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基层组织中扎根,使党能直接引导、组织,党员与群众紧密联系。实践证明:把党的组织基础设在社会最基层,并随社会基层组织的变更而变化,对于巩固党的领导,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基层党组织的任务、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必须适应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有不同的要求。

1925 年 1 月党的四大,决定将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上来。党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遇到的敌人却非常强大。由于工人阶级人数少,因此,党员的大量发展对象只能是广大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党支部不仅要在工矿中建立,更主要的是要在广大农村建立。但是农民处于分散状态,怎样把党支部建立到各个领域、地方去?怎样把这些人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党内进行改造?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基层生产单位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如何体现?党的"四大"规定:"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

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办事人员中”以及分散的农民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这样就形成了在基层生产单位和“以地域为标准”相结合的建立党支部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说明党的作用不仅只在于工矿企业,而且要扩大到广大以保甲制维系的农村地区及其它分散的行业中去,这就保证了党的基层组织能根植于所有社会基层细胞,为党的领导深入到各行各业的最基层明确了指导原则。

党要实现对群众的领导,就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改变党组织发展局限于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等大城市和少数铁路、煤矿、纺织等大企业中的状况,在广大城乡建立党支部。为此,我党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第一,“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把建立党支部的最低人数要求降低到三人,以求比较迅速地广泛地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第二,建立党支部和特别支部,以使党的影响和作用扩大到一切社会群体中。

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的时间不长,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和有党的知识的工农群众不多,因而党认识到“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能了解党的理论的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社会能够有许多现成的党员”。因此决定“把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这些人入党后,在支部内接受党的教育,改造思想提高党性修养。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当时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对党员的培训,因此党中央要求把党支部建成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和党的知识的训练基地。实践证明,大革命时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比较成功的,1925 年后,在两广、两湖、江浙,北方、豫陕、山东、四川等省党组织的发展都十分迅速,党已深探扎根于群众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杀害共产党员、破坏党组织,但是由于我党基层组织建设的成功,建成了无数打不烂、拖不垮的战斗堡垒,在白色恐怖中,党支部依然顽强地开展工作,革命火种继续到处传播。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形势变化极为剧烈的时期,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历经两起两伏。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形式和活动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在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由半公开转入完全秘密的地下状态,制定了严格的秘密工作制度和组织纪律;在苏区,毛泽东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各类社会基层组织中得到普遍推行。1928 年,党召开了“六大”。确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基础,加强中心区域党组织的建设,“以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

目的。根据这一总要求，六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甲)用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在无党的工农群众中，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乙)以党组织的力量，积极参加工农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斗争，以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讨论他们的要求，组织群众的革命行动，为取得工农一切革命行动的领导而斗争，努力工作以吸收工农参加中国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一般的革命斗争。(丙)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物，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和政治教育的工作。"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基层组织的工作，规定了支部的组织形式为支部干事会。即"以党员人数多寡为标准，支部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以进行日常党务，该干事会进行支部的工作，分配支部中党员的工作，如宣传，分发印刷品，在工会中及农民组织中进行党团工作，妇女工作，与少共支部发生联系等，支部干事会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执行党员大会或支部会议的决议，及上级党部的指示。"

针对国民党政府在城市疯狂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地下党的机关屡遭破坏的情况，党中央对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组织的问题发出了新的指示，要求首先建立健全支部基层组织，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再向上建立各级组织，改变过去由上级派人建立机关的作法。他指示由上级派去帮助恢复组织的同志，要先找到留下的党员，以支部形式开始他们党的生活，支部要在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动起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以发展行动，并在这一艰难困苦的工作中训练战斗员，这种支部就能成为工作发展的核心，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实践证明，这种活动方式，在白色恐怖下切实有效地保存和壮大了党的组织。

1937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指出了中国革命已由主要反对国内阶级敌人进入到了主要反对国外民族敌人的新阶段，毛泽东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斗争方式要有所转变，必须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影响的问题。由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党员的迅速增加，党要求基层组织在加强党的建设和实现党的领导两个方面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强调党的基层组织要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担负起四方面的基本任务：一要成为党团结群众的核心；二要成为征收党员的机关；三要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四是在根据地内，农村党支部要统一领导政、军、民、学各项工作。

党的"七大"前夕，一方面抗战胜利在望，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一方面是全党经过整风空前团结，生气勃勃，因此既需要也可能对党的

基层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密切结合起来。支部的任务是:(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二)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三)吸收新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四)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七大党章对于基层党组织的设置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凡在党员数量比较多的处所,在党的支部委员会之下,得按自然的、居住的或工作的情况,划分小组。每组选举组长一人,必要时再选举副组长一人。”同时,七大党章还专列一章来阐述党的地下组织。凡本党不能合法存在与活动的地区之党的地下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由中央根据党章通过特别的决议规定之。本党章各条所规定之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党的地下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按照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建立党的堡垒,这是必须遵守的党的一个组织原则。但在一个生产单位和群众集合点中,党的支部与小组,或党的总支部、党的工厂委员会、乡镇委员会等,应该着重那一个环节,才对于工作便利和有效,须按情况来决定。

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开始的形势,在党章中对党的基层组织的组织形式作了如下规定:凡是党员超过一百人的基层组织,经过上一级委员会的决定,都可以举行代表大会或者党员大会,选举基层委员会。在基层党的委员会下面,按照生产、工作和住区单位设立若干个总支部或者支部,在总支部下面,可以设立若干个支部。总支部由党员大会或者代表大会选举总支部委员会。支部由党员大会选举支部委员会。基层党的委员会和总支部委员会有权批准支部关于接收和处分党员的决议。八大党章还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民同党和党的领导机关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在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积极地实现上级党组织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不断地改进本单位的工作”。

(二)按照社会基层组织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在整个党的统一体中,基层党组织遍布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它不是生产组织和行政组织,也不是一般的政治组织、群众组织,而是党在各个基层单位的战斗堡垒。因此,按照社会基层组织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显得特别重要。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工业企业，实行“三人团会议”的领导体制，开始了建立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工业企业领导体制。1934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局颁布的《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规定：公营工厂企业建立三人团会议。“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必须经过厂长、支部书记、工会委员长三人团会议迅速共同解决。会议由厂长召集，如发生争执，最后取决于厂长，如支部或工会不同意厂长的最后决定，仍需执行厂长的决定，支部和工会可将意见提交上级解决之。”实行这个条例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对管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厂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它不可能一诞生就很完善，在执行这个条例的过程中，在一些工厂里曾经发生过行政、党支部、工会各搞一套，“三权鼎立”的不协调现象。因此，1942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指出，一个工厂内的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工会工作，必须统一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之下：成本少，产品好，销售快，这就是行政、党支部、工会的共同任务。三方面分裂开来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直属公营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联席会议，讨论了公营工厂的性质，明确了搞好生产是工厂党组织、行政、工会三方面的共同任务。同时，鉴于“三人团会议”存在“三权鼎立”的问题，决定建立“厂务会议”制。实行“厂务会议”制，对“三权鼎立”现象有所克服，但是又出现了厂长包办过多，削弱了党支部与工会独立工作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接管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面临着改造这些企业的严重任务。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加强企业的领导工作，1948年1月党中央指示，在公营企业中，由行政方面和工会方面组织联合的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以厂长为主席、由工会主席，副厂长、主要工程师及其他生产负责人和相当于以上数量的职工代表组成。与此同时，工厂建立职工代表会议，听取与讨论管委会的报告，对行政工作进行检查、批评与建议。这种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使企业领导体制，特别在民主管理方面，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发展。

1953年，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为了克服当时在企业管理上无人负责的现象，在部分地区的一些企业中先后推行“生产行政工作的厂长负责制”，即“企业管理方面的一长制”。企业的党组织对厂、矿中的政治思想领导负有完全的责任，对厂矿中行政生产工作负有保证和监督的责任。同时，还建立厂长领导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职工代表参加，作为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但是，在实行过程中，有些企业照搬苏联的做法，片面突出厂长个人作用，削弱党的领导和

职工民主管理,忽视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行政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

1956年党的"八大"针对"一长制"的弊病,通过参考国内外建立工厂领导体制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即"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问题都应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1957年中央又决定:"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在企业中积极试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但是,这两种制度由于"大跃进"年代强调"书记挂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后来,根据"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和改革企业管理的需要,196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革案)》。《条例》规定:"在企业党委的领导下,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指挥,由厂长负责。""企业党的委员会是企业中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贯彻执行这个条例,使企业管理走上了转为正常轨道。

农村乡、镇的基层党组织处于核心领导的地位,必须对本单位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实行全面领导。对于农村乡、镇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党是在总结农民运动和农村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明确的,这种体制一直没有作明显的变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占了百分之八十,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痛苦的失败教训中找到了到农村去,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此,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农村,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政、军、民等基层组织的关系就成了实现党的领导所必须解决的新课题。1933年1月,党中央在《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中指示:"健全支部工作,加强支部领导力量,是党的组织上最迫切重要的问题。……农村中人多的支部,可以成立支分部。农村圩场上的工人党员应单独成立小组"。同年8月,党在《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关于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的问题》中又指出:拿农村中来说,小组大都在一个群众集中的村子里,小组中的同志都是生活在本村的群众里面,对于本村群众的生活和情绪非常清楚。小组应该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工作忙的时候,还可五天一次,具体地来讨论本村子里每一件群众工作,分配每一个同志到一定的家或屋子里去工作,了解群众的需要,解答群众的问题,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小组便能够

领导本村最大多数群众。每个小组能领导本村的群众，支部就能领导全乡的群众了。1939年11月，党中央在《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单位，每个支部必须变成每个乡村每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群众运动和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

在夺取政权的年代，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农村党的组织一直处于这种领导核心地位，发挥着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仍然起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农村的全面工作。对此，党的有关文件也有明确的规定。1962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指出：农村中的党委、总支部和支部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之所以是领导核心，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担负着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工作的全面领导职能。一个乡、一个村，一条街道就是一个小社会，这里既有经济工作、政治工作，也有文教卫生、社会治安等管理工作，而且乡、镇、村又直接面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去协调各个组织，统一领导各方面的工作。这个领导核心只有执政党的基层组织才能胜任，因为在党组织中集中了一大批先进分子，他们经过党的培养教育，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不仅在农民中有较高的威信，而且能够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能够带领农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所以，乡、镇、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其它任何组织所不能替代的，我们只能坚持和完善，丝毫不能动摇或削弱。

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应对每个党员进行教育、监督，协助行政领导完成任务、改进工作。

机关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是随着根据地政权与群团机关不断发展而逐步提出来的。1939年，党中央已经指出由于机关担负着一地区或一行业的领导责任，因而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起领导核心作用。1945年5月，党的"七大"指出：各级政府机关及其他机关中党的支部，应直接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来领导。党的"八大"规定："在机关中的党的基层组织，由于机关工作的特殊条件，不能领导和监督机关的工作。但是应当对于机关中每一个党员（包括行政负责人）的思想政治情况进行监督，并且经常关心机关工作的改进，加强工作纪律，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及时地把机关工作的缺点通知机关的行政负责人和报告党的上级组织。"

（三）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根据"支部建在连上"的指导思想，党中央深刻论述了党的基层组织班子建设问题。指出：支部领导机关的健全与否，对于党的任务的完成有决定的作用。因

此,支部的党员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领导机关的人员。首先,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支部干事)必须是政治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仰的党员。要特别警惕投机分子混人支部领导机关。其次,必须有健全的支委会。支部委员会(或干事会)人数的多少,按党员的数量和工作的范围、工作的需要来决定。在一般情况下,支委会应设书记、组织、宣传、军事和群工等委员,不满五名党的支部,只设书记或加设一副书记。

党执政权立后,由秘密建党变为"公开建党"。从1949年到1951年,党的基层组织已达25万个。但是,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不能适应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认真地、谨慎地,对于我们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为此,中共中央在《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对搞好基层党组织的全面整顿工作作出了如下具体规定:第一,派到党的基层组织中去进行整党的干部,必须注意紧密地依靠党的基层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发扬他们的积极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工作作正确的估计,发扬好的,批评坏的,通过支部的内在运动,来整顿组织。第二,整理党的基层组织时,首先应对于所有的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对于已经发现的混人党内的坏分子,应予以清除。第三,对于拒绝党的教育,或经过教育改造确已无效的消极分子,应经过妥善的方法,使他们退出党的组织,或撤销他们的党籍。但在他们离开党的组织以后,仍须耐心地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与他们保持革命的友情,并可在自愿原则下,吸收他们参加党的同情者小组。第四,在处理党员的党籍问题时,必须经过支部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并提请区委以上党委批准。一次处理大批党员的党籍,须提请县委或市委以上党委批准。支部向上级报告时应注明被开除者本人的意见。被开除党籍者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向上级党委申诉。《决议》强调: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保持与提高,不仅需要对于已有的基层组织加以整理,尤其需要健全各级党委管理党员和支部的机构。这次整党极为严格,又非常慎重,所以,这次为时3年的整党工作是比较成功的。

1962年10月,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所谓党要管党,就是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切实抓好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根据这个原则,中央组织部在加强对基层组织的严格管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明确了基层组织最基本的任务是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使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懂得党员的义务、权利和做合格党员的标准。为此,

要建立定期的党课制度和组织生活会议制度，以保证党员教育和管理的落实。其次，建立、健全基层党委和支部的领导班子，明确各自的主要职能和职责，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再次，在必要时有重点地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克服党内的不良风气，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战斗力。

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党员素质

（一）积极慎重发展党员，整编党的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带来的革命高潮，毛泽东总结了我党发展党员的经验。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人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人，这才是正确的方针。"① 从而引导党组织的发展同党进行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伟大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党组织的发展。大批进步青年进人抗日根据地，大批农民加人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给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1939 年 8 月，党中央作出了关子巩固党的决定，强调在组织上巩固党，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因此，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党的建设方面，应"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一定要"进行个别的慎重的经过审查的征收新党员，纠正追求数目字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只求精不求多。"党中央还认为：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刷混人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为了贯彻积极慎重的发展党员的方针，为此，要坚持两项重要措施：第一，要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培养和教育，要特别注意把革命斗争和各项工作第一线的优秀分子，经过党的纲领、政策和党章的宣传教育之后，再接收人党。第二，要建立组织员制度。将发展党员的工作，委托给一些完全可靠的、在党的建设上有经验的、思想与作风都是纯正的工作人员去主持。

党执政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党的地位、威望的提高，要求加人共产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3—524 页。

的人越来越多,仅1949年全国就新发展党员140多万人。由于党员队伍发展过猛,特别是有些党组织审查不严,使不少思想作风不纯的人进入了党内。同时,由于一些老党员经不起胜利的考验,进城后产生了骄傲自满、不求上进和贪图享乐的思想和作风,甚至有的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严重违法乱纪,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加强执政党党员队伍的建设,就成了当时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50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提出了"严格审查"、"慎重地吸收人党"的方针,和"公开建党"的口号。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的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① 毛泽东强调:在整党开始后,先用一年时间在全党"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②。另外,在全国进行整党时,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首先将那些混人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坚决清洗出去;然后对那些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的人,加以改造和提高;而对那些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够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③ 毛泽东认为,在全面整党阶段,也要注意建党问题,他指出:"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他还特别强调:"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④ 始终注意把党员教育寓于整党建党之中。这是搞好整党建党的中心环节,也是党能保持党的纯洁性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

明确而恰当的党员条件,是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1929年12月,毛泽东从当时红军的实际出发,规定:"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人党条件为:"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人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7页。

手续为:"介绍人事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须的介绍手续。介绍人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人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毛泽东还亲自规定了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党的发展工作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制度。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了共产党员必须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所谓思想上入党,也就是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应当逐步达到:1.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2.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3.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践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4.在行动上能够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路线,并"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5.在胜利和成绩面前,不骄傲自满,在失败和错误面前,不悲观动摇,等等。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党的实际情况表明,党内那些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那些"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脏东西"的人,往往是以马列主义者自居,以共产党员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者,等等。他们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党员,党尤其要加紧教育,从根本上改造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当然,他们之中的个别人,会因拒绝党的教育改造而走到身败名裂的地步,对这样的人只有让他"离开党完事"。为了使党员从思想上入党,保证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建设党,面不允许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毛泽东强调要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对党进行组织整顿。

根据毛泽东关于党员地位、作用、条件和党组织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原则,党中央对于如何加强党员对队伍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原则、制度和要求。指出:既要严格入党条件,但又不能任意抬高党员条件。如:每个入党者要承认党纲,但这并不是说要把精通党纲作为入党的条件,提出这样高的条件,不仅会把许多要求入党的革命的优秀分子拒之门外,而且也否认了党对于党员的教育的责任。既要重视吸收工人入党,又要注意到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加入党的,而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

分子才能入党。在重视吸收工人优秀分子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吸收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贫苦的农民仍然和必将成为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因此,大量吸收他们之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使自己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放在农村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分子的上面,是完全必需的。同样,在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必要的桥梁。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要求入党者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只为当前任务奋斗,而不愿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的人,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因此,只有真正加入组织,一切服从组织和愿意将自己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

党执政以后,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要对执政党的党员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为此,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前,就拟定了在执政党条件下做一名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八项条件。党的全国组工会议严厉地批评了过去发展党员工作中任意降低党员标准的错误,强调:今后发展党员决不应该降低党员的条件,相反,应适当地提高党员的条件。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述了关于提高党员条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坚持党员标准,提高党员条件,这是执政后党的地位、环境的变化及革命任务的艰巨性所决定的,是党员队伍的现状和人民觉悟普遍提高所要求的,而不是任何一个人主观臆想出来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必须更加提高,同时也可能提高。

(三)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要求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的二大决议案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并要求共产党员在革命运动中做"先锋"。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当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伐时,党中央明确指示,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做英勇作战和爱护人民的模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要求,指挥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规定连队党支部要用各种办法激励党员,使他们在非党群众中成为执行工作的模范,成为勇敢战斗的模范。党支部要把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支部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突出地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要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①]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说，共产党员只有以自己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动，为群众作出表率和榜样，才能感召群众，带领群众前进。同时，毛泽东还根据当时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出了具体要求：在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共产党员"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在群众工作中，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政客。"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在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产党员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落后群众和犯错误的群众。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在思想作风和学习问题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1页。

泽东在全面论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毛泽东对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重大意义及其内涵的高度概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针对自己所处的执政地位,对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决议》中指出:"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积极地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建设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党中央号召党员"以自己的英勇劳动和革命觉悟,以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艰苦奋斗、自我牺牲的模范作用,来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前进"。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针对新形势的需要,要求党员"在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邓小平在"八大"中还特别提出了党的领袖人物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说:"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

第九章

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毛泽东关于党风和作风建设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大贡献。

一、党风直接反映党的形象

（一）"党风"概念的提出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实践和理论的一个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上，"党风"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论述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的任务时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接着又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①]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党风就是党的作风，并且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这里仅指党组织及党员在组织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作风。而包括"学风和文风"在内的党风，则指共产党组织及其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作风。

党风概念的提出，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在理论上的一次飞跃。党风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人民群众以及对党组织自身的态度和行为，是党在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和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作风上的表现，是党的各方面工作的综合反映。

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和领导革命斗争的特殊条件，决定了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的缺点错误的态度、对于革命中的困难和失败、成功和胜利的态度的特殊重要性。要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设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以主观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到党能否真正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党能否真正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盛衰兴亡。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数后少,革命力量开始时不过是一点、数点"星星之火",而中国革命的敌人却是很强大很残暴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以弱小的革命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党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必须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矛盾十分复杂特殊,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制定和实行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革命的胜利,这是十分艰难的任务。在实现这一艰难任务过程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任何错误,都会或多或少使人民利益遭受损失,因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一个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党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由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培养,逐步形成了理论联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而"党风"这个概念,就是在总结我党进行党风建设的独特经验,适应我党建设优良党风的需要而概括出来的。

毛泽东提出的党风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独特经验的理论升华。是表现在行为主体上,从党员或党员干部个人的态度和风格,扩展到党组织的整体形象和风貌,党风不只是党员个人的作风,而且是党组织的整体作风。二是从党风的内涵和外延上,从主要是党员或党员干部的个人品行、工作作风扩展到政治、思想、组织、生活等各方而,把学风、文风都包容于党风概念之内,从而深刻揭示了党风与党性、党的世界观的内在联系。

(二)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体现。

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不同于任何其他政党的党风,归根结蒂是由于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坚强纯正的党性。

无产阶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和升华,它是伴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随着近代大机器生产的出现而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阶级性形成的过程。无产阶级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生产实践、生活经验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当无产阶级作为"自在的阶级"存在和进行斗争时,就有了与该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阶级性,

但这时还不能说产生了党性。只有当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批判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并用以武装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起自己的政党，作为本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团结和带领本阶级广大群众为实现本阶级所意识到了的历史使命而自觉斗争的时候，才形成了无产阶级党性。无产阶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使这个集中得以实现的理论武器，就是被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党的优良作风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①

在毛泽东看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党的作风或党风，是党性的表现；而党性则是由党的科学世界观决定的。因而，就世界观、党性和党风的关系来看，是党的世界观决定党性，世界观和党性决定党风。党风是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世界观、党性是党风的内在根据。这就是党风同党性、党的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观、党性决定党风的性质。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这也就是党性。这种先进的世界观和党性，决定了共产党的党风必然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切为了群众、坚决相信群众、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必然是一切对人民负责，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抱着郑重的负责的态度，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必然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反之，如果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则必然是以主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态度对持马克思主义，以官僚主义的态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

度对待人民群众,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和问题,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从一个政党、一个党组织和党员的作风,从其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民群众、对待人民事业和自己错误的态度和行为,可以看出这个党、党组织、党员的世界观和党性。

第二,世界观和党性决定党风的变化。世界观和党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世界观和党性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向上的,也可能是向下的。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如果不坚持世界观的改造,不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不使自己的思想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也可能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后退,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在世界观、历史观上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人,由于党处于执政的地位,由于和平环境代替了战争环境,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也可能逐渐地使群众观点淡漠,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衰退,逐步脱离群众,犯官僚主义的错误。这些都是由于世界观发生向下的变化,而引起党性、党风发生向下的变化。相反,一个党员入党之初虽然还拖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在世界观上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化,但他能自觉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改造世界观,加强党性锻炼,表现在作风上就能逐步去掉不良作风,树立优良作风。这是世界观的向上变化,引起党性,进而引起党风向上变化的情形。

第三,世界观和党性的状态决定党风的状态。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是靠不断解决内部矛盾,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来坚持党性和保持优良党风的。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内部,不可能没有一点不正之风,不能因为有非无产阶级作风存在,就否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否定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这里的关键,是看党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坚决地不妥协地同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还是对它姑息纵容,放任自流。

端正党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根本上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改造世界观和增强党性上下功夫,这才是治本之策。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如何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时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他还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毛泽东是把自己也放在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的"所有的人"之内的。周恩来生前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为全党树立了自觉地坚持改造世界观、坚持党性锻炼和修养,保持和发扬优良作风的光辉典范。这一切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充分

说明了党风是世界观和党性的体现。坚持不懈地自觉地加强世界观改造和党性锻炼，是抵制不正之风、加强党风建设的根本。

(三)党的优良作风是保证党的发展、推动革命事业的强大动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党性的外在表现的党的优良作风，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党和党的事业，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具体表现在：

第一，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坚强的保证。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司令部。一个党要有力量，首先必须自身思想统一，组织坚强、行动一致。思想统一，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全党在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才能有共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实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优良党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统一是行动一致的前提，也是组织坚强的基础。行动一致、组织坚强还要有党的制度和纪律来保证。但对待党的制度、纪律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对于违反党的制度和纪律、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违反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有一个敢不敢、会不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这些都属于党风问题。党风正，就能确保党的纪律、制度得到切实贯彻执行，确保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落到实处，从而使党的组织团结统一、富有战斗力。

第二，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得以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的重要条件。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任务，一是要根据革命实践的发展，适时制定出正确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二是用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策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使全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保证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策略的贯彻执行。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策略来，并使之贯彻落实。这里，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民群众，对待客观实际，对待党的工作的正确态度即优良党风，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党的优良作风，是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党只有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完成党的纲领和路线所规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人民群众中只是少数。单靠少数先进分子，是战胜不

了强大的敌人,完成不了伟大而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的。

但实现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是有条件的。党组织和党员坚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实现党的路线、政策、策略的模范的优良作风。这是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实现党对人民群众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条件。

二、反映中国共产党本质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总结党进行党风建设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提出和论证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放在第一位。他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①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旧理论、旧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落后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可能独立地创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毕竟产生于西欧,发展于俄国,中国国情较之西欧、俄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是一项为西方各国无产阶级从未遇到过的空前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和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也关系到党是否能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是在同各种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曾指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① 毛泽东所得出的结论，完全适合于党的全部历史。我们党全部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是在不断地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这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中胜利前进的历史，也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正式把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在内的三大作风作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提出来，不仅从理论上为党成立24年以来党风建设作了总结，而且为此后党的作风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七大"以后，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尽管其中也经历过曲折，但这种曲折恰恰是因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毛泽东认为发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主要体现在：

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的区分和选择，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看这个原理是不是适合今天中国的国情，离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便无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理论联系实际又是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坚持，尤其要发展，而且只有随着实践发展，才能真正坚持。既然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和生命力所在，而实际生活、人民的实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也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在要求。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就能很好地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推动马列主义不断发展。

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途径。理论联系实际，不只是把理论应用于实际，还包括从实际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这是一个由理论到实际再由实际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理论的循环往复由低级到高级无限上升的辩证过程。无论是以理论指导实际或是从实际中创造理论,都必须既了解实际又了解理论,并且善于找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结合点"。了解理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需要了解实际、而了解实际不仅是学习和应用理论的需要,也是改造实际和从实际中创造理论的需要。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映在党员个人身上就直接体现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起码要求,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做老实人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批评党内宗派主义残余的表现时,曾经指出闹独立性的人"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①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物,一切从实际出发,反映情况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不歪曲、不臆造、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赶浪头,不搞形式主义,不摆花架子,扎扎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符合客观实际和符合人民利益的统一,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和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的统一、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顶住各种压力,抵制不正之风、敢于为人民的利益纠正错误,毫不犹豫地革除一切不合乎实际的东西。这是共产党员党性坚强的表现。

(二)密切联系群众。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就是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也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我们所面对着的最重要的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从这个最基本的实际出发,并且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毛泽东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之后,接着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②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其阶级利益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密切联系群众,是全世界一切共产党的共性,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具有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意义。共产党人在人民中只是沧海一粟,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象，但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占人口大多数，而在中国只占很小的比例。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同占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便显得势单力薄、孤立无援。悬殊的力量对比，严酷的斗争环境，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比欧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更加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而长期的革命斗争也培养了党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优良作风。以毛泽东当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止一次的强调，一个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得到人民群众信赖和拥护的党是不可战胜的。毛泽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中，以其密切联系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造，亲手培育了党的这一传统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的核心。党的优良作风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其中密切联系群众，居于核心地位。从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点来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服从和服务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另一方面，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在一切工作中都自觉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任何错误都会或多或少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有错误不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批评，不坦白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切实地加以改正，就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才会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觉悟和勇气。

党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也同密切联系群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骄傲必然看不起群众，急躁必然导致工作的失误，使人民群众利益蒙受损失，二者都有可能脱离群众。只有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能被群众看成是自己人，才能建立和保持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只有谦虚谨慎，才能平等待人，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当好群众的学生，群众也才愿意同这样的党员、干部接近，心里有话才会向这样的党员、干部诉说。

(三)自我批评。

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共产党人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既继承了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进行党风建设独特经验的凝结和升华。我们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引导广大党员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唯一正确的自我教育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思想关于自我批评的理论,是党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导思想,是党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理论概括。毛泽东论述了开展自我批评的根据。指出"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①] 帝国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反动势力即中国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有如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党的组织和党员出现错误、缺点的客观原因,也是我们必须经常进行自我批评的客观根据。

开展自我批评的主观根据,在于认识过程的复杂性。由于认识活动受主观和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所以,毛泽东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②]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错误难免",而且把犯错误的主体从"任何个人"推广到"任何政党"。既然错误难免,自我批评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毛泽东论述了进行自我批评的目的。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③] 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是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出发点。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战斗力的源泉。而党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只有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错误思想,消除意见分歧,才能在党的正确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也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是党的领导权问题。要实现党对同盟者的领导,还有一个教育和引导同盟者前进的任务。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导同盟者通过自我教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思想,协调行动,这是巩固统一战线,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重要途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共产党人之所以不惧怕批评,能够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同自身的缺点错误作斗争,就是因为我们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服务为唯一宗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通过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同志间的相互监督，增强内部团结，克服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缺点或错误，就能保证党的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毛泽东还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并把它由处理党内矛盾的方针推广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这个方针是我党自成立以来处理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等革命队伍内部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延安整风中正式概括成为上述公式，成功地解决了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矛盾，执政之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工商界也采取这个方法。以后，我们又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人民内部各个方面，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基本方针、基本方法。

“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鲜明地反对党内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反对取消党内积极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对破坏党内团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冒险主义。这个公式，概括了党内团结和斗争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和手段、动机和效果、原则和方法高度统一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谦虚谨慎。

谦虚谨慎是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全国解放的产夕，号召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①] 认为这是在破坏旧世界以后“建设新世界”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一贯倡导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1944 年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总结了党成立以来 23 年间 4 次大的骄傲，都使党吃了亏的历史教训，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②] 他特意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甲申三百祭》一文印发全党，[③] 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8—143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4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48 页。

的错误。党的"七大"是一次总结历史经验,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基础的大会。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号召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他再次号召全党吸取历史教训,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因此,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党执政的条件下,一些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容易骄傲自大,脱离群众,针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再告诫全党要保持谦虚态度,反对骄傲自满情绪。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提出全党要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其任务之一就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号召全国人民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词中,毛泽东在总结高饶反党事件的教训时,再次说: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由解放生产力转到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的转折关头召开的。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反复告诫全党不要因为有了一些成绩,因为国家大就骄傲自满,他指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95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到,再过45年,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同时指出: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党内指示中,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① 的不良作风。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骄傲自满的危害性。指出,骄傲自满会堵塞前进的道路。有骄傲自满情绪的人,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不愿虚心向别人学习。不打开自己的眼界,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会破坏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有骄傲自满情绪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3页。

人,会对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做出不正确的估计,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不愿意接受监督批评,听不得不同意见,不重视集体领导,做不到平等待人,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单位,有意无意地变成"独立王国"。所以,"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骄傲自满会引起共产党员政治上蜕化变质。如果对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骄傲情绪不加以严厉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毛泽东分析了骄傲自满的成因。指出,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只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忘记了远大目标;片面夸大个人作用,忽视群众和党的作用;把自己的长处、成绩绝对化,看不到自己还有缺点和错误。这必然会昏昏然,忘乎所以,骄傲自大起来。

毛泽东指明了防止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要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用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针对骄傲自满的认识根源,他号召党的干部"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用唯物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用实事求是战胜主观主义,从思想方法、思想路线上挖掉滋长骄傲自满的根子。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谦虚谨慎同骄傲自满的对立,从历史观、人生观上看,就是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的对立。只有树立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克服骄傲自满。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直接向群众学习。要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监督体系。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这些规定就是党内的制度,是防止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的保证。除了这些具体制度外,最根本的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使党员时刻处于党的、人民群众的、民主党派的监督之下,处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法律、舆论的监督之下。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主要是让民主党派来监督共产党。并且指出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种监督,就会谨慎一些,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五)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革命精神,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革命事业、对待困难、对待物质利益的根本态度。

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是中国特殊环境下长期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敌人力量异常强大,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战争的残酷性、长期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所罕见。正是这种特殊环境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揭示了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任何困难,要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敢于牺牲一切直至生命的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精神;不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也是一种淡泊名利、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和道德情操。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预见到党执政以后党内有可能滋长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醒全党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发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他要求全国一切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一再强调必须反对贪污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他为《勤俭办社》一文加上按语: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全党面临着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出: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1957年,针对党内一些中高级干部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闹名誉地位,追求吃穿享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敲起警钟,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号召共产党员发扬"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

彻底革命精神。

毛泽东强调艰苦奋斗是我党实现历史使命的精神武器。指出艰苦奋斗有利于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艰苦奋斗有利于振奋革命精神，不断开拓进取，作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就是要通过艰苦奋斗，永远保持着蓬勃的生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艰苦奋斗有助于拒腐防变，生活上贪图安逸，追求享乐，不顾人民群众的疾苦，必然导致政治上蜕化变质。

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少数党员、干部不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警诫，经不起执政的考验，发生贪污浪费的行为，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制止腐败现象蔓延，他亲自发动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强调，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不仅在环境艰苦的时候必须保持，就是在党执了政、掌了权，将来实现了现代化，国家富强起来以后，也不能丢。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要坚持辩证法，防止片面性，要坚持艰苦奋斗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统一。

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深刻地说明了艰苦奋斗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内在联系，他说：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勤俭是为了建国，团结奋斗是为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艰苦奋斗，决不是片面地提倡过苦日子，把艰苦奋斗等同于安贫乐道，是对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误解或曲解。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对于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

斗的模范,为广大群众做出表率。另一方面,干部群众越是艰苦奋斗,领导越是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免除后顾之忧,这样,群众的干劲、热情才能经久不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三、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同党内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对于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党风好坏关系民心向背。

党风好坏,决定党的路线和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正确的路线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主观臆造出来的,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面制定出来的。只能是从群众中来,从实践中来,从客观实际中来的。能否保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党风,是能否制定出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路线的关键。

党风好坏,决定着党的正确路线能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错了,会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即使党的路线正确,但如果得不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同样会损害群众的利益,影响党与群众的关系。党的正确路线能否全面地不动摇地贯彻落实,受许多条件制约,其中党风好坏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党风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党风好,党组织和党员模范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公道正派、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时刻关心群众的痛痒。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人民群众就会从身边所接触到的党员、干部和党组织身上,感受、体验到整个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而真心实意地信赖党、拥护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努力工作。反之,如果党风不好,党的组织、党员、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侵吞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财产,有的还对群众气指颐使,称王称霸,敲诈勒索,欺压人民,这就

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与愤怒，失掉民心，不仅个人弄得身败名裂，而且败坏党的声誉，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党风不好，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对党的影响和危害更为严重。首先，权力具有两重性，它既可用来为人民造福，也可以用来为个人、家庭、小集团谋取私利，权力过分集中和失去制约，必然导致权力滥用，产生腐败。其次，执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可以通过遍布全国的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全国各级政权，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由国家机构来推行。如果主观指导失误，特别是党的路线、基本政策失误，就会通过党组织和国家政权两个渠道，凭借政治权力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扩散，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再次，执政的地位与和平的环境，使党失去了严酷的战争环境对于党的队伍的自然选择、自然净化作用，党员、干部不再象战争年代那样明显感觉到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居功骄傲的情绪容易在老党员、老干部中滋长。党的迅速发展也使为数众多的未经过战争考验的人进入党内，这一方面给党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带进了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特别是有些动机不纯，想从执政党地位捞到好处的分子千方百计钻到党内来。加上资产阶级的腐蚀、渗透与和平演变以执政的共产党为重点，这一切，使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有可能发展；党内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有可能滋长。在这种情况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党风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更多更复杂了。党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群关系的实质，是党能否代表并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在党执政条件下尤其是这样。

(二)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持久的斗争。

我们党是一贯坚持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消极腐败现象，包括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等等，都是剥削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政党进行侵袭腐蚀的产物，是同工人阶级的本性、共产党的宗旨根本不相容的。由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而在工人阶级共产党内发生消极腐败现象更是难以完全避免。但消极腐败现象作为旧社会的遗留，总是要随着它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归于消灭的，不可能永世长存。工人阶段及其政党的任务，就是把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作为改造世界的一项任务，包含在它的历史使命之中，长期坚持下去。

早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就开展了反对贪污和反浪费的斗争。毛泽东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①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始终把从严治党治军,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贪污浪费,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当作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经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党中央毅然批准对黄克功处以死刑。毛泽东给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②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发表讲演,以抗日根据地党风、政风、民风建设的巨大成就,驳斥反共顽固派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的叫嚣。他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③ 这番话自豪而实在地说明延安时期党风、政风和民风已经堪称全国之最。

为了团结抗战,党同资产阶级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及时提出了防止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腐化、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的任务,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④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还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贪污现象、形式主义的任务。毛泽东指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3页。

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① 在1943年10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②。他还批评了地方工作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作风,要求象天天扫地洗脸一样,通过经常性的自我批评来克服这两种不良作风,和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

正是因为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不懈地同党内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自豪地对国民党区域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党风、政风进行了比较:“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忘记了毛泽东的一再告戒,经不起执政的考验,贪污腐化的现象滋长起来,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三反五反运动,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在建国以后由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处决了由革命老干部变为大贪污犯的刘青山、张子善,按照法律和党纪查处了大大小小的贪污、浪费等违法违纪案件,震慑了蜕化变质的坏人,教育了犯错误的干部,使党和政府在建国以后的头几年里保持了优良作风和树立了廉洁政治。由于党坚决进行了反腐败斗争,20世纪50年代是党执政以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一个时期,至今令世人称道和向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6、9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6、9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8页。

第十章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坚持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党的团结统一和党内斗争问题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构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关于党的团结统一的理论。

一、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一)党的团结和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党的团结统一，是指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动上的一致。是高度的觉悟和组织纪律的统一形成的合力。是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力量之所在。无产阶级政党从来都把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由毛泽东建议、经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的团结统一，从而使党在政治上不断成熟、组织上不断巩固、事业上不断兴旺发达。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一再强调党内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是取得中国革命事业胜利的两个"无价之宝"。从党的"八七"会议到遵义会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73页。

议近八年时间里，毛泽东在党内有一半时间是处于逆境之中。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原则和方法，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即使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自己受到排挤和打击时，也坚持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同时，在组织上服从党的决定，在思想上坚持党的原则，不消极，不悲观，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为党工作；当"左"倾错误危害革命时，还想尽一切办法使党的革命事业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团结和依靠党内大多数同志，毛泽东十分注意正确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时时警惕有人挑拨离间。遵义会议前，当时他处于少数地位，但他仍然服从大多数，并以实际行动积极争取大多数，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取得了大多数的支持，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1935 年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反对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严重危害党和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把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方法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处理了这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一方面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在党的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和延安会议上，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分裂活动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揭露；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耐心说服和教育的方法，争取张国焘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在他接受批评，表示愿意改正错误时，党就表示欢迎，并给予改正错误和自新的机会。虽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但保留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的职务。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为了挽救他，而且为了教育全党，特别是教育多数受张国焘影响的同志。虽然后来张国焘拒绝党的教育，叛党而去，但却"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① 避免了党和军队的分裂。1945 年党的"七大"认真总结了在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上的历史经验，首次将加强党的团结载入了党章的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措施，使党从 1935 年遵义会议之后一直较好地保持了党的团结统一，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坚强的组织保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1 页。

证。

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在党内曾发生了两次大的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的反党活动,一次是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的反党活动,一次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的反党活动。从粉碎这两次大的反对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实践中,我们党对党的团结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在理论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分裂党的破坏活动中,明确提出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这个十分重要的建党思想,把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到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54年,党中央针对高岗、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发起的反党分裂活动,于2月6日至10日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他尖锐指出:"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①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揭露、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的反党阴谋活动后,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象保护眼睛一样来维护党的团结。并就如何增强党的团结,提出了六条原则和规定:"第一、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第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27页。

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第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第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第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第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① 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个《决议》又分析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指出这场斗争是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和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及时揭露和粉碎野心家腐蚀党分裂党的活动，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毛泽东要求全党干部在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的长期斗争中，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光明正大原则。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1956年党的"八大"认真总结了同高饶反党联盟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首次将"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载入党章的总纲，指出："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他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反复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在党内不容许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不容许有分裂党、进行小组织活动、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党的集体之上的行为"。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73—74页。

党的"八大"进一步分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对党的团结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强调了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得到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是,仅仅有正确的主张还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胜利。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了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党自身不是团结的,我们怎样能去团结人民呢?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全党都要充分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二)党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①] 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达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共产党员应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把"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提高到坚持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取得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失败的高度来认识的,因此他在结束语中强调党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团结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并说:"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战线这个目的,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党的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还满怀信心地预言:"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②] 由于党的坚强团结并紧紧团结了全阶级、全民族,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于1949年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

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后,毛泽东仍反复强调党的团结是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279页。

利的基本保证。1957年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每个同志都应该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作为自己一切思想、言论、行动的标准。

(三)党的团结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毛泽东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离开这些根本原则，全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团结。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成立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原则、使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作了科学的评价，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①] 1945年党的"七大"，首次在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党的巩固、团结、统一的重大作用。"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党内无视或者误解中国革命这些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左'倾路线与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2—953页。

毛泽东还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① 全党在党的正确纲领和路线上的一致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全党在纲领和路线上的一致,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准则,失去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这已被党的历史经验所充分证明。

毛泽东不仅十分重视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而且十分重视党的团结统一的组织基础。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的结束语中,发出了"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的庄严号召,他说:"我们大会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这次大会由于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原则,使大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会之后,由于全党在"七大"的正确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不仅彻底打垮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全面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调动党员积极性、增强党的团结、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党的团结,从组织上讲,也就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一致。没有这种组织上的一致,全党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维护党的组织统一,还必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② 这"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是全党要服从中央。党中央是全党团结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就根本谈不上全党的团结。全党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到令行禁止,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决不能各行其是,自由行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维护党的组织统一，还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及派性，反对任何损害党的团结统一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毛泽东在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消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并着重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①

毛泽东在1962年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1954年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历史经验，谈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两条界限，突出地提出了在党内不准搞秘密集团。他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②

二、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是达到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条件和基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沉痛的教训。从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党内矛盾的理论，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方针、方法，从而使党不断巩固发展。

（一）党是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理论。他早在1937年的《矛盾论》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他还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4—835页。

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① 然后他着重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这个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指导思想。

1936 在毛泽东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了 1936 年以前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强调了党内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重要思想。他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党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 1935 年~1936 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③

1938 年,毛泽东又着重指出:"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④ 党从出生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也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这两种斗争是有区别的,但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党不进行这后一种斗争,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5、30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85—18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85—186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0、532 页。

那么,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就要使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因为这样而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腐化,就是因为这样而变成了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主要的社会支柱。所以,这种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些企图避免党内斗争的想法,那些不愿批评别人错误以便换得别人也不批评自己错误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①

党内斗争和党的团结是党内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统一,是进行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则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② 毛泽东在这里正确地解释了党内斗争与党的团结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党的真正的团结统一不是自然产生的,必须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实现。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批评与斗争,就不能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如果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保持一团和气,放弃思想斗争,那就不仅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相反会由形式上的团结和"虚假的统一",进而滑向假团结之名行分裂之实的邪路上去。另一方面,党内达到新的团结统一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内斗争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开展党内斗争是既要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共同进步。使大家分清是非,提高识别能力,坚持对的,改正错的,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离开党的团结统一,片面地强调党内斗争,必然要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甚至造成党的分裂。只有为着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党的团结统一的目标而进行的党内斗争,才是正确开展的党内斗争。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二)党内矛盾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要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就还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党内矛盾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根源。毛泽东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性质及其根源,它是我们在开展党内斗争时所必须遵循的一条马克思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9页。

主义原则。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在处理党内矛盾方面,有过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过去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矛盾方面的成功与失败,可以说都同能否正确地认识党内矛盾的性质与根源有关。

党内的本质矛盾,是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集中反映。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最觉悟、最革命的阶级,但数量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虽然占绝大多数,却具有很大的两重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小生产者自私狭隘性的一面,其革命性的一面,决定着他们绝大多数愿意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这就使大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先进分子加人了无产阶级政党。但他们的自私狭隘性的一面,又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在加人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即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作风或重或轻地带到党内来。加上有的人在人党后经不起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就引起了党内的矛盾。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了中国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揭示了党内的本质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① 对于党内的这种本质矛盾,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② 由于党内矛盾本质上是属于思想性质的矛盾,因此解决这种矛盾的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它的实质和内容,归根结底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分歧和斗争。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内矛盾的性质,是我们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前提。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分析和处理党内矛盾必须注意的问题。虽然党内矛盾基本上是思想性质的矛盾,党内斗争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斗争,但是并不排斥在某种情况下党内也会出现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
② 《刘少奇东选集》上卷,第327页。

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① 毛泽东在这里把党内矛盾的性质分为非对抗性和对抗性，着重指出在党内大量的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只有在个别特殊条件下才出现对抗性矛盾，这个基本观点，同样是我们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理论依据。

（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中，首次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处理党内矛盾、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基本方针。这是针对历史上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面提出来的。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处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作出中国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错误的判断，提出"对于共产党本身队伍内极少的'左'右倾向——就算是没有形式的倾向也好，都应当进行毫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② 当时王明在《两条路线底斗争》一文中，对这一错误理论作了系统的发挥。1931年6月，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发布《中央给红军党部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提出"一切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无情的斗争。"③ 他们曾对不赞同他们错误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面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④ 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身心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摧残，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使党受到极为痛心的损失。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22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0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6页。

正是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① 这个方针是处理党内矛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既不同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方针,又不同于对犯错误同志姑息迁就、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倾向。其目的是为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又把处理党内矛盾的丰富思想,科学地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个公式的本质要求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纠正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而提出的。毛泽东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种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几年之后,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毛泽东的这段阐述中,可以看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具体化。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只有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828页。

清思想，分清是非，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

“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①] 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矛盾论》中提出的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方法，到了延安整风时期，这个基本方法就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有团结的愿望到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必须有一个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正确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曾对延安整风的方法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②]

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必须正确开展反对“左”、右倾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为了正确地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地反对错误倾向，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左”倾，什么是右倾。毛泽东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具体阐述，他说：“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在党内发生错误倾向的时候，一个时期总有一种错误倾向是主要的。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容易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滋长，以致反右时可能出“左”，反“左”时可能出右。因此毛泽东强调：“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错误思想倾向一定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没有就不要硬找；同时在反“左”时要注意防右，要反右时要注意防“左”。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扣上“左”倾、右倾的帽子。

（四）整党整风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

采取整党整风的形式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是毛泽东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创举。“整风是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我们党的整党整风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党不是没有问题了,相反,“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是党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危害极大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长期统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未从思想上加以彻底清算。党内还存在严重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严重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在抗日战争中,有大批新党员涌入党内。“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带来了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有的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经常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成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滋生的温床。因此,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于是,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把人们的思想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他们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撰写了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论著。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沦》、《(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为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的,它经历了整风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总结历史经验时期,前后共用了四年多时间。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了整风的准备阶段;1942 年 2 月 1 日和 5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阶段转人全党整风阶段;1943

年10月10日，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从此，整风运动由全党整风阶段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这次整风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彻底清算了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力地克服了党内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风气，使党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加之当时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而对于战胜党和军队面临的严重矛盾和困难，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还在于为我们党提供了成功的建党经验。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加强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正确领导，这是党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的有效方法。

邓小平在回顾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时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① 毛泽东创造的这种整党整风形式，不仅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所以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

三、党的领导干部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模范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指出："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

①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2页。

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主要关键。"① 这就是说,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搞好党的团结负有更大的责任。

(一)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党的团结。

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把党的干部的团结、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团结放在首要位置上。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② 这是因为党的干部是广大党员和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他们直接肩负着党、政府、军队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中起着骨干作用。党的干部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他们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又去指导群众的斗争。党依靠他们去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他们去宣传、组织和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而党的领导干部则更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党政机关的主要成员。因此,党的干部队伍的团结,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团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团结,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实现自身的团结,并成为本单位的核心,影响和带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如果领导干部不团结,就会影响党委(支部)的团结,影响党和群众的团结,影响群众的情绪,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最终影响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

党的干部要带头维护党的团结,就要带头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③ 在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正确思想作风和庸俗作风之间,不能搞无原则的和平。毛泽东对那些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以及进行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等自由主义行为和表现是深恶痛绝的,认为"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④ 他号召:"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1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0、361页。

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① 在这个问题上，党的干部、特别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十分重要的。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坚持原则，出以公心，主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力弘扬正气，抵制和批判歪风邪气，反对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就能造成一种是非清楚，功过分明，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党内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便有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基础。

（二）要坚持搞“五湖四海”的原则。

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要实行五湖四海”的原则，是毛泽东历来强调的一条指导原则。他认为我们的干部“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② 大家虽然分别在各条战线上工作和生活着，但理想信念却是共同的。应该不分新老、不分地区、不分民族、不分行业和职务，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纲领和总任务而奋斗。但是，在我们干部队伍内部，每个干部的工作经历、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性格特点、业务专长等各不相同，加上社会事物异常复杂，干部之间包括领导班子之间，产生不同的认识甚至发生隔阂是很自然的。毛泽东说：“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而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专业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电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子诸如类似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③ 为此，就要善干正确处理各方面干部之间的关系，如老干部与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是团结的。但是由于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过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受到损害，存在着某些不利干团结的因素。要求党的干部一定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0、3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页。

有共产主义的伟大胸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处理同志关系上,只要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就不应为私怨而耿耿于怀、排挤打击,不应由于亲疏而有不同的对待,特别是要绝对禁止搞宗派活动,搞小圈子,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

毛泽东强调指出:"鉴于张国焘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责任。"① 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反对与克服那种以人划线,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倾向。

要加强党同非党干部的团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② 强调应该消灭在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残余,这是中国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他说:"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诚心诚意帮助他们,用热烈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③ 如果我们党不善于团结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就无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要想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要端正对党外干部的态度,尊重他们的长处,尊重他们的职权,真心诚意地去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与才能适当地组织到各项工作中去。对党外干部的要求不能求全,不能等同于党员干部。发现他们有缺点错误,应该满腔热忱地、推心置腹地进行说服与帮助。大批的党外人才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党的事业便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这是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三)力戒骄傲,是领导者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

毛泽东说过"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④ 党内生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才能和周围的同志平等相处,互相尊重,搞好革命团结。领导干部要做团结的模范,首先要有良好的民主作风。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委(支部)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在党委会讨论重大问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52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

题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决定问题时，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能专横跋扈，搞家长制，“一言堂”。各级领导成员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善于合作。大家都要自觉地维护党委集体领导的威信。正如毛泽东告诫我们的那样，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领导干部谦虚的美德还表现在：在工作中不争功，不诿过。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及时看到自己的短处，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如果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处处唯我独尊，只要别人尊重自己，而自己却不愿意尊重别人，那是很难搞好团结的。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如果领导干部骄傲自满，就会脱离周围的同志，变成“孤家寡人”，那是什么事情也办不好的。

（四）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和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毛泽东曾经说过：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问题了。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只要不是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就应该出以公心。在坚持党的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逐渐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即使一时不能统一思想，也应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以便团结一致，做好党的工作。对于工作中发生的不同意见，则更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对于正确的意见，包括不正确意见中的合理因素，应该虚心采纳，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说服教育。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甚至反对自己的话都要听，从中吸取正确的成分，而不应感情用事。这一点对于担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来说，尤为重要。

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还要善于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如何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说：“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一要看，二要帮。”“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毛泽东还从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强调指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人多一点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

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他还用高岗本来想搬石头打人结果却打倒了自己的教训告诫全党:"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毛泽东不仅这样谆谆教育全党,而且身体力行正确地对待党内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在党的"七大",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对于犯过"左"倾错误而又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博古同志,仍然予以团结和信任,并推荐博古担任七届中央委员。这种博大胸襟和豁达大度,为全党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东政治战略理论与实践

唐春元　著

目　　录

前　言 …… (1065)
第一章　绪论 …… (1067)
一、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来源 …… (1067)
二、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基本特征 …… (1075)
三、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哲学基础 …… (1080)
四、毛泽东政治战略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 (1084)
第二章　民众的大联合 …… (1086)
一、创办《湘江评论》：吹响民众联合的号角 …… (1086)
二、《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最早宣言书 …… (1093)
三、驱张运动：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战略的一次成功预演 …… (1097)
第三章　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 …… (1104)
一、国共合作的前奏曲：在中共“三大”上与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1104)
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 …… (1109)
三、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 (1114)
四、主编《政治周报》 …… (1118)
五、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 (1124)
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 …… (1131)
七、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教训的总结 …… (1136)
第四章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 (1139)
一、“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 (1139)

二、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 …… (1144)
三、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 (1152)
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民革命的伟大纲领 …… (1159)
第五章　争取袁文才、王佐 …… (1165)
一、上山："与绿林好汉交朋友" …… (1165)
二、只身赴约：首先争取袁文才 …… (1171)
三、合兵击败尹道一，说服王佐参加革命 …… (1177)
四、改造"绿林军"，创建根据地 …… (1180)
五、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赢得井冈山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 (1183)
第六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 (1187)
一、事变前：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确立 …… (1187)
二、事变前：毛泽东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接触 …… (1197)
三、震惊中外的"双十二"枪声 …… (1203)
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 (1208)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 …… (1213)
第七章　有理有利有节：坚持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1216)
一、毛泽东与王明的根本分歧 …… (1216)
二、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几个重要原则 …… (1222)
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 (1231)
四、打退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灵活运用 …… (1236)
第八章　重庆谈判：毛泽东"谈笑凯歌还" …… (1246)
一、蒋介石出难题：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 …… (1246)
二、戳穿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慨然赴山城 …… (1253)
三、针锋相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唇枪舌剑巧周旋 …… (1257)
四、因势利导：毛泽东渝州广交朋友 …… (1267)
五、签订"双十协定"：毛泽东谈笑凯歌还 …… (1281)
第九章　开创人民政协新纪元 …… (1286)
一、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流产 …… (1286)

二、筹备、组织新政协会议 ……(1290)
三、主持召开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1299)
四、领导和指导全国政协工作 ……(1302)
五、毛泽东对人民政协性质、任务和作用的阐述 ……(1306)
第十章 建立人民共和国 ……(1309)
一、新中国的总设计师 ……(1309)
二、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思考 ……(1318)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基本政治制度 ……(1328)
第十一章 两个联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1338)
一、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的基础 ……(1338)
二、争取动摇的同盟者,扩大统一战线力量 ……(1347)
三、正确处理两个联盟的关系,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1355)
第十二章 "还是几个党好":多党合作的政治战略 ……(1360)
一、多党合作的实践:毛泽东与民主党派的历史渊源 ……(1360)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1369)
第十三章 提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383)
一、"主题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1384)
二、"主题论"政治战略提出的重要标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390)
三、划清两类矛盾:"主题论"政治战略的基础 ……(1398)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题论"政治战略的核心 ……(1401)
五、"主题论"政治战略的意义与创新 ……(1408)
第十四章 防微杜渐: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 ……(1315)
一、历史背景: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 ……(1416)
二、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1420)
三、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主要内容 ……(1424)
四、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理论贡献 ……(1439)

第十五章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执政党建设战略 …… (1445)
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挑战 …… (1446)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执政党建设的主要内容 …… (1453)
三、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 (1457)
四、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 (1463)
五、巩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 …… (1469)

前　言

毛泽东是位伟大的战略家，这是连诋毁过他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国外对毛泽东战略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而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深人探讨，还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日益多了起来。特别是对他的政治战略的系统研究，在全国来说也还是不多见的。实际上，在毛泽东浩瀚的理论创造中，影响力最大、现实性最强的，当数毛泽东的政治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他的这一战略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

毛泽东政治战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政治战略，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带全局性的问题的理论思考。他的这一战略，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将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这块沃土中，进而架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初步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蓝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所制定的政治战略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和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所以，毛泽东政治战略中的许多科学观点，如巩固两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警惕和防止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图谋；加强执政党建设等等，在今天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单纯从理论上研究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著作已经不少，

但是，真正从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角度，来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战略的理论与实践的专著还是不多的。因此，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件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

本书重点是探讨和介绍毛泽东的政治战略是怎样从实践中提出、形成和升华，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经受实践检验的。我们也的确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指导下，站在新的角度来客观地再现这一政治战略提出和实践的历史过程，从而展示出这一政治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魅力，以及对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进而给人以新的启迪。当然，这只是作者的愿望而已，能否达到这一目的，那就要看读者给分的多少了。

本书前半部分是在唐春元1998年撰著的、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政治战略》一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后半部分则是新写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参考并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在此，谨向学术界同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章

绪 论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政治战略无论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近几年来，随着第四次“毛泽东热”的兴起，研究毛泽东的生平、思想的著述越来越多，并深入到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笔者正是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毛泽东政治战略作一探讨，以揭示毛泽东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与政治战略的内在联系，并从其政治战略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一、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来源

毛泽东政治战略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他自己思想中早就固有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毛泽东顺应20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伴随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在中国的逐渐衰落而萌芽、成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1．毛泽东政治战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和策略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战略理论的形成，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环境、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毛泽东政治战略同其他科学思想的形成一样，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理论来源和实践依据。毛泽东政治战略的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和策略思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和策略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阐明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

的自身统一、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同盟军等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战略理论。毛泽东政治战略产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其首要条件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掌握和运用。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政治战略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探求拯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真理。毛泽东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和策略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以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初步提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政治战略。尽管这时候他的政治战略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带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非常明显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理论已开始被毛泽东了解、掌握和初步运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长文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特别是在1920年夏，他完全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便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思想，并初步尝试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例如，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权、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思想，运用于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主革命，发表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文章，开始形成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战略。特别是他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著名论文，成为他政治战略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革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①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第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

很显然，毛泽东的以上论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基本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同盟军的问题（包括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革命对象和性质问题等等，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并将其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他以后提出的政治战略，都没有离开这条思维轨迹。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汲取营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政治战略问题，并将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战略。

2．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形成发展，是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中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要求。

众所周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80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曾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出现过3次革命高潮。

第一次革命高潮。是从1851年到1864年的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革命运动。这次农民革命运动曾在南京建立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究其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革命阶级领导，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所以提不出正确的政治战略、革命纲领和政治路线，也就形不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事实雄辩地证明，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靠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以宗教作思想武器，都是行不通的，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思想作指导，有正确的政治战略从全局上指明方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二次革命高潮。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梦想，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者的顽强反抗精神。但是，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样，最后还是失败了。其原因仍然是组织松懈，形不成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提不出正确的政治战略。

第三次革命高潮。是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运动，这是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虽然推翻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第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统治中国300多年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最后还是以袁世凯恢复帝制，孙中山出走而告失败。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同样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致，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提出正确的政治战略来指导革命，因而不可能广泛地发动和依靠工农大众，以夺取革命的胜利。

近代中国3次革命高潮的兴起与失败，充分地说明了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将民主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并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由先进的工人阶级来领导，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战略作指导。毛泽东政治战略正是顺应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同时，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要求。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开办企业而产生的，到“五四”运动前，中国产业工人已发展到200万人。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工人运动也在不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每年平均只有两次，最多的才三次，而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五四”运动，工人的这种罢工斗争平均每年达到17次以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工人阶级已由经济斗争发展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战略作指导。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中国工人阶级要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不仅要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和路线，而且要有正确的政治战略和斗争策略。要解决好同农民群众的关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要解决好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等等。实践证明，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有正确的政治战略作指导。毛泽东政治战略正是满足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3．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实践基础来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广泛调查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正确分析。

正确的政治战略总是来源于客观实际，又反过来去指导实际工作的。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形成与他对中国社会的广泛调查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是分不开的。建党前后，毛泽东为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经常深入到农村、工厂，考察农村、工厂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掌握工人、农民

的生活、思想和心理状况，并通过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为制定出正确的政治战略奠定基础。

(1) 游学考察湖南五县，了解、把握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现状。1917 年暑假，毛泽东为了对中国农村社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便邀其好友萧子升，开始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游学，共考察了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化等 5 县，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一是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在宁乡杨子冲，毛泽东与一位老农作了几个小时的促膝长谈，老农忿忿不平地向毛泽东诉说了地主老财对付穷人的阴毒手段，使年轻的毛泽东感到震惊。二是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情况。在宁乡沩山，毛泽东与一个在县衙里当过差的老人亲切交谈，老人详细地介绍了衙门里的黑暗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到衙门里打官司，没有钱的人，再有理，状子写得再好也打不赢。这官场黑暗腐朽的内幕，激起子毛泽东对这个不公平世界的满腔愤慨。三是了解农村的社会发展情况。在沅江县，毛泽东目睹了洞庭湖水泛滥成灾，房屋遭洪水淹没，而官府却熟视无睹的悲惨情景，并深入到灾民中倾听他们诉说北洋军阀搜刮民财、填满自己腰包、不修堤垸的骇人听闻的事实。四是了解农民对当时的政府的态度。在安化县，当毛泽东与农民谈起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农民起来抗租抗税，反对政府的苛捐杂税时，农民们都说，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老百姓真正是无路可走了，就只有一条路——“造反”。

(2) 创办工人夜校。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就创办了工人夜校，开始了与产业工人的频频接触，并以此种方法来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在一师学友会讨论创办工人夜校的会议上，毛泽东激动地说：

“工人夜学非办不可！这是因为：第一，依据国家现状，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二，欧美的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国人境遇不同，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夜学可作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第四，可借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特别是现在南北战争频繁，学校经费毫无保障，学生出校则职业无着。因此，学生敌视黑暗的社会；而社会一般人也不大了解学校内部情况。通过办夜学，可以加深学生与工人群众的了解，促使学校与社会融为一体，互相促进。”①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亲笔撰写了白话文的工人夜学招生广告。《招生广

①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 71—76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年 10 月版。

告》写道：

“列位大家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识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做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一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到各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①

《招生广告》写得通俗易懂，道理浅显明白，前来报名的工人不少。这样，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倡导和积极奔走，1917 年 11 月 9 日，工人夜校正式开学。毛泽东除任夜校“管理”外，还兼任了高级班的历史课教员。他们特别制订了一些规则，使夜校能坚持下来。如教员与管理员要一起按时上课；对学生要采取严格主义，以坚定学生的信心，管理员要负起学生的秩序、教学检查、看钟、摇铃以及夜学“日志”等当日教课以外的责任，对学生喝茶、上厕所等问题也有明确规定。在校纪方面，则严格规定不可喧扰，每次上课必到，3 次不到者，开缺另补。与此同时，对学生学习中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总是和同事们一道，发现一个就解决一个：他发现地理教材编辑得不好，字小，又不通俗易懂，便马上作持修改；他发现物理常识课教员授课过深，联系实际不够，就马上要求教员增加趣味性和实际性；他发现国文课内容太多太深，就要求减少分量，改用通俗的语言……他对教员教学总的要求是：上课要深入浅出，不能只讲大道理，不联系工人的具体实际。

为了扩大工人夜校的影响，推动其他学校也来办类似学校，毛泽东子 1918 年 3 月，特向《湖南通俗报》投寄了介绍一师夜校的文章——《告夜学生》，详细介绍了一师夜校教学和管理的情况和经验。

（3）两访长辛店，深入铁路工人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在毛泽东从事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曾两次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调查了解中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他们对社会的看法。1918 年 8 月，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他和萧子升、蔡和森、陈绍休、罗章龙、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夹道七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管理员。

①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 71—76 页，中国青年出版，1979 年 10 月版。

也是这一次，毛泽东和蔡和森一道，去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机车车辆修理厂——长辛店铁路工厂，考察工人的实际情况。1919年底，毛泽东为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又一次去了长辛店，深入了解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运情况。毛泽东这两次去长辛店，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为留法勤工俭学湖南籍学员联系到长辛店半工半读；二是深入铁路工人中，了解中国产业工人的实际情况。长辛店铁路工厂有好几千人，机械设备在当时来说也是比较先进的，毛泽东第一次到这样大的机器化程度高的工厂，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无疑是有巨大的作用的。据当时与毛泽东一同前往的何长工回忆：

"毛泽东到长辛店，在当时祖国很少有的重工业企业开始了他的活动。他先到工厂里去，在职工中寻东问西，深入了解长辛店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的个人生活水平，作了详尽的调查。"①

毛泽东两次访问长辛店，深入到大规模的现代产业工厂和产业工人之中，进行调查研究，这对于推动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和促进他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无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活动，毛泽东加深了对工人、农民生活和工作情况的了解，使他获得了几个方面的收获：一是使他切切实实感到，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二是农民、工人深受地主、资本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三是了解了工人、农民对地主、资本家剥削发自内心的不平和不满，以及希望改变这种制度的迫切心情；四是了解到工人、农民运动中最大缺点是组织不够，没有一个核心，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因此，必须组织起来，抱成一团，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一切，就成为毛泽东不久后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的直接素材，也为他的政治战略形成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

4．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形成、发展，还在于他那强烈的自强不息意识、特立独行的性格特征和可贵的独创精神。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的形成、发展，首先与他那强烈的自强不息意识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自强不息的意识，他就不可能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战略。这种自强不息的意识，毛泽东自小就体现出来了。小时候，他的父亲常常引用古训来责备当时尚幼小的毛泽东。毛泽东在读了四书五经后，每当父亲引经据

① 何长工：《五四运动在长辛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91—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典责备他时，他也引经据典地进行反驳，并常常取得成功；父亲责备毛泽东不孝时，他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为回敬；父亲指责毛泽东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小孩子多干活，你年纪比我大一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结果，父亲被他搞得很被动。毛泽东的这种自强不息意识和强烈的反抗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政治战略的形成。他的这种意识和精神，从他后来形成的针锋相对、独立自主、不屈服压力的政治战略中已充分体现出来。

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形成，与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小时候，毛泽东就表现得很有个性。他开始学写字时，同学们都要描红填字，他却不这样做，喜欢临贴写字，而且字比别人写得好。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也喜欢标新立异，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在同学们中是出了名的，当时大家曾送他一个雅号——毛奇（与普法战争中的普鲁士名将毛奇谐音），称他"人为品学兼优，具有特立独行之性格"。正是这种独特的性格，使得他后来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能及时制订出超乎常人的政治战略，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形成，还与他的独创精神分不开，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不喜欢走别人走过的路，用他的话说是"吃别人嚼过的馍馍没味道"。在学习上，他善于独立思考、分析批判、为我所用，从不盲从别人。他常对同学们说，读过的书，遇到的问题要多想一想。毛泽东读书，最喜欢眉批。他读过的书，上面画满了杠杠、叉号和圆点，并常有"不通"、"荒谬"、"切论"等批语，明显体现出他的独创精神。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也显示出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步人物中比较普遍地具有一种错误观点，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认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因而主张全盘西化。毛泽东则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说：

"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①

这里已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那善于独立思考的独创精神。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制订出正确的政治战略，并能集中全党的智慧，创立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的主观因素。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二、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政治战略产生于本世纪初，既是他本人思想的天才杰作，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纵观毛泽东政治战略，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鲜明的时代性。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外无独立，内无民主，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政治战略就是产生在这种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之中，因而其理论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一是以天下为己任。毛泽东政治战略，都是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不是从自己或小集团利益出发。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组织新民学会、领导驱张运动、创立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秋收起义、领导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到建立新中国和开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局面。前后几乎60年，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政治战略，都是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近代中国大半个世纪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密不可分。从毛泽东政治战略形成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中国历史曲折发展的艰难历程。

二是以反帝反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毛泽东政治战略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农民问题的解决、争取袁文才和王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重庆谈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政治战略都是以这个目的为基点的。毛泽东政治战略最充分、完整、科学、正确的时期，也是他民主作风最好时期。他告诫全党：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可达到，大批能干

人才的创造，也只有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政治战略是民主的产儿，科学的巨子。这也是它显著的时代特色之一。毛泽东一生追求科学、运用科学，他的政治战略也是建立在近代科学文明基础之上的，科学赋予了毛泽东政治战略以时代的活力，使之染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毛泽东政治战略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一部威武雄壮的英雄史诗，充分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三是紧贴时代脉搏，把政治战略适时地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毛泽东政治战略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将中国古代著名战略家的政治战略与中国现代的实际结合起来。众所周知，古代的政治战略理论虽然也闪烁着哲学的光辉，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法。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只是朴素的、不完备的，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正确的、科学的政治战略，而且大都夹带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迷信等思想糟粕。例如《易经》、《三十六计》等政治战略理论，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其中夹杂着唯心主义和迷信成分，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些神秘、虚幻、迷信的色彩。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战略家，精通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战略，他不是把古代的政治战略理论全盘否定，而是取其精华，排其糟粕，并巧妙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制订出了一个又一个正确的政治战略。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善于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多党合作理论、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三个世界理论等，都很奇伟、深邃，既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的神韵，又切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正由于毛泽东注意上述两种结合，所以他提出的政治战略，总是紧贴时代的脉搏，具有中国和时代特色，成为中国革命实践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2．高度的政治性。

毛泽东在提出和实施每一项大的政治战略时，一刻也没有离开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他的政治战略具备了前无古人的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政治性原则，首先是建立在认清反动派外强中干本质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最彻底革命原则。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之所以要实行革命的联合，以反对封建军阀为主要目的，毛泽东正是分析了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和摇摇欲坠的统治而作出的。他反复告诫人们：

“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

中国必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①

重庆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政治战略的提出，也表现出了毛泽东的彻底的革命性。解放战争初期，有个美国记者对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美国人的话，否则美国就会站在你们的对立面，给蒋介石撑腰。

毛泽东一听，愤然回答：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撑不下去的！"②

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政治性原则，也体现他建立在认清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曾经指出：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到了这些近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新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政治性原则，还体现在他制定和提出政治战略时，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认识和分析问题。例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运用阶级斗争学说，通过分析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地说：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③

很显然，毛泽东在这里通过分析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已初步解决了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1—1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聚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之下。

3．广泛的人民性。

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其人民性原则尤为突出。近半个世纪以来，流传在中国的发自人民心底的歌——《东方红》中，有句“他为人民谋幸福”的歌词，就是毛泽东政治战略人民性原则的最好的注脚。毛泽东经常告诫全党：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

毛泽东还说：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

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也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毛泽东政治战略的这种广泛的人民性，使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的理论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坚决执行。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井冈山斗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以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只要毛泽东一声号令，人民会义无反顾地去执行和实践。例如，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达500多万人，担架10多万副，大车38万多辆，牲口100万头，粮食8.5亿斤，我军与民工的比例竟达到一兵三民工，况且，这一切都是无偿的。正如陈毅所说的那样，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根据地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毛泽东政治战略之所以放射出如此灿烂的光辉，之所以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能不说与人民性这一特征有着极大的关系。

4．强烈的民族性。

强烈的民族特色，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又一显著特征。毛泽东政治战略之所以能超越时空传播久远，除了其内涵精深博大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4—10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4—10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中国特色”是一个内涵很宽很深的词语，没有“中国特色”，就失去了民族特点，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对此，毛泽东说得好：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位，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①

毛泽东政治战略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继承过程，这样，就使之打上了浓厚的民族色彩。

吸取诸子政治谋略之所长，是毛泽东政治战略民族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之所以能及时提出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战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先秦诸子的政治谋略有较系统的研究，而且能博采众子之长。毛泽东对管子、庄子、老子、孔子、韩非子等的研究尤深，并对其谋略能运用自如，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比如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时，毛泽东就针对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运用古代先贤们的哲言，作了坚决的回击。毛泽东多次对中央领导和有关新闻单位的同志说：

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感召下，从1939年底起，掀起了三次反共逆流。我们的策略，还是三句话：第一句是不敢为天下先；第二句是退避三舍；第三句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翻开历史，大家会清楚地知道这三句话都是出于先秦诸子的谋略。第一句话出自老子之口，第二句是晋文公说的，第三句是孔夫子与他的弟子们经常谈论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里采取的政治战略，借鉴了先贤们深邃的哲学思考，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

以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为奋斗目标，是毛泽东政治战略民族性的又一大特征。毛泽东在提出和制定每一项政治战略时，都是把实现民族的解放、民族的团结、民族的平等作为重要的基点。毛泽东认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他说：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①] 毛泽东把实现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作为自己提出政治战略的重要基点，就给他的战略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从而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坚决的执行。

三、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哲学基础

哲学与政治、哲学与战略，历来密不可分。哲学是战略的思维工具和理论基础。从古今中外的一切战略理论和实践中，我们都可以探索到某种哲学思想的轨迹。而由哲学思想指导的战略的实施，又丰富了哲学的内容。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他能自如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并据此运筹设计，制订出正确的政治战略，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把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引向胜利。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高潮》、《论政策》、《论联合政府》、《不要四面出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深邃的哲理和高超的政治战略，犹如水乳交融，相映生辉，既是宏图大略的政治战略的杰作，又是发人深思的哲学珍品。毛泽东政治战略较之历史上其他人的政治战略，具有更高的哲理性、科学性。

1．毛泽东政治战略先进的世界观基础。

毛泽东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战略家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基础不同。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当代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俯视人寰，放眼未来，运筹谋略，对一般规律和事物的发展趋势能准确把握。毛泽东政治战略，每每先人一招，高人一筹，奥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秘就在于他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真正把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摸透了；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摸透了；把时代潮流的大走势摸透了，从而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导中国革命也就得心应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80年的历史中，对中国革命和道路的选择，在认识上有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第二次是“一化三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三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前两次飞跃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这两次飞跃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两个杰作，是两个根本大略，这两个根本大略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其世界观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说，政治战略策划者的立场问题，即世界观问题，直接决定政策战略的性质和功能。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泥坑，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战略，也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由于毛泽东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做基础，亦是说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他制定和提出的政治战略，符合客观实际，取得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政治战略除了其重要的基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外，还有他为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献身精神。这一点，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重庆谈判是毛泽东政治战略中最得意的一笔，也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雄伟胆略的生动体现。

2．毛泽东政治战略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实事求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精华之所在。毛泽东总是把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看成是运作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并把这一对矛盾的正确解决作为战略成功的立足点和成功的关键。因此，毛泽东在提出政治战略时，采取的是客观和全面的思维方法，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也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纵观毛泽东在每一个紧要关头制订出的政治战略，首先是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实践来解决问题。早在1920年，他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后，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就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基础”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这篇光辉的哲学著作，这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经验总结。他认为，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之所以在1931年至

1934年的政治战略失误，给革命带来损失，从认识论角度看，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因而使其产生的一切政策与纲领、政治路线与政治战略都归于失败。正是鉴于这一经验教训，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和智慧，把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党的思想战线和制定政治战略的基础工程，使之建立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上。当前国内外许多人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政治战略比较研究时，都承认毛泽东政治战略之所以比蒋高，使蒋往往处于劣势，就是因为毛泽东有了科学的认识论作为认识问题的基础。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认识路线问题，不断推进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调查研究、社会实践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认识论基础。他后来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时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①

同一道理，正确的政治战略也只能通过调查研究，从实践中得来。毛泽东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至理名言就是这一理论的精辟概括。毛泽东在同一切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制订出正确的政治战略，就是因为他掌握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科学的思维工具。

4．毛泽东政治战略正确的方法论基础。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大师，他吸取了我国先贤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真谛，并将其运用到制定政治战略的实际工作中，因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于政治战略的谋划时，使用最多的是矛盾法则。

世界是矛盾的。因为有了矛盾才需要谋略和战略，也因为矛盾才产生了谋略和战略。

政治战略家的任务就在于认识矛盾，促进矛盾的转化；政治战略家的本领也在于比别人更好、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矛盾，制定解决矛盾的战略。

所以，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运用矛盾观点而形成的矛盾分析方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法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制定政治战略的根本方法。从毛泽东谋划的政治战略中就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

毛泽东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的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的这一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①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②

分析矛盾，可以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大趋势，制订出正确的政治战略。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结论。毛泽东不仅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善于抓住每一时期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而且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形成正确纲领和政策，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治战略。例如，在制定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政治战略时，他就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特点，制订出了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战略。实践证明，毛泽东这一政治战略是成功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抓住主要矛盾，推动和加速政治战略的实施，并使之朝预期目标发展，这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结论。在政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解决问题。例如，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就是从中华民族这个大问题出发，抓住中国与日本这一对主要矛盾，来实施自己的战略，对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利用矛盾、转化矛盾，是政治战略实现的关键之所在，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结论。毛泽东是利用矛盾、转化矛盾、解决矛盾的大师，他最善于根据各个方面的矛盾，因人施谋，随机妙策，而且每每妙招迭出。例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是利用了大小军阀、大小帝国主义列强、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极力主张建立和推进国共合作，使国共合作朝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336—3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336—3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争取袁文才、王佐，是他转化矛盾的妙招，他通过正确的战略、策略，硬是把两个“山大王”改造成为革命战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庆谈判、三个世界理论等，也无不体现出毛泽东转化矛盾、转移矛盾、利用矛盾的才能与风格。

四、毛泽东政治战略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诞生于20世纪的毛泽东政治战略是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的巨大发展。毛泽东政治战略指导着中国革命取得了节节胜利和巨大成功，也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1．毛泽东政治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的理论宝库。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的基础上，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制订出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的政治战略，指导着世界工人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制定出了“新经济改革”等一系列政治战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革命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时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旨在推翻异族压迫和本国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军，只是一种应当争取和利用的力量。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马、恩不可能制定出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战略。列宁、斯大林在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情况下，在总结俄国革命的新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开始提出关于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政治战略，要求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但在革命道路、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统一战线等政治战略问题上，没有新的突破。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政治战略创造性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在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领导者、同盟军等等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政治战略，从多方面、多角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战略，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毛泽东政治战略影响了整个世界。

毛泽东政治战略形成和发展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它科学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毛泽东的政治战略虽然产生于中国，但它作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潮流的理论和思想精华，却具有世界意义。它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分析、解决本国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政治战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作为毛泽东政治战略提出者的毛泽东，终生奉行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举的信仰，并以此作为其政治战略的基点，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中国革命成功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政治战略，并无私地援助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支持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正义斗争，勇敢地站在反帝反霸斗争的前列，为维护和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毛泽东政治战略影响世界人民和世界革命的最直接而有力的证明。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与社会实践更贴近。我们应当珍惜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创造，并在新的实践中运用、丰富和发展它。如何在繁重的国内建设任务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前沉着冷静，应付自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我们每个共产党人必须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探索、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内在实质，必将有助于我们科学而练达地研究和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保证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前进！

第二章

民众的大联合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从西方近代各种革命运动中，特别是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深刻认识到了这样一条真理：人民群众联合起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这样，毛泽东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战略：民众的大联合，即联合广大民众，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应当承认，毛泽东这时期提出的政治战略，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带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从其思想发展的趋势看，已是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战略理论的一部分。为了谋划和实施这一政治战略，毛泽东开始寻找真同志，寻找联合民众的骨干力量；创办了《湘江评论》，为民众的大联合作思想舆论准备。

一、创办《湘江评论》：吹响民众联合的号角

《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创办并主编的革命刊物，新民学会则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创建的革命组织。一个革命刊物，一个革命组织，都是宣传、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组织和号召人民大众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1.“寻找真同志”：新民学会与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政治战略。

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培训革命骨干，为民众大联合战略奠定组织基础，是“五四”前后毛泽东的一项重要活动。1918 年 4 月 17 日，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平时波涛滚滚的湘江，也是风平浪静。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在长沙一些学校读书或任职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罗章龙、邹鼎丞、张昆弟、周名弟、陈书农、叶兆祯、罗学瓒、李维汉等十几位青年，相约渡江来到坐落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召开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向与会者介绍了学会的筹备情况。他说：发起组织这个学会已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要组织学会？意思很简单，首先，大家觉得自己的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切；其次，当前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已经发起，旧思想、旧伦理与旧文学，在诸位眼中已一扫而空，使大家都觉得静静的生活与孤独生活之无聊，引发了对新生活和团体生活之追求，以联合民众；第三，在座诸位对杨怀中先生所作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之教诲念念不忘，决心身体力行。我的这几条不知能否反映大家的想法？

毛泽东的话一落音，蔡和森便大声说："好，润之兄所谈的这几条，正是我们之所以结成团体的原因。"

其他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便接着说：

我们这个团体的名称问题，最初拟名为新学会，意即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我们要共同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而子升兄则建议称新民会。究竟是哪一个好，我想请大家再讨论讨论。

萧子升见毛泽东点了自己的名便起身说："梁启超先生取《大学》中的新民主义，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新民说》。他认为中国积弱不振，是由人民没有爱国心，没有自治力，因此，必须把'新民'当作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学会应取名为新民会。"

萧子升的话一落音，又引起一阵议论。

最后，还是毛泽东一锤定音：我看是不是来个折衷，干脆将新学会、新民会合二为一，就叫新民学会。

毛泽东的意见获一致通过。

接着，毛泽东将自己亲自起草、几经修改的会章逐条宣读、解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会章逐条修改、进行增删，最后形成了11条明确、简洁、可行的新民学会会章。

会议最后推举萧子升为学会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这样，一个由志愿救国救民的青年知识分子集合而成、组织严密、充满勃勃生机的进步团体诞生了。同时，也为毛泽东后来实现民众联合的政治战略准备了组织基础。

新民学会成立后一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亲率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开始谋划民众大联合的政治战略，这时，

新民学会会员由20多人发展到80余人。为了进一步巩固新民学会组织，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同已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人频频通信，并开始探讨共产主义思想和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长沙把这些通信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印发给会员人手一册，以促进会员之间的思想交流。这样，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关于“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等思想观点，通过通信集，逐渐为大多数会员所认识、所接受。当然，会员中也存在一些分歧，有的会员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就有了1921年元旦长沙会议的争论。

1921年1月1日这一天，长沙城内外大雪纷飞，寒风刺骨，18名留在长沙的会员顶风冒雪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围绕着新民学会的方针和发展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首先，由毛泽东介绍留法会员讨论上述问题的情况。他说：

去年7月，和森、子升集合在法会友，在蒙达尼召开了为期5天的会员大会，他们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但对改造的方法有两种意见，和森等人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像俄国那样，组织共产党，联合全国民众，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急进方式，通过彻底革命以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在毛泽东说完后，马上说：“我说润之兄，改造中国与世界本来就是学会的主张，不管采取哪种手段，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因此，我看这个问题就不必多讨论了。”

毛泽东说：

我不这样认为，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进行讨论。现在国人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主张改造，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一种主张改良，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因此，我们每人必须有自己的态度。

毛泽东的话启发了大家，会员很快就打开了思想闸门，纷纷发言，各抒己见。有的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有的主张改造中国，世界问题太遥远了，有的主张改造世界，也有的主张改造东亚……

在改造的方法上，毛泽东将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5种，并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主张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一次扰乱，抵得上20年的教育。”有的主张改造，但宜采取温和的方法。李振翩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周世钊则赞成“社会进化”，熊梦飞赞成“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讨论的结果，到会的18名会员，有12名会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要根本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样，毛泽东不仅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发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真同志”，而且为实现民众的联合奠定了组织基础。

2．湘江怒吼：《湘江评论》与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政治战略。

“五四”运动以后，为了推进湖南革命运动的开展，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改造中国与世界作舆论准备，毛泽东认为，迫切需要创办一种指导性的刊物。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推举毛泽东任主编。

经过近半个月的紧张筹备，《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14日正式创刊出版，这是一张4开的报纸，与北京的《每周评论》相仿。它主要设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湘江评论》全是用白话写成，而且很有文采，前后共出了5期。《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后的第二天，长沙各报刊都刊出“湘江评论出版了”的新闻。

《湘江评论》的最大特点是：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泼辣，气势磅礴，非常富于战斗性，是同时代刊物所不能比拟的。《湘江评论》绝大多数篇幅的文章都是出于毛泽东之手，他既是主编，又是主笔，并且自己排版、校对，有时甚至还亲自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最能反映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战略。他在为《湘江评论》撰写的《创刊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公布了自己的观点：“自‘世界革命’的呼声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4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

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①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时，正处在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尽管如此，这时的毛泽东已初步显示出一个杰出革命家的大无畏气魄和政治战略家的宽广胸怀，充分体现出他作为政治战略家的卓越才能，充满着敢于思考、敢于斗争、敢于砸烂整个旧世界的革命精神。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能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国内和国际问题，并运用到自己的政治战略中去，贯彻彻底反帝、反封、反军阀的坚定立场，其政治战略的方向和基本内容是积极的、正确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热情地讴歌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伟大意义。毛泽东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边，转而东行，英、法、意、美即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若干大革命。"③

毛泽东还说："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④

这一字字，一句句、清楚地说明了毛泽东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十月革命一边，坚决地痛斥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和诬蔑。

二是无情地揭露和猛烈地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丑恶行径。"五四"前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2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后，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当权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战胜德国为首的同盟军的胜利，说成是“人道”和“公理”的胜利，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国内也有一批政客知识分子随声附和这种口号，没有认识帝国主义本质。毛泽东无情地揭穿了帝国主义丑恶嘴脸。他说：“欧洲‘同盟’和‘协和’战争，我们的南北战争，都用了强权，打倒了强权，结果仍然得了强权。1919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1919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强权，为政治上的强权，国际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和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①

在《湘江评论》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激烈矛盾，是帝国主义的致命伤。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明确地说：

“1919年以后，若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而阶级战争，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过去德国屡想成奸，而未得逞。而今后这种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也不会打断的。日本的强权政府、军阀、浪人不铲除，德国的爱倍尔政府不革命，他们联合的危险正多呢！……地球上第一个实业专制国的美国，是几千人享福，几千万人痛苦。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要打倒这种强权政治，只有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的许多文章中，对封建主义也予以了猛烈的抨击。他说：

“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了2000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③

毛泽东主张打倒封建枷锁的束缚，使劳苦大众真正成为自由的人。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联合全国民众起来共同斗争。

三是积极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主张冲破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对什么是真理，进行彻底研究。毛泽东多次号召人们去探求真理，革除非死人不能议论，著述不引今人言论的积习，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

① 载《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② 载《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③ 载《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月25日。

管他到底是不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他一针见血地说：

“我们住在这繁杂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做他人的奴隶。老先生最不喜欢的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像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我们要以天下国家兴亡为己任，敢作敢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①

洋溢于毛泽东笔下的这种蔑视一切反动权威势力的气概和精神，所向披靡，鼓舞着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冲决一切罗网，向腐朽的黑暗势力猛烈抨击。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不论长文、短论，或者是新闻、综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方面指出谁是我们应该打倒的敌人，一方面又指出我们打倒敌人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很多人读了这些文章后，觉得有了革命的方向，压在心上的焦虑和苦闷得到解除，眼前出现了光明和希望。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怒吼。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心声。也有人说：《湘江评论》吹响了劳苦大众联合起来的号角，是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就连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由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也在1919年12月第36期专门予以介绍：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评述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高兴。”②

北京《晨报》也称《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

《湘江评论》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就销售一空。由于来购买的人多，只得又加印了2000份，但仍不能满足需要。自第二期开始，每期印数超过5000份。这个数额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大的了。

当然，对于《湘江评论》，也有人恨它、骂它。长沙有一张报纸骂《湘江评论》是怪人怪论。张敬尧和他的喽罗们，见《湘江评论》猛烈地抨击他们，反对他们，不断揭发他们的种种丑态和种种罪状，就故意造谣，说什么过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并经常派军警到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捣乱。

① 载《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月25日。
② 载《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12月。

1919年8月中旬，就在《湘江评论》第5期印刷的时候，张敬尧竟横霸地封闭了《湘江评论》。

尽管《湘江评论》只出了4期和1期临时的增刊，发行的时间也只有1个多月，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它启发了劳苦大众的革命思想，加大了民众大联合舆论宣传的力度，极大地鼓舞着劳苦大众联合起来，向罪恶的旧社会发起猛烈的进攻。

二、《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最早宣言书

《民众的大联合》刊登在《湘江评论》二、三、四期上，是一篇重要的战斗檄文。这是“五四”运动后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写的第一篇指导性文章，也是毛泽东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阶级及中国社会，更是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政治战略的主要内容。

1．民众大联合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毛泽东之所以把民众大联合作为他第一篇指导中国革命的文章刊载在《湘江评论》上，之所以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政治战略提出来，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大联合具有联合劳苦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旧枷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大作用。毛泽东说：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然都要联合的手段，则相同。”[①] 根据上述观点，毛泽东引经据典，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实践出发，论述了民众大联合的作用。毛泽东说：

“自法兰西的民众的大联合，同三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

① 载《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前年俄罗斯的民众大联合，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至必可以完满，并且可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①

毛泽东还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有民众的大联合。他说：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联合，毫没关系。”②

2．民众大联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源泉。

“五四”以后，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上，毛泽东政治战略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人民群众和劳苦大众的联合，是改造中国与社会的物质力量和源泉。这也是他唯物史观的最初表现。毛泽东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③

民众大联合为什么会成为这么强大的力量？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一国的群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虽然少数统治者占有大量的土地、机器、房屋和金钱，垄断了教育，掌握了武力，但毕竟他们的人数很少，只要广大民众提高觉悟，认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就可以推翻少数人的统治，求得自身的解放；少数人所掌握的物质乎段，也完全能转化为人民所有。例如，统治者军营里的兵士，本来是民众的成员，只要他们幡然醒悟，就反会一齐化成为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国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指沙皇俄国国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毛泽东还认为，这种民众的大联合，主要是工农的联合。这是民众大联合的基础。他说：

民众大联合最根本的是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农民应该结成一个联合组织，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必须由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工人们同样要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其他如学生、

① 载《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② 载《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
③ 载《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妇女、教员……都应该根据切身的利益和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民众大联合必须这样建立在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阶层人民都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

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他相信只要人民一点点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就能冲破束缚他们的一切罗网，战胜一切障碍，朝着解放的道路上迅跑，最终埋葬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3．民众大联合的途径与方法。

民众大联合对于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的。那么，怎样实行民众的大联合呢？毛泽东认为，必须从小联合人手，由许多的小联合，进而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而为一个最大的联合。所谓的小联合，就是以各阶级人民的切身利益做基础，大联合则是以各革命阶级的利益做基础。毛泽东说：

“原来我们想要一种大的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面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基础的小联合。我们人类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①

这就是说，由小联合到大联合，即由工人的联合、农民的联合、妇女的联合、教师的联合、学生的联合，进而到全民众的大联合。大联合必须从小联合人手，而小联合则是大联合的基础。要达到全民众的大联合，必须从一个方面、一个系统的小联合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最后，毛泽东大胆地预言：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诸君！诸君！我

① 载《湘江评论》第3号，1919年7月28日。

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①

4.《民众的大联合》的历史地位。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战斗的檄文，以其丰富深邃的思想，豪迈奔放的气概，引起了"五四"时期思想界、理论界的高度注意。这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开始萌芽，也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萌芽，并开始付诸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

第一，《民众的大联合》已把"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和要求突出地提出来，是毛泽东世界观开始急剧转变的重要标志。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伦理革命发展到爱国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无疑是一种新的理论概括和思想的升华。这种理论概括的意义在于：就"五四"思想启蒙来说，它把启蒙者的目光进一步引向组织民众的实际斗争；就"五四"爱国运动来说，它从理论上对业已出现的各种联合作了理论说明。这一切，对于引导工人、学生的斗争从自发进一步走向自觉，显然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开始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跨越。

第二，《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战略思想第一次系统的表述，也是我党历史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标志。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已有深刻的认识，对勤劳、勇敢而智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性已有充分的估计。同时他已开始坚信：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形成为一个极其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这篇不朽的著作中，毛泽东结合"五四"运动的经验，已明确地开始提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略之一：必须进行人民力量的大联合，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而基础是工人与农民两大阶级（到1923年，中国共产党才正式决定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干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毛泽东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在领导湖南人民的"五四"爱国运动及稍后的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中，特别是在领导初期工人运动中，已开始创造性地、卓越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以革命群众、工人阶级为主体，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开明人士以及各种民主力量，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第三，《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政治战略形成的逻辑起点，从后来毛泽东

① 载《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

与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知道，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成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但我们应该看到，“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已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影响着少数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民众大联合的构想，是毛泽东早期政治战略的最闪光之处。他把人民大众，即工农作为民众大联合的主体力量；把共同的利益作为民众大联合的基础；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为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的敌人。很显然，毛泽东这时已对中国政治战略作出了近乎唯物主义的理解。而且与列宁的表述基本一致。因此，把《民众的大联合》作为毛泽东政治战略的逻辑起点，是与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规律相吻合的。

总之，《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从民主与科学出发，终于找到了改造中国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在其政治战略中的具体表现。尔后，他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与实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充和完备的。

三、驱张运动：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战略的一次成功预演

如果说《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早期政治战略在理论上的杰作的话，那么，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就是毛泽东运用这一政治战略指导革命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1．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罪行。

声势浩大的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政治战略的一次预演。

提起反动军阀张敬尧，湖南人民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是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安插在湖南的爪牙。

辛亥革命后，南北军阀连年混战，湖南就成为各派军阀争夺的焦点。1918年3月，直皖联军击败了湘桂联军，赶走了驻湖南的湘桂联军司令谭浩明，张敬尧率兵进入湖南，当了湖南的都督。张敬尧做了两年都督（有个时期还兼任省长），不但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而且放纵他带来的部队，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对湖南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毛泽东在后来的“驱张宣言”

中，历数张敬尧的10项罪状。

（1）连年战争，纵兵殃民，烧毁房屋，浩劫财物，强奸妇女，杀人如麻，人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无可归，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

（2）操纵银行，造成银行栈塞，民不聊生；

（3）盗押厂矿，勾结日、美卖纱厂，买断湖田，公私破产，恢复无期；

（4）贩种鸦片，烟害无穷；

（5）驻兵各校，迫害师生，扣减经费，摧残教育，致使学生无校可入；

（6）军队犯罪，嫁祸湘民；

（7）查封报刊，迫害舆论，致使言论自由扫地以尽；

（8）擅运私盐，加收盐税，造成盐价骤涨，破坏盐法；

（9）勒索城乡，勒捐军米，加征田税，坐收厚赃；

（10）私选议会，伪造民意。①

张敬尧的三个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更是倚仗老大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湖南人民愤怒地控诉说：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

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就这样在三湘大地爆发。

2.《湘江评论》、《新湖南》被查封和省学联被解散：驱张运动的导火索。

张敬尧视《湘江评论》和湖南省学联为洪水猛兽，先是设卡阻挠出版，最后见《湘江评论》锐不可挡，便违背民意，于1919年8月中旬，派军警查封了《湘江评论》；紧接着在9月份又强令省学联解散。面对张敬尧的高压政策，毛泽东和湖南的一批青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酝酿着一次更大的斗争。为了宣传新思想，大造反对封建军阀的舆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半个月后，又开始接手主办《新湖南》。毛泽东自第7期接手主办的《新湖南》，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风格，继续向军阀张敬尧射出一支支投枪，得到了湖南思想界和青年学生的拥护与赞扬。同时，在全国的反响也很大。当时，全国最有权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新青年》第7期第1号，对改版后的《新

① 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59—662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湖南》第7号作了这样的介绍：

“《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第7号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看第7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本刊第7号以后的宗旨是：①批评社会；②改造思想；③介绍学术；④讨论问题。第7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再看第7期的内容，其中精彩的真是不少。最重要的是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得很透。又有许多假冒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二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①

由于第7号以后的《新湖南》像《湘江评论》一样，对张敬尧督湘期间的虐政进行了猛烈攻击，自然为张所不容。这样，到1919年10月初，《新湖南》出至第12期，张敬尧以“造谣惑众，蛊惑人心”为由，派军警强行查封了编辑部。

湖南学生震惊了，毛泽东愤怒了，三湘大地怒吼了。《新湖南》遭查的第二天，毛泽东秘密集合湖南学联的骨干，在湖南商专开会。毛泽东首先详尽地分析了驱张的意义，并初步安排了驱张的行动。毛泽东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

“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我们湖南学生要做驱张的主力。具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行动；第二，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风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的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第三，积极恢复学联，做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②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学联，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11月中旬，湖南学联重新组成。

11月下旬，湖南学联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于12月2日联合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第2次焚烧日货示威大会。而这次示威大会，竟被张敬尧不容，派其弟张敬汤率军警驱散、殴打参加示威大会的学生与居民。

这一次事件，更激怒了湖南学生和湖南人民，他们也马上采取了行动。12月3日，毛泽东、周世钊等在易培基家里开会。毛泽东愤怒地说：

“这次示威大会被张敬尧驱散，激起了全体湖南人民的义愤。青年学生的愤

① 载《新青年》第7卷第7号。
② 参见马玉卿等《毛泽东成长的道路》第21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怒，全湖南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狗咬狗的斗争，都使张完全陷入孤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而且已传遍全国。如在北京的湖南籍名流熊希龄、范源濂，不仅不受他们的收买，反而通电揭发他的贪赃枉法的罪证，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的五大祸湘罪状。而且张敬尧与驻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矛盾在增大，驻扎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很反感。鉴于此，驱张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这回压迫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因此，我们要抓住这有利时机，号召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并派人赴全国各地，争取少数上层人士的支持、同情，坚决把张敬尧赶走，从水深火热中救出3000万湖南人民。”①

毛泽东说完后，大多数代表表示赞同，但也有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他们只主张驱张，而不主张罢工罢课。讨论了很久，双方各持自己的意见，谁也不肯让步。最后，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

“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已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呢？我们要行动起来，举行罢课、罢教、罢工，把张敬尧赶出湖南为止。”②

毛泽东终于说服了不同意见者，所有的与会同志都赞同实行“三罢”斗争。

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2月6日，湖南学联“公决男女大小各校全体罢学，解散归家”。一星期后，长沙全体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宣布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同时宣布总罢教。至此，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在三湘大地开始了。毛泽东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洪流中，领导起驱张运动这一历史重任。

3．组成驱张统一战线：民众大联合战略首次显示威力。

1919年12月上旬，毛泽东一面领导湖南的“三罢”斗争，一面又在楚怡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赴各地讨张代表团的有关事宜。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说：

现在，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已在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们要抓紧时机，马上派代表团到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一方面，公开揭露张敬尧危害湖南的种种罪行；另一方面，与各地各界人士联络，争取社会名

① 参见李锐《早年毛泽东》第266—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② 参见李锐《早年毛泽东》第266—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流和全国舆论的支持，一定要把张敬尧从湖南赶出去！

这次会议后，由各校派学生代表组成的各代表团，从长沙向各地进发，毛泽东亲自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北京成为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毛泽东在北京进行驱张活动，主要做了以下联络各界和统战工作：

一是组织驱张请愿团，集体向段棋瑞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张敬尧。1920年1月中旬，赴京驱张代表团召开代表大会，决定组成驱张请愿团，旨在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驱张影响，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请愿团公推毛泽东为团长。1月28日，请愿团数十人，高举“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和“与张偕亡”三面横幅，浩浩荡荡向段棋瑞政府的国务院进发。对毛泽东发起并领导的这次请愿活动，1920年1月29日的北京《晨报》是这样记载的：

“《昨日湖南人之大请愿》：三个代表团在新华门相持了三个小时，说靳总理、秘书长不在，最后允许三个代表团六人入院，由一个秘书接见。公民代表毛泽东、张百龄，教员代表罗教铎、杨遇夫，学生代表柳敏、李思安，相继痛述张督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总理求个办法不可。秘书于湖南痛苦也很表同情；代表以不得要领退出。群众在门外等候，看见代表出来，急问情形，大愤。千是决定赴靳氏私宅，效秦庭之哭。请愿团赴靳宅，众离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靳先得电话，知请愿团会到并不拒阻。宅中人即出接待。……代表将张敬尧祸湘罪状数十条，略数一遍。谓我们数十来京，近两个月了，饭也没吃，衣也没穿，所求者，请政府去一万恶滔天的张敬尧。湖南人处在水火当中，再不援救，就会死绝。说毕，有痛哭流涕者，请靳总理当众宣布办法。……于副官于内言明群众有非亲自出见宣布办法不可之势。于出向代表说总理对于诸君，深表同情，诸君来京多日，应该给诸君一个办法，准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这是总理负责的话，请诸君不要过于焦躁……”①

然而，一个星期以后，代表们不仅没见到这位靳总理，而且棉花胡同还布满军警，阻止通行。驱张运动进展不快。

二是召开湖南同乡会全体会议，定访湖南在北京的社会名流，广泛寻求支持。1920年2月初，毛泽东召集北京的湖南同乡会1000多人，在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并关起了大门，强迫10个湖南籍的安福国会议员签名干驱张决心

① 载北京《晨报》1920年1月29日。

书，以表示他们心迹。决心书写道："担负驱逐张敬尧的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

这些安福"国会议员"被迫在驱张决心书上签字。这对段祺瑞、张敬尧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这些"安福议员"都是张敬尧在湖南一手包办而"选举"出来为段祺瑞政权服务的。

同时，毛泽东还在北京四处活动，找湖南在北京的知名人士，如杨昌济、黎锦熙等，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以保证驱张活动的胜利。

三是组织平民通信社，散发揭露和反对张敬尧的专刊的小册子。为了向全国及时传播驱张运动的消息，制造舆论，争取各界的援助，毛泽东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平民通信社，并亲自任社长，每日印发150余份，送登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报刊。白天，毛泽东为驱张而四处奔波，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晚上，则坐下来编写稿件，每日向全国一些主要报刊发出大量稿件，揭露张敬尧的罪恶，传播各地驱张代表团驱张的活动及进展情况。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驱张代表电讨保张团》等十数篇电文，发往上海、天津、长沙等地，使张敬尧的罪恶昭然若揭。毛泽东指出：张敬尧罪大恶极，久经湘人控告，积案如山。全国人士，亦复口诛笔伐，同声攻击。弃之唯恐不远，去之唯恐不速。三年以来，湘民困苦颠连，九死一生，家无应门之童，野有自缢之女，何一非张敬尧所赐。敬尧不去，湘民宁有幸理？今欲救湘，首在驱张，张去后湘事始有整理可言。

同时，毛泽东率领的赴京驱张代表团还带去了大批揭露张敬尧罪行的专刊的小册子，向各界人士散发，其中有《湘灾纪略》、《醴陵兵燹纪要》、《宝庆兵灾纪要》等专记一县一地灾难的书刊十数种，以及《张敬尧罪恶史》、《湘祸记》和《张敬尧》等书。

经过近4个月，驱张运动在北京终于取得了初步胜利。为了与上海驱张代表团取得联系，以及联系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毛泽东于1920年5月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争取上海各界人士的支持，建立更广泛的驱张统一战线。毛泽东到达上海后，继续做驱张工作，写下了《湘人为人格而战》一文，表达了湖南人民驱张的决心和信心。他说：

"驱张运动的发起，名流老辈小于后生，一齐加人，就是缘于这几种很深刻的激刺。故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湘人驱张，完全

是‘为人格而战’，和蔡松坡云南誓师，说吾为人格而战是一样的。”①

与此同时，赴衡阳、郴州、常德和留在长沙的驱张代表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样，在湖南人民的愤怒声讨中，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撤防和逼迫下，在湘军谭延闿、赵恒惕的武力威胁下，张敬尧已处于孤立无援、内外夹攻的境地，不得不在1920年6月滚出了湖南。至此，历时大半年的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伟大胜利。

在发动和领导驱张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注意团结驱张的力量，结成了省内外各界人士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取得驱张运动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驱张运动是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政治战略的成功的演习，也是“五四”前后毛泽东在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写下的最精彩的一笔。

① 载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6月9日。

第三章

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

如果说驱张运动是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政治战略的一次成功预演的话，那么，毛泽东积极领导和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则是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特别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以后，把民众大联合政治战略灵活运用到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之中。其政治战略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而且标志着他后来创立的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学说的初步形成。

一、国共合作的前奏曲：在中共“三大”上与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酝酿，而且经过了艰难、复杂的斗争。毛泽东在这一酝酿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的伟大气魄和革命胆略。

1．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的酝酿。

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选择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的统一战线，是经历了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

1920年4月至11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受列宁的指派，到中国寻求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对象，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都有过接触，并对吴佩孚、陈炯明颇有好感，认为吴和陈都是可以合作的对象。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中，也是将吴佩孚作为统战对象来争取的。

1921年7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的纲领外，还讨论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并在党内发生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永远与其他党派，特别是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与其他党派合作，特别要注意加强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毛泽东在大会上不但支持后一种意见，而且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比北洋军阀政府进步，是可以与其合作的。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认为“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最后，大会对这个问题没作任何结论。

1922年6月，党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与其他党派合作的问题。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接近吴佩孚和陈炯明的问题上，并非是一种合作统战关系，而是为了谋求减少革命的阻力，发展工农运动，壮大自己力量的一种临时措施。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接到了会议通知，并专程前往上海参加会议。但由于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出席会议。党的“二大”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以党外合作的形式，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不同意这种联合形式，国共两党并没有达成联合的协议。

后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过与孙中山的斡旋，并根据他在印尼爪哇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马林还将这个建议上报共产国际，并很快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

1922年8月，为了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特别要利用廖仲恺等国民党左翼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因此，我们应该加入国民党。当然，也要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中心。

按照马林的要求，这次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尽管会议开始时大多数中央委员反对这一决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若加入进去，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后经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多数与会人员从尊重共产国际指示出发，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也对马林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作了修正。最后，会议通过决定：先由部分共产党员，即中共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很显然，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转折点。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对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是坚决执行的。他在湖南任省委书记期间，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一方面，他派夏曦、刘少奇等人具体与国民党联系，从事改造国民党的上层工作；另一方面，他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建立国共合作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1923年4月，毛泽东在他创办的《新时代》月刊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等文章，详尽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斗争的发展态势，阐明了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说：

由于革命的敌人势力太大了，革命的力量只有联合起来，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才能逐步取得革命的胜利。“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党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的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是最急进的共产学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的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①

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

“这两派斗争的结果，必须是军阀派势力逐渐削弱，民主派势力逐步增强，最终必定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正在酝酿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情况下，毛泽东在这里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如何建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核心的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和投入这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合作的积极态度，说明了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的。

2．党的“三大”：毛泽东对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的积极贡献。

1923年6月初，毛泽东离开上海到达广州，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2日，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的倾向：

一种是“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这种意见主要是张国焘、刘仁静等，甚至包括当时党内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蔡和森、李达，也支持这种意见。张国焘公开说：

我不相信能够把国民党改造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因此，我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也坚决反对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一种是“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完全倒向国民党。主要是以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为核心。他们不但主张加入国民党，而且主张共产党不应再有或再提自己的独立性，以免引起孙中山的猜疑。陈独秀公开说：

我们既然与国民党合作，就不要再提保持独立性的问题，不然的话，必然会引起孙先生和国民党的上层人士的猜疑。所以，我不但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彻底的合作，而且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我们必须服从和听从国民党的指挥！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而且都不利于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意见，许多代表不知如何是好，一时拿不定主意。毛泽东在仔细听了双方的意见后，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我赞成国共合作，而且极力主张实行党内合作。但是，我不赞成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我们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只能是以共产党员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把自己的组织和力量全部交给国民党。为什么要实行以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呢？我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面临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个穷凶极恶的敌人，只有实行国共合作，才能战胜这两伙强大的敌人。大家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联合起来宰割中国人民。帝国主义是封建

主义统治的靠山，封建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中国在经济上不能发展，在政治上不能进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翻以上两大敌人的反动统治。然而，要战胜这两大敌人，全中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特别是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实行真诚的合作。

第二，从国民党现在的情况看，也有必要同我们合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从它建立之日起，就具有阶级联盟的性质。在近20多年的历史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其他党派相比较，是最革命的政党，并且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但是，国民党不可能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也不可能战胜封建军阀。其原因有4个方面：一是国民党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思想比较混乱；二是脱离群众，只依靠少数人的奋斗；三是组织涣散，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四是成份复杂，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面对这种状况，只有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加人国民党，使之增添新鲜血液，国民党才能获得新生，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党。

第三，工人和农民大批加入国民党，既是改造国民党的阶级成份，使之革命化的需要，也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需要。有人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造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混乱。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以我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是极有利于我们党完成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使命的，我们全党同志必须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积极投人到国共合作工作中去。”

毛泽东的精辟分析，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片热烈掌声。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利用休息时间，多次与挚友蔡和森交谈，做他的思想工作，劝导他支持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从而使蔡和森后来转变了不愿与国民党合作的立场。毛泽东在做蔡和森工作的同时，还专门去找国民党的元老、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说服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经过毛泽东和大多数代表的努力，大会最后通过《关于国民党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明确地告诫全党同志：

“共产党员应加人国民党。……我们加人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

渐扩大我们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①

这一决议案形成了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的改组，使之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时又保存和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正确方针。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在三届一次全会上，30岁的毛泽东又当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第一次步入党中央的高层领导岗位，并任中央秘书，协助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

党的"三大"闭幕后，毛泽东全身心投入到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具体而全面地落实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

1．协助陈独秀制定和落实党中央的一些重大决议和方针。

根据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有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这里已清楚地说明，委员长和秘书是中央局的核心，主持处理中央的一切日常工作。同时，毛泽东当时还受命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在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根据党的"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形势的要求，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国共合作上。他与陈独秀联合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通告》第13、14、15、16号等重要文件和决议案，一再重申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3年9月中旬，毛泽东从上海到长沙。他这次回湘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备成立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并特别指示要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中共湘区委员会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421—4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接受了毛泽东的指导和建议，委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元老覃振、邱维震组织了筹备组，着手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

与此同时，毛泽东将回湘推进国共合作、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情况，及时地以书信的形式向时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作了汇报。他说：

关于本党（指国民党——作者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人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诸本部委任。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国民党长沙支部就于1923年10月初成立，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湖南出现了新的曙光。不久，国民党湖南总支部成立，辖长沙、安源两个支部。夏曦任长沙支部长，刘少奇任安源支部长。同年12月，毛泽东、夏曦、袁达时被推选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2．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

1923年1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以国民党湖南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一大”是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由孙中山决定和主持召开的。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主持了大会开幕式，来自全国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中共党员代表25人。

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国民党党纲和章程。毛泽东被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对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的作用，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的：

“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言非常踊跃。他常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使得许多老国民党员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在欣赏他这样的青年精神。”①

1月28日，当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围绕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

① 《张国焘回忆录》第1册，第31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印，1979年版。

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孙中山已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内部总有那么一些右翼分子，反对和阻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干扰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会议上，国民党广州代表方瑞麟首先发难，公开叫嚣："党章应明文规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这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反对国共合作。然而，这样一个公然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只得到10多个国民党代表的附议。李大钊当场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方瑞麟的提案，重申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立场和理由。毛泽东也随后挺身而出，予以了坚决反驳。最后，在孙中山、廖仲恺以及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大会通过了章程草案，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1月29日，大会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的提案。提案人黄季陆公开说：

"中央执委的选举，应采取比例选举制，因为比例选举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统弊，因为现代选举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①

显然，国民党右派是想利用国民党代表人数多的优势，来排斥共产党在国民党执委中的席位，以达到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

毛泽东立即予以坚决反驳。他说：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②

黄季陆辩解说："比例选举制并非代表资产阶级，亦非有害于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③

毛泽东进一步反驳道：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民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度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④

---

① 参见王进等《毛泽东生平纪事》第126—12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② 参见王进等《毛泽东生平纪事》第126—12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③ 参见王进等《毛泽东生平纪事》第126—12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④ 参见王进等《毛泽东生平纪事》第126—12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毛泽东的精彩反驳，赢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也是由于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比例选举制的实质，从而他的发言获得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同，黄季陆的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

由于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卓越表现，受到了孙中山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注意和赏识。这样，在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时，孙中山将一份亲笔书写的包括毛泽东名字在内的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讨论后表决。结果，毛泽东以多数票通过，当选为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使毛泽东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圈内，这样，使得他有条件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和影响，为进一步贯彻“一大”的改组精神，加快国民党在各地的改组步伐，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一场复杂而又微妙的斗争。

3．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到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等处组建执行部，以国民党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的党务。毛泽东作为中央候补执委，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领导国民党在上海地区的改组工作。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正式挂牌办公。执行部内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及秘书处各机构。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毛泽东则代理秘书处文秘主任职务和担任组织部秘书职务。同毛泽东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等。

上海执行部地位最高的是戴季陶，实权最大的则是叶楚伧。叶楚伧是极力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代表，戴季陶又在暗中纵容叶楚伧与共产党人作对。尽管如此，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执行部的主要代表，充分运用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制定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叶楚伧等右翼分子作了有理有利的坚决斗争。

首先，在国民党员重新登记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所有党员均需重新登记的决定，挫败了少数国民党右派不参加重新登记的图谋。上海执行部成立后，针对当时国民党组织涣散的状况，根据国民党“一大”党章规定，及时向上海地区党员发出通告，明确规定对老党员重新登记，对各

地的党组织进行调查。同时还颁布了党员重新登记的步骤、办法和手续等，规定了对老党员重新登记时，要对其进行谈话，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毛泽东作为执行部组织部的秘书，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而国民党右派却在登记过程中，千方百计地进行捣乱，破坏这一工作的正常开展。毛泽东对这些右派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既坚持原则，又采取了一些灵活的策略，确保了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国民党“元老”谢持因反对国共合作，所以对抗登记工作。当执行部通知他重新登记时，他自恃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四川省省长，竟然跑到执行部大吵大闹。公然说：

“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了，还要填表？我不登记！”

毛泽东针锋相对，义正辞严地回答：这是“一大”作出的决定，凡是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谁不来登记，谁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

谢持一时无言以对，只得愤愤而回。

随后，毛泽东考虑到谢持是老国民党员，在国民党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对其应该做到仁至义尽。于是，他让人给谢持送去一张表，并做了一些说服解释工作，既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又使得他不得不重新登记。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在实施政治战略时，所采取的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其次，在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时，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党员登记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执行部准备召开会议，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上海第四区处于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那里客居着下野的国民党政客千余人。毛泽东通过党员登记工作，具体而负责地对他们逐个进行了审查，清洗出去了一些不合格的党员，引起了一些老国民党员的不满。这样，在召开成立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大会时，毛泽东与右派的斗争便表面化、白热化了。会前，国民党右派酝酿了两个方案：一是合法争取领导权，请孙中山出来为他们说话；二是唆使一些人破坏会场，干扰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当他们的第一方案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后，便雇佣打手、流氓，企图混入会场，冲散主席团，挑起武斗，干扰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组织纠察队，由共产党员王荷波率领，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确保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再次，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叶楚伧的分裂行径。在上海执行部，

叶楚伧纠集右派分子何世桢、孙铁人等与共产党人作对，企图破坏国共合作，遭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叶楚伧想要把他的亲信派到组织部任干事，以达到逐步控制组织部的目的，被毛泽东坚决拒绝。这就使叶楚伧十分恼火，对毛泽东怀恨在心，时常纵容右派捣乱肇事。1924 年 8 月，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上海市各区党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党分子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起而进行说理斗争。这样，双方发生冲突。第二天，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毛泽东为此领衔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并要求严惩凶手。

1924 年 11 月，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加上经费又无法筹集，孙中山又急于北上，不可能对上海执行部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处理。这样，上海执行部的领导权便落入了国民党的右派戴季陶、叶楚伧之手。

在此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一方面又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和组织部长，为党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有同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有反对军阀战争的，也有加强党务建设和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等等。这些文件对全党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是他与国民党共事的开始，也是他政治战略的初步形成，使他对国民党和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积累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初步经验。

三、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5 年 10 月，毛泽东第三次到广州。这时，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和路线，是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等问题，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就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他在任此职期间，积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维护民主统一战线，捍卫和促进国民革命的斗争。

1925 年 10 月 5 日，国民党第 111 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在广州召开，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兼中宣部部长、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说：

"鄙人由于兼职过多，对宣传工作无力顾及，有必要对中央宣传部领导进行调整，以使宣传工作适应革命形势发展之需要。由此，鄙人提议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主持中央宣传的全盘工作。"

鉴于当时的实际状况，这次常委会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的提案，并于第二天将这一新的任命通知了刚刚从家乡湖南养病回到广州的毛泽东。

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该部部长，特于昨五日提出中央常务会议，请荐毛泽东代理该部长职，经决议通过，并请代理部长即日到部任事云。"①

毛泽东到任后不久，便针对宣传部工作缺乏系统性、党内教育没有计划性、舆论宣传缺乏广泛性、党报制度不健全等实际状况，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中央宣传部和整个宣传工作作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整顿。

1．建立健全宣传工作体系，克服过去宣传部门之间和宣传工作中的无序状态。

毛泽东接任宣传部工作时，中央宣传部只能管辖到广东省范围内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与其他省、市党部的宣传部门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各省、市党部宣传部是各行其事，放弃职责。宣传工作一片混乱，舆论不一致，口径不一致，引起党内思想的混乱。毛泽东到职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疏通宣传渠道，建立宣传网络，形成有机统一的宣传工作系统，实现宣传工作的有序化。为此，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交通工具等向全国各省、市党部宣传部门布置工作，使之做到舆论一致；二是要求各省市宣传部门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汇报情况，并接受领导；三是及时制定出适合本地宣传工作实际的宣传工作计划，使宣传工作真正起到革命的导向作用。

这样，到1926年5月，仅半年多的时间，中央宣传部就与全国12个省市党部的宣传部建立了工作联系，基本上使全国的宣传工作形成了一个畅通的工作网络。

由于毛泽东的出色工作，使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国民党大多数中

① 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6日。

央委员的承认。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任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仅3个月的毛泽东，就针对宣传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向大会提交了三个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并都获得了通过。这在国民党大会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一次会议就一个问题最多形成一个决议案，唯有毛泽东主持中宣部时的宣传工作，在一次大会上就通过了三个决议案，所以，被当时看成是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2．重新制定宣传计划，确保宣传工作的超前性和针对性。

毛泽东提出的并被国民党“二大”通过的三个决议案，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省市党部的宣传部门有章可循，能紧跟中央的精神。根据决议案的精神，毛泽东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了切合实际的宣传工作计划。不但有整个宣传工作的总体计划，而且有单项宣传工作的计划，如图书室宣传计划、民众宣传计划、党内发书计划、编纂计划等。这些计划规定得非常具体，方针也很明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其中明确指出：反对笼统的无针对性的宣传，注意党内宣传与党外宣传有别；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有别；民众文化的高低层次有别；广东根据地与军阀统治的区域有别。这样，就使宣传工作既具超前性，又具有针对性。

3．注意宣传队伍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

毛泽东在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期间，还于1925年12月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他除了做养成所的管理工作和宣传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之外，还经常到养成所上课、讲演。他先后讲了《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为了培养宣传干部，加强宣传队伍建设，毛泽东还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的政治讲习班理事长。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了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主办了政治讲习班，由谭延闿任理事长。谭不在时，就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经常到政治讲习班讲演，做学员的思想工作。2月28日，他还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学员的开学典礼，发表了关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专门为政治讲习班学员开设了《农民问题》等课程，每周上一至二次。他讲课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多次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苏、反对农工的阴谋，进行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的，必须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政策。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毛泽东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政工和宣传骨干，为国民革命运动的轰轰烈烈开展作了舆论准备，奠定了思想基础。

4．注重发挥党报党刊的作用，以扩大革命的影响。

当时，国民党中央已有两份机关报，一是《广州民国日报》，一是《上海民国日报》。毛泽东接管中央宣传工作后，按照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党报决议案》，又新办了《政治周报》，作为宣传革命理论的工具。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力争地方多办报刊。他的想法是：办一份国民革命的报刊，就多一块宣传国民革命理论的阵地；多一份中立的报刊，就少一个攻击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言论机关。为此，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凡有国民党组织的省份，就应有自己的言论机关。有条件的省份，如党员人数多，又有人力和财力，可争取办一份报纸，作为党的喉舌，没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津贴当地原有报纸的方法。毛泽东指出：

采用津贴这种方法，可以争取一些报纸，所费不多，却收效甚大。全国重要地点，一以20处计，平均每处津贴报纸一家，每家津贴200元，计每月共费津贴4000元，仅抵一家党报之经费，然而，收效却遍及全国。

国民党中央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方法切实可行，马上予以批准。于是，毛泽东促使有条件的湖北党部办起了《楚天日报》，湖南创办了《湖南民报》，上海方面接管了国民通讯社。无条件的地区采用津贴的办法，争取了一张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如九江的《江声日报》领取了津贴，杭州的《晨报》也提出了申请。

5．编纂国民运动丛书，普及国民革命宣传，以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

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唤起民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中，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样，编写一批宣传国民革命理论知识的丛书，就成了毛泽东十分重视的工作之一。毛泽东一直认为，对于国共两党为什么要联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怎样进行国民革命这样一些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一些中下层的党员干部是或明或暗，似懂非懂的。就是一些上层人士也急需一些书刊资料参考。过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虽然也编了一些刊物，但涉及的面很窄，印数

也很少，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所以，他向国民党中央建议：由宣传部编纂一套国民运动丛书，系统地宣传国民革命的理论，并根据我国民众运动的实际，先编印民众最急近需要的书，然后再编印其他书籍。

按照毛泽东的最初策划，这套丛书共5辑60册，计划每月出版12册，5个月全部出齐。丛书的内容，主要是向人们介绍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民众运动的情况。如：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有《中国近百年史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二七惨案》、《五卅运动》、《中国农民问题》等；关于国际方面的，有《巴黎公社》、《德国大革命的意义》、《世界的农民运动》等；还有苏俄研究方面的，如《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苏维埃制度》、《苏俄红军》、《苏俄的外交》等；也有理论著作，如《孙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马克思论东方革命》等；甚至有关于社会问题的，如《妇女问题》、《犹太人问题》、《黑人问题》等等。

这套丛书涉及的面很广，内容也很丰富，实是国民革命的百科全书。为实现这一规模宏大的宣传计划，毛泽东提出了一套改革过去书籍编纂的办法，提出先由宣传部审定题目，然后实行征稿的方法。他还根据上海是知识界聚集之地的特点，在上海专门设立了征稿处，并委任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负责征集稿件。对图书的发行问题，毛泽东提出，在党内无价发行，即赠送到每个党员的手中；在党外则以最低廉的价格全国推销，以达到宣传民众的目的。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发展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毛泽东在不久后就被迫辞去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这套丛书只出了前几本后，计划便再无人提起。

毛泽东担任宣传部长虽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对宣传工作的一整套的方法和计划，却为捍卫国共合作事业，彻底贯彻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支持和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宣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主编《政治周报》

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革命宣传，深入开展国民革命的宣传，毛泽东根据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于1925年12月5日，创办了新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他自己亲任主编，共产党

员萧楚女任主编助理。《政治周报》每期的内容，都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由萧楚女出初稿，然后送毛泽东审定后付印。毛泽东在主编《政治周报》时，主要作出了如下理论贡献：

1．旗帜鲜明地揭示了出版《政治周报》的任务和目的。

在《政治周报》的创刊号上，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既表明了他自己政治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又明确指出了《政治周报》的宗旨和目的。毛泽东说：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创办《政治周报》的主要目的。”①

很显然，创办《政治周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国民革命，宣传真理。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国民革命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全国大多数民众对国共两党却了解甚少，对国民革命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时，反动势力和右派势力的宣传机构、阵地又很多，并从各个方面诋毁、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因此，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宣传阵地，从推进国民革命的角度，奋起反击一切诬蔑和舆论进攻。基于此，毛泽东明确地说：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政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派。……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底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报纸和刊物。”②

创办《政治周报》的任务，是为了打破反革命的宣传，用事实来说话，用新舆论来把反革命的舆论打下去。毛泽东说：

“对于敌人的反动宣传，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这也是《政治周报》的任务。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政府勾结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统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接受我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1页，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们工作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①

2．根据斗争的需要而开辟主题鲜明、针对性强的专栏，以增强《政治周报》的战斗性。

毛泽东创办并主编《政治周报》后，首先抓住国民党右派及其喉舌——《上海民国日报》作为反击的主要对象。《上海民国日报》原是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的私人报纸，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收归国民党上海党部主办。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后，该报立即倒向反革命一边，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它每天连篇累牍地刊发反苏反共反对农工的文章、决议、宣言，替帝国主义、封建军阀“隐恶扬善”，替地主资本家压迫农民工人张目，逆迹昭著，罪不容诛，广大革命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毛泽东针对《上海民国日报》的昭昭劣绩，把思想上的批判和政治上的揭露紧密地结合起来，给国民党右派以致命的打击。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的一次编辑会上说：

《上海民国日报》之所以从革命的机关报变成反革命的机关报，是因为革命与反革命分子“分了家”，是因为邹鲁、谢持、林森像冯自由、马素一样投降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它的反动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之强大，国民党左派之强固，证明了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之发展，证明了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快要到来。在此情况之下，《上海民国日报》如果不反动，它就不能攻击左派的宣传，便不能取得右派机关报的资格，便不能向上海干部局和北京段祺瑞邀功使他们承认该报的反革命地位，便不能达到该报反动的目的。

为了彻底揭露《上海民国日报》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动面目，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专门开辟了“反攻”专栏，以大量的篇幅编发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军人、海外侨胞等愤怒抗议声讨“西山会议派”的文电40条，并标以鲜明醒目的标题：

《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邹鲁与革命》；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1页，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政治周报》“反攻”专栏上刊登的数十篇电文和短文，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反对省港罢工、反对打倒军阀和国共合作的罪行，指出了北京右派会议“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是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

3．热情歌颂了全国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外对日益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的种种舆论非难，多次在《政治周报》撰文，与流行的种种错误言论作了坚决的斗争，热情地讴歌了工人、农民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他多次指示有关编辑人员，编发大量热情支持省港大罢工、各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消息和文章。毛泽东说：

“目前，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好得很，这种发展必然会使多数人自由和觉悟起来，使更多的工农群众积极地投身于国民革命。这对于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的国民运动，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也促使目前还处在两者之间徘徊和彷徨的所谓中间派们，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①

毛泽东通过主编《政治周报》，有力地批判了中间派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迷梦。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政治周报》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用较多的篇幅，经常刊载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报告，向各地群众介绍广东革命根据地群众运动的情况，从而使全国民众能更多地了解广东革命的真相，支持广东革命运动。

4．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等问题，以指导国民革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初步探讨了国民革命的特点，以及国民革命中各阶级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以分析国民党右派从革命队伍中分离出去的现象出发，认为这是国民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告诫人们不要惊慌，要为此而高兴，因为这使得我们的革命队伍更纯洁了。也是从这里出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精彩的思想。

---

① 载《政治周报》第3期，1925年12月20日。

一是探索国民革命的特点，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民革命特点时说：

“目前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辛亥革命。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国内封建贵族，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辛亥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帝国主义，但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这一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革命的队伍是极其孤弱，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中产阶级甚至小地主阶级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成分。而现在的国民革命是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具体说来有以下特点：国际上出现了苏联和被压迫阶级联合的第三国际；国内有了共产党和形成社会力量的工农阶级。因此，这种革命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最终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达到人类平等大同。”①

以上分析表明，毛泽东实际上已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前途等问题。

二是着重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从中国各阶级的现状和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他把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这里的中产阶级就是他后来阐述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

“大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中产阶级的左翼可以和工农、小资产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很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来是要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但他们的革命是梦想前代西洋的革命，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而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梦想其自身能够成功后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成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这样，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他阶级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

① 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己的人。”①

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真可谓是入木三分，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无产阶级必须对他们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这一切与一年后，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资产阶级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三是分析了国民党右派从革命营垒中分离出去的客观必然性，指出了这对于国民革命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即纯洁了革命的队伍。毛泽东说：

“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分裂是必然的。他们在关键时刻，在涉及到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刻，对革命不免发生恐惧，不免如笋脱壳，纷纷分裂。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结成的反革命联合战线，一面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中间的中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国民党右派，是必须作出选择的。所以国民党右派的分离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还透彻地分析了中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他说：

“在中国，中产阶级想独立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从阶级力量的对比上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四万万中国人中，大资产阶级至多占1/400，中产阶级只占1/100，其余都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共占98.75%，约有39500万。他们疑忌工农阶级的兴起，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于是他们就会抛弃群众，而从革命阵营分裂出去。”③

总之，毛泽东创办和主编的《政治周报》虽然只出了14期，存在仅半年的时间，即从1925年12月5日到1926年6月5日，但它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它在广州、上海、北京、开封、重庆、昆明等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以及香港，都设立了分售处，每期发行约4万份，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份在全国发行最多，且最具权威性的刊物，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他政治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的充分体现，为以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政治周报》还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捍卫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维护国共

① 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② 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③ 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它也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反动劣绅对国民革命的无耻诬蔑，热情地讴歌了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对于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促进国民革命，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为了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无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或是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都旗帜鲜明地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和蒋介石的分裂篡权活动作了不懈的斗争，实践了他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战略。

1．站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前列。

“西山会议派”是由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组成的反动集团，他们早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前后，曾因反对国共合作而遭到孙中山的斥责。孙中山逝世后，特别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在1925年8月被暗杀后，他们为了篡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进行了猖狂的反对国共合作活动。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等一小撮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第一次公开亮出了分裂国民党的旗号。他们在会上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停止国民党广州执行会的职权”等一系列非法决议。会后，他们又以上海为“根据地”，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成立了伪国民党地方党部，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开的反革命集团，史称“西山会议派”。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反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给予了坚决的回击。1925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活动。同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第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的组织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这个时候，刚刚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任新创刊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积极投入到这一斗争中，并运用正确的政治战略，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连续在《政治周刊》上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向左还是向右》、《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和影响》等10多篇战斗檄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揭露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本质，指出他们已堕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工具。

一是揭露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背离孙中山遗言的种种罪行，指出了他们是国民党右派，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走狗，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毛泽东说：“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大大帮助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这些右派，完全不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不照三民主义去实际工作。这些右派实际完全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叛徒，尽管他们在总理灵前开一百次会，尽管他们把三民主义天天写在脸上，挂在嘴上。”①

二是精辟地分析了“西山会议派”从革命营垒中分裂出去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西山会议派”从革命营垒中分裂出去，是由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是中国革命政党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们革命人既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要忘乎所以，掉以轻心，必须与其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说：

“现在革命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和附属于它的大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而西山会议派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在革命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投入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怀抱，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②

毛泽东还从时局高度，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广阔范围，分析了“西山会议派”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分裂出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现象。毛泽东说：

“现在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根本变化。从国内来说，改组后的国民党，加入了一大批工农分子，工农阶级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从国际来说，实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联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

① 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② 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后援，从而打破了过去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称霸世界的局面。如此巨大的变化，使得当年参加辛亥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少数革命意志顽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却因为畏惧到现在的革命而把革命事业放弃了，他们跑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怀抱，同革命势力作对，西山会议派就是这样一些角色，他们从革命阵营中分裂出去是必然的。”

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的特殊的时局，使得他们不得不分裂。”

三是明确指出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并不影响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运动。国民革命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说：

“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①

2．积极投入反对戴季陶的斗争，从理论上肃清国民党右派对革命阵营的影响。

毛泽东在发表文章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同时，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民革命的理论文章，无情地批驳了戴季陶主义的种种谬论。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理论家。他在孙中山逝世后，于1925年六七月间，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党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大肆宣扬中国革命要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谬论，企图把共产党赶出统一战线，以达到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在戴季陶主义的煽动下，新右派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为夺取国民党中央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批驳了戴季陶的反动谬论。

一是严厉驳斥了戴季陶主义的中国国民革命要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反动谬论。毛泽东指出：

中国现在的革命既和欧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不同，也和中国辛亥革命的性质不同，它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

① 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买办、军阀、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联合阵线起到主力军的作用，单凭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的。按照戴季陶的理论，只能把革命引到邪路上去。

很显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是从理论上对戴季陶主义的以资产阶级为领导核心的反动谬论的有力一击，澄清了革命阵营中的种种错误思想，是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是揭露了戴季陶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毛泽东说：

“有一个自称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①

可见，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不仅在思想理论上击中了戴季陶主义的要害。而且，指出了戴季陶主义完全抹煞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实质。毛泽东说：

“戴季陶鼓吹的取消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取消工农的利益；他主张国民党中不应有‘信仰不一’的现象，就是要破坏国共合作，要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

由于毛泽东等人从理论上、思想上对戴季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使得国民党新右派完全陷入孤立，使得他们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从而提高了国民党左派的觉悟，维护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巩固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3．参加反对蒋介石篡夺国共合作领导权的斗争。

如果说戴季陶是为打击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作理论准备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是从实际工作中排斥、打击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罪魁祸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右派头目蒋介石，为了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千方百计地排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和打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绝大多数革命左派是缺乏清醒的认识的。因为在同国民党老右派的斗争中，蒋介石从来是以不偏不倚的中间派面目出现的。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是继承总理遗志，推进三民主义的。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识破蒋介石右派面目的，是毛泽东，力主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也是毛泽东。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中山舰事件”的问题上，毛泽东力主采取强硬措施，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1926年初，蒋介石策动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四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等谣言，策划反共活动。对此，毛泽东曾提醒革命左派，要注意蒋介石的动向。3月17日，从黄埔军校传出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启航开往黄埔。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通过电话询问李之龙是怎么一回事。李之龙回答说：这是蒋校长的命令。毛泽东嘱咐李之龙要小心行事。接着，毛泽东又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谈了这一情况，提醒他注意蒋介石是在玩什么花招。陈延年却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是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毛泽东听了陈延年这模棱两可的话，心急如焚，预感可能要出大事。

1926年3月20日，是蒋介石右派面目大暴露的一次丑恶表演：明明是蒋介石要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往黄埔港待命，却又谎称是共产党指使李之龙炮轰黄埔，共产党人要暴动。蒋介石遂以此为借口，实行全城戒严，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

这一天傍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工友，慌慌张张地跑到广州市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和沈雁冰的住所，急匆匆地说：“毛部长，黄埔那边传来消息，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已被蒋介石逮捕了，罪名是：企图造反，炮轰黄埔。”

毛泽东一听，感到事态严重，因为苏联总顾问回国了，加伦将军也走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对广东各军的情况又不甚了解。于是，他对沈雁冰说，必须迅速与陈延年和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取得联系，以采取对策，防止和应付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赶到苏联顾问团的住处，毛泽东见到季山嘉和陈延年。他用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着急地对季山嘉和陈延年说：

"李之龙被捕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被围的事你们听说了吗？今日的中山舰事件，已经说明蒋介石的右派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了。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对付蒋介石的叛变。我早就清楚，蒋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生意时，就与戴季陶打得火热。现在的情况已表明，蒋介石参加革命也是投机。我们如果示弱，他必然会得寸进尺；我们如果强硬，他就会缩回去！"①

毛泽东停了停，又提出了反击蒋介石背叛行为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他说：

"为了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我们第一步是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因为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独立团。目前就广州这个地方来讲，蒋介石的武力是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的这点兵力就处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一军的谭延闿、第三军的朱培德、第四军的李济深、第五军的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保持中立。中央执、监委到达肇庆后，立即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种阵势对付蒋介石，蒋介石便无能为力了。"②

显然，毛泽东的建议，考虑周详，分析透彻，具有现实可能性。然而，这一正确的建议，却遭到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顾问团的反对。陈延年也惧怕季山嘉等人而不敢表态。最后，不得不请示中共中央局。陈独秀竟然也同意苏联顾问团意见，不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这样，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左派失去了反击蒋介石阴谋活动的一次最好机会。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打击，而且使共产党员被蒋介石完全赶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让他顺顺当当地篡夺了第一军的领导权。

二是坚决抵制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更是步步紧逼，特别在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进一步提出了旨在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中国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国民党员

① 参见王进等《毛泽东生平纪事》第150—15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② 参见王进等《毛泽东生平纪事》第150—15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这是蒋介石企图限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地位，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又一个严重的反革命步骤。对此，中共中央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领导人张国焘却从极“左”跳到极“右”，竟然主张妥协退让。毛泽东进行了坚决抵制。他说：

从蒋介石提出的这个提案看，无异于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统统交给国民党，交给国民党右派，交给他蒋介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答应的！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防止蒋介石进一步篡权夺权。

但是，由于张国焘等人的坚持，不但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而接受了蒋介石的提案。“整理党务案”的通过，是蒋介石篡夺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一步。根据这个提案，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岗位，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也离开了部长，或副部长的位置。而蒋介石却因此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两个要职，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和军事大权。国民党政客顾孟余当上了中央宣传部长，西山会议派人物、国民党的老右派叶楚伧当上了中央党部秘书长。至此，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重要部门大多数为国民党新老右派所掌握。

三是在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提高党权运动”的提案，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1927 年 3 月，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中心内容是提高党权，即提高国民党领导的权威，反对蒋介石的武人政治和军事独裁。毛泽东在会议上主张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首先，毛泽东揭穿了蒋介石企图延迟开会的阴谋。蒋介石对提高党权很害怕，所以，借故一再拖延会期，进而达到开不成会议的目的。对此，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明确地说：“大会则决定今日开，不能再拖。”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于树德等也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因而使会议按原定日期举行。其次是主张限制军队的权力，主要是指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毛泽东主张，在大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件发生，由主席团全权办理，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再次是主张取消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志会。毛泽东指出：

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定，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遗孽，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原校及各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全会终于通过了各项限制或制约蒋介石的决议。

以上说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反对新老右派的斗争中，始终站在革命左派和正确意见一边，同国民党新老右派作了坚决的斗争。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或主张，没有被我党的主要领导人采纳，从而使蒋介石一步一步篡夺了革命领导权，最后终于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决定革命成功的关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在实施和推进国共合作的政治战略时，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妥协、退让策略，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战略原则的坚定性。在此期间，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斗争。

1．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领导权问题斗争的基本点。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大约经历了三个大的过程：

一是在党的“三大”前后，即在国共合作的前夕，毛泽东反对陈独秀放弃党的独立性的斗争。党的“三大”召开前夕，国共合作已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陈独秀主张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对的，但在国共合作的一些原则问题上却明显“右”倾。1923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公开说：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是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幼稚了。……中国最大多数的是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的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①

① 载《向导》第25期，1923年4月25日。

陈独秀既然是如此低估和轻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因而在以后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实践中，自然是放松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讨论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时，便散布了许多右倾的言论。他说：

“我们党员不多，力量不强，工人没文化，觉悟不高，不懂革命，也没有革命理论，而且带有明显的帮派、流氓习气。所以，我主张要在国民党里去发展国民党，可以暂时不要共产党的独立工作，整个党参加到国民党那里去，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①

多么右倾的言论！多么悲观的论调！毛泽东对此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用自己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的大量的事实，旗帜鲜明地反驳说：

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少，但战斗力却很强。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外，还有它的许多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第二，中国无产阶级从开始走上舞台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分析透彻，说服力强，得到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这样，在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案中，明确强调了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二是在党的“四大”、“五大”期间，同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虽然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决议，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必须性认识不够，因而决议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陈独秀仍然我行我素，对蒋介石采取节节退让的策略。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党的“四大”，但对“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极为关注，并坚决执行“四大”通过的决议。所以，他从1925年2月到1927年3月，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就发表

① 载《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日。

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再次重申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的领导阶级。”①

然而，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为了为他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辩护，多次对毛泽东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说：“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②

一句话，陈独秀就是不相信工人、农民的力量，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

1927年4月27日，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持，对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

“从五卅运动起，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是我们中的少数同志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级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③

与此同时，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还从理论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提案，如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等。但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压制正确的批评，再加上因为陈独秀的狡辩，使一些代表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右倾退让政策的危害，大会不但没有彻底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战略，而且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进行压制，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所以使大会没有能够制止和克服陈独秀的右倾退让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 载《向导》第25期，1923年4月25日。
③ 参见《毛泽东自述》第50—53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三是在对待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动是否进行反击的问题上，毛泽东与陈独秀的斗争。1925年9月，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公开打出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帜。对此，毛泽东一方面在《政治周报》上撰文，从理论上驳斥和揭露“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本质，另一方面，又向党中央和陈独秀反映，要求全党奋起反击“西山会议派”。而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却置之不理，并以“反击会使国共合作遭破坏”为由，压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时，还说这是国民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党不宜干涉太多。这样，使得“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气焰越来越嚣张，并频频向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发起进攻。1926年3月后，蒋介石连续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左派，篡夺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又多次向陈独秀提出，对蒋介石反对、排斥共产党人，篡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我们共产党人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必须坚决予以还击。而陈独秀竟斥责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国共合作的要求，公开说：“目前我们不是反对蒋介石，而是要缓和对蒋介石张静江的斗争。对于蒋介石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差不多都可以答应。”

同时，陈独秀还授意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负责人张国焘，要做好工作，答应蒋介石的一切条件，千万不要激怒蒋介石。陈独秀的右倾退让策略，使蒋介石看出了共产党可欺软弱的一面，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反对、排斥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加快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步伐，为他后来叛变革命、窃取革命果实提供了外部条件。

2．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农民同盟军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无产阶级领导权实现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如果失去了广大的农民同盟军，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是一句空话。陈独秀从错误的“二次革命论”出发，片面地重视资产阶级，只注意国共合作不破裂，如何把国民党新老右派拉在统一战线内，忽视和忘记了农民和农民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他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革命的力量，到何处寻觅广大的、可靠的同盟军。根本不懂得农民问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不懂得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陈独秀多次说：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是事实，国民革命固然有赖于他们参加，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他们是

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因而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①

基于上述理论，陈独秀害怕农民运动，担心农民起来革命会"破坏"国共合作，因而对农民运动百般地刁难、攻击，甚至跟着地主、劣绅和国民党右派一起指责农民，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

毛泽东同陈独秀这种忽视农民的力量和作用、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思想作了坚决的斗争。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指出如果离开农民这个同盟军，无产阶级就谈不上掌握了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而且多次深入农民和农村中，调查、考察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热情地讴歌农民的伟大创举，并强调指出在中国离开了农民这个同盟军，无产阶级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这样，就与陈独秀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战略策略思想。

1926年12月，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他强烈要求对国民党右派采取行动，以遏制他们的嚣张气焰；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入到广大农村，到那里去寻找我们的力量和希望，掀起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

然而，陈独秀在会议上却批评了毛泽东的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采取行动的主张，并指责了农民运动。陈独秀说：

近段时期来，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危险倾向，使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随时有破裂的危险。我们有的同志，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运动，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行动，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特别是最近湖南的农民运动过火了，太幼稚了，妨碍了正在进行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必须提出严肃的批评。

毛泽东听后，立即举手发言，明确地表示不同意陈独秀的讲话，特别是不同意陈独秀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说：

从近来的形势看，主要是从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现状看，不是农民运动过火了，妨碍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而是国民党右派太猖狂了，他们对革命左派步步逼进，害怕广大的工农起来革命。你说湖南农民运动搞得那样糟，你倒要去湖南实地考察一番，用事实来驳斥那些右派的言行。

就这样，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分道扬镳"了。他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糟得很"等一系列问题，前往湖南农村考察。通过对湖南农民

① 载《向导》第25期，1923年4月25日。

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得出了与陈独秀截然相反的结论："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毛泽东说：

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业可乐了。农民的暴动、反抗，实在是忍无可忍。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害怕"纠纷"，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

毛泽东还满腔热情地为湖南农民运动带来的农村大革命而欢呼：

"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得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①

基于这次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得出结论：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中农和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应把着力点转到广大的农村，转到团结、引导广大农民上。

七、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也因我们党的主要领导的妥协退让政策和蒋介石的反动面失败了。但这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破裂却给我们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这以后的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作了科学的总结。

一是，统一战线必须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国民党由于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是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革命的新三民主义便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政治基础。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是，统一战线必须有革命武装作为中心革命力量。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着重阐述了主要是我们没有掌握革命的武装，没有枪杆子作后盾，所以失败了。毛泽东说：

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使得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员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抗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使革命陷于失败。当时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是，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三是，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这一原则，统一战线就巩固、发展和壮大，违反这一原则，统一战线就受到削弱，最后导致分裂。所以，毛泽东说：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①

四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不但主张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且与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错误作了坚决的斗争。特别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上，他坚决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错误。毛泽东说：

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说：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功的关键。1924 年至 1927 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在 1927 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①

五是，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运用这个法宝。毛泽东说：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②

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时曾说过，由于国共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 年两党分裂，造成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后来，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表现，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理论结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6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第四章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或者说是基本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中，农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说过："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无产阶级只有领导农民，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有可能领导其他阶级和革命势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①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从投身革命的那天起，就把引导农民革命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总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和农民问题，而不是作为权宜之计。毛泽东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方法和途径，是他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为他后来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一、"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开始，斯诺还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后来，经过毛泽东对他自己革命历程的回忆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斯诺终于明白了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无怪乎斯诺后来在国外众多的报刊上多次撰文说：

如果中国没有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如果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肯定能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穷人，而且如果城乡的有产阶级的人数不是那样少，他们的利益不是与中国落后的经济那样息息相关，中国就不会发生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这场革命。毛泽东和他政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经有产阶级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仍然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广大农民之间建立了联盟。

这是一个普通的外国记者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治战略的最高评价。

毛泽东一直把中国的广大农民看成是中国革命依靠的对象和动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依靠广大的农民，首先在农村造成革命的高潮，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建国后，他又依靠广大农民，率先在农村造成社会主义高潮，很快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的这一政治战略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形成了。他之所以将农民和农民问题作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放在战略的地位，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农民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大。

一是从人口的数量来看，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离开了这80%的农民，根本谈不上革命的成功。因此，毛泽东说：

在人口上说，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有80%，当有三万万二千万以上，在人口上看，我们就不能否认农民问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

二是从革命的力量来看，农民的力量最强大。毛泽东说：

中国工人仅有200万人，现在组织起来的也只有几十万人，而农民则满山遍野了。义和团、洪秀全起义以及广东的平英团都曾显赫一时，就是因为人数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辛亥革命之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未得三万二千万农民来帮助和拥护。这样是一定要失败，我们宜注意。

三是从各方面的社会联系看，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同其他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毛泽东说：

若是农民问题不解决，极端穷困，则工厂得不到好原料，产品也无市场，工厂亦将倒闭，工人尚有加资减时之望？所以，工人的政治经济问题与农民关系极大。同样，农民若无生产力，商人购买难，销售也难。再者，农民问题不解决，学生和士兵都有失业之忧，没有出路。可见，国民革命的大部是解决农民问题，其余问题皆不如农民问题重要。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对农民问题作了更为

精辟的分析。他说：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大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

……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将一事无成。”①

这是毛泽东对农民问题重要的最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也是毛泽东这一政治战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2．农民受压迫最深，反抗精神最强。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之所以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之所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更在于他们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所以他们有很强的革命性。

第一，中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众所周知，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向军阀政府借放外债，发动侵略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勒索赔款等方法，压榨中国人民，其中农民最甚。有历史资料表明，从1876年到1926年的50年内，中国商品人超额达40亿白银。这一切，军阀政府又通过不同的途径，统统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只是对农民的间接剥削。帝国主义对广大农民的直接剥削也是非常严重和残酷的。他们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地主阶级，垄断了中国农村市场，一面在广大的农村收购廉价的原材料，另一面又将他们的商品高价推销给农民，并垄断了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农村以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了多数农民的失业，使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农民深受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毛泽东认为，封建军阀对中国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77—10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民的压迫和剥削，也可分为直接剥削和间接剥削两种。直接剥削主要通过田赋和捐税来实施。这两种赋税重且名目繁多。据统计，仅田赋一项，1925 年达1.5 亿元，田赋附加税 1923 年每亩为3.6 元，到 1925 年就增加到5.8 元。间接剥削就更多了，如通过沉重的兵差和力役来剥削贫苦农民等。毛泽东说：

“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从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之驯服制下农民身上刮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借款，究竟比较甚少。”①

所以，毛泽东得出结论：要打倒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必须先打倒封建军阀。

第三，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毛泽东认为，长期以来，封建主义以重租、重息、重捐、预征米粮等手段来盘剥农民。农民为了生存，也只能向地主借，最后只得以田、地、房屋，甚至孩子作抵押。同时，以“三纲五常”、“孝悌忠信”等为灵魂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观念，也成为农民的精神枷锁。

正由于农民身受三重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的反抗最坚决，其力量大而猛。特别是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后，这种斗争更由自发转而到自觉，其整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所以，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凶残而强悍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战胜这股强大的敌人，没有占全国 80%的农民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3．毛泽东引导农民革命的正确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多次强调，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那么，怎样来赢得农民呢？他认为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下大力气做好农民的组织工作。毛泽东认为，要十分重视农村工作，迅速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克服分散、散漫等落后现象。他说：

“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痛苦与需

① 《毛泽东文集》第 38—39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运动。"①

特别是经过1927年春对湖南农民运动的系统考察后，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整体力量。他说：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是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②

第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引导农民进行国民革命，关键是建立农民政权。这是因为，中国农民运动，本身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所以，毛泽东说：

"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恃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③

毛泽东这段话的实质，是揭示了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强调了农民运动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基于这一理论，毛泽东对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农民政权的建立兴奋不已，特别对农民提出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他大力支持农民的革命专政，主张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打倒一切绅权。毛泽东始终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更谈不上取得农民革命的胜利。

第三，建立农民武装，进行土地革命，是赢得农民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多次指出，要取得农民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必须首先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有两条途径：一是从地主手中夺取枪支以建立农民武装常备队；二是大力发展农民梭标队。

解决农民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通过对农村的广泛考察后认为，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有两个问题：即资本问题和土地问题。他说：

这两个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要通过进行土地革命以满足农民，特别是贫农的土地。在没有进行土地革命之前，应先实行减租减息。面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

① 《毛泽东文集》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是一个相当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很清楚，毛泽东实际上已分析了建立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和土地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把土地革命作为农民运动的目的之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这一政治战略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原则性。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为他的政治战略的形成和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思想，也是后来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他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起点。

二、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

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从事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赢得中国农民的重大举措，为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杆红旗白云山上飘，
一盏明灯广州城头照；
毛泽东主办农讲所，
云天雾海指方向，
阶级分析定路线，
培育革命火种播四方。”

这一首歌颂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赞歌，把我们带进了毛泽东在广州那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

1924 年 7 月至 1925 年底，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培训全国农民运动骨干，在广州举办了 5 期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 年 3 月 16 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第 6 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生情况和领导人物的人选问题。会议最后作出三项决议：

(1) 所长，决议请毛泽东同志担任，请示中央批准。

(2) 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

(3) 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

国民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一决议。3月底，毛泽东正式到位，担起了第6届农讲所所长的重任。毛泽东决心首先集训一批全国的农运骨干，把他们培养成敢于在革命风浪中搏击的勇士。他要在中国农民问题上下一番大功夫了。

毛泽东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主要作出了如下贡献：

一是，争取办班经费，严格学员的选拔条件。3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专门研究第6届农讲所招生和经费问题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林祖涵就经费问题报告说：

"农讲所经费7980元经中央常务委员议决政治委员会委员开会提出讨论结果交预算委员会审批。……现在国库虽然支绌，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其重要。而且实际上各省学生已陆续到粤，无法缓止，应由部函预算委员会从速决定。"

这次会议，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使第6届农讲所经费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4月初，农讲所举行入学考试。毛泽东特别提出了入学学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 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

(2) 中学文化，文理通顺；

(3) 年龄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

(4) 富于勇敢奋斗精神。

5月3日，农讲所正式开学。原定收学员200人，因要求入学的人很多，加收16人 (6月间又增收11人，共227人)。学员来自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奉天等20个省区。其中广西40人，湖南3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第6届农讲所与前5期比较，有两个之最：即人数最多和学员来源最广。第1届30余人；第2届142人；第3届141人；第4届51人；第5届114人；第6届多达227人。第1~5届的学员，一般只是来自10余个省市，而第6届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

二是，科学设计农讲所课程，突出重点科目。毛泽东接手主办第6届农讲所后，调整了农讲所的重要课目，共开设25门课，重点是中国农民问题。这些课程包括：《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

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状况》、《中国财政经济状况》、《苏俄状况》、《中国史概要》、《地理》、《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海外及东江农运状况》、《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农业常识》、《农业合作概论》等。在这25门课程中，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这样，就清楚地说明了本届农讲所学员学习的重点是关于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

三是，亲自讲授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课程。毛泽东对比较重要的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课程，有意安排那些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农运领导者讲授。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3门课程。在讲授过程中，他力求深入浅出，十分注意引导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不仅注意联系实际，而且语言生动、活泼、形象，引人入胜。例如，在讲到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时，毛泽东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然后，对学员们说：

“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也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有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上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①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学员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开始懂得了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其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四是，组织引导学员开展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毛泽东根据各省的实际，比如根据中国地域广阔，南北、东西差异很大的实际，以省区为单位，组织农民问题研究会，以加强对各省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把农民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指出：

我们应组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奉直、豫陕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一研究会由各该省学生组

① 参见王首道回忆，见《红日照千秋》下册，第999页，成都军区政治部1977年9月印。

织之，推举干事1人，书记1~8人主持其事；各研究会每星期开会1~2次。开会时由教务主任陆沉同志负指导之责，在各省研究会内，引导学生开始研究实际问题。

毛泽东规定的农民问题研究会调查的范围是相当广泛而具体的。主要引导学员作了36个问题的调查：（1）租率；（2）主佃的关系；（3）抗租子粜风潮；（4）利率；（5）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6）田赋；（7）抗粮情形；（8）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9）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10）地主的来源；（11）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12）工价；（13）失业情形；（14）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15）地方工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地方政治组织；（17）地方政治情形；（18）会党及土匪；（19）团防情形；（20）教育状况；（21）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兵祸及其影响；（24）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烟赌偷抢各种情形；（26）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27）妇女的地位；（28）农民的观念及感想；（29）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农村组织状况；（32）地质之肥饶；（33）宗教之信仰状况；（34）度量衡；（35）民歌；（36）成语。

这个调查提纲相当具体，说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和从事农民革命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工作思路。这种思路也是他的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础，使之更加切合现实，更加科学有效。

五是，组织学员深入群众中，深入到农村革命实践中，学习开展实际斗争的经验。1926年5月1日，农讲所开学不久，广东省第二届农民运动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有11个省的代表列席参加，毛泽东带领全体学员参加了这次大会。通过与代表们的广泛接触，以了解农民运动发展的情况和农村、农民的实际。“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又与学员们一起出席了广州的10万人的纪念大会；“六·二三”沙基惨案一周年，他又率领学员们冒雨进行了示威游行，使学员们了解城市的情况，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丰富实际斗争的经验。6月，毛泽东又组织50余名学员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周，接着又委派彭湃、赵自选等带队赴农民运动搞得好的海丰县实习两周。农讲所的学员到达海丰县后，受到海丰人民的热烈欢迎，沿街锣鼓鞭炮，热闹非凡。海丰县农协还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在海丰，学员们深入到基层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队部，现场参观见习，大大加深了对农民问题和农村现状的掌握和了解，增强了学员从事农运的信心。正如《中国农民》在当时记载第6

届农讲所情况时所说的："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之中，考察其组织，而且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六是，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掌握必要的武装斗争知识。在农讲所，毛泽东把军事训练作为学员的重要科目。大革命时期，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当时，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还没有把武装斗争提到突出的位置，但他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已越来越感到武装斗争问题的重要性，是我们党内对武装斗争问题认识较早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在广州第6届农讲所，毛泽东专门请来我党军委负责人周恩来讲授《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课程，并从黄埔军校请来军事教官，为学员们上军事课。当年的农讲所学员王首道曾回忆起毛泽东在农讲所重视军事训练的一些情况。王首道说：

"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地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在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六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在荆刺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厂进行实弹射击。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还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文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①

第6届农讲所于1926年9月11日毕业。毛泽东在毕业典礼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勉励学员拜农民为师，与农民交朋友，为农民谋利益求解放。毕业典礼后，学员们陆续离开广州，奔赴各地农村。到这年的10月5日，除了因病未离

① 参见王首道：《革命摇篮——回忆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载《红日照千秋》，成都军区政治部1977年9月印。

所外，其余学员均已回原籍开展工作，增加了各地农民运动的有生力量，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在全国农村大革命蓬勃兴起时，农讲所学员成为各地农运的骨干，农讲所也被举为“革命的摇篮”。

2．主办武昌农讲所，支援北伐军胜利向前推进。

1926年冬，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高涨的形势，特别是农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根据这一实际斗争的需要，主持中央农民部工作的毛泽东，在武汉创办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1) 提议创办武昌农讲所，并为农讲所做了大量筹备、组织工作。1926年冬，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欢呼声中，毛泽东思考着如何组织农民运动，支援北伐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问题。11月中旬，毛泽东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下旬，他致函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国民党省党部、省农民协会，筹办湘鄂赣三省农运讲习所。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三省党部和农协的支持。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最先响应，建议在武昌成立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次年1月14日，筹备处正式挂牌运行。湖南推举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为筹备员，湖北省党部由张眉宜、陈荫林、李汉俊参加，江西省党部则推荐龚式农、王礼锡为筹备员。毛泽东在完成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任务回到武汉后，就住进武昌都府堤41号，为农讲所的开办而日夜奔波。

1927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第26次会议，决定将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等3人为武昌农讲所常务委员，并通过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新章程；章程明确规定：学员由原来准备招收600名增到800名，第1期学习4个月，每月经费5100元，从2月份起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

3月7日，中央农讲所开学上课。4月10日，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这期农讲所为什么先上课，后举行开学典礼，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增加的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地学生不能如期入学，只得确定已到的学生先开课，待学员到齐后，再一起举行开学典礼。

这一期学员实际报到的人数739人，来自全国17个省区。

(2) 确定农讲所的办学宗旨，制定教学计划。毛泽东在主办武昌农讲所时，

亲自规定了办所的宗旨和使命。在他亲笔撰写的农讲所开学宣言中，毛泽东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农民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今天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①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亲自制定教育方针、教学计划，亲自选聘教员和组织选拔学员。武昌农讲所学员刘征是这样回忆的：

“1927 年 3 月的一天，风和日暖，春光明媚，农讲所通知我们去进行口试。开始我的心情是紧张的，因为前几天，我们已进行了笔试。我虽然写了六七张纸，但能否录取，心中并没有底。按考试程序，笔试后还要进行口试，并听说农讲所领导人要亲自主持口试。我还担心：像我们这样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青年，读的书不多，又没有见过大场面，能够考取吗？当我们进入考场坐下之后，毛泽东来了，他身穿长衫，健步走到讲台坐下，和蔼可亲地环顾了大家之后，亲自一个一个地叫名字，一份一份地批阅试卷。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立即走到讲台前端端正正地站着。

“毛泽东面带笑容地问：‘你是哪里人？’

“我答：‘直隶（现河北）玉田县人。’

“毛泽东又问：‘你家有多少田地？’

“我答：‘没有田地，我家是佃农。’

“毛泽东还问我原来干什么？我们那里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我答我是师范讲习所毕业，是小学教员。我们那里农民运动正在兴起，迫切需要农运干部。另外，还有些农运道理搞不清楚。

“毛泽东听了我的回答后很高兴，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和组织介绍信，亲笔在我的试卷上划了一个‘C’字（即共产党员的代号）。最后，毛泽东亲切地对我说：‘好，就这样吧。’过了两天，我们去看榜，一瞧，我的名字是第十五名，我们直隶省来的十人都录取了。”

这段回忆说明，毛泽东对农讲学员的挑选是严格、认真的，把住了学员的入学关。

---

① 参见马玉卿等《毛泽东革命道路》（1921—1935）第 125—126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7 月版。

对于教学计划，为了达到帮助学生“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的目的，毛泽东规定中央农讲所新开设了《共产党宣言》、《农民问题》、《社会发展史》、《辩证法》等课程。毛泽东还亲自兼任了《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重点课，占全部课时的60%。此外，他还主持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和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

(3) 加强军事训练，组织农讲所学员投入到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实践中去。武昌农讲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群众的情况下开办的。因此，毛泽东较之在主办广州第6届农讲所时更加重视武装斗争，更注意培养学员直接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此，他在农讲所中专门增设了军事训练委员会，聘有专门的军事教官，对学生实行严格的军事操练。学员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一个特别训练班。学员过着军队式的正规军生活，每天操练2小时，每周上一次军事理论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为了应付突然事件的发生，军事训练的时间每天增加到4小时。

与此同时，在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毛泽东还积极组织农讲所的学员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实践中去。1927年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偷袭武汉革命政府。当时，由于北伐军在河南前线激战，武汉防务空虚。在这危急之时，毛泽东果断地将农讲所学员400余人输送出去，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配合叶挺的部队，击退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5月底，湖北麻城北乡，土豪劣绅纠集千余人，围攻县城，捣乱农协，残害农民。毛泽东闻讯后，立即派学员200余人，号称国民军的一个营，指定大队长傅杰为营长，前往麻城平叛。6月初，学生军配合武汉警卫团向敌人展开了攻势，经过激烈战斗，迅速平息了叛乱。

经过3个月的理论学习、军事训练和实际战斗的锻炼，农讲所学员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大大提高，成为既能做群众工作，又能指挥作战的多用人才。6月18日，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原定学习4个月的农讲所学员，提前毕业离校。在毕业典礼上，毛泽东等农讲所领导向全体学员颁发了刻有“农民革命”的铜质五星证章，勉励学生到农村中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之后，这届学员陆续离所返回原籍，投入到领导当地的农村革命斗争实践中。

不久，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武汉农讲所只办了第一届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如此，武昌农讲所为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领导、农运领导和思想工作人才。

大革命失败后，武昌农讲所的一部分学员回到原籍，参加了各地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如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学员陈慕平回到江西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后来争取袁文才这支“绿林”武装，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起了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文、刘文蔚、汪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对开辟鄂豫皖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学员程伯谦协助方志敏开创了赣东北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了江西于都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挺进赣南、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学员刘非在开创湘鄂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部分学员则随贺龙、叶挺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为我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第一枪作出了贡献。总之，武昌农讲所的学员，在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我党我军的栋梁之才。

三、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为了把握农民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民理论的研究和对农运干部的培训，而且非常重视对农民革命和农村实践的指导，经常到农村考察，与农民交朋友，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取得第一手材料。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因而成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考察次数最多的地区，特别是1927年初的那次考察，在中国农运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

毛泽东之所以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深入到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较大规模的调查和考察，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具有很大的典型示范作用。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席卷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高潮。湖南的75个县，建立农民协会或筹备的有59个，会员136万多，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在600万以上。对湖南的这次农运高潮，曾受毛泽东的委派回湖南指导农运工作的王首道是这样回忆的：

我和一些同志怀着革命豪情，沿路进行宣传工作，步行回到长沙。党组织

派我到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担任中共祁阳县支部书记，公开则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运用在农讲所学到的知识，和本县的雷晋乾、李震球等同志一起，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宣传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如何残酷剥削农民和压迫农民，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和如何求得解放的道理；发动农民，组织区、乡农民协会，成立农民武装梭标队等。组织起来的农民把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捆起来，头戴高帽子游乡或押进城里游行示威，以锣鼓开道，梭标队列后，成千上万的农民跟在后面，边走边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协会万岁！’农民的威力惊天动地，吓得土豪劣绅魂不附体，直到土豪劣绅屈膝求饶，罚了款，写了悔过书，才放了他们。罪大恶极的被农民捉拿送县，经特别法庭审判后枪决。农会领导农民向过去把持乡村财政、贪污舞弊的豪绅进行清算斗争。过去县衙门差勇下乡作威作福，捉鸡打鸭，敲诈勒索，欺压人民，这些旧官场的恶习，也因慑于农会的威力面敛迹。地主政权既倒，族权神权夫权也动摇起来……这样一来，盗匪、流氓绝迹，苛捐杂税废除，进而兴办学校，搞互助合作运动，修塘坝，修道路，发展生产，移风易俗，真是好得很！

二是，驳斥地主、土豪劣绅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诬蔑和诽谤。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和传统观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千百年来，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在政治上残酷地压迫农民，他们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现在农民们起来了，用戴帽子游街示众的方法，打下了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的八面威风，把他们从政治上一下子打倒了。往日里，总是地主豪绅把无辜的农民抓起来，送进大狱，如今，农民们却把一些土豪劣绅送到县署关起来，对一些罪大恶极者则干脆枪毙。千百年来，地主阶级疯狂地剥削农民，逼租逼债，农民终日辛苦，仍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现在，农民开始减租减息运动，农会提出的减租数字，地主劣绅不得违抗或减少。各地农协会都建立“平粜局”和“平粜委员会”等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斗争。

农民的革命行动，使地主、劣绅惊慌失措起来，纷纷外逃。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的，只得在乡里向农会投降，到了上海、武汉、长沙的则纷纷散布农民运动的谣言。

农民运动的高涨，极大地震动了社会各阶级。反动阶级迅速聚集起来，对农民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扑。地主、劣绅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一小撮国民党

右派和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则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污蔑农民运动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污蔑农民运动"妨碍农业生产"、"妨碍税收"、"影响北伐"，公然说，对农民协会要"加以限制"。对于地主、豪绅的种种诽谤和污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应如何奋起反击，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湖南农民运动作一次系统的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对反动派的驳斥更加有力，更能击中要害。

三是，回击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指责和刁难。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听了地主、豪绅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后，不但不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为农民说话，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反而站在地主、豪绅一边，为他们帮腔，对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提出了种种责难。特别是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独秀公开说：

"各地农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能干涉县乡行政，不能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只能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同时，现在农会领导的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要有常备的组织，不要收缴民团枪械。"

陈独秀的"三个不能"、"三个不要"，目的是取消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以此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表白，我们共产党进行国共合作是"真心诚意的"。

为了讨好地主、豪绅，陈独秀甚至点名批评：

"过去一段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搞糟了，带有明显的原始幼稚的行动，必须纠正过来！"

面对国民党右派、地主劣绅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一些责难，毛泽东决定再度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用事实来驳斥反动派的造谣、攻击，批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推动农民运动的健康、深入发展。

2．参加和指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6年12月5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的毛泽东收到了湖南省农民协会的邀请电。邀请电称：

"湖南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

敝会已于东日（1日）开幕，现在在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限感祷！

敬祝！"①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12月17日，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由汉口回到长沙。20日，大会发出召开欢迎毛泽东参加大会的通告。通告说：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来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届时当有一番盛况也。”①

这天下午，欢迎大会在长沙幻灯场隆重举行，除参加农民大会的300多代表外，还有许多市民自发地参加了旁听。毛泽东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作为中央特派员，此次回省，主要是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进展情况，总结近年来农运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下面，我想谈两个方面的感受：首先，近年来，由于在座诸位的努力奋斗，湖南农运进展顺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离开湖南仅一年，这一年的形势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一切都是湖南同志努力工作而取得的巨大成绩。其次，在今后的农民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加强工农商学的联合战线，大家齐心合力，协同作战。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就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工业、商业或教育事业，关键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现在，有人说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完全是一派胡言；有人说在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之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这也是右派的言论，完全是为地主和劣绅讲话。那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而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②

在大会期间，毛泽东通过与农民代表的广泛接触，掌握了许多的第一手资料，使他更坚定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看法是正确的，农民运动总的发展方向是好的，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是错误的。于是，他回电国民党中央农民

① 载《湖南省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12月22日。
② 载《湖南民报》，1926年12月29日。

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县，作一次系统的调查和考察，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以进一步推动全国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掀起全国反帝反封的革命高潮。

3．实地考察农民运动，调查农村社会发展情况。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便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提出到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得好，并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农村，实地考察农运的进展情况。为此，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立即召开会议，作出了两项决议：一是决定由省党部监委戴述人陪同毛泽东下农村考察；二是向全省各级党部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协助做好这次调查、考察。通告的主要内容有6项：

（1）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

（2）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

（3）解决开放米禁问题；

（4）指示解决民食问题的方法；

（5）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

（6）宣传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决议案。

由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提前通知，所以毛泽东每到一地，各县国民党县党部都派专人陪同视察，并作详细汇报，为他的这次考察提供各种方便，确保了考察任务的顺利完成。

（1）毛泽东考察五县的行程。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戴述人等的陪同下，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风尘仆仆地在湖南考察了32天，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

毛泽东这次考察的行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考察湘潭、湘乡、衡山3个县。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当天到达湘潭县城。5日，由县城经银田寺、清溪寺进入韶山冲。6日至9日在韶山考察。9日离开韶山，下午到达湘乡棠佳阁。11日抵湘乡县城。14日离开湘乡，经肖家冲到达衡山县的白果、福家铺、世上冲考察。20日到达衡山县城。2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将考察3县的情况与中共湖南省委、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交换了意见，并在省党校、团校作了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第二阶段是从1月27日至2月5日，主要地考察醴陵、长沙两县。1月27日清早，毛泽东从长沙乘火车到达醴陵。2月1日，步行25里到达南乡东富寺。2日离开东富寺，经县城、龙凤庵到达渌口。2月4

日到长沙考察。5日回到省城长沙。在长沙，又一次将醴陵、长沙两县考察的情况同湖南有关部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在短短的32天的时间里，行程1400多华里，广泛地接触了农民群众和有经验的农民干部，普遍走访了农、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和负责人，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2) 毛泽东这次考察的主要内容。一是如何评价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首先对于各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高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支持。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痛斥了党内外一些人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攻击。在韶山、衡山等地，毛泽东历数了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斗争中的丰功伟绩，指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在衡山，他特别赞扬了白果农民敢于在埋军阀赵恒惕胞衣的地方闹革命；在长沙，他向省党校、团校作报告时，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指出这是站在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利益方面打击农民革命的反革命言论；在衡山、湘乡、醴陵等地，他还热情地赞扬了农民自己动手打掉曾信奉的菩萨的行动。毛泽东对于妇女的翻身解放备加赞扬。在韶山毛震公祠，他请妇女吃饭坐头席；在白果，他称赞参加革命的农村妇女大灭了族尊老爷的威风的革命行动。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告诫革命的同志，一定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拥护农民革命。醴陵县有个农协会负责人，因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限制农民的革命行动，私自放走被农民关进监狱的土豪劣绅。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那个人是“好好先生”，不懂得革命，并语重心长地对其进行了教育。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有些县政府、县农会徇地主之情而拘捕基层农会干部的错误做法。在衡山、湘乡，他发现县监狱竟关押了许多基层农协会长和委员时，便生气地说：

“赶快放出这些革命的‘泥脚杆子’。你们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地主、劣绅的反动气焰。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反对他们，便是反对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同时，对农协委员中的中农代表，也要很好地团结，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①

二是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问题。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

①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册，177—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对农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衡山等地干部汇报了农协会在农村“独裁”一切，实行革命农民专政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扬说：

“你们做得很好，‘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很有气势和力量。农协会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贫苦农民手里。在农协会里面，这个贫农的领导，是非常之需要。同时，你们还要注意在打倒地主权力和地主武装时，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以此来保卫和巩固农协会已得到的权力。”①

在湘乡县考察时，毛泽东对县农协会的负责同志说得更加直接了当。他说：

“你们要把团防局的几百条枪夺过来，武装我们自己。同时，要迅速发展农民梭标队，使每个青年农民都有一个标枪，或者一杆梭标。”②

三是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农民运动的问题。在醴陵南二区三屋里乡，农协会的同志汇报说：“我们乡里有个大土豪易萃轩，原来是个‘乡里王’。农协会势力强盛时，他伪装开明，巴结农民协会。乡农协会开会那天，他假惺惺地又送猪肉又送稻谷，还送了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字大匾，具有一定的欺骗性。”③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立即对陪同考察的县农协会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提防土豪劣绅表面上向农协会投降，实际上暗中与农协会作对，不要上他们的当，要加倍同他们作政治斗争；要大力发展农民梭标队，以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反抗。”④

四是如何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问题。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还教育农运干部，要向农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在韶山、醴陵，毛泽东以当地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农民和农民之所以受苦受难为例，教育农民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迅速地组织起来，与土豪劣绅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说：

“这几个月来，由于我们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使得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这说明不是土豪劣绅‘八字走运’、‘坟山贯气’；也不是农民‘八字不好’、‘祖坟风水不好’。只要我们把农民组织起来，依靠共产党和农协会的领导，坚持斗争，才能解放自己。”⑤

---

①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册，177—178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②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册，177—178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③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册，177—178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④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册，177—178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⑤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册，178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还对建立和发展农村党的组织、培训农运骨干、改进干部作风，特别是建立农民特别法庭、农民诸禁、革命的长期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民革命的伟大纲领

1927年2月6日，毛泽东结束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12日，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资料，离开长沙返回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

面对一大堆的考察材料，毛泽东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在农村中的所见所闻，与武汉、长沙听到的完全是两样。自己有必要、也有责任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如实地向党中央汇报，以便使中央能根据当时农村的实际，及时修正自己的农运政策，正确地指导农村和农运工作的健康发展。于是，他立即着手向党中央写报告，提出了13个问题。2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写完报告后，又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并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党的机关刊——《向导》周刊，一份寄给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3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机关刊物《战士》上连载了此文。接着，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也开始连载。但后来由于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的干扰和阻挠，该文最关键的第八部分，被迫停载。毛泽东也因此受到陈独秀的批评。不久后，主持党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力排众议，不但指示当时党领导的长江书局出单行本，而且亲自为之作序，热烈地赞扬毛泽东的胆量和气魄。瞿秋白说：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是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

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每个人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出版后，也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93期立即予以转载，并认为是“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用自己在湖南考察中取得的大量的事实，热情地讴歌了农民运动的奇勋伟绩，反驳了党内外存在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和攻击，科学地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明确指出了我们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正确理论和路线，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农民问题。

从政治战略的角度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毛泽东充分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阐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农民问题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如果农民起来革命了、斗争了，就必然会动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政治基础。第二，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目的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国民革命要求农村有一个大的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农民起来造反了，才有了这样大的变动。第三，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得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初步显示出了农民革命的强大威力。

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说：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②

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阐述了如果我们不重视农民问题，不发动农民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这个革命变动中得到相

① 瞿秋白：《湖南农民革命》（序）长江书店出版，1924年4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13页，人民1991年6月第2版。

当解决，农民就不会起来并拥护国民革命。毛泽东认为，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革。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毛泽东还认为，对待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的态度怎样，是检验真革命、假革命或反革命的重要标准。他说：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迫使你迅速地选择罢了。"①

(2) 毛泽东热情地赞扬了农民运动"好得很"，坚决反驳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毛泽东说：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主动好得好！'好得很'是农民及其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13页，人民1991年6月第2版。

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①

(3) 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了农民问题的根本是贫农问题，贫农是"革命先锋"。正确认识中国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农村各阶层进行科学的分析。毛泽东指出：

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看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

毛泽东认为，对于国民革命贡献最大的是贫农，农民问题就是贫农问题，把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发动起来了，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毛泽东说：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来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时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②

(4) 毛泽东初步论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毛泽东认为，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革命，相信群众会自己解放自己。对农民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6页，18—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6页，18—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动不要横挑鼻子竖挑眼，特别是对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新鲜经验，不要看不顺眼，总是指责群众这也不对，那也不是，用太多的清规戒律去束缚农民群众的手脚。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们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倒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以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反对。”①

(5) 毛泽东重点阐明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毛泽东认为，农村革命，首先是农民阶级要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而封建地主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权的，必然会起来反扑。基于这样的原因，农民要建立自己的政权，首先必须打碎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农村政权，代之以新的农民阶级的政权——农民协会。毛泽东说：

“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立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是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2版。

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①

为彻底把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打下去，建立起新的农民政权，关键的一步是建立农民武装。如何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说：

"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的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标队。……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标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标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标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标，而不应限制它……"②

毛泽东这种建立真正的人民革命政权，武装全体农民的主张，是当时争取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策略方针，也是其政治战略的重要的物质条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23—24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第五章

争取袁文才、王佐

改编“绿林”武装，与“绿林好汉”交朋友，是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确定敌我友的一大战略决策，也是毛泽东政治战略中的光辉篇章。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后，果断地改变了进军路线，引兵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与当时的“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交上了朋友。由于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采取了改造、团结、使用的政治战略，使他们较快地改掉了自己身上的毛病，成为两位真正的革命战士。毛泽东也正是在这些“绿林好汉”的拥护和支持下，才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创建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一、上山：“与绿林好汉交朋友”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这是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触景生情而吟成的光辉诗篇。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掌握枪杆子，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迫切心情。更是激励工农阶级拿起枪，用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的屠杀政策的战斗号角。

1. 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

事实上，从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的那一刻起，上山下湖，

与“绿林好汉交朋友”的思想就开始形成了。

1927年4月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白色恐怖下，黄浦江边、武昌三镇，血雨腥风，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又继续战斗了。

同年8月7日，为了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工农的反革命行径，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战略，指出了对蒋介石集团只能是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政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说：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子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

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在讨论湖南军事问题时，毛泽东第一次在党的决策层中提出了“上山”的战略。他说：

“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中央临时负责人瞿秋白，欣赏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才能和工作才能，一心想挽留毛泽东去上海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任职，以共同承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担起指导全国革命重任。瞿秋白对毛泽东说：

润之兄，如今形势严峻，任务艰巨，中央决策机关的人手实在太少。而你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几年，有这方面的领导经验，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能否与我一道去上海，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不知润之兄意下如何？

听了瞿秋白的盛情邀请，毛泽东面显难色。论交情他与秋白相谊甚厚，是难以回绝的；论公理，秋白是中央临时负责人，是顶头上司，应该服从。但毛泽东历来是有主见的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是难以改变的。所以他稍略思考了一会儿，便带歉意地回答说：

秋白兄，谢谢你的信任和关心。眼下，基层的实际斗争需要人，党发动的各地武装起义更需要人，所以，我不想去上海，我愿意回湖南做农民工作，到那里去领导农民起义。我要上山下湖，与绿林好汉交朋友，拿起枪杆子，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白色恐怖。

瞿秋白见毛泽东决意要回湖南，也不再勉强他，只是叮嘱说："润之兄，这一去千难万险，困难重重，你一定要珍重啊！"

8月12日，毛泽东一从武汉回到长沙，便投入到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经过数次会议的研究讨论：中共湖南省委于8月13日正式决定集中力量在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等地发动起义，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此后，省委又一次作出具体的起义行动计划：起义地点在安源、铜鼓等湘赣交界之处，起义时间为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攻省会长沙。尽管这个方案在某些方面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但起义的大方向是积极的、正确的。

2．霹雳一声暴动。

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着。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浏的农民和安源工人武装，共5000余人。起义部队的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一、二、三团。

9月9日，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安排和部署，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长岳和长株段铁路，标志着起义的开始。

紧接着，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队按前敌委员会规定的目标发起进攻。

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公开打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

一团由修水出发，经渣津、长寿街进攻平江；

二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三团合攻浏阳；

三团从铜鼓出发，沿东门、达浒一线直逼浏阳，与二团配合，南北夹击，夺取浏阳。

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节外生枝，在起义前收编了国民党军阀夏斗寅一部，编为第四团，随一团行动。正是这一轻率的行动，导致了整个起义受挫。

9月9日这天，第一团从修水出发；10日，占领平江龙门。正当部队继续向平江挺进时，余洒度私自收编的第四团叛变，从背后向第一团进攻，致使第一团牺牲100多人，战斗失利，部队只得向浏阳方向转移。

第二团于9月9日从安源出发，12日攻克醴陵，15日胜利地占领了浏阳城。但由于该团主要领导人王新亚骄傲轻敌，未能及时撤出浏阳城，结果敌人从长沙、株洲增援，起义部队陷入重围而严重失利。接着，在突围中又损失1/3。

第三团按前敌委员会安排，由铜鼓出发，在毛泽东领导下，9月11日挺进白沙镇，随后又占领了东门市。但由于一团在长寿街失利，敌新八军两个团转而向三团扑来，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部队只得向后撤退。

至此，三支起义部队均遭失利。在这一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调整了进攻战略，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并通知三支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结，商量决定起义部队的去向。

3．引兵井冈，“找绿林朋友去!”

1927年9月19日，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的三支部队经过几番艰苦的战斗，终于在浏阳文家市会师。毛泽东当天就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这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工农革命军师、团以上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进行了一整夜，主要是围绕着部队进军方向问题展开讨论。参加会议的人争论得很激烈。当毛泽东提出改变部队进军方向时，师长余洒度立即站起来说：

同志们，部队进军方向是没什么可讨论的！我们要坚决按照中央、省委会议的决定，按照省委会议通过的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取浏阳直逼长沙。如果改变进军方向，不继续攻打长沙就是违反中央、省委的决议，就是右倾，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坚决反对余洒度的意见，主张在进军方向上实行战略转变。毛泽东说：

我不同意余洒度同志的意见。如果继续向长沙进攻的话，只有死路一条。目前，在浏阳有敌人的两个整团，驻长寿街的有一个团，在长沙的附近还驻扎

着敌人的部队。而我们就只剩下这千来号人马了，再也不能拿鸡蛋碰石头了。所以，我认为必须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向农村进军。我们只有到农村和山区找一个落脚点，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说着拿出从学校借来的教学用的地图，钉在黑板上，用木棍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说：

这块山形最宽的地方，就是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而这像眉毛的地方，就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我们只有向这个地方进军，到这里去当革命的‘山大王’，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从这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罗霄山脉地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省交界之处。其北段紧靠长江，又依托着武长和武浔铁路，太靠近大城市，敌人统治力量强，不利于我们的发展；而南段的地形不很理想，不便于我们活动和筹粮、筹款；唯有中段，地势险要，崇山峻岭，峭壁林立，林丰树茂，进可攻退可守。特别重要的条件是，这是湖南、江西两省的结合部，距两省省会城市较远，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较大，你来我不往，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我们有回旋的余地。再说，由于这里地处两省交界之处，革命的举动，可以影响两省，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而且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实在是我们积草屯粮、养兵集众，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①

毛泽东的话一落音，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绝大多数与会的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或不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觉得去做“山大王”还叫什么革命呢！

毛泽东耐心地说服着大家，并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现在革命军做“山大王”，与过去土匪的“山大王”是有本质区别的。毛泽东说：

同志们，我们向农村进军，向山区进军，去做‘山大王’，与原来我们讲的‘山大王’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有革命宗旨和目标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那种土匪大盗式的‘山大王’。同志们，现阶段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就是要去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攻占之，然后，不断积聚力量，一步一步把敌人消灭之。②

听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部队进军方向的意见之后，工农革命军总

① 参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所的文章，载《红日照千秋》下册，第1024—1026页，成都军区政治部编印。
② 参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所的文章，载《红日照千秋》下册，第1024—1026页，成都军区政治部编印。

指挥卢德铭，略停思了一会儿，便第一个站起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卢德铭说：

润之兄分析得很有道理，我完全赞成。现在，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都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如果再去攻打长沙，恐怕只会全军覆灭。……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再这样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就是到天亮，也不会有统一的结论。我看还是举手表决一下，少数服从多数！我完全赞成润之的意见。”到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举了手，表示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就这样，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及时而又正确地作出了向农村进军的伟大战略决策。无论从政治，或是从军事上，进与退是辩证统一的。退是为了更好地进。列宁指出的“退一步，进两步”也是这个道理。试想，如果没有文家市会议作出的退兵决策，哪有后来进军井冈山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之举？

9月20日清晨，天气晴朗。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文家市，工农革命军第一、二、三团的指战员1000多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坪上，等候看毛泽东宣布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不一会儿，毛泽东身穿老蓝布农民衣服，打着整齐的绑腿，脚穿草鞋，迈着稳健的步伐，在师团领导的陪同下，满面笑容地来到起义部队面前。值班干部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部队情况后，便大声宣布：“现在，请中央的毛委员讲话。”

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呼声。

毛泽东向广大指战员挥了挥手，大声地说：

同志们，请坐下吧！大家很清楚，我们工农革命军是一支工农的武装，是为工农打天下的。北伐军打倒南京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向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为了反抗蒋介石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工农革命大业，必须拿起枪来，与蒋介石作决死的斗争，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我们要和反动派作斗争，枪杆子是第一重要的。我们在大革命时期之所以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枪杆子的亏。而要拿起枪杆子，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①

接着，毛泽东又分析了之所以放弃攻打长沙而转向农村进军的理由。他说：

同志们呐，按秋收起义的原定计划，是要去攻打长沙的，大家也都想去长

① 参见唐春元、黄先健《毛泽东说服与攻心之道》第92—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而且还有我的亲人，我也想快点把长沙拿下来。然而，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长沙是一时打不下来的！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因而就不要去了。我们就到敌人不想去、难得管、管不着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到农村去、到大山大沟里面去，在那里站稳脚根，养精蓄锐，发展我们党的武装力量。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出发到罗霄山脉中段去找一个好的落脚点。①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既幽默风趣，又富有哲理，犹如清爽的东风，冲散了笼罩在秋收起义将士心头上的愁云迷雾，明确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当天下午，工农革命军与当地群众告别后，高举红旗，离开了文家市，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伟大进军！

二、只身赴约：首先争取袁文才

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经过文家市转兵、三湾改编，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宁冈县城——古城。这天清早，龙超清带领宁冈县委的同志很早就等候在古城，迎候毛泽东和革命军。当工农革命军旗迎着秋风，猎猎飞舞进到古城时，鞭炮齐鸣，穷苦百姓欢呼雀跃，整个古城一派欢乐景象。起义将士也长长嘘了一口气，好似在说：总算到了家。

(1)“啊！井冈山一直有农民武装？我们就到那里安营扎寨！”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古城的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工农革命军中营以上党员干部和宁冈县的龙超清、肖子兰等人应邀参加了会议。

首先，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向工农革命军的领导介绍了宁冈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介绍了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农民运动情况，并着重介绍了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是如何坚持斗争的。说着，龙超清还推开窗户，指着不远处的井冈山说，就在离这里几十里路的茅坪和茨坪，还活跃着两支农民武装，共300多人。尽管这两支农民自卫军现在还不是我们党领导的，是“绿林式”的武装，但他们是劫富济贫、专打土豪劣绅的，其中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还参加过党组织。那里确实是一个开展武装斗争的好地方。

---

① 参见唐春元、黄先健：《毛泽东说服与攻心之道》第92—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接着，会议切入主题，主要是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在什么地方“安家落户”的问题，同时，也讨论确定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方针问题。毛泽东说：

秋收暴动已近一个月了。虽然这次暴动在军事上受了很大的挫折，但我们在战略上并没有失败，因为我们已经摆脱了敌人，从险境中解脱出来了。尽管现在人少了，但却更精干了，换个法子跟敌人斗。军阀可以割据，我们也可以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山高皇帝远，敌人是奈何不得我们的。井冈山一带还有两支农民武装在活动，我们就到那里安营扎寨！宁冈这地方，山清水秀，特产丰富，是个好地方，离井冈山近，是我屯粮积兵之地。①

毛泽东的主张，却遭到余洒度等少数人的反对。他们批评毛泽东这种做法是“右”倾保守，是逃跑主义，是与中央的武装对抗政策相违背的，并扬言要向中央反映毛泽东的严重“右”倾错误。

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在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毛泽东仍然是耐心地向与会同志分析之所以到井冈山“落户”的原因。他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入手，反复论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并批评了那种只知道“杀杀杀”、“冲冲冲”的“左”倾苗头。毛泽东说：

同志们，超清同志刚才说了，大革命时期，宁冈的土客籍曾联合一起，推翻了反动政权，统治全县达一年之久。马日事变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相继被破坏，唯宁冈县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在茅坪、茨坪保存了两支农民武装。宁冈盛产粮油，有一年耕而三年食之称。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在这里屯兵，积蓄革命力量。我们为什么在革命低潮时去与强大的敌人硬拼呢？为什么不在这里积少成多、养精蓄锐，待革命力量完全恢复后，再打出去消灭敌人呢？②

毛泽东的一席话有理有据，博得了与会同志的一阵热烈掌声。最后，与会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井冈山“安家”，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对待这里的两支“绿林”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的问题。袁文才的部队驻扎在山下——宁冈的茅坪，大约有100多人；王佐的部队扎在山上——茨坪，有200多人。这两人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遥相呼应，成犄角之势。两人又是拜把子兄弟，关系十分密切。一有风吹草动，双方就互相支持，连附近几县的靖卫团都奈何不得他们。

① 参见曹西河《贺子珍》第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版。
② 参见曹西河《贺子珍》第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版。

对于这两股武装，革命军中的分歧更大，多数同志主张力取，用武力解决他们；以毛泽东为首的少数同志则持相反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袁文才、王佐两个“山大王”，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占山为王的，他们的本质是好的。特别是袁文才，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共产党，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因此，经过我们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可以把他们改造成革命的同盟军的。再说，他们是本地人，人地两熟，如果动武，就势必在他们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我们也是很难长期在这里立足的。毛泽东说：

听龙超清同志介绍，袁文才又名袁选山，1898年出生于宁冈茅坪马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是客籍人，祖辈由北方迁移到此，深受当地土籍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曾在吉安读过初中。1923年，茅坪一带的游民组织起‘绿林马刀队’，以胡亚春为首，公开与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分庭抗礼。袁文才这时就参加了‘马刀队’，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因为他有文化，不久就成了马刀队的参谋长，接着便接任首领一职。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帜，频繁地活动在宁冈、永新一带，在群众中很有影响。还听超清同志说，大革命时期，在革命的感召下，袁文才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说明改造袁文才是有相当基础的嘛！所以，我认为先做袁文才的工作，并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思想工作到位，就一定能把他们争取改造过来。①

在短短的时间里，毛泽东对袁文才的情况就如此清楚、了解，与会人员不得不佩服他的工作能力、智慧和胆略。这样，使多数同志转而同意了毛泽东关于争取、改造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方针，使工农革命军安营扎寨于井冈山地区的战略决策明确地确定下来。

(2)“不带部队不带枪，我带几个人去就行了！”

工农革命军到了宁冈古城，袁文才早从派出的“探马”口中知道了。他不知道工农革命军此来的目的，戒备心很强，特别是他身边的少数几个小头目，更是担心工农革命军来抢地盘，多次在袁文才耳边吹风：要小心被人吃掉。所以，袁文才一直不相信工农革命军在传单中所宣传的我们党的主张。好在袁文才的秘书陈慕平，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主办的武昌农讲所培训了两个多月，既了解毛泽东，更清楚我们党的主张。于是，他多次对袁文才讲毛泽东是如何如何胸怀宽阔，是为穷苦人谋利益的。这才使得袁文才愿意同毛泽东会谈，商

① 参见唐春元、黄先健《毛泽东说服与攻心之道》第101—10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谈工农革命军与农民自卫军的驻防问题。正在这时，宁冈县委书记、袁文才参加共产党的引路人龙超清派人送来了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亲笔信。

袁文才总指挥拜鉴：

久闻大名，难得幸会。今我工农革命军路过贵地，为工农革命，打土豪劣绅，奉上标语数条，为我军主张宗旨，择日拜访，愿同贵军结为友好，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工农革命军毛泽东①

袁文才读了毛泽东的信后，感到毛泽东言语谦和、真切，文笔清新、飞扬，肯定是一个满腹经伦的大材。特别他从送信人的口中了解到毛泽东在宁冈的一些情况后，更加增加了对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信任感，并愿意与毛泽东面谈。

经过一番协商，双方决定在10月6日见面，地点定在茅坪与古城之间的大巷村。

尽管袁文才对毛泽东的信任度增加，但他手下的一些人总有些疑虑，他们说：对工农革命军的底细我们还不太清楚，自古以来，没有军队不抢地盘的。人家有近千号人马，近千条枪，而我们只有100多人，几十条枪，会不会被一锅端，被当作下酒菜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呢?

听了这些议论后，袁文才又有些动摇。为慎重起见，他决定把会见毛泽东的地点放在茅坪与古城之间的大巷村，如果毛泽东有吃掉农民自卫军的意图，肯定会带许多的人、枪来，那时，山上离得近，部队也可做好迎击的准备。同时，他还听从了心腹头目的意见，将特务连的一个排，配备当时他们最好的武器，埋伏在会谈地点的周围，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出来行动，先拿住毛泽东再说。

与此同时，在工农革命军这方面，也有许多顾虑。一些同志主张毛泽东多带人抢去，以防袁文才不讲信用而对毛泽东下毒手。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个意见。他说：

人家已同意会见，说明他们多少有些诚意。再说，前次袁文才派的代表陈慕平是我在主办武昌农讲所时的学生，这个小伙子不错。他告诉我，袁文才从

① 参见唐春元、黄先健《毛泽东说服与攻心之道》第101—10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本质上是好的，至少是同情革命，有正义感的热血男子，我们要相信别人。我是去和袁文才谈判的，又不是去打仗，派那么多人马干嘛？本来袁文才对我们有些猜疑，人去多了不好，枪带多了只能坏事。所以，明天去大巷村，不带军队不带枪，只去我和龙超清同志，再加上两个勤务兵和带路的老表就行了。也不要带什么武器，我看是不会有什么危险，最多有惊无险。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不仅避免了双方的磨擦，消除了袁文才的猜疑，而且为争取、改造袁文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3) 你送枪，我送钱，袁文才同意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落户”。

10月6日，袁文才率农民自卫队10余人，集合在大巷村，等候毛泽东的到来。他们一个个枪上膛，如临大敌，一边不断派人到村外打探，一边议论着毛泽东将带多少人马来。

正在这时，在村外打听消息的自卫军队员回来报告：毛泽东来了。袁文才一听，脸上表情凝重，忙问有多少人。

打探的队员告诉袁文才，毛泽东一共来了5个人，而且都是赤手空拳。

袁文才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并忙招呼众人去村口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见大巷村口集聚着10多个背枪的人，知道是袁文才，立即跳下马来，与龙超清等人热情地迎上去。

龙超清为毛泽东与袁文才作了介绍。

毛泽东用那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袁文才的手说：“文才同志，久仰了！”

袁文才也一边握着毛泽东的手一边热情地说：“欢迎啊，毛委员！”

这时候，袁文才见毛泽东一行人一身农民打扮，赤手空拳，未带任何武器，而且身后也没有军队跟随的迹象。他心里感到惭愧，忙示意他身边的小头目周桂春，立即撤走埋伏在谈判地点周围的农民自卫军。

袁文才等人把毛泽东迎进屋里，一边叫人倒茶，一边说：“毛委员，咱们久居深山，孤陋寡闻，您能给我们讲讲当前山里山外的情况吗？”

毛泽东马上礼让说：“还是请文才同志先谈谈你们目前的情况吧！”

经过一番谦让，还是毛泽东先向袁文才等人讲起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毛泽东说：

文才同志，前不久，我们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我们举行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由于各种原因，起义

受到挫折，只得向农村、向山区转移。听说前段时间你们这里也闹得很欢呀！所以就奔这里来了，以后还得请文才同志多多关照工农革命军！

袁文才见毛泽东这样随和大方，而且平易近人，忙回答说："这里确实红火了一阵子，后来因时局逆转就退回山里来了。如今你们来宁冈，革命暴动又可闹腾起来了。"

毛泽东见袁文才对工农革命军到宁冈并不反对，忙接过话头说："文才同志，我们到这里是初来乍到，人地两疏，还得请你们以后多多关照和支持。我们一起联合起来闹革命，一靠枪杆子，二靠广大群众，两者相结合，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袁文才被毛泽东征服了。再加上他又曾是中共党员，所以对毛泽东的许多意见深表赞同。他知道毛泽东来这里确实是打地主老财的，并不是与他们争地盘的。这样，原来的那股猜疑心理消失了。他与毛泽东越谈越投机。

当毛泽东问到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的情况时，袁文才告诉毛泽东，他们虽然有160余人，但只有60多条枪，有的还不能用。

毛泽东觉得这是争取袁文才的最好时机。他赞许地对袁文才说：

"文才同志，真是难得啊！你们在大革命失败后，还保存了这支农民武装和60多条枪。这就是革命的本钱呀！以往的失败，主要在子我们没有抓住枪杆子。所以，像农民自卫军这点武装还不够，必须发展和壮大。要不断扩大武装，发展革命。这样吧，为了支持农民自卫军。工农革命军送你们100条枪。你们的武器装备加强了也是我们整个工农武装力量发展壮大了。明天，你们派人去宁冈古城挑枪。"

说完毛泽东亲自写了送枪100杆的条子给袁文才。

毛泽东的坦诚，更进一步打动了袁文才。他在与毛泽东会谈中，不但答应送款700大洋作为工农革命军的军饷，而且同意工农红军将留守处和医院建在茅坪。

实际上，袁文才已同意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落户"。争取袁文才的工作进展顺利。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得到了袁文才和茅坪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毛泽东与袁文才同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他们朝夕相处，经常促膝谈心到深夜，使袁文才的世界观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不但不再猜疑工农革命军来抢地盘，而且常常帮助工农革命军。在袁文才的积极努力下，工农革命军的粮、油、

菜得到了妥善解决，后方留守处和工农革命军医院也很快建立起来，使100名的伤病员较快地得到医治，军需物资也有了固定存放的地方。

为了彻底得到袁文才的信任，毛泽东在这时仍摆出不与袁文才争地盘的架势。他要袁文才代管工农革命军留守茅坪的军队和后方医院，自己则带领部队到永新一带活动，四处打击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当地地主武装。毛泽东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使袁文才真正感到，工农革命军是来干革命、打土豪、领导穷苦人谋解放的，而不是为自己抢地盘的；二是以此扫清井冈山周围的敌人，为将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有利的环境。

毛泽东的这一招果然奏效，袁文才对毛泽东信服得五体投地，他不仅请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长期驻扎茅坪，而且要毛泽东派人去为农民自卫军搞训练。与此同时，袁文才还答应毛泽东，去做王佐的工作，使农民自卫队与工农革命军真正拉起手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至此，争取袁文才的工作告一段落，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开始站稳脚根。

三、合兵击败尹道一，说服王佐参加革命

实事求是地说，争取王佐的工作比争取袁文才就难多了……

王佐又名王云辉，自号南斗，是取北方玄武的斗宿，占元龟之首，与北斗同掌生杀大权。他是井冈山附近的遂川下社人，裁缝出身。王佐个子不高，面白体胖，目光犀利，剑眉浓黑，看上去确有些像“绿林大盗”。王佐识字不多，也没有受到革命的影响，思想较袁文才落后，工作难度显然太大了。如何争取王佐？毛泽东采取了三条策略！

一是，通过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以事实引导王佐相信革命，参加革命。王佐与袁文才是老庚，并义结“金兰”，彼此间很讲得来。毛泽东从茅坪下山到永新、遂川一带活动前，特地拜托袁文才上茨坪做王佐的工作，既向王佐讲明工农革命军来井冈山的意图，又希望王部能与工农革命军携起手来，共同与地主老财、土豪劣绅作斗争。袁文才立即满口应允。他还告诉毛泽东：王佐虽不识字，行为有些粗鲁，但他勇气过人，而且最讲义气。我立即写信给他要他助工农革命军一臂之力。王佐只要见到我袁文才的信，一定照办的。我俩曾义结“金兰”，在关帝前磕过头，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的。说完，袁文才就修书一

封让人送到茨坪去，简单介绍了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并希望他们三方能联合起来一道革命。

本来，王佐对毛泽东到达茅坪早已知道，他害怕工农革命军抢了老庚袁文才的地盘，又到茨坪来争地盘。所以他对茨坪周围作了严密的设防，防止工农革命军打上山来。正在这时，王佐收到了袁文才派人送来的书信，使他知道了毛泽东的为人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了工农革命军是坚决与土豪劣绅作对的，与他们的“劫富济贫”相类似。同时，王佐从袁文才的信中还了解到，毛泽东不但没有吞并袁文才，而且还送给老庚100多杆枪，帮助农民自卫军训练。

通过袁文才的工作，王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戒备心理也渐渐消失了。这样，当毛泽东率部队从永新一带打土豪回茅坪时，便收到了王佐邀请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茨坪的信函。

二是，规定“三大纪律”，取得王佐的信任和茨坪人民的支持。经过袁文才的介绍，王佐同意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暂驻茨坪。为了与王佐领导的农民武装搞好关系和得到茨坪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毛泽东在上山前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茹；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也是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表述形式。

宣布完纪律后，毛泽东先带了几个人“单刀赴会”，以消除王佐的戒备心，大部队待与王佐谈妥有关条件后再进山。毛泽东与王佐见面后，果见王佐生性耿直，快人快语。毛泽东也单刀直人，开门见山地向王佐阐述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来此的目的。在会谈中，毛泽东见王佐部队的装备也不太好，便当场宣布向其赠枪70杆，帮助他扩大农民自卫军。这样，使王佐深受感动，也以500担粮食相赠，以解决工农革命军的吃饭问题。与此同时，王佐不但请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而且提出请革命军的教官来为农民自卫军搞训练。毛泽东当即答应了王佐的要求。

争取王佐及王佐部队的工作也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三是，合兵击败尹道一，争取王佐加入革命。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后，对群众秋毫无犯，深得茨坪人民的信赖和拥护。然而，王佐对工农革

命军有戒备心，怕自己被吞掉。他一方面请求毛泽东派人帮助训练部队，一方面对毛泽东派出的何长工等人又有所防备，有时还派人盯视何长工等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示何长工，对王佐不能操之过急，既要胸怀坦诚，又要讲究策略。何长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王佐采取了不急不躁的工作方法。开始，王佐怕何长工与他的自卫队接触多了，会拆自己的台，便安排何长工与战士隔离居住、休息的办法。何长工毫无怨言，他把做部队的转化工作放在训练场上，在训练中谆谆善诱，既教给自卫军队员的军事本领，又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使许多自卫军队员敬佩何长工，愿意与他交朋友。与此同时，何长工还通过王佐的母亲，做小头目家属的工作，以此来影响王佐及其部下。

经过一段接触后，王佐被毛泽东和何长工的诚心所感动了，有些话也愿意与何长工交谈了。王佐想收拾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就同何长工商量办法，何长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尹道一是国民党反动团总和当地臭名昭著的土豪、恶霸，也是工农革命军消灭的对象，帮助王佐消灭这股地主武装，既有利于争取王佐，又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意派兵合击尹道一，并帮助制定了具体的合击方案。何长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安排，又仔细询问了尹道一的活动规律，然后全盘拿出了他与毛泽东商量的方案。同时，告诉王佐，工农革命军将派一个连的兵力和最好的武器，担任伏击的任务。

按照毛泽东和何长工的计划，由王佐率一支小部队到尹道一的驻地挑衅，大骂尹道一的种种恶行，用激将法将他诱到工农革命军和王佐部队埋伏的地方，然后围而歼之。尹道一从来就没把王佐放在眼里，经常对其穷追不舍。今天对王佐上门挑战，辱骂，更是不能容忍，立即纠集部下200多人，拼命追击王佐，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并边追边喊："兄弟们，抓住王佐血洗茨坪，放假3天，任凭大家快活快活。"

王佐见尹道一已上钩，便边打边骂边退，回到驻地茨坪。尹道一率200多人追到旗罗坳时，已是饥饿人乏，精疲力尽了。于是，决定吃饭后再攻打茨坪。此刻，正好闯入到工农革命军和王佐部队的伏击圈内。他们随何长工的一声令下，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枪弹、手榴弹一起在团丁中开花，打得尹道一部喊爹叫娘，抱头鼠窜。这时候，尹道一才知中了埋伏，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王佐有如此强大的火力。在伏击部队的齐心合击下，团丁们乱成一团糟，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尹道一也被王佐部的一个小头目活活地砍下脑袋。

合击尹道一的胜利，对王佐的影响很大。这时，他才真正信服了毛泽东和

工农革命军。在庆祝宴会上，王佐向农民自卫军大讲何长工的谋略，大讲工农革命军的真诚支援，大讲毛委员的雄才大略。不久后，王佐要何长工转告毛泽东，他愿意参加革命，愿意参加共产党，并主动将自己的所有家产拿出来分给贫苦农民。毛泽东和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王佐的申请，不但同意工农革命军和农民自卫军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而且以其表现，于1928年春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井冈山地区两位著名的“山大王”在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感召下，都已投入革命的怀抱，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改造“绿林军”，创建根据地

袁文才、王佐虽然参加了革命，并把他们掌握的农民武装交给了工农革命军，但改造这两支“绿林武装”的任务却异常艰巨。这两支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带有“土匪气”的农民居多，纪律松弛、散漫。特别是王佐的部队，平时都各自回家种田，在有情况时，才集合起来行动。因而对工农革命军的军纪，一时不习惯。毛泽东在改造这两支部队时，既以诚相见，又坚持原则，同时也讲究策略，慢慢启发农民自卫队员的觉悟。把改造两支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把他们改造成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毛泽东争取、改造这两支武装的具体策略是：

1．调查分析，对症下药地做好转化工作。

通过与袁文才、王佐的接触，毛泽东认为，袁文才、王佐部队中的大多数成员是受欺压、受剥削的农民群众。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这样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成员具有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意愿，具有反对封建豪绅、恶霸地主的强烈要求。再者，他们中一些人又不同程度地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然而，由于长期的“绿林”生涯，长期受封建帮会和旧军队的影响，再加上缺乏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两支“绿林武装”还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弱点。主要表现在：

一是政治目标模糊，目光短浅。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受历史上绿林豪杰的影响，提出了为广大贫苦农民所欢迎的“劫富济贫”的口号，但却缺

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具体的奋斗纲领。而且这两支武装中的大多数成员是农民个体小生产者，他们受自身经济地位的限制，又无先进阶级思想的领导，所以，他们的政治眼光短视，流寇思想严重，游民习气颇浓，只追求一时一地的得失，只考虑自己的利害关系，缺乏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因而也就决定了这两支部队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

二是敌友不分，混淆阶级阵线。如何对待敌我友，是关系到农民武装能否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原则问题，也是关系到农民武装能否发展、壮大的根本问题，袁文才、王佐这两支武装一直没有解决革谁的命，靠谁革命的问题。他们虽然与封建地主、土豪劣绅有着尖锐的矛盾，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可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敌我友常常混淆不清，而且经常侵犯普通群众的利益，甚至有时受地主、土豪的挑唆、利用，做出了仇者快、亲者痛的错事和蠢事。比如，他们常常靠抓人罚款来解决经济给养，以养活部队。这样，当自己财源发生困难时，一般群众的利益也会因此而受到他们的侵害。不管抓到什么人，都罚款100大洋，普通老百姓有时也难逃此劫。特别是由于他们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客籍矛盾的影响，不分阶级，只维护客籍人的利益，对土籍农民的财产也去侵扰。也是由于阶级路线不清，敌我友不分，才使得这两支武装的成份复杂、组织紊乱。

三是政策观念不强，纪律性较差。袁、王这两支武装，由于朴素的阶级反抗精神和狭隘的复仇思想，使他们的行动带有浓厚的盲动主义色彩。再加上受到社会上种种封建思想和不良恶习的侵蚀，遇事只凭自己的感情和个人思想行动，根本没有什么政策和策略，有时候甚至胡来和蛮干，纪律性很差。基于以上原因，当地群众对他们产生了恐惧心理，把他们与“土匪”等同起来看待。

四是官兵关系不正常，队伍内部缺乏凝聚力。由于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和旧军队的一些不良影响，使得这两支武装中军阀作风比较严重，打骂当兵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们非常重视封建社会里那种义气与交情，但不讲阶级兄弟的感情与友爱。在部队中缺乏彼此尊重、平等待人的新型关系，存在着上下不一致，官兵不平等的军阀主义残余。又由于官兵之间在政治上不一致，在经济上不平等，造成广大战士受压抑，积极性得不到应有发挥，从而导致队伍内部缺乏真诚的团结。

针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武装存在的上述种种弱点，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根治方法，对他们进行革命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长期

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各种不良倾向与恶习，才能使他们获得新的生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武装力量。

2．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的政策与策略。

毛泽东在分析了袁、王两支部队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后，明确规定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造这两支“绿林武装”。

一是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肃清农民自卫军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游民习气。毛泽东多次告诫去这两支武装中工作的同志，要切实加强对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在部队进行政治训练时，毛泽东还多次亲自上政治课，用浅显易懂的话语，使农民自卫军的队员们明白工农革命军的任务、性质与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在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在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设立党代表制度，从而使这两支农民武装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为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奠定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毛泽东还多次对派往袁、王两部中的党代表指示，要灵活地将工农革命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原则与方法，运用到改造这两支农民武装中去；要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推广各项民主制度，培养官兵的军队与群众紧密相连、处处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要在部队中成立工农运动委员会，以推动群众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分批组织这两支武装的官兵到工农革命军中参观，学习。由于在这两支武装中逐步实行了工农革命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久便使这两支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二是整顿组织，调整充实部队的指挥机关。在进一步取得袁文才、王佐的信任和改造这两支部队的局面有初步好转后，毛泽东立即指示两支部队中的党代表，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组织整顿上。毛泽东认为，长期以来，袁、王的部队中混杂了不少的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这里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藏身之地；另一方面，又利用袁、王的弱点，在农民自卫军中宣扬迷信和腐朽没落的思想，甚至有极少数坏分子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利益出发，在部队中煽风点火，进行破坏活动。基于这样的现状，毛泽东指出，对这两支部队进行组织整顿的首要任务，要发动广大士兵，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出去，彻底揭穿他们的反革命嘴脸。袁文才、王佐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调查摸底，坚决把部队中的那些出身豪门的不良分子和老兵油子清洗出去，农民自卫

军初步纯洁了队伍。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指示，要把那些忠厚纯朴、思想进步、革命坚定、年轻力壮的农民自卫军队员吸收到党内，以加强党在这两支队伍中的力量。

三是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袁、王的农民自卫军，除了思想政治素质不高外，军事素质也很低。他们根本不重视军事素养的提高，平时，部队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着无事干，有的甚至赌博。只有遇有情况时，才把大家集合起来，从而两支部队的战斗力不强。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也适应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需要，毛泽东指示，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的步云山，王佐部则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并从工农革命军中抽出军事素质较强的干部，来领导这次军事训练。毛泽东规定，部队每天进行“三操两讲”，严格按照工农革命军的要求，学习兵法、射击、进攻等。无论刮风下雨、打霜结冰，都不允许间断，始终要部队保持高涨的热情。毛泽东还几次给部队讲军事理论，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样，使这两支武装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较大提高。

改造袁、王部队的工作进展顺利。袁文才、王佐的思想转变也很快。1928年2月中旬，袁文才、王佐主动要求将自己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序列。毛泽东和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袁文才、王佐的表现和这两支武装的变化，同意将部队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任命袁文才为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为了切实加强对第二团的领导，毛泽东又从第一团中抽出20余名政工干部到二团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就这样，毛泽东基本上完成了对这两支“绿林武装”的改造，不仅扩充了工农革命军的实力，而且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五、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赢得井冈山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只有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工商政策，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赢得农民，也才能使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成果真正巩固下来。所以，毛泽东在完成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改造工作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进行土地革命上，以从政治上、经济上赢得井冈山地区广大农民的支持拥护。为此，毛泽东在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土地革命，实行了正确的工商政策，制定了中国土地革命的第一个土地法令——《井冈山土地法》，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以后的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1．通过调查提出具体的土地革命政策与方案。

在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时，毛泽东对井冈山周围农村和农民的情况，作了周详的调查摸底，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为制订出正确的决策和政策奠定了群众基础。通过初步的调查摸底，毛泽东对井冈山及周围地区有了一定的了解：井冈山地区虽然有大片肥沃良田，广阔的森林和丰富的地下矿产资源，但所有这一切，都操纵在地主豪绅手中，劳动人民则根本无开发利用的权力。据统计，只占边界人口5%的地主豪绅阶级，占有土地和森林矿产资源达70%以上，而占90%以上的劳苦大众，却只占土地和其他资源30%以下，人民过着缺吃少穿的痛苦生活。遂川县土地最集中，约80%被地主阶级占有；永新约70%的土地被地主占有；万安、宁冈、莲花三县的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了65%左右。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便把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当时党的工作的重大政治战略之一，作为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大举措。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大约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土豪、分浮财，废除一切债约，做好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为进一步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打好坚实的基础。二是试验阶段。即在部分县、乡进行分配土地的试点。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积累分配土地的经验，为全面推行土地改革政策作好准备。

在调查摸底和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28年10月上旬在宁冈步云山，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各县第二次党代会。在会上，他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教训，并亲自起草了决议案，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在这个决议案的《农村斗争问题》一节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是措出了过去的试点工作和农村工作，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即在分田地的过程中，不是适应贫苦农民的彻底要求，只是站在贫农、中农、富农一致的调和立场上，没有调动起广大贫雇农的积极性，这是过去在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的一种重大失误。

二是指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土地革命”斗争中，没有实行严厉的“赤色

恐怖”。即没有坚决打倒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及其走狗，从而导致有相当部分的农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三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忽略了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即只讲三者之间的团结、和解，而忽略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样，就导致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使得贫农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四是确定了今后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策略。毛泽东规定的农村斗争的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抓住中农，孤立富农；深入土地革命；实行赤色恐怖，毫不怜惜地镇压罪大恶极和死不悔改的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用强硬的手段威胁富农，使之不帮助地主阶级为非作歹。

五是加强根据地的组织建设，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在根据地建立这样几个组织，①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作为农村中开展土地革命的骨干。②乡村暴动队。即把农村中的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夜间游击，以对付地主豪绅造成的威胁；在夺取政权时，暴动队改为赤卫队，作为工农革命军的补充。③在工农群众中发展武装，以在必要时发动乡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在整个试点阶段中，毛泽东探索出了以下几点经验：一是要充分发动群众，清查田亩，划分阶级；二是坚持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三是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四是给地主也分一份土地，给予生活出路。

2．制定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土地法。

为彻底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争取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成果，毛泽东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在总结部分县、乡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1928年12月，亲自制定并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作为井冈山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政策依据。毛泽东在我党的第一部土地法典中，将他前一段时间领导土地革命运动时的政策和方法，归纳于9个大的部分：

①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用下列3种方法分配之：分配农民个别耕种；分配农民共同耕种；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②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③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④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以劳动力为

标准，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⑤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以乡为单位分配；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

⑥山林分配法：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⑦土地税之征收。税种分为15%、30%、50%，……

⑧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分得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⑨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之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①]

《井冈山土地法》是毛泽东领导制定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土地法规，是毛泽东土地革命战略的重要体现。它使广大基层苏维埃在打土豪、分田地中有章可循。这对于落实毛泽东争取袁文才、王佐，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战略，推进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左”倾错误，再加上经验的不足，这个土地法规还明显地存在着一些缺陷，的确不够完善。正如1941年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井冈山土地法》的缺陷主要有3个方面：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②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③禁止土地买卖。这些局限性，后来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被纠正了，并为毛泽东土地革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5—3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第六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生动体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毛泽东政治战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事变前：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确立

“西安事变”前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确立，毛泽东积极倡导、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方针，不但促进了事变的发生，而且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1．毛泽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矛盾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风起云涌，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改变其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改弦易辙”，停止反共内战政策。国民党统治营垒内部也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并从中分化出一些抗日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不仅进行了著名的淞沪抗战，而且成立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曾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要求得到红军的支持，联合起来，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分裂情况，坚持支持蔡廷锴、蒋光鼐的福建人民政府，并把红军向福建逼近，以形成更大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

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人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政治团体和军队，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毛泽东说：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合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①

然而，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顾“九·一八”以来由于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仍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的反革命”。“整个地主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巩固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的。”因而采取“只要斗争，不要联合”的关门主义策略，丧失了一次发展红军、发展抗日的有利时机，也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方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党的遵义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战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一反帝统一战线宣言，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也使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初步得到体现。“宣言”郑重宣告：

“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一切党派和各界人士，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②

《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提出了国防政府的十大政纲，是我党当时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第39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中共党教学参考资料》（二），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抗日救国的基本方针。“宣言”认为，由于日本强盗的入侵，不仅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使资产阶级、商人、地主分子、甚至南京系统的军队与国民党中部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领袖，有参加抗日和同情抗日的可能。二是指出了党与苏维埃红军对于任何派别，即使过去不抵抗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而现在反正自新参加抗日的军队与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反对革命，只要他们现在起来抗日，就必须与他们联合，共同进行抗日；三是指出我们党应采取上下纵横的活动方式，不受任何局限地最广泛地在各方面进行统战活动。宣言认为，应当在全国军队的军官与士兵、黄色工会和各帮派的工人组织内的领袖与工人群众，一切学生团体、爱国团体、新闻记者、知识分子、商会等团体中宣传我们的主张。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争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2．瓦窑堡会议：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初步构想。

继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发表后，1935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向全国人民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毛泽东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十大纲领：（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2）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3）救灾治水，安定民生。（4）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5）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6）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7）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8）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9）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10）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①

1935 年 12 月 6 日，党中央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这是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一个重要文件。决定指出：

“在苏区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

① 《六大以来》上册，第 727—728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 2 月版。

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部分，即没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等的自由。……富农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但可以参加反帝拥苏与互济会等群众团体。至于依照过去政策，已经处理过的富农，则不必翻案，但如某乡、某村有多余的土地时，可给以相当补偿。"①

显然，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土地政策，即批判了共产国际加紧反富农的错误政策，发展了"六大"决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面。

上述决议或决定，都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我党最高决策成员之后作出的，明显地标志着党在政治策略上认真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转变，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准备了思想基础。

如前所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1月初，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11月13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反蒋。同年12月，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使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客观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时局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并制定出适应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构想。

12月13日，毛泽东从直罗镇前线回到瓦窑堡，中共中央就立即着手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17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发、凯丰、李维汉、张浩、刘少奇、杨尚昆、郭洪涛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讨论军事战略问题，由毛泽东作主报告。他说：

我们现在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口号下进行。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②

① 《六大以来》上册，第730—73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②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第497—49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接着，会议讨论政治战略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在大革命中叛变了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博古仍站在“左”倾立场上，引经据典地说中间势力，即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因素。毛泽东则对博古的观点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势力。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

“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

“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①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构想。

首先，毛泽东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全国各党各派力量是有可能联合起来的，即使是在大革命时期离开了革命营垒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会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说：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对此，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尽管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背叛了人民的利益而倒向敌人，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由于他们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不喜

① 《六大以来》下册，第735—73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二者之间动摇着，当殖民化威胁他们的时候，是可能向着反帝方向动摇，即是有可能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因此，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毛泽东不仅正确分析了在民族危亡加剧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而且还科学地预见到，只要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英美同日本的矛盾必然增长，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可能利用这种矛盾，使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暂时处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营垒之内。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政治战略。

其次，毛泽东全面地提出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方针——在政治上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经济上实行保护政策。毛泽东特别严厉地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集雄厚的力量。”①

毛泽东在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阐述了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到革命营垒中。毛泽东说：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还认为，无产阶级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牢牢地拉在统一战线中。所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特别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下，不仅不没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且还要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既保护工人的利益，又不反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不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发财。

再其次，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思想。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这就使统一战线内部呈现了错综复杂的特点。针对这一复杂性，毛泽东认真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经验，告诫全党要认真记取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致使革命陷入失败的惨痛教训，指出我们党必须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

"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善处同盟者。"①

再次，及时调整了党的若干政策。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大与强有力的基础，毛泽东提议并得到会议的通过，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名称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若干政策：(1) 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愿意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保护小资本工商业，实行有利于一切小资产者的统一累进税。(2) 优待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3) 优待一切愿意反日反卖国贼的日军官长（不分官级）、士兵，对愿在红军中服务的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一切抗日讨伐卖国贼的友军，给予尽可能的援助，直至协同作战。(4) 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对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在平分土地时，富农与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5) 放宽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毛泽东认为，要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6）保护华侨。毛泽东认为，对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逐的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业。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运用于中国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中，正确而全面地解决了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系列问题，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式形成。

3．把对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作为统战重点，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士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在许多场合批判了“九一八”以来，党内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的联合“下层”、排斥“上层”、“要兵不要官”的片面政策，恰当地采取了“以下层为基础、上层为重点，用上层领导下层、上下结合”的统一战线原则，并把着力点放在做上层的统战工作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争取和依靠国民党左派及其爱国领袖。这部分人以宋庆龄、何香凝等为杰出代表，是坚持革命纲领、革命精神、推动蒋介石接受国共合作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毛泽东通过书信和派代表多次与这部分人联系。1936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高度地赞扬了宋庆龄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他说：

“1927 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过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①

二是，积极争取国民党内部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反蒋派。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1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2 月版。

蔡元培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另外有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1927年，蒋介石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政策时，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是弹劾共产党提案的提出者之一。而“清党”以后，蔡元培目睹国民党、蒋介石的变质和残忍，使他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特别是“九·一八”后，蔡元培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深表不满，因而辞去了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1935年后加紧了做蔡元培的工作。多次派人拜访蔡元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抗日救国、对内开放民主的主张。并几次致函蔡元培，希望他能出来号召中国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

“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新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陆海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①

三是，争取国民党内部的当权派，甚至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顽固势力，弃旧图新，走上国共两党团结御侮的道路，以实现全国抗战。毛泽东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努力。1936年1月，毛泽东在同《红色中华》记者谈话中说：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要是蒋介石或任何方面的军队能够停止进攻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立即命令该敌对地方的红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实行动员来进行共同抗日战争。……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从这以后，毛泽东向南京的蒋介石发出一系列联合抗战的信号。1936 年 3 月上旬，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我党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就停止内战问题开始秘密接触。我方代表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而实际之谈判。4 月 25 日，毛泽东为倡议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企划并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8 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要加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方针。10 月 15 日，毛泽东又一次通过中华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明确宣布："吾人已决定恳切申请一切国民军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① 10 月 26 日，毛泽东又领衔发表《红军将领给蒋介石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指出：

"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决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既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②

毛泽东发出的上述信息，充分说明了我党争取、团结蒋介石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诚意。这一切，也为后来的"西安事变"作了舆论准备。

四是，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扩大联合抗日阵线。这部分人同蒋介石中央独裁的排斥异己、投降卖国的反动政策有矛盾，又怕共产党侵害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这部分人的典型代表是李宗仁、陈济棠、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力求保全实力，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把这部分力量争取过来，就能够加大抗日力量的比重。所以，毛泽东加紧了对这部分人的争取工作。其具体目标是：在华北是争取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在华南是争取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在西南是争取刘湘、刘文辉、龙云；在西北则是争取张学良、杨虎城。毛泽东在 1936 年间，对上述各派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派人与他们秘密会晤外，还写了大量的书信，其中包括《致高桂滋》、《致阎锡山》、《致杜斌丞》、《致杨虎城》、《致宋哲元》、《致傅作义》、《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致于学忠》、《致张学良》等，向他们宣传了我们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进行转化工作。

---

① 《毛泽东年谱》(189—194) 上册，第 596 页，1993 年 12 月版。
② 《六大以来》上册，第 786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 2 月版

毛泽东争取上层人士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活动，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事变前：毛泽东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接触

在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参加抗战的工作中，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身上，把他们俩作为当时统战工作的关键人物。这是毛泽东在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后作出的重要的政治战略决策。这是因为，这两支部队地处“剿共”的前沿，直接与我红军接触。同时，这两支部队中“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高。特别重要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在不同场合表示要联合抗日。所以，毛泽东从1935年10月开始，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关系密切的往来，为他们后来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与张学良频频接触，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奉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退至关内，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张学良作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心里早就窝着一把火。1935年9月，蒋介石又委任他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这样，蒋介石又一次把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推向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对立面。而把他自己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放在第二线，好让张学良与红军两败俱伤后，再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导致张学良对蒋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再加上东北军内的抗日呼声愈来愈高，使得他的内心开始动摇，想寻找一条更有利东北军生存和发展的出路。毛泽东分析了张学良的处境和当时政治态度后，对其采取了与以往相反的斗争策略，即由以打击为主，转为以团结为主，争取张学良在小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这以后，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式，全方位开展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一是，亲笔致信张学良，劝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掉转枪口，一致对抗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后不久，毛泽东便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将士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说：

“蒋介石不但要东北军打红军，而且处处在压迫东北军。他不给东北军一块好地方，把东北军调到最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也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东北军官兵薪饷，哪里及得上蒋介石军队的一半？东北军官兵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赡家养子更是说不上了……”①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子他们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抗日的先锋……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在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倡导与努力下，红军与东北军在1936年1月实际上实现了和解，双方已没有什么战斗了。这年的10月5日，毛泽东又致信张学良，再次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希望红军与东北军尽快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②

二是，通过释放东北军被俘将士做张学良及东北军的转化工作。1935年10月后，红军对东北军的俘虏实行了优待政策，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毛泽东多次亲自给被俘的东北军官兵讲话，向他们分析形势，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

① 《六大以来》上册，第746—74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页，人民出版社，11983年12月版。

抗日的主张。这些俘虏回到东北军后，对东北军的中下层官兵影响很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教育、争取和转化，对张学良态度的转变有重要作用。1935年10月25日，红军在榆林桥战役中生俘了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曾是张学良的卫兵营营长，是张学良的亲信之一，做好他的转化工作，对张学良有直接的影响。所以，红军俘虏高福源后，毛泽东立即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抓住时机，做好争取工作，以更好地影响张学良。高福源刚被俘时，态度很不老实，不但不接受改造，而且准备一死了之。红军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他进行反复的思想工作，并带他参观红军驻地，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的照顾，这样，使其思想渐渐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一死了之转到主动要求回西安宣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与红军联合抗日，负责做高福源转化工作的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及时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同意了高福源回西安的要求。第二年初，高福源秘密返回西安，第二天就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为试探高福源的底细，导演了一场挥泪斩爱将的话剧。而高福源早就知道张学良的心理和思想状况。所以，面对张学良的训斥，高福源慷慨陈辞，把在保安和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张学良和在场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随后，张学良立即密召高福源，表示同意与中共和中国工农红军高层领导人直接接触，并要高福源作为自己的秘密使者，从西安返回延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在延安，当高福源把西安东北军的情况及张学良想与中共高层人士直接面谈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当场表扬高福源干得不错，称赞他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干了一件大好事，并要高福源回西安转告张学良，中共答应他的要求，请双方考虑一下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至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与张学良开始沟通，东北军与红军之间进入到实质性谈判阶段。

三是，派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人与张学良直接见面谈判，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高福源回西安后，向张学良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双方最后商定，在东北军与红军阵地较近的洛川见面，具体商谈有关停战事宜。2月中旬，毛泽东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张学良派出的东北军军长王以哲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磋商，并为张学良与我党的领导人周恩来会面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从而使谈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3月初，张学良又亲自到洛川，与李克农直接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政治上东北军拥护《八一宣言》所提出的抗日要求；军事上互不侵犯；经

济上开放几个口子，为红军运输物资，并规定由东北军子以保护。从这时起，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基本实行了停火。

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直接见面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向张学良转达了毛泽东对这次会谈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表达了我党对这次会谈的诚意，使张学良进一步受到感动，当即与周恩来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的具体协定。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周恩来在与张学良谈到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张也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他现在不能、也不打算反蒋，但将来蒋介石如果真正降日，他一定离开蒋介石而另作打算。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与红军联合起来后，想尽一切办法逼迫蒋介石抗日。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主张表示理解和赞同，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毛泽东和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答复。届时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张学良见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非常高兴，便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对蒋委员长来个内外夹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

很显然，张学良这时已具备了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2．争取杨虎城，奠定西北抗日的基础。

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比做张学良的工作顺利得多。这是因为，这支部队曾是冯玉祥的老部队，对中国共产党比较了解，大革命时期，就曾有共产党在部队活动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地下组织在中央红军未到达陕北之前，就在这支部队中做了不少的工作。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早就主张停战抗日了。毛泽东做杨虎城的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

一是，派代表送来亲笔信给杨虎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立即派人送信给杨虎城，劝说杨虎城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据当时的信使汪锋回忆：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通知我到富县套通塬村谈工作。当时我刚从狱中出来，见到毛泽东后，他要我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实现互不进攻，联合抗日。在谈话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特别详细分析了杨虎城本人的处境、思想情况以及所属部队的情况，指出，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之间

有深刻的矛盾，蒋介石让杨虎城‘剿共’，是为了达到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目的。同时，西北军也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特别是杨虎城和西北军中下层军官都有抗日的思想，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抵触情绪。当西北军在‘围剿’红军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撤销了西北军一些部队的番号，减发他们的军饷。这样，就不得不使他们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我们这时去做杨虎城的工作，是有可能争取他加入到抗日阵营中来的。”① 毛泽东说：“对杨虎城我们要有信心、决心，像姜子牙钓鱼一样，愿者上钩，不愿者就让它逍遥地去游，耐心等待。杨将军虽然好，但他周围有坏人，有国民党特务，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②

说完，毛泽东拿出事先写好的给杨虎城、杜斌丞等的信，要汪锋当面交给他们。毛泽东在信中恳切地说：

我们党愿意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并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如荀同意，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③

汪锋奉命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延安，向杨虎城转达了毛泽东的意图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杨虎城的政治认识得到提高，同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在1936年2月，西北军与红军也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

随着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进一步密切，逼蒋抗日的时机也日益成熟。这样，毛泽东在1936年8月13日，又一次致信杨虎城，表达了我党建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心愿和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表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另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④

---

① 参见马玉卿等《毛泽东革命道路》(1935—1945)，第117—11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② 参见马玉卿等《毛泽东革命道路》(1935—1945)，第117—11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③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第494—49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④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二是，派人到西北军中做杨虎城和中下层军官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申伯纯到十七路军中做杨虎城及所属部队官兵的统战工作。5月，共产党员王炳南从苏联回国。毛泽东了解王炳南与杨虎城两家是“世交”的关系后，立即派王炳南到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1936年，中共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等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了杨虎城当时的思想，并认为杨虎城因受蒋介石的排斥而倾向革命。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加大对西北军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的力度。于1936年5月派秘书张文彬赴西安，加强对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从这时开始，张文彬经常往来于西安和陕北之间，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进展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西北特支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中建立了“红军秘密联络站”，尽量利用在国统区的合法权利，发动和组织工人、学生、商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以便从各方面影响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官兵。同年8月，毛泽东又派汪锋和回陕北汇报工作的张文彬一起赴西安，与杨虎城洽谈联合的具体事项。这次洽谈，双方达成了以下各项协议：（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军驻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或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预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根据这个协议，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也先后在富县、西安等地建立起来。

1936年9月间，毛泽东又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团团长常驻西安，协助杨虎城、张学良改造部队，准备抗日。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西北军分别签署《抗日救国协定》。至此，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顺利建立起来。

在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最能体现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一方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即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含糊，不能让步；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即为了联合抗战，我们可以在时间、地盘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变斗争对象为争取的同盟者。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西安事变”的解决，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重大成果。

三、震惊中外的“双十二”枪声

由于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各党各派的共识，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从而直接导致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也因此成为历史所关注的重要人物。

1．蒋介石西安“督阵”，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匪”。

在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同时，我们对蒋介石也采取了退让政策，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做蒋介石的工作。1936年9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还提出，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从这个指示开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介石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明我党的抗日立场。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率46名红军将领，直接致信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停止进攻红军的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全民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反帝斗争勇气。对此，蒋介石并没有回心转意，仍坚持“剿共”的反动立场。1936年12月1日，就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10天，毛泽东又以个人的名义致信蒋介石，劝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毛泽东在信中恳切地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呼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而发表宣言，促先生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幡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

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前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变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①

同时，按照毛泽东与张、杨的有关协定，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也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政策，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遗憾的是，毛泽东恳切的信函，张、杨二人的多次规劝，不但没有使蒋介石放弃内战的政策，反而变本加利地向共产党和红军进攻。蒋介石一意孤行，仍然把“剿共”和消灭红军放在第一位，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6年末，他亲自从南京飞往西安“督阵”，逼迫张、杨二人进攻红军。这样，就把张、杨二人逼到了“墙壁”上，不得不采取行动，实行兵谏，以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一到西安，立即召来张学良、杨虎城，严厉训斥二位前段“剿共”不力。并当即作出决定：一方面，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率部开往前线“剿共”；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准备调中央军进人西北地区围剿红军。同时，要张学良、杨虎城在以下两个方案中作出抉择：①服从“剿共”命令，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攻陕北红军，由“中央”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②如不愿意“剿共”，将东北军调驻福建，西北军调驻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来“剿共”。

这两个方案都是很刻薄的，是企图置东北军和西北军于死地，当然是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他们不愿再与红军作战，因为去攻打红军，必将使自己的实力损耗殆尽；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西北，因为离开西北，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迟早会被蒋介石改编吞并。

基于上述原因，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商定：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3—4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先对蒋介石进行“苦谏”、“哭谏”，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真正再达不到目的的话，就实行“兵谏”。很显然，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是促使“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导火索。

12月6日，张、杨二人决定，轮番向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利弊，以唤起这位委员长的“中国心”，在大敌面前以民族利益为重。12月7日，张学良首先到临潼华清池晋见蒋介石。张学良慷慨陈辞、声泪俱下地说：

“委员长，继东三省沦陷以后，国家、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中国人民再也不能自己打自己了。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恳请委员长考虑改变进攻陕北红军之决定，掉转枪口，一致对抗倭寇。”

蒋介石一听大怒，歇斯底里地吼道：“张汉卿，你不要说了，我不听！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只得扫兴而回，并把会见的情况向杨虎城作了通报。

所以，张学良前脚走，杨虎城马上到了华清池，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开始想从杨虎城身上挽回局势，要杨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东北军、西北军齐心协力，去剿灭共产党和红军。谁知杨虎城也是来劝他放弃“剿共”计划，与共产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的。蒋介石只得大骂：“娘希匹的，都反了，反了。”最后竟责令杨虎城不日赴前线指挥围剿红军。

杨虎城也未能说服蒋介石。

12月9日，中共西北特支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15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竟违背民意，下令特务和军警向学生开枪，打伤学生数人，更激起学生们的无比义愤，临时决定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对学生的行动，蒋介石不仅指使军警、特务在去华清池的路上布置架设机枪拦阻，面且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立即派兵镇压学生的游行示威，并连连说：“格杀勿论！格杀勿论！”张学良怕学生受到伤害，立即驱车赶到十里铺，下车后，便站在山坡上劝阻学生，张学良满含热泪恳切地对学生们说：

“同学们，同胞们，我同情你们，并和你们站在一条路线上，你们要相信我张汉卿也是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因为我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啊！请相信我，一定代表你们向蒋委员长请示，实现你们的抗日要求。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12月10日，张学良最后一次到华清池进行劝告，蒋介石一见张学良，就表

示不愉快，并挖苦地说："你张汉卿多么伟大！在那么多的学生面前慷慨陈辞。你要抗日，你就去，我是不会答应你的要求的。你要在一星期之内给学生一个圆满的答复，我看你如何去面对他们。"

这一番责骂，羞得张学良满脸通红，张学良只得转回西安城，并及时向杨虎城通报，要杨再去作最后一次努力。杨虎城面见蒋介石后，还没说上两句话，蒋就不耐烦了，横蛮地说："我说杨虎城，你与张学良这种车轮战术，是不是想气死我？告诉你们，我不想听你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类的话了，如果你还是那几句话，就请你回去吧！"

话不投机，蒋介石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杨虎城碰了一鼻子灰，立即赶到张学良处商量对策。张、杨二将军通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劝告乃至苦谏、哭谏等软办法是不可能"感动"蒋介石了，也不能再用了，只有按原定计划，在苦谏、哭谏不奏效时，就实行"兵谏"，先捉住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联合抗日救国。

2．来自华清池的枪声。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最后商定了"兵谏"的几个步骤：①由东北军进入华清池，解决蒋介石的侍卫和卫士，活捉蒋介石，但必须绝对保证其生命安全；②西北军则负责西安城内的战斗，捉住与蒋介石同来的陈诚、朱绍良等党政要员；③通电全国，阐明这次"兵谏"的目的是为了抗日；④致电中国共产党，邀其派代表来西安参加解决这一事件。

12月12日，是人们永远忘不了的一天。这天清晨，蒋介石的住地——临潼华清池突然枪声大作。东北军前卫营在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等的带领下，冲进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外围的宪兵武装，然后冲进蒋介石的内院，迅速解决了蒋介石的贴身卫兵、随从三十余人。蒋介石的秘书萧华在乱枪中被打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打伤，原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被枪决。蒋介石于匆忙中从窗子爬上屋外的小石山，也被东北军卫兵抓了出来。至此，捉蒋的任务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在西安城内，西北军派兵包围了住在西京招待所里，与蒋介石同来的国民党党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十余人及其随从卫士，迅速解除了他们的全部武装，并接管了西安郊外的飞机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共总指

挥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由张、杨二人分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抗日救国；

(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 释放一切政治犯；

(5) 开放民主爱国运动；

(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确定遵行总理（孙中山）遗嘱；

(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在通电全国的同时，张学良、杨虎城及时致电延安，请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速派代表到西安予以具体指导。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有颂扬的、也有批评、指责的。南京政府内部和国民党内部更是不亚于总统府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一片混乱。本来就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立即形成了意见截然不同的两大派别：一派是以主张亲日的何应钦为首，主张不管蒋介石死活，下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并不惜一切代价，用飞机把西安炸平。何应钦在自己颁布的《讨伐令》中称：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元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家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这是何应钦想趁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实现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另一派则是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他们从蒋介石的安全和国民党内不出现内讧的现状出发，主张暂不下达讨伐令，以激张、杨而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同时，也不主张轰炸西安，可先派人去西安看看，设法营救出蒋介石再说。

宋美龄还指责何应钦居心不良，企图乱中夺权；何应钦则指责宋美龄是妇人之见，不该干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具体事务。两派明争暗斗，南京城内热闹非凡。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上对张、杨二人的举动，指责者多，称颂者少，就连当时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也态度冷淡，并带有指

责，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

很显然，“西安事变”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如何驾驭这一微妙的局面？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事变？将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前途。毛泽东以他那非凡的智慧，制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既挫败了亲日派的阴谋，又批评了某些力量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这一壮举的种种非难，使中国的抗日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西安事变”的发生，包括捉蒋及蒋的随行人员的一切部署，中共事前毫无所知。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化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事变当天凌晨2时30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才收到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的电报，知道了蒋介石等人被扣的消息，但对具体的内幕情况仍一无所知。3时左右，毛泽东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称这次扣蒋及重要将领，旨在抗日救国。至此，毛泽东才明白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扣蒋的真正意图在于，以“兵谏”的形式，逼蒋抗日。他虽然觉得此种方法有些不妥，但二将军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有益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抗日事业的。这时候，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已决定了坚决支持张、杨二将军，把中国的抗日事业推向前进。6时，毛泽东又收到陕甘前线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电文，也通报了扣蒋这一事件。正在这时，毛泽东又收到张、杨二将军请求派代表到西安解决这一事件的电文。于是，他立即主持召开会议，商量解决这一事件的具体办法。

1．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初步骤。

国民党最高政府、军事长官被扣，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倾刻间，国内外舆论大哗。这一事件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战略家，审时度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了以下几个重大步骤：

(1) 立即复电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建议两位将军：一方面保护蒋介石的绝对安全，一方面，做好整兵备战，准备迎击中央军的进犯。若胡宗南胆敢向南压迫，红军坚决从侧面配合友军将其消灭之。

(2) 马上致电共产国际，说明西安发生的情况，并报告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的5条应急措施：一是，由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二是，准备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三是，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部、晋绥军四部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乘机进攻的日军；四是，建议国民党南京方面，应以林森、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五是，争取蒋军全部，要求国际赞助。

(3) 立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确定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

(4) 初步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西安，帮助和指导张学良、杨虎城处理好这一事变。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毛泽东就初步安排出了处理这一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的实际步骤，足以证明毛泽东临危不惧的胆略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是当时中国无人可以与之比拟的。

2. 初步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为了确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第二天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采取哪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一事变。毛泽东首先说：

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是应该支持和拥护的。这次事变发生的前途，或者说结果，我看不外这三种前途：一是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是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以威逼蒋系直接统治的东南七省就范；三是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①

毛泽东的话一落音，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纷纷发言，谈了自己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认识，以及解决的基本方针。最后，毛泽东又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

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因此而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爆发新的大规模

①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册，第62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因此，我们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①坚持停止内战，统一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②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③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④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进其反省。最后，我提议，由恩来同志率我党代表团前往西安，代表我党帮助张、杨处理好这一事变。①

3．致电国民党中央，阐述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

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接受毛泽东的新指示。在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在听取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的情况介绍及准备采取的处理措施后，周恩来连续两次致电毛泽东，并根据外界对西安事变的不同反应，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

“为了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南京如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②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经过郑重的考虑后，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于是，毛泽东亲自拟写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报。电报称：

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应实行下列处置：（1）目前应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3）停止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民主，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将领；（5）实现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如贵党能实行上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得救，蒋介石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2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对“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局势、我党的策略、谈判条件，以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等，都作了进一步详细的指示。毛

①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册，第621—6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转引自逄建农《世纪伟人毛泽东》第663页，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泽东说：

要争取与蒋介石等公开谈判，在他答应初步改组南京政府，取消何应钦的权力，讨伐军退出陕北，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条件下，可以恢复其自由。

这样，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实现了由最初“罢免蒋氏、交付人民审判”，到“保蒋安全”，再到“释放蒋氏”的策略转变，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环。

4．统一全党思想，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使之统一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战略上来。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后，广大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及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蒋介石围剿了我们党和红军十余年，屠杀了无数的革命志士，因而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认为，要杀掉蒋介石，以祭我革命烈士在天之灵。在12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当时，张国焘以极“左”面目出现，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少数红军将领也出于革命义愤，同意这种主张。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没有采纳张国焘的意见，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为了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提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重要意义的认识，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变化，多次开会研究应付的对策，为解决好这一事变而日夜操劳。并于12月19日又一次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了处理这一事变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认真分析了西安事变几天来急剧变化的形势，全面提出了为争取和平前途而努力的各项对策。毛泽东说：

目前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应争取中间的一派，并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力争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这次事变有两种发展的前途：一种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由于事变的发动，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实现。我们必须力求避免第一种前途，争取第二种前途。①

正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正确分析了事变的进步性质，是一部分

① 参见蒋建农《世纪伟人毛泽东》第663—664页，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南京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主张的结果。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事变。

与此同时，为了使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尽快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毛泽东还多次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作宣传解释和思想工作。在红军大学作报告时，毛泽东打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比方，阐明了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道理。他说：

同志们，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呢？我打个粗浅的比方：你要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不愿抗日，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上就打他。西安事变也是这样，捉蒋的目的，是为了把他推上抗日之路，而不是为了把他置于死地。特别是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我们要赶驴子上山是对的，但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必须提防它。这就叫又联合又斗争。

有些学员问：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欠下了我们那么多的血债，就是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为什么捉住了他，不但不杀他，反而要将他放掉，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是的，蒋介石是罪恶滔天，欠下了人民的无数血债，大家主张杀掉他，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算过分。但是，同志们呐，蒋介石现在不能杀。为什么不能杀？因为在目前形势下，杀了蒋介石，正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就会天下大乱。你们看，国民党中的亲日派不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帜，纠集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直逼西安，扬言要平了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这样，全国各派军阀之间争权斗争又会重演，内战战火又会燃遍神州大地，必然给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利益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那就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格。我们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其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毛泽东一席话，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使全党同志和红军战士深受教

育，解决了他们心中的种种疑虑，激发了全党同志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使全党同志和红军战士的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基本方针上来。

5．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毛泽东政治战略的丰硕成果。

1936年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批准了周恩来拟就的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方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出席了双方的谈判。经过两天的会谈，张、杨二将军与南京方面终于达成了六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界各派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实行其他具体救国办法。

蒋介石碍于面子，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他当着各方代表的面承诺，接受并遵守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立即公布了这一消息，使得蒋介石想赖帐也赖不掉了。

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圆了各方力量的宿愿。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

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以及这一方针的顺利实现，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超的政治艺术，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止了亲日派的大举进攻，粉碎了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企图乱中夺权、引狼入室的阴谋。“西安事变”发生后，亲日派何应钦认为时机已到，马上动员和调遣军队准备向西安进攻，并派出一队队飞机在西安上空飞翔，其目的不是炸西安而是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日本帝国主义在事变后也积极活动起来，想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以扩大中国内战，支持何应钦，把在德国养伤的汪精卫寻回中国，企图组成以汪精卫为头子的卖国

政府，从而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使蒋介石安全回到了南京，宣告了何应钦的阴谋的破产，在中国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内战。正如毛泽东所说，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于企图“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

二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反共内战，成为时势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围剿”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达十余年之久的蒋介石，不得不答应停止内战，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标志着十年内战的结束。毛泽东说：

蒋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转变其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项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时，也论述了这一巨大的意义。他说：

“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极大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转变。……十年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①

三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这次事变，成为国共两党关系转换的关键。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使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的承诺，毛泽东指示我党有关领导，按照蒋介石的承诺，三次与国民党谈判：第一次是1937年2月初。我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奉毛泽东之命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在西安进行了西安事变后的首次接触，谈判的中心是红军的改编和边区问题；第二次是1937年5月，我党代表周恩来等在南京直接接触，但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谈判没有进展；第三次是7月17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合法政府，但对红军改编问题毫不退让，并坚持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不久，“八·一三”抗战爆发，迫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蒋介石被迫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同意将西北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9月22日，我党又提出宣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我党的宣言，即

①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第63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第二次正式合作。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第七章

有理有利有节：坚持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的争论却远远没有结束。毛泽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设计师，无论在与党外，或是在与党内各种反对这一政策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都显示了高度的战略原则和高超的策略艺术。他不仅与“左”倾关门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对右倾投降主义作了无情批判与揭露。特别在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这种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毛泽东与王明的根本分歧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在坚持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时，毛泽东遭到了来自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责难和干扰。就党内来说，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右倾投降主义容易被人忽视。大家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受了长达10年之久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对“左”的危害，大家有深刻的感受，而对右倾投降主义却缺乏足够的认识。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并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时，既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要警惕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指：

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必要条件。……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第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压制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1937 年 11 月，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他下车伊始，在 12 月 9 日至 14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发言，重点批评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观点和政策。由于王明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旗号，这就使许多与会者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难以明辨是非。

第三，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主要表现在酝酿国共合作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放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应有的戒备。如被毛泽东称之为“何鸣危险”就是一个明显例子。事情是这样的：在国共合作初期，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改编时，对国民党毫不防范，结果，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全部包围缴械。

第四，党内和军队内的个人英雄主义滋长，少部分同志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国共合作后，党内和军队内的个别人，在改编后不愿严格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滋长了个人英雄主义，把接受国民党的改编作为最大的荣耀。如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不久，八路军某高级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时，递上了一张高级名片，上面竟印着“国民党少将××”的字样。毛泽东一见，心里就很不高兴，在询问那名“少将”有关前线的情况时，他竟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

面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及时指出，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他说：

鉴于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在党内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他离开中国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37 年 11 月 7 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党中央对他回国参加抗日的实际斗争，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然而，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右

倾错误指示，加上王明本人一贯自命不凡，自高自大，所以，他下车伊始，指手划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王明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满，尤其不同意毛泽东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策略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所以在同年12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讲话，点名批评了毛泽东报告的观点。接着，1938年3月，王明在武汉连续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

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否存在着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国共两党是否存在着本质差别。王明一回到国内，就错误地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抗日派与亲日派的区别，不存在阶级差别与阶级斗争；国共两党没有本质区别，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并吹捧蒋介石是什么“不朽的民族英雄”，是“抗战领袖”。并只讲民族斗争，不讲阶级斗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此，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王明抹煞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抹煞国共两党本质差别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并着重阐述了抗战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说：

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但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斗争的形式有所变化。在抗战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是阶级斗争以民族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抗战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这两种斗争同时存在。我们的根本原则是阶级斗争服从今天的民族斗争。在此原则下，必须保持我党和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合作了，建立了统一战线，就牺牲党和阶级的利益。我们只有坚持一定限度的权利，坚持一定限度的斗争，才会有利于合作，有利于统一战线。①

二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是争取还是放弃的分歧。王明极力反对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王明公开说：我们一些同志，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估计不

① 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4卷，第9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

够：过去太强调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的原则。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经过国民党。要统一政府、统一军队、统一群众组织。

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是要把我们党领导的民主政府、人民军队、革命群众团体，统一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动军队和反动团体中去，完全放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毛泽东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认为，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经过国民党，“是企图以委屈求全”而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王明根本不懂得国民党所以与我们合作，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真的“回心转意”，而是因为我们有力量，即建立在人民有力量的基础上。蒋介石是因为害怕人民的力量才被迫与我们合作的。我们的力量愈强大，蒋介石愈不敢轻易破坏统一战线。相反，如果我们不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权和领导权，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必被蒋介石破坏无疑。基于这一实际状况，毛泽东明确地说：

“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①

毛泽东还认为，我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让步和帮助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既然是我们党领导的，我们党就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国民党、蒋介石之所以与我们合作，首先在于我们有力量。没有这个条件，蒋介石“剿共”十几年，早已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能轻易地愿意与共产党平起平坐、合作抗日吗？所以，只有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自主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党和军队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逆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54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统一战线。

三是，在军事斗争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是以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主，还是以国民党和蒋介石军队为主的分歧。王明轻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妄想依靠国民党求得速胜。王明说："我们要打破拥兵自重的传统，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国民党建立几个师的现代化，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和号令。"很显然，王明这已经把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拱手送给了蒋介石，从根本上放弃了我党对抗日战争的军事领导权。

王明还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主张进攻敌占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王明反对我们党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战后，迎合国民党统治区合法斗争，迎合国民党的要求，企图以所谓"建议"、"赞助"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毛泽东针对王明的上述错误言论作了坚决的、公开的斗争。毛泽东认为，在军事斗争上，应该是在战区、在敌后、在农村等广大的地方，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反复强调，党在敌后的工作，应以发动游击战与建立根据地为中心，要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还专门对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它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他认为，所谓持久战，实际上是用游击战来持久，所谓胜利，实际是靠游击战的发展来最后夺取胜利；要把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那就要靠我们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一开始就亲自部署八路军在华北等战略要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到1938年6月，仅在华北地区就建成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等10个游击战略区。

毛泽东还批评了王明在军事上的所谓"七个统一"。他认为，"七个统一"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只能说明王明对蒋介石的本质毫无认识，对国民党蒋介石充满幻想和毫无警惕。这是因为：从统一纪律来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原因是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的性质根本不同；从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编制来看，仅仅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蒋介石根本不会同意拿钱来养活共产党的军队；再从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来看，只能是有

助于蒋介石玩弄借刀杀人的阴谋，有助于蒋介石削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而达到取消人民军队编制的目的。

在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毛泽东与王明的基本思路也截然相反，他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敌后，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战场，把日本帝国主义拖累、拖垮、拖死。

四是，在抗战前途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即究竟是国民党的胜利，还是人民胜利的问题。王明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认为，国民党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是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显然是在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1937年12月，王明在《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公然说：“听信‘抗日胜利了是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不但是对于中国实际情形大隔膜，而且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力量和光明前途无信心。”表面看来，王明是为了不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使国民党不因此而脱离统一战线，才把抗日的胜利说成是国民党的胜利。实际上，王明这时已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气势汹汹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所吓倒，从原来的极左跳到极右，压根看不起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只看重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故寄希望于蒋介石，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毛泽东与王明看法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经过八年敌后抗战，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派力量的共同胜利，是民主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而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的胜利，更不是国民党的胜利。更何况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人侵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也从来没有放弃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没有放弃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国民党蒋介石虽然被迫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迫停止内战，抛弃了独裁和不抵抗政策，但他总是以主体自居，仍然坚持削弱和消灭中共武装力量的政策。早在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班对就说：“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和消灭中共武装力量的五分之二。”抗战爆发后，他又趁国共合作之机，凭借实力上的优势熔化和削弱、取消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他亲自制定了“防共、限共、熔共”的方针，制定了新的“整理党务案”，设立了“国防委员会”，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接着，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

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抗日活动应如何处置》等反共文件，并从1939年开始，连续几次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基于以上客观现实，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使大部分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蠭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级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员的抗日战争。”

很显然，如果像王明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的胜利，是蒋介石的胜利的话，那么，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民主力量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抗日战争的胜利，必然是全民族的胜利，其结果，只能是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而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胜利，更不允许国民党建立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独裁政府。

二、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几个重要原则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为了夺取和坚持党的领导权，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既反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又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1．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尽管蒋介石表面上同意与共产党合作，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在暗地里却与共产党对抗，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在共产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为首的右倾投降主张，只强调合作，否认对抗，公然提出“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放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企图依靠国民党来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面对上述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如何在斗争中打破国民党的束缚与限制，以求得自身力量的发展？这就成了当时极为重要尖锐而又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问题。它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首要原则，即独立自主原则。这个原则坚持得如何，运用得怎样，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否。毛泽东说：

“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说明，坚持和实践，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才能保存和发展已经取得的阵地。”①

如何坚持和处理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抗日战争一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就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政策，妄图借实力上的优势，逼迫共产党服从其“政令”、“军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听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而招致抗日的失败，还是冲破他们的束缚和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的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就成了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关系到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特别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要坚持“既须统一，又须独立的政策”。毛泽东认为，所谓“统一”，即“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所谓“独立”，即是要坚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多次指出：

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要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国民党的委任，不靠国民党发饷，独立自主地扩大人民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战略的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发展阵地，这是主要的。”

毛泽东还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和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

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为了更好地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政策，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制定了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如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纲领；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挑衅行为，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灵活的策略方针，从而使“既统一又独立”的政策，贯彻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始终。

二是，在军事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放手发展敌后武装力量，建立和扩大抗日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这也是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军事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毛泽东说：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1）依据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 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3) 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 坚持依靠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①

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已提出了抗日游击战的重要方针：即中共的军队的行动是自由的、主动的，打与不打，怎样打，主动权完全操于我之手，国民党只是在战略的统一下，相对进行集中指挥。具体作战情况，我军要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性，绝不受制于人。

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和保存、发展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制定了六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原则，并特别强调放手发展敌后武装，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

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敌后游击战争必须放手发展敌后武装，以对敌人的进攻。只要能克服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冲破国民党的束缚，真正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敌后抗日武装，巩固扩大抗日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根据地。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原则在军事上的生动体现，其内涵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指挥，在战略上与国民党军队配合，战术上不受国民党束缚，以分散兵力的游击为主，不以集中打仗为主，着眼于发动群众，尽可能地依傍山地，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建立起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尽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各个不同阶段中我军的具体战略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却没有跨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基本原则，都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演变。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和武装力量的大发展，也正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军事上不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会导致自己的力量被削弱或被消灭；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作后盾，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成了一句空话。

三是，在经济上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努力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日、伪、顽的经济封锁，这是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物质保障。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粉碎日、伪、顽的封锁、围困，巩固抗日根据地，更好地坚持山地游击战，就必须在经济上坚持自力更生。为此，毛泽东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依靠国际援助，不依靠国民党发饷，不加重人民负担，靠自己的努力，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努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围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坚持长期的、艰苦的抗日战争。

经济上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原则在经济上的具体体现。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持久战，边区处于经济十分落后的农村和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环境中。因此，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只能是自力更生。假若不坚持自强、自主精神和经济上的自力更生，一味依靠外援和国民党发饷的话，我们势必会因此而受制于人，最终导致政治上独立自主地位的丧失；假若不坚持经济上的自力更生，靠加重本来生活就很贫困的边区人民的负担来解决经济困难的话，那么就无法改善军民的生活，更无法发动民众支持抗战，以粉碎日、伪、顽的封锁，也就根本谈不上发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可能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是三位一体、互为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不可分割的。要坚

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如果离开了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就会失去这一原则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坚持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2．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说，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从政党关系方面来说，最主要的是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复杂的阶级关系，要在其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领导权，必须采取正确的策略原则。毛泽东根据我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特点和我党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在我党的历史上，对于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曾采取过“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两个极端的政策，结果，不是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就是助长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①

毛泽东认为，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首先要正确掌握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所谓联合，就是斗争形势需要的时候，无产阶级应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条件下，同民族资产阶级讲团结，但不要受它的影响。这种联合，在不同的时期，目的是不同的，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就是要调动其抗日爱国的积极性，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斗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毛泽东指出：

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毛泽东还多次指出，“联合”与“斗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以斗争求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动摇性的一面。若只看见其革命性的一面，忽视其动摇性的一面，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就不能保持我们党的独立地位和领导地位，当然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相反，如果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面，忽视他们革命性的一面，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同样达不到团结的目的，同样会失去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还认为，“又联合，又斗争”原则是多侧面、多角度的，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联合与斗争的程度又有区别。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看，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对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以斗争为主，团结为辅，对他们亲日、叛敌行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只要他们有悔改的表现，愿意抗日，我们还是要团结他们；二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以团结为主，斗争为辅，对其革命性的一面，实行联合与团结，与他们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但对其动摇性的一面，要进行斗争，使他们真正回到革命的阵营中来，如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中的一些高层爱国人士，我们对他们抗日的一面要进行联合和团结，但对其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一面，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毛泽东指出：

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含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们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同时，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原则，我们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采取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避免了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再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

3．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是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假抗日、真

反共的国内政策而确定的。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战略进攻，中日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这一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由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提出了中日两国缔结反共的军事同盟和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诱使国民党投降反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本来是迫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而勉强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很快改变了它的对内政策，从抗战开始时的比较积极抗战和国共两党团结，转而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在军事上便采取由小的反共磨擦，逐步发展为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正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这一政策变化，为了与其作坚决而彻底的斗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争取有利于国共合作和中国抗战的环境氛围，达到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巩固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有理”即自卫原则。也就是说，在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我们不无故进攻别人，但也决不可对他人的进攻不予还击。要做到后发制人，用各种方式和确定可靠的事实，揭破对方进攻的无理；要诚恳地劝告并警告进攻方，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希望他们不要欺人太甚；要在各种具体事实上表明愿意抗日、团结的立场，以促进对方内部的分化瓦解；要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打击最反动、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从而使我党我军处于主动地位。

“有利”即胜利原则。毛泽东认为，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为达此目的，一要有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斗争未发动之前，要冷静估计彼此双方的力量，当条件不成熟，或者说不利时，应善于等待和争取有利时机。但斗争一旦发动，就应毫不动摇地对进攻之顽固派军队，“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以全力去争取胜利，逼使对方退却和让步。只有这样，才能给国民党顽固派教训，使我们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二要善于利用矛盾。要择其要者、弱者而打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这样，既有利于反对、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又有利于得到多数派的同情，保证斗争的胜利。

“有节”即休战原则。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坚持自卫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以必要的打击，是为了教训他们，使他们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来，

而不是真正消灭他们，把他们推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去。因此，我们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之后，要适可而止，及时停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同他们讲团结，订立和平协定，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说：

“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只有和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合作的最主要方法。”①

4．坚持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两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是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另一个是对人民革命力量害怕和仇视，但又狡猾地挂着抗战招牌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两大敌人不论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上都比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强大。在这两大敌人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如何战胜这个狡猾而又强大的敌人？毛泽东从我党我军的实际和我国各阶级的状况出发，提出了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并具体指出了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这一原则。

一是，对待国民党顽固派内部，适用于这一原则。毛泽东说：

国民党是一个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虽然目前顽固派还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数量上是少数。对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以孤立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

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还指出：坚持这一原则，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要把代表地方实力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控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要把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不定、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团结其中的大多数，孤立少数顽固派，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要灵活运用这一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同样适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但在抗日战争时期，还须要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没有侵略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要将曾与日本结成同盟的德、意帝国主义和与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从而在国际关系上达到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取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一原则，从理论上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提高了全党的政策水平，使我们能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稳定动摇者，孤立顽固派，克服妥协投降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5．坚持以武装斗争作为后盾的原则。

毛泽东多次强调，武装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以革命武装作后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要以革命武装为后盾。毛泽东说：

“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①

事实的确是如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虽然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加深，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和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所致。但是，至关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党有了相当的力量，特别是我们已有了一支在艰苦奋战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武装。如果当时我们党没有这样的军事力量，武装到牙齿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是不愿意、也不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也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说：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开了武装斗争也不能巩固。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只有取得了党的兵权，才有党的巩固和发展，也才有抗日发展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

综观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实践，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始至终，都必须有革命武装作坚强后盾，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

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处理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毛泽东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①

1．发展进步势力。

毛泽东认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三个环节，紧密相联，缺一不可。但在这三个环节中，发展进步势力是中心的一环，基本的一环。因为只有进步势力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础和依靠。进步势力不发展、不壮大，就不可能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反对顽固势力，也就谈不上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毛泽东说：

"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从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②

毛泽东认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革命的基本力量，这从来就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进步势力是夺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没有这个基本保证，就无法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更无法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所以要把发展进步势力放在最重要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置。那么，怎样发展进步势力呢？毛泽东说：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革命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果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就无从发展。”①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有效地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坚持了抗战，坚持了团结，坚持了进步，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坚持了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的方针，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毛泽东同时还认为，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党内犯右倾错误的实质，就在于他们根本不懂得发展进步势力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相信国民党超过了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既没有孤立顽固势力，也没有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结果是进步势力得不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不到发展。

2．争取中间势力。

毛泽东认为，争取中间势力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争取中间势力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中间势力本身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争取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客观现实的迫切需要，极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什么是争取中间势力呢？毛泽东说：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达到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不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阶级有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①

毛泽东还认为，争取中间势力的极端重要性，不仅在于中间势力本身，而且还在于争取中间势力是同发展进步势力和孤立、反对顽固势力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去争取中间势力，或不能很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就不能有效地发展进步势力和孤立、反对顽固势力，因为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砝码。毛泽东说：

"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②

实践证明，不发展进步势力，固然谈不上有效地孤立顽固势力；但顽固势力是否有效地被孤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如何。顽固势力同进步势力从来就是根本对立的。顽固势力是否被孤立，不在于进步势力对它的态度如何，而在于中间势力对它的态度如何，当中间势力追随顽固势力的时候，就说明顽固势力还没有孤立。从这点上来说，争取了中间势力，就是孤立了顽固势力，也就是有效地发展了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首先是因为中间势力本身是复杂的。如前所述，中间势力有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由于利益不同，决定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对进步势力的态度不同。所以，我们在争取他们时，不同部分采取的政策也是有所不同的。毛泽东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6—7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①

争取中间势力之所以复杂，还因为顽固势力时时在与我们争夺中间势力。而中间势力又经常有靠拢顽固势力的可能。所以，在争取中间势力时，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而积极的态度。

为了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严格执行“三三制”，给中间势力以1/3的席位，从组织上把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的营垒中来。众所周知，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无论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参加。毛泽东特别重视抗日民主政权中的各方代表构成，给中间势力留出了1/3的席位，以表示我们争取、改造他们的诚意。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势力各占1/3。规定这样的比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以有利于孤立顽固派。

与此同时，为了更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渐地扩大了中间势力的内涵。开始，毛泽东只把中间势力定位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上。到1941年，为团结更多的人，他把中间势力确定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部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各小党派、国民党军队中的黄埔毕业生等，这样，使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人数进一步扩大了，对于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毛泽东还认为，要争取中间势力，除了我们的政策正确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这样，才能达到争取中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势力的目的。那么，这些具体的条件是哪些呢？毛泽东说：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者变为顽固派向我们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在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①

3．反对顽固势力。

毛泽东认为，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抗日派，一部分是降日派。反对顽固派，就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抗日派”。至于对他们当中的降日派，我们的政策是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打倒他。

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为什么要批评和反对呢？因为这种势力具有两面性，即一面是抗日，一面是反共反人民。我们反对的正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毛泽东说：

“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②

针对顽固派的反革命两面性，毛泽东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团结其抗日的一面，并与其反共反人民的一面作坚决的斗争。

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反对顽固势力呢？毛泽东认为，顽固势力是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当权派，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极右翼。他们的本性是反共反人民的。他们对抗日战争是消极的，是经常企图妥协投降的，或者是以反共反人民作为他们对日妥协投降的条件准备。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顽固势力的这种反动性，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7—7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有阻力，内战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的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①

毛泽东还认为，反对顽固势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革命的两手，对付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政策，对付顽固派的反革命两手。如前面所述，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等顽固势力的政策愈来愈带有两面性，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要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②

四、打退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战略，在抗战时期运用得最为精彩的，是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通过坚持这一正确的政治战略，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来面目，又坚持了我们的正确立场，使蒋介石在我党的强烈反对和全国人民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对其反共政策不得不有所收敛，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

1．击退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方针及实践。

国民党顽固派迫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和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的压力，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坚持灭亡中国的政策，以及英美帝国主义出于自身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抵抗侵略，不得不赞同抗日。毛泽东正是抓住了这一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7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利的契机，采取又打又拉的正确的策略，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其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一旦国际国内条件发生某种变化，他们的本来面目就彻底暴露出来了。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实行了由打击为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为诱降为主，打击为辅的策略，特别是国民党蒋介石对日益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十分恐惧和害怕。于是，便改变了它的内外政策：从抗战开始时的比较积极抗战和注意国共两党团结，转而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从1939年开始，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动了三次大的反共高潮。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接着，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派兵封锁和包围陕甘宁边区；袭击抗日部队；逮捕、惨杀抗日将士等。并先后制造了枸邑事件、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到1939年冬和1940年春天，国民党的这种反共活动终于发展为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军事进攻，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

在陕甘宁的陇东、关中地区。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相继占领了我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县等5个县，还准备闪击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在边区的绥德、米脂地区，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组织了反革命的武装叛乱。

在山西，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多次召开反共的军事会议，在日寇的配合下，集中6个军的兵力，进攻由薄一波等领导的抗日决死队。

在晋冀鲁豫地区，蒋介石授意国民党军队石友三、朱怀冰部，在日军配合上，进攻我八路军，企图消灭我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我们党是早有警惕、早有准备的。毛泽东在1940年前后，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又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因此而破裂。

一是，明确确定了我们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总方针。即“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的总方针。毛泽东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①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了在反对顽固派反共高潮时，必须采取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毛泽东说：

“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分裂活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②

二是，通过不同方式和渠道，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向全国人民公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毛泽东从1939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起，到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公开掀起反共高潮，在党内外的公开刊物、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等一系列文章，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毛泽东说：

“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抗日，这是‘异党’么？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③

毛泽东还特别愤怒地指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1—59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4—5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6—5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喊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

毛泽东在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的种种罪恶阴谋的同时，还公布了我党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行径所持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说：

“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的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①

三是，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办法，用武装手段来教训敢于来犯之敌，以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气势汹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对策，多次警告国民党蒋介石不要忘乎所以，轻举妄动。在劝阻和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毛泽东立即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集中力量狠狠地教训敢于来犯之敌。在山西，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进行了坚决的还击；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奋起打击了来犯的朱怀冰部，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指示各部队，在狠狠地教训了来犯之敌之后，要适可而止，因为我们还击的目的，不是把他们推向日本帝国主义一边，而是要把他们拉回到抗日战线中。所以，在山西等地，我们在对卫立煌、阎锡山等部给予了一定的打击后，立即从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磨擦。这样，既符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又给予了顽固势力以应有的打击，挫败了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妥协、反共分裂、反动倒退的阴谋，促使时局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正确处理“皖南事变”：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人民的有力还击下，损兵折将，遭到严重的失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国民党见我党在华中的力量较为薄弱，便逐渐将反共磨擦的重点，由华北转到了华中。1940年7月，国民党向我党提出一个“提示案”，要求将我在华中和江南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调到黄河以北；10月，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发动了抢占黄桥的战役，被我新四军击退；10月19日，蒋介石竟指使其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反诬我们党破坏团结与抗日，强令我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同时，蒋介石还密令当地的国民党军队积极准备围歼我军。这样，标志着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1940年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奉蒋介石之命发表“齐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底以前“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并规定了新四军的行军路线。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在顾祝同的指挥下，于皖南集结重兵，准备围歼新四军主力。而当时的我党负责华中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由于忠实地执行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对国民党的阴谋毫无准备，根本不相信国民党顽固派会袭击新四军。1941年1月，项英命令我新四军军部及主力9000余人，按照国民党顽固派规定的路线，选择了由泾县往南，经宁国、广德、郎溪，绕道天目山脚，进入苏南，然后渡江的路线。1月7日当部队进至安徽茂林地区时，即遭到国民党事先埋伏的7万多军队的包围袭击。此时，项英仍不主张突围，还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幻想，以为经过与国民党谈判可以解决问题。最后，我军经过苦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军9000余人，除2000余人突围出去外，其余的或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也被国民党抓住，开始长达5年的牢狱生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在其阴谋得逞后，竟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公然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至此，由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电”开始的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展到顶点。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既争取中间势力，又孤立顽固派的目的，毛泽东从政治战略的高度，采取了如下原则立场。

一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前，毛泽东主张有原则的退让，并多次提醒全

党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并再次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毛泽东及时觉察到了其阴谋，于1940年5月就给中共中央东南局负责人写信，提醒他们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的突发事件，最早对东南局发出警告。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

“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目的，一方面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另一方面，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以求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要准备对付黑暗的局面。”①

此后不久，毛泽东又多次向党内发出指示，对蒋介石准备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要慎重处理，争取缓和，准备抵抗。毛泽东说：

在此种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二是，“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与国民党顽固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皖南事变”后，为了坚决击退国民党派的反共逆流，毛泽东采取了以下对策，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件事，宣布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削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反共企图，毛泽东在1941年1月20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庄严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进一步加强了新四军的领导力量。

第二件事：提出了处理这一事变的具体措施。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提出了中共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措施。毛泽东说：

“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①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队；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①

第三件事：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直接同蒋介石交涉，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1941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②

1 月 25 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说：

“人家已经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使蒋介石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处于步步设防的境地。这样，到 1941 年 3 月 14 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约见周恩来，对毛泽东提出的 12 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措施作了某些承诺。至此，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三是，认真总结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和教训，以继续而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为了维护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局面，毛泽东于 1941 年 3 月和 5 月，发表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章，总结了同国民顽固派作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说：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决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75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324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325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①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②

"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③"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④

很显然，毛泽东在处理"皖南事变"这一事件时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对于孤立国民党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同时，也教育了全党同志，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策水平和革命斗争的艺术性、策略性，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没有因此而破裂，而且随着斗争的深入而不断发展；使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3．提高警惕，针锋相对，遏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以后，蒋介石在英、美的拉拢下，自以为身价百倍，可以任意摆布中国人民。于是，开始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除密令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外，还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借助"平等新约"，作出以下的妄断："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在内政"。蒋介石的所谓"内政"，就是反共反人民。蒋介石在这本书中，还伪造、篡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他自己叛变革命的历史，公开贩卖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并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诬蔑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从而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共产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一决定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后，使国民党蒋介石乘机加快了反共内战的步骤，加快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步伐：1943年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托派汉奸张涤非在蒋介石的授意和国民党特务总队部军统和中统的指令下，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座谈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打电报给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将中国共产党也“解散”，并“取消边区割据”。6月18日，胡宗南又奉蒋介石之命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撤退对付日军的河防主力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大军，沿宜川、洛川、宜君、耀县、淳化、平凉、固原之线行动，准备“闪击延安”，“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7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又炮击我陕甘宁关中分区。至此，蒋介石开始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毛泽东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积极撰文，充分揭露反共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1943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质问国民党》一文，揭露了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和种种罪行。毛泽东说：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难道在你们看来，一切这些反革命的东西，都是完好无缺，十全十美，唯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破产’干净了么？”①

“老实说吧，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子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敌人汉奸要解散新四军，你们要散解新四军；敌人汉奸要解散共产党，你们也要解散共产党；敌人汉奸要取消边区，你们也要取消边区；敌人汉奸不希望你们保卫河防，你们就丢弃河防；敌人汉奸攻打边区……，你们也想攻打边区；敌人汉奸反共，你们也反共；……你们的这样许多言论行动，既然和敌人汉奸的所有这些言论行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②

另一方面，毛泽东领导在延安举行了三万人的群众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并动员边区人民积极备战，提高警惕，随时准备严惩那些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8页，908—90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8页，908—90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敢于进犯边区的顽固派。由于我们迅速进入战斗准备，国民党反共军队无机可乘，特别是广泛的抗议运动，动员了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以及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表示不满；苏联以及英、美也都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暂时停止了它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第八章

重庆谈判：毛泽东“谈笑凯歌还”

重庆谈判是毛泽东政治战略中最得意的一笔。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以他的大智大勇，巧与蒋介石唇枪舌战，不但揭穿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而且以实际行动教育了广大人民和爱好和平的民主志士。事实上，这是吹响了埋葬蒋家王朝的前奏曲。在长达43天的“和谈”中，波折迭起，惊心动魄。毛泽东用他那不朽神笔，描绘出了一幅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精彩夺目的画卷。

一、蒋介石出难题：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占抗战的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阴谋发动内战，企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是，由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压力，以及当时的国际条件不容许蒋介石轻易发动内战。于是，蒋介石经过同美帝国主义的密谋策划，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采取了“假和谈、真内战”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妄图迫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范。对此，毛泽东洞察秋毫，采取了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策略方针，挫败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

1．毛泽东早就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美蒋反动派的阴谋，毛泽东早就觉察到了，并及时提出了在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党应采取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方针。1945年8月1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两天，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深刻地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基本形势，揭露了蒋介石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的企图，阐述了我党的立场和应付紧急情况的措施。毛泽东说：

“从整个形势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

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①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②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③

事实也是如此，当抗日战争胜利快到来时，国际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从国际看，美帝国主义早在抗战期间就以抗日为名，给蒋介石大量的金钱、物质，装备国民党部队；抗战后期，他们又是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又是为国民党军队派军事顾问，明目张胆地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抗战刚胜利，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就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向中国战区的日军下达命令，只许向蒋介石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投降。从国内看，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来面目，早就暴露无遗。1945 年 8 月 11 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了三道命令：第一道是要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第二道是要国民军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第三道是要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对原来的汉奸大加委任；侵华日军冈村宁次也向蒋介石表示，绝对保证将日军控制的地区移交给蒋介石。这样，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上演出了一曲曲蒋、日、伪合流的丑剧。

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力，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如果蒋介石胆敢下山来摘“桃子”，抢占胜利果实，我们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的话，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同他决战到底。

2．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30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26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34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蒋介石虽然对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虎视眈眈，也想尽收囊中而后快。但是，由于当时许多的制约因素，使得他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立即发动内战。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有：第一，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有1亿人民、100万军队和200万民兵武装；第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战呼声，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呼吁民主统一与和平建国；第三，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上层人物也不赞成内战，如张治中等；第四，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远在西南、西北等抗日的大后方，一时难以将大量的兵力调到打内战的华东、华北及东北前线；第五，从国际上看，美、英、苏三个大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都表示不愿中国发生内战。

基于以上诸种因素，蒋介石不得不摆出一副“和平谈判”的样子。在他与他的美国主子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和平的“喜剧”便登场了。从1945年8月14日到23日，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续三次给延安发报，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大问题”。

8月14日，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客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八月十四日”①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虚晃一枪，避虚就实地于8月16日回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委等编《重庆谈判纪实》，第21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你表示意见后，我特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八月十六日"①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造成了蒋介石的错觉，他以为毛泽东不会、也不致赴渝谈判。于是，在8月20日，又给毛泽东发了第二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以受降办法系同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给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之信守。朱德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以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救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安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驾

八月二十日"②

为了继续给蒋介石造成错觉，但又能体现我党的和平、民主诚意，毛泽东在两天后复电蒋介石，同意派周恩来赴渝谈判。电报云：

---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委等编《重庆谈判纪实》，第22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②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委等编《重庆谈判纪实》，第23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八月二十二日延安"①

接此电后，蒋介石有些得意了。他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到重庆。于是，便决定假戏真做到底了。8月23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三封邀请电：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前，时机迫切，仍盼望先生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候。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八月二十三日"②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咄咄逼人，大有非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不可，足见"和谈"之心"至诚"、"至深"。其实，这是蒋介石玩弄的一个大阴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第一，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谈判，不要和平，从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身上。这样，我蒋介石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内战、摘取抗战胜利果实了。第二，如果毛泽东敢来重庆谈判，我蒋介石可以利用在重庆天时、地利之便利条件，迫使毛泽东和共产党交出军队。否则，叫你来得回不得。第三，还可以利用和谈之机来麻痹共产党，欺骗民众，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调兵遣将，为我蒋介石打内战作准备。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委等编《重庆谈判纪实》，第24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②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委等编《重庆谈判纪实》，第36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得意忘形的蒋介石，只想到如何算计毛泽东和共产党，根本没有考虑怎样与毛泽东、共产党谈判。然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毛泽东最后作了赴渝谈判的决策。

3．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出赴渝谈判的重大决定。

对于蒋介石和谈的“诚意”，毛泽东洞若观火。他本想置之不理，但考虑到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考虑到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并在谈判过程中戳穿美蒋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反革命伎俩，以团结和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决定赴重庆谈判，会会蒋介石的“鸿门宴”，究竟看其玩的是什么把戏。为使和谈更有准备，牢牢掌握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权，毛泽东于1945年8月23日，即接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电的当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彭德怀、林伯渠、张闻天、高岗、康生等12人；另有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同志37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

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围坐在一起，讨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特别在去与不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不去，就会授之以柄，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去，毛泽东主席的安全又有没有保障？对此，朱德端坐默然，刘少奇一言不语，周恩来踱步沉思……在这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关键时刻，同志们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毛泽东身上。毛泽东一支接一支抽着延安生产的烟，一边思考着战友们刚才的意见。最后，他大手一挥，作出了历史性的英明选择：去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说：

“经过听取大家讨论的意见，我认为必须去重庆谈判。因此，我决定：我与恩来去重庆，会会我们的蒋委员长，看他自己怎么下台。我们这次去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目的是击破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尽一切可能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并尽力阻止和推迟内战的爆发。对于蒋介石，我们不要抱多大的幻想。我们在与其谈判中，也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以局部让步，换取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更为严峻的形势。同时，还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这个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反动家伙，总是要打内战的，所以，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国民党蒋介石胆敢发动内战，我党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我和恩来去重庆期间，由少奇同志负责延安的一切工作。

恩来，明天就给重庆的蒋委员长发报，我毛泽东8月28日准时赴渝”。①

接着，在8月26日，毛泽东就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问题，专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毛泽东说：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岸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依然是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很大。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区的数量，并不许发放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②

当时，党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毛泽东去重庆不放心，主要是担心毛泽东的人身安全。

有的同志说：“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这一定是个大阴谋，毛主席不能去！”

有的同志说：“顶多让周副主席去就行了。”

也有的同志说：“现在这种形势，周副主席也不要去！”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更是焦急，直接给党中央发报：“请毛主席不要来重庆！”

对于同志们的担心，毛泽东是理解的。他也深深地感谢同志们的关心，但到重庆谈判又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毛泽东向同志们解释说：

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不要怕，我与周副主席去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是不会有危险的。因为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有广大国际舆论的同情，蒋介石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中央对此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请大家放心好了。

一个关系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大决策，就这样决定了。

---

① 参见毛岸青、邵华主编《雾都较量》，第1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4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二、戳穿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慨然赴山城

1．蒋介石慌了手脚。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第三天，即8月24日，毛泽东立即给蒋介石拍发赴渝谈判的电报：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至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二十四日”①

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要员即将来渝和谈的电报后，蒋介石一下子慌了手脚。因为他本来估计毛泽东不会到重庆，才一再邀请的，结果是弄假成真了。于是，在匆忙之中，蒋介石立即召集有关人士会议，部署毛泽东到重庆后的有关事宜。主要做两方面的准备：

一方面，蒋介石安排空军去延安接毛泽东等人，并要张治中随同前往。当时的美国大使赫尔利，也要求专程赴延安迎接毛泽东。于是，蒋介石于8月27日凌晨，第四次致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敬电诵倾复。闻先生可偕周恩来先生同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偕同赫尔利将军，于明日乘专机来延迎驾，特先生电闻。

蒋中正宥邀

八月二十七日晨”②

---

①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② 转引自毛岸青、邵华主编《雾都较量》，第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4月版。

另一方面，蒋介石于慌忙之中召集他的智囊团，研究毛泽东到渝后的对策，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毛泽东到渝后的住地；二是毛泽东在渝的保卫工作；三是毛泽东在渝期间能与哪些人会面，不能与哪些人会面；四是谈判的主要内容以及要达到的目的。由于时间太仓促，再加上蒋介石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这样，研究了两天，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只对毛泽东到渝后的住地、保卫工作等事项作了初步安排。

与此相反，毛泽东早在延安时就和党中央就此次谈判的条件、目的、内容等，作了详细的研究，并拟就了几大应急措施。临行前，毛泽东又专门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并要他转告同志们：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失败了，我和恩来的安全就成了问题了。我军的胜利越大，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要知道，我们这位蒋委员长先生只认识拳头，不认识礼让。

2．毛泽东飞抵山城。

1945年8月27日下午3时，赫尔利和张治中乘蒋介石派出迎接毛泽东的飞机到达延安机场。当晚，延安举行了欢迎舞会，欢迎美国和蒋介石的特使。8月28日上午，代表团成员正式登机。代表团主要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另外有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负责警卫工作的陈龙、贴身勤务员齐吉树，周恩来的警卫员颜太龙和王若飞的警卫员魏万吉。

毛泽东是最后一个登机的。在机场上：毛泽东没有发表讲话，甚至没有过多的言语，据当时参加送行的《解放日报》社记者方纪看到的情景称：主席站在飞机舱口，用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用宽大的手掌握住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慢慢地举起，举起，然后用力一挥，停在空中……

在重庆，当人们得知毛泽东将飞抵山城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的消息后，整个山城沸腾了，人们沉浸在无限喜悦之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社会舆论同声期望国共会谈成功。8月28日午后，欢迎毛泽东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重庆九龙坡机场。欢迎队伍中有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沈均儒、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等；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方面有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谭平山等；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下午3时40分，中共谈判代表团

乘坐的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安全着陆。毛泽东第一个走下飞机。毛泽东神采奕奕，满面春风，边走下飞机舷梯，边手拿盔式帽，潇洒地挥动着右臂，面带笑意地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在飞机前，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向在场的记者散发了书面讲话。毛泽东在书面讲话中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①

随后，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下榻在蒋介石为他安排的住处：“林园”，即重庆西郊25公里处的歌乐山——原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

3.“毛泽东热”在山城悄然兴起。

“毛泽东来了!”毛泽东到重庆了!”

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其对手蒋介石谈判，震惊全国，惊动全世界。特别是重庆舆论界的推波助浪，倾刻在山城兴起了一股“毛泽东热”。

我党在重庆的喉舌——《新华日报》，于毛泽东到渝的当天下午就发表了“毛泽东抵重庆”的号外。一时间，雾都山城随着报童们不绝于耳的叫卖声，《新华日报》很快就被人们抢购一空。第二天，重庆几乎所有的大小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社论、社评、消息，热情洋溢地称赞毛泽东到重庆的壮举：

《大公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称赞道：

“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先生与蒋介石一旦握手，真一幕空前大团圆!”

《华西晚报》也尖锐地说：

“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是造成国共两党领袖直接谈判的国内情势。面领导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密团结和广泛合作，则是造成我国共两党领袖直接谈判的国际情势。在此情势下，如果对中国命运应负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下册，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重大责任的国民党确具结束一党专政与在野党派团结合作的诚意，毛泽东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新民报》的社评也明确地说：

“目前两个最大的政党应该对国民负有特别的责任。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假如这次的商谈再无结果，那就是两党共同的失败。……我们固然还不能判断这次谈判的具体结果将是怎样，但可以相信，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好坏的影响。‘良时不再至’，日本投降，战争结果，我们全国人民不能不迫切期待在这个良好的时机中，见到我们的国家能够在团结统一方面迈步前进。”

由于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山城的民主力量，平民百姓，到处在传诵着毛泽东的名字。他们将毛泽东到重庆视为和平到来的先兆。饱经战乱摧残的中国人民，把和平的“砝码”，全压在了毛泽东身上。那几天，光《新华日报》就收到了上千封热情洋溢的群众来信。重庆纱厂的5名女工，在请《新华日报》转交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亲爱的毛泽东——我们人民的领袖：

“听到您到了重庆的消息后，我们真高兴得不晓得怎样才好，大声地欢叫吧，别人会干涉我们的。关在心里头不讲吧，又觉得闷得不好过，我们只好悄悄地躲在宿舍里，几个人面对面地傻笑一阵！

“毛先生，您觉得我们太幼稚好笑吧？请您不要笑我们，好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老是被别人当牛马看待，一点起码的自由也没有。我们老是想我们不能这样永远过下去，我们会遇到救星的。从报纸上，从许多朋友的口中，我们晓得中国人有一个大救星，这个大救星就是您。我们欢迎您来，我们拥护您提出的主张。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希望。”

这是劳动人民朴素的阶级感情的流露。还有一位叫王文英的人给报社的编辑写信。他是这样赞颂毛泽东的：

“毛先生是最体贴老百姓的疾苦的，听说毛先生定了一条规矩，只要军队和老百姓闹纠纷，一定先责备军队，可不是吗？天地间只有带枪的人欺侮没有枪的人，这样替老百姓着想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人民的疾苦。咱们相信毛先生一定能替老百姓争取到和平。”

重庆的一对普通夫妇，用“一个家庭两个人”署名，写信请《新华日报》转达他们对毛泽东的敬意。信中写道：

“我们既非党员又非无产阶级，可算是小康之家，也就是因为这点，才足以说明爱戴他的人，除上列人类外，还有我们这一类人！”

“我们认为只要他还活着，中国就总有完成人民愿望的一天！”

“这封信如果不妨碍你们的篇幅，我们希望能够公布，因为我们想，有如是用意的人不会只有我们几个人，也许还有相同的人更有如是举动。”

情真意切，一封封来信，一份份报纸，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谈判的热切期望。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自早晨到深夜，本来就很拥挤的山城雾都街头，交通秩序更加混乱，使得指挥交通的警察更难以应付。

毛泽东的到来，使整个重庆为之改观，不只是在表面上，面且在人民的心里，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原来一些贴着“禁止谈论国事”的茶馆饭店，一时间到处荡漾着人们高谈阔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声浪。平时从不看报纸的人，现在到单位上班，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报纸。而且一打开报纸就找到刊有毛泽东消息的地方，不论刊登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占版面的多少，人们一眼就能找到，看了后就想，而且讨论。本来不太景气的重庆报业，自毛泽东到重庆后，竟变得一时红火起来。凡是刊有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内容的报刊，一上市就很快被人们争购一空。

在这段时间里，平民百姓们议论的只有一个话题：“这下团结了，中国也应该是有办法的时候了。”“毛泽东到了重庆，这下中国问题要解决了，人们要过太平日子了……”

刹那间，山城重庆，出现了空前的“毛泽东热”。

三、针锋相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唇枪舌剑巧周旋

毛泽东到重庆后，表面上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实际上是蒋介石设下一个个陷阱，企图逼毛泽东就范。而毛泽东则从大局出发，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坚持策略的灵活性，作出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挫败了国民党蒋介石一个又一个的阴谋。

1．蒋介石探访“林园”，毛泽东提出谈判的八项条件。

蒋介石尽管表面上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但从内心来说，他

又很不希望毛泽东赴渝。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毛泽东真的应邀到了重庆，而且是带着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救民主张而来的。这样，蒋介石不得不假心假意地应付毛泽东和中共谈判代表团，企图达到既蒙骗民众，又压服毛泽东的目的。不过，历史却与蒋介石开了个大玩笑，他自己打自己一个大嘴巴，因为谈判的结果，与他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毛泽东到达重庆后，按蒋介石的安排，下榻“林园”，距他与宋美龄的住处不远。8月29日清晨，即毛泽东到重庆后的第二天，林园内百鸟鸣啼，清香阵阵。毛泽东打破了在延安时的工作、生活习惯，早早就起床了。他正与警卫员齐吉树在住处门前散步，只见蒋介石从长满青苔的石阶拾级而上，向他们走来。

毛泽东与齐吉树立即迎去。彼此寒暄了几句后，便来到门前的石桌前，落坐于带有露水的石凳上。蒋介石身着黑色绸缎长衫，假惺惺地用兄长般的语气说：

润之先生，你怎样起得这样早？听说你有晚上办公早上睡觉的习惯，为什么改变了生活规律呢？是不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呀！

毛泽东笑了笑，轻轻地挥了挥手说：习惯，习惯。岁月如流水，常言道：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不知委员长你有不有这个体会？

蒋介石吱吱唔唔，答非所问地回答说：嗯，嗯。润之来这天府之国的雾都有何感觉？四川是个好地方，土地肥沃得很呢！林森老先生生前对我说，他十分钟情于这里，所以，前年政府为他举行了奉安典礼后，才将先生的梓棺由官邸大礼堂迁入墓中。润之如有兴趣，改天我可陪你去林老先生墓看看……

毛泽东见蒋介石有意绕开话题，便接着蒋介石的话，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毛泽东说：

小弟不敢有劳委员长大驾陪同，改日，我是要拜谒林主席之墓。林老先生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对日态度强硬，力主抗战，深受国人爱戴。所以，林主席去世时，我们曾发了“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溘然闻逝，痛悼同深”的唁电，以示对林主席的崇敬。委员长，现在全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你却要“国军”接连不断地向我解放区进攻，导致内战不断，对这种不利于国家、民族和破坏谈判的行为，大概与林老先生倡导的不相一致吧！

蒋介石被毛泽东一语中的，而显尴尬地回答：

润之言重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要你来重庆，就是商讨建国大计，怎么会下令部队讨伐呢？你说中国仍有内战，实是夸大其辞，更不有利于我们将要进

行的和谈吧！毛泽东听后，毫不留情地回答说：

委员长，要说中国没有内战，恐怕是自欺欺人吧！就在我从延安到重庆之前，我们许多解放区常有国军‘光临’呢！当然，我希望委员长说没有内战是真的。

蒋介石很不自然地笑着点了点头。

毛泽东乘机向蒋介石提出了这次国共两党谈判的八条意见：

委员长，为了真正在中国消灭内战，使这次谈判取得成功，我已与恩来商量过，必须坚持以下八条：第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后，应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第二，如国民党坚持旧国大代表有效，中共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第三，应给人民自由，现行法令应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第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第五，释放政治犯；第六，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权；第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中共将领导主持北平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第八，中共应参加部分区域受降。

听着听着，蒋介石的脸色骤然变成铁青色。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完了毛泽东的几条建议。也许是给今后的谈判制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蒋介石最后只得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苦笑着说：

哈哈，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那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这次来的胃口啊！

毛泽东也意味深长地说：“委员长，这不是我的胃口大，而是人民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你我都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啊！”

2．以谈对谈——毛泽东说：绝不能让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便宜。

43天的谈判，是一场复杂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泽东将与国民党具体谈判的事宜交给周恩来、王若飞二人，并向他们交待了这次谈判的根本原则。毛泽东说：

这次你们与国民党在具体谈判时，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个目的。两条原则是：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目的是努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根据这些原则和目的，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绝不能放弃原则，更不能让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便宜！

蒋介石在选择谈判代表时，也是颇费心思的。他选择了他的亲信张群、王世杰和与共产党素有交情的张治中、邵力子作为首席代表，这样，既有利于维护他的利益，又让你中共代表团难以脱情面。尽管蒋介石对要谈的有关事宜毫

无准备，但他对参与谈判的代表规定了三条不可逾越的原则，这就是：（1）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以外来谈改组政府的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实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必须以此为中心。

由于蒋介石的这三道紧箍咒，才使得整个谈判举步维艰，进展很慢，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态势。

为表示中共和谈的诚意，不使谈判因此而搁浅，毛泽东指示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把已向国民党作妥协让步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付国民党代表团，并请转告蒋介石。这十一项方案是：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一党独裁过程中，必须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讨论事项如下：1. 和平建国大计；2. 民主实施纲领；3. 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4. 重选国民大会；5. 复员善后问题。（二）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三）解放区解决办法：1. 陕甘宁边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2. 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3. 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4. 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四）实施善后紧急救济。十、军队国家之必要办法：（一）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师；（二）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三）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四）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五）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担任；（六）安置编余官佐；（七）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八）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九）确定政治教育制度。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一）释放政治犯；（二）保障各项自由，取消特务机关（中统军统等）。”①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卷，第155页。

看过由毛泽东提出的谈判方案后，蒋介石火冒三丈，竟横蛮地全盘予以否定。就这样，国共双方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毛泽东在重庆一呆就是43天。在这43天里，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8次直接会谈：8月29日，初次会谈；9月2日，第二次会谈，议题是中共军队问题；9月4日，第三次会谈，议题为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代表等问题；9月12日，第四次会谈，议题是军队整编数目问题；9月17日，第五次会谈，议题是军事问题；9月29日，第六次会谈，议题是国共两党合作问题；10月1日，第七次会谈，议题是解放区问题；10月11日，第八次会谈，议题是解放区问题。与此同时，以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团，先后商谈了23次，可真谓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在这一系列的会谈中，国共双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是关于军队问题的争论。蒋介石为了达到在谈判中削弱人民武装的目的，只允许100多万的人民军队整编为12个师，企图削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80%。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与蒋介石作了坚决的斗争。一开始，双方都不让步，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最后，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促使尽快达成协议，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作了较大的让步，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意把原来向国民党提出的整编48师，减少为24师，以至20个师的数目。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这个建议。

二是在解放区问题上的争论。蒋介石要共产党完全交出解放区，归国民党政府管理，共产党只能到国民政府中去做官。蒋介石公然说：

“解放区的名词是在日本投降以前的称谓，现在已成为过去，不应再有解放区的称谓”。

蒋介石是企图以此来一笔勾销人民用血汗换来的抗战胜利果实。毛泽东则对此作了坚决的斗争，认为这已是现实，国民党政府应当正视、承认这种现实，即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最后，还是中共作出了让步，在不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即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等。并决定将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省区的解放区让出来。毛泽东这种顾全大局、以忍为上的精神和让步措施，不但得到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由衷钦佩和热烈赞同，而且粉碎了国民党舆论工具制造的“共产党只要地盘，争枪杆子”的中伤和诽谤。

三是关于政治问题的争论。毛泽东曾约请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到他住的地方，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全国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地位，并强调指出："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同时，毛泽东还要求释放政治犯，放弃国民党一党独裁，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对毛泽东的此项建议，蒋介石表面应承，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而且就在谈判期间，他们还秘密处死了一批"政治犯"。

四是关于国民代表大会问题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一开始就采取不合作态度，坚持要承认旧有代表继续有效。中共谈判代表团开始主张重新选举，后来考虑到过多地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会影响团结，所以最后声明：这个问题"留后商议，不愿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在政治代表名额上，本来确定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9个名额。然而，国民党故意作梗，鼓动民盟之内的青年党要5个名额，而且作为独立单位参加，企图把水搅浊。几经斗争，未达成一致。最后，为打开僵局，中共代表团提出，民盟仍9个名额，青年党5个名额的解决办法是：代表总数中增加2个，中共让出2个，国民党让出1个。这样，既使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又使国民党的阴谋暴露于天下。

3．以打对打——毛泽东说：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同样不能让他得到。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一方面玩弄"和谈"的骗术，阴谋在重庆逼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就范；另一方面，则拣起他惯用的反共、内战的"法宝"，企图用武力来对参加"和谈"的毛泽东施加压力。本来早在8月中旬，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军队南下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毛泽东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当面与毛泽东握手，暗地里又密令军政部将他在十年内战期间编写的所谓《剿共手本》重新印发，在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9月初，为了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施加压力，捞取在谈判桌上捞不到的东西，蒋介石公然下令阎锡山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向晋东南解放区发动进攻，以主力占据同蒲路，一部侵入上党地区，企图迫使毛泽东在谈判桌上就范。这就是历史上的"上党战役"。

上党战役是以9月2日阎锡山大举进兵襄垣城、进攻解放区开始的。我军担负这次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刘伯承、邓小平，在敌人进攻之前，立即向中央军委和在重庆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即对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说:

蒋介石历来就是这样,他来进攻,你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他就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我们要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坚决给予狠狠地打击。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决不能让他在战场上得到。立即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同意他们的作战方案,并转告他们,一定要狠狠地打,打得越狠越好。看来蒋介石是不会在谈判桌上服输的!

这样,重庆谈判刚刚开始,阎锡山就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面授意汉奸、伪军照常维持社会治安,一面派出以搞反共磨擦而闻名的史泽波为先锋,指挥所属十九路军的1万多人,向我解放区进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我八路军向阎锡山的史泽波部发起还击,并分头对长治市外围的所有敌占区发起进攻,不断缩小对长治的包围。从9月2日到9月30日,上党战役大战1个月,我军连克5城,把长治周围的县城从蒋、阎、日、伪的蹂躏下解放出来,一举歼灭了进犯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队的11个师的主力和一个挺进纵队,共35000余人。不可一世的史泽波也被活捉,成为阶下囚。蒋介石原想利用军事冒险来扭转政治局面,结果是走向反面,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件事,在谈判桌上向国民党、蒋介石发起进攻。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严正声明:

"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不愿同国民党发生冲突,借以避免内战的触发。但是,国民党却勾结日伪残敌,向抗日军民发动猖狂进攻,并攻占了解放区许多城镇,这是不能容忍的。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和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希望当谈判正在进行中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不要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共产党宁愿撤退,而不愿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但对于敌伪军,各解放区军民必须坚决反击一切敢于人侵之敌,直到敌人缴械投降。"①

实际上,蒋介石对和谈是根本没有诚意的,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为他打内战作准备而已。9月20日,就在毛泽东揭露蒋介石指使阎锡山进犯解放区时,蒋介石还在毛泽东面前玩弄两面手法,一边说下面的人不听招呼,自己不知详

① 《毛泽东同志对各众杜记者发表谈话》,载延安《解放报》1945年9月14日.

情，一边又给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去密电，仍然称共产党为“奸党”。电云：

“目前与奸党谈判，仍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延拖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为彻底挫败蒋介石借和谈来争取时间，抢占东北战略要地的阴谋，毛泽东回电延安，作了明确的指示：要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军东北；为了赶路，赴东北部队可以不带武器，只要人到东北就会有武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派出10万主力部队和数万名干部挺进东北，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举动，直接而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把政治谈判与军事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的高超的政治战略艺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4．主子慌了手脚：美国大使赫尔利赤膊上阵。

美国主张国共和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蒋介石拖延时间，以便有充足时间作内战的准备。所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先是以和平使者的面目登台，到延安迎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继而在谈判中极力站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立场上，制造种种事端，寻找种种借口，企图配合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压服毛泽东和中共谈判代表团。当毛泽东等人以惊人的胆略和勇气，挫败了国民党、蒋介石一个又一个阴谋时，美国主子再也坐不住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更是恼羞成怒，赤膊上阵，公开干涉中国的内政了。

赫尔利早在1944年11月，就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到延安，并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他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然而，一回到重庆，赫尔利马上变卦了。这次谈判，赫尔利在离渝赴延安迎接毛泽东之前，也曾信誓旦旦地说：

“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甚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在此一争论上冲突因素之果多，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

重与信赖，此实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①

可是，当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后，赫尔利又马上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一味站在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说话，骄横霸道，盛气凌人。当其目的未能达到时，威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企图迫使毛泽东就范。这天，赫尔利在重庆蒋介石、宋美龄的避暑山庄——黄山官邸，会见了毛泽东。会见开始时，赫尔利以谈判调停人的身份，首先向毛泽东表明了美国政府愿意保持中国和平的“诚意”。但当涉及到具体问题时，赫尔利又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嘴脸，公开站到蒋介石、国民党一边。他用威逼的口气对毛泽东说：

你们应该和平，应该接受国民政府的收编，听从蒋总统的统一指挥。斯大林不是也只承认国民政府吗？他不是和蒋总统签订了《中苏友好合约》吗？

赫尔利对毛泽东的连续几句反问，显然是为蒋介石说话、撑腰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先得到了苏联和斯大林的默许的。应该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起了作用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也是很大的，但在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支持谁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至少是暧昧的。赫尔利在出使中国前，曾专程访问过苏联，拜见了斯大林，并得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的保证，所以，赫尔利才敢如此大放厥词。

毛泽东早已看不惯赫尔利那一套。但出于外交上的缘故，没有立即反驳他。赫尔利以为毛泽东被吓住了，便得寸进尺地说：

毛先生，假如你们归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里去做官，共议和平建国大计，我们就可以给你们武器。如果你们不听劝告，那么，我们美国则不支持你们，对你们不客气！这将在美国引起对中共的不利反应，对你们不利！

赫尔利咄咄逼人，俨然救世主一样。毛泽东越听越不是滋味，越听气越往上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毛泽东气愤地站起来，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赫尔利进行反驳。毛泽东说：

大使先生，要知道，捆住手脚的官是不好做的，我们只好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脚，自由自在地去做，这就是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你们美国人有的是飞机、大炮、黄油、面包，你们就尽管留着自己吃吧！你们吃

① 载重庆《中央时报》，1945年8月28日。

饱了，喝够了，睡足了，要给蒋介石撑腰，要骂人，由你们去。你们美国人要干什么，那是你们的自由，我们不干涉，因为你们美国人不是从来就标榜‘自由’的吗？但有一点我也要告诉大使先生，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武装，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要撑蒋委员长的腰，愿撑多久撑多久，悉听尊便。我毛泽东不同于蒋委员长，不需要什么人来撑腰，我们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我们自己的路。我还请大使先生记住一条：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绝不是哪个人的中国，当然也不是委员长一个人的！总有一天，这个腰你们会撑不下去的，中国人的事还是要自己去办！①

其实，毛泽东事先也知道“老大哥”斯大林对美国和蒋介石间有过承诺：苏联只承认国民政府，只援助国民政府。延安、新疆必须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但毛泽东在人民和民族利益上是绝不会让步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正是这种倔犟的性格，驱使毛泽东面对赫尔利的威吓，说出了上述痛快淋漓的一番话，把不可一世的美国大使反驳得哑口无言。最后，只得歇斯底里地对毛泽东下了最后通牒：

毛先生，根据我的经验，你们不要企图解决太多的问题。……如果你们对和谈有所松动的话，鄙人回国述职时，将向国会陈述毛先生的意见。

对于赫尔利的威胁，毛泽东不屑一顾，随口答道：

大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并不拒绝，向国会陈述，也是你们的自由！

赫尔利虽是“中国通”，但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共与国民党争端的历史，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当然更不了解毛泽东的为人和性格。他回美国述职时，向国会作了违反事实的陈述。美国国会因此而作出了出钱、武器，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抉择。赫尔利和美国的这种为虎作伥的政策，不但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遭到美国朝野许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美国人民的反对。也正是这个原因，在1945年11月，这位缺乏政治斗争艺术的所谓外交家，在美国人民和国会中一些人的一片谴责声中，不得不引咎辞职，从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

对于美国大使赫尔利的威逼，毛泽东并没有屈服。蒋介石企图打美国牌，利用美国政府压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企图，也因此破产。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四、因势利导：毛泽东渝州广交朋友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利用谈判的空隙时间，广泛拜访和会见社会各界的新朋老友，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主张。他无论住在林园，或是后来搬到桂园和红岩新村，经常和社会各界、民主党派人士，甚至包括国民党右派进行接触。

1．毛泽东两路口拜见宋庆龄。

对于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宋庆龄，毛泽东一向非常崇敬。1945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 3 天，便驱车前往重庆两路口新村，专程拜会了宋庆龄。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她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后，与其作了坚决的斗争。无论是在集会上演讲，或是在报刊上撰文，宋庆龄都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这个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学生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由于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又是他的爱妻宋美龄的胞姐，所以，蒋介石既恨她，却又奈何不得她。

毛泽东与宋庆龄见面后，宋庆龄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中共谈判代表团不顾自己的安危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是一大壮举，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幸事，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是真正主张和平、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的。毛泽东也称赞了宋庆龄几十年一直坚持革命、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不怕任何威胁和恐吓的革命气魄与胆略。毛泽东说：

先生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了坚决的斗争。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安危，献身于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其高尚气节实是可敬可佩。

宋庆龄感谢毛泽东和中共对自己的高度评价，并表示要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毛泽东一再向宋庆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她的敬意，感谢她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宋庆龄感谢毛泽东的关心和信任外，还诚挚地向毛泽东表达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良好祝愿。

后来，毛泽东又专门宴请了宋庆龄，并先后三次拜见她，与其共商建国大计。

2．毛泽东三顾特园，专程探访民盟领袖张澜。

毛泽东在重庆的活动中，与张澜的会晤是较多的。除了在大众场合见面外，毛泽东还亲自三顾特园，与张澜促膝长谈，共同探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真正体现出了一种民主和谐的气氛，令张澜及所有的民主人士感动不已。

第一次，毛泽东亲临特园，拜见张澜及夫人鲜英。毛泽东到重庆后，先住在蒋介石为其安排的林园。三天后，即8月30日，便搬至曾家岩张治中先生公馆——桂园。这天上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恩来，这次到重庆，很想与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交朋友，特别是民盟领袖张澜，就是张表佬先生详谈详谈。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有见地的，而且与我们党的主张也比较接近，应该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前日在机场，由于人多，只匆匆地见了一面，来不及深谈。我想今天下午到特园，拜访张表佬，并请谈谈如何建国的问题。请您去安排一下好吗?①

周恩来与张澜是老朋友了，在重庆更是经常出入特园。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立即驱车到特园，告张澜及夫人鲜英：下午，毛泽东将到特园造访。

张澜夫妇一听，忙对周恩来说：恩来，润之先生操心国事，极尽辛苦，应当在他方便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他才是，不应劳他过访。②

周恩来忙说：表佬，我看您就别谦让了，主席的意思是他亲自来。但是，您家的隔壁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巢穴，所以，请你们不要对外人讲毛泽东要来，也不必在门口迎候，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而节外生枝。③

说完，周恩来又同张澜共同商定：将会见的地点设在张澜的卧室。

8月3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准时到达特园。

一见面，毛泽东便向张澜转达了朱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

张澜知道毛泽东赴渝，是为了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但考虑到重庆的现状和蒋介石的秉性，仍有所不安地对毛泽东说：

润之啊，和谈明显是蒋介石演的假戏，重庆到处布满杀机，我们都为你的

① 参见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
② 参见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
③ 参见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

安全担心，国共两党要谈判，你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就行了，何必自己亲自来？这里不安全啊！①

随后，张澜又对毛泽东说："蒋介石演的是鸿门宴。他是个不讲信义的小人，前几年，我曾对他说；'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当时，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实行民主！'现在国际形势一变，他居然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②

毛泽东一听，也风趣地对张澜说：

是啊，民主也成了蒋介石嘴里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也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看真假，分出是非，这样，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③

张澜这才真正领悟到毛泽东此次来重庆的良苦用心，忙说："润之啊，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可是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福呀！"

接着，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对这次谈判的立场和主张向张澜作了阐释，并着重介绍了8月25日中共中央为这次谈判而作出的《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说：

表佬，对这次和谈，我们党是作了认真准备的。本月25日，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六项紧急措施，主要包括：①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②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③严惩汉奸，解散伪军；④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⑤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⑥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表佬啊，目前摆在我们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我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④

毛泽东与张澜越谈越投机。两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直到警卫员进来告知张治中为毛主席举行的晚宴时间将到，俩人才结束了第一次会谈。

①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误判纪实》书，重庆出版社出版。
②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误判纪实》书，重庆出版社出版。
③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误判纪实》书，重庆出版社出版。
④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误判纪实》书，重庆出版社出版。

第二次：张澜夫妇设家宴宴请毛泽东及中共谈判代表团。9月22日，张澜夫妇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的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谈判代表。沈均儒、黄炎培、张申府、左舜生等也出席了这次家宴。

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①

席间，作为主人之一的鲜英，向毛泽东献上了家里最好的枣子酒。张澜首先举杯向毛泽东敬酒，并说：“会须一饮三百杯。”

才思敏捷、知识渊博的毛泽东，立即以陶靖节的“饮酒”诗相邀赴宴会的所有朋友：“且共欢此饮。”

在宴会上，大家都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担心。沈钧儒先生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润之先生，蒋介石是一个骗子，他对这次国共和谈是没有诚意的。你要注意安全，要提高警惕，早作打算。”②

毛泽东听了沈钧儒那发自肺腑的话后，感激地向大家举杯说：

“谢谢诸位朋友的关心。不管他蒋介石是怎么想的，我们共产党人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开始感到没有什么把握，这可以理解。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共产党有诚意，说明事情已有一半把握，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③

宴毕，鲜英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挥笔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启迪在座诸公：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第三次：毛泽东再次造访特园，张澜向毛泽东献策。9月25日，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的心情不佳。这天下午，毛泽东再次到特园，拜访张澜。首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和谈的近况。毛泽东说：

“此次和谈虽不顺利，但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项，都已有了眉目，并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还在继续磋商。目前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解放区人民政权同人民军队的问题，蒋介石说这个问题‘根

①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
②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
③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

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背道而驰'，妄想取消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从而使和谈陷于停顿。现在蒋介石又阳奉阴违，明里与我们谈判，暗地里却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向我解放区前线进兵，为内战作准备。"①

听了毛泽东关于国共和谈情况的介绍后，张澜立即向毛泽东建议：

"润之，现在是你们国共双方关起门来谈判。谈得怎样，结果如何，国人一无所知。我看还是将真相公开出去为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谁是真心诚意，谁是假心假意，免得蒋介石到时候又不认帐。你如果觉得有所不便的话，我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写封公开信致国共双方，在报刊上发表，把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国人百姓的监督与推动。"

毛泽东欣然采纳了张澜的建议。

几天后，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便在《新民报》、《华西晚报》上发表。张澜在公开信中说：

"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自润之先生来渝，双方商谈已愈十日，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亦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透彻之解决。……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论，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争一点，窃恐贡献无多。……目前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确保国家之自由、独立；消极须着眼于化除畛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②

张澜的公开信，明确地将国共两党和谈的真相昭示于天下，把问题提到全国人民面前，以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检查，使蒋介石不敢出尔反尔，否则，将受到全国人民的群起而攻之。

3．毛泽东与柳亚子在重庆"和谈"期间的诗交。

毛泽东在重庆逗留期间，与柳亚子先生的接触也是比较频繁的。他曾与柳亚子面谈过三次，通过两次信。当然，他们的交往是另一种方式，几乎都是通过谈诗论词来表达对这次和谈的看法。其中最使人记忆犹新的是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的那段故事。

1945年10月2日。毛泽东在百忙中又--次约自己的诗友柳亚子到红岩晤谈。在会谈中，柳亚子牢骚满腹，对自己的来来和前途，对国家的前景非常悲

①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
② 载重庆《新民报》，1945年9月18日。

观。毛泽东当即鼓励柳亚子在困难面前要有勇气，要看得远一点。10月4日，毛泽东又亲笔修书一封给柳亚子，毛泽东说：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有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忙。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①

10月6日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又一次去柳亚子教书的南开学校拜访，使柳亚子更为感动，在频繁的接触中，柳亚子曾3次诗赠毛泽东。诗云：

其一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
遍地劳民战尚休。
霜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
一笑昆仑顶上头。

其二

瑜亮同时君与我，
几时煮酒论英雄？
陆游陈亮宁卑视，
卡尔中山愿略同。

其三

兰至庭阶第一枝，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英雄当拜复何疑。
已看三杰留鸿爪，
更谴髯翁补小诗。

柳亚子最后这首诗，明显地是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没有让老友失望，子10月7日，又修书柳亚子，信中说：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①

信中毛泽东还亲抄了1936年2月写的一首词。这就是后来轰动山城、被外国人誉作“一首诗赢得了中国”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毛泽东的这首词，气魄宏大，声吞山河，柳亚子展读之余，惊叹不已，称毛泽东是“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

第二天，柳亚子和词一首，以表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词云：

廿载重逢，
一阕新词，
意只云飘。
叹青梅滞，
余怀惘惘；
黄河流浊，
举世滔滔。
邻笛山阳，
伯仁与我，
拔剑难平块垒高。
伤心甚，
哭无双国士，
绝代妖娆。

才华倍养多娇，

看千古词人共折腰。
算黄州太守，
犹输气慨，
稼轩居士，
只解牢骚。
更笑胡儿，
纳兰容若，
艳想秾情着意雕。
君与我，
要上天下地，
把握今朝。

字里行间，无不抒发了诗人对毛泽东的敬意和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抨击。

据说，毛泽东的这首词发表后，蒋介石十分恼火。从下面蒋介石与陈布雷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恼火与恐惧。

蒋介石问陈布雷："你看毛泽东的诗如何?"

陈布雷如实回答："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回答很不满意，说："娘希匹，精品个屁。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他，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为和谈而来，而是为称帝而来。"

在蒋介石的布置下，重庆由国民党控制的大报小刊纷纷登场，对毛泽东的这首词进行"讨伐"。蒋介石自己也想写一首压倒毛泽东的词。于是，他要陈布雷请了一班御用文人，写了近两个月，怎么也比不上毛泽东的词，没有毛泽东的词那种气魄和气质。蒋介石只好气愤地往废纸篓里一丢作罢。

对于蒋介石的指责，毛泽东不屑一顾。他说：

"随他去说吧！想称王称霸的是他蒋介石。不然我毛泽东随便哼一首小词，何以值得他蒋介石如此大动龙颜，如此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呢?"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对毛泽东《沁园春·雪》这首词的围攻，柳亚子气愤已极，特地与在重庆的著名的青年画家尹瘦石一道，举办了《柳诗尹画联展》，尹瘦石专为毛泽东画了一张坐在藤椅上的画像，柳亚子则为毛泽东画像题诗一首：

恩马堂堂斯列健，
人间又见此头颅。
龙翔凤翥君堪喜，
骥附骖随我敢呼？
岳峙渊亭真磊落，
天心民意要同符。
双江会合巴渝地，
听取灌虞万众呼。

我党在重庆的报纸《新华日报》为柳诗尹画联展专辟特刊，进行广泛宣传，毛泽东则为特刊题写了刊头："柳诗尹画联展特刊毛泽东题"。

4．毛泽东与冯玉祥以诚相见。

冯玉祥将军是国民党的元老，军衔上将，又是蒋介石的盟兄，彼此共事多年。他对蒋介石出尔反尔，一意孤行的为人极为了解。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妄图把中国变成蒋氏天下的政策，冯玉祥更为不满，与蒋介石的关系便变成了貌合神离，从思想上、感情上日渐分裂。在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将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从抗战大局出发，逐渐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由理解、同情到支持。早在40余年前，周恩来就称颂冯玉祥将军："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而成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11月14日，冯玉祥将军60寿辰时，毛泽东从延安发了贺电，以示祝贺。1945年8月下旬，当冯玉祥知道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毅然赴渝与国民党蒋介石和谈的消息后，更加敬佩毛泽东的为人和胆略。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因事不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欢迎毛泽东及中共谈判代表团。当晚，冯玉祥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专门为毛泽东召开的欢迎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先生此次赴渝和谈，正是实现了孙总理所提出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

警惕，严防有人从中破坏。"①

冯玉祥的欢迎讲话，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共鸣，当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二天晚上，冯玉祥又设家宴为毛泽东及中共谈判代表团洗尘。

宾主相见，彼此寒暄一阵后，毛泽东向冯玉祥介绍中共谈判代表团赴渝和谈的目的和诚意，并阐述了我党对此次和谈的政治立场。冯玉祥听后，忙接着说：

"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现在就要看蒋介石的态度了，如果他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从人民利益出发，就该回心转意采纳施行，那就是全国人民之大幸啊！"②

"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闻名。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做出了不懈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以不负国人所望。"③

宾主边吃边谈，从中国的过去谈到现在，又从现在谈到将来。席间情绪欢快异常。在黑暗笼罩着和独裁统治下的重庆，冯玉祥专门为毛泽东设家宴，成为当时重庆各大报刊的头条重要新闻。这说明了毛泽东与冯玉祥尽管还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之间却似乎又是"神交"已久的老朋友。也是由于这一次会见，使冯玉祥更加坚定了信念和立场，以致在后来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美帝援蒋，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他义无反顾，奔走呼号，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5．毛泽东"桂园"会见工商界人士。

重庆谈判期间，一些民族资本家由于受国民党当时对中共的歪曲宣传的影响，只知道中共"共产"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不知道中共对民族资本家的具体政策。所以，他们在非常矛盾的状态中，渴望见到毛泽东，以释心中的迷雾。为满足广大工商界人士的要求，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自己的住地——桂园，举行茶话会，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亚园、章乃器、范旭东等实业界人士参加了会见。

会见一开始，毛泽东就赞扬广大工商界人士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作出

① 参见谭玉琛《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13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② 参见谭玉琛《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13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③ 参见谭玉琛《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13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的贡献，并告诉他们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每个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出过力的人的。当有人问到中国共产党将如何对待中国民族工业时，毛泽东说：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没有办法得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只有在这样一个新中国，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但在现阶段，我们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我请大家转告广大的工商界朋友，要搞好对工人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再次重申：民族资本家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茶话会后，毛泽东还通过答路透社记者问的形式，向中外宣布：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中，将提议实行一个经济文化建设纲领，其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革命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带垄断性质的部门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等等。

毛泽东阐述的中共关于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解除了民族工商界的顾虑，稳定了不安的心情，使更多的国外工商人士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方针的理解和支持。

6．毛泽东拜访国民党右派陈立夫。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除广泛接触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外，还特意登门拜访了国民党右派人物陈立夫、戴季陶、吴稚晖、白崇禧等。特别在与陈立夫的会见中，取得了主动和较好的效果。在毛泽东决定拜访这些人之前，许多人对毛泽东的举动很不理解。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不错，这些人是反共！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同反共分子的总头目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肯定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手中没有权，解决问题还得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于是，在9月20日下午，毛泽东带着几个随行工作人员去拜晤陈立夫。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右派人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在十年内战期间，陈立夫都是主张坚决反共的。所以，对于毛泽东的来访，陈立夫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毛泽东则先人为主，先声夺人，以回

忆往事的口吻，与陈立夫谈起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情景，并婉言批评了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说：

“陈先生，十年内战，我们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同时又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险些招致亡国之祸害，这是教训，是足以引人深思的。”①

陈立夫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反而以守为攻，反问毛泽东道：

“既然毛先生为和平而来重庆，同时又表示拥护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为何还不放弃那些外国的思想观念（即马列主义理论——引者注），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呢?”②

面对陈立夫的责难，毛泽东笑着答道：

“陈先生，我们上山打游击，当‘土匪’，还不是你们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做了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在这次国共和谈中，请你们要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③

毛泽东引古喻今，巧妙地对陈立夫给予了严厉的批评。陈立夫自知理亏气弱、窘迫尴尬，只得连连说：“过去的事就不必提了，对这次国共和谈，兄弟我一定尽心效力。”

毛泽东与陈立夫的这次会谈，既严肃认真，又透着大度、机敏，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高超的谈话艺术。

7. 毛泽东与美国士兵交朋友。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美国第十四航空总部的三个普通士兵，特地找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先见到周恩来，表达了他们渴望见到毛泽东主席的迫切心情。这3位美国士兵是：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克尔曼。

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问他见不见那3位普通的美国士兵。

毛泽东连连回答说：见，要让美国人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像国民党蒋介石所说的那样可怕，那样不通人性。

周恩来立即要人通知那3位士兵，并具体安排了会见的时间和地点。

1945年9月16日下午，在重庆红岩村——毛泽东重庆谈判时的临时住处，3

① 参见毛岸青、邵华主编《雾都较量》第141—1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4月版。
② 参见毛岸青、邵华主编《雾都较量》第141—1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4月版。
③ 参见毛岸青、邵华主编《雾都较量》第141—1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4月版。

个普通的美国士兵见到了他们早就盼望见到的“北方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为了3个美国士兵的安全，红岩村毛泽东住处的会见室被拉上了布帘。在整个会见过程中，毛泽东仔细地倾听着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并一一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同时，毛泽东还向美国客人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和北方解放区的情况，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关于解放区问题，毛泽东告诉美国朋友：解放区在八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并已经建立了“三三制”的边区民主政权。对于陕甘宁边区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是决不会放弃的。

关于日本人民抗日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胜利后的去留问题，毛泽东说：抗战胜利后，这个组织的成员将去东北，如果美国允许的话，他们将迁回日本，重新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去生活、工作。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条约对中国国内局势及对外关系都是有利的。

关于国共和谈问题，毛泽东回答3个美国士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方针。国共和谈的关键在于国民党如何对待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及解放区人民政权。现在，日本侵略军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沉重打击下，业已投降，而国民党却大量收容日伪汉奸分子及日本战犯，对付人民军队，严重违反了和平原则，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国内和平，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建议国民党与各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国民党却竭力破坏和平，制造内战，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坚持法西斯独裁政策。

毛泽东还告诉3位美国朋友：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请你们回国后将自己在这里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将重新建立真正的友谊。

会见之后，毛泽东还与美国客人共进晚餐，并合影留念。

在重庆谈判期间，为了争取和团结各方面的和平民主力量，毛泽东通过接见来访者，登门拜访参加各种宴会、茶话会，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据统计，在这43天中，毛泽东会见和拜见了宋庆龄、张澜、冯玉祥、沈均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陈铭枢、章伯钧、李德全、王昆仑、张申府、马寅初、史良、茅盾、侯外庐、阳翰笙、曹孟君、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胡西园、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陈诚、

戴季陶、朱家骅、吴铁诚、王世杰、张群等100多名民主党派人士、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贤达、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士、国际友人。通过广泛深入地与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接触，宣传了我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提高了人们对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的认识，推动了重庆的和平民主运动，发展了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从而使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使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更加孤立，不得人心。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①

五、签订"双十协定"：毛泽东谈笑凯歌还

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到10月10日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双方经过43天的艰难较量，国共和谈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双十协定"签字，谈判斗争告一段落。

经过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坚决斗争和积极争取，《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在10月8日正式定稿。当晚，为国共和谈取得阶段性胜利，张治中举办了盛大的宴会。重庆各界知名人士500多人齐集一堂，欢迎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毛泽东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

这次和谈，全国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仅是关系两党，而且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和结果，如张治中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近30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间，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双方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当然，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①

毛泽东的演讲，赢得到会人员的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和为贵"道出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声。

1945年10月10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共谈判代表团，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代表中国国民党，在桂园客厅正式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并决定12日公开发表。

在"双十协定"中，双方共同协议：

——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

——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

——关于解放区政权、国民代表大会及人民武装的问题，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平等地位，使中共关于和平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健康发展。

2．毛泽东与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

"双十协定"是在桂园——张治中的公馆签订的。毛泽东当时在桂园公馆的

① 载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9日。

二楼，但没有参加签字仪式。蒋介石也没有出席这一仪式。整个过程也没有中外新闻记者在场。双方代表都显得十分庄重和严肃，因为无论怎样，也不管这个协议以后能否实行，毕竟是双方40多天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在场的每个人从内心来说又是比较高兴的。

签字仪式完毕后，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立即对双方代表说："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辛苦与奔波，应该请他下楼相见。"

毛泽东下楼与双方代表一一握手。正在这时，蒋介石也赶到了桂园，双方谈了十余分钟后，便一起乘车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同时，又是蒋介石为中共谈判代表团送行。因为毛泽东回延安的日期定在10月11日。

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夜宿林园。次日清晨，毛泽东抓住早餐后的点滴时间和机会，最后一次便访蒋介石，试图再在有关问题上作一次努力，同时也向蒋介石辞行。此时，林园蒋介石官邸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在严肃地等待着毛泽东。这天，他脱去了平时最爱穿的黑色拷绸长衫，一身戎装，紧束武装带，腰间一把佩剑寒光闪闪，金黄色五星上将肩章显得格外扎眼。显然，蒋介石今天的装束是经过一番刻意准备的。

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刻，毛泽东再一次向蒋介石提出解放区的问题，要他从历史与现实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承认其合法地位，而蒋介石竟毫无诚意地回答："政府决不会再做出任何让步！"

毛泽东见蒋介石态度如此顽固，知道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便对蒋介石说：

"在我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贵党代表举行商谈，以使《纪要》中未能解决的问题，能在政治会议之前得到解决。"

蒋介石点头表示首肯，临别前，蒋介石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润之，今天我另有要事，恕我不能到机场亲自相送，我的军政部长陈诚将军将为我代劳。润之，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是是非非，历史将会做出结论的。

毛泽东望着蒋介石那挑战的目光，淡淡地笑了笑说：

介公，我也相信，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终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次重庆谈判，这天早上的会见，是两位巨人的最后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较量。历史早已做出证明：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3．毛泽东乘"美龄号"飞机凯旋而归。

10月10日的“双十协定”签订后，如何使毛泽东安全地从重庆返回延安，是周恩来特别考虑的问题。尽管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但他不能不考虑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安全啊！万一有点闪失，将是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因为周恩来知道蒋介石的为人，更知道蒋介石的秉性，是一个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流氓。正在周恩来为毛泽东一筹莫展的时候，周恩来知道了张治中将于“双十协定”签订后去兰州的消息。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希望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然后再去兰州，张治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恩来，并说：“毛先生是我接来的，当然由我送回去！”

从后来截获的敌伪档案看，周恩来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蒋介石确实曾密令山西的阎锡山，在毛泽东乘飞机从重庆回延时制造事端，后见张治中在飞机上，他们才未轻举妄动。

10月11日9时，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到达重庆九龙机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如邵力子、张澜、陶行知、郭沫若、章伯钧等，共约500余人。毛泽东在登机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既然女士们、先生们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那么，请允许我面对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我们的人民讲几句心里话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了，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再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都坚决反对。在最近30年内，打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之间，间隔了二十几年。人类历史50万年，只有在这30年内打过世界战争。第一次大战以后，世界有很大进步，这次大战以后，世界一定会进步得更快。

毛泽东的话还没落音，就被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继续说：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中国也正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中国发展的总趋势，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当然，困难也是有的。不仅有，而且还有许多许多。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这样才能够促成我们在承认困难的同时，分析困难，研究困难，从而向困难作斗争，最终达到胜利的目的。

最后，毛泽东以他那坚定的目光，特有的手势，结束了他那震撼人心的演讲。并与送行者一一握手后，转而迈向蒋介石专门为他准备的“宋美龄号”。

9时45分，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飞往延安。下午1时，飞机平安抵达延安。

毛泽东重庆之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说：

“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人民的武装，一杆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①

重庆谈判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展开的一次面对面的政治与军事，智慧与才能的较量，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第九章

开创人民政协新纪元

毛泽东缔造了人民政协，开创了人民政协新纪元，使中国的统一战线有了具体的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极为重视，并经常给予指导，从而使人民政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毛泽东在领导人民政协的实践中，把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成为我国人民政协不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流产

旧政治协商会议是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赢得舆论支持而于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有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我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出席旧政治协商会议。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和平的“使者”，蒋介石根据与中共签订的“双十协定”，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了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毛泽东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会议。1945年12月26日，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乘飞机到达重庆。

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先与国民党蒋介石交涉，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必须无条件地实行停战，即停止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在各方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于1946年1月10日被迫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了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的具体执行。

这样，在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的同一天，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等党派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再次欺骗人民，以掩饰其内战和独裁的阴谋，

摆脱他们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达到孤立共产党的罪恶目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虽然拥护民主，不满意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他们仍抱有改良主义的幻想，以为通过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能够从国民党手里得到一些权利。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高举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大旗，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2．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在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前夕，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专门召开了会议，提出了参加这次会议必须注意的问题及要达到的目的，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与各方人士广泛接触，于1月16日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明确规定了这次会议的原则是："确认国内各民主党派，应实行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路"。同时，还就"人民权利"、"中央机构"、"国民大会"、"地方自治"、"财政经济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国际和平及华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旧政治协商会议上斗争的焦点，仍是军队与政权这两个根本问题，即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对这两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国民党作了坚决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解决的方针和方案：第一，实行军队国家化，首先必须实行国家民主化，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同时必须实行军队民主化，即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所以，国家民主化和军队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两大原则；第二，中国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解放区军队就应立即交给它，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所以，解决军队问题的根本方案是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同时都交给联合政府。这既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是毛泽东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贯思想。

国民党蒋介石妄图以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花招，首先把人民的军队"化"掉。而一部分中间人士，也抱着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提出"共产党在军事上让些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些步"的所谓希望；有的更幻想双方都把军队交出，由他们出来代表"国家"加以接受。周恩来坚

决贯彻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同国民党斗争的方针，明确地指出了中共提出的“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与国民党提出的“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表面上看虽然只是位置的差别，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周恩来说：

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早就清楚了国民党的‘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企图在于，‘你先交给我军队，我再给你民主’，以便吃掉人民的军队。我们认为，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绝不能将人民的武装‘化’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中。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民主，国民党在吃掉人民的军队以后，必然要向人民猛扑过来，把人民的民主也吃个一干二净，所以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应该也只能是政治民主化。

周恩来的讲话，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既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又批判了一些中间人士的幻想。

在旧政治协商会议上，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激烈斗争，勉强通过了以下几个重要协议：

一是，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的协议。协议规定了全国要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规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的具体原则；规定了要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内争端，保证国家能和平发展。

二是，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了实行军队内民主化、“军党分治”、“军民分治”等原则，规定整编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的具体数目。其整编办法须继续商定。

三是，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原来的选举法所产生的区域和职业代表1200名照旧，并规定新增加各地区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850名。协定还规定“宪法之通过需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从而否定了国民党一党的垄断地位。

四是，关于宪法草案的协议。协议规定了修改国民党1936年的《五五宪草》的具体原则，取消了其中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中央集权制和总统制，确定了保障人民权利，中央政府采取分权制度、中央和地方采取均权主义、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实行民主等等原则。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须经立法院之同意任命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有同意权和不信任权，这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国会制和内阁制。协议还规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之规定，省得制定与国宪不相抵触的省宪。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是制定宪草的根本原

则。我们党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制定宪法，虽然对国民党作了重大让步，但在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并且有利于保障中国解放区的民主制度。

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广大人民和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压力，不得不答应给人民以自由，以缓和全国人民要求民主的浪潮，并向全国人民作出四项承诺：给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释放政治犯。

旧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31日闭幕。

3．蒋介石破坏政治决议和撕毁停战协定：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流产。

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决议的公布，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他们所以在政协决议上签字，完全是被迫的，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出尔反尔、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从1946年2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事端，采取了一系列撕毁政协决议的行动，从而标志着旧政治协商会议在事实上的流产。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并打伤执行主席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等60余人。

2月21日，国民党蒋介石又指使特务在北平制造了所谓的还乡请愿团，捣毁了军调处执行部。他们纠集流氓地痞千余人，举行反共示威，然后由特务率领冲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肆意侮辱、殴打我方的工作人员。

3月1日至17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然撕毁政治协议，顽固地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任何民主改革，为发动内战制造根据。

3月20日至4月2日，蒋介石又召开了由他一手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一个冗长的政治报告，他露骨地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明确宣布撕毁东北停战协议和政协的各项协议，顽固地坚持所谓《训政时期约法》，把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公开化和合法化。

6月中旬，蒋介石竟违背政协关于解放区和军事问题的协议，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5项无理要求，公然要求解放军退出下列各地：①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

区；②胶济路全线；③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④东北除黑龙江、兴安两省嫩江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外之所有各省；⑤1946年6月7日以后解放军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蒋介石还声明，如果中共不退出上述地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考虑停战问题。对此，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于6月20日在南京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提出的这一违反政协决议的无理要求，并电告毛泽东有关方面的内容。毛泽东接周恩来电报后，立即回电中共代表团：

"站在有理立场取强硬态度是很对的，只有如此才有出路。……已令各地准备一切，粉碎蒋之大举进攻，估计打6个月后又将讲和。"①

6月21日，中共政协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4项建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但却遭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拒绝。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撕下伪装的面孔，派遣大批部队进攻中原解放区，从而标志着全面内战的爆发。

同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这样，就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完全破裂，同时也标志着旧政协决议成为一纸空文，宣告了旧政协的彻底破产。

二、筹备、组织新政协会议

新政治协商会议是相对1946年1月由国民党主持的旧政治协商会议而言的，是排除了反动分子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毛泽东为新政协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而呕心沥血。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种形势发展到1948年春天，使筹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毛泽东开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托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转告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等人，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同情和赞赏，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区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下册，第9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参加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建立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首次以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在香港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沈钧儒，向他们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意见。毛泽东说：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次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①

中共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的倡议，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响应中共的号召和毛泽东的倡议，通电国内外，表示拥护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共同策进完成建国大业。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毛泽东说：

“五月五日电悉，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次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①

这样，从1948年起，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分批安排应我党邀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华侨、少数民族和宗教代表，从全国各地及海外经香港陆续到达解放区。10月3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到达东北解放区，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致电以上各位，电文云：

"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②

同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东北局领导，指示由高岗、李富春出面，抽一二天时间，根据中央九月会议通知精神，邀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高崇民、朱学范等，恳谈一二次，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问题的同意，并请他们先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参考名单。至此，毛泽东为新政协召开的前期准备工作，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张成立中央统战部，专管政协工作，以邀请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1948年8月，毛泽东批示同意将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专管政协、海外及国统区工作。当月初，中共中央派钱之光前往香港，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一同担任办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这样，从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华侨的代表人物陆续到达解放区，共77人，其中包括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马寅初、李达、叶圣陶、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著名人士。

二是，指示起草讨论《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等文件。为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有一个草案，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草拟一个文件作为依据。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诸问题》的草案，发往各解放区组织讨论。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中共东北局、华南分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从11月份起，先后就草案多次组织民主人士协商，并及时把民主人士的意见反映给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对正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确的意见一般都采纳了，并给以详细的答复。经过几次讨论、协商，终于在1948年11月25日对《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诸问题》达成了共同协议。

三是，沟通思想，加强团结。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4个阶级的联合阵营，各个阶级、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因而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可能完全一致，加之民主人士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还存在着某些疑虑。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春这一时期内，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思想上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①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②新中国是实行新三民主义还是实行旧三民主义；③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他们。可见，要争取民主人士，首先需要同他们充分交换意见，以沟通思想，提高认识，解除疑虑，加强团结。毛泽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一方面，他指示有关部门，对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以积极、热情、诚恳、坦白的胸怀对待，并在生活上妥善安排。另一方面，注意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好工作，帮助他们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了解党的政策。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有关部门发出了“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明确地指出：

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以及有关党的政治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回答。……对政策实行情况，亦据实相告，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努力下，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与共产党的思想更加一致，团结更为坚定，从而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这样，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就蒋介石玩弄和谈的阴谋，提出了进行和谈的8项条件。其中第8项就明确声明：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

同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双方在会谈时，毛泽东特别介绍了即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

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了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宣告：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

至此，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前提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毛泽东亲自出席新政协筹备会。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胜利结束了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这样，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成熟了。再加上毛泽东的亲自倡导和精心组织，为新政协的召开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于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于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出席筹备会，作了重要讲话，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的《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大体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阐明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必然性和深刻意义。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方向。”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①

二是，明确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毛泽东说：

“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3—146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①

很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已提出了新中国所奉行的、迄今仍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三是，指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选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重点。毛泽东说：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说：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③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共召开了5天，于6月19日闭幕。这次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这个条例选出了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同时，会议还决定在筹备会常委会领导下成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工作：（1）拟定参加新政协之单位及单位之代表名单；（2）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3）起草共同纲领；（4）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5）起草大会宣言；（6）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也是在这次筹备会上，毛泽东还提议在该年7月7日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单位联合发表纪念文件，并获得会议的一致通过。这样，在1949年7月7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了重要修改的、由23个单位代表联合签署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12周年宣言》正式公布于天下，该《宣言》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14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3．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政协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在新政协即将召开和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性关键时期，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给予明确的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是：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以后，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将要成立的新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各阶级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怎样？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什么？发展前途怎样？等等。为了对上述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以驳斥敌对势力的污蔑和攻击，批评各种错误思想，澄清一部分人在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统一认识。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利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及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毛泽东总结了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使中国的面目有了根本转变的科学结论，从而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14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二是，论述了人民内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毛泽东认为，现阶段人民内部各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些阶级中，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毛泽东说：

“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①

毛泽东也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人民共和国的巩固的基础。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主要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毛泽东说：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

毛泽东还认为，在人民共和国里，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当革命的领导者，因而也不应该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但为了发展生产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有其重要性。毛泽东说：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③

三是，论述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人民共和国必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是因为，被推翻的敌人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对人民革命事业进行破坏，进行反抗。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专政，就无法镇压他们的反抗。所以，毛泽东说：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①

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共和国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和选举权，实行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说：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②

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内部的民主；也只有发扬人民内部的民主，才能更好地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在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和民主联合政府即将诞生之时，显然是为二者的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9年9月17日，毛泽东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了周恩来代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所作的筹备工作报告；原则通过了筹备会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了筹备会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还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为“中国人民政协”。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14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三、主持召开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从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到9月20日，筹备会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迎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胜利召开。于是，毛泽东又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工作。

1．领导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共45个单位。毛泽东直接领导和主持了这次会议。

一是，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9月21日，在雄壮的乐曲声和54响礼炮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正式召开，毛泽东豪迈地宣布大会开始，并宣读了会议的具体日程。接着，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毛泽东的开幕词是正式成立人民政协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这个文献回顾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历程，明确地提出了人民政协近期和长远的艰巨任务及光荣目标，深刻地阐明了人民政协会议的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说：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

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①

最后，毛泽东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地宣告：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人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②

二是，主持通过了三个重要文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建国的重要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要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了。这三个文件对建国后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这个文件的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肃清公开的及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并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同时，《组织法》还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2—34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34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三个文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它起着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制度是多种经济并存；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即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婚姻、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等等。

除这三个重要文件外，这次会议还通过了4个其他决议。即：(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2．亲自起草并主持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

1949年9月30日，是中国人民最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大会选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以全票当选为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大会还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言以鲜明、简洁、坚定的语言昭示于天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

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①

第一届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主持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就职。全会一致同意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这天下午3时，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四、领导和指导全国政协工作

毛泽东开创了人民政协新纪元，还体现在他担任6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直接领导人民政协的工作中。同时，在卸任政协主席一职后，毛泽东仍然关心和指导人民政协的工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主持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二、三、四次会议。

毛泽东领导全国政协工作期间，是我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有步骤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是代行人大职权4年多的时期。他在任这届政协主席期间，共召开了4次全委会，60多次常委会，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开展了许多的重大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10月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通过广泛讨论，会议最后选举毛泽东为第一届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这次全体会议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建立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制定了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同时，会议还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以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

---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第58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土地改革问题。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开国初期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革命任务。所以，毛泽东不但主持了这次会议，而且亲自作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会议听取了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听取了周恩来、陈叔通、陈云、薄一波、聂荣臻、郭沫若、沈钧儒等人的各项工作报告；讨论并同意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各项工作报告；通过了国徽图案。6月23日，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作了题为《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闭幕词，重点阐述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号召各阶层人民积极支援土地改革，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说：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政党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的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去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关。”①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是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政治运动的经验，讨论部署抗美援朝、经济和财政、文化教育等工作。毛泽东首先致题为《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幕词。他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国家内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9—8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胜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①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于1953年2月4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仍然是讨论抗美援朝的问题和开展“三反五反”斗争问题。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陈叔通、郭沫若、安子文分别作关于会务报告、关于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报告和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等项决议和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电。毛泽东最后致闭幕词。他说：

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第二，要学习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不仅要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第三，要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2．开创了全国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统战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主要工作和主要任务。所以，毛泽东在领导第一届全国政协期间，把统战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解放初期他亲自主持召开的两次统战会议上。

一是，在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上，决定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的政策问题。1950年3月，毛泽东主持和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期间，就对民族资产阶级是采取以斗争为主，还是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以团结为主，对民主党派的性质界定及必要性的认识等问题出现了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越要排挤私营经济”；对民族资本家要以斗争为主；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给我们找麻烦。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针对上述错误观点，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汇报的讨论情况后，当即明确地说：

我认为必须强调5个问题：第一，关于斗争的主要对象。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第三，限制、排斥和扶助哪些工商业。我们应该排斥和限制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第四，关于公私经营的关系。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那种‘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建立百货公司也不是代替全部私营商业，我们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除此之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第五，对民主党派一定要尊重。现在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的情况，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我们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有民主党派。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是，参加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张让民主人士去农村看看土地改革，并多提意见，以改正我们的工作。1951年1月，全国第二次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一些民主人士对土改有些意见的情况作了解释。毛泽东说：

我们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各地农村去参观、视察。各地不要以为他们去了是一个累赘。要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错误和缺点，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可以沟通我们党与民主人士之间、民主人士与农民之间的感情。

为了让民主人士能顺利地到农村参观、视察，毛泽东还亲自给有关地区的领导写信打招呼，要求他们给予支持和关心。1951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就亲笔致信中央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等地的党委书记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明确地说：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不好的，还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① “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②

五、毛泽东对人民政协性质、任务和作用的阐述

毛泽东在领导和指导人民政协工作期间，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作了系统的论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政协理论，为我们后来开展人民政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1．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

毛泽东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有过许多的精彩论述，特别是分别论述了 1949 年 9 月至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和 1954 年 10 月以后，人民政协性质和任务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从而为人民政协工作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从全国解放到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召开之前，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决定国家的一切大事。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

①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152 页，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152 页，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

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①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这重要转折时期，毛泽东在1954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阐明了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性质和任务，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毛泽东说：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任务主要是：第一，协商国际问题。如对外发表宣言，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等；第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组织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的相互联系问题，联系人民群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及党派团体之间联系问题；第五，在自愿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努力进行思想改造。

很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正确地解决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问题，正确地解决了人民政协与人大、政府机关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2．毛泽东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作用。

毛泽东在对人民政协性质论述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协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协商的作用。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和作用之一，也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和发扬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此，毛泽东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

人民政协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协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

① 《新华月报》第2卷第3期，第489页，1950年3月。

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

在实践上，毛泽东也十分注意运用政治协商这一方式。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多次就召开新政协的重大问题，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平等认真的协商，尽量求得到会的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

第十章

建立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军民三十余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开国大典。一时间，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广场上无数的红旗和大幅横幅标语，汇成波澜壮阔的红色海洋。

下午3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开始。接着，毛泽东用那洪亮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在威武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基本结束，中国从此将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

建立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奋斗一百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建立人民共和国，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战略的重要成果。

一、新中国的总设计师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应向何处去？是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抑或是第三条道路？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别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后，一直思索的重大政治战略问题。

1．西柏坡：毛泽东设计人民共和国。

1948年5月间，毛泽东由陕北到达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在农村的指挥中心——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后，就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什么性质的国家政权的问题提上了自己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历史上，我们党曾经用过“工农共和国”这个名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我们党作了及时调整，先后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

但是，由于那时毕竟没有面临建国问题，设计共和国的问题就搁置下来了。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工作报告，又一次阐述了建国的问题。1948年1月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建国问题便日益突出地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于是，毛泽东在1948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着重谈到了建国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的问题。他说：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①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的比较完整的设计。

1948年的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又专门谈到了建国问题，谈到了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问题。他说：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他们，就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②

我们建立的国家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呢？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2页，人民出版社，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肯定了是搞社会主义。这一点是每个共产党人不能有半点含糊的。

针对成立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建立完全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新形势，以及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已经得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组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由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开会议，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为了加快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亲自指挥了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广泛地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著名人士频频联系，共同商讨建国事宜。1949年1月，毛泽东特别致信著名爱国华侨司徒美堂，邀其回国参加建国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说：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①

同月，毛泽东还致信民主革命时期我国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请他回国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同月，毛泽东又亲笔致信宋庆龄，邀请她到解放区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说：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市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②

同年2月，毛泽东又致信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主要商讨有关建国事宜。毛泽东在信中说：

“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河山，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求和平，待外援名曰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成功。"①

1949年3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筹建新中国的问题。他着重强调了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②

毛泽东在会议讨论时，还专门谈到了新中国中央政府的组成问题。他说：新中国中央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有两个人要报告，毛、周是否加人，恩来是一定要参加，其职务是内阁总理；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也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设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刘、任不加人，不要全部加人进去，全加人是不行的。

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地论述了建国初面临的经济建设问题及经济政策，对经济成分的构成、民族资本主义及个体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7—3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①

毛泽东还着重强调了在建立人民共和国时，必须反对"左"右倾两种错误倾向。他说：

"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正确的态度。"②

毛泽东还指出，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新建立的国家政权不仅不是可以削弱，而且是必须强化的。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特别强调，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必须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样--股热情，那样一种革命精神，那样一种革命干劲。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③

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全会初步勾画出了一幅瑰丽的新中国蓝图。会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而且对中国的建国和建国后的建设事业，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史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追求和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成真。

2．双清别墅：最后敲定共和国中央政府的盘子。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14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1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香山双清别墅是毛泽东1949年3月25日至8月23日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虽然只住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但却正是他缔造新中国的最关键的时刻。

香山位于北京西北20公里外的太行山余脉上，是北京人称之为西山的一部分。这里三面为群山所环抱，有如弯曲的月牙，看上去群峦叠障，山势起伏，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双清别墅就在香山寺旁。因为这里原有两股清泉，乾隆帝又在泉旁石岸刻有“双清”二字，故名。1917年熊希龄在此修建了别墅，取名双清别墅。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进驻北京，经中央有关部门的反复挑选，决定将香山的双清别墅作为毛泽东的暂住地。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指挥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最后决战，面且也最后敲定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搭起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框架。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重点抓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指挥了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攻克南京，解放了全中国。第二件大事就是最后敲定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实现了缔造新中国的宏伟大业。

毛泽东虽然住在双清别墅，但经常进城办公、访友，主要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最后准备。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新中国诞生的钟声即将敲响，此时唯一需要毛泽东操心的是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安排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新的人民政府的组成，必须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既要有利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又要体现出人民政府的根本性质。

实际上，早在从西柏坡向北平（后改为北京）的行进途中，毛泽东就与即将出任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内阁总理的周恩来商量过中央政府的组成问题，并从实现民族的昌盛和国家的富强的战略高度，强调了吸收民主党派和党外著名民主人士参加中央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反复对周恩来说，我们对在中国民主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应该也必须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安排重要职务，并具体指出了一些人名字，要周恩来考虑。后来，从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人事安排来看，毛泽东说话是算数的。中央人民政府中的六位副主席，党外人士有三位（即宋庆龄、李济深、张澜）；56位委员中，党外人士占27位。政务院的4位副总理，党外人士占一半（即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多达五分之三，有9人；在政务院所

辖的34个部、委、院、署中，由党外人士担任正职的就有14人。作出这样的安排，既充分显示了我们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谋私利的荡坦胸怀，也说明了毛泽东在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中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到了双清别墅后，为了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接触上，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商建国大计。在双清别墅，毛泽东先后接待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著名人士。他对这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极为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都要亲自出门到汽车前迎接，并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商讨政治协商会议如何召开、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发展、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怎样进行等重大问题。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又一次亲笔致信宋庆龄，热情地邀请她北上，参加管理国家大事。毛泽东说：

“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①

但是，由于宋庆龄因孙中山先生是1925年3月在北平逝世的，北平是她最为伤心的地方，曾发誓不再踏进北平这块土地。所以，毛泽东怕她拒绝赴就，在写了亲笔信后，又专门派邓颖超同志专程赴沪，迎接宋庆龄到北平。

真诚所致，金石为开。在毛泽东的一再邀请和邓颖超的劝说下，宋庆龄终于改变初衷，答应到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工作。

8月26日，毛泽东得知宋庆龄由上海乘火车到北平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28日这天，毛泽东与宋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59人，到火车站欢迎宋庆龄。这样，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著名的无党派人士参加新中国的管理工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香山，毛泽东还就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作出过重大的部署。1949年5月，毛泽东为了稳定北平的秩序，建议成立公安机关，并对周恩来说：

在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之前，公安机关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对外叫中央人民军事委员会公安部；新政府成立后，再划归政府，改叫公安部。部长人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选就是罗瑞卿，马上调他走马上任，组建我们的公安机关。

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人民的公安机关很快就运转起来。

在双清别墅期间，毛泽东还就建国的准备问题做了以下几项重要工作：

——同周恩来商讨了建国后如何处理与苏联和美国，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同陈云商讨了建国后所面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问题；

——亲自部署和解决了解放初期上海出现的金融风暴问题；

——同刘少奇商讨了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与民族资本家的关系问题；

——同当时的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最后研究了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组成人选问题……

至此，在双清别墅，毛泽东完成了筹建新中国的全部前期工作。一张美好的新中国的蓝图，已经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

3．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几项非常急切面又棘手的任务。

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在建国初期，必须集中精力抓好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镇压国内外敌人的侵略、颠复、破坏和反抗。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告诫全世界无产阶级：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要使无产阶级上升到统治地位，就是说，要掌握政权。而要掌握政权，就必须有效地镇压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反抗。基于这一基本原理，毛泽东在设计人民共和国时就一直认为，人民共和国是广大劳苦大众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又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完全可以打倒国内的一切反动阶级和反抗一切来自国外敌对势力的侵略和颠覆。因此，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的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内部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企图破坏革命和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对外是坚决粉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封锁，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高大形象。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预计是完全正确的。在建国后不久，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我们开展了"五反"和镇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反革命，保证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对外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使美帝国主义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罪恶目的不能得逞。

二是，恢复国民经济，组织生产，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认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必须把恢复经济、组织生产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将面临十分困难的经济状况，那就是：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的烂摊子。所以，毛泽东在组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时，就谆谆告诫全党：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毛泽东和我们的党也正是按照这个原则工作的，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极大地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而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就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三是，依靠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力量，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阐述了要运用人民政权的力量，加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不然，资产阶级就会出现反抗情绪，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政权的稳定。建国后出现的问题确实是像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当上海刚解放时，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最大的城市，就出现了少数不法的资产阶级乘新生的红色政权尚未完全巩固之机，在经济上掀起风波，企图搞垮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好在毛泽东早就估计到了。他及时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扰乱市场的斗争，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胜利。紧接着，他又领导了"五反"斗争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通过物价税收等各种手段，引导民族资本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是，要充分估计到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采用民主的方法教育人民，并引导其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14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场深刻的变革，在这场伟大的变革过程中，必将引起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变革，也必将触及到人们的物质利益，有些人会跟不上社会主义的步伐。但这些又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象对待敌对阶级那样，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国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

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都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人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正因为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转变是一个过程，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准备了应对措施，即采用民主的方法对其教育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从而为完成三大改造的繁重任务准备了条件。

二、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思考

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什么，这是毛泽东在设计和勾画人民共和国蓝图时，考虑得较多的政治战略之一。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这从他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宏论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但是，后来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毛泽东不得不又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下来。1948 年后，随着战争朝着越来越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建国问题又开始突出地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又进一步地思索着即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国体问题。

1949 年 3 月，北方的天气还寒气逼人，但这年的春天却来得特别早，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已是春意浓浓。中国共产党在进人北京前的最后一次全会就在这里召开。参加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34 人，候补中央委员 19 人，另有列席的中共中央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12 人，共 65 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次全会。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并于 3 月 5 日作了极其重要的工作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 27 人在大

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到城市，因此，必须各方面都要适应这个转变的需要。他特别就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国体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毛泽东说：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这里，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及其功能，已经作了比较完整的阐述。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或者说这一政治战略是早就开始酝酿了。

1．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战略理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忠实而又全面地记录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找国家的出路和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艰辛探索的足迹。毛泽东的这一政治战略的形成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确提出“用阶级专政方法”，标志着毛泽东从主张用“温和的革命”向“激进的革命”的转变。1921 年 1 月，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地表明了这一思想。毛泽东说：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②

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用阶级专政的方法”。他的这一思想，一直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才有明显的转变。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战略的雏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6—1437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形，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用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就已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用和平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在阶级社会里，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必须使用暴力来迫使反动统治阶级下台。毛泽东说：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①

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二是，无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要巩固这个政权，只有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方法。用毛泽东和蔡和森他们当时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就是：方法 = 阶级战争 + 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保护革命，也不可能完成革命。

第二阶段是建立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成立“工农民主共和国”。这一思想主要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所处的实际斗争情况出发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成为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也由于革命的失败而倒向敌人一边。所以，毛泽东就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方法，主张“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特别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及所签署的文件中，毛泽东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和职能作了具体说明。

一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这个政权巩固与否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1933年9月签署的《苏维埃选举法》中就明确规定：

“无产阶级是苏维埃的先锋队，领导农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对

① 载《新民学会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

于居民与代表人数的比例，工人比例的居民要享受优越的权利。"①

二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给广大工农群众以最宽泛的民主。毛泽东认为，工农民主专政是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它的力量完全依靠于工农群众，它一刻也不能离开工农群众。所以，工农民主专政必须给它的阶级基础工农大众以最广泛的民主，并以此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三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必须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是因为，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者，是旧政权的掌权者，所以，他们对于苏维埃总是怀着极端的仇恨。他们虽然被推翻，但却时时企图复辟，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原来的剥削制度。所以，必须对他们实行坚决的镇压，实行毫不留情的专政。毛泽东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是工农的政府，他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对于工农和广大民众是广大的民主。同时他是一个专政，是对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专政。"②

四是，工农民主专政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毛泽东认为，工农民主专政只是过渡性国家。它只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工农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其前途必须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

"革命的担子挑到这个地方就完了吗？工农民主政府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同志们！还没有完，还不是最后的目的，革命的担子还要挑到更远的地方去。在今天我们就要指出这些地方，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但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要消灭地主阶级，而且现在就要准备着，准备到了将来，到了适当的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像苏联现在所做的一样，最后还要进到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办法，进到最自由光明伟大的世界去。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是人类最后的解放，才是人类最后的胜利！"③

第三阶段是由工农民主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即实行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认为，这是实现团结抗日的最好方法。他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形式，按照他的设计，转变为民主共和国后，我们的国体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

① 转引自徐育苗《毛泽东政治学说》第12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②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1934年第2期。
③ 《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7期，1934年2月3日。

一是，民主共和国是进步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工农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只是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民主共和国则更加广泛，不但代表工农的利益，而且代表民族的利益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就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来参加抗日斗争，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结成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中明确地指出：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办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①

二是，民主共和国的施政纲领是抗日、民主、改善民生，所以更能为广大的抗日阵线所接受。毛泽东认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必须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民主共和国正是可以为这个目标服务：第一，它能够团结一切抗日的人们共同抵御外侮；第二，它能够给所有的抗日的人们以民主的权利；第三，它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减轻以致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

三是，民主共和国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其前途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政权。因此，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政权。毛泽东指出：

“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革命群众的利益。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②

第四阶段是由民主共和国走向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战略阶段。这是毛泽东这一政治战略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其标志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939年后，毛泽东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概念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概念。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有过精辟的阐述。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①

毛泽东到了1941年以后，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就更清楚了。他说：

“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②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和共和国模式的设计，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十分接近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随着后来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战略和理论，以及在这一战略指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也就如新春的竹笋呼之欲出了。

1948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毛泽东说：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不同。”③

此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中共中央在文件和材料中，使用人民民主专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2—56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67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政的概念逐渐多了起来。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标志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的基本完成，并开始具体运用到建国的实践中去。

2．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战略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这一政治战略的内容极其丰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一政治战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点。

（1）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

在中国，其他的道路走不通，只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这个专政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国家政权。这样就决定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毛泽东说：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达胜利。”①

毛泽东同时又认为，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里的这种领导作用，是通过本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共产党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争得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

（2）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说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因为工农这两个阶级在中国的人数最多，占了全国人口的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主要靠这两个阶级，同样，建设社会主义也主要是靠这两个阶级。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一直将工农联盟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力量。毛泽东说：

“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①

(3) 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敌人实行毫不留情的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最基本的内容。

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体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的民主与专政这两方面的职能，也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②

首先是对人民的民主。对人民实行民主，就是要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真正体现出人民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的主体地位。早在设计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就说：

"所谓人民民主，就是全体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③

也就是说，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各项企业和管理文化教育等权利。对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教育和改造自己。以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增强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保证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

人民民主专政还有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一方面。对敌人实行专政，就是对那些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尽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对此，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

"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④

当然，在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的同时，还要做好他们内部的转化工作。毛泽东认为，有些虽然属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改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1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0页，1986年版。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造，以减少在对敌人实行专政中的对立面。毛泽东说：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①

毛泽东在系统论述了民主与专政的功能和作用后，又多次指出这二者是一个整体，是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人民实行民主，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前提，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客观需要。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充分发挥和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对敌人实行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保证。不对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就会进行破坏和捣乱，甚至颠覆人民的政权，进行复辟，结果就会导致人民已经争得的各项民主权利付诸东流。所以，只有对敌人实行有效的、强有力的专政，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反抗和破坏，才能真正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历史经验证明，离开了人民民主，就不可能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反之，离开了对敌人实行专政，也就很难保证对人民的民主，二者是不可割裂和偏废的。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说：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②

(4) 保证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认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承担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历史任务，承担了革命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承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时期则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消灭阶级，实现向无阶级社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

的过渡。毛泽东多次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最后实现世界大同。

3．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战略的独创性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政权形式，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战略，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适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创造了苏维埃政权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毛泽东则把马列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战略。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有较大不同，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也不一样，具有国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受不同帝国主义的控制、无产阶级人数少、农民人口多、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俄国的资产阶级等特点。所以，毛泽东在分析了这些特点后，逐步得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政治战略。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战略在概念上比较全面。无产阶级专政只提到专政，而没有明确民主的地位，这样对人民民主的这一方面，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有专政这一含义，更重要的是包含了民主这一层意思。它表明这个政权的主体是人民，这个政权也包括两个方面，它既是民主的，又是专政的，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即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人的专政的统一。由此可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全面性的概念。

再次，人民民主专政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个专政的社会基础，不仅包括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而且包括工农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还包括工农这两个劳动阶级同赞成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联盟。这样，毛泽东的这一政治战略得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拥护，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最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在这个专政中，实行的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格局，通过多党的监督和协商，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来推进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基本政治制度

政体是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政体将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在设计和勾画新中国的蓝图时，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应采取民主集中制”。

1．毛泽东对政权组织形式的探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之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关于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和思想。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

（1）茶陵工农兵政府的诞生：毛泽东对政权组织形式的最初探索。

1927年11月，毛泽东趁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发生战争之机会，派兵攻下了敌军薄弱的湖南茶陵县城，并指示谭震林等人，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当时，攻克茶陵县城的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明确规定政府的一切权力归于工农兵，并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专政。

谭震林当选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工农兵政府还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县赤卫大队，成立了在政府领导之下的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毛泽东亲自指导创建时我党第一个根据地政权，也是毛泽东对政权组织形式的第一次尝试。

接着，毛泽东在井冈山附近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和以瑞金为中心的数十个县成立了红色政权。尽管当时有的叫“工农兵政府”，有的叫“苏维埃政

府”，也有的称“革命委员会”，其中以称“苏维埃政府”的居多。但不管叫什么名称，其性质都是工农兵政权。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对政权组织形式的探索初具雏形。

1931 年 11 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根据地内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为统一各地的工农民主政权，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等法规，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是中央苏区工农兵政权的主要缔造者，从 1931 年 11 月到中央红军长征撤离中央苏区，他一直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就政权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以下基本思想：

一是，关于工农兵政权的性质。毛泽东认为，这个政权的名称就叫工农兵政府，所以，政权的实质就是工农专政；工农兵政权为工农兵所有，为工农兵谋福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就明确规定：

“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①

毛泽东也曾经强调：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②

很显然，毛泽东把这个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它的政策都放在为人民谋利益这个基点上。

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工农兵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张，由工农兵群众中选出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作为工农兵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工农兵群众直接选举。代表大会采用“民主集中主义”的组织原则。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下册，第 464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6—137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三是，工农兵政权的任务主要是两项：第一，开展军事斗争。由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开展军事斗争就成了这个政权中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毛泽东说：

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与游击队，组织关于战争的给养与运输。

第二，进行土地革命，组织经济建设。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在苏维埃区域内，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及红军战士。同时，还要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艰苦的军事斗争。

很显然，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内采取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已经初步具备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它的许多规定和作法，为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3)“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毛泽东为特殊时期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在斗争策略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为了争取更多的阶级和阶层参加抗日战争，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形式从苏维埃代表大会转为参议会制度。同时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称，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内采用“三三制”的组成原则，即中国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在这个政权中各占三分之一。随后，陕甘宁边区所属各县、区、乡实行普选，组成了各级参议会，同时按这一原则，各县都设立了政府和法院，与参议会一起，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和审判权。这样，参议会制度便成为我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形式。毛泽东说：

“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①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的确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别是到了1948年以后，毛泽东在设计即将诞生的新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人民政权时，在确定我国的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后，对政体问题也作了正确的设计，提出了人民共和国必须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说：

“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①

(1) 毛泽东说：就用人民代表会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步步走向全面胜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这样，毛泽东在思考这个新型国家的国体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回答这个国家将采取什么样的政体的问题。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

“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②

也是从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按照以上政权构成形式，来酝酿成立新政府了。

1948 年 12 月，伟大的战略决战进入尾声。30 日，毛泽东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宣布：

“1949 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③

1949 年 1 月 6 日到 8 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党在 1949 年的 17 项大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国问题，并重申了毛泽东在元旦献词中提出的思想。

在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7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136 页，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79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初设想是分两步走：先召开一个百人左右的小规模的新政协会议，草拟政治纲领，商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方针，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中央人民政府。1948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就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当时的口号是这样提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但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和我们党所预计的速度，夺取全国政权的时间比原来估计的提前了，而这时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又没有成熟。如果等待时机成熟，又势必推迟新中国诞生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民主人士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召开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以产生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和党中央采纳了这个主张，从 11 月下旬开始，积极组织筹备新政协会议；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指出：

“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①

从此以后，毛泽东领导加快了新政协会议筹备的步伐：

1949 年 6 月 15 日，召开新政协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949 年 9 月 17 日，召开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同时还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委员。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政体作了如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②

至此，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的探索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6 页，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② 转引自徐育苗《毛泽东政治学说》第 167—168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政权。毛泽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权学说的形成作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

(2)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全确立。

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权的话，那么，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则是完全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必须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任务，以及民主法制建设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后来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代表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它不是完全意义上人民代表制。所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应当说是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是基于这一认识，从1950年开始，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作了一系列的准备。

一是，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了第20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下设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亲自领导。这年的12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带着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到浙江杭州，扎扎实实地搞了两个多月，在广泛征求意见，作了三次大的修改后，形成了一个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于次年3月中旬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第一会议，讨论这个初稿。同时从3月下旬起，将经过修改了的宪法草案在全国8000多人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征求意见。5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7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全部条文作最后审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

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采纳了百八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

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①]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决定将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0日，出席会议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由主席团公布。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自己的正式宪法。

二是，指导召开各级代表大会，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作组织准备。从1953年4月到1954年8月，毛泽东指导了全国各级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由人民普选产生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到1954年8月，除个别地区外，全国省级以下各级政府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成熟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文件。

至此，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成为我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特点。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宪法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作了系统阐述，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明显的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把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保证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又使各个国家机关分工负责，密切配合。

在我国，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确定为国家政权组织的原则，是在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在1954年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中也有明确表述。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国家政

①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4—32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权组织的基本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机关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它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二是，在人民代表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集中和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三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同下级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一方面，地方必须服从中央，下级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必须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指示，并接受其监督；另一方面，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也要尊重其下级机关，听取下级并考虑它的下级机关的意见和要求。从而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因地制宜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四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实行集体讨论问题、集体决定问题、集体行使职权等原则；在讨论问题时，人人享有发言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决定问题时，一人只有一票权，领导和一般代表都是一样；在通过决议或决定时，少数服从多数，只要有 2/3 以上的票通过，任何人不得更改。

毛泽东认为，只有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一步加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工作，才能切实地保障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2)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它的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毛泽东认为，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表明，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

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代表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所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政治权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

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

常委会既是权力机关，又是工作机关。

四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本级国家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全国县以上的人大常委会，既是议事机关，又是工作机关。

马克思在设计巴黎公社的政权机关时，提出了议行合一的原则，认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毛泽东根据这一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毛泽东认为，和资本主义的政权组织实行“三权分立”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则是实行行政权和立法权相统一的构成形式，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权力机关和工作机关；既行使行政权，又行使立法权，还行使执法权。这种“议行合一”的作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统一性。这种“议行合一”原则具体表现在：

一是，人民代表大会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构成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完整体系。在全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和重要制度；在地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议决本地区的一切重大事务，作出必要的决议。

二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如司法、检察机关），领导和监督这些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的高度统一，进而保证了国家权力的集中行使。

三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协助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实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维护这些法律和决议的尊严，根据有关规定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人民贯彻实施这些法律和决议。

(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反映了我国的国家性质，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这一制度的诞生和确立，是历史规律的反映，是中国人民的最佳历史选择。

这一制度有利于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代表性，我国人民的各个阶级、阶层、社会团体和各个民族，都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人民代表大会来代表自己说话。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是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说：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①

毛泽东设计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从制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全国各民族在管理国家事务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一致，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但关系到职权的划分，也关系到权益的划分。所以，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两个积极性的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因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22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第十一章

两个联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两个联盟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中的最核心部分，也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用以团结同盟者、打击敌人的重要政治战略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与其他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建立联盟，以战胜主要的敌人的理论，制定了建立两个联盟，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共同的敌人的政治战略，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两个联盟就是指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毛泽东认为，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基础，是最可靠的同盟者；第二个联盟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但却是动摇的同盟者，与他们的联盟是既重要，又要坚持斗争。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复杂的经济建设，只有正确处理好与这两个联盟的关系，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的基础

把工农联盟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这不是毛泽东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学说时，就把工农联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马克思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如果能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最大贡献是，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并提出工农的这种联盟，是由中国农民与中国工人阶级有天然的联系决定的，所以，它比其他国家里工农之间的联系更宽广、更紧密。特别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时，明确地把工农联盟作为这个专政的基础，并认为，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数最多、

阶级力量最强、与各阶级的联系最广泛的一个联盟。离开了这个联盟，人民民主专政将成为空中楼阁，我们的事业也将一事无成。毛泽东说：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①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学说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学说和国家学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以及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农民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中国是一农业大国，全国人口中有80%在农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中国社会又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各行各业都靠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养活。所以，在中国无论是革命或是建设，离开了农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反抗统治者的斗争都是以农民为主体，农民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农民更是成了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②

中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毛泽东是深深地领会了这一真谛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要坚持革命，要挽救革命，依靠谁来担当这一历史重任呢？大多数人心中无数。只有毛泽东，已经把目光盯到了农村，盯在农民身上。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把革命战争同中国农民紧密联系在一起：领导秋收起义，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是依靠人数最多的农民，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在三大改造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农民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能否成功。基于此，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仍然十分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并用很大的精力去引导农民、教育农民。毛泽东说：

“我国是农业国，有5亿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①

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农业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则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毛泽东说：

在我国的6亿人口中有5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2．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石，农民的状况如何，对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

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农民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农民的经济状况如何，对于工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农民是一支宏大的产业军，担负着国民经济的基础部位（农业）的生产任务，不仅直接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和资金，而且为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证明：农业的收成好，农民的经济状况好，工业就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繁荣和发展；农业歉收，农民的经济状况不好，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甚至处于瘫痪状态，整个国民经济就不景气。

——农民的政治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农民在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1页，1999年6月版。

我国人数最多，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主体，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重要的阶级基础，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只有加强工农联盟，使农民始终成为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得到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由于我们党在农村紧紧依靠农民，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因而我国农村的社会秩序是稳定的，基层政权是巩固的。

——农民的文化状况如何，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很大。由于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农民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题材的来源和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享有者和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主体。也是基于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认为，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首先必须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这个基础，而要巩固工农联盟，关键又是如何解决好农民问题，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问题。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说：

"我国有5亿农业人口，农民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①

事实证明，哪一个时期，我们党对农民的政策搞对头了，充分满足了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农民的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工农联盟就更加巩固；相反，如果我们党在农村的政策有了失误，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他们的积极性也就受到压抑和打击，工农联盟就会受到损害。对此，毛泽东一次在谈到为什么要重视农民的利益时曾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一阶段由于陕甘宁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过重和我党没有认真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便影响到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影响了工农联盟。当我党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农民的积极性也高了，同共产党的关系也好了，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国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农民有意见，影响了农民的情绪；1955年就少购了70亿公斤，又搞了个"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加上丰收，农民就满意了，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

3．土地问题：巩固工农联盟的基本条件。

无产阶级要想牢牢抓住农民这个同盟军，就必须拿出具体举措，来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9页，1999年6月版。

原理，毛泽东认为，满足农民的利益，就是要给他们土地，使他们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摆脱贫穷和落后的境地。否则，是不可能调动他们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的，也不能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同无产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盟。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解放初期，正是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为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1928年冬，毛泽东在井冈山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了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

——1929年4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对井冈山土地法作了三处大的修改，加进了党的“六大”决议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精神。

——1929年7月，在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又主持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对土地的分配方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1931年后，在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由于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有力地推动了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为了争取和团结地主阶级抗日，提出了地主“减租减息”和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又考虑了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实际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地主阶级态度的转变，为了动员群众参战，毛泽东又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并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通过革命得到了土地，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团结，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践证明，要巩固工农联盟，调动农民这个同盟军的积极性，首要的条件是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使之彻底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中解放出来。所以，毛

泽东说：

“如果我们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①

4．农业合作化：巩固工农联盟的又一重要举措。

民主革命胜利后，通过分给农民土地，实现了他们祖祖辈辈都想得到的梦想，从而使农民相信党，愿意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当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满足后，新情况出现了，新的问题也就产生了，主要表现在：

一是由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的经营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土地的利用率不高，很难抵御一些大的自然灾害的袭击；

二是随着经营管理不善，一些农民的土地又得而复失，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三是农村中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矛盾，以达到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呢？毛泽东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因为民主革命使农民得到了土地，革命胜利后，又使一部分农民的土地得而复失。所以，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那个工农联盟又不巩固了。我们现在如果不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人，使之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农民就不会想念我们，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什么意思。同时，那小部分富裕起来了的农民更想富，总想当上个小财东，但又为我们党的政策所不允许，所以，他们也不会相信共产党，这样一来，工农联盟就不那么巩固了。工农联盟就会出现问题，进而势必会影响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怎么办？如何解决革命胜利后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要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消除两极分化，解决单家独户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的问题，解决好小农经济与国家工业化之间的矛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既解决农村中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只有给农民以新的利益，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进而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家政权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毛泽东说：

“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①

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从1953年起，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到1956年底，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使个体农民同工人阶级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使农业逐渐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对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进而解决了土改后可能导致工农联盟破坏的矛盾，使工农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

5．工农联盟在我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由于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性质和任务不同，决定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工农联盟也有不同表现形式和内容，明显地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毛泽东认为，我国的工农联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有着不同的作用。

（1）民主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毛泽东早就指出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就是对这个时期的工农联盟的性质和作用的最精辟的概括。这就是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是建立在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作为这个联盟的共同奋斗目标。民主革命的工农联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离开了土地革命，工农联盟就没有共同的经济奋斗目标，不可能使工农联盟得到巩固；离开了武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以农民为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广大农民的利益可言，因而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民主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的另一个特征是，这个时期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农民”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即是指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雇农和中农，而富农只是作为可以争取的那部分力量。这样，就生动地体现出工农联盟中最中坚的力量，使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科学的依据。民主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目的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基础是用土地改革的方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2) 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在政治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1953 年，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宣告胜利结束。这时，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转化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工农联盟的形式和任务的相应变化，即不再以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为基本形式，而应以教育、示范的方式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工农之间在新的形势下结成政治经济联盟，以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中国的实际国情表明，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必须是建立在合作化基础之上的工农联盟。这个联盟的目标就是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达到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很显然，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这个联盟，不仅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党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把广大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又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使工农之间在社会主义这个新的基点上结成新的同盟。农民离开小生产的轨道，使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复活的温床彻底消失，同时也使城市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失去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新的条件下的全新的、巩固的工农联盟，才使我国人民民

主专政具有强大的力量，也才使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力量。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农联盟。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已在中国基本确立，国内的主要矛盾也由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据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党及时地提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任务。很显然，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工农联盟也必须充实新的内容，采用一种全新的形式。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新形势下的工农联盟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在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时候新工农联盟的形式，主要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农业互相支援，协调发展，工人农民共同富裕；表现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逐步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只有这样的工农联盟，才能比较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要实现工业化，从农业积累一部分资金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像苏联那样，对农民索取太多，把他们搞得很苦的话，就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从而影响工农之间的关系，最后带来严重恶果，既影响工业的发展，又对农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把工农联盟的成功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经济建设中的工农业关系，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做到既要发展工业，又要照顾农业和农民的利益。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这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他多次告诫全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重视农民，轻视农业，那是很危险的，不抓粮食的后果是，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危及工农联盟，进而危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工业部门要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全党对农民问题必须十分重视。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

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物质利益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尽管有过曲折和反复，但还是基本上使工业和农业得以协调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为目标的产业结构。毛泽东探索的，实际上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使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工人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时，这也有利于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有利于巩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形势和新的情况下的工农联盟，进而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更加稳定和强大。

二、争取动摇的同盟者，扩大统一战线力量

对于为什么要加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什么要争取资产阶级这个动摇的同盟者，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有过明确的论述。这年的10月4日，他在为新创刊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中，就告诫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①

可见，加强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也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能否成功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也就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党的重要的政治战略提了出来，并贯彻在党的实际工作中。

1.“两部分”论：毛泽东的创造性发展。

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不是毛泽东的创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列宁就说得更明白了，他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有条件的。”①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两部分”论是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进行科学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完全符合我国社会和我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状况。正确认识和对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和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与中国革命的成败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贡献，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政策和方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大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代表的阶级和依赖发展的后台不同，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毛泽东早期称之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所代表的是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垄断资本，一般依附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身上。毛泽东说：

“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②

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中，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当时，统治中国的中央政权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成了中国最大、最集中、最残暴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从中国现代史看，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革命动力，而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也与封建地主阶级一样，完全是为国际资产阶级服务的，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阻碍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与革命的目的完全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不相容。他们不但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而且还压迫城乡小资产阶级，排斥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性，毛泽东明确地揭露说：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①

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革命中交织着国内阶级矛盾和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样，一旦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因牵涉自身的利益，可能也会参加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斗争。抗日战争就是明显的例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毛泽东曾经指出：

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尽管如此，对大资产阶级还必须保持警惕，时刻提防他们叛变革命，跑到反革命的营垒来屠杀人民。对此，毛泽东时刻提醒全党：

“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②

(2) 民族资产阶级：动摇的同盟军。

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绝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动摇的同盟军。为什么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动摇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同盟军呢？毛泽东认为，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决定的。他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以下两个特点：

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革命性。毛泽东说：

“民族资产阶级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①

也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定的革命性，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不能忽视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应该争取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②

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非常软弱的。这样他们又保存了对革命的敌人的妥协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在任何时候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并同农村中的封建地租剥削也有联系。他们总是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保持着那么一些暧昧的关系，不愿意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而不可能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和两大基本任务，即打倒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能参加革命，或者在革命中守中立，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人民大众的主体，更不是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只是我们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毛泽东说：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的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③

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一科学分析。1924年，当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起，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取得胜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成了革命的力量。但是，当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革命处于低潮时，民族资产阶级又跑到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一边去了，成了革命敌人的帮凶。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又转变了立场，成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支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又左右逢源，既不想得罪中国共产党，又不敢得罪国民党蒋介石，所以，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动摇不定，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总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的确是表演得淋漓尽致了。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对其采取了团结和争取的政策，因而使革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

2．团结、争取、改造：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是盟友。

在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能不能与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阶级一起跨入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无产阶级的盟友，仍然是我们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这是因为：

（1）民族资产阶级同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的盟友关系，我们不能忘记老朋友。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也不管他们过去在一定时期内曾反对过革命，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盟友，也为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过河拆桥的，更不会恩将仇报的，所以，是不会忘记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朋友的。毛泽东说：

“只要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和文化建设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人民和人民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们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们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同他们保持着同盟军的关系。”①

（2）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经济管理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必须与他们结成联盟。毛泽东认为，为达到社会主义改造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8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目的，最终消灭剥削制度和反革命残余势力，以及较快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尽快地将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与他们结成广泛的联盟。否则，将会影响社会主义改造的按时完成，将会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人和农民，以及其他劳动阶级，大都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新中国非常缺乏熟悉企业管理和技术研究、技术推广应用的人才。而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长期从事工商业活动，有不少的人具有相当的经营和管理能力，且有丰富的管理和业务经验。特别是有些工商资本家本人就是知识分子，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的这些经验和技能，恰恰是无产阶级所缺少的，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特别对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极为重要。对此，列宁早就告诫我们：

“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莫名其妙地就有了，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的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我们看看这个例子：资产阶级刚刚胜利时，它是用另一个阶级，即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做管理工作的，否则它就无人可用。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才，而我们也就有同样的任务，要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①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在我们面临巨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的情况下，灵活运用了列宁的这一思想，论述了充分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管理经验和技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和他们结成联盟。1953 年 7 月，毛泽东特别邀集李济深、陈叔通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座谈，向他们转达了我们党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与会者拥护和赞同。

(3) 民族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可以提高人们物质文化水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步伐。当时我国的经济结构是这样的：私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 63%以上，在供应城乡居民日常需要的消费品工业总产值中占 70%。可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我国国计民生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果不利用和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积极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正是基于这一客观实际，毛泽东明确告诫全党：

---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70 页，人民出版社，1970 年版。

"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①

(4) 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分析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同工人阶级合作。他多次指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得他们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软弱。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他们也有益处，特别是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党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所以，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赞成和拥护的，他们愿意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就使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必要的基础。

(5) 和平赎买：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有效方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过贡献，又因为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对这样的老朋友，我们党不是简单采取打倒的政策，而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采用和平赎买的政策。也就是用和平的手段引导老朋友自觉接受改造，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过程中采取了两个步骤，以便使民族资产阶级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一步一步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步骤是：

第一步，将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第二步，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这一改造方针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他说：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②

实践证明，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这个政治战略是正确的。我们之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所以说这个政治战略是正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坚持对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但是，如何改造剥削阶级分子，他们没有作过明确的回答；列宁在领导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因为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拒不接受和平改造，所以他们采取了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即用专政的方式来处理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自身特点，而且又有过与无产阶级联合的历史，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所以，毛泽东便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针，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并根据这一理论阐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法。即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同他们保持统一战线，同时通过民主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改造他们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正由于我们党采取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才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出现抗拒改造的情况，使我们团结、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调动了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一工作经验时说：

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

二是，在改造中，坚持把资产阶级分子放在企业内部来改造，促使企业的改造与人员的改造结合起来。由于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用逐步过渡的方法来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国家在对待资产阶级分子时，没有采取扫地出门的方法，而是把对他们的教育放在企业内部，同对企业的改造结合起来。实践证明，这种同时改造的方法，效果是很好的。一方面，让资本家在企业内部亲身参加对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使他们有可能通过生产经营、企业改组、以至生产关系的变革等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受到最实际的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使他们逐步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进而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通过参加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使他们增进同工人阶级的感情，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从而抛弃其剥削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意识，自觉地树立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决心。另一方面，把资本家放在企业内部改造，对于顺利实现企业的改造也是十分有利的。一则可以利用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

营管理知识，发挥其在改造中的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减少在大规模经济改建过程中的混乱和损失；二则让他们在企业内部有其位、谋其事，使他们不能不对生产经营、企业改组、所有制的改造负有一定的职责，增进他们对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责任感，以减少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阻力。实践已经证明，党把资产阶级分子放在企业内部改造，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三是，坚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的人员和他们的政治、工作和生活待遇作出妥善安排。在政治上，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让他们享有公民的待遇，并对他们中间的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中有所表现的代表人物作出政治安排，让他们参与对国家的管理。在经济上，对资方人员的工作给予全部安置，并让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在企业中担任适当的领导职务，成为企业的管理人员；不降低他们的工薪，对他们的家属、子女作出妥善安排；在工作中，对企业中的公方管理人员提出严格要求，不能对私方人员态度粗暴，要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使私方人员消除对公方人员的戒备心理，充分利用他们的能力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正确处理两个联盟的关系，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会动摇和影响统一战线的力量，都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损失。这已经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的真理。所以，毛泽东始终认为，要发展和扩大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处理好两个联盟的辩证关系。

1．工农联盟是基础。

毛泽东十分重视工农联盟，认为这是两个联盟的基础，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键力量。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对这个问题的实现，又主要体现在对于农民的领导权问题上。所以，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巩固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也就成了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的最关键的联盟。毛泽东多次指出，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是占了中国80%上的农民。没有农民这个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在领导中国人民展开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时，必须首先与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舍此是不可能领导革命到胜利的。

这两个联盟中，工农联盟是主体，是人民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工农联盟愈巩固愈发展，争取第二个联盟内的同盟军的工作就愈顺利，已经争取过来的同盟者就愈坚定。只有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才有第二个联盟的巩固和发展；只有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确保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才能使统一战线获得雄厚的可靠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正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建立与巩固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任何削弱这个联盟的看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决不容许以削弱工农联盟来换取第二个联盟，进而放弃工农群众运动工作的现象存在；更不容许不顾农民的基本要求而去迁就第二个联盟，或者把依靠农民群众与第二联盟对立起来，认为强调工农联盟就会吓跑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存在。也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或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总是把工农联盟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不管遇到任何复杂的情况，都坚持指导全党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联盟仍然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农民仍然是主力军。这是因为，在我国比较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艰苦繁重的手工操作方式，改革传统农业，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所以，他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最大，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只有与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达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是非常注重这一点的。他始终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与农民结成坚不可摧的联盟。有了这个联盟，就可以更好地争取与非劳动阶级的联盟，同他们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2. 争取第二个联盟，为巩固工农联盟提供有力的支持。

革命统一战线既然是由工农联盟和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组成的，那么，争取第二个联盟，即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对于扩大统一战线，对于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有着重大的作用。所以，毛泽东一直重视争取和巩固这个联盟，注意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来争取和加强这个联盟呢？毛泽东认为，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只有这样牢牢地把这个同盟军

控制在革命的统一战线内，才能发挥第二个联盟的作用。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特点，明确制定了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方针，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这一策略就更完整化了。为了加强这个联盟，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制定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分化资产阶级集团的政策。这样，不但没有使第二个联盟破裂，而且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加强了第二联盟，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争取了多数，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时，仍然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不断加强第二个联盟，巩固第一个联盟。建国初期，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内外敌人加紧了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进攻，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有的同志沉不住气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恨铁不成钢，提出将其作为革命的对象。毛泽东认为，这样一种思潮，既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因此，他明确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原则。要充分认识到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仍然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我们坚持了这一正确方针，我们不但巩固了工农联盟，而且顺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即便是如此，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仍然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这种斗争有时还相当激烈。这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因而自始至终充满着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尖锐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这场用和平方法进行的特殊斗争中，仍然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就是说，在对资产阶级用民主的方法进行教育改造的同时，对那些不接受教育、抗拒改造甚至违法的资本家，实行必要的斗争。毛泽东说：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①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中，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期间，较大的斗争就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9年至1950年，主要是同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

第二次是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斗争；

第三次是1953年围绕着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第四次是1955年开展的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围绕在清产核资和人事安排问题上的斗争。

其中1952年的“五反”斗争最为激烈。当时，不法资本家利用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手段，即“五毒”行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严重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针对这种情况，党领导全国人民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使资产阶级感到越来越孤立，使资产阶级分子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党在对资产阶级进行又团结又斗争的同时，还充分注意利用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分化，积极做好扩大进步层，带动落后层，孤立少数反动分子的工作。特别是对他们中间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的先进典型，给予及时的宣传和表扬，对于那些极少数的顽固分子给予必要的打击。我党正是通过做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工作，努力使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受到教育，从而达到把他们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目的。

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胜利，说明了毛泽东的两个联盟的政治战略是正确的，说明了我们采取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正确性，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工农联盟，壮大了人民的力量，而且使无产阶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2—19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得到一定的加强、顺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完成后，特别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虽然过去第二个联盟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入了第一个联盟，但是毛泽东的两个联盟的政治战略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十二章

“还是几个党好”：多党合作的政治战略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亲密合作，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发展史上的重要特点和内容。民主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民主党派居于何种地位，直接涉及中国的政党制度如何建构。所以，多党合作，共同参政，是毛泽东为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而提出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国领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了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战略，从而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毛泽东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① “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集团或个人，对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②

一、多党合作的实践：毛泽东与民主党派的历史渊源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与党外人士、民主党派合作奋斗的思想，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独创性发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来思考这一问题。毛泽东说：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间阶级。我国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基本上是由农民以外的中间阶级组成，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要求。我们只有采取争取、联合民主党派的方针，并通过他们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形成最广大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①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非常关心和支持民主党派的建设，关心民主党派人士，并与他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共有10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这些民主党派大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具有阶级联盟的政党。全国解放后，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先后自动宣布解散，只剩下8个民主党派。长期来，毛泽东在与这些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党外民主人士的交往中，政治上尊重信任，思想上交流帮助，生活上细致关怀，留下了许多有教育意义的轶闻佳话。这也是我国多党合作史上的佳话。

1．建议"九三"学社改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1944年由许德珩、潘菽等发起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许德珩等决定把这个座谈会定名为"九三"座谈会。9月12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会见了许德珩等人。毛泽东听完他们有关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情况后，认为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带有政治倾向，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于是，立即建议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毛泽东说：

"德珩先生，刚才你说你们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参加的人不少，既然参加的人多，就干脆把它改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能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②

由于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许德珩等"九三"座谈会的组织者一致同意将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 谭玉琛：《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3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个有固定组织和场所的座谈会改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正式定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在我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刊发了消息。从此，“九三”学社作为一个永久的政治组织，或者说政治联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争取国内民主和平、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时，毛泽东亲自圈定“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参加会议，并要周恩来找许德珩写一份关于“九三”学社情况的报告，使之名正言顺地成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之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民主党派认为自己在民主革命中的使命已经完成，就自行宣布解散。中国人民救国会就是在这时候解散的。受当时这股风的影响，“九三”学社的部分成员也认为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九三”学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提议解散。毛泽东刚从苏联访问回国，在听说中国人民救国会已经解散的情况后，又有人告诉他“九三”学社也准备解散，其他的几个民主党派也在酝酿解散中。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已经解散的难以挽救，没有解散的民主党派，一个也不能解散。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同时，他又要中央的一位领导同志去做许德珩的工作，要他进一步加强“九三”学社的组织。毛泽东说：

“‘九三’学社是一个进步的组织，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过贡献。对此，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九三’学社不但不要解散，而且要继续发展，以发挥更大的作用。”①

这样，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九三”学社在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由一个只有百来人的政治组织，发展到1万多名成员，成为联系科技界知识分子中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关心中国民主同盟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一直是国统区要求团结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毛泽东与民盟的几位领导人过从甚密。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和平谈判期间，多次会见民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等，就国共合作、民主建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特别

① 谭玉琛：《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3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是毛泽东在重庆“三访”民盟领袖张澜，当时就传为佳话。在三次会见中，毛泽东与张澜真诚相见，将我们党的许多主张向张澜解释，并把和谈的进展向他通报。张澜也时时牵挂着毛泽东的安危。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民盟在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争和平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在一次答谢宴会上指出：

中国民主同盟在国统区坚持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斗争，对解放区的支持很大，我们表示感谢。你们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的建议，我非常赞同。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1946年以后，在国统区反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斗争中，民盟的领导成员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相继惨遭国民党的杀害。毛泽东分别电唁其家属以表慰问。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团体，不得不于次年1月迁香港重建临时支部。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对国民党、蒋介石迫害民盟的做法予以强烈谴责，并于同年的5月1日致函民盟负责人，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而在事实上驳斥了国民党、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政策。毛泽东在给沈钧儒等的信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①

在毛泽东的关心、支持下，民盟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建国后，民盟没有忘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自己的支持和爱护，积极推动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自己真正成为以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3．与民建领袖黄炎培坦诚相见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非常尊重，不但关心他们的发展，而且要求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1—30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他们多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贡献。他与民建的知名人士，特别是与民建的主要创建人黄炎培先生更是友情深厚。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等，毛泽东就多次与黄炎培交谈。民建是1945年由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的，由黄任主任委员，参加者多为工商界知名人士。为了发挥民建对于联系工商人士这一特殊作用，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政府中，特别安排其负责人黄炎培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就是在延安时黄炎培与毛泽东谈话时提出来的，并为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牢记在心里。1945年7月，黄炎培同几位国民参政员访问了延安。毛泽东不但接见了他们，而且与黄炎培作了一次长谈。当毛泽东问黄炎培参观延安后有什么感想时。黄炎培直率地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查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①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毫不掩饰。毛泽东听后，很是感激民主党派朋友的忠言。他高兴地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②

毛泽东的铿锵有力的回答，黄炎培很是感动，澄清了他原来的许多模糊思想，并从与毛泽东的交往中获得了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与黄炎培谈民建的前途和分工问题，并希望他

① 谭玉琛：《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15—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② 谭玉琛：《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15—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些工作，为全中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同时，还向中共中央建议，要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52年9月，三反、五反运动时，工商界人士情绪低落。毛泽东劝黄炎培以民建负责人的身份发表一次讲话，以消除工商界人士的一些顾虑，鼓舞他们振作起来，搞好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黄炎培很愉快地答应了毛泽东，并及时地在一次民建会议上的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民建中央对工商界人士的要求。同时，准备把讲话稿印发全国各地民建组织。毛泽东在送审的准备下发的讲话稿上作了4处大的修改，并致信黄炎培，对工商界人士要以诚相待，不要操之过急。毛泽东在信中说：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说先生所说的'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①

从毛泽东对黄炎培的这个讲话的修改和给黄的信可以看出，他对黄的帮助是赤诚的、同志式的。黄炎培反复读了毛泽东的信和对他的讲话稿的修改后，深感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对民主党派的信任。这个讲话稿发下去后，立刻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开了一条崭新的路，我们一定要好好干，为社会多出力。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毛泽东特地指示有关部门，邀请黄炎培和其他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列席大会。这又使黄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随后，他立即召开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传达了中共八大的会议情况，并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将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写了信，作了情况汇报。毛泽东立即予以回信，表彰了民建的进步。毛泽东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4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①

4．毛泽东要求民主党派跟着共产党过“三关”。

毛泽东在与民主党派交往时，总是平等相待，真诚相见。1949 年 11 月，应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之邀请，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农工民主党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干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在听取了章伯钧对大会情况的介绍后，风趣地对代表们说：

“你们知道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故事吧！我现在也坐在关口上，看你们过关呐。但是，我今天讲的三关，可不是杨六郎的那三关呐。我讲的三关是：第一关就是战争关。这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而且大家都过得很好，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全国人民也是满意的。第二关是土改关。也就是现在要过的。这一关就不那么好过了，大家的出身或多或少同封建土地制度都有些联系。我希望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好。大家要多研究，多商量，搞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顺利地过这一关。第三关是社会主义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这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②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一席话，使被接见的代表深受感动，如沐春风，心中荡漾起一股暖意。毛泽东肯定农工民主党战争关过得不错，就是对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最后说：

“只要大家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的多年建设和文化中有所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③

后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对所有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讲了与上述相同意思的话。所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工民主党的评价和希望，实际上也是对所有的 8 个民主党派的评价和希望，目的是要民主党派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深刻认识到自己作为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这样，就不但使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要求有了比较完整的把握，而且使民主党派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实实在在地作为参政党在发挥作用，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道，共同为建设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14—515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2 月版。
②③ 邵康：《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第 133 页，团结出版社，1993 年 9 月版。

5. 反对党内的“左”倾思潮，坚持正确的多党合作的政策和方针。

中国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反对“左”、右倾两种错误倾向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发展壮大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采取的关于对民主党派的方针和政策，是中国民主党派政治纲领的传播和实现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样，首先在知识界的上层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联名通电，宣告脱离国民党，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张组成“联合战线”抗日、反蒋。而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错误地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把可以团结的民主力量，推向了敌人一边，使刚刚成立的民主党派这支力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停止内战、停止国内阶级间、政党间、政治集团间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从而团结了所有的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后来，我国大多数的民主党派是从这时开始慢慢演变和发展起来的。

1937年初，王明从苏联回国后，见他原来的那一套已根本行不通了，于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左跳到极右，拱手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交给蒋介石，给国民党、蒋介石有机可乘。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这种右倾倾向和蒋介石趁机拉拢、分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达到孤立中国共产党之目的阴谋，多次给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写信，提醒他们要警惕蒋介石玩弄的两面派伎俩，切不要再受骗上当。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又提出了联合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团体，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①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依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2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靠广大人民群众，与民主党派紧密合作，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而又一次得到民主党派的拥护。

中国的民主党派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之所以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所以没有走“中间路线”，虽然与革命的节节胜利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实行了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政策，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政治集团和民主人士的拥护。事实证明，中国民主党派反帝、爱国民主的政治纲领的传播和实现，民主党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如果不是这样，中国民主党派的任何政纲都将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6．毛泽东提出了多党合作的具体而有效的组织形式，保证了合作的顺利实现。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实践表明，要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系，必须有正确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合作共事、协商解决的方式。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机构来协调行动。所以，从1948年5月后，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向各民主党派发出邀请函，主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用人民政协作为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组织机构。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为民主协商的具体方式。从此，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有了固定的组织形式。所以说，新政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国家大事的合作方式的形成。

毛泽东领导和主持的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充分体现了各党派平等的精神：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组成筹备会共同召集；筹备会的21名常委中，非中共人士14人，占三分之二；6名正副主任中，非中共人士4人，也占三分之二。新政协会议召开时，在商讨建国的重大事情时，也广泛听取和采纳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出自张奚若的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则是采纳了徐悲鸿的意见；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是马叙伦的主张。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在总结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多党合作比只有一个党好，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个方针的初衷，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妥善处理好双方的关系；目的是为了互相监督，特别是需要参政的民主党派来监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①

1.“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形成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他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经验的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

(1)“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坚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方针。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做过好事，作出了贡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党之所以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基本方针，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考虑到我国的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拥护；

二是各民主党派也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与中国共产党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

三是从中华民族所面对的敌人和国家的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来看，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毛泽东确定了多党合作这一重大的政治战略。1957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特别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作了明确阐述，并把这一基本方针作为我党的重大的政治战略而确定下来。毛泽东说：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方针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具体体现。坚持这一基本方针，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调动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作用。毛泽东特别强调民主党派作为一种外部监督对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意义。毛泽东说：

“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②

实际上，坚持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在批判“左”倾空谈主义时，就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那篇著名著作中，第一次详细论述了这一战略方针。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③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④

---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夕，毛泽东又一次号召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作好同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准备，在工作上切实采取长期合作的政策，在干部的使用上同等对待，决不容许任何排斥和轻视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的现象存在。毛泽东告诫全党：

“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每一个大、中城市，每一个省和战略性区域，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是敷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①

建国初期，有的民主党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准备宣布解散；当时，我们党内也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作用不很大了，可有可无了。毛泽东听了有关部门的汇报，了解到民主党派内和我们党内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和看法后，明确地说：

“要向大家讲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有民主党派……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②

1956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内部原来曾经出现过的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彻底完成，民主党派“可以取消”的思想，以及民主党派中的一些成员原来就已经有等待解散的思想又重新冒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消除中国共产党内部和民主党派内部的这些错误认识，势必危害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势必会影响和打击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在及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经验教训后，及时而明确地阐述了我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两个万岁的观点。毛泽东说：

“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1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①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明确作出决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成员将转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转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因此，在今后，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2)“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提出的理论基础和客观条件。

毛泽东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作为政治战略提出，不是他凭空的主观臆想，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充分的客观条件的。

首先，从理论渊源来看，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团结广大同盟者的理论。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千百万革命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一切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无不是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结果。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中，无产阶级还不占多数，占多数的还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要完成历史任务，就必须去争取和团结广大的同盟军。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这个问题也作了原则的阐述。他说：

“谁的后备军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撑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共产党和非党员结成这样一个联盟是绝对必要的，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上谈不上顺利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②

毛泽东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共产党必须与非党员结成联盟的原理，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才明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各民主党派结成广泛联盟，并进行长期合作的原则，进而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

其次，从客观条件看，这一基本方针的确立，主要是基于当时我国各阶级、阶层、政党之间的具体实际；基于当时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面对的强大敌人，要求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战胜他们。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当时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其阶级实质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

①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13页，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8页。

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明确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创立人民政协这一具体组织形式来具体协调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国家政权，并共同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这样，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能够长期合作。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外帝国主义和尚未完全消灭的国民党残余势力，都想置新生的红色政权于死地，再加上蒋介石留给我们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也需要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认真对付。这一切，就成了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的客观现实条件。毛泽东说：

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泛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①

2.“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期共存，亲密合作，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如何合作共事的问题；二是互相监督，共同发展，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革命和建设中怎样相互监督，一起发展的问题。

(1) 长期共存，亲密合作。

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亲密合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发展史上的主要内容。特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共存”、“合作”关系显得更加突出。所谓长期共存，亲密合作，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许多民主党派，都将长期存在，合作共事，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长期共存，究竟是多久？毛泽东多次说过，一直到政党消灭为止。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存在多久，各民主党派也就存在多久。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亲密合作的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出于临时的策略需要，而是从政治战略的高度来立论的，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的。毛泽东曾经指出：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里，毛泽东把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看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提到了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来认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同时，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还认为，在人民利益基础上实行亲密合作，既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继续合作的原则，也是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任何合作都是在一定基础上的合作，是有条件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离开了这个政治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说：

共产党同多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胜任。”①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这种“共存”、“合作”关系要长期存在下去，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正确外，还要看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怎样。只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能否长期共存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看，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民主党派中虽然有个别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掉了队，违背了“共存”和“合作”的基础，但从整体看，我国各民主党派确实在革命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人民的信任，是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毛泽东指出：

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事业，离开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事实上，在建国的头7年，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坚决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而且身体力行，在实践中真正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共商国事，倾听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主动与民主党派人士交往，或通过书信，商讨国家大事；或谈诗论词，共叙友情；或通过聚餐和相互拜访，了解民主党派人士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在贯彻执行这一基本方针过程中，毛泽东具体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让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各级政权的管理工作。毛泽东认为，做好这一工作，是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他就亲自过问各军政区、各省及重点城市的政权建设，多次指示各地必须“网络各民主人士”，成立“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毛泽东还亲自掌握各地对主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政府中的工作安排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安排得当，则表示赞同。广州成立军管会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安排少了些，他立即代中央起草了电报，作了三点具体指示。电报指出：

“(1) 广州军管会及广州警备机关名单除照你们以外，应加上李章达、张西录、吴奇伟三个党外人士为军管会委员。(2) 广州军管会及广东省政府均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3) 你们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随时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①

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得知华中局在筹建广西省政府时，决定拟任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的李任仁为政府副主席时，极为赞许，立即复电华中局：

“你们十七日吸收李任仁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云逸（指张云逸，引者注）正和李任仁谈此事。我军占领广西全省后还要物色其他民主分子参加工作。”②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80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正式实行后，毛泽东对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政权工作更加重视。第一届全国人大拟任的国家领导人名单，就是由他亲自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协商后提出的，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二是，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并及时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毛泽东特别注重发挥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他常说，同党内的同志在一起，听到的意见总是不多、不同的意见就不容易听到，只有广泛接触各方面的人士，才能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所以，只要有可能，毛泽东总是为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发表意见创造条件。1949年9月，在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就让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发表意见，参加议政问题专门致信周恩来，信中说：

“周：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即来不及讲了。请注意组织此事。”①

这件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实际意义却很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作用的高度重视。

1950年4月，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就苏南征粮中出现的偏差及补救措施，写信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收到信函后，立即去函华东局，信中特别提示说：

“请叫陈丕显同志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粮食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3项问题，向中央作一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如材料不足，须经过调查研究，可于6月10日以前做好发来。特别注意调查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据黄炎培说，此3县有灾民30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②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第5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版。

毛泽东给华东局写信后，又特别指示陈丕显两次拜见黄炎培，向他通报苏南情况，并交接意见，并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使黄炎培先生极为感动。毛泽东在信中说：

"任之先生：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①

三是，主张和要求民主党派成员与其他党外民主人士，积极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实际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去掉自己头脑的旧思想、旧观念，从而增进与劳动阶级的感情。为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作用，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真正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亲密合作的关系，毛泽东多次让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如在镇反运动中，他提倡让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在土地改革中，他支持党外民主人士多到农村走走，做一点调查，或者直接参加土地改革。为了使全党同志统一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特别强调：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

由于毛泽东的积极推动，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党外民主人士踊跃参加、参观土改工作和其他各项中心工作。据有关部门统计，仅1951年5月，北京和天津两地就有689名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参观了土改工作。民主党派参加土改，壮大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阵容，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对夺取土改斗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2年11月，当我国即将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转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又及时肯定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各项经济建设工作的意见。毛泽东曾在一份报告上批示：

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此事件中所说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是必要的。其他民主党派恐亦需解决此问题。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402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这样，自1953年以后，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学社、台盟等民主党派，都先后确定以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并努力推动其成员在祖国的建设中积极贡献自己的知识和专长。这一切，是与毛泽东鼓励、支持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加议政活动是分不开的。

(2) 互相监督，共同发展。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所以要长期共存，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互相监督。为什么要让参政的民主党派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相互监督呢？毛泽东是这样告诫全党同志的：

“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① “对于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对于民主人士，我们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②

毛泽东认为，同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要保证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进而使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必须有多方面的监督，其中就包括民主党派的长期监督，以确保自己不犯或少犯错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总结。

二是由中国共产党内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革命的胜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开始好转，在党内便逐渐滋长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上进的情绪和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特别是一些曾经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同志，却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成为资产阶级金钱的俘虏，开国第一贪污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出现，就给我们敲响了这方面的警钟。与此同时，由于革命的胜利，少数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以为自己打下了江山，便居功自傲，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有的同志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染上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不良习气，在工作中不时表现出命令主义的作风和其他方面的违法乱纪行为。面对中国共产党内的这样一种状况，要克服以上不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使我们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除了加强党内教育和采取组织措施，以至于必要的法律手段，包括最严重者处以极刑外，更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以制约部分人手中的权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来自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多听他们的意见，使我们在贯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时，一切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使我们党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

民主党派怎样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呢？毛泽东认为，包括参政议政、批评、建议、参加管理等。1955 年 1 月，为了贯彻执行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时，在原稿上的“政协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应开一次会，对于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各种名单等，应提到适当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一段话旁，加上了“这种对重大问题的协商会议每年至少要 4 次，即平均每季有一次；此外还应有一些若干个别问题的协商会议”一段文字。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对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倾听不同意见，使中国共产党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是非常重视的。他还更明确地说：

“如何监督？就是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我们有各种机会，比如今天就是机会，还有各种机会进行批评。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批评缺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实践中，毛泽东还根据相互监督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认为彼此间的监督不是没有条件的，必须符合一定的原则。为此，他提出了双方监督的 6 条标准，以实现正确而有效的监督，防止负面效应。毛泽东说：

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这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

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①

总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目的，是为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富强和复兴。所以，毛泽东断言：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但是我们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批党外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为改造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

3．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的深远的战略意义。

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战略，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正确处理国内外各种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1）坚持和贯彻这一基本方针，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派别。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就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而且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进而帮助他们不断进行自我教育，推动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已经在国家政权机关里担任着重要职务；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其他许多部门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员。由此可见，各民主党派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这种长期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实际上也就是加强了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2）坚持和贯彻这一基本方针，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人民民主专政不但需要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工人阶级只有同最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比较顺利的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建成社会主义。当然，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农民占80%以上，因而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但也必须看到，在我国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加强统一战线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我国社会中除了官僚资产阶级以外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比较有影响、有知识、有管理经验的阶级。这个阶级不但在历史上发展了近代工业，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接受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态度，接受又逐步地采取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并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坚持同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对于巩固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是非常有益的和必要的。

(3) 坚持和贯彻执行这一基本方针，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正确协调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扩大民主，协调好国家内部人民之间的关系，以便调动全国各阶层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常脱离我们国家制度的正确原则；在一些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所以必须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正是我们国家制度的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的有力保障。这个基本方针的基本点是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只能通过互相监督来实现，互相监督是长期共存的保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二者之间，更需要的是民主党派的监督。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她在国家中处于执政地位，她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党自己的事业的成功与否，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同时，由于我们的许多共产党员处于领导岗位，需要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和作风。因此，加强民主监督，可以不断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由于各自有自己不同的联系对象，他们

的监督，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听到在自己周围的群众中不易听到的意见。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更需要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民主党派在工作中也会发生缺点和错误，因而也需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这样，各民主党派才能有效地参政议政，才能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可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只有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协调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才能协调好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才能协调好人民内部产生的各种复杂的关系，从而为“互相监督”提供良好的客观环境。

(4) 坚持和贯彻这一基本方针，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步伐。这是因为，各民主党派及其联系的群众中，绝大多数是知识界、科技界、文化界人士，而且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其中许多人比较好地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这些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专门人才，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因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由于这部分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比较高，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和国际影响，通过他们的工作，可以扩大我国对外的影响，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总之，加强同这些人的联系，充分依靠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对于我国同各国发展文化经济往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十三章

提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957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无论是在中国，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在发生着一场极其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当时，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确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这样的时代，呼唤着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政治战略的诞生。毛泽东，这位20世纪的历史巨人，正是顺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潮流，根据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通过分析我国各阶级的现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明确将此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战略，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所谓国家政治生活是指国家的有关政治性日常活动，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对其它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着重要影响。毛泽东之所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首先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对这一矛盾的处理的正确与否，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后来，不管毛泽东如何改变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但“主题论”命题，他是始终能够接受的；“主题论”这一政治战略，他是始终坚持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政治战略，是适应当代政治要求、有特定意义和全局性意义的战略。毛泽东提出“主题论”政治战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集中与统一、纪律与自由、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说：

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

很显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题目的思想和实践，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贡献，是他在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一大成果。

一、“主题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是多事的一年。

这一年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苏联的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许多共产党国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抛出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震撼了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人。

1956年6月，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10月，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际上这两个事件的发生，给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也使人们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这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

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国内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事件，带来了人们思想的混乱。

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深深思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可见，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战略提出，是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深刻的国内原因的。

1．刚刚开始的国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已基本完成，从而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大规模的建设即将开始。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在这年的9月，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议指出：

“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

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要实现党的八大提出的目标，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当时面临的具体情况却是：几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比较起来，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不完善，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也在一定环节上起作用，等等。因此，必须很好地总结经验，找到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种方法、形式和措施，去不断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方面的复杂的问题。同时，也要求我们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不断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克服各种困难，解决各种矛盾，以更快地推动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主题论”的政治战略。

2．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我国社会虽然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956年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作了初步分析，并归纳为5个方面。

一是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变化看：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已经被铲除，虽然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我国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已经大量地不表现为束缚与破除的对抗性矛盾，而表现为内部调整的非对抗性矛盾。

二是从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情况看：我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和它们之间的相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23—524页，人民出版社，11980年1月版。

互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9年前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对立的阶级矛盾。全国解放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主要是解决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也基本上是对立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改造，而且正在实现着从剥削者向劳动者的转变；广大农民也由原来个体私有的小生产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所以，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三是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据统计，到1956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9.1%，很大部分工业还停留在半手工劳动的水平，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还是比较落后的小生产。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的生产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迫切需要。

四是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当时的工作作风看：过去我们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面对的是敌人，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因而学会和掌握了如何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积累了丰富的处理阶级斗争的经验。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后，我们面临着国家各方面的庞大的、复杂的建设工作，对这些我们没有经验；特别是对日益增多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缺乏正确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五是从我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来看：当时，正处在社会的大变动时期，也是两种体制转轨时期，尽管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对这样一个新生事物，仍有些不习惯，甚至有的人在自己利益没有完全得到时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抵抗情绪。而这种抵抗情绪又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需要我们去说服、教育群众，使之逐步适应和树立起新的观念和习惯，树立起新的世界观。

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变化，决定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从对抗性矛盾转向非对抗性矛盾，从敌我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从阶级斗争转向同自然的斗争。一句话，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3．当时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和苗头，而我们的干部在处理中又没

有正确的标准可循，这样，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1956年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较深刻的认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没有经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少数地方、少数人闹事的问题。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

"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百人，多者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①

发生这种闹事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但从参与闹事者来看，大多数是为了要党和政府解决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只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捣乱，属敌我之间矛盾。毛泽东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这种闹事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

"发生少数人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的或在经济上的政策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②

毛泽东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它说明这些闹事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然而，我们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是敌我矛盾，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与政府闹事就是敌我矛盾"，等等。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采取了专政的手段，激化了矛盾。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说：

"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运用武力。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和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面县政府根本不顾群众意见，硬是在那里建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8名警察赶赴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二是，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放寒假回家路费，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6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②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7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①

对这些单位和地方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毛泽东非常气愤，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一些干部官做大了，与群众离远了，再也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二是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所以一出现问题，统统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毛泽东对这些错误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现在，有这么一种空气，有相当这样的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忱无忧了，可以横行霸道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的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办法对待新问题。……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②

批评归批评，但总还得找到一条有效的办法来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这样，毛泽东在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后，适时地提出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以此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4．国际上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不得不认真总结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并在总结这些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大反斯大林，借反对斯大林的晚年错误而全盘否定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对待斯大林。对此我们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是有看法的。毛泽东明确地说：

“批评斯大林有两方面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大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他揭的方法不对，没有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个方法引起全世界去年下半年的几次风潮。”③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70—5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②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③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必须是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对此，毛泽东组织写作班子，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毛泽东在讨论这两篇文章时，在肯定了斯大林的功劳的基础上，指出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对这个错误是应该批评的。但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时候，也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斯大林。

由于苏共20大的错误，很快波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世界性的反共风潮愈演愈烈。“波匈事件”正是苏共20大后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严重后果。所谓波兰事件，是指波兹南市于1956年6月28日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波兰共产党的一些干部的错误，使党同群众发生误会。后来，由于波兰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措施，如克服缺点，扩大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从而得到人民的谅解，事件得以较好的解决。

然而，匈牙利事件就在不同了。1956年10月下旬，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也发生了类似波兰的骚乱，其原因也主要是由于匈牙利共产党的错误而引起的。但是，事件发生后，匈牙利党却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待群众闹事，这样带来了更大的麻烦，甚至被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共势力所利用。

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来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并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所以，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而且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存亡。正是在这一系列国际国内复杂情况下，毛泽东制定出了“主题论”的政治战略，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们党能否领导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说：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十分必要的了。”

二、“主题论”政治战略提出的重要标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主题论”政治战略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提出来的，是为了我们党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战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不是出于一时的考虑，而是酝酿了很久，积累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他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时，就一直萦系心头的问题。

1.“主题论”政治战略形成的历史过程。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时就说过：“我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这表明，“主题论”政治战略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1952年，毛泽东在为《矛盾论》重新发表而作的修改中，在“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一节中，对两类矛盾问题作了阐述。

1955年5月，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要分清楚“人民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他说：

“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①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矛盾，但大多数已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指出：

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8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对“主题论”政治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

1956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研究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突出的重大课题。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已接触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问题。他指出：

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民建主委、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黄炎培的信中，就初步阐述了两类矛盾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论”政治战略的基本逻辑结构勾画出来了。毛泽东说：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

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①

1956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历史经验》时，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矛盾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明确使用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个重要概念。同时，他亲自加上了一段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的重要文字。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②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主要是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专门就思想动向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矛盾，讲辩证法，讲如何对待群众闹事，即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说：

"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这个东西，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的斗争很小，因为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的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③

至此，毛泽东"主题论"的政治战略已初步形成。于是，便有了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进而也便有了这一政治战略的完整框架。

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主题论"政治战略正式出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据薄一波回忆，这篇讲话从提纲到讲话录音的整理，再到正式公开发表，前后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修改了这么长的时间，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这个事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慎重，必须反复听取意见，加以认真修改，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二是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战略提出，必须作进一步的调查和可行性研究，以便使这一战略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51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② 参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3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
③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8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三是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共产党人遇到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讲话中对这一政治战略的框架的基本逻辑结构，还有许多的东西不够成熟，需要再调整和再思考。

事实的确是这样，从现存的档案看，这个讲话开始还只是一个提纲稿，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分十二个问题，再加十大关系，整个提纲不足3000字。十二个问题是：

(1) 两类矛盾；
(2) 肃反；
(3) 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
(4) 资本主义改造；
(5)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6) 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7)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8)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9) 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10) 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
(11) 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
(12) 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改变面貌。

十大关系是：

——重与轻、农的关系；
——沿海与内地关系；
——经济与国防关系；
——国家与生产单位（工厂、合作社）与个人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
——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其他人关系（长期共存)；
——敌我关系；
——人民内部关系（是非关系)，一家与百家关系（百家争鸣)；
——中国与外国关系。

后来，在整理成文时，十二大问题与十大关系合并成十二个问题。

讲话一个多月后，即1957年3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将整理成文的讲话记

录报毛泽东。他收到后，既没有急于修改，更没有安排有关部门发表。这段时间，毛泽东就这个讲话，或者说这一政治战略的公布于世问题，做了三件事：

一是反复思考和研究这一政治战略的可行性问题，并仔细推敲每一个观点和提法；

二是走出北京，南下部分省、市，一边宣讲讲话的内容，一边调查研究，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

三是亲自为中央撰写了《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然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①

3月中、下旬，毛泽东先后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召集党员干部会议，听取对讲话的意见。

这样，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从5月开始动手修改由中央有关部门整理的讲话记录稿，并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现将毛泽东修改这个讲话稿的重要批语照录如下：

5月7日，审阅整理记录稿全文，并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月10日，将已经由他修改后的稿子作为第一稿，指示中央办公厅印发送小范围征求意见："印小型12份，大型三份，连原稿送来。版留。……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②

5月24日，批示印发第二稿，交中央委员会一级干部征求意见："再打清样（大本），即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

①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32—433页，中共中央文献，1992年11月版。
②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32—433页，中共中央文献，1992年11月版。

"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送返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①

5月25日，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批示，大多数在当日就送回意见，毛泽东看了后，又立即作了些许改动，并批示中办作为第三稿印发，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田家英同志：即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今天到会各省市区负责同志（卅余人），务于今日晚十二时以前送到各人手里，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同时，还嘱咐："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②

5月27日，在第三稿还未完全收上来的时候，毛泽东又指示田家英印发第四稿征求意见，主要是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的同志征求意见："田家英同志，请再印发，印数如此次到会人数，于今天晚上九时前发到到会各人手里。改处校正勿误。""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送还杨尚昆同志为盼！"③

5月28日，批示将第五稿印发给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同志征求意见："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每省（市、自治区）一份，另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每人一份，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各一份。将以前几次所发各稿全部收回。"并再次嘱咐："各同志：这是第五稿，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④

6月9日，毛泽东在自己标明"六月八日修改稿"上批示："请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

6月17日，毛泽东在对讲话稿作了第14次修改后，才最后定稿。

6月19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这个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最后为十二个部分：

（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①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58—360页，中共中央文献，1992年11月版。
②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58—360页，中共中央文献，1992年11月版。
③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58—360页，中共中央文献，1992年11月版。
④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60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

(2) 肃反问题；
(3) 农业合作化问题；
(4) 工商业者问题；
(5) 知识分子问题；
(6) 少数民族问题；
(7)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8)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9)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10)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11) 关于节约；
(12)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最后发表这个稿子，与当时的提纲已经有很大不同，无论从内容，或是从逻辑结构上，都较提纲更加成熟、完美。毛泽东对这个讲话先后作了14次修改，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政治战略的提出和具体贯彻实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对此，作为当事人的薄一波曾是这样回忆的：

“《正处》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加上中间的修改，共有15份稿子，就是说，一共修改了14次。修改，不仅是根据文章逻辑结构的需要，还有形势的需要，以及认识的发展变化。所谓形势的需要，就是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进行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进攻。发表稿中尽管没有直接提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话，但发表的目的含有为反击右派的进攻提供思想武装，则是无疑的。”①

作为“主题论”政治战略的重要的标志性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修改到公开发表时，与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相比较，删去了部分内容，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从而使这一政治战略更加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

删去的内容主要有：

一是删去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

二是删去了对若干有“左”的倾向的文章（以及有右的倾向的文章）的批评；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8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三是删去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实例，如对某些人的批评和一些地方闹事的典型事例等。

新增加的内容相当多，不但在结构上有较大的改动，而且在顺序上也有调整。而最主要的是内容的增加，几乎遍及文章的每个段落。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对国内基本形势与根本任务的论述。对国内基本形势的论述，主要是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这就是第一章结尾的那一段："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对这个方面的增加约有1000余字。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任务的内容，主要是第二章中在谈到肃反问题时，增加了今后的根本任务的提法，这在原来的讲话稿中是没有的，是经过多次修改、听取意见、补充而完善的。其具体表述是："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基本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二是，增加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论述和对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个问题增加比较多，如"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等，共有2000多字。

三是，增加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断。这个内容是经过几稿讨论后，毛泽东采纳部分同志的意见而增加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这就是："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①]增加的这段文字虽然不多，但分量却很重。

四是，增加了政治批评的6条标准，即区分香花、毒草的6条标准。这一增加，可以说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而确定的划分标准。实际上，这六条标准已经孕育了后来的四项基本原则。

尽管以上这些增删，有的是使这一政治战略的思想内涵更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有的段落的增删却显得"左"了一些，但是有一点是必须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肯定的，即所有的修改没有改变讲话的基本精神，其主题、中心思想和基本内容没有改变。多次的修改更加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政治战略的制定和贯彻实施的重视，也说明了“主题论”这一政治战略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划清两类矛盾：“主题论”政治战略的基础

毛泽东在提出和贯彻这一政治战略时，首先明确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这是“主题论”的基础。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初步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明确的划分；同年12月，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通信中，再次论及这个问题；也是在这年的12月9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概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阐述，对于提出“主题论”的政治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只有分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才有可能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若干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说：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①

面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如何来正确处理呢？这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正确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回答。

1．分清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

要准确掌握两类矛盾的学说，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这两个概念。毛泽东认为，要认识这个问题必须把它们放到一定的环境、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时代来把握。毛泽东说：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

毛泽东告诫我们，"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根据党的战略任务，以及对待革命和建设的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要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的一切阶级和阶层，都是人民，他们之间发生的所有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一切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2. 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有矛盾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来说，敌我矛盾就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如劳动阶级与非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说：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②

毛泽东又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是因为，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民族资产阶级有其革命性的一面，所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就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及与其他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得当，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基于此，毛泽东明确告诫全党：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①

显然，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加强各个方面的工作，防止人民内部的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毛泽东认为，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具体来说，对敌我之间的矛盾一般采取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即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剥削者，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予以取缔和镇压。如果不对敌我矛盾采取强制和专政的方法，就会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失，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也就很难成功。所以，用强制和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同时，毛泽东又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强制和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时，也要注意促进矛盾的转化，即除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外，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实行劳动改造政策，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这不仅可以把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化为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且可以使极少数顽固不化分子更加孤立。

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就根本不同了。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问题，所以，只能采取非对抗性的方法，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匈牙利为什么出问题，就是由于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和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国广东省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出现农民与政府的对立，也是因为一些干部用强制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见，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是正确处理两类不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同性质的矛盾的关键所在。毛泽东说：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①

毛泽东这里讲的民主的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民主协商，民主讨论；二是要在人民内部把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实行民主集中制；三是党和政府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题论”政治战略的核心

毛泽东在划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后，明确地指出了这两类矛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大量的表现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也是“主题论”政治战略的核心。

1. 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要把握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首先要具体搞清楚人民内部矛盾是什么？它又有那些表现形式？对此毛泽东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①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各阶级、各阶层之间利益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部同志之间的矛盾，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等等。具体说来，可以分成以下三大类：

第一，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之间利益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者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劳动阶级同正处在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渡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由此引起了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与团体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在这些阶级、阶层中又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他们既存在收人的差别、劳动支出的差别，又存在着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差别。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最多的一类。

第二，中国共产党内部同志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党是一个拥有六千万党员的大党，由于党员的出身、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和经历的不同，使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及理论素养有较大差别，也使得他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有较大的差别，更使得他们在立场、观点、方法及工作作风上存在一定的距离，进而引起各种矛盾。这种矛盾，通常表观为共产党内的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之间的矛盾。

第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谋利益的政府，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会发生一些碰撞，进而产生一些矛盾。这种矛盾主要包括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集中与民主的矛盾，我们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态度与人民群众要求之间的矛盾，等等。由于各级政府是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具体领导者，又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代表者，所以，上述矛盾就往往表现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府是受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党的领导的，代表党的根本意志，所以，上述矛盾有时又表现为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应当承认，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党除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外，是没有其他特殊的利益的。但由于以上矛盾反映到党内，再加上一部分党员与党组织存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人民群众有一定的意见。这样，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就会产生矛盾。但是，不管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好，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好，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都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非本质性矛盾。

毛泽东还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又可以说，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人们相互关系上的反映，也有特定的表现形式。而社会发展过程，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形成和联系过程，即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其次是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发展过程，即政治法律制度和观念形态的发展过程。所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内容，又必定分为经济方面的矛盾和政治方面的矛盾。经济方面的矛盾的表现形式一般为人民群众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中，与社会、政府、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矛盾；政治方面的矛盾一般表现为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思想水平与社会、与我们党和政府对他们要求之间的矛盾，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不良影响与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期望之间的矛盾，政党与政党之间的矛盾，政党与各政治团体之间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矛盾也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表现。

总之，我们只有准确地找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还有哪些矛盾，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和处理，从而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个主题不偏向，也才能使“主题论”这一政治战略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2. 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

毛泽东早就说过，矛盾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既有其客观基础，又有它的主观原因。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也有具体的、客观的原因。我们只有准确地揭示出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种种原因，才有可能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它，进而及时地解决它。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理解。

(1) 经济方面的根源。

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实际上是人们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在人民内部各阶级之间、各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经济矛盾，说到底是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因此，分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当然就离不开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分析。

首先，从分配关系上看，存在着差距和矛盾。比如，我国企业内部就存在着职工之间利益的矛盾和不同工种、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矛盾；在农村则主要是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的矛盾，即作为农民的劳动收人，自己占多少，国家税收占多少，集体留成的占多少等等。同时，还有一部分富裕了的农民与那部分尚未富裕起来的农民之间的矛盾。在整个企业和国家经济生活中，也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显然也是分配中的矛盾之一。

其次，从生产经营的过程看，存在着矛盾。当时，我国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所以，就产生了计划生产与市场经营的矛盾。比如，生产按国家计划与销售和成本又靠市场调节的矛盾，企业之间存在的协作关系的矛盾，生产劳动组织中集中和分散的矛盾，等等。

第三，从交换领域看，也存在着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国家要求统一价格与企业、农民要求放宽对定价限价的矛盾。

第四，从消费领域看，同样存在着矛盾。即生产规模少与供应不足的矛盾，人们的支付能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等等。

(2) 政治思想方面的根源。

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产生的。理由是：

首先，人民内部的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是由于旧上层建筑的残余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碰撞面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产生面产生，并随着经济基础的消失面或迟或早地也要消失。但是，由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旧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立刻地、全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消失面消失；上层建筑中的个别因素必然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作为旧上层建筑的残余和陈迹而在新的上层建筑中存在。例如，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在我国消失了，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些传统观念和行为习惯却仍在发生作用。所以，旧上层建筑的残余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必然要发生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象旧上层建筑与新的上层建筑那样是完全不同阶级的敌对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次，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内部来看，也存在着矛盾。当然，从总体来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各个因素之间，是基本一致的，但这并不排斥各个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存在着矛盾。这是因为新的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这种发展变化势必要求新的上层建筑的某些因素也跟着有所改变。这样新的上层建筑中一些需要改变和来不及改变的因素与经济基础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同时新上层建筑中那些已经改变的因素与尚未改变的因素也会不相协调而产生矛盾。表现出来在思想观念方面的现象，就是是与非、先进与落后、开放与保守之间的矛盾，以及制度与思想观点之间的矛盾，等等。

毛泽东还曾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一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二是剥削阶级影响的存在；三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够。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就有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的产生。

3.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与有效途径。

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目的是为了找到更好的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毛泽东认为，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所以，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他总结了我党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的方法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具体化为这样一个公式：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①

用民主的方法，或者说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般规律，是基本的方法。但是，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具体的、多种多样的，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除了遵循最一般的民主方针外，还必须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或方针。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中，坚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一系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 解决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矛盾，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

党内矛盾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内部不同思想观点或工作方法的分歧和对立。党内矛盾，从根本上讲是思想矛盾，是思想方法上的矛盾，或者说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或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农思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也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党员成分的构成所决定的。所以，这种矛盾严格来说是在根本目标、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如何处理党内存在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就是说，对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缺点和错误，一是要进行严肃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有所表现。二是要坚持团结和与人为善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揭发问题、批评缺点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和挽救同志，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2) 解决人民内部在经济上的矛盾，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既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又处理好表现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以防止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毛泽东说：

“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的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安排。”①

(3) 解决科学文化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

科学、艺术上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科学艺术领域的具体表现。为了适应建国后我国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正确处理在这一领域的矛盾，毛泽东早在1951年4月就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口号，1954年7月之后，推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解决科学文化领域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而有效的方法。毛泽东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

显然，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的基本点，就是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赛。它包括对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和对外国科学文化的批判吸收。同样，毛泽东又将其进一步具体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也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来克服假、恶、丑，推动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4) 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人民内部矛盾，采取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的方法。

大汉族主义就是在处理民族事务时，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看不起少数民族干部，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有时甚至歧视少数民族。这种种表现，是过去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思想残余对我们一些同志的影响，如果不肃清，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妨碍民族团结。地方民族主义就是借口民族特点，片面强调本民族的利益，忽视国家整体的利益，不愿意接受其他民族的有益经验和帮助，甚至有排外情绪。以上两种错误思想都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处理各民族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践证明，民族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往往也是以上两种原因引起的，要解决这一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把民族平等放在第一位，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说：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②

(5) 解决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

---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前章已经论述过，民主党派在中国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各政党，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民主党派虽然仍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合作关系，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矛盾。一般来说，这些矛盾也是在根本利益基本一致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处理这一领域的矛盾，就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与合作。毛泽东说：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①

“因此，我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②

总之，毛泽东根据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时国内出现的、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而初步探索出来的几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主题论”政治战略的意义与创新

“主题论”政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主题论”政治战略的强烈的社会反响。

毛泽东“主题论”政治战略的提出，不仅在我们国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尤其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内部，反响更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相继转载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并配发了评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毛泽东提出的“主题论”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1957年6月22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刚刚发表三天，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就全文予以转载，并配发了题为《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的社论，明确地说：

“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中国现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报告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以前一个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束缚而没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的问题。”①

同年7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在摘要刊登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同时，发表了署名长文《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新问题》，文章说：

“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发展中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道路来领导社会各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将在不长的时期内变成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也刊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的社论，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的“主题论”战略。社论说：

“毛泽东的讲话是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讲话。……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匈牙利有着重大的意义。”③

苏联共产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朝鲜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党中央新闻机构，也都纷纷撰文，或者介绍毛泽东的“主题论”战略，或者转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2．毛泽东“主题论”政治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主题论”政治战略的提出和贯彻实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

(1)“主题论”政治战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②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③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从而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此，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薄一波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首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列宁。1920年5月，列宁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当读到书中写的‘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时，他批注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由于列宁经历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太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能展开论述。斯大林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1952年，才勉强承认，如果搞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主席是第一人。”①

事实确实是这样，毛泽东“主题论”政治战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充满着矛盾，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②

显然，毛泽东“主题论”政治战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已经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从而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了理论武器。

(2)“主题论”政治战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及其处理方法。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他们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人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9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民内部还有没有矛盾？怎样处理人民内部之间产生的矛盾？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此作出系统的回答。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虽然已经直接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实际问题，但由于他过早去世，只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存在，但却没有涉及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如何处理这一矛盾问题。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也提出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存在着两种矛盾的观点，即所谓的“结合内部的矛盾”和“结合以外的矛盾”。但在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基本完成以后，斯大林又基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由于斯大林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当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时，他就简单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之所在。只有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胜利结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武器，把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两类：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具体提出了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和手段。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3)“主题论”政治战略，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但我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没有教条式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则，而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现状出发，并照顾历史的原因，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有区别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将其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敌人之一，采取了推翻、打倒和没收的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作了独特的处理，始终将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这一重大的政治战略，不但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毛泽东说：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

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①

应当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是多次讲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用和平赎买的方法，即和平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但他们从来没有将资产阶级当成人民；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资产阶级就是采取一律消灭、打倒、专政的政策。而毛泽东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这个基本的政治特征，却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没有说过的，也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没有先例的，这是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

也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创造，才使得我们党顺利地实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才使得我们顺利完成了消灭作为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

(4)"主题论"政治战略，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认为，"主题论"政治战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主要是说，这一政治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巨大动力。这种动力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终形成一种良好、和谐、宽松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毛泽东“主题论”政治战略，正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以此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主题论”政治战略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我们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者的民主素质和民主作风；另一方面是指国家民主制度中的民主运行机制。这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只有建立和健全了这种运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是：民主协商、民主讨论、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以及群众路线，等等，这就必然要求建立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法律制度等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及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制度。可见，坚持“主题论”这一政治战略，不仅有利于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三是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积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否建立和完善，并得到不断的巩固，说到底，离不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信任及高昂的政治热情。而人民群众的这种态度和高昂的政治热情的调动，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以消除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隔阂，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使人民群众心情舒畅地投身于政治活动，参与政治建设，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同时，毛泽东的“主题论”政治战略还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必然要求，它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因为只有社会具备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的发展才有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而“主题论”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营造这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

二是，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提出“主题论”政治战略时，特别强调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这是因为，利益分配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客观经济根源。这个问题处理得如何，事关整个大局。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了要运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既要教育人民有全局和长远观念，又要真

正关心人民的物质利益，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利益。通过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以达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是，科学文化事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使各方面的力量齐心协力，才能促进科学文化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对于这一问题，“主题论”政治战略中明确规定了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作为解决科学文化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

四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本身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求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加以处理和解决。如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等，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曾明确地说：

“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些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和处理，本身就是经济工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更是直接的重要的了。”①

总之，“主题论”政治战略，是毛泽东政治战略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大理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的战略措施。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第十四章

防微杜渐：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

“和平演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企图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而实施的一种新的政治战略，是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侵略、武力威胁或暴力颠覆的同时，通过非军事、非暴力的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动乱、分裂和破坏活动，进而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平”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以达到建立帝国主义“一球一制”的“世界新秩序”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他们在网络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反共反华势力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同时，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演变攻势。特别在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全确立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愈演愈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略转变，毛泽东于1959年11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他说：

去年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要用和平取胜呢！美帝国主义摆脱已陷入的无情包围，这个“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从那时起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左”的和右的曲折，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剧变潮流的冲击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仍巍然不动，仍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说明了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具有开拓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和平演变的危险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始终存在的，毛

泽东提出的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这个关系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政治战略，是极其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

毛泽东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是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和平演变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重要法宝。

一、历史背景：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

毛泽东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既不是一时冲动和权宜之计，也不是凭空臆想，而是他多年来对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和平演变战略进行冷静观察与分析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以及对我们国内、党内情况的现实思考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1．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推行，促使毛泽东高度重视反和平演变问题。

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的苏联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也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与斗争。开始，他们企图通过军事威胁武力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等手段来消灭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绞杀下，不但没有被扼杀和消灭，反而愈来愈兴旺发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已由一国发展到十多个国家，形成了足以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变换手法，将以武力为主的扼杀方式改为武力威胁和“和平演变”两手并用或交替使用，以非暴力为主的扼杀方式。西方帝国主义的这种扼杀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具体说来，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酝酿和基本形成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中叶。

1946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乔治·凯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强大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壮大的实际，向当时的美国政府写出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构想；

次年5月，美国政府根据凯南的报告，成立了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订对共产主义遏制政策时，明确提出了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来“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凯南说：

“对苏维埃实行遏制政策，不仅仅是使用某种军事威胁手段，而且是某种政治威胁手段。要在10年至15年后，使苏联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①

1949年7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前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中国问题向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起来”，从内部颠覆人民政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艾奇逊说：

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对西方帝国主义制定和平演变战略形成具有决定影响作用的是1953年1月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这年的1月15日，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说：

“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②

杜勒斯的所谓“解放政策”，就是“和平演变”的代名词。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第二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展开和在全世界实施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世界范围内正式推行和展开时期。

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波匈事件，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① 李振域主编：《无硝烟的战争》第12页，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手法》第12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样，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政要人士认为他们推行的所谓“解放”政策，对于消灭来自共产主义方面的“威胁”是成功的，因而更坚定了他们进一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狼子野心。这一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就公开对英国电视公司记者说：

“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了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公开地说：

“要以法律和正义代表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同年12月，美国政要肯尼迪也公开说，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目前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甚至批评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解放”战略缺乏具体的措施，是一些“空话”，并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1961年，肯尼迪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久，就立即炮制了煊赫一时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调整时期，其特点是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重点由苏联移至中国。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更是将“和平演变”战略作为摧毁共产主义主要手段。他在不放松对苏联和东欧和平演变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攻势。尼克松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其目的除了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即借助中国寻求与苏联的战略平衡外，就是要把脚伸进长城以内，使中国人民听到“自由之声”。他明确主张，通过同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交往，对他们的领导人施加政治影响，使之逐步演变为“文明”的资本主义。特别是随着1979年中美的正式建交，两国关系的改善，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搞“和平演变”有了更多的渠道和客观条件。这样我党、我国反和平演变的任务就显得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正是基于这一实际状况，江泽民早在1992年就指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

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推行，使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很早就思考着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下，中国共产党人应如何采取措施，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2．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现象的出现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使他更加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很快得到验证，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首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的逆流。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背着参加会议的各国兄弟党的代表，抛出了反斯大林的所谓的秘密报告，借反对个人崇拜而疯狂地反对斯大林，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借此掀起了反苏反共浪潮。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不满。接着，赫鲁晓夫又抛出了“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简称两全三和）”的修正主义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年的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事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矛盾，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刻思考，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特别是从50年代后半期起，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苏联领导人又不顾国际主义原则，从大国主义出发，不借以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相要挟，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等等，给我国社会主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感觉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确已经存在着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

3．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我国出现的少数人闹事和右派的进攻，以及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这样，就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在中国共产党内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

1957年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深入人心。然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在这大好形势下，由于我们有的工作没有到位，加上一些刚刚被剥夺了权力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煽动，我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也是在这时候，少数右派分子趁我们党出现了一些错误之机，向共产党闹独立，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要与共产党分享权力，与共产党轮流坐庄，等等；而被共产党赶到台湾的国民党又在叫嚣反攻大陆，国内残存的反动势力也遥相呼应。这样，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情况。特别是当时在我们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由于在革命的胜利面

前骄傲起来，面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打了败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感到，在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被敌人“和平演变”的“土壤”。

以上可见，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不是他的主观臆造，而是他在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共产党内的实际情况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或者说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苏共二十大后政治思想路线的变化，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等现象的滋长，使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

二、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也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一股暗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是说这一政治战略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具体来说，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酝酿时期。这一阶段从1949年后期毛泽东批驳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开始，到1958年明确提出要注意和反对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言论为止。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灭亡在即，为挽救国民党的败局，美国政府在武力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又展开了政治攻势，企图从中国内部找到第三种力量。这样美国政府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通过在中国挑选和组织“民主个人主义者”，施展其自由主义影响，以消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发表了五评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指出了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干涉由武装的干涉转变为“和平”的干涉，并要中国那些自称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要冷静地想一想；同时要求中国人民要看清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毛泽东通过五评美国政府白皮书，为后来的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53年，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所谓的“解放政策”后，毛泽东就明确告诫全党同志，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对我们的进攻。1956年，发生了苏联共产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波兰、匈牙利出现了动荡局势。对此，和平演变战

略的倡导者杜勒斯等欢喜若狂，他们公开宣称是美国的政策促使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走向自由化。并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获得成功。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并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复辟为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①

不难看出，尽管毛泽东这时候还没有公开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但他已较明确地觉察到了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确实存在。所以，从这时候起，他一方面注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阴谋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与苏联共产党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作坚决的斗争，并开始认为赫鲁晓夫正在沦为修正主义分子，苏联也正在蜕变为修正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正在苏联变成现实。

2．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形成时期。这一阶段从1959年11月明确提出反对和平演变，到1963年提出"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据现有资料记载，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和平演变战略是在1959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这年的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他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次关于和平演变的演讲（即1958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商会发表的《对远东的政策》的讲话；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讲话）作为反面材料，要与会同志认真地看一看。毛泽东明确地说：

杜勒斯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继续说：

去年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

毛泽东在提醒要重视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同时，也告诫全党同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确实存在着被“和平演变”的内部因素。1962 年 2 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深刻地指出：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诸方面的原因，毛泽东认为社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搞和平演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特别是还有少数仇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他们在国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时，必定成为内应力量。

第二，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等现象，既是和平演变的“土壤”，又成为那些敌对分子煽动和平演变的口实。

第三，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怀疑态度，盲目崇洋的观点和情绪在滋生蔓延。

第四，几千年的封建剥削思想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亡。这些旧的观念时时在侵蚀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灵魂，因而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文化“土壤”。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的“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这句话，足以说明

和平演变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所以，他多次提醒我们党要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理论。

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不仅初步形成了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理论，而且对如何贯彻和实施这一政治战略作了探讨，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1963年5月9日，他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第一次提出了拒腐防变、反对和平演变的措施。毛泽东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3．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发展的完善时期。这一阶段从1964年6月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谈话开始，一直到他逝世。这一阶段，他的关于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进一步系统化。

1964年后，毛泽东再次把反对和平演变问题提上党的重要日程。这时候，他考虑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毛泽东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反对和平演变就有了保证。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两个问题抓住了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点。1964年6月16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明确地说：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毛泽东还在许多不同场合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条件作了明确阐述，并措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标准。

进人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更多是重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级领导集团的建设问题。他始终认为，如果领导人变了，整个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所以，从1965年8月以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论及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要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注意克服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他多次批评林彪、四人帮一伙违背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挫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中，形成了完整的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理论，并采取了具体的措施。这些理论和措施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必须谨防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骄傲自满和腐化变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既有外部条件，也有内部因素，但总的说来，内部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层。用毛泽东当时的话来说，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反对和平演变，必须把重点放在领导层，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特别是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多次语重心长地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为此，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以保证在大是大非面前有清醒的头脑。他多次告诫全党：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二是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克勤克俭，切忌骄傲自满。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的廉洁奉公和谦虚谨慎。早在 1944 年延安整风时，他就提出印刷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之一，其目的就是要全党同志防止在胜利后的骄傲自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

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任何复杂的形势下，不迷失方向，不犯方向和路线错误，进而把我们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三是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坚决反对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不要高高在上，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1956 年 11 月，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总结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时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为此，他多次提出要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认为，只有坚持干部参加劳动，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去掉我们一些同志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如果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为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

四是要求广大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要拒腐蚀、永不沾，与各种腐败现象作不懈的斗争。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他多次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与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从他一生来看，反对腐败是一直抓得很紧的，并把此作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对惩办贪污犯罪问题从不手软。为了克服干部中的贪污腐化现象，他亲自领导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并要求各级领导上阵“督战”。后来，他在许多场合都提醒全党同志要廉洁奉公，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2. 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主战场，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他早就告诫全党：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①

①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 期。

他还说过：

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始终认为，意识形态是反“和平演变”的前哨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如果忽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可能重新上台，因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总是首先从意识形态打开缺口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苏联、东欧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事实已经证明，帝国主义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寻找突破口的。那么应如何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但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决定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同步的，旧的思想、观念并不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消灭面消失，它作为旧社会遗留物在人们头脑中沿袭下来，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样，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能立即随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亡，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的影响也不可能一下子肃清。这就决定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那我们迟早是要犯大错误的。毛泽东早就告诫我们：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他还说过：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同时，由于许多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得特别艰苦、复杂和曲折：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特别是各种社会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思想认识上的是非问题与政治路线上的是非交织在一起；国际国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党外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等等。对这些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不能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用简单的武力去对付，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慢慢地去消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最后达到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阵地的目的。

其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大力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毛泽东早就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怎样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

一要十分重视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地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要坚持正面教育，通过教育来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矫正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监督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人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态度等。毛泽东曾经指出：

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二要把理想信仰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最高要求。毛泽东说：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

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①

历史也证明：无产阶级无论是在夺取政权以前，还是在革命胜利以后，都需要不断地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不会自发从广大群众头脑中产生，只有通过各种形式、手段，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不断地向人民群众灌输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才能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如果稍微忽视或削弱社会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的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必然会趁虚而入。

3．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重要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西方帝国主义联合对我国进行所谓的制裁和经济封锁情况下，已经看出帝国主义要从经济上要挟我们，所以，他一直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到反修、防修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毛泽东提醒全党说：

“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②

毛泽东还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一方面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渠道，来贩卖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企图征服人们的思想，瓦解共产党人的斗志。另一方面，他们又变换手法，通过经济技术交流或各种援助，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因此，为了反对敌人“和平演变”的图谋，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反对“和平演变”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发展速度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中间的形象，也关系到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时能否取得胜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反和平演变中至关重要。毛泽东早就说过：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8—84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采取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对我实行颠覆、禁运、进攻、渗透政策，使我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来对付帝国主义从各方面的进攻，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这样，我们在经济上花的功夫相对少了些，也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发达的资本主义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尽管这样，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抓好经济建设，多次指出，要想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就要加快经济的发展步伐。怎样加快经济发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另一种办法是单纯依靠外援的办法。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困难，不断地发展经济，进而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一方针，想依靠人家的援助和支持来发展的话，是很难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故而在政治上也就很难有独立的“人格”。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时，往往是政治和经济两手并用，我们稍有不慎的话，就会掉进他们设的陷井里，先是在经济上被他们控制，接着在政治上不得不受制于他们。建国后，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中，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正是因为坚持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才顶住了国内外种种压力，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不仅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提高和改善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成功地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想“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特别是80年代末出现的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事实，更加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要抵御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必须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以保证在反“和平演变”斗争中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4．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

根本保证。

培养好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解决，但又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的革命能否继续下去，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

二是因为西方“和平演变”的预言家们主要是把中国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极力在青年一代中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我们的年青一代，许多人由于没有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极易被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迷惑。

三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后，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逐步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情况，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领导权实际上已掌握在“修正主义者”手中，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鉴于上述原因，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看成是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成功地挫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保证。毛泽东认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关系到能不能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重大问题。所以，从1964年开始，毛泽东多次论及这个问题。他多次说过：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①

后来，毛泽东根据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又详细阐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

① 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1939年10月23日），载《解放军报》1966年7月13日。

业的接班人必须具备的5项基本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第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除了具备以上几条革命化的标准之外，还要有专业化的条件。为此，他多次强调广大干部队伍要努力做到“又红又专”。毛泽东说：

“政治家要懂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①

根据接班人的5项基本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应如何造就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对此，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接班人只能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和成长起来。毛泽东多次告诫我们：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②

毛泽东还主张广大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应该到基层去锻炼，在实践中与群众打成一片，进而获得实际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革命事业培养出真正的接班人。毛泽东说：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② 载《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①

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从上到下要注意接班人的培养、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和选拔接班人的原则方法等，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措施，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实践也证明，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人民政权就有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掌握的危险，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会让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得逞，从而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苏联、东欧的剧变，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早在30多年前提出的必须造就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是极富远见卓识的。

5．强化人民民主专政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关键。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毛泽东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就非常看重这一基本原理，特别重视这一原理在中国的运用。所以，他在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就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始终认为，在中国，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要抵御和粉碎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也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把刀子，放弃这把刀子，社会主义国家就有被敌人“和平演变”过去的危险。所以，当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刚出台时，他立即洞察到，和平演变的实质就是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还指出，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过去了的“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而要抵御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思想意识领域的进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以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为前提条件。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才能使人们的头脑里多一些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多一些反对“和平演变”的自觉性。他甚至认为，波兰、匈牙利等东欧一些国家之所以出现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好无产阶级，没有分清敌我友，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反复强调，在社会主

①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

义建设中，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分子，要毫不留情地实行专政。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明确地说：

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之所以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得逞，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刀子，对人民没有实行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对敌人没有实行坚决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容忍和放纵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肆意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丑化革命领袖，等等。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能保卫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反而对各种敌对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妥协退让，甚至支持放纵，其结果只能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我们只有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对敌人实行无情的专政，对西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颠覆活动予以坚决的打击，才能保卫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挫败他们的“和平演变”的阴谋。

6．搞好党风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把党组织建设成领导人民反对“和平演变”的坚强堡垒。

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经受住革命战斗的洗礼，而且还要经受住执政的各方面的考验。所以，毛泽东一直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也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毛泽东特别重视执政党腐败变质的危险。纵观古今中外，由于腐败导致蜕化变质而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同时，由于执政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人腐败变质，也为搞和平演变的中外反动势力提供了进攻社会主义的借口。基于此，毛泽东早在1944年延安整风时就明确指出：要以明代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全国解放前夕，又进一步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并提出了保持“两个务必”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实际上已有要防止资产阶级用和平的手段腐蚀我们的干部的思想，包含了要注意反对敌人“和平演变”的图谋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一直把反腐败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根据我们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着的一些腐败现象，开展了“三反”

斗争，目的是要纯洁我们党的队伍，防止保垒从内部攻破。后来，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重视拒腐防变问题，认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抓好反腐倡廉的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中的胜利与否。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在反和平演变和领导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毛泽东1963年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就明确地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者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①

毛泽东认为，为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必须从严治党，严肃党风党纪，真正把党建设成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为达此目的，必须抓好四件事：

第一，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在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一直认为解决好反对腐败问题是执政党建设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环，必须坚决反对搞任何形式的特殊化。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始终对党内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的现象坚决反对。毛泽东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身体力行，从没为自己的亲属、子女谋取任何私利，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品质。由于毛泽东的影响和以身作则，在他领导的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受到了有效的抑制。

第二，加强和严肃党的纪律。毛泽东曾经指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认为，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只有严格党的纪律，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严肃党的纪律，首先是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纲、党章、党纪，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其次是模范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决不容许任何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现象存在。

---

① 转引自樊瑞平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第302页，石油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第三，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良现象。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矛盾，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以达到更加巩固的团结。毛泽东曾经设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利于克服困难，纠正缺点，使党能够经受住风浪的考验，在关键时刻，能抵挡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进攻。

第四，牢记党的宗旨，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否密切联系群众，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价值的判断标准，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所以，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牢记党的宗旨，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一方面，要自觉树立“服务员”和“公仆”的意识，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做到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防止与克服官僚主义。只要我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紧密联系群众，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一定能够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不仅在思想理论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以一生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什么补品，平时的最高享受就是那一碗红烧肉。在1960年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有时几天不吃米饭，工作一天只吃一盘子马齿苋或炒菠菜，一连七个月没有吃一片肉。

毛泽东一生很少做过新衣服。也许没有人知道，从1953年到1962年底，毛泽东竟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的衣、袜、鞋等，总是补了又补。现在遗留下来的那件睡衣和几双袜子，密密麻麻地补了十几个补丁。谁又能相信，这些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穿了20多年的衣、袜、鞋呢？但这又确确实实是毛泽东的遗物。

毛泽东一生从没有为自己的子女谋过任何私利。他虽然位居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也很爱他的子女，但他对子女的要求却十分严格，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境地：子女不能用他的汽车，不能享受任何特别照顾，未经允许不能与他一起吃饭……1950年，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又亲自把自己最心爱的长子

毛岸英送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当有人建议将遗体运回国内时，毛泽东却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毛泽东一生也没有"关照"过自己的亲友。毛泽东也有三亲六故，并深深地爱着他们，但却从不为他们谋私，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若为亲友解决一点生活困难、读书、就业之类的问题，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他却从没有这样做。解放初期，当他最好的儿时朋友、对他到东山学校读书给予过直接帮助、而且是他的亲舅舅的儿子文运昌托人求他给介绍一份工作时，毛泽东却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949年10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给表舅的一封信》中，也体现出毛泽东那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毛岸英在信中这样写道：

"新的时代，这样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思想。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①

实践证明，如果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能像毛岸英信中所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子，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完全能够在改革开故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也根本不会出什么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了。

7．在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反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则。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一原则。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种力量处在大分化、大改组中，我们的周边环境也恶化起来。在这种局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15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国主义又加紧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中国这块阵地，加大了文化、思想、观念的渗透，而且从武力上向中国施压，如增兵台湾海峡、入侵中国领海、制造“两个中国”、悍然入侵越南，等等，企图逼中国就范，达到分化、演变中国的目的。对此，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站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与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一贯反对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他认为，外国确实有比中国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好好学习的。但是，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华民族有自己许多的优点，并不是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甚至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他主张一定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出发，从国家和全局的利益出发，学习外国好的东西，但不能放弃我们好的东西，更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①

毛泽东有非常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从没有对外来势力屈服过。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也没有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低头。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针锋相对，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三条外交政策，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美国帝国主义企图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毛泽东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1950年6月28日，美国在出兵朝鲜的同时，又入侵我国的台湾省，明确宣布台湾为他保护的地方，毛泽东坚决的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为。当美国帝国主义以他拥有原子弹相威胁时，毛泽东给予了坚决回击，明确告诉全国人民，原子弹也是纸老虎。1955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时说：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当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两个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毛泽东不顾我国自己的困难，顶着各种压力，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

当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从1958年起开始变换手法，竭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时，毛泽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作了坚决的斗争，坚定地明确地宣布：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无权插手。正是由于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使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的企图成为黄粱一梦，使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当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沦为大国沙文主义后，首先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搞霸权主义，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1958年，苏联就提出与中国联合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由于这必然涉及到其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而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所以，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当苏联以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合同、陈兵边境等相威胁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照样搞原子弹，照样建工厂、修铁路和公路，照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党和政府决不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决不听任别的国家的任意发号施令。当苏联在政治和经济手段都未能奏效，进而恼羞成怒地对中国诉诸武力，挑起军事冲突时，毛泽东不信邪、不怕压，指挥我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坚决的还击，粉碎了苏联的军事进攻。总之，毛泽东这种坚持各党各国的独立平等、反对大国大党的霸权主义，以大无畏的气慨顶住巨大压力的做法，完全是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得到了各国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信赖，使“两霸”夹击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昂然挺立。

当美、苏两国争霸，欺负和压迫弱小国家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党和政府挺身而出，与之作了坚决斗争，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的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① “第三世界的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②

---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1—44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1—44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毛泽东认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属第一世界。他们总是想通过武力，或者政治、经济的手腕，逼弱小的国家就范，或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建立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帝国主义更是到处横行霸道，干涉别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美、苏两国争霸。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决地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在一起，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略。日本、欧洲等第二世界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中可以团结的力量，应该将他们与两个超级大国相区别。进入70年代后，我国政府以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为指导，开展了积极的、全方位的多边外交，采取了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孤立和反对第一世界的正确战略，使我国在国际上威望日益提高。“三个世界”理论使我国建立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既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有效地回击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中国的阴谋。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这一理论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为打破大国欺负小国、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就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艰辛的探索，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毛泽东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反“和平演变”的伟大的战略家，对反“和平演变”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史上，写下极有分量的一笔。

(1) 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当帝国主义变换手法，由武力进攻改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即用和平的方式来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后，共产党应采

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呢？这是革命导师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他们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而不是巩固政权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面对敌人的“和平演变”战略，所以，他们不可能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列宁和斯大林虽然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揭开了社会主义逐渐取代资本主义伟大历史进程的序幕，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和较量。但是，由于当时的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是以武力为主，妄图通过军事威胁、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的办法，把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从1918年的扼杀新生的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开始，中经20世纪40年代企图借希特勒之手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法西斯战争，到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朝鲜，并把锋芒直指社会主义的中国，说明这时候的西方帝国主义，主要是企图以武力来消灭社会主义，达到恢复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列宁虽然提出了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反对腐败等与反“和平演变”有关的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1947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见武力已不能征服社会主义，便改变战略，将主要是以武力进攻，改为武力和政治并用，以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为主，武力只起辅助作用，明确提出并实施了“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正是根据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略转变和共产党内部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反“和平演变”这一重大的政治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2）第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和实践了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而且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为此，毛泽东开展了以下一系列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在外交上顶住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积极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取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从而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企图在政治和外交上孤立社会主义中国的阴谋。

其次，从经济领域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打破了帝国主义在

经济上渗透的目的。在帝国主义改变手法，妄图通过经济渗透来“和平演变”中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后，毛泽东不是一概反对与外国交往，也不是反对学习外国，而是为我所用，在与帝国主义交往时，时刻警惕他们的阴谋。他多次提出，在与外国资本主义交往时，要注意他们是否有政治目的，提醒全国人民帝国主义的“美元”是不会白给的。他极力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出发，“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他强调指出：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①

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思想文化上要坚决抵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毛泽东特别强调，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对随之而人的资本主义的腐朽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作风等，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对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意识形态领域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阴谋，必须高度警惕。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决不能让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

第四，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的反腐败斗争，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从而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能力。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加强共产党员的自身修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在党内开展了“三反”和整风运动；1957年，又在党内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他始终认为，“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要警惕领导层出修正主义。

(3) 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从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提高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警惕性，对于唤起人们的警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我们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泽东的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与实践，是与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并且受国际阶级斗争的严重影响。所以，社会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如果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后就麻痹大意的话，很有可能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下丧失政权，所以，必须提高警惕，注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从而对广大人民敲响了警钟。也正是毛泽东的提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一出笼，就遭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与帝国主义的“西化”、“分化”图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一政治战略，不但在六七十年代对于我们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使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仍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4) 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科学预见，为我们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的形势下，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及其实践，对我们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进攻，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东欧、苏联剧变后，或者说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后，中国已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目标的严峻形势下，学习和坚持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意义更加重大。

学习和把握这一政治战略，必须坚持把经济搞上去，以增强综合国力，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有效地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学习和把握这一政治战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寻找突破口的。美国就是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输出黄色录音和黄色录相、贩卖黄色书刊等所谓的“文化交流”活动，向社会主义国家鼓吹资本主义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从而达到动摇人们的信仰，改变人们的观念的罪恶目的。例如，美国政府每年就拨给“美国之音”数十亿美元，用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据统计，到目前止，“美国之音”在世界各地已有 5 个发射台，140 多个转播站，用 40 余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每年还向欧洲的“自由欧洲之声”、“自由电台”拨款十多亿美元，每周以 600 多个小时的节目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广播。美国政府还通过所谓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以及宗

教渗透等，向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可见，毛泽东早在30多年前就提出的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我们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学习和把握这一政治战略，使我们在扩大开放、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时，保持高度警惕，注意和防止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东西趁机而入，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又要把资产阶级的“垃圾”拦在国门之外，决不能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泛滥。西方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除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外，总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向他们靠拢，成了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品”。早在80年代末，美国总统布什就露骨地说：要“以西方的援助来促进和奖励共产党国家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后达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目的。波兰、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的。所以，我们在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交往时，一定要警惕和及时识破他们的“和平演变”图谋。

实施反“和平演变”这一“政治战略”，就必须反对腐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领导的反“和平演变”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反对“和平演变”，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并把反对腐败的斗争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扫除社会上各种丑恶的东西，促进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好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腐蚀侵袭；必须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敌人实行坚决镇压，绝不能掉以轻心。

实施反“和平演变”这一政治战略，就要将对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西方帝国主义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时，总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年青一代兜售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总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寻找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把他们培养成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如果我们不注意他们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腐蚀，就必定在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面前打败仗。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论述，就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培养人、选好人，是关键的关键。必须在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

由于种种国内外复杂的原因，在具体实施反“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存在

着一些失误，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反“和平演变”中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必须指出，毛泽东在反“和平演变”问题上尽管存在一些失误，但是，早在40年前，毛泽东就作出了这一科学预见，不能不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到既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又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和侵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应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国际大气候将会长期存在。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西化”、“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敌对势力也会长期存在。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我们必须提高防止“和平演变”的警觉性，防患于未然。我们一定要珍惜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从他提出的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理论和领导的反“和平演变”的实践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有效地防止敌人从各个方面的进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

第十五章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执政党建设战略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一定的阶级为了战胜敌对阶级,就必须有本阶级的核心和领导力量,以动员和领导自己的阶级队伍,提出本阶级的政治纲领、组织路线及战略策略,统一本阶级的行动,领导本阶级与自己的敌人作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这种阶级的核心组织和领导力量,就是政党。马克思指出: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建国以后,一直把执政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战略,作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只有毛泽东,才把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到政治战略的高度来重视,并认为这是实现其他政治战略的根本保证。

早在1942年,我国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执政后,如何防止"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明确给予了回答。他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就是加强我们自身的建设。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我们的政府,监督我们的党,政府才不会松懈,我们党才会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才不会人亡政息。"①

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从没有放松过党的建设,总是把执政党建设放在重要的政治战略的高度。在毛泽东和全党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党也成功地经受了执政的初步考验,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

---

① 谭玉琛:《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挑战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有来自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因素，也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也就成了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经常考虑的重大政治问题。

1.“进京赶考”：毛泽东提出和平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政治战略。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已经预计到了这一情况。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乘车进北平，在即将上车时，毛泽东突然回过头对周恩来说：

“走，恩来，我们进京赶考去。”

深谙中国历史的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毛泽东，却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事：那是1644年暮春，农民首领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入京后李自成及手下的官员，贪图享受，饱食终日，不思进取；起义军纪律涣散，战斗意志衰退。李自成本人也以为占了北京后就大功告成，不顾面临的军事和经济危机，急于举行皇帝登基典礼。结果，即位的第二天，就被吴三桂引清兵攻入北京。李自成只得率部撤出北京城，只享受了一天的皇宫生活。接着又连连打败仗。1645年初夏退至湖北，不久后，遭敌人伏击而丧命。李自成考试没有及格。

毛泽东见周恩来没有回答，又说：

“恩来啊，你在想什么？”

周恩来见毛泽东在等待着他的回答，便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不会像李自成那样退回来。因为我们作了充分准备，考试一定会及格的！”

“对，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要争取考个好成绩。”① 听了周恩来的回答后，毛泽东边说边满怀信心地跨上了吉普车。

是啊，自从三大战役胜利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在即将建立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前夕，毛泽东考虑得最多的是我们党如何才能经得起

① 以上参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了个毛泽东丛书”之《开国前后》，郭文韬著，海南出版社，第31页，1993年10月版。

执政考验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政治战略郑重地提了出来。

从1948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无论在与中央高级干部的谈话中,或是与身边工作人员的闲谈中,或是在各种会议上,都告诫全党同志要吸取明末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得而复失的惨痛教训,时刻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1949年3月,为作好进京的准备,特别是为了不像李自成那样因"考试"不合格而被退了回来,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专门研究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问题后,毛泽东特别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政治战略。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是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

也是在这次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作出了旨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几条重要规定:

(1)不做寿;

(2)不送礼;

(3)少敬酒;

(4)少拍掌;

(5)不以人名作地名;

(6)不要把中国同志的像与马、恩、列、斯的像平列挂贴。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措施,也是毛泽东加强执政党建设政治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略的具体化。

2.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建国初期,随着环境的变化,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利诱下,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的感染下,逐渐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1951 年 9 月,东北地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干部中的严重贪污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再次认识到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性。于是,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在党内开展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斗争。1951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批示:

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这年的 12 月 4 日,当毛泽东看到北京市委报送的"关于腐败现象"时,他愤怒了。

报告展现了这样一幕幕情景:

(1)贪污的总额十五亿元,其中 1949 年 166 人;1950 年 289 人;1951 年 195 人,但已发现的仅仅是贪污现象的一部分。据市税务局、市人民银行、市供销合作社等单位初步检查和估计,各该部门工作人员贪污现象均极严重。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作重点检查的结果,发现九区联合消费合作社,132 名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的有 39 名,计百分之三十;六区联合消费合作社 132 名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者 34 名,计百分之二十六;……

(2)在已发现的 650 名贪污分子中:(甲)最多为财政企业部门,计有 420 名;其次为公安部门,计有 112 名,其它各部门为 118 名。(乙)党员 108 名;团员 19 名;非党人员 523 名。(丙)留用干部和新干部 514 名;老干部 79 名,其它 57 名。(丁)科长以上干部 34 名;科长以下工作人员 616 名。

(3)在 650 名贪污分子中,已发现的贪污方法:公安人员主要是设障不管;税务人员和大宗采买的人员主要是接受私商贿赂,串通私商合伙贪污;银行、贸易和合作社工作人员有造假账和假单据的,有偷票子的,有大称人小称出的,有受贿的;机关总务人员,主要是买东西、买房子、修房、要回扣和接受礼物,冒领和克扣薪资以及盗窃公共财物;仓库物资管理人员主要是盗卖公物;此外,并有携款潜逃的。

这些人贪污的原因,在留用人员中主要是过去有贪污的恶习,在老干部中主要是堕落腐化,有一部分则是受坏分子的引诱。

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数据,毛泽东的心隐隐作痛,他再一次感到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摆在政治战略的位置,我们是要打"败仗"的。于是,毛泽东提笔指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国家机关"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

在这一斗争中,为了确保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对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情况,不管他有多老的资格、多高的职务职别,都视问题严重的程度,作出坚决的处理,决不姑息养奸。对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处理,说明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他们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做了不少工作,有过贡献。但是,他们在进城以后,却没能挡住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进攻,以至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他们胆大包天,竟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盗窃机场建筑款、救济灾民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剥削克扣民工工资、勾结不法奸商进行非法经营等,共计贪污受贿100多万元之巨。

对于刘青山、张子善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不作出严肃处理,将会影响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根据这一情况,中共河北省委,在对这一贪污案件作了充分调查取证和侦讯后,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中共华北局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一同报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是:

刘青山、张子善凭借权力,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华北局的处理意见是:

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全国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后执行。

毛泽东又一次看了刘、张二人的罪行材料。巨人再次震怒了。他挥笔写下了如下批示: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

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事实上，毛泽东对这类事情的总体把握，一向以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的尽量不杀。但刘、张二犯，毛泽东却坚决主张要处以极刑。他曾对周恩来说：

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进一步提高了对腐败现象的警觉，进一步认识到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重大的政治战略。

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成功与失败，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指导革命战争上的经验更加成熟。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对打仗和进行阶级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的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设新中国成了党迫在眉睫的任务，所以，党的中心工作也就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由夺取政权转向发展生产力。同指导战争相比，完成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更为艰巨、更为复杂，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加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怎样发展生产力，更是一个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再加上我们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的干部又几乎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对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就谆谆告诫全党：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着，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面对经济建设的新任务,我们有许多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观念不适应。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我们主要是从事阶级斗争,所以,在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的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肯定绷得很紧,极容易出现以搞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搞经济建设,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是文化水平不适应。我们的大多数干部出身于工农,在当时来说就是文盲,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参加革命后,虽然学了几个字,但毕竟是战争年代,学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这样的文化水平,自然不可能适应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是知识水平不适应。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水平,与战争年代是截然不一样的。战争年代主要是带兵作战,或者是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干;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却需要各种管理知识,如管理工厂、管理贸易、管理银行、管理铁路、管理城市,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课题。所以,对大多数干部来说,过去比较熟悉,干起来也比较得心应手的东西,现在就用不上了;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就不够用了。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要求广大党员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学习管理知识,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使自己成为经济的行家里手。同时,更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切实制定出一条符合实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来。

总之,毛泽东始终认为,由于执政党的地位、任务、环境等方面的变化,给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对执政党也是一个新的严峻考验。他多次提出要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到政治战略的高度来抓紧、抓好、抓落实。并在建国初期就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措施:

——1950 年 5 月 21 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明确提出:

目前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的问题。即是说,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而对于那些毛病很大,经过教育又不愿改正的党员,应逐渐地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劝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然后对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并经过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确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应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

——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向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供的书面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

"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联系的

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党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在老解放区，一般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①

显然，毛泽东是一直注意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

——1951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他根据会议的精神，起草了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毛泽东在这个党内通报中专门就整党建党的问题作了四个方面的论述。通报说：

"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② "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新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③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毛泽东直接支持和领导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亲自审阅和批准了刘少奇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会议认为，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因为就全党来说，大多数党员是够标准的或基本上够标准的，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起决定作用和领导作用的，是大多数好的党员和大批优秀干部。但是，也要看到党内存在的问题，有一些基层组织中有相当大比重的党员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在党内钻入了极少数的坏分子。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接着，会议分析了这些党员不够标准的原因：一是由于过去在接收党员时降低了条件；二是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不够；三是受新的环境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执政条件下，必须提高对新入党的党员的条件，不合条件的，决不吸收到党内；二是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包括理想信仰和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5—14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党员标准的教育;三是吸收新党员必须严格按手续办事,按党章办事;四是结合在全党开展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切实做好党员的考察、补课工作;五是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切实做到党要管党。

在建国初,毛泽东对执政党的建设是抓得很紧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因而,党员队伍的素质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较大的提高,党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后来,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仍十分重视执政党的理论、思想和作风建设,真正经受住执政的严峻考验。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执政党建设的主要内容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毛泽东对建国后党的建设的科学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仍要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呢?这是由当时我们党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所决定的。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

"在无产阶级人数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能够代表全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也是能够承担起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的。但是,也应当指出,建国后,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我们党也存在着明显而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有很大的份额。据统计,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农民出身的党员有741万多人,占全部党员1073万多人的总数的70%左右。由于农民出身的党员数量多,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难免带入党内,对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极大。所以,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带领全国人民尽快地摆脱贫穷、改变落后的面貌,所以强调从思想上建党。

1.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首先是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这也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提高全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基于此，毛泽东一直认为，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党的重要任务，也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坚持我们党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就已经形成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并在全党范围内，重新开展大规模的教育运动。解放初期，我们党在进行整风时，毛泽东就一再强调要把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到党的思想建设的高度来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时就明确指出，无论在革命，或是在建设中，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我们过去和现在之所以犯错误，就是思想不对头，主观与客观相违背。所以，我们现在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反对思想与客观实际相脱离。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中曾经说过，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克服思想上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进行，避免犯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就是要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开展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加强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想教育，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总结和研究。他也多次说过，过去几年党的工作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结果。

2.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建设党。

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条重要原理。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最高目标和历史使命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纲领。政治路线是总揽全局的，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行动方向，是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统一的基础，同时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所以，党的思想建设必须联系党的政治建设来进行。

毛泽东在处理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关系时，还特别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同党的主要任务相一致的思想。毛泽东早就告诫全党：

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

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

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是谈军事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但实际上为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如何把从思想上建党密切联系政治路线建设党指明了方向。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怎样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也就是说,党的建设应当沿着什么正确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中,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的。1956年后,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指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到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基于这一分析,毛泽东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到建设上来的决策,同时还强调了党的建设如何与党的这一政治路线相结合的问题。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对于把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是有重大指导作用的,为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党的建设问题指明了方向。

实践已经证明而且必将继续证明,党的思想建设与政治建设是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基础,政治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中心环节。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必须把这一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密切联系起来,从而真正抓好执政党的各项建设。

3.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党的思想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要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所以,毛泽东认为,解决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关键问题,是解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进而达到用马克思主义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才能真正解决好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才能使广大党员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去同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有效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毛泽东早就告诫全党:

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①

所以，无论革命斗争的环境如何恶劣，毛泽东都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党员的思想，作为从思想上建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在延安领导整风运动时，也是重点解决好如何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在整风运动中，首先就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是由于毛泽东一直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极其重要的环节，所以，才使我们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使我们党经受了种种考验，领导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建国以后，为了使党员和党员干部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毛泽东在提出从思想建设执政党的时候，又一次将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举措，把认真学习理论与党的思想建设紧密结合起来。1951 年 2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应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为了加强对党员理论学习的组织和指导，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按照党员和干部的原有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分别编为高级组、中级组和初级组，所有党员，不论职别高低都要参加学习，从而在全国出现了理论学习的热潮。为了适应全国广大党员和干部理论学习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著作的编选、注释和出版工作。1953 年，又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负责马、恩、列、斯的《全集》和《选集》的编译工作。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的相继出版发行，大大推动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由毛泽东多次审阅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

“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3—1094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①

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更是明确指出:

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

党的八大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有失误,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却一直是非常强调的。1958 年 11 月后,毛泽东针对当时人民公社运动出现的混乱现象和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向中央、省、地、县四级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共产主义社会》。此后不久,毛泽东又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提出重新教育干部,开展新的学习运动。后来,毛泽东还把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首要条件。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时,非常注重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修养,所以,使我们党内的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较强的认识问题、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这一制度的完善与否及能否在实践中得以有效地遵循,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内的民主状况更是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民主状况。因此,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也就成了执政党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极其宏伟艰巨的事业。只有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的贯彻实施,增强党的纪律和凝聚力、战斗力,使我们的事业顺利地向前推进。

---

① 参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8 册,第 345 页。

这一点，毛泽东是早就认识到了的，而且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主义和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就多次论及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就告诫全党同志：

“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①

建国后，毛泽东对推进党内民主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健全和巩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53 年，毛泽东针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事件，反复强调要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分散主义。1955 年 3 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②

1.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怎样才能真正把自己建设成领导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呢？毛泽东多次强调：唯有扩大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毛泽东始终认为，为了实现党的坚强领导，必须有一个坚强而统一的组织。而这种坚强而又统一的基础和源泉就是民主集中制。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结合起来的有机体。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党就不会有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就不可能实现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所以，执政党的建设必须依靠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增强党的战斗力。

毛泽东历来强调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认为全党必须遵守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四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9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391—392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

一是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因为,党的领导机关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选举产生的,它是执行和行使广大党员赋予的权力的,所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特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自觉接受党的监督,执行党的方针,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果个人的意见对组织的决定有保留的话,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向上一级党委提出声明,但在上级或本级党委没有改变决议之前,在行动上必须执行原来的决定。只有这样,党组织的肌体才会永远保持健康,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才会不断提高。

二是下级服从上级。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当然,上级机关也要经常听取下级机关的意见,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并给予及时解决。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机关不要干预。

三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发挥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毛泽东早就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四是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所有的重大决策和决议,都是在经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作出的,是代表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所以,只有严格地执行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条纪律,党才能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任务而奋斗。要做到全党服从中央,最关键的是严格遵守两条:一条是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另一条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自觉地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然,各级地方组织在不与党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定发生抵触的条件下,党的地方组织应有自主决定权,以利于因地制宜。

毛泽东还认为,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也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广大党员的意见。党之所以坚强有力,就是因为我们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建立在党内高度民主基础之上的,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这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厂。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生产;没有数量上充分和质量上乘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凭上级机关掌握的那一部分材料,或者说是不太真实的材料来决定问题,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因而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也就无法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2.健全民主集中制,努力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建国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民主集中制,来造成一种和谐的局面。他曾高瞻远瞩的告诫全党: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以及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面且为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确立了基本的目标。毛泽东始终认为,要在党和国家生活中造成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关键是如何将民主集中制全面运用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这既是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基本要求和保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红色革命根据地创立时期,就要求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应用于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他曾经对开创根据地的同志们说:

"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①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又进一步告诫全党:

"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①

建国以后,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更加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引入国家政治生活中。1957年,他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发。毛泽东说: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②

这就是说,集中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自由则是有领导的自由,民主也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并系统地阐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大意义。毛泽东说: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③

3.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反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

毛泽东认为,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是同集中制根本相对立的两种错误倾向。如果对民主集中制不适当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忽视另一个侧面,都会削弱甚至破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这一原则。只有同时注意反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这两种错误倾向，才能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

毛泽东认为，反对个人专断对一个领导者来说，主要是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发扬民主作风。也是说，要让人家说话，并让人家把话说完；要广泛听取意见，并注意改正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毛泽东早就说过：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会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①

二是注意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形成个人专断的基础。个人崇拜的危害之一，就是把党的领袖神化，轻视和否定人民群众的作用，无限夸大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还是非常注意反对个人崇拜的，他曾经约法三章，提出不祝寿、不敬酒、不与马列平起平坐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团代会上，他专门指示起草报告的同志，删掉了“毛泽东思想”一词；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等一系列文件中，他也极力主张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重申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党内产生了个人崇拜的现象，使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破坏。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吸取的。

毛泽东还认为，反对极端民主化，就是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所谓的绝对民主。极端民主化的特征是不顾大局，不顾整体利益，脱离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不遵守党的纪律，不执行党的决议，在党内传播各种非组织的言论和“小道消息”，等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毛泽东曾经说过：

“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②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294—295 页，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88 页，1991 年 6 月第 2 版。

四、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执政党的作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毛泽东关于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时期,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在执政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继承和发扬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党内很快出现了一些不良的作风,如贪污腐化、贪图享受、脱离群众、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等等。如果不克服这些坏的作风,我们党就不可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所以,毛泽东多次指出,好的党风,是我们领导人民打倒敌人,完成革命任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来说,作风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要求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建国以后,他又多次提出,力戒骄傲,这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没有犯过大的错误,面且在工作中有了较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当如何防止骄傲情绪滋长呢?毛泽东提出了两条办法:一条是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另一条是在纪律上作出若干规定,从制度上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

二是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毛泽东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起,一直到党的八大召开,多次提醒全党同志,要提高警惕,注意敌人变换手法向我们进攻,用财色来拉拢、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三是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认真学习经济,使自己由外行变成内行,以良好的工作风貌来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学习经济工作,对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认为,党和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否学会领导经济工作,关系到党的总任务能否实现,也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能否巩固,更是关系到我们在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能否取得胜利。所以,作为执政党,在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必须下大力气来抓经济建设,并把这

个问题放在加强党的建设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来认真对待。

毛泽东对党在执政时期的作风建设问题，并根据新时期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阐述了加强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1.大力改进思想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反对主观主义。

思想作风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长期以来，我们党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客观反映，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灵魂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在新的世纪里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所必须具有的精神风貌。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早就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多次强调，我们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克服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怎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克服主观主义的倾向呢？毛泽东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要深入实践，作好调查研究工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的出发点。毛泽东一直是重视调查研究的，并总结出了"解剖麻雀"、"蹲点"等行之有效的方法。调查研究的形式，可以亲自下去调查，也可以派人下去调查，还可以向自己身边的人调查。在解放初期和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往往是这三种形式并用。他曾数十次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亲自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他也多次派自己身边的人下基层了解实情，并要求他的秘书、卫士回家探亲时实事求是地向他提供一份调查报告；他还向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向他的同学、亲戚朋友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二是，坚持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调查研究、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和筛选，再将实际的东西与理论结合起来，得出正确的结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运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说，把我们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理论分析后，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找出其带规律性的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西。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由于条件和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由于"大跃进"以后浮夸风和主观主义日益严重,党的优良作风在一些党员和干部中开始淡忘。毛泽东针对这一情况,多次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主观与客观相一致。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就强调了工作作风问题。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并就此作了自我批评。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其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用片面、孤立和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唯心主义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凭自己的主观想象,违反客观规律,所以,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要受到挫折,甚至遭受失败。形而上学也是主观主义,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

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相互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反对主观主义,必须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倾向。教条主义重视理论而轻视实际。其特点是,不从实际出发,只从本本出发,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不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国情,来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并得出结论,而是抛弃马列主义的本质的东西,把个别词句当作教条。另一种是经验主义倾向。经验主义只重视实际而轻视理论,看不起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他们往往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只注重局部经验,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显然也是错误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是一致的,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这两种错误倾向是我们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时必须坚决反对的。

2.改进工作作风,坚持走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优良作风。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核

心内容。毛泽东早就谆谆告诫全党：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毛泽东还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核心问题。1957年3月，毛泽东就说过，要通过整风，使我们的这一优良作风好好地发扬起来，提高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怎样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调党员、干部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以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共产党执掌政权同历史上其他王朝更替的本质区别在于，共产党执政以后，党员、干部不是官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好处。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必须为人民服务。"并一再重申，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还说，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摆官架子。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第一是"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思想感情深入到我们的脑筋中来"。第二是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第三是打倒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二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脱离了内容的形式，不符合内容实际的形式，被无限夸大了的形式，都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格格不入的。形式主义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假。有的干部爱汇假报，报喜不报忧，追求所谓的政绩，在数字上做文章，从而出现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现象。浮。有的干部工作不扎实，浮在上面，习惯于做表面文章，不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做过细的调查研究，成天沉湎于文山会海和应酬接待；有的贯彻上级指示和决定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单位实际，搞"一刀切"，不切实际地乱提口号。虚。有的干部只图虚名，不干实事，成天只说空话、套话，只重唱功，不重做功，等等。毛泽东多次指出，以上种种不良的作风，如果不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其要害是高高在

上,做官当老爷。官僚主义在中国有很深刻的历史根源,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的必然产物。这种"官本位"的观点认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有色,就有了一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种"官本位"意识的最好的注脚。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个别党员、干部受这种"官本位"的影响很深,为了当官而不顾群众的利益,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为了当官而吹牛拍马、不择手段。还有的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主观主义,脱离实际;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办事拖拉,软弱涣散,推脱责任;以权谋私,骄奢淫逸,贪污腐败,等等。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官僚主义导致了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了官僚主义,二者的根子都是个人主义,与党的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勤政廉洁的工作作风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些问题恰恰又是广大人民群众最能看得见的,是最能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的,所以,改进党的作风必须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着力点来抓紧、抓好、抓落实。

3.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认为,谦虚谨慎的作风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优良作风之一。所以,他在建国前夕就号召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护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并认为这是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必要条件之一。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样,就使得一些党员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容易产生骄傲自大,脱离群众。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反对骄傲自满情绪,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提出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也号召全国人民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

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在总结高饶反党事件的教训时,再次语重心长地说: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词中,又一次提醒全党要防止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并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

真理。"①

1963年12月,毛泽东特别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党内指示,公开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的不良作风。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总体上看,其主流思想是主张反对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的。他在其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也是谦虚谨慎的。他的这一宝贵思想,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学习和铭记的。

在提倡反对骄傲自满、发扬谦虚谨慎作风同时,毛泽东还极力主张在党执政的情况下,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建国以后,他多次强调要反对贪污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1955年,毛泽东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就明确指出: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②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1957年,毛泽东针对一些中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闹名誉地位,追求享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这样一些实际情况,及时向全党敲响警钟,明确指出:"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③

毛泽东在要求全党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还深刻揭示了艰苦奋斗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内在关系。毛泽东说:

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页。

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事实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许多有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光辉思想,为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以自己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为全党树立了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

五、巩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毛泽东执政党政治战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特别是他提出的"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的论述,从本质上阐明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的建设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亲自主持起草的、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就明确告诫全党:

"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①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②

1.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是党的力量所在。党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不仅因为党的主张是正确的,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且在于党团结了全体人民,在于党的自身的团结和统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1953年至1954年,我们党内发生了一次分裂党和破坏党的团结的反党活动。那就是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活动。针对这一事件,毛泽东主持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同志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并就如何增强党的团结问题提出了六条原则和规定。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任何野心家、阴谋家的分裂活动,将是一个长期的斗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71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73页。

争任务。因此，在反对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斗争中，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坚持光明正大的原则。毛泽东说：

“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①

2.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他曾告诫全党同志：

“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② “（一）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必须改正。（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③

特别在我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更是将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到政治战略的高度，反复强调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在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73—7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

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明确地说：

“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①

很显然，毛泽东始终把执政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看作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和最重要的基础；把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视为无价之宝。这是因为，如果共产党本身不团结的话，就无法团结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地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只有共产党经过党内的团结，才能达到无产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只有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一切敌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党的光荣使命。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谁不懂得党内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不高度重视党的团结和统一，谁就不能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也就无法推动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

3.党的团结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这已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但是，党的团结又不是没有原则的，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组织和纪律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们团结。因为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最基本的原则。实践证明，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全面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调动党员积极性、增强党的团结、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党的团结，从组织上讲，也就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一致。没有这种组织上的一致，全党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我们党是统一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党。毛泽东在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

“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少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②

毛泽东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广泛民主，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

主要是党内民主。这是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而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毛泽东说：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及派性，反对任何损害党的团结统一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毛泽东早就说过：

我们一定要建设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消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对内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全国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通无阻。

毛泽东始终主张，在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上，一定要根除派性，坚持党性原则。只问他是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而不应因为私怨而耿耿于怀，排挤打击，不应由于亲疏面有不同的对待；更不允许搞小圈子，不允许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了我们党在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历史经验，突出地提出了不准在党内搞秘密集团。他谆谆告诫全党：

“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①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仍十分强调党内的团结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搞秘密小集团。他发现和觉察到了林彪的非组织活动，并多次提出批评，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对林彪搞小组织活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及时粉碎了林彪企图分裂党的阴谋。当江青反革命集团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后尘，企图以破坏党的团结来搞乱人们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的思想,以达到他们乱中夺权的目的时,毛泽东又及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同党的领导同志的谈话中,严厉的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搞宗派活动的错误,为我们党后来能顺利地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思想基础。

4.共产党员要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模范。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之所在。广大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1954年,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时就明确指出:

"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主要关键。"①

(1)党员干部要带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在维护党的团结的问题上,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关键中的关键。各级领导一定要身体力行,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真正在广大党员中起到表率作用。毛泽东一贯认为,党的干部队伍的团结,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团结,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团结,才会有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党的基层组织的团结,才能使我们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从而影响和带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如果领导干部不团结,就会影响党委的团结,影响党和群众的团结,影响群众的情绪,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最终影响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基于此,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指出:

"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②

(2)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认为,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是辩证的统一整体。要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是辩证统一关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团结是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斗争则是达到党内团结的重要手段。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离开党的团结,片面地强调党内斗争,势必要破坏党的团结,甚至造成党的分裂。同样,如果放弃必要的党内斗争,单纯强调党的团结也是非常错误的,它不可能实现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党的团结和统一,只有通过党内斗争才能实现。因此,在党内必须开展积极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7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3)要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和犯过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认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同主张和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只要是不违反党的基本原则，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政治立场的，我们就要从大局出发，做好团结工作，促使那些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同志转变观点。所以，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而且还要善于团结犯过错误，甚至反对过自己，但被历史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毛泽东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阐述了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人多一点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翘尾巴。

总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一直非常重视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重视执政党的建设，所以，他不仅把制定和实施执政党政治战略作为他整个政治战略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作为保证其他政治战略实现的重要的组织保证。毛泽东始终注重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并身体力行地在执政党建设中起模范表率作用。毛泽东执政党政治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党政治战略的创造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织部分。毛泽东的这一政治战略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